劉益昌、Ann HEYLEN（賀安娟）
主編

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Ⅴ：早期南瀛

Nanying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Ⅴ：
Early Tainan Region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ainan City Government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Tainan Are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探究過往，鑒往知來

早在有歷史記載以前，原住民族已在廣袤的南瀛大地上深耕居住生活。歷經荷蘭、鄭氏、清朝、日本等政權直到今日，臺南這塊南方的豐饒土地孕育出眾多生命、先後接納了不同族群，人們也在如此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胼手胝足，齊力打拼出如今臺灣的樣貌。

「早期南瀛」正是指臺灣位處原史與歷史時期之間的交接期。當時原住民族已經在這裡發展出獨特的生活模式；而後由於歐洲「尋找東方」的大航海時代來臨，荷蘭人首先因為貿易所衍生的統治活動帶來不同的文化，改變了原、漢住民的原本生活樣貌，從而使得這個區域產生衝擊與演變。做為臺灣史上第一個「外來政權」，荷蘭移民與原住民族及漢人之間的關係，在時間的演進下持續互動融合，同時也使得臺灣歷史初期發展的樣態逐步成形。

2018 年我們特別針對這個主題，邀請來自越南、馬來西亞、日本、中國、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等 8 國的專家來臺與本國學者共同以「早期南瀛」進行深入的學術交流與探討，會後並由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成立編輯委員會，將與會所有文章精心編整後出版。在此過程中，偉哲特別感謝本次會議的主要組織者－劉益昌老師以及賀安娟老師，由於兩位老師及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委員們的協助支持，本書方得以順利付梓。

即將到來的 2024 年不只是臺南城市 400 周年，也是臺灣近代史 400 年；本書所探討時代範圍，正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缺憾不足，其出版意義絕非僅止於一次會議學術討論的成果，更為臺南地方研究注入新的內涵。期待未來臺南學相關研究精益求精，持續累積歷史人文的知識基礎，蓄積城市發展的文化能量，讓臺南永續多元、不斷進前。

臺南市長 黃偉哲

導讀

臺灣政治經濟文化核心的建立：早期南瀛（10-18 世紀）

賀安娟、劉益昌

臺灣在 1980 年代開始了本土化運動，帶來對自我土地與歷史文化認識的心志，1986 年張光直先生倡議臺灣史的田野研究，逐漸形成風潮，在臺南縣縣長蘇煥智先生的倡議之下，邀集國內外研究古稱南瀛的大臺南區域學者，於 2003 年 4 月 5 日成立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除了支援學術研究與國際化之外，自 2004 年起，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即開始規劃舉辦研討會事宜，並且與成功大學歷史系合作，於 2005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假當時臺南縣柳營鄉江南度假村會議廳，正式舉行了「第一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主題定為「南瀛的歷史、社會與文化」，會中總共邀請國內外學者 26 人，並發表論文 23 篇，與會人士近三百人。此次會議可說是南臺灣首次舉辦的跨學科區域研究之國際性盛會，透過此一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研究、討論及激盪結果，使南瀛學研究開始針對到南瀛地區的人文、歷史與文化特色進行關注，除了激發新的研究課題而促使南瀛研究更為多元化之外，更有助於釐清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繼而讓南瀛研究成為顯學，並提升南瀛學術研究在國際上之地位，正式邁出一個具體的成就步伐。

接續的第二屆以「不停歇的江河、未休止的南瀛」作為主軸，探討南瀛地區古往今來各種層面的發展軌跡，或南瀛與其他區域之比較，對臺灣甚而太平洋地區所帶來的影響，主題包括環境變遷、移民社會發展、族群研究、產業發展、宗教與社會、政治與區域比較、文學與藝術、民俗文化。

基於前二屆的經驗，學術委員討論第三屆的會議議題集中於南瀛地區複雜的宗教發展，而以變遷中的南瀛宗教為主題，探討不同的宗教議題，包括西拉雅傳統宗教、漢人民間宗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日治時期宗教以及其他新興及新近外來宗教，獲得豐碩成果。在 2012 年 10 月第三屆國際會議圓滿閉幕時，南瀛中心的學術委員會決定在 2014 年舉辦第四屆會議，主題訂為「南瀛的社會與生活」，探討自史前以至現代，南瀛區域社會與生活因為時代演進與變遷，所呈現的多樣性面貌，並比較與臺灣其他區域的異同性，同樣獲取重要的研究成果。

歷經四屆十年的發展，南瀛研究已經逐漸為國際學術界認識且重視，成為臺灣研究的重要指標性學術會議之一。因此循例在 2017 年舉辦第五次學術研討會，思考南瀛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形成過程，如何成為臺灣政經文化核心，因此議題訂為「早期臺灣政治經濟文化核心的建立：早期南瀛（10-18 世紀）」。「南瀛」泛指日治時期臺南州，包括今日的臺南市、嘉義縣市以及雲林縣，是臺灣最早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中心。居住在這片土地的人民，擁有特有的生活型態與社會結構，甚至是人群組織。會議內容以文化發展與社會變遷為主軸，說明當今南瀛區域文化的演變和臺灣早期政治、經濟重心的建立過程，包括史前與原住民社會、漢人移民到在

地化過程等文化與社會議題。這次會議使南瀛學研究開始針對到南瀛地區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建構過程，以及研究回顧為主。

此次會議假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舉行，討論早期南瀛作為臺灣政治經濟文化核心的建立過程，時間以 10-18 世紀的發展為主，表達出對南瀛學研究的持續關注與深入探討。此次會議共吸引將近 300 人次參加，與會學者總共發表 18 篇論文，探討範圍涵蓋南瀛地區古往今來各種層面的發展軌跡，思考臺南做為早期臺灣政經、社會、文化核心的形成過程與要素。會議結束後，循例由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組成編輯委員會議，先行針對各篇發表論文內容進行評選，每篇文章再延請 2 至 3 位審查人協助進行詳細審查，最後共擇取 13 篇論文進行收錄並集結出版成論文集，以為本次會議之進行留下具體的學術成果。而在本論文集當中所收錄的論文，依據本身的論述與研究回顧為主軸，我們大致可以將之分為「文獻研究與原住民史」、「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相關議題」、「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經濟與貿易的變遷」、「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與文化實踐的變遷」、「鄭氏王朝及其國際網絡」等 5 種研究面向，本書討論的核心議題，大致以荷蘭時代的文獻，如《熱蘭遮城日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還有古地圖，入港指引，以及當時留下的語言資料做出發點，強調其對臺南發展史的重要性。另外本書也顯示當時的臺南與其他地區的往來，不限於日本、中國與印尼，也延伸到英國與中東的貿易網路，以下將進一步說明。

第一部份－文獻研究與原住民史

在「文獻研究與原住民史」的部分，共收錄劉益昌、蘇峯楠兩篇相關論文，兩者皆從古荷蘭的地圖角度進行理解與談到原住民史。

劉益昌〈原史時期（10-16 世紀）臺南區域的歷史地景變遷〉一文，除了使用荷治初期的地圖、文獻之外，也參考自然科學如地形、地質資料，探討 17 世紀以及更早階段的歷史地景，說明 10-16 世紀變遷過程，並延伸至十七世紀，思考臺南區域做為十七世紀以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重心的自然與人文背景，並做為進一步探討的依據，這是至目前為止探討臺南原史時期歷史地景的第一篇文章。

蘇峯楠〈〈赤崁耕地圖〉所描繪的 17 世紀中期臺南地景及其歷史空間〉一文，利用文獻與地圖，說明 17 世紀中期臺南台地土地利用與農業地景變遷。參考前輩學者著作，從耕地圖製圖之前的赤崁空間、耕地圖的繪製、版本與使用，詳細考證說明耕地圖的年代、版本與特性，並對於自然地景與人造地景、農耕地進行比定，綜合觀察整張地圖，最後提出一個殖民式耕墾形成的概念，指出這些制度是否在鄭氏及清治時期，是否有承襲、轉化或者變遷，是一篇細膩的歷史考證文章。

二篇文章前後連續，足以做為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討論的基礎資料，也說明臺灣歷史從史前、原史到歷史時期發展的延續性。

第二部分－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相關議題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相關議題」的部分，共收康培德、Christopher JOBY、賀安娟三篇相關論文，針對語言密切互動關係的論述。早期臺灣歷史主要使用的語言並不限於漢語，而是包含荷蘭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日文及南島語。況且當時的荷蘭語還沒標準化；荷蘭共和國剛成立，移民從鄰近地區帶來他們的母語（法語，德語與拉丁文），這些語言都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語言成分。另外，荷蘭人在亞洲的運作也需要使用較早期就已經存在的葡萄牙語，日語及南島語等語言。

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及周遭地區的漢語地名〉一文，討論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活動時留下的文獻資料中，被紀錄下來的南瀛地區漢語系地名，嘗試勾勒出當時福建唐人在南瀛地區活動的地理範圍。本文以文獻中的漢語語系地名開始，再說明了賸港地名、墾地地名、賸社地名的臺灣地名部分，在後記，作者提出一些主題，語源為漢語的地名若是出自部落、村社的一地二名現象，那麼何者是漢語語源的他稱？何者是南島語語源的自稱？這當然牽涉論文一開始提及，是否能在東亞其他漢語系通行區或東南亞唐人足跡曾蒞臨之處，找到有相同或類似讀音的漢語系地名。若有，則臺灣的案例源自南島語的可能性即降低；如「雞籠」即是明顯的案例。作為結論，作者認為語詞屬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相當的動態性，可見有其複雜的面向。

Christopher JOBY “The Dutch langu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and Japan: a case-study in language spread” 一文，以殖民語言學的論述為主，為 17 世紀的荷蘭語在臺灣，日本及印尼東部的馬魯古做了比較研究。對荷蘭語在臺灣的發展史部分，作者雖然依賴賀安娟之前出版的研究，但是他更重要的貢獻是將日本的蘭學（rangaku）發展史與 VOC 在臺灣的語言政策比較。對於影響語言傳播的因素，作者以中央政府，傳教語言，語言競爭和語言地位分開進行觀察。為了說明荷蘭語在臺灣相對成功的傳播結果，作者引入印尼馬魯古作為第三個比較的案例。其結論顯示，在馬魯古有葡萄牙語和馬來語作為既存的溝通語言，所以即使荷蘭人在馬魯古有更深入的統治活動，荷蘭語仍然無法成為跨族群的溝通語言。相較之下，臺灣缺乏如同馬魯古的條件環境，因此荷蘭語的傳播能取得相對較大的成功。

賀安娟的 “A ‘Sense of Place’in Geocultural Dutch Formosa Mapping” 一文，以數位人文的方式整理荷蘭文的文獻，結合了數位軟體和荷蘭檔案手稿，討論 1643 至 1649 年在臺灣東印度公司荷蘭人的移動性。本文首先介紹如何從檔案手稿中擷取資料的步驟，輸入程式軟體內製作數位地圖。然後進一步描述關鍵字的選擇，以及描繪空間移動時所面臨的困難點。最後本文討論學術性資料庫如何加強學術上的應用，以及讓它能夠盡可能接觸更廣泛且多元的群眾。本文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相關議題的貢獻，在於它結合歷史地理資訊系統（GIS）和空間人文的方法，運用大數據來深化臺灣的歷史研究。

第三部分－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經濟與貿易的變遷

在「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經濟與貿易的變遷」的部分，共收錄鄭維中、坂井隆、島田竜登三篇論文。這些論文討論從荷蘭時期到清中葉的歷史，並強調歷史中的經濟與貿易的因素。

鄭維中的〈荷蘭時代大員港的入港規範：駁船、旗號與盪纓〉一文基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留存的「入港指引」內容，嘗試搭配其他殘存資料，來復原大員港之「入港規範」運作狀況。並兼及描述大員港之引水員與領港艇之沿革、大員港道之歷年深度變動，以勾勒荷蘭時代大員港港務運作實態。本文介紹歐洲當時所用的海岸里程航路指引，說明大員港包括海圖、海岸識形與水道標旗等等的入港規範，研究結果顯示，即使到了清代，安平居民仍沿用荷蘭時代的辦法，讓這個港口能夠持續營運下去。由此觀之，荷蘭時代的港務設施，經過鄭氏時期之因革損益，時至清初，仍持續發揮功能，而使得安平—赤崁保留港口吞吐作用，持續影響著清代臺灣的發展。

坂井隆(SAKAI Takashi) “The trade network between Nagasaki, Banten and Anping in the 1670s” 一文，也透過港口的研究，強調日本、臺灣與印尼之間的貿易網路，作者基於他在1991年至2006年於印尼所進行的調查研究，利用考古學發掘的遺物作為證據，輔以相關資料，針對景德鎮陶瓷貿易的往來進行了綜合考察，本文不只說明了17世紀末在東亞的安平、長崎，以及在東南亞的Banten三者之間的海洋網路，作者還特別注意到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角色，依據景德鎮陶瓷的出現在這三個港口的情況，顯示這個貿易網路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離開臺灣後依然繼續。根據一封來自英國東印度公司廈門

商館的貿易信作為佐證，可知這樣的貿易網絡一直延續到鄭氏時代（1682年）。

島田竜登 (SHIMADA Ryuto) “Tayowan as a Global Center: Trad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一文，從全球與亞洲經濟史的角度主張 Tayowan 的歷史重要性。作者將論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他從全球角度分析荷蘭在海洋亞洲的擴張，然後討論 Tayowan 如何保持 VOC 在海洋亞洲主要貿易中心的地位。其次，他強調白銀貿易的演變，並以此說明 VOC 的亞洲境內貿易的狀況。作者特別說明 VOC 作為日本和中國之中間貿易商的中心地位在 17 世紀中葉（1650 年代以後）開始發生變化，主因是日本的白銀減產，同時也減少了白銀的出口。第三，作者進一步說明 Tayowan 如何在亞洲經濟史上扮演了另一個重要角色。VOC 在臺灣引入了蔗糖生產體系，因為公司想要在商業以外，透過土地開發獲利。到 1650 年，從中國進口轉運的糖被臺灣出產的糖所取代，出口到荷蘭、薩法維朝的波斯王國，德川幕府的日本和其他亞洲市場。

這三篇論文對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經濟與貿易的變遷研究之貢獻，在於鄭維中與坂井隆的兩篇論文顯示了荷蘭時期進入下一個歷史階段時，經濟和貿易實踐的連續性，島田竜登的研究貢獻則提到東亞與東南亞以外的貿易網路，並且延伸往中東的方向，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值得關注的新領域。

第四部分－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與文化實踐的變遷

在「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與文化實踐的變遷」的部分，陳計堯、康尹貞、簡宏逸的三篇論文，繼續從荷蘭時代荷蘭到清中葉的文化實踐連續性之理解與探析，這三篇提出的歷史連續性角度，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陳計堯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Pre-Nineteenth-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十九世紀以前臺灣「府城」的歐美銀幣）一文，重新探究歐美銀幣流通的歷史，以檢驗該種硬幣在社會與經濟上的意義，就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課題。臺灣「府城」在十七、十八世紀曾經在島際與島外貿易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該城市及其周邊地區也普遍存在大量歐美銀幣流通的情形。不過，十九世紀末的紀錄卻發現島內竟然不存在類似在寧波的錢莊一樣的金融機構，令人好奇在臺灣貿易、商業、貨幣與金融之間發展的連結。本文所參考的，包括地方志、地契、碑文與考古報告等資料。初步的調查發現，雖然「府城」地區在清帝國之下經歷「漢人」的殖民運動，卻繼承了來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歐美銀幣的傳統，最終使本地所轉變的型態，與清政府所期待的大相逕庭。

康尹貞〈從 17、18 世紀大員／安平、府城、臺灣縣戲劇文獻看華人戲劇在臺灣的傳播途徑與傳播中心〉一文，表示華人戲劇傳入臺灣並非從清朝統治才開始，只是荷治與鄭氏東寧王國時期戲劇史料特別難尋，因此作者利用跨戲劇的概念，展開大範圍視角，採用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所謂《空的空間》，展開了對大員／安平、臺灣府城、臺灣縣的華人戲劇活動深入觀察。從歷史文獻的調查，可知這些標示「臺灣」或「臺」之戲劇文獻，

戲劇活動大部分是發生於臺灣府城，其次為安平和臺灣縣，而非指當時臺灣府全境。19 世紀以前，大員／安平、府城與臺灣縣，華人戲劇活動具有領頭的重要地位。產生華人戲劇活動的背景，也和港口城鎮的景象密不可分。請戲的人包括了統治階級文武官員、商人階級，尤其是從事進出口貿易者，他們為娛樂、酬神等目的，促成了府城的戲劇活動。以結論來說，文獻整體所呈現的華人戲劇在臺傳播路徑，乃是由海岸向內陸，由港口城鎮向鄉村發展，與對外貿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作者認為「橫向移植」的模式，從荷治時期便已開始，並持續至今，成為臺灣劇場史的特點。

簡宏逸〈被農業覬覦的湖水：租稅政策與鯽魚潭的消失，1645-1900〉一文，以臺南府城東邊鯽魚潭的租稅歷史為考察對象，嘗試比定清代的鯽魚潭在荷蘭檔案中的名字，並從荷蘭檔案中尋出鯽魚潭漁業稅的源頭。接下來他討論這筆稅收如何被後續的政權繼承、改造，甚至到了鯽魚潭全面陸化的時期，名目上的漁業稅仍然存在了一段時間，直到清末劉銘傳清丈後才消滅。作者特別對稅額與其名目深入考察，並且以歷史連續性的方式，研究鯽魚潭的稅額和人民的負擔。本文利用荷蘭時代和清代的文獻論述鯽魚潭租在歷史上呈上升趨勢，並探討了鯽魚潭周邊社會隨著潭水陸化而產生的變化。他也特別注意到，有時清代文獻中有沒有詳細資料來說明當時漁業的規模，也無法從其它方法推估，因為清代時的稅額並不反映漁業規模。但是由於鯽魚潭陸化而逐漸增加的農業稅額，則有相對詳細的紀錄可供追尋。由於作者強調歷史連續性的重要性，所以本研究從十七世紀一直討論到 1900 年，完整呈現了鯽魚潭的租稅歷史。

第五部分－鄭氏王朝及其國際網絡

在「鄭氏王朝及其國際網絡」的部分，收錄葉春榮與張隆志兩篇相關論文，兩者皆從不一樣的角度來看鄭成功如何對臺灣社會當做一種文化實踐的表現。國姓爺的歷史作為現在跟過去不斷的對話，除了強調其本身歷史事實的考證，亦應重視其相關知識與形象的傳播及影響。

葉春榮〈大神吃小神：談鄭成功封神〉一文，要討論的是神明標準化的問題，因此就不擴及儀式標準化，文化統一等議題。作者以鄭成功封神的例子來討論美國人類學家 James Watson 的神明標準化的說法。在歷史的過程裡，台灣有些奉祀鄭成功的宮廟確有以鄭成功取代其他神明之事，但鄭成功被封為神並取代其他小神，則與朝廷政策、文化統一無關，並不是出於政府的推動或仕紳的配合，因此 Watson 的說法不能讓人信服。大神吃小神的事情不只是發生在香港，在臺灣更不少見。最後，作者認為由本文討論的鄭成功封神的發展看來，有的學者只要一看到姓朱的王爺就說是鄭成功，已經變成是一種機械反應，這也就是筆者在本文最前面引用列子那段話的意思，當一個人心裡有成見時，越看就越像。這樣的歷史的確如 Foucault 所說的從來都不是客觀公正的，都是歷史學者帶有目的的論述。

張隆志〈國姓爺在台南：鄭成功文化節與府城公共歷史記憶初探〉一文，以臺南市鄭成功文化節為例，從當代臺灣公眾歷史的觀點，探討其由地方藝文節慶，逐步轉型為跨國觀光意象的發展歷程及社會意涵。作者自 2010 年以來的實地研究，對於臺南市鄭成功文化節活動進行初步探討，本文應用公眾史學與記憶研究的觀點，來反映了歷史人物與集體記憶的互動關連，因次

本文的架構站於三個支柱；鄭成功文化節對臺南的都市發展與文資政策，結果來十七世紀海洋史與鄭成功論述，還有臺南在地文史研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之一，所以可說明從「鄭成功是誰」的爭議到「鄭成功如何被紀念」的反思是臺南市鄭成功文化節作為當代重要的公眾歷史個案。不果在結論，作者對於促進歷史學與文化資產研究的跨領域對話提出個重要的課題給大家反思；未來如何結合知識溝通與傳播的探討可持續成為承載臺灣島嶼歷史的「記憶所繫之處」。

以上是此次論文集所收錄的研究成果。從中可以發現，這些研究成果涵蓋考古、地形、歷史、文化研究不同學科的不同層面，內容同時論及自然、歷史、社會、地理、經濟、宗教、教育、建築等諸多面向，呈現出一種多元式的文化圖像，尤其注重歷史的延續性，時間跨距從 10 世紀到 18 世紀，並延續至當代的現象，實為豐碩的跨學科學術成果。而這本論文集的付梓，將以上的成果共同輯為一體，是為此次會議留下完美的句點；但是對於南瀛學研究的方向來說，卻是一座將朝向未來持續邁進的里程碑。我們期望日後南瀛學的研究，能夠再更持續深入探討、累積相關學術成果，正如此次會議主題「臺灣政治經濟文化核心的建立：早期南瀛（10-18 世紀）」所說的接續綿延，並且橫向擴展，說明臺南與臺灣歷史發展的特色，為這片南瀛土地，不斷累積更多的學術基礎，探索更多不為人知的深刻文化內涵，繼續共同拼湊這片巨大的南瀛文化圖像。最後特別感謝是溫勝智與簡宏逸幫忙校對的部分，以及臺南市政府與市府文化局鼎力支持，才能延續南瀛國際學術命脈。

CONTENTS 目次

ii **市長序**

黃偉哲 (HUANG Wei-che)

iv **導讀**

賀安娟 （Ann HEYLEN） 劉益昌 (LIU Yi-chang)

第一部份—文獻研究與原住民史

1 **原史時期（10-16 世紀）臺南區域的歷史地景變遷**

劉益昌 (LIU Yi-chang)

29 **〈赤崁耕地圖〉所描繪的 17 世紀中期臺南地景及其歷史空間**

蘇峯楠 (SU Fen-nan)

第二部分—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相關議題

81 **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及周遭地區的漢語地名**

康培德 (KANG Pei-te)

105 The Dutch langu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and Japan: a case-study in language spread

Christopher JOBY

135 A 'Sense of Place' in Geocultural Dutch Formosa Mapping

賀安娟 (Ann HEYLEN)

第三部分—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經濟與貿易的變遷

155 **荷治時期大員港的入港規範：駁船、旗號與盪纓**

鄭維中 (CHENG Wei-chung)

185 The trade network between Nagasaki, Banten and Anping in the 1670s

坂井隆 (SAKAI Takashi)

205 Tayowan as a Global Center: Trad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島田竜登 (SHIMADA Ryuto)

第四部分—荷蘭到清中葉漢人社會與文化實踐的變遷

221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Pre-Nineteenth-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

陳計堯 (CHAN Kai-yiu)

287 **從 17、18 世紀大員／安平、府城、臺灣縣戲劇文獻看華人戲劇在臺灣的傳播途徑與傳播中心**

康尹貞 (KANG Yin-chen)

327 **被農業覬覦的湖水：租稅政策與鯽魚潭的消失，**1645-1900

簡宏逸 (CHIEN Hung-yi)

第五部分—鄭氏王朝及其國際網絡

353 **大神吃小神：談鄭成功封神**

葉春榮 (YEH Chuen-rong)

393 **國姓爺在台南：鄭成功文化節與府城公共歷史記憶初探**

張隆志 (CHANG Lung-chih)

原史時期（10-16 世紀）臺南區域的歷史地景變遷 *

劉益昌
（國立成功大學 考古學研究所）

一、前言

從地質學或地形學的觀點，嘉南平原西側沿海的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所在，當受到臺南台地與曾文溪、八掌溪及牛稠溪影響最大。就整體而言，這個形成於古朴子溪、古曾文溪和臺南台地之間的區域，外受黑潮支流由南向北及沿岸流影響，加上季風影響形成的沙丘，共同構成一個外洋與內海的世界。由於外洋是黑潮和海底地形所形成的強勁水流，也就是俗稱的「黑水溝」，隔著南北向的條狀沙汕之內則是內海，從外洋穿越沙汕的缺口水道，就進入平靜而且擁有豐富生態資源的內海，內海內側邊緣及港汊、溪流二岸則形成重要的聚落。

從全新世中期海水面穩定以後，受到溪流帶來沉積物的影響，海岸逐漸向西側加積，留下不同時代的海岸線和聚落。十七世紀初年（1602-1603 年陳第撰述的《東番記》）到 1623 年荷蘭商人 Jacob Constant 與 Barena Pessaert 撰述的〈蕭壠城（社）記〉（江樹生譯註 1985：80-87，葉春榮編譯 2011：56-68）所描述的台江狀態，正是這種內海型態最晚狀態，也就是大家所熟悉歷史文獻與圖繪紀錄台江與倒風內海的樣貌，實際這個內海型態就地形變遷而言，已經逐步走入潟湖演替的最後階段。從整體臺灣歷史的發展而言，其中的台江是 17 世紀初年以來近現代到當代臺灣和世界交流的入口，同時也是如今臺灣人群和文化主流的漢文化人

※ 本文得到二位審查人細心審閱指出意見，已經部分修改，在此敬致最大謝意。

群以及漢文化的進入的重要場域。若放寬時間尺度至史前時代，無疑也是史前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重要入口之一。

本文建立嘉南平原地區延續史前晚期與文字歷史初期之間的原史階段的歷史地景，透過考古遺址的內涵以及最初的文獻記載，試圖復原此一階段人類與自然互動的場域，以作為荷治以來歷史早期階段的空間背景，同時藉由史前晚期遺址分布與文化發展的狀態，說明歷史延續性的意義。

二、研究前的理解

（一）地理區位與地形變遷

嘉南平原位於臺灣西南部，從濁水沖積扇以南到高雄平原以北的平原區域，偏南側的臺南是嘉南平原的核心區域，文獻紀錄以來可知是今日所稱西拉雅族的居住與活動場域。平原西側的海岸歷年研究已知具有重大變遷，東側的丘陵主要為嘉義丘陵以及新化丘陵，早年是通稱為大武壠群的原住民居住區域。後方的山地地區則以阿里山脈、玉山山脈與中央山脈作為主軸，北迴歸線恰好穿過這個區域的北側，整體地形包括海岸平原、丘陵以及山地地區三大區域，區域內的最大溪流是曾文溪，發源於中央山脈西側，穿越阿里山脈，溪流的上游山高谷深，但仍有不同高度的高山平夷面以及高低位河階可以作為人群居住與耕作之所，是日治初期以來民族誌記載布農族、鄒族分布的地區。

嘉南平原是一個隆起的海岸平原，地形平坦、廣闊，在平原中有早期形成的大岡山、小岡山等隆起珊瑚礁形成的小山，以及如國母山、鳳梨山等在沖積平原突起的丘陵延伸小山，也有受到構造運動而隆起的臺南台地、大湖台地、中洲台地等略微高起的台地地形。由於本平原面形成的年代相當晚，尚屬幼年期的海岸平原，除了在平原上發育的較小溪流之外，也擁有朴子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層行溪等發源於東側較高山區或麓山帶，穿越並切割平原面的溪流，這些溪流流域面積較廣，不但流水量豐富，而且帶來大量泥沙繼續堆積於河口及兩側平原邊緣的海岸地帶，平原面尚陸續擴大當中，因此海岸地帶地勢低

下的岸外洲、潟湖、沼澤相當發達，早期大多利用為養殖魚池或鹽田，近來則大部分被規劃為工業區使用。

從地史而言，以臺南為中心的西南平原地區，目前標高 35 公尺以下的地區在 6000 年前，全部為海水淹沒，至 5000 年前海水逐漸退出，只剩大灣低地為海水淹沒，5000 年前之後沉積物才將大灣低地逐漸填滿（陳于高 1993：141，陳文山主編 2016），歷史時期初，大灣低地靠近臺南台地東側邊緣後甲里斷層附近，仍為地勢低下蓄水成湖的鯽魚潭，直到西元一八二〇年代才因山洪爆發帶來大量泥流而淤積成陸。今日地勢仍然相當低下的古岡山灣、古典寶灣、古高雄灣與古倒風內海區域的成陸過程，可能與大灣低地相近，但年代則需更進一步研究。這種情形對海岸平原地區人群的居住環境影響相當深遠，早期人類生活留下的遺址分布位置，通常代表人與環境之間密切互動關係下選擇的結果，透過具有貝塚的遺址，也可以說明不同時期海岸線大致所在（林朝棨 1960）。海岸線的變遷與古代遺留的低地、沼澤分布，往往可以說明聚落分布的情形。從近世大航海時代以來，已有較為實測的地圖，古地圖描繪的海岸可見三、四百年以來海岸線的變遷異常激烈，海岸線與今日的距離往往在數公里到十數公里以上，古代的潟湖、海灣往往已經填覆成為陸地，做為今日人們營生的場所（劉益昌等 2011a），這些資料目前已有相當多研究說明，也為一般研究者熟悉。

（二）原史時代的研究意涵[1]

臺灣歷史學界通常以 17 世紀初作為文字歷史的開始，考古學界也將 17 世紀二〇年代之前稱為史前時代，由於學科屬性與研究議題的關係，因此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往往在史前史與文字歷史之間，形成斷裂的臺灣人類活動史（劉益昌 2014）。此一斷裂之關鍵時段，當在外部對臺灣已有少許文字記載的 10-16 世紀或 17 世紀二〇年代之前。早在 1960 年代，考古學家就曾經提出原史時代的觀念，宋文薰先生將臺灣的考古遺址區分為史前、原史和歷史時代三大部分（宋文薰 1961）。張光直先生也在中部地區的史前文化末期的番仔園文化和歷史時期的現代漢人文化之間，置入原史水平時期 Portohistoric Horizon（Chang *et al*. 1969：

1　此一段文字修改增加自劉益昌，〈考古學研究建構的原史時代台灣史〉（2012a）。

204），之後也在「濁大計劃」執行階段指出臺灣史前史四個主要階段，最晚階段的原史時期「即歷史上所知土著族之直接祖先，在考古學上有遺物遺跡可以代表的階段，大約始於西元第十世紀前後」（張光直 1977：4）。就臺灣考古學而言，原史時期應當是外界已經對臺灣本島具有少許文獻紀錄的階段，亦即本文所討論的階段。

歷年來臺灣的考古學研究者少有研究這個階段的議題與論述，筆者在 1995 年提倡史前文化和原住民關係的研究，提出應儘量將史前文化的年代推晚，得以和歷史初期相關連接，雖在討論過程中指出以年代距今 1000 年以內，甚至 600 年以內的史前文化做為「直接歷史類比」的連續比較基礎最為恰當（劉益昌 1995），不過並未能提出此一時期所具有的「原史階段」的特質，以做為比較研究的基礎。同一時期臧振華先生提出考古學與臺灣史的關連，主要從史前史的重建、早期歷史的探索和移民社會發展模式的驗證等三大方面說明，其中早期歷史的探索中，明末以前華人的經營談到早期文獻紀錄和澎湖群島宋元時期考古遺址，以及十三行遺址中出土唐宋時代的銅錢、銅器和少量瓷片，推測唐末五代時期漢人開始開拓澎湖，南宋時期開始有漢人居住建立聚落，且與福建沿海交易有無，同時也到達臺灣本島附近捕魚，並和當地的原住民進行交易（臧振華 1997），可說較為清楚提出原史階段漢人與臺灣本島原住民關係的議題，不過仍以漢人開發史的角度做為思考的方向。同一時間連照美教授以〈七世紀到十二世紀的臺灣－臺灣鐵器時代文化及相關問題〉為題，討論七世紀到十二世紀（AD.601-1200），根據歷史學家曹永和先生的研究，指出當時鄰近的中華帝國的《隋書》可能已有少量文字紀錄指涉臺灣，不過當時的臺灣本島是「富有地方特色與傳統的臺灣南島民族的古文化」（連照美 1998：2），並指出此一階段的臺灣尚處於史前史的階段，屬於發展最後階段的鐵器時代，鹿野忠雄所稱之金石並用文化不能成立，同時引用宋文薰教授的意見，認為臺灣鐵器時代史前文化中帶有幾何形印紋陶和普遍見於華南沿海的幾何形印紋陶相當類似，也同意鐵器時代文化與同一區域當代原住民族之間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連照美 1998）。連教授這篇文章點出較早階段，亦即 7 世紀左右《隋書》〈流求國傳〉所述的流求，依據歷史學家長達一百多年以來的討論，顯然較傾向為臺灣（曹永和 1979、2000）。由於《隋書》〈流求國傳〉、〈張稜傳〉說明當時隋朝只是出兵流求，並未和流求的住民之間產生具體的互動關係，

更遑論兩地之間是否具有人群或物質的互動關連，因此甚難以說明較早階段是否應在本文討論的範疇。雖然十三行遺址曾經出土五銖錢，以及可能屬於唐代的鎏金青銅碗，但目前難以肯定是否屬於十三行文化的較早階段，也許可以放在唐末五代之間，亦即 9 世紀末到 10 世紀。因此本文具體討論的時間，仍以 10-16 世紀，頂多向前延伸至 9 世紀末，向後延伸至 1620 年代荷蘭人、西班牙人直接進入臺灣本島之際。

整體臺灣人類活動史角度而言，不同段落的研究方法當有所不同，就如同張光直先生在〈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文中所提先秦史不同階段的研究方法（張光直 1995），同樣也可以運用到臺灣。舊石器時代幾乎全部需建立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學者所根據的材料主要從地質學、古地形學、古動物學、古植物學、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等不同學科的資料集合而來。從目前的理解，臺灣舊石器時代階段大致在更新世中期後段到最晚階段，當時海水面數度下降，臺灣海峽就是一片廣大的陸地，研究臺灣舊石器時代必須在東亞、東南亞舊石器時代的架構考慮。其次的新石器時代以至於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的早期，年代大約在距今 6000-1000 年，這是臺灣原住民南島系人群的祖先型態進入臺灣本島及週邊附屬島嶼，逐漸形成南島文化，分布於臺灣各個不同生態區位，進一步擴張於南方呂宋島以及環南海區域，甚至太平洋島嶼的階段，所有的研究成果均需依賴考古學的調查研究，始能建立此一階段人類活動史的演變過程生活型態及其與不同區域人群的互動關係。因此考古學者必須了解史前文化的特徵以及所處的生態環境，古生態環境的資料如同舊石器時代，也必須來自於地質學、古地形學、古生物學等環境科學，考古遺址資料的來源當然是考古學田野工作所得，不過此一階段的學者顯然也需要社會文化人類學以及民族考古學的資料，做為比對研究的基礎，而臺灣從日治時期以來的眾多人類學、民族學調查與研究資料，正是最寶貴的比對參考資料。

從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晚期，也就是金屬器時代距今約 1000 年開始到 17 世紀初年，鄰近的中國、日本已有部分文獻記載可能涉及臺灣本島的局部區域，尤其是中華帝國歷代文獻所記錄的「琉球（流求）」、「毗舍耶」、「談馬顏」，都可能指涉臺灣本島或一部分（曹永和 1979、2000）。這個階段考古學的資料如同上一階段新石器時代、金石併用時代，需要環境科學以及考古學田野工作和後

續的研究分析。除此之外，文字資料也逐漸加入到整個研究資料之中，顯然這是一個特殊的階段，也是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可以彼此對話和互證的場域，這個階段就是前述的原史時期。就考古學者和研究方法而言，仍然將此一階段歸屬於史前時代（張光直 1977：4）。

基於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對於臺灣歷史研究的時間段落和方法的落差，使得臺灣人類活動史經常以文字記載有無做為其分野，筆者沿續張光直先生書寫臺灣史的理念（張光直 1986、1994），以及曹永和先生臺灣島史的觀念（曹永和 1998、2000），思考歷史書寫應該從延續性和全貌觀的觀點著手，才能真切反映臺灣的人類活動史，也提出介於史前史和文字歷史之間的原史階段在臺灣史的重要性，並舉出北、東部海岸地帶擁有 Sanasai 傳說的人群，其文化來源、演變過程以及可能與分布於北、東海岸廣義 Basay 人的關連（劉益昌 2010、2011、2014）；也曾針對濁水沖積扇區域史前最晚階段的貓兒干文化和 17 世紀荷治時期 Favorlang 人的關係，提出考古學資料與文獻之間的實證研究，連繫史前末期原史階段人群與歷史初期的直接關係（劉益昌 2012b）。近年來歷史學者已經突破討論早期文獻所屬何地的爭議議題，逐漸進入原史階段到歷史初期人群在臺灣本島與附屬島嶼活動的狀態，逐步和考古學者研究無文字史前時代人群的文化內涵界定及時空分布、聚落型態、人群性格，以及社會、宗教、經濟等各方面的結構、演變和變化的動力與過程等議題相近，同時也將原本似乎孤立在東亞文明社會之外的島嶼，透過人群交換與互動體系，而有更多的連繫（例如，陳宗仁 2005、2010）。原史時期的研究進一步可以思考放在臺灣周邊海域互動關係的場域，以更廣闊的時空視野看待臺灣歷史研究，並重新思考臺灣當代的形成過程。因此對照文字歷史初期的原史階段研究，更顯示其做為史前與文字歷史之間的關鍵地位，值得更進一步探討。

三、原史階段的生活場景

人群和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是人類活動史的根本，尤其是沒有文字紀錄的史前時代，假若將台江、倒風內海的時間序列，從單純的自然史加上人類活動史，將可以看到長時限台江、倒風內海的文化地景變遷，得以將臺灣的人類活動歷史向上延伸到史前的數千年前，而不只是四百年前文字歷史初起的階段。從考古學研究的結果，初步將西南海岸在台江、倒風內海以及平原區域的變遷過程，筆者曾經提出史前時代的不同階段（劉益昌等 2011a），今再加上歷史初期以前資料，區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海灣形成階段，年代在 6000-4300B.P. 之間，全新世中期海水面穩定之後，在嘉義與高雄之間出現一個略微凹入的大海灣，灣內並有大岡山、小岡山、半屏山、柴山等幾處突出的島嶼，後期海岸平原已部分堆積出現，臺南台地亦已突出海面形成沙丘，史前文化屬於大坌坑文化時期，又可依農業耕作性質的改變以 5000B.P. 區分為前後期。

2. 海灣穩定擴張階段，年代在 4300-3300B.P. 之間，海岸持續向西側外海加積，形成略為寬廣的海岸平原，八掌溪、曾文溪等較大溪流河口三角洲沖積扇略向外突出，逐漸形成海灣，史前文化屬於廣義繩紋紅陶文化時期，在曾文溪北可稱「雲嘉繩紋陶文化」，曾文溪以南則稱為牛稠子文化，高雄平原則為牛稠子文化的一個地方性類型，或可稱「漯底山類型」，這些人群是大坌坑文化晚期在各地的演化所形成。

3. 內海出現時期，年代在 3300-1800B.P. 之間，海岸仍持續向西側外海加積，海岸平原逐漸擴大，部分已經到達丘陵邊緣與今日海岸線的中間，但仍有局部區域相當凹入，形成小海灣，此時期之初曾文溪已經向西北側流出，突出形成古台江與古倒風二大內海，史前文化屬於大湖文化時期，但鄰近嘉義的八掌溪流域一帶則屬於雲嘉區域的「灰黑陶文化」，少有大湖文化特徵。

4. 內海穩定時期，年代在 1800-1000/600B.P.，受嘉南平原西側沉降的影響，內海海岸線與前期比較並未劇烈變化，呈現穩定狀態，內海及港汊邊緣出現大量史前遺址，史前文化屬蔦松文化早、中期到晚期，亦即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以下簡稱「南科園區」）搶救考古所稱之鞍子期、蔦松期以及看西期。

5. 內海衰退時期，年代在 600B.P. 以內，曾文溪持續向西北側突出，長期穩定之餘內海局部區域已見淤積，開始呈現衰退狀態，史前文化屬蔦松文化末期，在曾文溪以南的臺南境內或稱西拉雅文化時期。

從史前時代嘉南平原的五大發展階段而言，得以看見土地的形成過程以及人類活動的遺留，在古倒風、台江二大內海周邊留下大量不同時期的遺址（劉益昌等 2008，劉瑩三等 2009，朱正宜 2009），根據考古遺址的年代也可以大略指出海岸線變遷的狀態。目前理解至少在大湖文化後期、蔦松文化前期開始，內海及海岸線進入穩定的時期。這個穩定時期持續時間當至歷史時代初期，由荷蘭據臺時期測繪的地圖，例如 1636 年〈手繪臺灣西海岸海圖〉（圖 1），顯示二大內海仍有相當面積，也大都能行船，雖說距今 600 年以內史前文化最晚階段，內海已經逐漸開始淤積，但仍可說明當時內海尚稱穩定。比較二大內海的狀態，台江內海似乎在歷史紀錄初期狀態較為穩定；倒風內海則顯示有較多沙汕與淤積，而內海亦因此形成較為狹長的狀態，這可能與曾文溪當時出海口向西北側，加上急水溪、八掌溪的沖積量亦大，使得泥沙淤積量較只有一條較大鹽水溪（蔦松溪、許縣溪）注入的台江內海來得快。但從歷史初期原住民聚落和蔦松文化中、晚、末階段遺址分布比較，仍可見二大內海仍是較為穩定的狀態。

基於環境變遷的比較，可以說此一穩定狀態是當代西拉雅族群祖先文化形成的重要關鍵時間，依目前曾文溪南北的考古資料顯示大致在 2000-1400B.P. 之間蔦松文化逐漸形成，並遍布於嘉南平原區域以及高雄平原北半，高雄平原南半至屏東平原則為廣義蔦松文化的地方類型，文化內涵略有不同。以文化演變的角度而言，曾文溪以南的區域大致在距今 1000 年左右開始進入看西期階段[2]；曾文溪以北區域也在距今 1000 年前左右進入蔦松文化晚期，二個區域演變步調一致，但文化內涵略有不同。此種狀態一直持續到 17 世紀荷蘭統治時期，四大社中麻豆社和其他三社的些微差異，似也隱含倒風、台江二大內海人群的差異。

2 看西期為曾文溪南側南科園區大規模考古搶救發掘之後，根據鄰近的看西遺址蔦松文化層之文化內涵命名的史前文化期，年代在距今 1000-500 年前之間（臧振華等 2006：79，臧振華、李匡悌 2012：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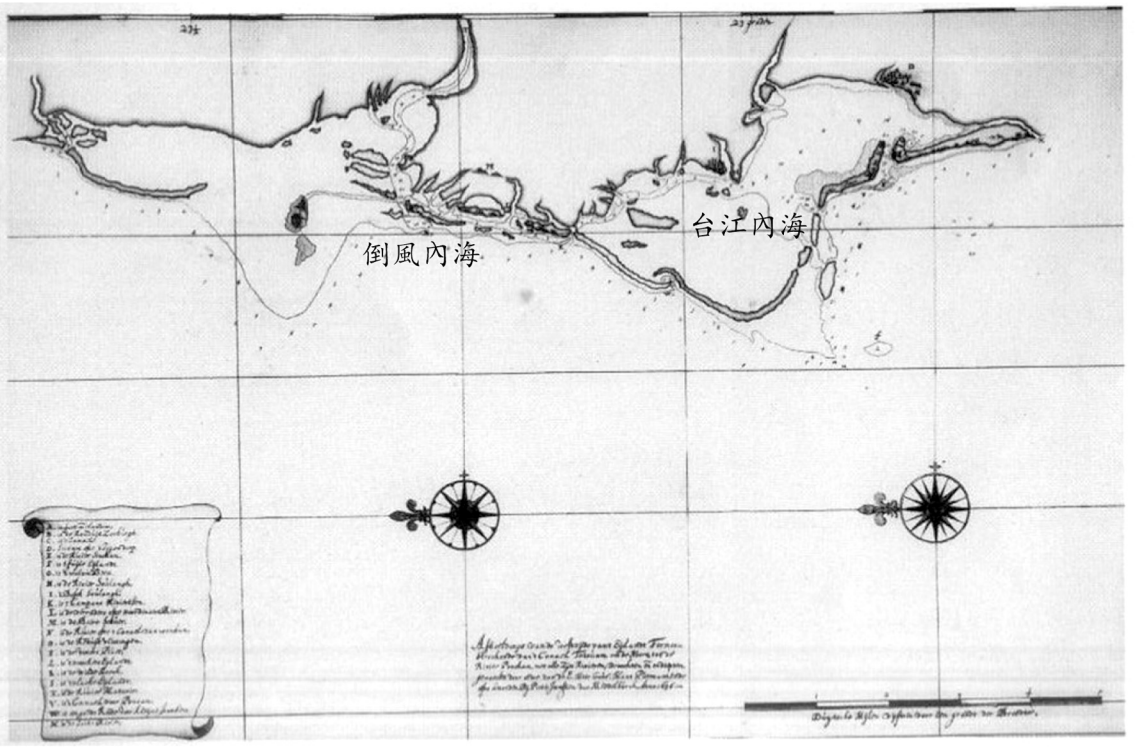


圖 1：1636 年手繪臺灣西海岸海圖（局部）

資料來源：格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註，《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圖版篇解讀篇》（台北：英文漢聲，1997），頁 42-43；《下冊論述篇》，頁 28，並加上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文字。

就整體臺灣而言，此一階段已進入史前最晚期的原史階段，澎湖群島位於華商向南海貿易的航路之上，已有漢人漁民與聚落存在，同時也已有部分漢人漁民或華商進入臺灣西海岸中段的濁水沖積扇原住民聚落，而有少量中華帝國五代越窯青瓷以及相當數量宋、元時期的瓷器、硬陶發現（劉益昌 2012b，Liu & Wang 2017）。而華商向東前往琉球的路線似也進入淡水河口以及北海岸區域，同樣在淡水河口南北二岸及北海岸遺址中發現相當數量宋元陶瓷（Liu & Wang 2017）。上述資料可以佐證華商或漁民當有部分進入臺灣本島，可說是外部漢籍文獻記載的直接證據，因而開啟原史階段。目前臺南平原的考古工作已發現不少考古遺址（圖 2）, 其中經大面積發掘多處遺址，但依目前公布資料，僅在西寮遺址發現少量年代大約在 11-12 世紀之間的福建青瓷（劉益昌等 2011b），說明此一時期嘉南平原區域和外界仍無明顯的往來關係，直到十六世紀中葉大約西元 1550 年前後開

始，才有中華帝國的商人或漁民進入，留下較多文化遺物。目前在臺南市新市區社內遺址出土 16、17 世紀福建漳州一帶製造的陶瓷器（臧振華、李匡悌 2012：312），可能為「漢人」攜入與原住民新港社祖先交換的物品。同一時期臺灣中部濁水沖積扇區域、淡水河口及北海岸區域、小琉球島和潮州斷層東側山區邊緣，則有較多 12-14 世紀中華帝國宋元階段的瓷器出土（Liu & Wang 2017）。

目前臺南區域原史階段如以外來影響的狀況做為區分，大致可以西元 1550 年代為界區分為二大段，如以考古學界常用的碳十四年代即為 400B.P. 為界，而分為 AD.950-1550、AD.1550-1620，二大段落之中尤其 AD.1550 以後較能直接連續至 17 世紀二〇年代的文獻，說明人群和土地互動所帶來的文化景觀狀態。當然景觀會隨著地質、地形條件以及物候[3]、氣象，甚至人力作用而有變遷，但目前所知二大階段自然與生活型態相當類似，只有人群及其所造成的行為有較大的差異。以下分就各項目說明原史階段的狀態。

1. 地形

嘉南平原已經大致形成歷史初期所見的狀態，最西側的沙丘、沙汕和當代相去不遠，只是在沙汕（沿海洲）內側擁有因曾文溪河口向西突出形成的南、北二大潟湖，造成廣大的內海海域。倒風內海的東緣北起今嘉義鹿草鄉西側朴子溪口南岸，南向急水溪畔的鐵線橋，向南到達茅港尾，至麻豆則向西，順著古曾文溪形成的河口沖積扇轉向西北，形成凹入的狀態。整體古倒風內海是南北長的內海，只是東南側向麻豆水堀頭區域凹入。古曾文溪河口西南側則是台江內海的北側邊緣，順著河口沖積扇向東南側延伸，其頂點為南科園區西側附近，以此頂點向西南側延伸至臺南台地最北端之蔦松附近，而沿著臺南台地北側、西側至六甲頂附近向南至喜樹仔、二層行溪口附近，形成一個大略頂部向東的三角形（圖 2）。順著臺南台地東側邊緣則有一狹長形水域，即為歷史時期以來所稱之鯽魚潭，也就地勢低下的大灣低地前身的一部分。

3 物候是指生物的周期性現象與季節、氣候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指涉非屬生物的自然變化與季節、氣候之間的關係。

平原上由北而南除了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這些從中央山脈及麓山帶流下的大型溪流之外，因為平原隆起而逐漸形成的小型溪流滿布，而平原隆起殘留的凹地則渚水成泊，因此除了內海和鯽魚潭等大型水域之外，平原上亦有許多小型水域，形成小溪與湖泊共存的淡水供應系統。從遺址的分布狀況可以證明此一自然資源和人群居住的關連狀態，許多遺址存在於內海港汊或是小型溪流的二岸。

整體而言，今日嘉南平原區域，尤其是臺南區域至少 20%~30% 仍為內海與沼澤，陸域生活空間顯然較當代小許多，但水域資源豐富的內海、沼澤以及溪流卻提供了不同的資源。就平原地形而言大體平坦，除了臺南台地以外，僅有少數突起小山，由麓山帶丘陵向西側延伸，而在堆積平原上形成小山，如曾文溪北的國母山、鳳梨山，這些小山散佈於平原之中，有如殘丘，在史前時期都是重要的遺址。此外就是當時海岸邊的沙丘，除了沿海的沙汕以外，內海中也有沙汕，更有稍微內陸的沙丘群，有名的如櫻丘沙丘群、北頭洋山。這些因子加上溪流的切割凹入，造就了以臺南為中心的嘉南平原，雖是平原，但仍有複雜的地形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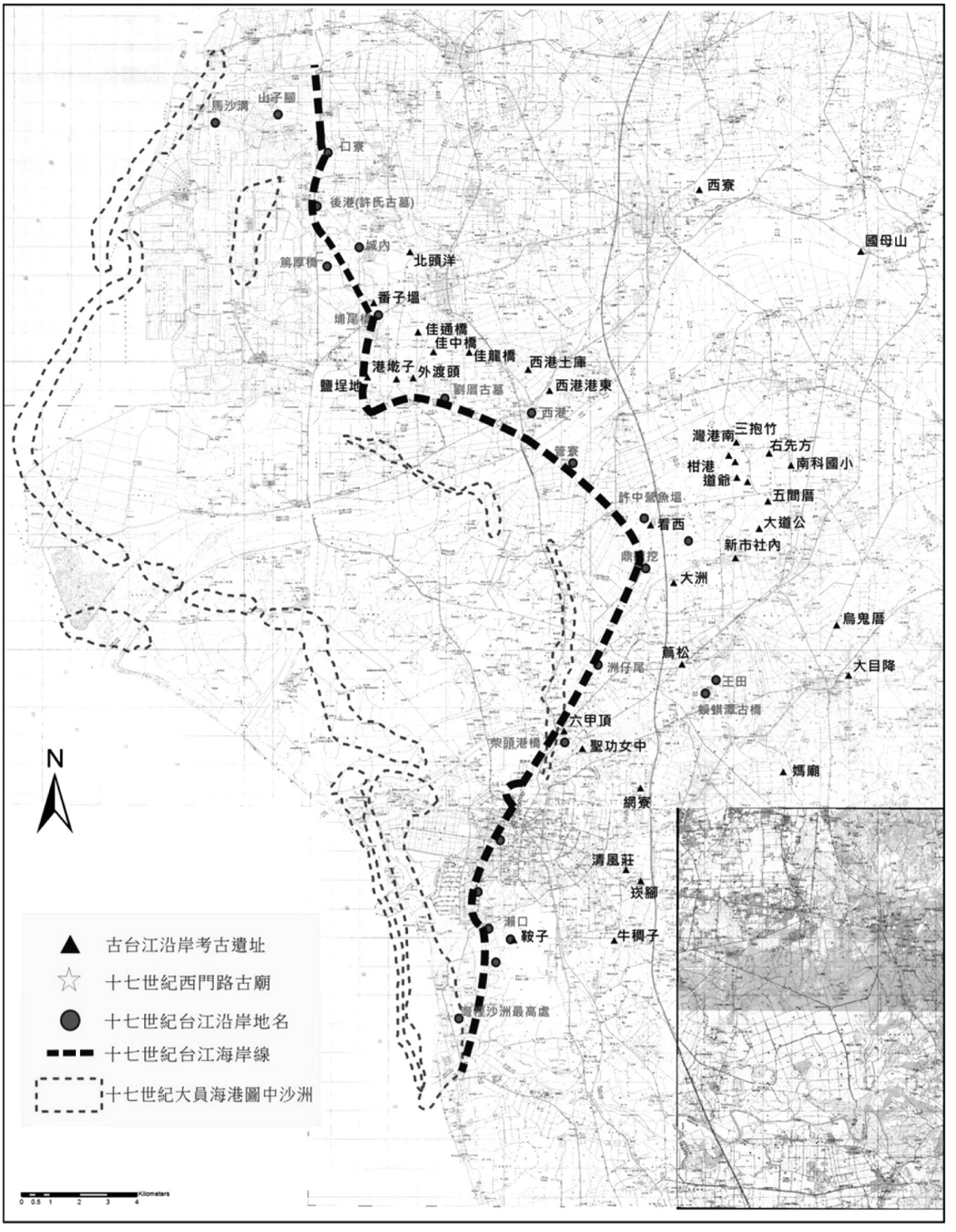


圖 2：推估之十七世紀台江海岸線（圖中粗黑虛線）（劉益昌等 2011a）

2. 生物相

生物相包含動、植物在土地上所形成的生態系，以當前學者研究的生態系統而言，嘉南平原區域有二大生態系統，一是海岸林群系，一是熱帶疏林群系（陳玉峰 1995：圖 26、266）。在沙汕、沙丘、潟湖（內海）邊緣得見豐富的紅樹林（含水筆仔、五梨蛟等）、林投、黃槿等植物以及海岸沙丘上的馬鞍藤、濱刺麥等草本、藤本植物構成的海岸林生態系，也可能在稍內陸形成大片森林，這在荷蘭治臺時期的地圖很多都可以看到此種情形，或畫出一片森林，或沿著溪流而有帶狀森林。而在海岸林內側到丘陵邊緣的平原區域，則在平坦區域可見大片草原，其中點綴有一些大型喬木與局部灌木叢，也會出現一整片森林，在凹下溪流的二岸通常長滿樹林、灌木叢，沿著溪流形成帶狀深綠色區域，和顏色較淺的草生地形成對比。林木的種類包含在考古遺址中常見種子的苦楝，以及欖仁、黃槿、正榕、雀榕等樹種，藤類植物亦經常可見，大宗的草生地植物應為芒草、甜根子草等禾木科植物。在平野間的溪流以及疏林草原之中，最常見的大型動物即為梅花鹿和野豬，其次還有山羊和水鹿，較小型動物則有獐、野兔、獾等平原區域常見動物，當然也存在許多鳥類，例如山鷸、鷸鴴、斑鳩和其他種類的家禽（葉春榮編譯 2011：76）。雖然文獻同時也記錄了有虎和熊等猛獸，但依據現代的理解，應該在平原地區並未存在，而是存在於山區，熊可能是仍存在的保育類臺灣黑熊，虎則可能是石虎或是已經滅絕的雲豹。

在聚落附近則可以看到人們開闢所留下來的狀態，由於聚落都是園藝式的聚落，因此在聚落內也有許多人為種植的植物，根據最早文獻的紀錄，他們種植稻米、小米、樹薯等主要的糧食作物和蔬菜，也種植香蕉、椰子、甘蔗、柳橙、檸檬、棗子和甜瓜等不同的水果，當然也種植許多檳榔，在聚落內的道路旁也種植相當多的竹子做為防禦之用（葉春榮編譯 2011：36-37、79-80）。

3. 聚落分布與型態

原史階段大致落在蔦松文化發展的後段，在曾文溪以南屬於蔦松文化看西期（1000-500B.P.）、西拉雅期或稱西拉雅文化（500-300B.P.），曾文溪以北屬於蔦松文化晚期（1000-600B.P.）、末期（600-300B.P.），聚落相當密集分布在二大內海沿岸及周邊平原地區，直到丘陵邊緣區域，但北側新營、後壁、柳營之間則少有遺址（劉益昌等 2008），學甲、北門、將軍亦少有遺址分布，至於鹽水溪和二

層行溪之間遺址較為零散（圖 3）。其中倒風內海鄰近的二個區域缺少遺址，當與早年曾文、急水、八掌三大溪流的行水泛濫區有關。

鹽水溪以南二層行溪以北平原區域在歷史初期並未記錄有原住民聚落，原史時期聚落較為稀疏，是否是人群與自然因素，目前尚難理解。但荷治十七世紀初期二層行溪以南極可能是塔加拉揚人居住的區域（簡炯仁 2001）。但從考古遺址的類型的分界，大致應以阿公店溪為界，以北為臺南地區的蔦松文化，以南為高雄地區的蔦松文化，二個區域雖然都稱為蔦松文化，但文化內涵略有不同，筆者曾加以分類敘述，指出其間的區別（劉益昌 1998、2002），在此不贅述。

晚近五、六百年以內已經可以直接從歷史初期記錄的原住民聚落追溯，所謂西拉雅四大社之麻豆、新港、目加溜灣社等三社，均已發現十七世紀的社址，並得以從地層堆積上溯至更早階段，尚未發現社址的蕭壠社位置當不離佳里市區西南側的蔦松文化遺址群。佳中橋、佳通橋、佳龍橋、番子塭等遺址所在的區域即當是蕭壠社所在，遺址群南側即為當時台江北側偏內的海岸，根據〈蕭壠社記〉所載，當時從大員航行到蕭壠，首先碰到幾個平坦的小島，島上只有幾個灌木叢，而沒有高大的樹木，這些灌木叢很可能是今天仍分布於台江、倒風二大內海殘存區域的紅樹林，隨著向岸邊航行水深漸減，直到岸邊的沼澤地，植物從鹹土中長出的尖銳樹根妨礙航行，更可以清楚說明就是生長在海岸水澤旁的紅樹林，紅樹林的內側則是一片平坦荒蕪的鹽滷之地（葉春榮編譯 2011：56-57），可見當時臨著台江內海沿岸的狀態。然後出現的就是小路和圍有籬笆的田地，種植著稻米和蔬菜，而且可以看到由竹子和稻稈建立的農小屋和穀倉，從小路又可以接上一條大路，路旁有一些遮雨或遮陽的竹棚，沿著大路就逐漸進入聚落之內（葉春榮編譯 2011：58）。這顯現出位於台江北側偏東蕭壠社的具體情況，相信其他位於台江內海邊的新港社、目加溜灣社以及倒風內海邊的麻豆社，也具有相同的景觀。

根據 1628 年干治士（George Candidius）所描述的情形，他認為福爾摩沙島的土地非常的肥沃，只是開墾的不多，而且樹林大部分野生，顯示受人類影響不多，他描述當時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的八個聚落為 Sinkan（新港）、Mattau（麻豆）、Soulang（蕭壠）、Bakloan（目加溜灣）、Taffakan（大目降）、Tifulukan、Teopan、Tefurang（大武壠），這些聚落的人有相同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也講相同的語言，只有一些小差異，但從地理位置而言 Taffakan（大目降）、Tifulukan、

Teopan 所在的位置是內陸的平原地區，大致在今日新化附近，至於 Tefurang（大武壠）位於丘陵地區（葉春榮編譯 2011：77-78）。依據今日的分類，通常會將大武壠視為與前述其他平原地區聚落為西拉雅族的不同群，甚至是不同族的人群，就考古遺址所顯示的文化內涵而言，大武壠舊社所在的大內遺址，其文化內涵的確和平原地區的蔦松文化略有不同。因此如果以蔦松文化遺址類型的分布，以及後來四大社或七社來說明今日所稱的西拉雅，其包含的聚落與分布範圍可能需考慮原始的分布範圍，至少在今日八掌溪以南到阿公店溪之間的平原地區，曾有研究者認為極可能後來因為人群之間的衝突，Tifulukan、Teopan 從二層行溪與阿公店溪之間的領域，遷至今日的新化區及附近區域（梁明輝 2014：10-15）。若考慮荷治時期的聚落分布，參考已知的各舊社考古遺址，以及可能在荷治末期 1653-1662 年之間改繪的廣東省及福建省的中國沿海及福爾摩沙島的航海圖（簡稱卑南圖），同樣可以看到北起麻豆，南到新港之間的聚落分布範圍，更足以說明從蔦松文化晚期距今 1000 年前以來，聚落的分布逐漸往台江沿岸地帶集中，與北方的 Favorlang 群聚落之間得見相當間隔，與南方搭加拉揚群也有一定間隔，說明今日所稱西拉雅的聚落範圍，亦即西拉雅空間逐漸形成，但麻豆仍和新港、蕭壠、目加溜灣之間隔著曾文溪，明顯分成二個小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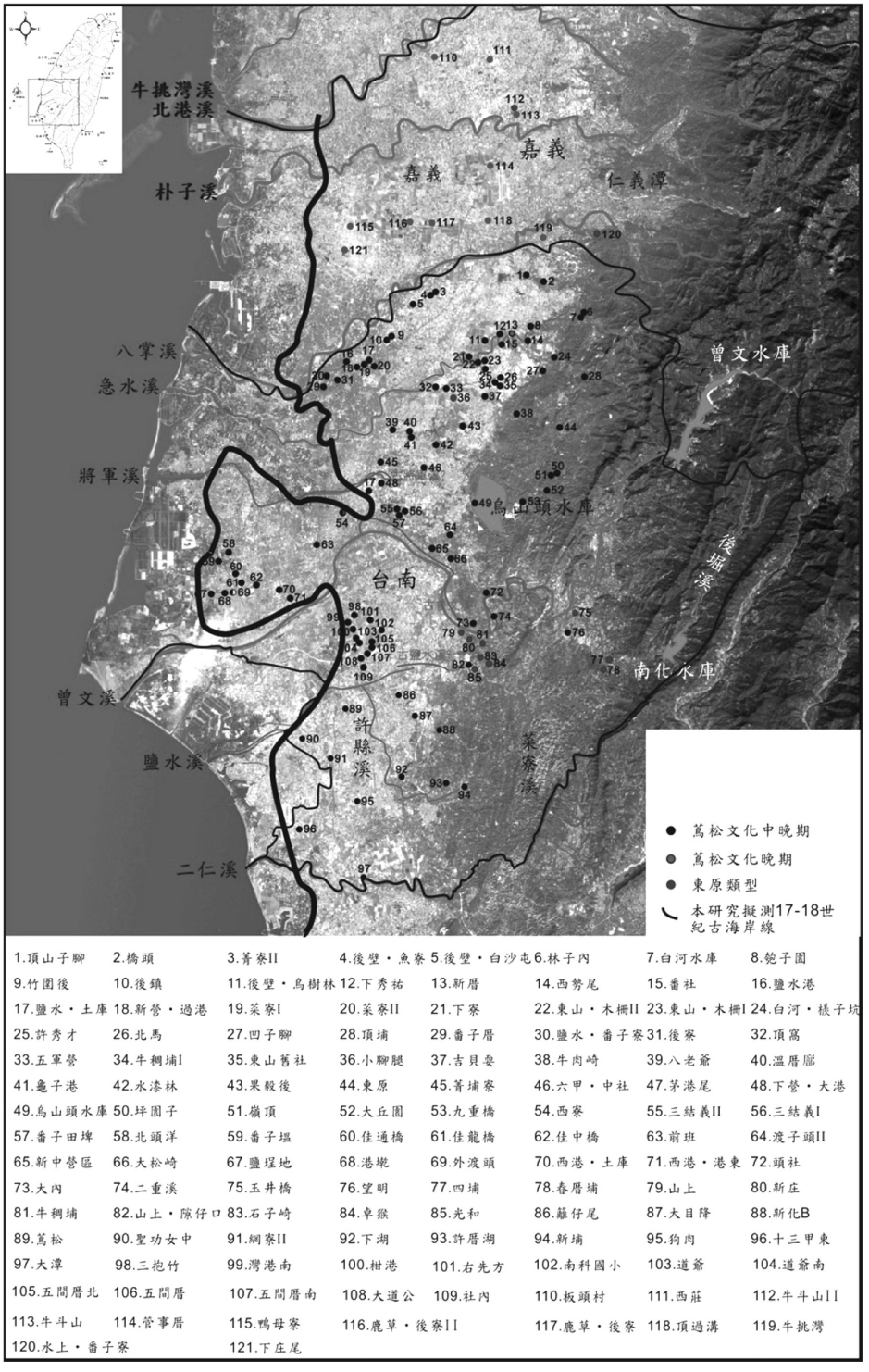


圖 3：2000-600 年西南海岸變遷與遺址分布圖（本圖根據劉瑩三等 2009 所建構的海岸線變遷地圖並修改）

由於人群的行為必然會影響自然環境，中西文獻得見的早期臺南地區原住民，即今稱西拉雅人的紀錄，主要描述聚落內的風俗習慣、宗教等，至於有關聚落型態的描述相當罕見，至多簡單提到聚落的大體狀況和房屋的建築形式，不過 1623 年 Jacob Constant 與 Barena Pessaert 寫下的〈蕭壠社記〉（葉春榮編譯 2011），對於聚落則有較為清楚的描述，引述如下：

> 從河岸穿過這片平坦荒蕪的鹽鹵之地，就有一條破舊的小路通往幾塊田地。田地上建了籬笆，種植著稻米和其他蔬菜。不遠處有些用竹子和稻草建造的小屋和穀倉，提供給在這塊地上耕作的人使用。小路橫越田地中央接上一條大路，路上稀疏點綴著雨棚，白天的時候，人們可以在下面躲太陽。因為沒有明顯的街巷，也缺乏密集的建築，人們往往要走到了市鎮的正中央，才會忽然發現這個市鎮就在這裡。從蘆葦和綠竹成蔭的樹林中一走出，房舍，甚或是市鎮，就出現在眼前了。每一棟房舍都精緻得像是公廨，綠竹圍繞在它們的四周。（葉春榮編譯 2011：57-58）

> 這個名為蕭壠的社（town）很大，在我看來，幅員足以和荷蘭的一些最大的城市相比。但它的四周並不圍以城牆或外側堡壘（palisades），也沒有密集的建築，每個房子在籬笆之內都佔據了很大一片土地；籬笆和鄰家的土地毗連，一條條排列出街道。街道狹窄侷限，沿路兩旁種著優美的竹子，為行人遮蔽日頭和風雨，也令人賞心悅目。幾乎每個房子在籬笆內都有一口井，約四五十呎深，井水乾淨清澈，清涼沒有鹹味。如上所述，市鎮裡有五個公共廣場，設有涼亭和其他公共建築。眾多男女，尤其是小孩，數量多到驚人，都聚集在此處，使得空間格外擁擠。（葉春榮編譯 2011：65）

李國銘先生曾經比較屏東平原和臺南平原不同原住民人群的聚落與房屋型態，有關臺南地區西拉雅人的資料，就是根據上述譯文寫到：

> Siraya 的聚落非常寬鬆，房屋蓋得疏疏落落，並不稠密。例如蕭壠這個村子的幅地，就和當時荷蘭最大的城市可以相比擬。每棟房屋之外都有竹籬，竹籬之內還有一大片土地及一口水井，裡頭種稻米及其他蔬菜，是一種很富

> 庶的園藝景觀模樣。竹籬內的每一棟房子都蓋得非常高大、精美;其壯觀程度，讓人以為每棟房子就是一棟廟宇。房子的底層是一個土造臺基，光是這個臺基就有一個成人高。因此，出入房屋要藉由一個梯板上下。（李國銘 1993、2004：80）

從上述敘述可知聚落內家戶與家戶之間有著竹子長成的籬笆，外圍有大小道路、田園、小屋、穀倉、竹叢，每一家戶都有水井，這些都可說明是一種園藝式聚落。對照原史階段年代較早的西寮遺址大面積抽樣發掘，確認聚落整體可區分遺物遺跡集中區（聚落、房舍）、聚落邊緣特定區、聚落邊緣特定功能區（劉益昌 2008：22-32），這三個連續性分布區說明聚落整體型態和〈蕭壠社記〉所記錄的聚落型態相近，也是一處園藝性聚落。

上述〈蕭壠社記〉等文獻記載雖然不是較為接近西寮遺址的麻豆社，但是局部可與西寮遺址初步研究的結果相互比對，說明西寮可能是一個面積廣大的園藝式聚落，聚落房屋集中區的外圍尚有不同功能的區域，這二個區域可能為聚落主要範圍，至於更外圍的農業區域發現耕作現象，也有田間的農小屋，顯然就是文獻記載所說，聚落內年紀較大的夫婦通常遷移到聚落外圍的耕作地，居住在小田寮之中的景象。也可以發現祭祀的場所，留下祭祀的陶壺排列以及大量食物殘渣堆積的貝塚（劉益昌 2013）。

這些大型聚落如以西寮遺址計算，從聚落中心向東南側計算至少延伸 1700 公尺，四邊延伸以遺址調查鑽孔所得為 3000×4000 公尺達 12 平方公里（劉益昌等 2011b）。因此當時在平原至少可見四個大型聚落，加上其他較小的聚落，塊狀分布於臺南區域，東側平原鄰接的丘陵之上也得見如大內、山上等幾處大型遺址。這些遺址在平原呈現大塊狀園藝式聚落，由竹叢或高大的檳榔樹圍繞，內部得見房舍、集會場、稻田、小米田、菜圃、果樹園，形成完整的聚落景觀，而這些聚落中四大社及部分小社又都與台江、倒風二大內海相關，利於利用河系或潟湖從事水域資源採集，整體構成依賴陸域、水域資源的聚落分布型態。

從原史到歷史時代初期，當代西拉雅人的祖先生活型態所顯示的文化景觀，是一處廣大的沖積平原，西側近海具有廣大的內海，除了海岸林包括紅樹林、草

澤[4]，沿內海岸邊及外側沙丘分布之外，內側平原則為廣大的疏林草原間雜著塊狀森林以及獨立的喬木，視野開闊，得見東側的丘陵、高山，西側的潟湖與沿岸沙洲。依當代的氣候資料，可以確認為夏半季西南季風雨量充分的氣候，水資源無虞匱乏，冬半季則為乾季，必須依賴溪流及湧泉並鑿井。

上述這些自然條件和人為因素，諸如放火圍獵、山田燒墾均使得廣大的疏林草原中得見人類步徑及活動足跡，而且促使植物社會產生演替現象，使得疏林草原、陽性樹種的血桐、苦楝以及灌叢錯雜，並存有部分較為完整的森林區塊，沿著中小型溪流岸邊長有帶狀樹林，鑲嵌於疏林草原之中，可說是常有局部變化的文化景觀。至今聚落之間的連繫，除了平原上的步道小徑之外，也常循著溪流下游河段，以筏子（可能是竹筏）航行移動。整體而言，因為人群聚落分布以及耕作、圍獵、交通動線等行為使得臺南平原形成以草埔地為主，夾雜局部森林、溪流、小型湖泊，而耕地、路徑嵌入其中的大型景觀。

四、西拉雅分布空間的形成

從荷治時期記錄的原住民聚落資料，得知西拉雅族祖先的四大社或其他較小族社主要居住在臺南平原區域，但也同時可以得見南北二個空白地帶（圖 4），都分佈在西南平原區域，一個是高雄平原，一個則是嘉南平原北半和濁水沖積扇南側。這二個空間的解析與理解，關係原史時期，今稱西拉雅人群分布空間的形成，以下試做解析。

（一）荷治嘉南平原北側空白的原因

目前所知嘉南平原北半和濁水沖積平原南側，則在荷治時期的紀錄和地圖清楚顯示並無聚落。大致以 Ternern（南社，即 Favorlang）、諸羅山、麻豆三個大社連線以西的平原及沿海地帶，不見有聚落，其範圍相當廣大，南北約六十公里，東西約三十公里的三角地帶，面積大約 900 平方公里之內不見聚落分布，這是極

4 為帶有水生及岸生植物的沼澤，在西南平原目前仍存許多，受西南平原乾濕分明季節影響，夏季水量豐沛的湖沼，冬半季容易形成半乾長滿長草的草澤。

為奇特的現象。此一區域並無大型溪流，從淺山丘陵發源穿越平原的溪流，只有中型的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急水溪，不足以造成毀滅性水患，而且小溪縱橫的平原和臺南平原區域相同，足以作為農業用地；沿海地帶則潟湖密佈，擁有豐富水生資源，實為適於人類居住的場所。

就考古學資料而言，此一區域史前最晚階段（原史時代），距今約 1000-350 年前（亦即 AD.950-1600）之間，目前未有遺址紀錄，的確是北側貓兒干文化與南側蔦松文化最晚期之間的空白地帶，目前資料仍然不夠明朗的嘉義平原區域，當然不排除是調查研究不足所致，但目前經過初步調查的新虎尾溪以南雲林縣平原區域，也是少見遺址資料。向前溯至新石器時代最晚階段（2400-1800B.P.）以及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早階段（1800-1000B.P.），則清楚可以發現，以嘉義縣太保市魚寮遺址上文化層為代表的「魚寮文化」，且似乎延續至同時或更晚的「灰黑陶文化」（劉益昌 2012a），當然此一時期八掌溪以南則為大湖文化晚期與蔦松文化早、中期的分布區域，均發現相當數量遺址。至於濁水溪沖積扇南北翼，此一時期也許尚不適人居，或因沖積過於頻繁，未有遺址明顯發現。

如以地形或其他自然環境的觀點，實不足以解釋嘉南平原北半和濁水沖積平原南側的 900 平方公里為何沒有聚落。究竟是考古學調查研究不足，還是存在其他因素，仍難完整說明。不過就荷治時期 1640 年代前後，Favorlang 人強力反對中國人進入該區域獵鹿，主張該區域為他們的領域，並因此與荷蘭統治者發生衝突，也許說明此一區域至少部分傳統權力屬於 Favorlang 人所有。Favorlang、諸羅山以及麻豆似乎是語言、風俗習慣不同的人群，而且都是大型聚落，「二大之間難為小」似乎是緩衝空白地帶的合理解釋。再者，區域內的北港溪口或牛挑灣溪口一帶，最接近當時可能已有漢人移民長久居住，且作為捕魚與貿易基地的區域，這些盤據北港被明朝稱為海賊的人群，可能是走私貿易的商人或海盜（陳宗仁 2003），這些商人或海盜的行為（如傳說中的顏思齊之類的人群），是否也造成原住民聚落保持一定距離，而為聚落少見的原因之一，值得進一步研究思考。總之在荷治時期的地圖，在麻豆、諸羅到南社三角連線之間的確是一個聚落分布的空白地帶（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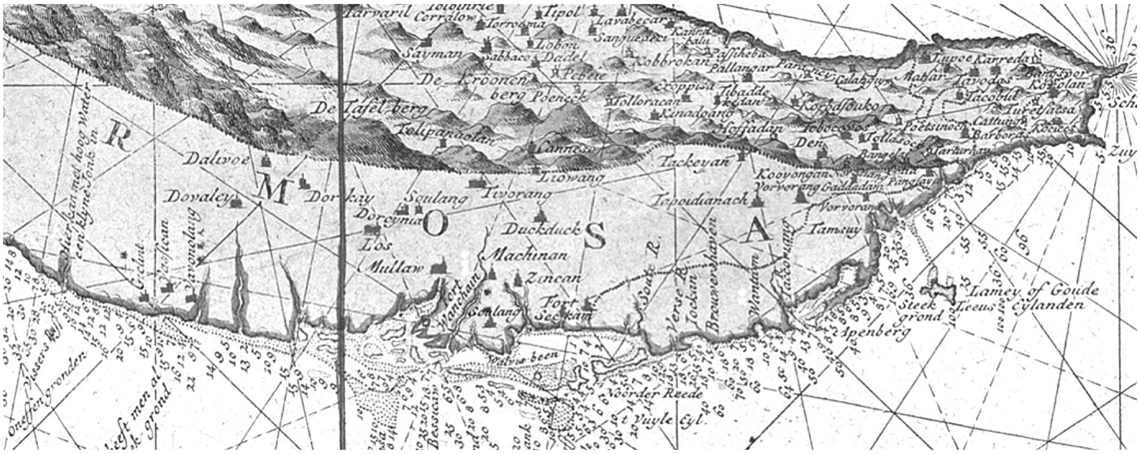


圖 4：十七世紀西拉雅族祖先分布區域（圖引自呂理政、魏德文主編 2005：87），本圖同樣得見今日二層行溪以南的高雄平原區域沒有聚落分布，而麻豆以北到 Favorlang 之間的平原地區也不見聚落，只在東側近丘陵地帶才有諸羅山社等幾個原住民聚落。原圖為廣東省及福建省的中國沿海及福爾摩沙島的航海圖（簡稱卑南圖），約翰 ‧ 凡 ‧ 丘連（Johannes van Keulen）的《海員指南第六卷》。

（二）文獻上原住民空白的高雄平原

高雄平原的空白狀態最初在 1990 年代初期提出，學友李國銘教授生前曾經為文舉出從荷蘭時代以來至清代，高雄平原地區不但沒有原住民聚落的紀錄，也沒有文獻的紀錄（李國銘 1993、2004：101-125），之後經過荷治到清代文獻仔細耙梳研究（簡炯仁 1998：101-111），學者則提出不同的意見。

由於在 1998 年筆者曾經提到臺南縣、市，高雄縣、市及屏東縣，雖已有全面性基礎資料建檔（劉益昌 1994，臧振華等 1994，劉益昌、陳玉美 1997），但仍有相當大的空白地帶未有資料，高雄平原就是其中資料最貧乏的地區之一，因此筆者無法從考古遺址的研究中給學界一個滿意的答案，所幸 1990 年代末期以來已新增不少考古學資料，已經清楚說明荷治初期高雄平原及周邊淺山、丘陵邊緣存在原住民聚落（劉益昌 1998、2002：109-115），加上高雄市地方文史工作者李瑞琳先生利用公餘之暇調查以高雄平原為主之區域，並涵蓋其周緣地區，新發現至少 40 處以上之考古遺址，明顯補充上述資料檔之不足，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清楚得知高雄平原及其周邊區域和臺南地區一樣，擁有相當數量之史前時代晚期蔦松文化的遺址，遺址的年代也如同臺南地區可以區分出三至四個不同階段，雖目前資料仍在整理尚未完全發表，不過從初步遺址資料所顯示的分布地區，可以得知平

原中除了地勢仍然相當低下的「古岡山灣」、「古典寶灣」、「古高雄灣」原來分布區域未見遺址出現之外，平原周邊較高的區域或東側的龍崎丘陵、內門丘陵、鳳山台地均有相當豐富的蔦松文化遺址，目前高雄平原及邊緣區域的遺址調查結果，確知二層行溪南岸大崗山東麓南安遺址出土年代較晚的蔦松文化，並與宋代錢幣並出，高雄灣二岸的柴山、覆鼎金遺址所屬龍泉寺類型年代在 800-300B.P.（劉益昌 2008），此種情形可以說明高雄平原原來應該有原住民族居住，但該族群在荷治時期並未接受荷蘭人之統治，而在荷蘭人勢力介入之時，退入東側丘陵山區，事實上《熱蘭遮城日誌》中亦有清晰記載，近年簡炯仁教授曾經從《熱蘭遮城日誌》以及日治初期伊能嘉矩採集的口傳資料，論證 1935 年高雄平原曾經有「搭加里揚社群」居住，後因荷蘭人之強勢進入而遷移部分進入屏東平原（簡炯仁 2001），似乎和前述考古遺址所見可以相互印證。

至於在荷蘭人退走，鄭氏接續之後，強大的軍事力量仍然在臺南與高雄之間佈設，軍事屯墾的結果漢人社會迅速在這個區域建立，因此原住民未能回到原有之領域，也使得後來的文獻紀錄並不明顯，不過從本地區仍遺留有部份原住民地名或具有原住民特性的墓葬，例如以灰漿砌成的長方形棺，相當數量分布在本地區，這些灰漿長方形棺均未見二次洗骨葬，其習俗顯與漢人不同，因此極有可能為接受部份漢文化後之原住民族群。這也顯示原住民可能未在本地區消失，只是隱沒在漢文化的強大勢力之中。但目前所知這個人群從史前文化內涵而言，與臺南區域所見蔦松文化具明顯差異，當屬不同人群的遺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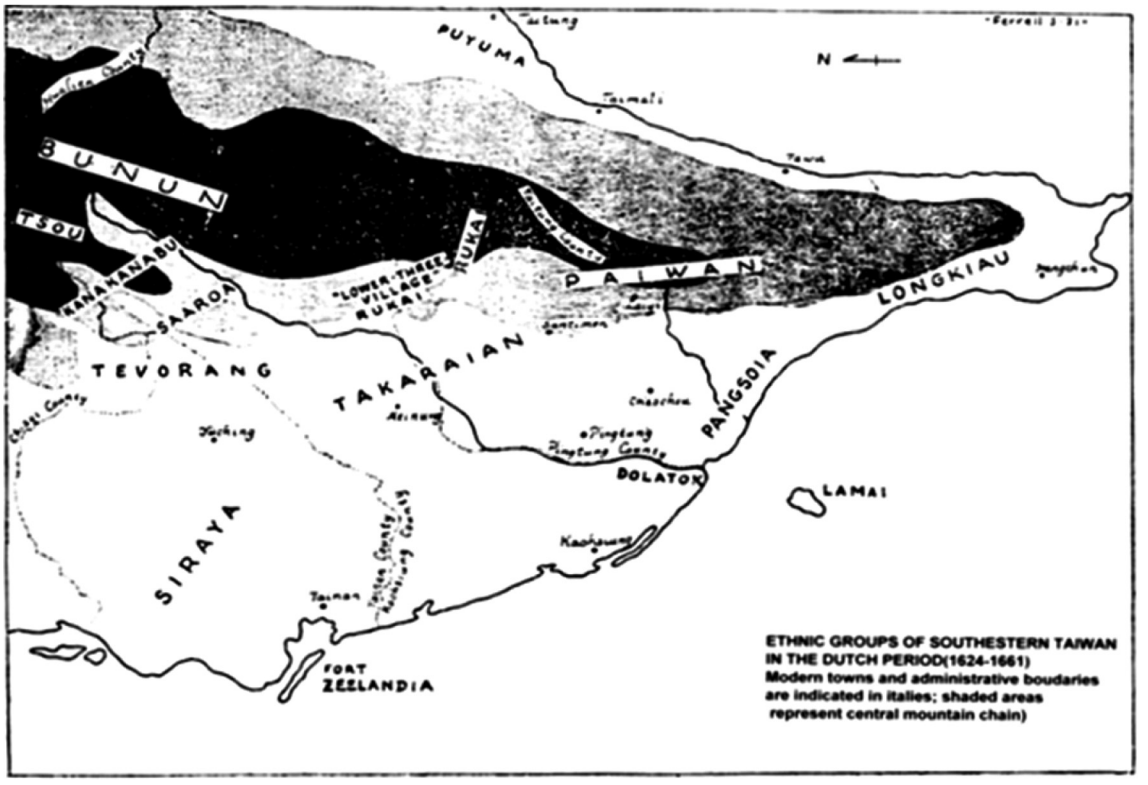


圖 5：十七世紀西拉雅族祖先分布區域（圖引自 Ferrell 1971），得見今日二層行溪以南的高雄平原區域沒有聚落與人群分布

（三）小結

從高雄平原以及嘉義平原區域的討論，顯然原史的較早階段人群與聚落相當均勻的分布在濁水沖積扇以南到高雄平原以北的區域，但荷治初期的文獻即指出臺南區域急水溪以北，二層行溪以南卻有著聚落分布的空白，因而形成當今西拉雅祖先的分布空間，與其他平原地區人群之間形成相當大範圍區域的空間阻隔，但是和東側丘陵邊緣人群則緊密相連，其原因為何，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五、結語：歷史地景的延續性

1987-88 年筆者參與「臺灣平埔族及漢人早期聚落研究計畫」時，張光直先生曾經問到五百年前的臺灣究竟是什麼樣子，長年以來這個提問使筆者思考史前時代人群生活和自然互動所形成的文化地景，足以說明人群的文化樣貌，因此在進

行濁水沖積扇區域史前文化與人群關係的研究之時，曾經針對 Favorlang 人，也就是南社的 Babuza 人群在貓兒干文化時期的生活狀態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因此寫下一節討論當時人生活的文化地景（Culture landscape），從自然環境變遷、族群與聚落分布、農業耕作、捕鹿與漁場、聚落與周邊區域關係、貿易與交換、當聚落遇到國家等不同議題書寫，嘗試建立 Favorlang 生活的樣貌，希望回到四百年前的外來人群以及國家勢力強力介入之前的歷史場景。此次對於臺南區域西拉雅人祖先的歷史生活場景，也希望藉由考古學資料的研究，重溯沒有文字時代人群和自然環境互動所留下來的地景，但是卻缺乏近六百年內的花粉分析資料，只能從遺址中出土的植物種子、聚落型態等資料來說明原史時期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所形成的文化景觀，也就是某一時段的文化景觀。相信原史時代到歷史時代初期景觀的變化除了 1550 年代以來漢人、日本人介入臺南區域之外，其他的景象應該是一個連續性的發展，後世的測繪地圖以及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鹿皮上色地圖（劉益昌 2013），都可以做為復原的參考資料，接續原史以及歷史時代初期的文化發展，當然也就是歷史地景的延續性。

最近臺南市曾經針對飛雁新村所在的六甲頂遺址進行遺址重要性的分析，以做為政府決策的參考，筆者在參與會議的當中，除了敘述考古遺址在日治末期所具有研究典範轉移的具體重要性之外，也特別提到此一古台江內海東側的高大沙丘所在地點，在史前大湖文化以來到原史時期以及歷史時代初期所具有的文化景觀意義。換句話說，站在六甲頂這一個原先面對台江內海的沙丘，可以想像從三千年以來的歷史場景逐幕變換，其間對於當代臺灣歷史的重大轉折點，無疑是鄭成功的軍隊由北往南，經過六甲頂西側下方台江內海邊緣海岸平原地帶，向普羅民遮城前進的景像，也就是臺灣歷史轉折點一場重要戰役的片段場景，就在六甲頂這座沙丘下方上演，此一場景雖然因為台江內海浮覆，柴頭港溪不再注入台江內海而成為鹽水溪的支流，因而無法想像這些歷史場景，但是卻可以透過荷治時期所留下來的地圖以及當代學者的研究，重新復原此一區域的歷史場景，這才是歷史文化景觀，亦即歷史地景研究的積極意義，也是本文書寫的基本意義。

參考文獻

宋文薰

1961 〈臺灣的考古遺址〉《臺灣文獻》12(3)：1-9.

朱正宜

2009 《台南縣考古遺址普查計畫（第二期 - 西南地區新市鄉、安定鄉、善化鎮）結案報告》新營：台南縣政府。

江樹生譯

1985 〈蕭壠城記〉《台灣風物》35：80-87.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圖版篇解讀篇》台北：漢聲出版社。

李國銘

1993 〈文獻上平埔族空白的高雄平原〉（未刊稿）。

2004 〈文獻上平埔族空白的高雄平原〉《族群、歷史與祭儀 -- 平埔研究論文集》：101-125，板橋：稻鄉出版社。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

2005 《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繪製臺灣相關地圖》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林朝棨

1960 〈台灣西南部之貝塚與其地史學意義〉《考古人類學刊》15/16：49-94.

連照美

1998 〈七世紀到十二世紀的臺灣 -- 臺灣鐵器時代文化及相關問題〉《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3：1-11.

梁明輝

2014 《打狗社最後的身影》作者自印。

張光直

1977 〈『濁大計劃』與民國六一－六三年度濁大流域考古調查〉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1-2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6 〈發刊詞〉《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1.

1994 〈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灣史研究》1(1)：11-15.

1995 〈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中國考古學論文集》：25-35，臺北：聯經出版社；又見臧振華編輯 1997《中國考古學歷史學之整合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于高

1993 《 更新世以來南台灣地區海水面變化與新構造運動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地質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陳文山、宋時驊、吳樂群、徐澔德、楊小青（陳文山等 2004）
2004 〈末次冰期以來臺灣海岸平原區的海岸線變遷〉《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2：40-55.

陳文山主編
2016 《台灣地質概論》台北：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陳玉峰
1995 《台灣植被誌第一卷：總論及植被帶概論》台北：玉山社。

陳宗仁
2003 〈「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2)：249-278.
2005 〈一六二二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東亞貿易策略的轉變—兼論荷蘭文獻中的 Lamang 傳聞〉《台大歷史學報》35：283-308.
2010 〈1632 年傳教士 Jacinto Esquivel 報告的解析 -- 兼論西班牙佔領前期的臺灣知識與其經營困境〉《臺灣文獻》61(3)：1-34.

曹永和
1979 〈荷據時期台灣開發史略〉《台灣早期歷史研究》：45-7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0 〈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113-14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曹永和著，陳宗仁、陳俐甫合譯
1998 〈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台灣〉《台灣風物》48(3)：91-116.

葉春榮編譯
2011 〈蕭壠社記〉《初探福爾摩沙：荷蘭筆記》：56-68，台南：台南市政府。

臧振華
1997 〈考古學與臺灣史〉《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721-742，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臧振華、李匡悌
2012 《南科的古文明》南科考古發現系列叢書之一，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臧振華、李匡悌、朱正宜（臧振華等 2006）
2006 《先民履跡——南科考古發現專輯》新營：臺南縣政府文化局。

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臧振華等 1994）
1994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台南縣、台南市》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劉益昌
1994 《高雄縣史前歷史與遺址》高雄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之研究報告（未出版）。
1995 〈臺灣北部沿海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的分佈〉潘英海編，《台灣平埔族群研究學術論文集》：2-16，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8 〈臺灣西南平原地區史前時代晚期的文化〉《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5-40，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2　《台灣原住民史史前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2008　〈從西寮遺址發掘談蔦松文化的聚落〉葉春榮主編，《再現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15-40，臺南：臺南縣政府。
2010　〈臺灣東部史前晚期人群互動的考古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十九年度第十七次學術講論會，2010.11.8。
2011　〈Basay 人群與生業型態形成的再思考〉，「2011 族群歷史與地域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2011.9.23。
2012a　〈考古學研究建構的原史時代臺灣史〉，「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中央研究院主辦，2012.4.26-28。
2012b　《濁水沖積扇區域史前文化與人群關係之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2c　〈台灣史前黑陶互動關係體系的初步研究〉「古代交換與殖民模式的跨地域比對」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New Caledonia and the Pacific, New Caledonia 主辦，2012.9.1-3。
2013　〈考古遺址所見的宗教儀式行為：以西寮遺址出土遺跡為例〉葉春榮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I—變遷中的南瀛宗教》：295-316，台南：台南市政府。
2014　〈從史前文化談原住民聚落分布與文化構成〉「2014 年台灣原住民族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主辦，2014.9.15-17。

劉益昌、許清保、吳建昇、郭俊欽、王柏喬、薛鼎霖（劉益昌等 2011a）
2011　《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地區人文歷史調查及保存規劃研究成果報告書》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社團法人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之研究報告。

劉益昌、許清保、顏廷伃、王心怡、吳佩秦、許怡婷（劉益昌等 2008）
2008　《台南縣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計畫（第一期－溪北地區）結案報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臺南縣政府文化處委託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之研究報告。

劉益昌、陳玉美
1997　《高雄縣史前歷史與遺址》高雄縣文獻叢書系列 3，高雄縣政府，鳳山。

劉益昌、顏廷伃、蕭清松、顏妏晏、許怡婷（劉益昌等 2011b）
2011　《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西寮遺址搶救發掘工作成果報告書　第一部份　發掘總述　第一冊　序說、地層與遺跡》台南：交通部公路總局高南區工程處。

劉瑩三、劉益昌、許清保、顏廷伃（劉瑩三等 2009）
2009　〈晚期全新世以來台南地區海岸線變遷初探〉《2008 年台灣考古工作會報》，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09.3.28-29。

簡炯仁
1998　《高雄縣鳳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2001　〈由「熱蘭遮城日誌」有關「搭加里揚」的記載試論高高屏地區的平埔族〉《臺灣文獻》52(2)：293-324.

Chang, Kwang-chih & the Collaborators（Chang et al. 1969）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73.

Ferrell, Raleigh（費羅禮）

1971 〈Aboriginal Peoples of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Plain〉《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2 217-236.

Liu, T.K., Sung, Q.C., Chen, K.Y., Pi, Z.L., Yang, C.H. and Cheng, P.H.（Liu et al.1997）

1997 Tectonic subsidence and uplift in the Zeikang-Hopi area of Southwestern Taiwan since the late Pleistocene. *Jour. Geol. Soc. of China*, 1,pp.155-165.

Liu, Y.C., Wang, S.C.

2017 Encountering the wider world before the transition to history: Chinese ceramics in proto-historic Taiwan （tenth–sixteenth centurie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Early Modern Colonialism in Asia-pacific: The Southwest Pacific and Oceanian Regions*, edited by Maria Cruz Berrocal and Cheng-Hwa Tsang.

Sung, Q.C.

1994 *Geomorphic evolution and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Coastal Plain in southwestern Taiwan*.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1994

〈赤崁耕地圖〉所描繪的 17 世紀中期臺南地景及其歷史空間 *

蘇峯楠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研究助理

一、前言

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所藏一幅描繪今臺南地區農耕地景的手繪設色紙本地圖，為尼德蘭七省共和國的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以下簡稱「公司」）在臺活動相關文件之一，亦是現存 17 世紀臺灣古地圖中，少數描繪今臺南地區空間細節的稀見地圖。原件不著題名，內容也全無載寫文字，本文依據典藏單位登錄名「Caerte van de besayde velden aen Saccam.」[1]及先行研究慣稱，稱之為〈赤崁耕地圖〉（以下簡稱〈耕地圖〉；不加書名號者，則指描繪耕地之地圖的圖類）。

關於 17 世紀公司繪製臺灣古地圖之研究成果，以 1962 年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為鉅細靡遺之發端，[2] 該文引用 1867 年 P. A. Leupe 編纂之荷蘭國家檔案館藏古地圖目錄進行概述，雖有提到「赤崁耕地之地圖」，然並無介紹。[3] 1997 年冉福立（Kees Zandvliet）撰〈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將

* 本文初稿宣讀於研討會時，獲評論人李文良教授點評指正，與會之劉益昌、陳計堯、康培德、劉相君等諸位教授亦給予提問及建議；後再承蒙本論文集兩位匿名審查人斧正，謹此深致謝忱。

1 〈赤崁耕地圖（*Caerte van de besayde velden aen Saccam*）〉（海牙：國家檔案館藏），檔號：4.VEL 1126。原件尺寸為 40.5×55.5 公分。

2 該文初發表於 1962 年《臺北文獻》第 1 期，1979 年收錄至聯經出版的研究文集《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參見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295-368。

3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334。

該館藏臺灣古地圖進行脈絡式陳述，有提到〈耕地圖〉並加以簡說，[4] 具體勾勒該圖繪製內容的基礎輪廓。1998 年范勝雄撰〈「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則站在冉福立基礎上，更細緻比定地圖圖像及其指涉地景；[5] 翁佳音亦有相關細節的討論。[6]

綜觀〈耕地圖〉研究史，實已累積部份具體成果，惟許多問題尚未明朗，因而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即透過文獻研讀，並援引其他地圖史料檢視比對，搭配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輔助分析與製圖等法，重新爬梳〈耕地圖〉製圖歷程、圖像細節與對應空間，及繪製 17 世紀中期赤崁地區的歷史空間（historical space）[7] 樣貌，對〈耕地圖〉提出三項課題，藉以深入探索。

首先，在地圖性質與內涵上，〈耕地圖〉為實地測繪之作，但冉福立、范勝雄的研究卻已說明該圖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精確；另一方面，始終困擾著研究者的是，該圖沒有載寫任何文字。這些異於一般地圖的誤差與缺漏，只是一種偶然的結果嗎？或者其實是該圖本身就擁有的特性、並且是能引導我們更深入理解耕地圖背景及其製圖脈絡的線索之一？筆者認為，針對這些誤差與缺漏進行討論，或許有助於釐清〈耕地圖〉究竟是一幅什麼樣的地圖，以及其在地圖史課題上的意義。

其次，在地圖內容與畫面上，因為〈耕地圖〉沒有文字，這些圖像與畫面究竟在表現什麼，實更有必要（也必然會更費力）釐清。范勝雄的研究已經針對圖內一部分河流、山巒、道路等內容加以比定，然一部分比定結果似乎仍有疑義；

4 冉福立（Kees Zandvliet），〈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漢聲雜誌》106（1997.10）下冊，頁 70-71。

5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臺灣史料研究》11（1998.05），頁 128-139。

6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收於李明珠主編，《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頁 69-85。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2008）。

7 筆者使用「歷史空間」概念，盼與「當代空間」區隔，並凸顯其特質。筆者認為歷史空間至少有三項特質：第一，歷史空間與當代空間的差異，不在空間位址，而是在時間軸上，歷史空間是過去的，當代空間是現今吾人身處者。第二，因某些條件或過程，當代空間有累積或遺存了一部份歷史空間的傳統、線索或記憶，因此，歷史空間是構成當代空間的部份元素；而當代吾人亦有藉此連結與追索往昔歷史空間的可能，這是本文利用 GIS 技術與現代圖資處理此項課題、並討論其歷史連續性的理由基礎。第三，作為研究課題，歷史空間是當代吾人以傳統、線索、記憶，或引用史料文獻所描繪的空間圖像，它應能協助當代吾人理解過去空間樣貌與人地關係，也保留一定程度的修正、討論與調整餘地。

但其他圖像細節則略過未提。特別是該圖焦點所在的農耕地，更未再見到其他研究加以討論。筆者認為，針對圖內所有圖像細節再次整理、檢視及比定，應可進一步還原該圖的圖像訊息與全貌。

最後，〈耕地圖〉所描繪的地景空間畫面，呈現出 17 世紀中期在東印度公司控制與經營下的臺南地區，有著什麼樣的人地關係、空間內涵與發展趨向？站在前述兩項對製圖脈絡、細節比定的確認上，本文對此再行初步的觀察與解讀，盼能試窺〈耕地圖〉的空間圖景內涵及其意義。

二、製圖以前的赤崁地區早期空間

在公司入主之前，大員已是華人、日本人、原住民等各方人群往來互動的貿易據點；相較於此，隔海正對的本島陸地、即今臺南市區一帶，則較少見記載。1625 年大員長官 Martinus Sonck 在寄給巴達維亞總督的報告裡，對該處有較初始的描述：自然環境良好、土地肥沃，有鹿、山羊、野豬等許多野生動物，是新港的領域。[8] 由此來看，即便不能因此認為該處完全沒有海外人群足跡，但至少 17 世紀初期以前，該處空間地景應仍以萬物滋生的自然地景為主，相對主要活動人群是新港人。[9] 此地區後來被稱為 Saccam（赤崁），至少在 1629 年 10 月 8 日《熱誌》就已載寫此名；[10] 之後雖也常見 Saccam 之名，但一直沒有具體的四至範圍定義。翁佳音曾依〈赤崁耕地圖〉認為赤崁有「赤崁樓與赤崁街一帶」的狹義之意，亦有廣義的「赤崁大地」，即北抵今鹽水溪，南以二層行溪為界，東側至少包括仁德區一帶。[11] 雖然就 1625 年公司購地結果來看，當時的 Saccam 的概念可能比廣義

8 〈宋克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5 年 2 月 19 日，於大員商館〉，收於江樹生主譯註，《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1622-162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 191-192。書題以下簡稱《書信集 I》。

9 雖然 Sonck 描述該地是新港領域，而且公司之後也是跟新港人交涉購地，但依《熱蘭遮城日誌》記載，公司在赤崁地區興建房屋時，曾不斷受到「野人」滋擾（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一）》〔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頁 2-3。以下簡稱《熱誌 1》）。而直到 1634 年，在赤崁地區耕作的華人，還在遭到麻豆、蕭壠人「很大的騷擾」（《熱誌 1》，頁 189）。筆者認為，在赤崁地區，新港人或許是「相對主要」的活動人群，但不能排除同時也有麻豆等其他人群的活動足跡。

10 《熱誌 1》，頁 2。

11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頁 221-223。

的、或〈耕地圖〉所呈現的範圍稍微小一些，但本文所使用的「赤崁地區」一詞，原則上仍以廣義為主。

1624 年，公司落腳於大員水道兩側——包含在水道南側的大員島上建立奧倫治城，以及在其對岸的水道北側北線尾島上建立商館，但仍對其海上沙洲環境不太滿意；另一方面，當局也欲與陸地部落及人群展開進一步接觸，以進入並掌握鹿皮貿易網絡，[12] 因而始終有前往陸地發展之傾向。1625 年初，當局與新港人相互拜會，長官 Sonck 設宴款待，並以 15 匹 cangan 布向其購得一部份陸地土地。議會規劃將商館遷至該地，盼發展為人口眾多的城市，因而命名為普羅民西亞（Provintien），[13] 即清治時期府城市街、今臺南市區所在處；而 Sonck 也描述了想在「靠內陸那邊還有一個綿延的高地」（應指崁頂山）上興建要塞的願景，至於還有一個「相當大的內陸水域」（應指鯽魚潭）則屬「周邊附近」，可能已在範圍之外。[14] 由此推測，公司購得的土地，可能東至崁頂山為止，即是所謂前述「赤崁地區」的大致範圍。

歷經 10 個月整建，公司在赤崁地區建造了長官及隨員宿舍、倉庫、醫院、班達島人住宅、馬廄、羊廄、儲藏室等建物；西側建防火城砦，裝置 4 門小砲，外側有壕溝，駐守士兵 12 人；[15] 華人住民亦建起 30 至 40 座屋舍。[16] 此般發展具體反映在 1626 年一幅依據澳門華人 Salvador Díaz 見聞情報所繪製的大員港灣地圖裡（圖 1），[17] 圖中繪有一座方形堡壘，牆上安有砲座，註記「荷蘭人的堡壘」（Baluarte

12 〈宋克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4 年 12 月 12 日，於大員商館〉，《書信集 I》，頁 170。鄭維中的研究指出，此時公司欲進入暹羅出口至日本的鹿皮貿易，卻無法與暹羅在地日商競爭；另一方面，公司注意到僅有華商代理、體制壁壘尚無暹羅高聳的臺灣鹿皮，故於 1624 年底開始拜訪蕭壠等原住民部落，繼而展開臺灣鹿皮出口事業之經營。見 Wei-chung Cheng, “Emergence of Deerskin Exports from Taiwan under VOC (1624-1642),”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aipei) 24:3 (September, 2017), pp. 10-16.

13 〈宋克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5 年 2 月 19 日，於大員商館〉，《書信集 I》，頁 191-192。

14 〈宋克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5 年 2 月 19 日，於大員商館〉，《書信集 I》，頁 192。

15 〈德．韋特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5 年 10 月 29 日，於大員商館〉，《書信集 I》，頁 234-235。

16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2000），頁 54。

17 *Descripcion del Pverto de los Olandeses en Ysla Hermosa*（艾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描述圖），收入 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ía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1930), pp. 416-17. 陳宗仁對於該圖內容及繪製由來已有細緻的考察，見陳宗仁，〈1626 年的大員港灣：一位澳門華人 Salvador Díaz 的觀察與描繪〉，收入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Ⅱ》（新營：臺南縣政府，2010），頁 1-31。文字註記之中文釋義，亦引自陳宗仁同著作，頁 9。

del Olandes），應即上述的防火城砦；稜堡右側（南方）繪有 6 個屋舍圖案代表村落，註記「赤崁，華人漁民與海盜的地方」（chacam lugar de chinos pescadores y ladrones），即可能指華人建起的屋舍；更右側繪有兩人持刀槍捕鹿，註記「獵場」（Campaña de casa）。這幅圖說明了赤崁地區開始出現海外人群的市鎮與聚落景觀，其生業模式仍以華人控制的「鹿皮、鹿脯和魚的生意」之獵捕與簡易加工產業為主。

市鎮雖建設初成，卻隨即遭遇挫折。1626 年春天，市鎮發生大火，焚毀華人房屋與公司新建屋舍；[18] 夏天又爆發瘟疫，居民四散遷離，公司也將堡壘拆除，將士兵調回大員，[19] 此後少見記載。直到 1629 年，長官 Putmans 才又派人至赤崁圈圍土地、興建房屋；[20] 該年 9 月 Jan Garbrantsz Black 乘坐 Texel 快艇測繪的大員海圖裡（圖 2，以下簡稱「Black 圖」），即可見普羅民西亞市鎮（de stat proventij）處繪有屋舍圖案，[21] 應是當時市鎮又重新發展的一部分結果。由此可知，公司對於赤崁地區的經營方針，中間雖有受挫及停頓，亦仍未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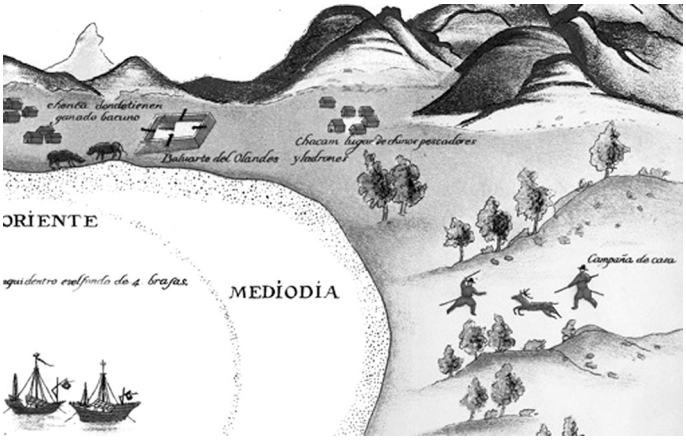


圖 1　Pedro de Vera〈艾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描述圖〉所描繪的赤崁地區一帶（東方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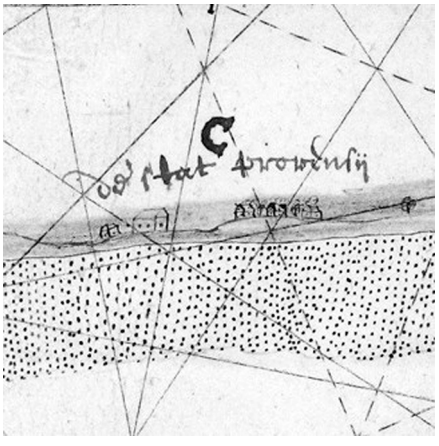


圖 2　Jan Garbrantsz Black〈大員圖〉所描繪的普羅岷西亞市鎮（東方為上）

18　〈德・韋特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6 年 3 月 4 日，於大員商館〉，《書信集 I》，頁 269。
19　〈德・韋特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6 年 11 月 15 日，於大員商館〉，《書信集 I》，頁 305。
20　《熱誌 1》，頁 2。
21　〈大員圖（*Caerte van Teyouan*）〉（海牙：國家檔案館藏），檔號：4.VELH 140。

在此發展下，最晚於 1634 年，赤崁地區就已有華人「在農地耕種」。[22] 這可能是源自公司大約在 1633 年左右開始推行的方針：鼓勵華人在陸地種植甘蔗，公司則協助提供資金、牛隻，甚至設立醫院。此方針一開始是因應中國糖漲價，因而欲嘗試自主產糖。[23] 隨著蔗糖產量良好，再搭配當局各項獎勵手段，赤崁地區的農耕人數、種植面積、其他作物種類也隨之增加。

1636 年，稻作亦開始起步。當時議會決議，未來 4 年計劃全面收購臺灣生產的稻米，亦不徵稅，並評估臺灣成為巴達維亞與摩鹿加之米倉與糖廠的可能性。[24] 約在同時，在巴達維亞任甲必丹的福建同安人蘇鳴崗（Bencon）也來到大員，準備投入赤崁地區的稻米與甘蔗事業。[25]

稻作的發展，在 1640 年底尚未進入盛行階段；[26] 但在 1643 年 9 月已有「生長得還不很壞」的評估，議會亦在該年決議開始收取稻米收成什一稅。[27] 這項決策，除了是當局對稻米市場有樂觀評估，並要為公司增開一項收益管道外，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中國米價高漲，為避免本地農作大量移種稻米、影響原有蔗作而有的考量。[28] 所以 1644 年起，當局將赤崁地區農耕地進行區域劃分，並透過每年公開標售各區稻作承包權的方式，間接收取什一稅。

由此可知，1620 年代尚以獵捕與初級加工為主的赤崁地區聚落與生業方式，在公司當局的市鎮設置、農耕生產等陸地經營方針下，1630 年代中期開始，農耕區域逐漸擴大、華人移民亦有增加，原本以林野為主的地景，漸次轉變為市場商業取向的大規模農作空間。

---

22 《熱誌 1》，頁 189。
23 〈漢斯．普特曼斯函，1635 年 2 月 20 日，在熱蘭遮城堡〉，收於江樹生主譯註，《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V（1629-1636）[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頁 636，及頁 637 譯者註腳 21。
24 〈漢斯．普特曼斯函，1636 年 10 月 7 日，在熱蘭遮城堡〉，《書信集 V》，頁 826。
25 〈漢斯．普特曼斯函，1636 年 10 月 7 日，在熱蘭遮城堡〉，《書信集 V》，頁 849。
26 《熱誌 1》，頁 473。
27 《熱誌 2》，頁 197。
28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頁 304。

三、耕地圖的繪製、版本與使用

為了讓公司當局及參與競標者充分了解農耕地位置與面積、並據以評估農產收成效益，需要仰賴土地測量與地圖繪製工作。此即是詳載耕地空間資訊的「耕地圖」圖類之製圖緣起。

在目前所知的東印度公司遺存圖件中，此類耕地圖，僅有〈赤崁耕地圖〉一幅存世。但是，承包權標售會歷年舉辦，耕地圖也是歷年測量製作、更新繪載，可知耕地圖的版本數量應該相當多，也各有內容與功能上的差異。本節回顧其製圖過程，試著確認耕地圖是由哪些人在畫、怎麼畫，以及從版本問題來看地圖如何運用。

（一）測量與製圖

公司首幅耕地圖的繪製工作，始於 1644 年 9 月，主要由上席商務員 Simon Jacobs. Domckens 與 Cornelis Caesar 兩人進行。

關於 Domckens 其人，他在 1644 春天擔任航往柬埔寨艦隊的副司令官，正司令官為 Hendrik Harousse，該艦隊於 6 月在湄公河作戰。[29] 該年 8 月 25 日，他隨船艦 Kievith 及 Leeuwercq 號自占巴（今越南中南部）抵達大員。[30] 8 月 27 日，他再受派與 De Hooge 前往魍港繪圖，以確認新建碉堡的預定地，[31] 此工作直到 10 月初仍在進行。[32] 9 月，他亦受派勘查與測量赤崁地區農耕地，以及主持承包權標售會，詳見下述；而也是在 10 月，他即離開大員前往柬埔寨。[33] 整體來看，Domckens 實際待在臺灣的時間，大約只有一個多月。

關於 Caesar 其人，他於 1629 年以助理身分出航，不久來到臺灣，1633 年升任下席商務員，1635 年升任商務員，1636 至 1638 年前往廣南（今越南中部），之後再回臺灣任出納、孤兒院院長、福爾摩沙議會議員等職。1641 年他升任上席商務員，1651 年至巴達維亞擔任法務委員，1653 年 5 月再被派任大員長官而來到

29 《熱誌 2》，頁 321，註腳 11；頁 326，註腳 22。
30 《熱誌 2》，頁 326。
31 《熱誌 2》，頁 327。
32 《熱誌 2》，頁 345。當時又再受派與掌旗官 Paulus Strous 前往魍港勘查。
33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1，以及註腳 123。

臺灣，1656 年被召回巴達維亞，1657 年 10 月於巴達維亞辭世。[34]

1644 年 9 月 3 日，Domckens 與 Caesar 先受派前往赤崁地區勘察，[35] 繼而在 7 日進行測量。[36] 13、14 日，長官 Cohen 也動身前往現場勘察，之後決定要進行農耕區的劃分，並再度派遣 Domckens 與 Caesar，協同華商 Peco 一起測量土地與繪製地圖，[37] 至 17 日，地圖始繪製告成。[38] 當局依此次調查，將赤崁及附近的土地分作 4 區，於也繼續委任 Domckens 與 Caesar 主持於 10 月 10 日舉辦的承包權標售會，賸期至隔年的 5 月 31 日。[39]

這次地圖測繪過程，自 7 日的初步測量起，直到 17 日地圖告成之時，製圖僅只花了 11 天時間。負責測繪的這兩個人，都不是以土地測量或地圖繪製為主業；事實上，這個現象也並不罕見，誠如冉福立所指出：幾何學、測量學、透視畫法等 17 世紀普遍的基礎學問，已是當時投入海外貿易、航運、經營管理的眾人才們，應該都多少有所具備的基本技能。[40]

當時常見的土地測繪方法，可能是由測繪者搭配助手，攜帶長柱、鏈子等工具定好界址、測量長度，或利用 360 度的天文觀測儀測量角度，再以三角測量法取得無法直接測量的長度。[41] 1661 年鄭軍控制赤崁地區後，土地測量師 Meijensteen 也在新任承天府尹楊朝棟陪同下進行農耕地測量工作，他的方法則是騎騾，以騾的行走步數來測量土地長寬。[42] 由此來看，實際測繪的人員、器材、方法、時間之差異，可能都會影響到測繪成果。甚至除了製圖任務外，他們也需順帶觀察現場的作物生長狀況，評估收成效益，提供高層參考，[43] 因而身兼第一線的考察者與建言者。

---

34 《熱誌 1》，頁 95，註腳 33。
35 《熱誌 2》，頁 332-333。
36 《熱誌 2》，頁 335。
37 《熱誌 2》，頁 338-339。
38 《熱誌 2》，頁 340。
39 《熱誌 2》，頁 347。
40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9-10。
41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2-73。
42 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漢聲雜誌》132（2003.03），頁 61-62。
43 如 1652 年長官 Verburch 曾向土地測量師徵詢農耕地的作物生長概況：「據赤崁的土地測量師的看法，甘蔗長得很好，下次將會特別豐收。」見《熱誌 3》，頁 286。

值得注意的是，1644 年參與製圖的人員，除了兩名荷蘭人，還有一名華人 Peco。依《熱誌》記載，之前他是一名商人，1639 年曾標得鹿肉經營承包權；[44] 1640 至 1641 年再投入硫磺業，派船至淡水採硫並載回精煉；[45] 1641 年與另一名華商 Sitsick 向公司交涉，使其商船能順利前往柬埔寨與東京（越南），[46] 之後即常見往來航行於東南亞地區。耕地圖繪製完成沒多久，他就與其他華商 Jockthay、何金定等人，受邀加入公司當局為處理民事事件所組成的委員會，訂每星期開會兩次，討論各種民事之處理。[47] 因他欠公司巨額債款，[48] 1645 年底他辭世之後，公司便拍賣其房屋、地產、農地、牛、作物等遺產，以償還欠款。[49] 關於他為什麼會參與製圖、在繪製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沒什麼太多具體線索可循；不過，從他受當局延攬進入委員會協助處理地方公共事務，以及在陸地上擁有私人產業、並有接觸農作，甚至能獲得公司巨額融資等情況來看，除了海外貿易，他也可能已經在陸地的社會中累積一部份活動與經營成果，並獲得當局某種程度上的信任，因而能夠成為當局進行土地調查測繪工作所需要的人力或人脈。

在往後記錄裡，沒有像 1644 年這次測繪工作留有較多的過程細節。不過，1644 年的記載可以提供一個大概的流程輪廓，特別是陸地製圖行動的原委，以及華人如何出現在荷蘭人的臺灣製圖事業裡。

（二）版本與用途的推想

從有限的記述來看，耕地圖本身應該就擁有不同的製圖階段與應用方式；而測繪工作是每年進行，若再置入時間軸的話，則應還有不同形式與年份的多種版本。這些地圖版本的類別，可能至少有以下 5 種。

1. 調查與測繪原稿

在繪圖者調查與測繪過程中，應該就有產出數幅草稿圖件。經過修正或改繪，則有最終完成、提交公司當局的定稿。此類是耕地圖初始版本，也是進行後續規劃、改繪及其他應用所依據的底本。因此，圖面上的訊息可能只有地理景觀與農

44 《熱誌 1》，頁 463。
45 《熱誌 1》，頁 474、478。
46 《熱誌 2》，頁 4。
47 《熱誌 2》，頁 342。
48 《熱誌 2》，頁 70。
49 《熱誌 2》，頁 485。

耕地分佈，還沒有之後的劃線、分區、註記等規劃資訊；在形式上，也可能常是分繪數幅、需要拼接的分圖，而較少有整理完畢、一體呈現的單幅全圖。

2. 規劃用圖

上述的定本完成後，應受公司當局取用，作為評估與規劃該年度發賣內容的圖資，並將規劃訊息及其結果註記在圖上，最終成為規劃定本。此類地圖，內容應與定稿沒有什麼太大差異；重點可能在於各片農耕區的界線、地名、面積數字等新註記。《熱誌》裡描述的耕地圖，絕大多應是已經規劃完成的此類地圖。

3. 公告用圖

在承包權標售大會於公司庭苑正式舉辦前，公司當局會先對外公告該年度的耕地圖。依《熱誌》描述，圖上繪有耕地標記及面積大小等資訊，用荷蘭文與中文書寫，張貼於華人的房子，如 1647 年是貼在 Jocktay 的房子，[50] 1648 年是貼在三舍（Samsiacq）的房子。[51] 這些華人的身份是商人、也是赤崁地區的土地開發者、亦為當地華人社群的頭人（cabessa）。[52] 這說明，所謂的房子（huyse[53]）與其說是一種住宅，更可能是一種公館的所在地，因而得以作為張貼公告與地圖的最適當場所。

此類圖應是依據規劃的定稿摹繪而成，所以內容可能與定稿沒有太大差異。因無實際案例留存，無法具體得知此類圖的形貌與內容；但因為是公告所需，推想或許會比定稿簡略，卻更力求註記清晰、容易閱讀。

4. 寄送報告或歸檔用圖

在公司週期性業務回報、或需運送資料物品等狀況，大員商館可能會將耕地圖隨附於報告、信函、資料內，寄送回巴達維亞總部。夾藏在公司檔案裡的〈耕地圖〉，可能就是因此流傳到荷蘭。不過，這些經過傳遞與保存的地圖，可能不全然是單一件，而是還會摹繪再製其他複本。[54] 這些複本地圖又會再為原圖再增添不少圖件數量。

---

50 《熱誌 2》，頁 679。

51 《熱誌 3》，頁 95。

52 cabessa 在西班牙與葡萄牙語中為「頭人」之意。而關於當時這些華人土地開發者及其事業身份，韓家寶有初步的整理，見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109-113。

53 即 house，房子。原文見 *DZ II,* p.598; *DZ III,* p. 88.

54 關於公司對地圖的傳遞與複製，冉福立有略加陳述。見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12-13。

5. 其他延伸應用

除上述 4 種自身應用脈絡外，耕地圖也可能作為其他文獻或地圖的參考依據或延伸使用。例如在〈福爾摩沙與澎湖海岸圖〉（圖 3）[55] 對臺南一帶的描繪裡可以發現，它所描繪的鯽魚潭及潭邊巨宅景象，與〈耕地圖〉所描繪的畫面相當類似（圖 4）。這些鯽魚潭的圖像訊息，很可能始自耕地圖測繪所得，因而該圖（或該圖的上一幅母本）應是自耕地圖取引輯製，而非該圖的第一手記錄。[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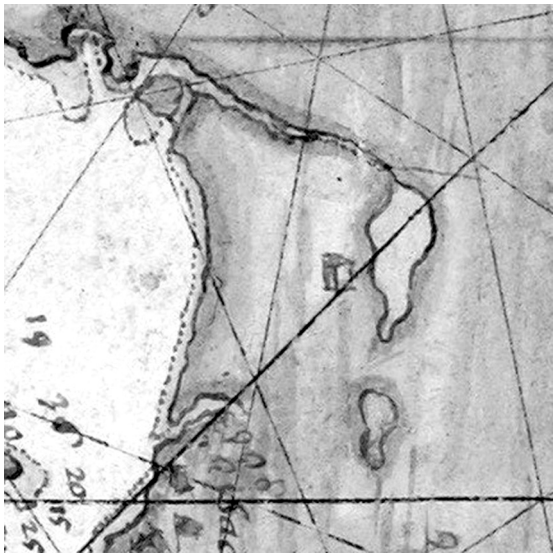


圖 3　〈福爾摩沙與澎湖海岸圖〉中的鯽魚潭與潭畔大宅（北方為上）



圖 4　〈赤崁耕地圖〉中的鯽魚潭與潭畔大宅（北方為上）

另依韓家寶所稱，公司曾製作臺灣地產登錄簿（*Formosa landboek*），記載每位農民姓名、擁有地產的大小與方位；[57] 這些詳細的土地登錄資料，可能也與相襯的土地測量行動與地圖文獻有所聯繫。諸如此類關聯，實與耕地圖的製圖脈絡密切相關，也是耕地圖在物質性流動與知識資訊傳播的面向之一。

55　〈福爾摩沙與澎湖海岸圖〉（*Kaart van de kusten van Formosa en de Pescadores*），檔號：4.VELH 619.52。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56　關於鯽魚潭及其潭邊巨宅的問題，本文第八節第三小節另有描述。

57　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2002），頁 33。

四、〈赤崁耕地圖〉的年代、版本與特性

目前唯一僅見的〈赤崁耕地圖〉，本身仍存在一些疑點尚未解決，尤其是沒有文字的現象更是困擾研究者。在前述對製圖過程與眾多版本的討論基礎上，本節自這些疑點切入，窺探〈耕地圖〉在耕地圖的製圖脈絡中，是屬於哪一種版本、位處在哪一個位置，冀以還原其一部分身世線索與地圖特性。

（一）年代與製圖者問題

〈耕地圖〉沒有載寫任何文字，繪製時間無法直接得知，需間接加以旁證。目前廣受引用、幾成定論的說法，是早在 Leupe 地圖目錄即已載明的 1644 年，其判斷依據，應該就是上節所述《熱誌》記載的 1644 年 Domckens 測繪地圖事蹟。不過，由於耕地圖歷年皆有測繪，理應不只一幅；而沒有文字、也與原始文件脫離的〈耕地圖〉，到底是如何比定為 1644 年，似乎未見詳細說明，因此，今人也有認為可能是繪於其他年份之推測。[58]為支撐後續的判讀分析，繪製時間點的問題，有進行確認之必要。

在目前所知公司繪製臺灣古地圖中，登錄為 Domcken 繪製的，除了〈耕地圖〉，還有另一幅〈魍港形勢圖〉（以下簡稱「魍港圖」）。[59]從羅盤玫瑰圖（compass rose）描繪方式（圖 5）及具有特定畫風的動物墨線小圖（圖 6）來看，〈魍港圖〉與〈耕地圖〉有類似的繪畫風格，似出於同一人之手。因此，保留了較多時間線索的〈魍港圖〉，可作為定奪〈耕地圖〉時間點的依據。

58 如《綜覽臺江：大員四百年地輿圖》一書即提出：該圖亦有 1650 年繪製之可能性。見高賢治、黃光瀛總編輯，《綜覽臺江：大員四百年地輿圖增訂初版》（臺南：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2012），頁 34-35。

59 〈魍港形勢圖（*Caerte van Wancans gelegentheyt*）〉（海牙：國家檔案館藏），檔號：4.VEL 1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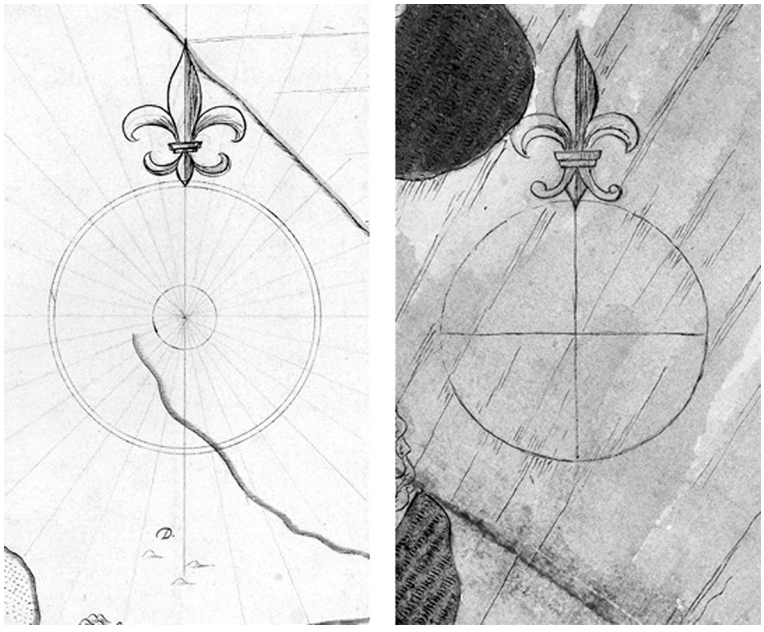


圖 5　〈魍港圖〉（左）與〈耕地圖〉（右）的羅盤玫瑰圖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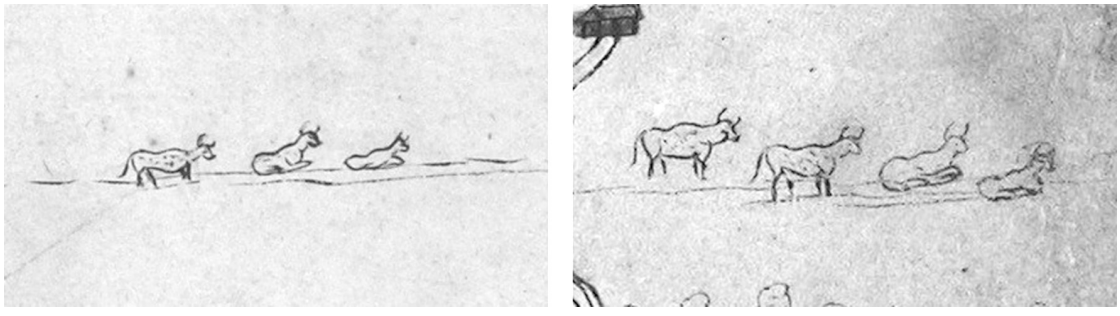


圖 6　〈魍港圖〉（左）與〈耕地圖〉（右）的牛群圖像

然而，同樣沒有署名製圖者、但附有詳盡圖說的〈魍港圖〉，又是何時之物？依其圖說記載，該圖應是為了勘察毀壞的 Vlissingen 堡壘而繪製，並對於魍港地理形勢與各種細節有細緻描述，尤其是「削低對岸丘陵高度」以建造新堡壘的提議，幾乎與《熱誌》記載 1644 年 10 月 6 日 Domckens 回報當局的內容大致相符。[60] 因此〈魍港圖〉應能推定是依 1644 年 Domckens 的勘察結果製成。

另外，Domckens 在抵達大員之前，是航往柬埔寨作戰之艦隊的副司令官。在其遠征日記報告裡，原本也附有一幅描繪 6 月 12 日 Ponumpingh（即 Phnom

60　《熱誌 2》，頁 346。

Penh，今金邊）作戰景象的墨線手繪紙本地圖。[61] 該圖在矮灌木樹叢、屋舍圖案、充填土地的虛線與實線等繪法與細節表現，亦皆與〈耕地圖〉甚為類似（圖 7）。故此幅〈金邊海戰圖〉可再強化說明 Domckens 的繪圖風格，並推測它與〈耕地圖〉應有共同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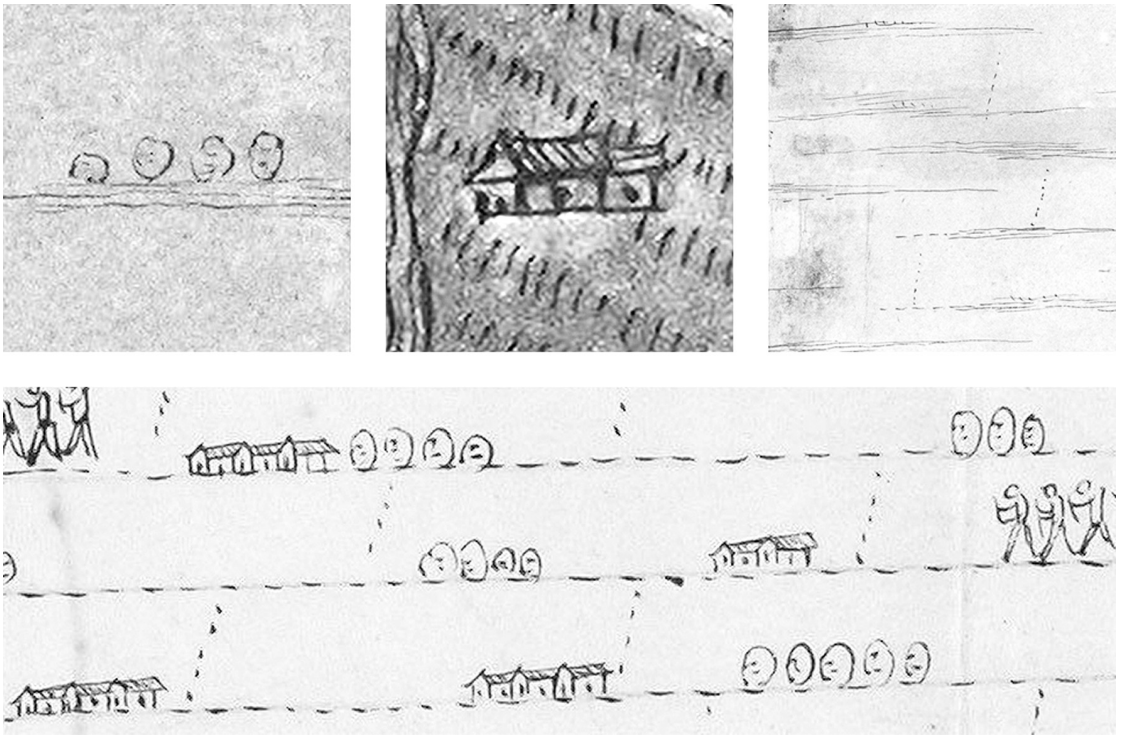


圖 7　〈赤崁耕地圖〉（上）與〈金邊海戰圖〉（下）在矮灌木樹叢、屋舍、土地線條圖像的表現

經過不同地圖與圖像細節之比定，可以確認〈耕地圖〉乃出自 1644 年 Domckens 手筆，應無疑問。

（二）無字的現象與版本問題

如前段所述，〈耕地圖〉圖像描繪豐富，但令人費解的是，圖上沒有記載任何文字。文字本是地圖構成要件之一，筆者不認為〈耕地圖〉是一幅不用文字就可輕易辨識內容的圖像，因此，若它的無字會對今日閱圖者造成困擾，那麼對往

61　〈1644 年 6 月 12 日金邊海戰圖（*Afbeelding van de Zeeslag voor Panumping (op de Rivier van Cambodia) gehouden den 12den juni, op Sondach, van den dageraedt tot savonts ten 5 uren, in 't jaar 1644*）〉（海牙：國家檔案館藏），檔號：4.VEL 268。

昔閱圖者而言，相信應該也有同樣的困擾。前述同樣是 Domckens 作品的〈金邊海戰圖〉與〈魍港圖〉，都有註記代號與另外題寫圖說，故對製圖者來說，地圖附加文字是一種正常且完整的格式，而無字地圖才是特殊現象。因此，可能是有特定的原因，使得〈耕地圖〉缺少文字；但此原因亦無法直接徵於文獻，只能間接推敲以下兩種可能。

其中一種可能是：就像〈魍港圖〉那般，〈耕地圖〉應該也有一份另外題寫、可以搭配的文件或圖說，使圖文可以互襯，不需直接在圖上註記文字；日後，圖說的部分與地圖脫離了，最後留下無字的地圖。這項推測的問題，在於〈魍港圖〉於圖中有註記代號，以便對應圖說；〈耕地圖〉則是沒有任何文字符號，所以假設它原本有一份相對應的圖說文字，可能也很難參照解說地圖的圖像細節。

另外一種可能是：〈耕地圖〉或許屬於未完成的圖稿。根據《熱誌》在 1644 年承包權標售會當天的記載：「那些要出賤徵收什一稅的土地，即赤崁及其附近的土地，分成四區，如同那張為此繪製的地圖所顯示那樣……」[62] 據此，該年耕地圖的規劃完稿本與發佈用圖，應該具體顯示了當局規劃的4區形勢;然而在這幅〈耕地圖〉上，卻怎麼也看不出此般地區劃分痕跡。由此可確認，〈耕地圖〉並非《熱誌》所描述的那幅分區完成、張貼公告的圖；更進一步說，〈耕地圖〉可能還不是完稿本，而是尚未將文字填入的圖稿，也就是前節在耕地圖版本的討論中所提到「調查與測繪原稿」的版本。

另外，〈耕地圖〉圖面北起新港溪、南迄鹹水溪、東至鯽魚潭，對閱圖者而言，似乎就是一幅完整空間的全圖展現；而後人命名的「赤崁耕地圖」一詞，又更強化了這個印象。但也可以發現，耕地Ⓜ、Ⓝ並沒有完整繪入圖內。筆者無法確認究竟 Domckens 是只有繪製〈耕地圖〉一幅、或者有其他地區的分圖，但這些不完整的區塊告訴我們，〈耕地圖〉的畫面並不完整。這除了說明華人的農耕活動已然超出該圖之外；也提醒我們，可能不能直接貿然認定當時測繪的地域，就只有〈耕地圖〉這塊畫面而已，而無其他分圖存在。

62 《熱誌 2》，頁 347。

（三）誤差之一：比例之失衡

如前所述，〈耕地圖〉有墨線描繪的指北針及尺標圖案。這些圖案是要交待該圖的方位與縮圖比例；另一方面，也暗示該圖不是傳統繪畫式地圖（pictorial map），而是實地測繪製成，某程度上應該可以對應到實地空間。

尺標圖案以 8 段單位構成，沒有記載文字。其所代表的比例，依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一書解說，單位是 800 Rijnlandse roeden，可知其認為尺標的一個單位是 100 Rijnlandse roeden，[63] 以此換算，該圖比例尺大致為 1:14,600。[64] 不過，經解讀與比定圖內各項元素（比定過程參見後文第五至七節），輔以 GIS 系統套疊現代圖資，維持住湖泊①鯽魚潭、道路㉕、河流⑤竹溪出海口、山地⑪崁頂山以南之大致位置與格局，再以該圖原件尺寸 40.5×55.5 公分換算後的結果，本文認為實際比例應該大約接近 1:34,500（此為整數之近似值。以下所稱「GIS 比定位置」皆以此比例套用，不再另行說明）。

即便確認了比例，但實際比定後又可知，該比例其實無法完整套用到全圖，特別是在德慶溪與柴頭港溪之間、鯽魚潭與新港溪之間等處，比例縮減程度相當大；而竹溪中段、崁頂山沿邊一帶，亦有比例與方位偏移的現象（圖 8）。

〈耕地圖〉具有比例誤差問題，先行研究者冉福立與范勝雄皆有深刻體會。冉福立認為，之所以有極大誤差的原因，是因為 Domckens 沒有足夠的時間可測繪；[65] 但他隨後也有提到，1645 年以後，公司當局依然對耕地圖的繪製品質感到不滿。[66] 事實上，地圖誤差的問題，公司當局自己也一直都很清楚，所以在召開標售大會時，每每不忘附加「因為土地面積無法真的測量得那麼精確，因此，一切資訊以發賤前的公告與地圖為準，若之後有發現實際面積有多或少，都不能有任何意見或解約」的但書。[67]

---

63 據曹永和引用荷蘭語辭典之解說，1 Rijnlandse roeden 約等於 3.767 公尺。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340。

64 Jos Gommans and Rob van Diessen, eds.,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el VII: Oost-Azië, Birma tot Japan* (Voorburg, Netherlands: Atlas Maior, 2010), p. 232.

65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1。

66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4。

67 如 1647 年宣稱：「因為無法知道那些農地完全正確的大小，有的農地測少了，想要減少租金的，有的測多了，應該追加租金的，都不予考慮。」見《熱誌 2》，頁 679。直到 1657 年，公司還在做這般宣稱（見《熱誌 4》，頁 294）。

這樣看來，〈耕地圖〉的誤差，並不完全是 Domckens 繪製時獨有的問題。在本文第三節第一小節對地圖測繪方法的回顧裡，已提到土地測量與製圖成果，可能會因人員、器材、方法、時間而有差異。在這些因素的影響與限制下，可能使耕地圖（以及耕地的測量與紀錄）一直無法掌握相對精確的圖資。雖然這些誤差似乎沒有對耕地稻作承包權的標售造成太大困擾；但對當今研究者而言，則是必須明確意識到、並且要審慎應對的地圖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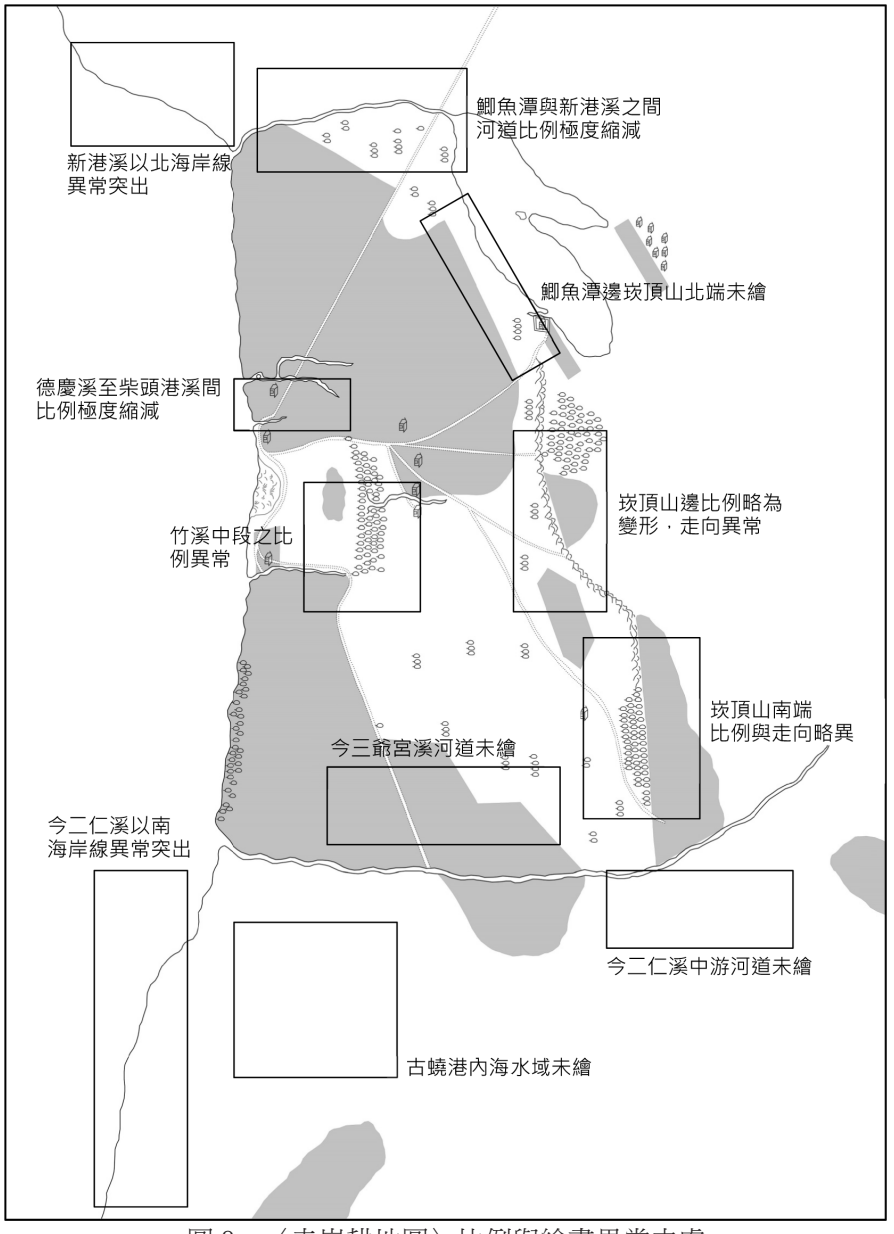


圖 8　〈赤崁耕地圖〉比例與繪畫異常之處

（四）誤差之二：繪畫示意性

〈耕地圖〉的誤差，除了反映在測繪技術所造成的比例不一，還有圖像的「繪畫示意性」。這是指畫面並非完全得自純然的測繪成果，而還有製圖者自己補充、選擇增減地景空間內容的示意性圖畫，富含了製圖者自身在空間認知上的心像（mental image）元素，[68] 無法視之為能夠直接精準對應到實地空間的純然精確資料。

這項特性，冉福立已有揭示「只提供對耕地的印象而已」，所以長官 Caron 對此結果並不滿意，因而在 1645-1647 年間，繼續要求繪製更完整的地圖。[69] 而實際從地圖的描繪方式來看（圖 8），亦可見〈耕地圖〉有其寫意式的表現，除了對樹木與野生動物的描寫，最明顯之處，即在於對崁頂山形勢走向的描繪，而這也連帶影響到圖內旁側空間的位置與比例。另外，亦有省略不繪之處，如三爺宮溪河道、二仁溪主河道、古蟯港內海水域，皆不見於圖中；更有模糊帶過的虛幻空間，如新港溪以北、二仁溪以南往外突出的陸地海岸線。

整體來說，〈耕地圖〉是一幅在有限時間與技術下完成的初期圖稿。這個版本特性說明了，與其認為〈耕地圖〉是 1644 年當局針對農地區劃的定案，不如說它更切重於反映赤崁地區從 1630 年中期開始發展商品化農業歷時約十年後的地景空間大致發展情況。另一方面，初稿版本所導致的未載文字、未達相對精準性、部分地區比例失衡等現象，以及製圖者採用繪畫示意性手法描繪圖內一部分空間圖像，皆使得實地測量行動下繪製而成的〈耕地圖〉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精確無誤。但這些成果既是誤差、也是其地圖特性，雖與實際地景有所落差，亦是珍貴線索，可提供當時人們識讀與理解空間之意涵，並回饋給地圖及地景之考察工作。因此，研究者在探究地圖內涵、比對空間地景時，需明確意識到這些誤差的存在，並加以謹慎處理。

---

68 心像（mental image）指空間經過人類選擇性接受與不同識覺所產生的空間圖像，與實質環境有所差距。關於古地圖的空間認知與心像問題，賴進貴等人已有基本討論，參見賴進貴、黃清琦、葉高華，〈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 1878 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地理學報》42（2005.12），頁 47-68。然而，該文僅以中文古舊地圖為討論對象，對於 1895 年以後日本所帶來的現代實測製圖，則認為空間認知的心像因素較低，僅以測繪誤差為主。對此，筆者認為，不論是哪一種地圖產物，應皆有其空間認知、詮釋與再現的識讀結果，只是形式、層次、程度不一而已，當然也包含本文所討論的、經由實地測繪所製成的〈赤崁耕地圖〉。

69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4。

五、自然地景之描繪與比定

為進行〈耕地圖〉的地圖閱讀及空間比定，本文以GIS系統進行圖資套疊對應，兼採幾何校正、錨點比對等方式進行適度調整，更用圖像的閱讀與分析作為主要方法，藉以同時處理地圖的測繪紀錄、示意性、誤差等各種不同性質訊息。以下三節即從「自然地景」、「人造地景」、「耕地」三部分，於圖面逐一設置代號（參見附圖 2 所示），進行各圖像元素及比定判讀之說明。

在自然地景部分，〈耕地圖〉繪有海洋、陸地、湖泊、河流、草地、丘陵、樹木等不同圖案。本節整理 11 項地點，逐一簡要敘說。

（一）湖泊

①：圖內最顯眼、亦是唯一的湖泊地景。冉福立認為是「沼澤地」，[70] 范勝雄 [71]、翁佳音 [72] 皆認為是鯽魚潭。依其形狀及位置，判定為鯽魚潭應無疑義。故址約在今臺南市永康區網寮、西灣、崑山、建國、南灣，仁德區太子、仁德、一甲等里一帶。

（二）河流

②：上游銜接湖泊①鯽魚潭北端，往西流入臺江內海。冉福立 [73] 與翁佳音 [74] 認為是今鹽水溪，范勝雄認為是蔦松溪，[75] 兩溪差別在於下游出海口位置，以主河道而言，可說皆為鹽水溪（古稱新港溪）。然經過 GIS 比定，此河落在南方的花園坑溪位置，完全無法契合至鹽水溪，比定差距至少 4 公里以上。

70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1。
71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30。
72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頁 76。
73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1。
74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頁 76；《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頁 221。
75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30。

此般結果，不合鯽魚潭銜接新港溪的實際地形。然而，若將此河比定為鹽水溪，則鯽魚潭會脫離故址範圍，空間比例失調；甚至不用 GIS 比定亦可知，新港溪至鯽魚潭的實際距離，沒有〈耕地圖〉所描繪的如此短近。

如上節所述，因為比例失衡，這一帶空間的圖像很不穩定，無法直接對應至實地空間。范勝雄亦因為比定困難，所以嘗試了將鯽魚潭切開另外套置的方案。[76] 筆者認為，此河繪為銜接鯽魚潭，故將之直接比定為新港溪（今鹽水溪）應是較合理的結果。

③：有 Y 形汊流。范勝雄認為是石頭坑（今柴頭港溪），並將汊流解釋為清治時期方志所載「受眾流小水，入於海」的形勢。[77]

因為比例失衡，此河亦難以比對。然而，若以 1:34,500 的比例套用，並將此河對應在柴頭港溪位置，則上段河流②就會落在鹽水溪的位置。這般情形可能說明的是：此河也許是柴頭港溪，河流②則為鹽水溪，但兩河之間的比例極度失衡。據此，則暫將此河比定為柴頭港溪。

④：范勝雄認為是德慶溪。[78] 因為比例失衡，無法以 GIS 比對位置。若將道路㉕視為今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前身（見下節之比定）的話，則此河理應比定為府城古河道坑仔底（德慶溪）。

⑤：范勝雄認為是《臺灣采訪冊》所載「溪仔墘溪」，[79] 即今竹溪，本文同意此說。其右上方另繪一條河道，由東向西流入林地⑦後，不再繪出輪廓，應指竹溪上游。1652 年 Cornelis Plockhoij 繪製的大員附近地圖（圖 9，以下簡稱「Plockhoij 圖」），[80] 完整表現竹溪河道走向，符合其於臺南市法華寺一帶轉折南流後，再折回西流的梯狀形勢。相較於此，〈耕地圖〉並沒有把隱沒在林地⑦（即海牙人森林，見下段陳述）範圍內的水道畫出來。

76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34。
77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30，第 7 點。
78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29-130，第 5 點。
79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30，第 10 點。
80 〈1652 年福爾摩沙大員水道完整全圖（*Een perfect caertjen van 't Tayouanse canael, Formosa 1652*）〉（海牙：國家檔案館藏），檔號：4.VELH 14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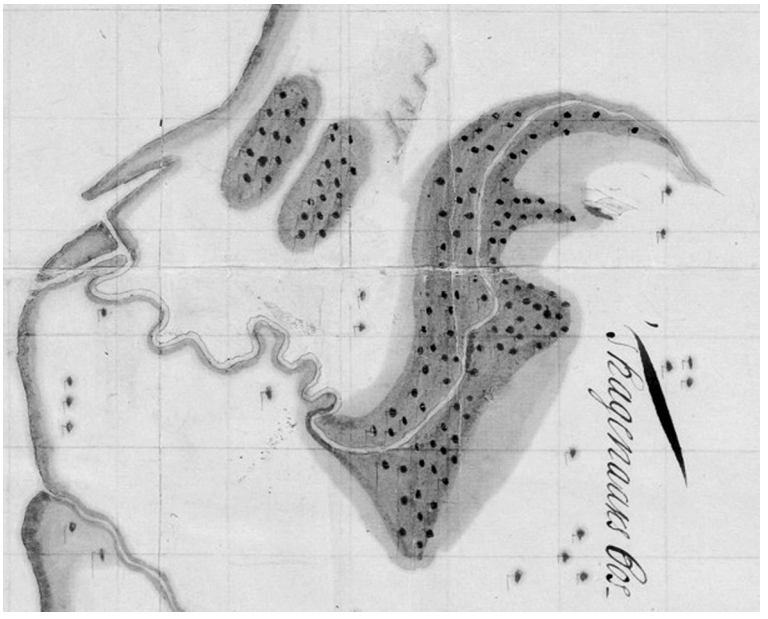


圖 9　Plockhoij〈1652 年福爾摩沙大員水道完整全圖〉海牙人森林局部（北方為上）

⑥：位於圖幅最南端，自東往西延伸入海，耕地Ⓕ、Ⓖ、Ⓗ皆與其貼鄰。GIS 比定位置，落在今二仁溪河道。

冉福立認為是鹹水溪（Soute Rivier），即今三爺宮溪，[81] 范勝雄 [82] 與翁佳音 [83] 皆同意此說。然若比定為三爺宮溪，則崁頂山、耕地Ⓓ、Ⓔ皆會失去適當位置；而若比定為「二仁溪—五帝廟溪」，則在比例、位置上皆大致契合其河道走向。另，在公司的發賤耕地中，有一塊「清水溪（Verse Rivier，二仁溪）南邊堯港附近所有的耕地」，耕地Ⓖ可能即指此地。[84] 以此推論，此河下游應屬清水溪（二仁溪）；東端上揚處應比定為支流五帝廟溪。至於三爺宮溪與二仁溪主流的河道，則如前節圖 8 所示，被省略未畫了，致使這條「二仁溪—五帝廟溪」表現得有如單一河道般。

81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2。
82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30，第 11 點。
83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頁 221-222。
84　《熱誌 2》，頁 680。有關耕地Ⓖ，參見下文第七節，及第八節第一小節之比定。

（三）林地

林地是以墨線、無著色的矮灌木圖案，密集地重複描繪而成。圖內可見 3 處顯著的林地；另有一處疑似表現草地，亦歸此小節述之。此外，尚有高聳樹木、椰子樹等單一圖案，它們可能是被當作一種辨識用的地標而被畫在圖上。另外，耕地Ⓗ西方海岸邊，亦有一排稀疏樹林。這些地點，因為規模零星或位置不定，暫不於本文討論。

⑦：林地。在「Plockhoij 圖」的相同位置上，標示有 't hagenaars bos（海牙人森林），並在南北向的竹溪兩岸繪滿林地，與〈耕地圖〉相似。惟〈耕地圖〉沒有那麼精準呈現林地形狀，只繪出南北向長形帶狀林地，北端略貼近道路㉕。經過比定，約在今臺南市南區大林一帶。[85]

⑧：海濱有片半圓形區塊，繪有類似草地的線條。「Plockhoij 圖」此處有兩座橢圓形森林；經比定，〈耕地圖〉與「Plockhoij 圖」的此位置皆落在今臺南市南區下林（ê-nâ-á）、土墼埕一帶，可知下林地名典故可能來自 17 世紀的林地。然而，〈耕地圖〉在這裡沒有像林地⑦海牙人森林那樣綴以密集樹叢，卻只畫了一片類似荒草的空間。

⑨：林地，南臨耕地Ⓒ，西臨崁頂山，北與耕地Ⓑ比鄰。依此位置比定，約在今臺南市仁德區國道一道臺南交流道至文華路一帶，範圍內有崁腳等舊聚落。

⑩：林地，北抵崁頂山尾端，西南依臨道路，東倚耕地Ⓔ西側直線邊緣。依此位置比定，約在今臺南市仁德區田厝、三甲等里交界處一帶，範圍內有龜仔廍、紅花園、三甲、三爺宮等舊聚落。

（四）山丘

⑪：圖內僅見的山丘圖繪，以綿密連續的矮丘圖案構成。北起湖泊①鯽魚潭及耕地Ⓑ南端，往南方蜿蜒延伸，經林地⑨西、耕地Ⓒ西、耕地Ⓓ東，至林地⑩北方結束。

85　中譯本《熱蘭遮城日誌》作「哈根納森林」，見《熱誌 2》，頁 71。

范勝雄認為是崁頂山；[86] 按位置判斷，本文亦同意此說。崁頂山為臺南臺地東緣背斜軸，大致在今臺南市東區東緣，及永康、仁德兩區西緣等地。圖中將山的北端繪至湖泊①鯽魚潭南端為止，實際上，在鯽魚潭西側應還有繼續延伸，但圖中並未繪出。

（五）動物

除地景圖像外，〈耕地圖〉還有水鴨（只出現在鯽魚潭）、牛、鹿等動物圖像。牛與鹿的描繪，可能說明當時赤崁地區仍有野生動物，尚未因耕地開闢與人類活動頻繁而絕跡；然而這些圖像到底只是單純點綴、或者有特定地點的指涉，還無法明確認定，暫存而不論。

六、人造地景之描繪與比定

人造地景部分，「耕地」另於下節討論，其餘則有「屋舍」、「道路」兩類圖案。屋舍圖繪作二坡水屋頂的房子，著紅色，共有 12 處地點標示。道路則著黃色，有 7 條路線。

（一）屋舍圖案

⑫：集結有 7 個單棟屋舍，為全圖僅見。緊靠在耕地Ⓐ東側，可能表示有大型聚落。冉福立認為應是新港（新市）；[87] 然以其緊鄰在耕地Ⓐ（位置約在今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太子等里，詳見第七節之比定）旁來看，應比定在臺南市仁德區土庫一帶。

⑬：東臨鯽魚潭，北側還倚鄰一條自水潭分出的小水道；南有道路相通，繪有圍籬，似表示圍牆與庭園的格局，是圖內僅見的大型建築圖案。冉福立認為應是大目降（新化）。[88] 從鯽魚潭故址範圍搭配《臺灣堡圖》比對，推知其北側小水道可能在今臺南市東區後甲里與永康區復興、建國里交

86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30，第 12 點。
87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2。
88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2。

界處，今日尚存。據此比定，此屋舍位置可能在今裕永一街欣南瓦斯廠址一帶。

⑭：位於耕地Ⓓ南、森林⑩西、道路㉙西方。GIS 比定結果落在約今臺南市仁德區奇美博物館一帶，但此處省略未畫三爺宮溪河道，所以這個比定結果亦難確認。此屋舍南方尚繪有 4 隻牛像，或站或臥。

⑮：位於河流⑥、道路㉚交會處東北方。比定在約今臺南市仁德區大甲里，即舊聚落大甲一帶。

⑯：耕地Ⓘ內、道路⑯邊，似乎與耕地Ⓘ關聯甚密。比定在約今臺南市南區明亮里，即舊聚落鹽埕東北角一帶。

⑰：位於河流⑤竹溪中游左岸，道路㉗尾端。「Plockhoij 圖」（圖 9）在相同位置亦畫有一棟屋舍，可能是同一對象。比定在約今臺南市東區路東里、大德里一帶。

⑱：位於河流⑤竹溪中游右岸，在耕地Ⓚ內，與屋舍⑰隔河相對。比定在約今臺南市東區德光里德光女中一帶。

⑲：位於道路㉕與㉘的分岔處東側，耕地Ⓚ範圍內。比定在約今臺南市東區崇善路與林森路一段交會口一帶。

⑳：位於道路㉖北邊，靠近道路㉕的分岔處，在耕地Ⓚ範圍內。位置的線索不齊全，僅能依相對位置，暫比定在約今臺南市東區長榮女中、勝利國小一帶。

㉑：位於河流④左岸，道路㉔與㉕分岔處旁。比定在約今臺南市中西區赤崁樓一帶。

㉒：此帶比例失衡不定，難以研判；然若將河流③比定為柴頭港溪的話，以其位在河流③與道路㉔交會點西南方的位置來看，可能在今臺南市北區開元寺北方一帶。惟仍難定論。

㉓：同樣在比例不定的區域內，亦缺乏可輔助比對的線索，無法判定，僅能大致推定應不脫今臺南市永康區西北側境內。

（二）道路

㉔：從河流④往東北延伸，通過河流③兩支流與河流②，直抵圖框，因此未繪出最後抵達何處。江樹生認為是 1662 年土地測量師 Meijensteen 所稱的新港車路（Sinckanse wagenpath）；[89] 范勝雄認為是府城大北門與大目降（新化）之間的開元路。[90] 經比定，往北方走，應依序經過臺南市開元寺（北區北園街）、大橋（永康區大橋里）、小橋（永康區陸軍砲校舊址）、蔦松（永康區蔦松里）、車行（永康區王行里）等地，最後應抵新港地區（新市區社內里一帶），而非范勝雄所稱通往新化。位置接近今臺南市北區公園路（臺 20 線），再通過永康區安康、大橋、東橋等里，以及永康區中正北路（臺 1 線）等道路或地區。

㉕：與道路㉔、㉚在屋舍㉑的地方有所交會，接著往東延伸，先在林地㉗北方分岔出 4 條路，其中一條筆直往東，最後抵達崁頂山，接近林地⑨。范勝雄認為：與道路㉔交會處，為今中西區民權路二段之大井頭，而道路則為普羅民西亞街。[91] 經比定，此路線可能接近今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東區東門路之位置，起至中西區永福路與民權路交會口，終至東區、仁德區交界一帶。經過清治時期府城大街、大東門、虎尾寮南方等舊聚落。

㉖：是由道路㉕分岔出來的 4 條路之一。分岔後往東延伸，越過山丘⑪崁頂山，最終抵達屋舍⑬、耕地B、湖泊①鯽魚潭西南岸。經比定，其分岔點可能在府城大東門附近，接著由西向東依序經過草店尾、關帝廳、前甲、後甲等舊聚落，路線接近今臺南市東區裕農路。

㉗：道路㉕分岔出來的 4 條路之一。分岔後往南延伸，沿著林地㉗海牙人森林東緣，越過河流⑤竹溪上游河道後，最終抵達屋舍⑰。經比定，大約在今臺南市大東門往南延伸到東區路東里、大德里一帶。此址現為市區街廓，無法尋得接近的道路。

89　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頁 22、後 2。
90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36，第 5 點 OX 道路。
91　范勝雄，〈「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頁 129，第 3、4 點。

㉘：道路㉕分岔出來的 4 條路之一。分岔後往東南方延伸，直抵崁頂山腳下、耕地Ⓒ南邊。經比定，大約經過今臺南市大東門、德光女中、崇學國小、仁和路西南側等地帶，因現為市區街廓，無法尋得接近的道路。路線經過舊聚落竹篙厝，最後抵崁尾仔一帶。

㉙：由道路㉘分岔出來，往東南延伸，經過耕地Ⓓ西側、林地⑩西側，最終抵耕地Ⓔ南部。經比定，其與道路㉘的分岔點，可能在今德光女中一帶，接著往南延伸，大約經過今臺南市東區文化中心、糖業研究所、仁德區二空新村、虎山農場、保安里一帶。路線經過大路東、牛稠仔、十三甲、三爺宮、車路墘等舊聚落。

㉚：與道路㉔、㉕在屋舍㉑的位置交會，接著往南延伸，先迂迴繞過⑧，再於耕地Ⓘ內分岔為兩條路，其中一條沿海濱通往河流⑤竹溪河岸，另一條則沿竹溪右岸邊往東延伸，再往南轉，沿著耕地Ⓗ東緣，直抵河流⑥二層行溪北岸。經比定，大致經過今臺南市南區鹽埕、臺南機場側、仁德區大甲里一帶。路線經過莊雅橋、馬兵營、土墼埕、下林仔、田寮仔、鹽埕、曾振暘墓旁、藩府二鄭公子墓旁、鞍仔、山仔頭等舊地名。

七、農耕地之描繪與比定

〈耕地圖〉的農耕地，皆為面狀區塊，著深綠色。各區分別比定如下：

Ⓐ：長方形，位於鯽魚潭旁。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太子等里，範圍內有土庫、大宅、六甲仔等舊聚落。[92]

Ⓑ：長方形。東臨鯽魚潭，北臨道路，與巨宅⑬對望。以此地景為依據，本文比定在臺南市東區裕信路與裕義路之間一帶，北邊臨今裕農路。此範圍南端有一舊聚落「王牛稠」，今不存。

92 以下所稱「耕地範圍內舊聚落」，乃指該範圍裡所出現的日治時期《臺灣堡圖》記載舊聚落地名，僅供比對參考，並非指這些地名在〈耕地圖〉繪製當時就已經存在。

Ⓒ：不規則形。貼近崁頂山腳。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仁德區白崙仔一帶。以此來看，此片耕地西邊的直線，是因臨近崁頂山（今稱虎子山）所致，應無疑問；而東邊的半圓形狀，可能因鄰三爺宮溪的曲流地形所致。

Ⓓ：六角方形。位於崁頂山西側與南邊道路間。因空間變形，此處不易比定，經取南邊道路㉙、東側山丘⑪崁頂山相對位置來看，或許位於今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國小、虎山農場一帶，北端觸及南勢園、牛稠仔等舊聚落。此位置在東北倚臨虎子山，南臨三爺宮溪河道，此般狹長的包合形勢，可能是造就此片耕地呈現六角長條方形的原因。

Ⓔ：不規則長條形。北臨崁頂山南側盡頭，南臨河道，西緣相當筆直。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仁德區後壁、田厝、上崙、三甲、保安等里，範圍內有洋仔下、那拔林、田厝、鳥松腳、凹仔、龜仔廍、三甲、坑仔墘、港墘等舊聚落。以此來看，此片耕地可能就位處於三爺宮溪與五帝廟溪之間。

Ⓕ：接近梯形。西臨大路，南臨二層行溪河道右岸。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仁德區大甲、二行等里，範圍內有山仔頭、大甲、土庫、港崎頭、二層行等舊聚落。以此來看，北邊的階梯式切劃，疑因倚臨三爺宮溪河道所致。

Ⓖ：不規則形，略呈半圓。北邊倚臨二層行溪河道左岸，與右岸的Ⓕ耕地對望。經比定，約在今高雄市湖內區葉厝、公館、海埔等里一帶，範圍內有葉厝甲、太爺、公館、廍邊等舊聚落。

Ⓗ：不規則形。北至竹溪、南至二層行溪，西至海濱，東至道路㉚，其東邊亦因鄰路而筆直。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南區竹溪以南、二仁溪以北，東至臺南機場西側、西至明興路一帶，範圍內有鹽埕、瀨口、堀仔、喜樹、灣裡、草埔等舊聚落。

Ⓘ：方形。南臨道路及竹溪右岸，西臨大路，不遠即至海濱。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南區鹽埕路、利南街（竹溪舊水道，下游段舊稱鹽埕溪）交會口至日新國小一帶，範圍涵括鹽埕舊聚落北端一帶。

Ⓙ：不規則形。東鄰林地⑦海牙人森林。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至臺南市立棒球場一帶，範圍內有府城小南門、法華寺、五妃廟等舊地名。

Ⓚ：不規則形。西鄰道路㉔，南鄰道路㉕，東南受道路㉕分岔的四條支道分割，東南方一角抵於河流⑤竹溪中游北岸。東北邊呈現直線，可能因依鄰鯽魚潭側的崁頂山（但圖中未畫出山巒）所致。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中西區、南區、東區，及永康區西南角大約東橋里至復興里一帶。境內，上半部幾乎無可對應之聚落名，下半部則涵蓋清治時期府城上半部，及東門外的草店尾、關帝廟、虎尾寮、許厝甲、前甲、後甲等舊聚落。

Ⓛ：略呈三角形。南起河流④（德慶溪？），北抵河流②新港溪，東隔道路㉔與耕地Ⓚ為鄰。此區比例大幅失衡，無法以 GIS 套疊比對；若以四至地點來界定，則位置應約在今臺南市北區北側、永康區東北側一帶，範圍內有府城小北門、三分子、開元寺、凹仔底、六甲頂、花園、洲仔尾、鹽行等舊地名。

Ⓜ：不規則形。僅繪出一部份。經比定，約在今臺南市歸仁區武東、大潭兩里交界處一帶，範圍內含刣豬厝、大潭等舊聚落。推測此片耕地尚有往東延伸的部分，因為沒有繪入圖內，無法了解詳細狀況。

Ⓝ：不規則形。位於圖幅南端，僅繪出一部份。若自二仁溪位置比對，可能位在今高雄路竹一帶。另，過二仁溪後，理應遭遇蟯港內海；但圖中陸地海岸線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更往海邊擴展，疑與實際地景不符。

八、赤崁地區耕地發展的綜合觀察

透過圖像細節的逐一觀察，再輔以 GIS 比定位置，則可將上述比定結果與當代空間圖資整合，輸出為附圖 3 的「1644 年〈赤崁耕地圖〉歷史地圖」。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耕地圖〉屬於初期圖稿，比例不一、且繪畫示意性強，這幅歷史地圖可以呈現大致概況，卻不必然能夠反映真實無誤的歷史地景空間。

然而，古圖今譯的積極目的，本在於全面整理圖像訊息與歷史空間視覺化，使研究者得以置於空間格局，進一步觀察及思考人與空間的相關課題。因此，在附圖 3 的基礎上，有各方面〈耕地圖〉相關課題的深化討論要正式起步。本節嘗試初探〈耕地圖〉畫面所描繪的「人—地」概況及發展趨向。

（一）農耕區的後續規劃

如附圖 3 所示，〈耕地圖〉所描繪的赤崁地區農耕地，大致位於今臺南市中西、北、東、南、永康、仁德，及高雄市湖內區北端一帶。需留意的是，即使該圖是當局為了標售稻作承包權所進行的調查成果，但圖上標註的深綠色農耕地，卻也並不一定全都指稻田。從公司的赤崁附近土地開墾表可知，耕地除了稻米、甘蔗兩種作物，還有甘藷、藍靛、大麥、果樹等零星其它作物。[93] 因此，圖上這些農耕地塊應至少是指「有種植作物的農地」，而稻作是在這些農耕地上種植發展，亦是日後農耕區再擴大劃分的基礎。

赤崁地區的農耕地劃分，始於〈耕地圖〉完成的 1644 年，初劃 4 區；而如前所述，這 4 區的劃分，在屬於初期圖稿的〈耕地圖〉上是看不到的。到了 1645 年仍維持 4 區；[94] 1646 年因逢旱季取消標售一次；[95] 1647 年則擴增為 12 區，分別以荷蘭城市與歷任臺灣長官的名字為各區命名，[96] 這可能是因為長官 Caron 於 1645-1647 年間不斷要求更精確測量所致，並且也可能是稻作持續進展的結果。至少在 1650 年，農耕區又擴增到 15 區，[97] 往後就此定案。

關於這些農耕區的分佈狀況，文獻甚少著墨。翁佳音曾依據一份 1650 年耕地名稱及作物面積統計表的原件，解讀這些農耕區及其原有在地地名。[98] 透過他的解讀，我們有可能掌握各片農耕區的座落位置，並與〈耕地圖〉相互參照，了解其承襲變化。以下就這些農耕區試析之。

---

93 引自中村孝治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1997），頁 56-59。

94 《熱誌 2》，頁 479。

95 《熱誌》1646 年 10 月 13 日

96 《熱誌》1647 年 10 月 10 日

97 《熱誌 3》，頁 173-174。另，稱「至少在 1650 年」是因為《熱誌》缺少 1649 年的資料，故無法確定 15 區是否在 1649 年就已出現。

98 該幅耕地表原藏荷蘭國家檔案館 VOC 1176 fol. 792。冉福立已有揭示原影像（氏著，〈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5），翁佳音則有細緻的地名比定（氏著，〈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頁 76-78）。本小節提及翁佳音解讀皆引自此文，不再重覆標示註腳。

1. 與 1650 年耕地表的相互比定

Ⓒ：經上節比定，境內有白崙仔舊聚落。白崙仔一說為清治時期「中港岡」所在，[99] 若如此，可能是原稱 Tiokankon（翁佳音解為中港岡）的 Traudemius 農耕區。[100]

Ⓓ：位於耕地Ⓒ（中港岡）南方，崁頂山坡西側。《仁德鄉志》認為下港岡古地位於崁尾（今仁德區成功里與後壁里交界處，白崙仔南邊）；按此，崁尾西南邊的耕地Ⓓ，理當可推為「下港岡」所在。然而，筆者認為耕地Ⓔ應該更適合被比定為下港岡，詳見下段說明。如此，則本區暫無適當農耕區可對應。

Ⓔ：北抵崁頂山尾端東側一帶，隔三爺宮溪與北方中港岡耕地Ⓒ相對望。可能是原稱 Akankon（翁佳音解為下港岡）的 Putmans 農耕區。[101]

Putmans 農耕區是赤崁耕地面積甚廣者。1647 年測得的面積有 537 morgan，僅次於 581 morgan 的中港岡 Traudemius 農耕區；[102] 1648 年，其面積躍升至 816 morgan，居全耕地之首；[103] 1650 年以後，面積仍有四或六百餘，亦屬廣大。在 1654 年巴達維亞總督報告裡，Putmans 農耕區被稱為全島最肥沃之農地。[104]

以比例 1:34,500 計算，耕地Ⓔ面積接近 295 公頃≒ 303.85 甲，而耕地Ⓓ僅有 80 公頃，就面積及可擴展的腹地來看，耕地Ⓔ是比Ⓓ更接近《熱誌》記載 Putmans 農耕區的規模。再依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康熙臺灣輿圖〉，「下港崗」沒有題寫在崁頂山上，而是在山後東側，週邊圍繞屋舍田園，[105] 此亦與耕地Ⓔ位於崁頂山末端東方的狀況相符。

99 陳奮雄主纂，《仁德鄉志》（仁德：臺南縣仁德鄉公所，1994），頁 46。另，其又稱崁腳為上港岡、崁尾為下港岡。
100 Traudemius，為公司第 6 任臺灣長官 Paulus Traudenius 之名，任期 1640-1643 年。
101 Putmans，為公司第 4 任臺灣長官 Hans Putmans 之名，任期 1629-1636 年。
102 《熱誌 2》，頁 680。
103 《熱誌 3》，頁 95。
104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頁 394。
105 〈康熙臺灣輿圖〉（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檔號：AH000580。

如此推測，耕地Ⓔ可能成為下港岡 Putmans 農耕區所在。對照測量面積，其日後應該還更繼續大幅擴展，若非往西（林地⑩，仁德區三爺宮一帶）進展，則是往東方的北保仔、上崙仔、下崙仔等地進展。

Ⓕ：經上節比定，境內有大甲、二層行等聚落，可能是原稱 Leijseijkoeijen（翁佳音解為二層行）的 Delft 農耕區。[106]

Ⓖ：位於清水溪（今二仁溪）南邊，應是日後所謂「清水溪南邊、堯港附近」的農耕地。其原稱 Cattkaunia，[107] 應即茄藤仔（ka-tiānn-á），即傳承為今茄萣之名。

Ⓗ：範圍甚大，應包含多個農耕區。境內有鹽埕、瀨口、喜樹、灣裡等舊聚落，可能包含原稱 Lockauw（翁佳音解為瀨口）的 Enckhuysen[108] 及原稱 Heijsouga（翁佳音解為喜樹仔）的 Koeckebackers 農耕區。

Ⓚ：範圍甚大，應包含多個農耕區。雖然冉福立認為道路是用來規劃赤崁耕地的基準線，[109] 而〈耕地圖〉也明顯繪出道路㉔從中通過耕地Ⓛ、Ⓚ之間，然目前筆者還未尋得以道路作為農耕區界線劃分的記載。不排除此區西南角可能屬於耕地Ⓛ中樓仔 Hoorn 農耕區一部份，北部也可能屬於禾寮港 Amsterdam 農耕區一部份（此二區詳見下段所述），至於其它部分，未尋得可對應的地名。

Ⓛ：範圍甚大，應包含多個農耕區。在疑為柴頭港溪的河流③以南，可能是原稱 Tonglouw（翁佳音解為中樓仔）的 Hoorn 農耕區。[110] 1648 年議曾決議將赤崁（Saccam）市鎮一帶改稱 Hoorn，[111] 此與中樓仔一帶（今北區公園北路、北門路、開元路交會處一帶）不謀而合。推測赤崁市鎮與北鄰耕地一帶，都曾共同使用 Hoorn 之名。

106 Delft，尼德蘭市鎮名，位於海牙東鄰，東印度公司會所所在地之一，今在南荷蘭省（Zuid-Holland）境內。

107 《熱誌 4》，頁 295。

108 Enkhuizen，尼德蘭市鎮名，位於艾瑟爾湖（IJsselmeer）畔，東印度公司會所所在地之一，今在北荷蘭省（Noord-Holland）境內。

109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3。

110 Hoorn（荷恩），尼德蘭市鎮名，位於艾瑟爾湖畔，Enkhuizen 西南方、阿姆斯特丹東北方，東印度公司會所所在地之一，今在北荷蘭省（Noord-Holland）境內。

111 《熱誌 3》，頁 12。

河流③以北，可能是原稱 Orakan（翁佳音解為下寮港或蚵寮港[112]）的 Amsterdam 農耕區。[113] 按杜臻〈附紀彭湖臺灣〉載：「烏鬼橋，其港為下寮港。」[114] 可知烏鬼橋所在的蔦松溪有「下寮港」之稱；另依 1693-1704 年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地里圖〉，新港溪左岸亦標示「禾寮港」（圖 10）。[115] 此皆與 Amsterdam 農耕區北抵新港溪（蔦松溪）位置相符。

Ⓜ：此區有刣豬厝、大潭等舊聚落，即舊稱「角帶圍」一帶，可能是原稱 Kaptwahoij（翁佳音解為角帶圍）的 De Wit's 農耕區。[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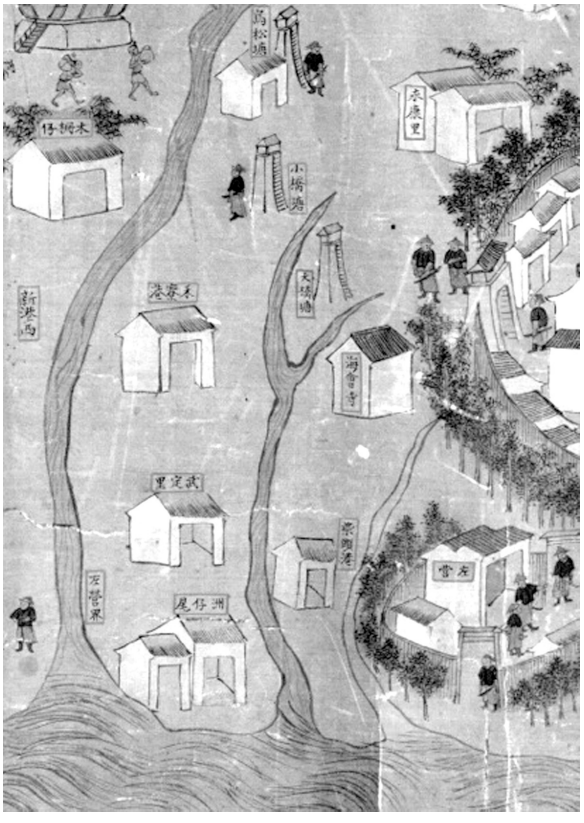


圖 10　〈臺灣地里圖〉所繪禾寮港與蔦松溪河道位置（東方為上）

112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頁 76。
113　即阿姆斯特丹，尼德蘭市鎮名，東印度公司會所所在地之一。
114　杜臻，〈附紀彭湖臺灣〉，收於氏著，《粵閩巡視紀略》。見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臺灣史料匯編》，第八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頁 41。
115　〈臺灣地里圖〉（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檔號：G7911.A3 1722.T3 Vault Shelf。
116　De Wit's 為 Gerard F. de With 之名，1625 年長官 Sonck 不慎溺斃於大員港道，其以司令官身份暫兼長官事務，任期 1625-1627 年。

2. 比定與落差

從以上 8 個農耕區的比定來看，〈耕地圖〉描繪的農耕地，很大一部份是日後擴增的基礎。但在比定過程中，有一些無法對應之處，除了是研究與考證上的問題，也關乎當時農耕地的發展狀況，簡述如下：

第一，由於未知確切位置，地名考證上也還有所疑義，一些農耕區與地名無法對應。如原地名 Siamsiamticke 的 Lemaires 農耕區，翁佳音推測為三舍甲（sam-sià-kah，其推測可能由 Samsiacka 誤寫而來）。今臺南市新化區全興里確實有三舍甲一地，接近大目降（新化），該地是否屬於赤崁耕地範圍之內，尚未可知；而若以 1:34,500 的比例套用，該地則不在〈耕地圖〉圖繪範圍內。此外，三舍甲也可能不只新化才有，在〈耕地圖〉範圍內是否曾經存在另外的三舍甲之名，亦未可知；筆者則認為該名有可能是傳沈光文〈平臺灣序〉裡提到的雙塹竹（siang-chhiàm-tek），[117] 然此地名早已佚失，不見史籍記載，更不見留存現地，線索更少。所以在〈耕地圖〉的農耕地中，或許還有可對應到 1650 年耕地表的部分，只是線索中斷，無從處理。

第二，耕地Ⓐ、Ⓑ、Ⓓ、Ⓘ、Ⓙ等 5 塊小面積的耕地，找不到可對應的耕地。它們有可能在 1644 年或者之後，就併入其他農耕區；抑或是不列入標售與收費的自由農耕區，原因可能不一而足。如耕地Ⓑ，即可能在之後成為 Traudemius 農耕區的一部份，見後文第三小節詳析。

第三，有些耕地已經開墾，但沒有在耕地表內。如耕地Ⓜ的角帶圍 De Wit's 農耕區，以及耕地Ⓗ的喜樹仔 Koeckebackers 農耕區，雖已在〈耕地圖〉中呈現開墾基礎，但 1647-1648 年間卻未見於耕地表，要到 1650 年才被列入 15 區之一。它們可能原本是併在其它農耕區內，之後才獨立劃出；[118] 或者，是其他原因使它們一開始沒有被列為測量與標售對象。若是前者，則能顯現出農耕區的擴充與發展，劃分也越來越細。

---

117 傳沈光文，〈平臺灣序〉：「觀音山，疑是落伽分派；雙塹竹，想從淇澳移來。」見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1983；1747 年原刊），頁 1426。

118 以耕地Ⓗ為例，區內有瀨口的 Enckhuysen 農耕區，依據 1674 年耕地表記載，Enckhuysen 農耕區的作物面積約 171，未耕地約 273；至 1654 年的耕地表，Enckhuysen 作物面積 95，但隔鄰新出現的喜樹仔 Koeckebackers 農耕區則為 282。這樣看起來，不得不令人推測：耕地Ⓗ全境原本皆劃為瀨口 Enckhuysen 農耕區，後來，其南部喜樹仔部分（也就是未耕地部分）獨立劃為 Koeckebackers 農耕區。（以上面積單位皆為 morgen）

第四，有些農耕地，則可能在 1644 年當時還沒形成（或者說，是尚未發展到可以讓製圖者關注的規模），是之後才出現的。例如原稱 Tampoasiam（翁佳音解為桶盤淺）的 Soncks 農耕區，以及原稱 Tongsoija（翁佳音解為中洲仔）的 Van der Burch 農耕區，這兩塊農耕區在 1647 年已經列為標售項目；但是在〈耕地圖〉上卻還是一片空白，沒有標註農耕地。

3. 在〈耕地圖〉之後的農耕區發展

將〈耕地圖〉與日後耕地表地名進行比對，除了可更加了解〈耕地圖〉的農耕區分佈狀況，也可略窺這些農耕區往後的進展。

1644 年的最初 4 區，冉福立推測可能是 1650 年耕地表中最前頭、且正好都是以尼德蘭市鎮命名的 Amsterdam、Delft、Hoorn、Enckhuysen，[119] 以此來看，則應指耕地L（可能包含K一部份）、F、H這些位居德慶溪以北、竹溪以南的大片農耕區。因此，南、北兩側地區的這些稻作，獲得公司當局最初的青睞。

1647 年，農耕區增劃為 12 區，推出標售的農耕區稻米／甘蔗耕作面積總計是 4056.5/1469.25，可見稻作的積極投入。當中，面積最大者為下港岡 Putmans 農耕區的 817，其次為中港岡 Traudemius 的 661，在〈耕地圖〉中是位於崁頂山東方的耕地C、E。至於上述最初 4 區的稻米／甘蔗耕作面積，則分別為 177/358、110/257、23/18、91/77，大致似以蔗作為主，面積擴展也相對有限。相較於此，那些東方的農耕地似有崛起之勢。[120]

1650 年，農耕區已增劃為 15 區。此年稻作面積為首者，已經換成可能位於更東方郊區、面積 719 的 Rotterdam 農耕區（Hoenjouwa，翁佳音解為香洋仔）與面積 696 的 Middelburch 農耕區（Schoesiackhou，翁佳音解為舊社口），但是 516 的下港岡 Putmans 農耕區、267 的中港岡 Traudemius，依然是緊接其後的主要稻作產地。此年新增的兩個農耕區都位於南方與東南方，角帶圍 De Wit's 農耕區該年米／糖面積為 65/36；而喜樹仔 Koeckebackers 農耕區僅有稻作，面積 156，直至 1656 年依然是專營稻作（面積擴增至 407）。[121]

---

119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5。

120 1647 年作物種植面積數字，引自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 56。單位皆為 morgen。整數以下的畸零數省略。

121 1650 年作物種植面積引自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5 之檔案原件影像（荷蘭國家檔案館 VOC 1176 fol. 792）。單位皆為 morgen。整數以下的畸零數省略。

位於喜樹仔隔溪南方的茄藤仔「清水溪以南」農耕區，要到 1648 年才列入標售之列。圖內耕地G的面積，大約是 190 公頃≒ 195.7 甲，即略與 1648 年測得的 200.5 morgen[122] 相近，顯示擴張有限。1650 年，該地米／糖面積為 116/159，加上不必收費的 52，得知耕地面積應稍有增加。到了 1656 年，此地稻作面積已經擴增至 692 morgan，[123] 大約是〈耕地圖〉耕地G的 3.5 倍；1657 年，此地即被命名為 Coyett（即揆一）農耕區，[124] 該年已記載為「清水溪對岸人口密集的地區」。[125]

從這些概況看來，1644 年以後赤崁地區的農耕地發展，仍是在〈耕地圖〉所描繪的地景發展結果之上，繼續更擴大發展。相較於北方的禾寮港 Amsterdams 農耕區始終以蔗作為主，[126] 東、南方的農耕地則大多投入稻作，且規模日益加大。

（二）空間的擴展：以鯽魚潭為例

稻田不同於旱地插蔗，而是需要充足水源。依鄰河流，以及簡易的水源或水利設施，[127] 應是當時人們想辦法引用水源以支撐稻作水田（polder）[128] 的方法之一，此即〈耕地圖〉所反映農耕地往南、北兩方河流處依鄰之趨向。由此可知，水源應是影響耕地如何分佈、甚至往後如何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

122 《熱誌 3》，頁 95。

123 引自中村孝治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 59。

124 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6。

125 《熱誌 4》，頁 159。

126 禾寮港 Amsterdams 農耕區歷年米／糖面積：1647 年 177/358；1650 年 83/403；1654 年 25/300；1655 年 33/321；1656 年 46/286，可見一直都以蔗作為主。引自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 56-59；冉福立，〈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5。單位皆為 morgen。整數以下的畸零數省略。

127 這些設施，有鑿井者，如《重修臺灣縣志》載：「馬兵營井，在寧南坊，泉淡而甘，甲於諸井，紅毛時，鑿以灌園者。」（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1983；1752 原刊〕，頁 1236），雖稱「灌園」，但仍應指小園圃，而非大範圍灌溉。亦有建埤者，如《熱誌》1656 年載清水溪（Verssche Reviere，即今二仁溪）「以前建造了水壩〔土埤〕」（見《熱誌 4》，頁 60），可知二仁溪畔在〈耕地圖〉繪製前，已建有水埤設施。1720 年《臺灣縣志．建置志》亦載：「參若陂，在文賢里二圖。紅毛時，王參若築以灌田，故名。」文賢里二圖為今高雄市湖內區西側（陳文達等編纂，《臺灣縣志》〔臺北：成文，1983；1720 序刊〕，頁 329。文賢里二圖位置可見卷首輿圖，頁 76-77）。這兩筆紀錄都在今二仁溪旁，不確定是否同一對象；至於參若陂，也可能與鄰近的耕地G有所關聯。

128 荷蘭人將赤崁地區的農耕地皆稱為 polder。依冉福立所述，該詞在荷蘭是指有水溝、運河和風車來控制水位的低窪耕地（氏著，〈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頁 73）。

相較於依鄰河流的南、北兩端，東部的耕地則沒那麼密集。然而，〈耕地圖〉描繪了幾條從普羅民西亞市鎮通往東部的道路，它們抵達崁頂山，有些還越過山後，並已形成數片耕地。這說明赤崁地區「東—西」向的人群動線與區域發展，應不會比南北向貧乏，甚至可能更熱絡。如上節所述，日後主要稻作生產地即興起於東部。

東部因山勢東阻，缺乏河流經過，加上地質本多沙埔，崁頂山以西多為乏水灌溉的沙埔平野；[129] 而越過崁頂山後，也少有河流通過。但這對東部耕地的擴張來說，應該不是什麼太大問題，因為除了東南方有二仁溪上游支流外，廣大的鯽魚潭也扮演了水產與水源供應的重點角色。

1. 潭邊大宅與耕地，及南方林地

1625 年公司取得赤崁地區土地不久，當局就對鯽魚潭豐富魚產有深刻印象。[130]〈耕地圖〉則說明 1644 年以前該地已開始墾耕，在水潭東南方、今仁德區土庫與太子廟一帶，繪有長方形耕地Ⓐ，東側有大片聚落；水潭西南側亦有長方形耕地Ⓑ，甚至還座落一幢圍牆大宅院，即屋舍⑬。

該宅院的由來，在〈耕地圖〉前一年（1643）的《熱誌》可以發現一段類似記載。該年 3 月 12 日，當局派上席商務員 Cornelis Caesar、Adriaen van der Burch、中尉 Boon 等人視察華人肆意砍伐林木的情況。據其回報，有一座林地 Willem Ebbens Bosch（威廉的森林）開始被大量砍伐，華人更在靠近該座森林的地方，建造有院子環繞的房屋，持續開墾農地。[131] 這段描述十分類似〈耕地圖〉的描繪，也就是說，屋舍⑬可能是 Caesar 等人所謂華人建造「有院子環繞的房屋」，而「持續開墾的農地」則可能指南邊的耕地Ⓑ。由此來看，一方面可理解屋舍⑬、或者〈耕地圖〉所使用的紅色屋舍圖案，可能代表當地社群頭人的居宅，或是如第三節所述，為兼有公館性質的地方；另一方面，耕地Ⓑ南邊的林地⑨，則可能是當時正被大量砍伐的「威廉的森林」。

129 許淑娟、李明賢、鄭全玄、孔慶麗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294。

130 當時可見記載：「這上述地方（按：指赤崁地區）的周邊附近，還有一個相當大的內陸水域，那裡面有很多魚。」此應指鯽魚潭。參見〈宋克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5 年 2 月 19 日，於大員商館〉，《書信集 I》，頁 192。

131 《熱誌 2》，頁 55。

華人砍伐林地的問題，早在 1631 年就已讓當局甚為關注。該年公司決議，要規劃一處特定伐木區讓華人伐取木材，其他林地則加以保護、禁止砍伐，否則罰款。[132] 不過公告似乎未達效果，1643 年威廉森林被大量砍伐，還有一座 Lange Bos（長的森林）已完全弭平，闢成農地。[133] 這促使當局一個月後再度前往威廉森林、海牙人森林等處訂立界樁、發佈告示，禁止華人砍伐。[134]

砍樹主要是獲取薪材；但從上述記載來看，砍伐後空出的土地，皆被農耕地取代。從〈耕地圖〉來看，耕地B位在崁頂山腳、鯽魚潭邊的狹長地帶，腹地並不寬廣，但整齊的長條方形格局，代表了它是計畫性的闢耕。那裡除了可直接取用鯽魚潭水源，也隨著林地⑨的砍伐行動，順勢往南推展耕地範圍。

2. 上港岡的出現

另外，從南邊的中港岡耕地C看起。用 1:34,500 的比例計算，耕地C的面積約 23.5 公頃≒ 23.69 甲。1654 年，中港岡 Traudemius 農耕區發賧面積為 185 morgan，[135] 1655 年更擴增到 313 morgan，[136] 已是耕地C的 10 餘倍，顯示當時中港岡耕地範圍，較〈耕地圖〉畫面更為擴張。它的擴張方向，如果不是往西拓展，則可能是往北邊林地⑨拓展、甚至結合耕地A、B等鯽魚潭畔一帶空間。因此，林地⑨所面臨的砍伐壓力，可能不只來自北邊的耕地B，還有南邊的耕地C。

而依前節比定，林地⑨境內有舊聚落「崁腳」，其一說為「上港崗」古地，[137] 因此 1644 年的上港岡，可能仍是林地⑨的林木滋生之景。但到了 1660 年代清朝官員依鄭軍降將情報繪製的〈臺灣略圖〉裡，已有「上港公民社」之記載，[138] 顯見至少在當時，上港岡已成為一處顯著聚落。再到 17 世紀晚期〈康熙臺灣輿圖〉裡，「上港崗」之名仍存，而鯽魚潭南邊與崁頂山交界處（也就是靠近〈耕地圖〉森林⑨）亦註記「坎頂」之名，附記「至長興里捌里」，顯示該地已是道路往來重要據點，

132 《熱誌 1》，頁 54。
133 《熱誌 2》，頁 55。關於「長森林」的線索過少，筆者還無法判斷位址所在。
134 《熱誌 2》，頁 71-72。
135 《熱誌 3》，頁 420。
136 《熱誌 3》，頁 576。
137 陳奮雄主纂，《仁德鄉志》，頁 46。
138 〈臺灣略圖（漢文版）〉，檔號：平圖 021444。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該道路已可通往原本耕地Ⓐ（長興里）的位置；至於附近空間圖像，皆描繪為田園與民居之景（圖 11）。[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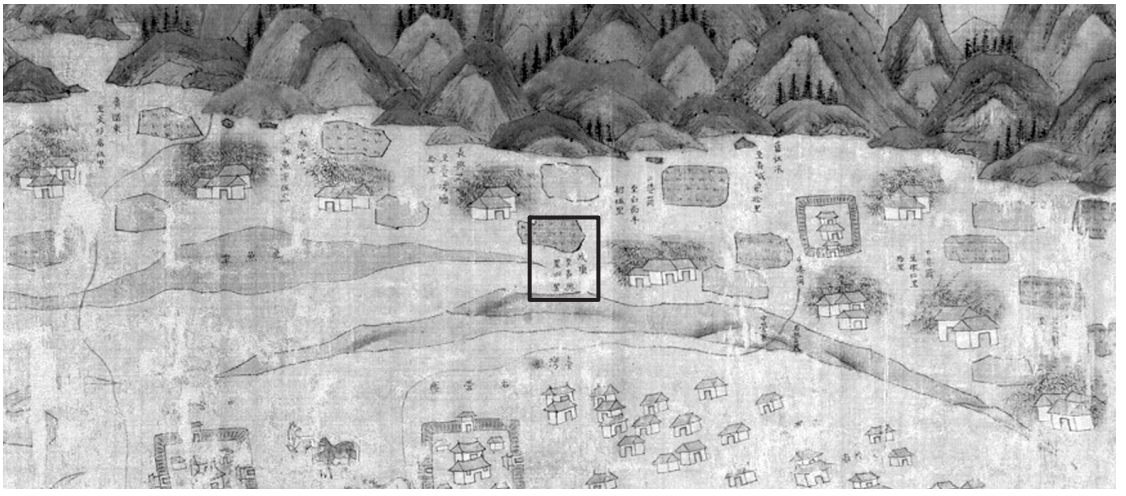


圖 11　17 世紀晚期〈康熙臺灣輿圖〉鯽魚潭至崁頂山一帶田園民居
（東方為上，方框處為崁頂與上港崗）

從這些圖像與文獻來看，〈耕地圖〉繪製當時，上港岡可能還沒出現。隨著林地⑨的消失以及週邊耕地拓展，上港岡於林地⑨故址、即崁腳附近形成，成為顯著聚落，並有道路可往東前進，盛況至少維持到 17 世紀晚期。

至於鯽魚潭東邊的土庫一帶，耕地空間可能也持續拓展，並觸及北邊大灣、東邊大人廟等地的連帶發展，即為〈臺灣略圖〉所載的「鯽魚潭民社」及長興、保大等里的發展，以及 18 世紀初《臺灣縣志》所稱：靠鯽魚潭「三里之田，藉以灌溉」的地區之一。[140]

至於此後林地⑨威廉森林的狀況，因文獻未載，難以了解。但照以上推想，其範圍可能持續縮減，隨著耕地同時擴張，最後盡化為田園居所矣。

139　〈康熙臺灣輿圖〉，檔號：AH000580。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140　陳文達等編纂，《臺灣縣志》，頁 330。

3. 赤崁地區墾耕拓展的觀察面向

1645 年，華人任意擴增耕地的現象，已經引發公司當局嚴正關切，因而使他們決定發佈公告：未獲當局許可，禁止任意開墾土地。[141] 雖然不確定當局針對的是鯽魚潭附近地區、或者是其他地方，總之，這似乎反映出〈耕地圖〉繪製前後的 1640 年代初期，赤崁地區正逢一段私墾潮流的小高峰。究其緣故，也許是如公司當局預期的：中國因為戰亂導致米價高漲，[142] 再加上難民流寓臺灣者益多，[143] 皆加快了赤崁地區的墾耕步調。在此發展下，1625 年還只是赤崁地區「周邊附近」的東方鯽魚潭週邊空間，1644 年已經走入〈赤崁耕地圖〉內，該處數個密集單棟屋舍圖案、以及有庭院環繞的大宅等全圖僅見的特殊畫法，反映了當時崁頂山東側至鯽魚潭一帶的墾耕成果，以及繪圖者與當局目光的特別投注。

因此，崁頂山東方與鯽魚潭週邊地區的發展，可提供我們觀察赤崁地區農耕地如何擴張的一個觀察面向。正如南、北兩方農耕地對河流水源之依鄰，鯽魚潭的水源，也支撐了東部地區稻作經營與墾拓熱潮，空間地景因此改變，人群與社會也隨之陸續成形。日後，這股擴張更可能繼續推進到更東邊的大人廟、歸仁等地，即鄭氏時期所稱長興、保大、仁德、歸仁以至新豐等地區。這個「東—西」空間互動模式，日後繼續維持與延續，[144] 其形成即可溯至此時空間與社會互動關係之雛形。

九、結語：一個殖民式墾耕空間的形成

遺留至今的一部分地方社會記憶與歷史敘說，經常將先人至臺南地區墾拓的故事，只追溯到鄭軍渡臺及永曆紀年的時代；不過，東印度公司遺存的各式文獻裡，

141 《熱誌 2》，頁 436。

142 如 1643 年 6 月，荷蘭人向華商抱怨貨物價格過高，華商回應：因為戰爭導致米價昂貴，許多中國農民皆放棄原本養蠶的田地，改種稻米，致使蠶絲產量大幅下降。《熱誌 2》，頁 146。

143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 62。

144 如 18 世紀，在〈耕地圖〉道路㉖原本止於屋舍⑬與潭邊的位置，有城內士紳侯世光出面倡建鯽魚潭橋，使該道路越過潭面，直通土庫、太子廟地區。1788 年知府蔣元樞與士紳鄭其嘏，以及 1795 年士紳郭士傑等人，也接續維護此橋。19 世紀，長興、保西、保東等里的地方頭人，也透過太子廟明直宮徵用過橋油香費，橋樑毀損，則由明直宮負責維修。由此來看，日後的東方地區，與原本的普羅民西亞市鎮、清治時期的府治城牆都市，依然維持密切聯繫。

此前大量華人於臺南地區的活動及往來，已然歷歷在目，因而受到篩選、排除或遺忘的地方史段落，得以據此略加補白。然而，符號化的文字，在對於空間與地景畫面的傳達上，有程度不等的侷限之處，視覺性的圖像史料則能加以互補。〈赤崁耕地圖〉即超越文字的言說與表達限度，將空間細節樣貌具體表現出來。

職是之故，本文透過〈耕地圖〉的觀察、比定及考索，再次確認其性質內涵與生成脈絡，亦借助圖像史料的優勢，盼能具體理解 17 世紀中期臺南地區空間地景及其發展狀況。綜合各項比定與討論，本文以三項小結歸納。

第一，在地圖性質與內涵方面，本文認為，與現存數量相對較多、主要著墨在航海針路訊息及各地海岸線、港灣形勢的海圖（chart）相比，耕地圖這類陸地圖資及其土地調查測量活動，可說才是支撐殖民當局陸地經營策略與在地事業管理的重要圖類及文獻生產事業，故其版本與數量，理應相當浩繁；惟目前僅見一幅〈耕地圖〉存世。該圖是 1644 年公司當局為對赤崁地區稻米收取什一稅，委派製圖者協同華商所進行的先行調查成果之一。在版本上，〈耕地圖〉應非定稿，而是初期圖稿，所以有未達相對精準性、部份地區比例失衡、濃厚繪畫示意性、甚至缺乏文字註記等現象。而其版本特性也說明，〈耕地圖〉不只是單純描繪 1644 年的畫面，而更切重反映赤崁地區在 1630 年代開始發展商品化農業、特別是下半期開始發展稻作，由原本的林野地景漸變為市鎮與耕地的地景空間發展結果。

第二，在地圖內容與畫面方面，本文逐一整理〈耕地圖〉自然、人造、耕地等類地景，重新閱讀圖像訊息、檢視先行研究舊說疑義，同時以 GIS 系統輔助比定位置，最後製成附圖 3「1644 年〈赤崁耕地圖〉歷史地圖」，具體呈現其歷史空間概況。從圖中可知，當時的農耕地主要集中在南、北兩方河流處，一部份的水田稻作應即受惠於那些河流，並有鑿井或小型水埤等簡易水利設施的營建。至於崁頂山後的東方大灣低地一帶，雖未倚鄰河流，卻也不影響耕地擴展潮，因為在該處支撐水源的主角不是河流，而是鯽魚潭，所以雖未有大型耕地，亦早有擴展態勢。以該潭為起點，大灣低地一帶的墾荒活動就此展開，潭邊土地、消失的林地、陸化的潭域，皆轉成耕地，不到 20 餘年即已形成鯽魚潭、上港岡等主要的「民社」，並延續至 17 世紀晚期以後長興、保大、仁德、歸仁以至新豐等地區的發展，並始終與府城地區維持密切聯繫。

第三，在地圖的空間圖景及其意義方面，本文認為〈耕地圖〉反映的赤崁地區，已形成一個具體的空間格局。當中，華人頭人的屋舍（或公館）與道路，以及商品市場取向的農耕地，皆座落其間，它們依地理形勢、尤其是對水源的依鄰，以普羅民西亞市鎮為中心，於四方週邊分佈擴展開來，大致形成「中心—中介點—生產作業地」的殖民式墾耕空間。1647 年以後農耕地的規劃與擴張，甚至普羅民西亞市鎮（或日後承天府治、郡治府城）逐漸城市化及更中心化的過程，諸此人群活動、地方社會與城鄉互動面向，也皆在此架構下持續發展。這個空間的形成，不只基於公司當局陸地經營方針下的政治、經濟關係，還有不同人群互動的社會關係，誠如歐陽泰（Tonio Andrade）提醒，公司對臺經營及華人移墾地之成形，植基在公司與華人彼此的仰賴與共構。[145]

本文主要專注在〈耕地圖〉此一單幅地圖之研究，然不管是地圖史的取徑，或者是〈耕地圖〉所反映的空間與社會方面，皆有更多課題尚待後續深化處理。例如，在橫向的空間軸上，本文強調陸地圖資作為殖民當局管理在地事業之地位，但除了描繪臺南地區的〈耕地圖〉外，其他地方是否也有這般繪製陸地或者耕地之圖資，又反映出製圖者或當局什麼樣的方針或態度？此應可進行比較研究，以繼續確認殖民陸地地圖之性質內涵。另外，在縱向的時間軸上，本文嘗試觸及「連續性」課題，[146] 認為此般「殖民式墾耕空間」有其延續及形塑往後空間的面向，而事實上，其耕地、人群社會，究竟與往後被鄭氏要員收為官田或軍事性屯田、及清治時期請墾制度下的土地管理利用，有什麼樣的承襲、轉化或者變遷？這又與往後的地方社會對 17 世紀歷史的敘說或記憶方式，有什麼的關聯或影響？這樣的思索，或許能嘗試解答 17 世紀初期在臺南地區活動的這麼多人們後來怎麼了、到哪裡去了的問題。受限篇幅與主題，此類課題本文暫不予處理，但值得日後繼續探討。

145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 240。

146 臺南地區早期人群與社會發展的「連續性」視野，已由翁佳音提出闡述，見氏著，《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頁 223-224。

引用書目

一、地圖史料

〈1644 年 6 月 12 日金邊海戰圖（*Afbeelding van de Zeeslag voor Panumping (op de Rivier van Cambodia) gehouden den 12den juni, op Sondach, van den dageraedt tot savonts ten 5 uren, in 't jaar 1644*）〉，檔號：4.VEL 268。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1652 年福爾摩沙大員水道完整全圖（*Een perfect caertjen van 't Tayouanse canael, Formosa 1652*）〉，檔號：4.VELH 141A。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大員圖（*Caerte van Teyouan*）〉，檔號：4.VELH 140。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艾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描述圖（*Descripcion del Pverto de los Olandeses en Ysla Hermosa*）〉，收於 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ía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1930), pp. 416-17.

〈赤崁耕地圖（*Caerte van de besayde velden aen Saccam*）〉，檔號：4.VEL 1126。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康熙臺灣輿圖〉，檔號：AH000580。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福爾摩沙與澎湖海岸圖（*Kaart van de kusten van Formosa en de Pescadores*）〉，檔號：4.VELH 619.52。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臺灣地里圖〉，檔號：G7911.A3 1722.T3 Vault Shelf。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臺灣略圖（漢文版）〉，檔號：平圖 021444。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魍港形勢圖（*Caerte van Wancans gelegentheyt*）〉，檔號：4.VEL 1125。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二、其他史料

Blussé, J. L., Milde, W. E., Ts'ao Yung-ho, and Everts, N. C. (Uitg.)

1995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I: 1648-1655.*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六十七、范咸纂輯

1983(1747) 《重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

王必昌總輯

1983(1752) 《重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

江樹生譯註

2000 《熱蘭遮城日誌（一）》。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2 《熱蘭遮城日誌（二）》。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3 《熱蘭遮城日誌（三）》。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3 〈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漢聲雜誌》132。

2010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1622-162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5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V（1629-1636）[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陳文達、林中桂、李欽文、張士箱編纂

1983(1720) 《臺灣縣志》。臺北：成文。

程紹剛譯註
2000 《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

杜臻
2004 《粵閩巡視紀略》。收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臺灣史料匯編》，第八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三、近人編、著述

Cheng, Wei-chung 鄭維中
2017 "Emergence of Deerskin Exports from Taiwan under VOC (1624-1642)."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aipei) 24 (3): 1-48.

Gommans, Jos, and Diessen, Rob van (eds.)
2010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el VII: Oost-Azië, Birma tot Japan.* Voorburg, Netherlands: Atlas Maior.

中村孝治著；吳密察、翁佳音編
1997 《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

冉福立（Kees Zandvliet）
1997 〈荷蘭人畫的臺灣老地圖：建造殖民地的藍圖〉，《漢聲雜誌》106，下冊論述篇。

范勝雄
1998 〈「1644 赤崁耕地圖」試讀〉，《臺灣史料研究》11: 128-139。

翁佳音
2006 〈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收於李明珠主編，《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頁 69-85。
2008 《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

高賢治、黃光瀛總編輯
2012 《綜覽臺江：大員四百年地輿圖增訂初版》。臺南：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曹永和
1979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

陳宗仁
2010 〈1626 年的大員港灣：一位澳門華人 Salvador Díaz 的觀察與描繪〉，收入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新營：臺南縣政府，頁 1-31。

許淑娟、李明賢、鄭全玄、孔慶麗撰述
1999 《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一．臺南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奮雄主纂
1994 《仁德鄉志》。仁德：臺南縣仁德鄉公所。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
2007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

賴進貴、黃清琦、葉高華
2005 〈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 1878 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地理學報》42: 47-68。

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
2002 《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

附表 1　〈赤崁耕地圖〉自然與人造地景類圖案比定結果

代號	類型	比定可能的今址	境內或鄰近 舊地名、舊聚落名	備註
1	湖泊	臺南市永康區網寮、西灣、崑山、建國、南灣；仁德區太子、仁德、一甲等里一帶	鯽魚潭	
2	河流	鹽水溪	新港溪	
3	河流	柴頭港溪？	綠谷、石頭坑	比例失衡不定，暫定
4	河流	德慶溪？	坑仔底	比例失衡不定，暫定
5	河流	竹溪	溪仔墘溪	
6	河流	二仁溪，末段為五帝廟溪	二層行溪、清水溪	
7	林地	臺南市南區大林一帶	大林	即「海牙人森林」
8	草地	臺南市中西區新光三越臺南新天地至南區新興國小一帶	土墜埕、下林	
9	林地	臺南市仁德區國道一道臺南交流道至文華路一帶	崁腳	可能是「威廉的森林」
10	林地	臺南市仁德區田厝、三甲等里交界處一帶	龜仔廍、紅花園、三甲、三爺宮	
11	山丘	臺南市東區東緣，及永康、仁德兩區西緣等地	崁頂山	
12	屋舍	臺南市仁德區土庫一帶	土庫、太子廟	有 7 個屋舍圖案集結一處，為該圖僅見
13	屋舍	臺南市東區裕永一街欣南瓦斯廠址一帶		有圍牆與院落，為該圖僅見
14	屋舍	臺南市仁德區奇美博物館一帶		
15	屋舍	臺南市仁德區大甲里	大甲	
16	屋舍	臺南市南區明亮里一帶	鹽埕之東北角	
17	屋舍	臺南市東區路東里、大德里一帶		
18	屋舍	臺南市東區德光里德光女中一帶		
19	屋舍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與林森路一段交會口一帶		
20	屋舍	臺南市東區長榮女中、勝利國小一帶		
21	屋舍	臺南市中西區赤崁樓一帶		

22	屋舍	可能在今臺南市北區開元寺北方一帶		因比例失衡不定，難以研判
23	屋舍	應不脫今臺南市永康區西北側境內，位置難考		因比例失衡不定，難以研判
24	道路	接近今臺南市北區公園路（臺 20 線），通過永康區安康、大橋、東橋等里，以及永康區中正北路（臺 1 線）等道路或地區	路線經過開元寺、大橋、小橋、蔦松、車行、新港等舊聚落	
25	道路	接近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東區東門路。起至中西區永福路與民權路交會口，終至東區、仁德區交界一帶	路線經過清治時期府城大街、大東門、虎尾寮南方等舊聚落	
26	道路	接近臺南市東區裕農路	可能在府城大東門附近與道路㉕分出，路線經過草店尾、關帝廳、前甲、後甲等舊聚落	
27	道路	約今臺南市大東門往南延伸到東區路東里、大德里一帶。現為市區街廓，無法尋得接近的道路		
28	道路	約經過今臺南市大東門、德光女中、崇學國小、仁和路西南側等地帶。因現為市區街廓，無法尋得接近的道路	路線經過竹篙厝，最後抵崁尾仔一帶	
29	道路	可能在今德光女中一帶與道路㉘分岔，接著往南延伸，大約經過臺南市東區文化中心、糖業研究所、仁德區二空新村、虎山農場、保安里一帶	路線經過大路東、牛稠仔、十三甲、三爺宮、車路墘等舊聚落	
30	道路	約經過今臺南市南區鹽埕、臺南機場側、仁德區大甲里一帶	路線經過莊雅橋、馬兵營、土墼埕、下林仔、田寮仔、鹽埕、曾振暘墓旁、藩府二鄭公子墓旁、鞍仔、山仔頭等舊地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屋舍、道路兩項，甚難比定出精確的絕對位置，其比定結果僅供大致參考。

附表 2　〈赤崁耕地圖〉耕地類圖案比定結果

代號	形狀	比定可能的今址	範圍內的舊聚落名	面積（甲）	可能對應 1650 年以後的農耕地	備註
A	長方形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里、太子里一帶	土庫、大宅、六甲仔	39.14		
B	長方形	臺南市東區裕信路與裕義路之間一帶	南鄰有王牛稠	23.69		
C	不規則形	臺南市仁德區白崙仔一帶	白崙仔	67.98	Traudemius 農耕區，又稱 Tiokankon（中港岡）	
D	六角形	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國小、虎山農場一帶	北鄰南勢園、牛稠仔	82.4		
E	不規則長條形，西邊相當筆直	臺南市仁德區後壁、田厝、上崙、三甲、保安等里一帶	洋仔下、那拔林、田厝、鳥松腳、凹仔、龜仔廍、三甲、坑仔墘、港墘	303.85	Putmans 農耕區，又稱 Akankon（下港岡）	
F	接近梯形	臺南市仁德區大甲里、二行里一帶	山仔頭、大甲、土庫、港崎頭、二層行	362.56	Delft 農耕區，又稱 Leijseijkoeijen（二層行）	
G	不規則形，略呈半圓	高雄市湖內區葉厝里、公館里、海埔里一帶	葉厝甲、太爺、公館、廍邊	195.7	Coyett 農耕區，又稱 Cattkaunia（茄藤仔）	
H	不規則形，東邊因鄰路而筆直	臺南市南區竹溪以南、二仁溪以北，東至臺南機場西側、西至明興路一帶	鹽埕、瀨口、堀仔、喜樹、灣裡、草埔	1090.77	Enckhuysen 農耕區，又稱Lockauw（瀨口） Koeckebackers 農耕區，又稱 Heijsouga（喜樹仔）	

I	方形	臺南市南區鹽埕路、利南街交會口至日新國小一帶	鹽埕北端	29.87		
J	不規則形	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至臺南市立棒球場一帶	清治時期府城小南門、法華寺、五妃廟	25.75		
K	不規則形，東北邊呈直線	臺南市中西區、南區、東區，及永康區西南角大約東橋里至復興里一帶	清治時期府城上半部，東門外之草店尾、關帝廟、虎尾寮、許厝甲、前甲、後甲	1305.01	可能包含 Hoorn 農耕區（中樓仔）、Amsterdam 農耕區（下寮港或禾寮港）一部份	比例大幅失衡
L	略呈三角形	臺南市北區北側、永康區東北側一帶	府城小北門、三分子、開元寺、凹仔底、六甲頂、花園、洲仔尾、鹽行	601.52	Hoorn 農耕區，又稱 Tonglouw（中樓仔） Amsterdam 農耕區，又稱 Orakan（下寮港或禾寮港）	比例大幅失衡
M	不規則形	臺南市歸仁區武東、大潭兩里交界處一帶	刣豬厝、大潭	79.31	De Wit's 農耕區，又稱 Kaptwahoij（角帶圍）	僅繪一角
N	不規則形	高雄市路竹區路竹	半路竹	201.88		僅繪一角
估算面積合計值				4409.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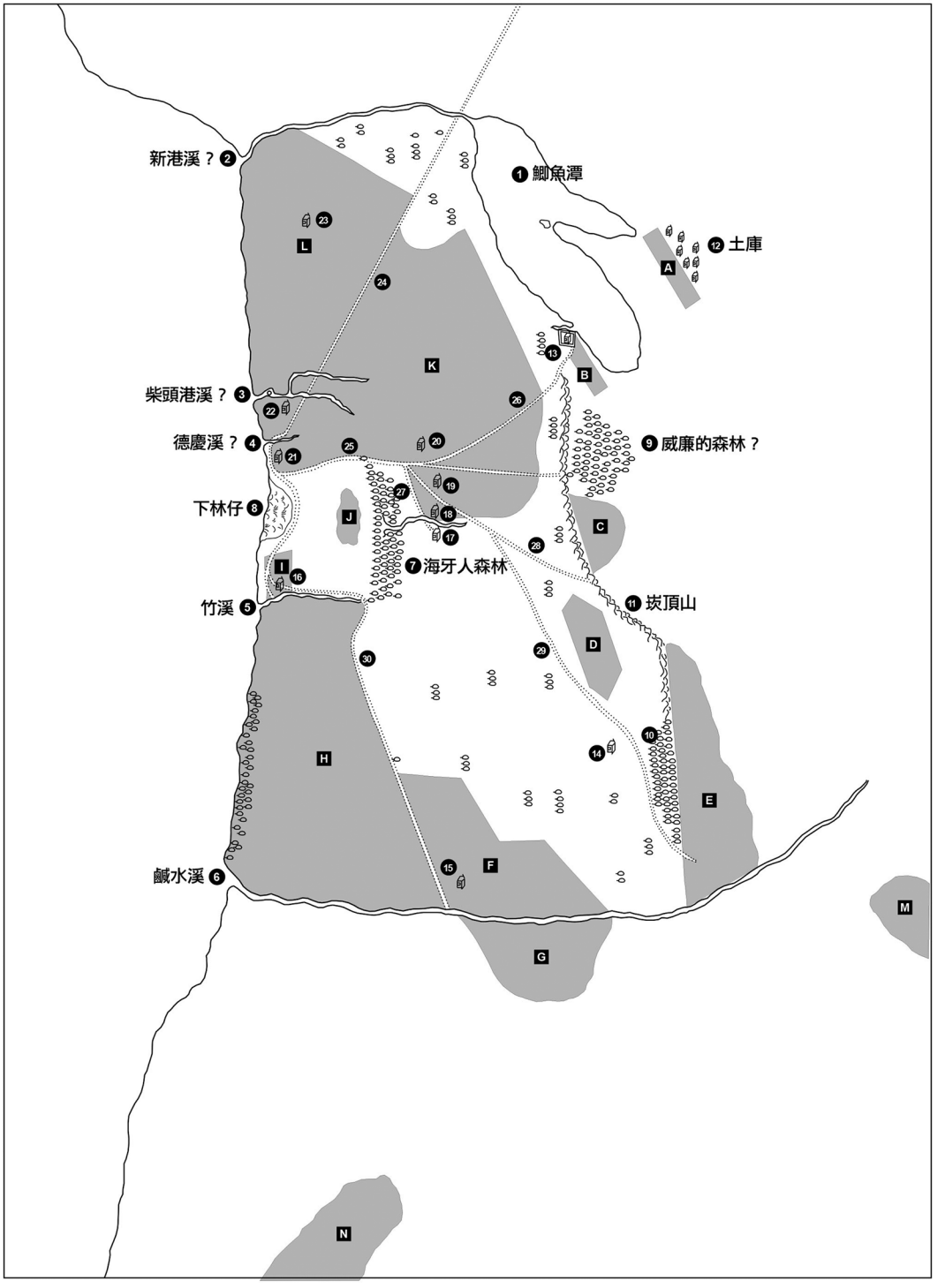
註：面積數字以比例 1:34,500 套疊，並經比定考證及微調，於 GIS 計算而得，不代表絕對精確數字。

附圖 1　〈赤崁耕地圖〉原件影像（約東北方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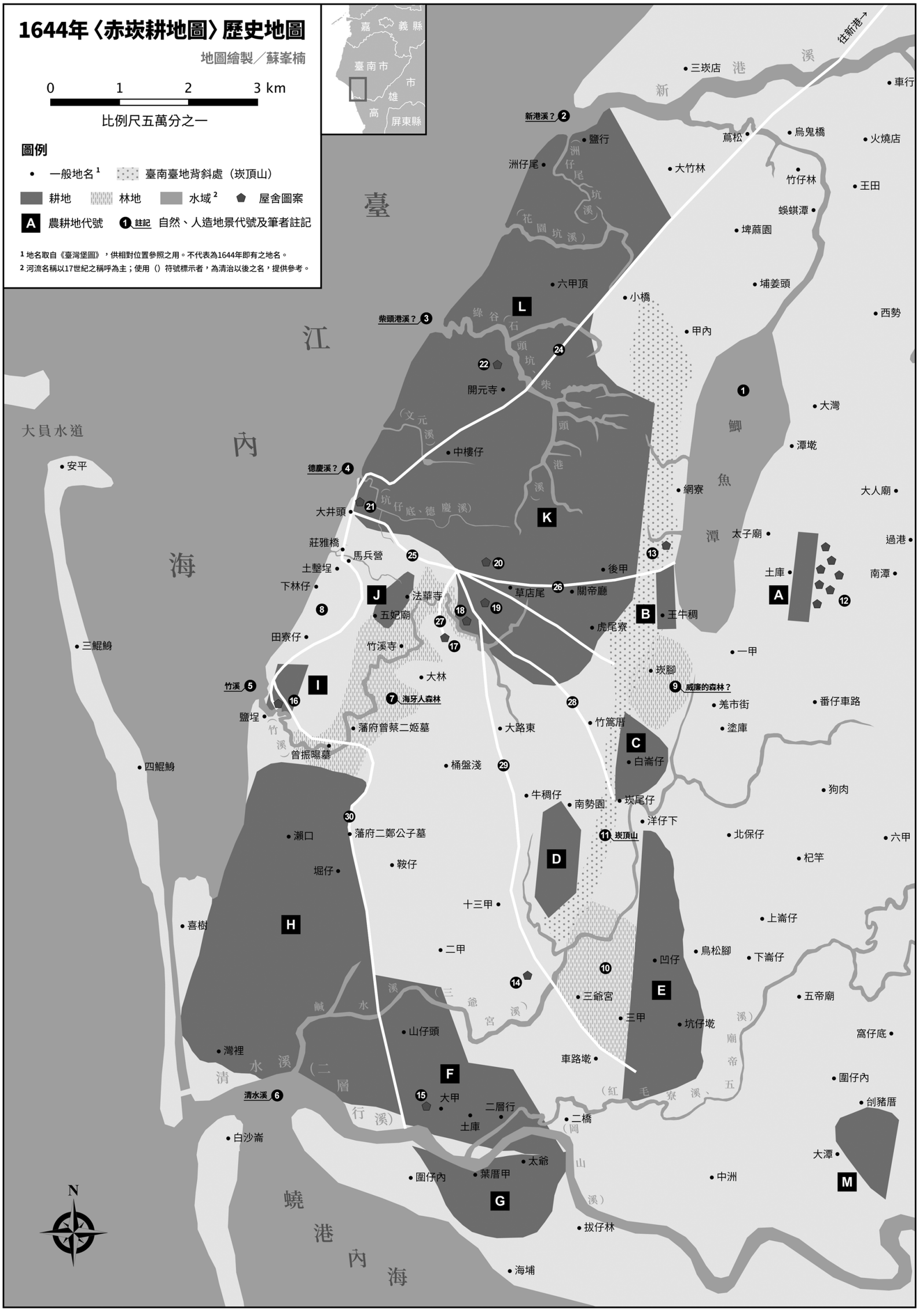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赤崁耕地圖（*Caerte van de besayde velden aen Saccam*）〉，檔號：4.VEL 1126。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附圖 2　〈赤崁耕地圖〉圖像線描與代號（約東北方為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附圖 3　1644 年〈赤崁耕地圖〉歷史地圖



資料來源

一、耕地、道路、屋舍圖案

1.〈赤崁耕地圖（*Caerte van de besayde velden aen Saccam*）〉，1644 年，檔號：4.VEL 1126。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二、河道

1.〈輿圖〉，陳文達、林中桂、李欽文、張士箱編纂，《臺灣縣志》，1720 年。

2.〈康熙臺灣輿圖〉，約 1699-1704 年，檔號：AH000580。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3.〈臺灣地里圖〉，約 1691-1704 年，檔號：G7911.A3 1722.T3 Vault Shelf。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4.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1898-1904 年。

三、海岸線與部分河道

1.〈1652 年福爾摩沙大員水道完整全圖（*Een perfect caertjen van 't Tayouanse canael, Formosa 1652*）〉，檔號：4.VELH 141A。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2.〈大員圖（*Caerte van Teyouan*）〉，檔號：4.VELH 140。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3. 臺灣總督府製圖部，〈臺南府附近迅速測圖〉，1895 年。臺北：南天書局藏。

4.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1898-1904 年。

四、一般地名

1.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臺灣堡圖》，1898-1904 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及周遭地區的漢語地名*

康培德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一、前言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紀錄、使用的地名，依照語言區分可約略分為歐語系、南島語系，以及漢語系；當中，南島語系、漢語語系的地名分別與台灣南島語族、福建等地移入人口的活動範圍有關。漢語系地名除了用於福建唐人為主的經濟活動領域，如賸港、墾地外，亦有用於出賸的南島語族村社。荷蘭東印度公司文獻記錄中的漢語地名，往往代表當時福建唐人的活動範圍，或是福建唐人熟悉的地區。至於同一地點若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文獻記錄中有不同語系的地名，則代表荷蘭東印度公司地理認知的建立過程。

本文藉由整理、討論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活動時，相關文獻資料紀錄下南瀛地區的漢語系地名，嘗試勾勒出當時福建唐人在南瀛地區活動的地理範圍。

* 本文改寫自原發表於 2017 年 10 月 20 － 21 日，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國立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第五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政治經濟文化核心的建立—早期南瀛（10-18 世紀）」之論文，〈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地區的漢語地名〉。本文的完成，須感謝評論人查忻教授，研討會與會學者的評論，會後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以及白偉權博士（Dr. Pek Wee Chuen）的地圖繪製；作者在此一併銘謝之。文中的漏失、誤引等，則為作者的責任。

二、文獻中的漢語語系地名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文獻紀錄下的台灣各地地名，除了明顯可辨是源自歐語系的地名外，早年的研究討論一般多視為是源自南島語系。並以此為前提，將一些冠以漢字，但可在東印度公司文獻資料中找到對應拼寫的地名，視為係源自南島語系；如蕭壠（Soulangh / Soelangh / Zoulangh）、台灣（大員）（Tayouan / Tajouan / Tayovan）、打狗（打鼓）（Tanckoya / Tankoeya / Tankoya）等。前者為南島語族的部落名稱，認定名從主人的理念下，因而推斷係源自南島語系；後二者則在類似的邏輯下，認為歷史上曾有過稱之為台窩灣（Tayovan）與打狗的南島語族部落或人群，因而延伸出這二個地名。

不過，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已逐漸修正此一看法，將一些先前認定是南島語系的地名案例改視為源自漢語系。以前述的三個地名為例，針對非南島語族部落的台灣（大員）、打狗（打鼓仔）這二個地名，除了質疑讀音相近的南島語族部落是否曾存在外，另一關鍵論證方式，即在東亞其他漢語系通行區或東南亞唐人足跡曾蒞臨之處，尋找是否有相同或類似讀音的漢語系地名。至於本身是南島語族部落名的蕭壠，除了前述在漢語系通行區尋找類似的漢語系地名外，關鍵證據則在荷蘭文獻中是否直接提及該部落的別稱。透過文獻中一地二名的紀錄，進一步分辨出南島語的自稱與漢語的他稱。像是蕭壠又記載為 Toeanimich，蕭壠（Soulangh / Soelangh / Zoulangh）乃視為源自漢語系的他稱，Toeanimich 則是南島語的自稱。[1] 進一步針對桃園一帶南島語族部落「南崁」的討論，指出荷蘭文獻中的 Parricoutsie 和 Lamcam（即「南崁」），指涉的區域雖重疊，但內涵不同。語源為南島語的 Parricoutsie，指的是特定南島語族部落。語源為漢語系的 Lamcam，唐人除了用於指稱範圍遠大於該部落的地名，也用來稱呼包含該部落的發朦單位名稱。這兩個地名在荷蘭時代並未混用，之後隨著漢語系在當地逐漸取得優勢，才由「南崁」取代一切。[2] 至於針對彰化一帶的討論，除了類似前述一地二名案例中，

1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收入《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頁 70-85。

2 簡宏逸，〈從 Lamcam 到南崁：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臺灣史研究》19 卷 1 期（2012），頁 6-10。

指出代表源自漢語系的 Taytoet（大突）、Gilim（二林），分別對應源自南島語系的 Torchia / Torchara、Tackay / Tackais 外；並整理出屬於唐人稱法的 Gilim，多用於唐人主宰的部落或跨部落地區經貿活動稱謂。部落自稱的 Tackay / Tackais，多用於以南島語族為對象的東印度公司教會宣教、行政治理等規範體系；當用於指行政區時，Tackay / Tackais 含蓋範圍遠大於二林社本身，成了由數個部落組成的行政區域。指教區時包含二林、大突、馬芝麟、阿束、半線等 5 社，指政務轄區時則進一步包含大武郡，以及八卦台地以東的猫羅、南投、北投等社。且此一自稱、他稱的用法係隨著荷蘭統治時程而逐漸穩定。另外，並指出習以為常的「馬芝麟」（*Bet*gilim），其實不是源自南島語族部落的自稱，源自南島語系的部落自稱是 Dorenap。唐人在當地活動的首要據點為「二林」（Gilim），並以二林為地名的詞幹，稱呼 Dorenap 一帶為「西二林」（West Gilim、Wesgilim）或「尾二林？」（*Bet*gilim）；「馬芝麟」的「芝麟」，為漢字擬音異體寫法。[3]

三、西南沿海一帶福建唐人為主的活動領域

學術界一般認為，十七世紀初以來福建唐人在台灣西部沿海一帶的活動，已在沿岸建立起間歇性據點，並已有一系列的地名指稱不同地方；當中，也有語源為漢語系的地名。以陳第〈東番記〉中列出的沿海地名為例，有魍港、加老灣、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等 10 處。其中的魍港、大員、堯港、打狗、淡水、雙溪等 5 個地名明顯係源自漢語系。至於繪製於十七世紀初期的〈福建海防圖〉，臺灣西部海岸明顯可見的地名依序有雞籠、雞籠港、淡水、芝巴山里、新港、崩山、牛山、三林、二林、灣頭、小漁嶼、北港、大線頭、魍港、馬沙港、加老灣、小溪水、小溪水、茭丁港、沙馬頭等 19 處。[4] 其

3 康培德，〈二林地區：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彰化平原與濁水溪沖積扇北半部人群的地域區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5 期（2014），頁 25-27、37-38。原文將 *Bet*gilim 譯為「北二林」，即視為同「西二林」般的方位地名。經匿名審查委員指出「北」與 *bet* 在轉音上的困難，之後蒙陳國川教授提醒可能為地名中常用的方位詞「頭」、「尾」的「尾」(bé)，故本文改稱為「尾二林」(POJ: Bé-jī-lîm)

4 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23 卷 3 期（2016），頁 37。

中的雞籠、淡水、新港、崩山、牛山、三林、二林、灣頭、小漁嶼、北港、大線頭、魍港、小溪水、茭丁港等地名即源自漢語系。[5]

這些福建唐人慣用的地名，並未在荷蘭人蒞臨後，在東印度公司相關文獻紀錄中消失或遭到替代。相反的，文獻記載提及唐人活動時仍多使用這些舊地名，例如 Quelangh / Kelang 指「雞籠」、Tamsuy 指「淡水」、Sinckangia / Sinkanja 指「新港（仔）」、Pangswa / Panswa 指「崩山」、Gilim / Gielim 指「二林」、Ponckan 指「笨港／北港」、Toasumpan 指「大線頭」(POJ: Tōa-sòaⁿ-thâu)、Wanckan 指「魍港」、Bessikauw / Besjekau 指「馬沙溝（即馬沙港）」、Tayouan / Tayovan 指「大員」、Jockan 指「堯港」、Tankoya 指「打狗」、Cattia / Kattia 指「茄藤（即茭丁）」等。之後並隨著文獻資料對地方描述的細緻化，以及唐人活動範圍的拓展，西部海岸一帶出現更多的漢語系地名。如南崁（Lamcam / Lanckan）、竹塹（Tixam / Ticksam / Ticxam）[6] 等。

至於西南沿海一帶，隨著唐人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體制營運下擴大、深化其產業經濟活動，相關的漢語系地名亦伴隨而出。特別是十七世紀中葉以來，唐人大量參與東印度公司規劃的墾地與出賣經濟活動後，此類地名即在相關文獻中應運而生。以下即約略循沿海往內陸延伸的方向，依序從賣港、墾地、賣社等三個項目逐一討論伴隨而生的漢語系地名。

---

5 「茭丁」，亦可記為「茄汀」、「茭汀」、「茄定」等，即為「茄藤」；「茄汀」、「茭汀」、「茄定」白話字（POJ）寫為 ka-tiaⁿ、ka-tiãⁿ，「茄藤」為 ka-têng 或 ka-tîn。茄藤，在福建唐人語彙中指生長於海灣岸邊鹽灘或潮水可達的沼澤地一帶的一種紅樹（mangrove），主要作為薪柴，以及染網原料。換句話說，「茭丁港」、「茄藤港」等為擬音異體漢字。另，〈福建海防圖〉作為地圖，但所呈現的地名空間序列，少部分與實際排序有異；如魍港其實應在大線頭北方等。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海防圖〉標示出的臺灣西部海岸 19 處地名，應是當時福建唐人出洋時在臺灣西岸交易、捕魚、取水，或是作為行船地標所留下的地名。當中有些即為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紀錄下的雞籠、淡水、南崁、新港仔、崩山、北二林（馬芝遴）、二林、笨港、魍港、堯港、打狗、下淡水、茄藤、放索、瑯嶠等與東印度公司商館所在地大員一帶互有船隻往來的交易點前身。康培德，〈荷蘭時代臺灣各港之間的貿易變遷〉，黃富三（主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19-28。

6 此處「竹塹」相當類似前述的「南崁」、「二林」等一地二名案例。文獻中 Tixam 若用於指涉竹塹，多用於唐人船隻往來之處，或是出賣單位；用於指涉南島語族部落，即日後所說的竹塹社時，則用語源為南島語系的自稱 Pokaal / Pokael。

四、賧港地名：沿海漁場

賧港（verpachten van meiren, revieren en visscherijen）一般指公司將其有效管控的水潭、溪河、漁場等水體的經營權，出租給得標最高者從事為期一定時間的營運以換取利潤。賧港的緣起與賧社（verpachten van dorpen）一樣，都是在 164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本島住民、土地實施制度化的經營管理之際。此階段重要且具代表性的作為，像是地方會議正式改成南北二路，每年召開；對村社戶口、人口進行大規模調查，並以此作為開徵年貢的依據；透過大規模的土地調查與測量工作，開始對從事移墾的唐人農民課徵稻作什一稅等。

賧港作為出賧對象，正式出現於東印度公司的出賧名單上係 1645 年 4 月。當時，僅有桌山山腳下，以及大菁栽種區（indigowerff）旁二個都未具名的水潭，作為漁場出賧。[7] 隔年 1646 年 4 月，出賧名單上多了 Catchieuw，標明係位於笨港附近的水潭，另外附近還有一未具名的埤塘（poel）也在出賧名單上。[8]

1647 年 4 月，出賧名單上的賧港單位與前一年一樣。[9] 不過，此時新增了沿海漁場的出賧，並於不同日單獨公告。當時記載的沿海漁場出賧單位有 10 個，但當中有合併賧金者，因此共有 8 個出賧單位。如下：稱作魍港有二處，稱作 Caya 有一處，稱作 Oynij 有一處，稱作麻豆港或麻豆溪有一處，稱作 Lamkjoe 有一處，稱作 Cattia-atau 有一處，稱作歐汪（Ouwangh）有一處，稱作鹿耳門（Lackemoy）與 Gaya 二處。[10] 隔年 1648 年 4 月，出賧的沿海漁場與前一年一樣，不過多了清水

7 *DZII*, p. 379；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402。出賧名單上的河流，如除笨港溪（de reviere van Poncan），以及之後的南崁溪（de reviere van Lamcam）、竹塹與新港仔溪（de revieren van Ticksara ende Sinkangia）等，因其出賧的營利方式並不完全以漁場為主，住民貿易或鹿產交易仍是當地的營利方式之一，故本文暫時不視為討論賧港時的對象。例如竹塹與新港仔溪的出賧，1646 年時標示為溪，但 1647 年起則標示類似村社、地區的地名，不稱為溪。換句話說，東印度公司文獻的分類邏輯，一開始係將村社、河流、水潭視為一類，並未區分其營利方式差別。待 1647 年起將近海漁場視為另一類出賧對象，擺明是漁獲利益後。才開始把先前將把村社、河流、水潭等視為同一出賧類項，不區分營利方式別的分類方式，稍微調整，改將漁場獨立為一項出賧名單。不過，其他像是市鎮的豬隻屠宰權，雖然營利方式有別，一開始出賧時，即一直與村社、河流、水潭歸於同一出賧名單，並未如漁場般另行記載。

8 *DZII*, p. 488；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 521。

9 *DZII*, p. 562；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 621。

10 *DZII*, p. 567；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 628。

溪（de Verse revier），以及明確指出先前未具名，只提示魍港有二處漁場；一為魍港旁的北鯤鯓（Pakonsin），另一為 Lamcan。[11]

1649 年資料闕無。1650 年 4 月，出賦名單開始將水潭、溪河漁場單獨列出，以區分「海上漁場」（der visscherijen die in zee gelegen）。此時，原本列為沿海漁場的 Oynij、麻豆港或麻豆溪、清水溪等 3 處移到「水潭、溪河漁場」，但名單多了 Ciauwangh。先前在 1647 年稱 Lamkjoe 者，此時則分為 Lamkia（即 Lamkjoe）與 Pohon 等二處；作為沿海漁場出賦單位仍維持 10 個。[12] 往後到 1657 年都維持這 10 個漁場名稱。

以一六五〇年代這 10 個已穩定的漁場名稱為討論對象，應都是源自漢語系的地名。《熱蘭遮城日誌》中譯本已確定的地名有北鯤鯓、歐汪、鹿耳門等 3 處。其餘 7 處，Cattia-atau 應該是「茄藤（仔）頭」（POJ: Ka-tia^{n}(-á)-thâu）。[13] 剩下 6 處有 2 個為同名地名，即 Caya / Gaya。之後剩下 4 處分別是 Lamkam、Lamkia、Pohon，以及 Ciauwangh。不過不同年份的資料記載拼寫略有不同。以下討論以 Lamkam、Caya 為主。

Lamkam 於紀錄中位於魍港旁，又拼寫為 Lamcan、Lamkam。讀音相當像南崁，文獻中南崁的拼寫剛好也是 Lamcam。不過，作為桃園一帶地名、村社名的南崁，也是出賦對象。魍港旁的 Lamkam，與桃園一帶的南崁一向共同出現在年度出賦名單上，直到 1656 年起桃竹苗地區不再出賦，桃園一帶的南崁才消失在名單上。此外，作為漁場的 Lamkam，標定的地理位置與南崁相差南轅北轍，不可能與北臺灣出賦的南崁溪有關聯。魍港旁的 Lamkam，為避免與南崁混淆，也因其為漁場之故，暫時稱為「南港」，作為北港（笨港）的對應地名；[14] 但確切的地名以及地點仍待查。

11 *DZIII*, p. 31；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32。
12 *DZIII*, p. 122；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頁 127。
13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
14 字尾 kan 或 kam 對應成「港」，前者有 rivier van Pon（c）kan 對應笨港溪（北港溪），後者有 Hamsekam 對應含西港。

Caya 有二處；一為獨立賧金單位，一六五〇年代都記載為魍港附近。[15] 另一處 Caya 則一直與鹿耳門合併為一賧金單位，統稱「鹿耳門與 Caya」。二個 Caya 當中，後者除了記載為出賧的漁場名稱外，還在文獻出現多次，東印度公司亦曾搭蓋哨所派兵駐守。比起魍港附近的 Caya，鹿耳門一帶的 Caya 在文獻中出現相對頻繁，說明了荷文版《熱蘭遮城日誌》「歷史地名列表」（Lijst van historische plaatsnamen）內的 Caya，為何僅註明在今日臺南市安南區或其附近。[16]

Caya 作為地名可在魍港、鹿耳門一帶指不同地點，地名屬性應該偏向是通名。查十八世紀中葉地圖，如《臺灣府汛塘圖》[17]、或 1752 年的《臺灣縣境圖》[18]，圖上鹿耳門北方岸外沙洲上有「隙仔」此地名。《臺海使槎錄》於「卷一、赤崁筆談・風信」提及：由彭湖至臺灣向巽方行，近鹿耳門隙仔，風日晴和，舟可泊。[19] 當中鹿耳門、隙仔並列。《臺灣縣輿圖纂要》於「臺灣縣輿圖冊・山水・水之屬」提及海翁汕時，記載其距縣西北十二里・土名隙仔口，又名海翁窟。提及隙仔港時，記載其距縣西北水程三十五里，位鹿耳門外北方。北風時可以泊舟。[20] 完成於 1720 年的《臺灣縣志》，於「輿地志一・海道」提及：晚秋北風時，船隻出鹿耳門，必由鹿耳門外北邊名為隙仔的澳出海再航往澎湖。[21] 至於同時期的文人，認為隙仔係俗名，改稱月眉灣，並留下〈舟再泊月眉灣〉詩：鹿耳門前幾溯洄，月眉灣作避風臺；舟師不畏東流急，喚得小船載酒來。[22]

---

15 《熱蘭遮城日誌》中譯本於 1654 年的出賧名單寫成「Caya 與魍港」，但荷文本以及原檔仍維持「Caya 係魍港附近」。VOC 1206: 408; *DZIII*, p. 337；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頁 325。

16 *DZII*, p. 678.

17 謝國興主編，《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5）頁 293。另參考「數位方輿」《臺灣府汛塘圖》：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4000123#

18 王必昌（1752），《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另參考「維基百科」臺灣縣境圖（1752）.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E8%87%BA%E7%81%A3%E7%B8%A3%E5%A2%83%E5%9C%96_（1752）.jpg

19 黃叔璥（1722），《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13。

20 不著撰人，《臺灣縣輿圖纂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04、105。

21 陳文達（1720），《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67-68。

22 原文為：「月眉灣，俗稱隙仔；在鹿耳門前。北風，可以泊舟。予阻風，泊此旬餘。」余文儀（1763），《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931。之後《續修臺灣縣志》收有〈泊隙仔港〉詩，內容與〈舟再泊月眉灣〉一樣，僅將小船二字改成漁翁，舟師改成舵師。謝金鑾（1807），《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587。

鹿耳門附近的 Caya 與「隙仔」的地點以及描述約略符合，暫且假設此 Caya 即「隙仔」，可約略確定其位置。至於魍港一帶的 Caya，位置待考。[23]

至於 Lamkia、Pohon 與 Ciauwangh，暫不可考。目前可推測的是：作為漁場的 Pohon 又記為 Po（n）hong（h），地名屬性類似附近倒風內海「倒風」（Tohong）中的「風」；Ciauwangh 又記為 Chiauwangh，地名屬性類似附近「漚汪」（Ouwangh / Auwangh）中的「汪」。[24]

前述討論的沿海出賫漁場名整理如表一。

表一　沿海出賫漁場名

地名	**Pe̍h-ōe-jī**	文獻紀錄
北鯤鯓	*Pak-khun-sin*	Pakosin / Paikonssijn / Lakhonizyn etc.
歐汪	*Au-âng*	Ouwang（h）/ Auwang（h）
鹿耳門	*Lók-ní-mn̂g*	Lackemoy / Lactmuya / Lackquemoy etc.

23　「隙仔」此地名，除了出現於鹿耳門一帶外，臺南山上區廟街仔南邊也有一稱「隙仔口」的聚落。據載其地名緣起，係昔日因於聚落南邊有一條溪溝，更南又有一小溪，由溪溝到南邊小溪間有一較低凹的缺口，因而得名。參考林聖欽等，《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338。至於臺灣西部海岸一帶尚有幾處稱「隙仔」，或轉音自「隙仔」的地名。如彰化縣芳苑鄉的「隙仔」，屬於頂廍仔（今稱頂部村）下的聚落。又稱其為「隙仔庄」（POJ: khiah-á-chng / khiā-á-chng），地名緣起為夾在王功與本庄（按：路上厝）之間。參考彰化縣芳苑鄉路上厝謝鐵楚先生說法（2018 年 7 月 19 日）。北臺灣新竹一帶也有原稱「隙仔」，後雅化為「客雅」的地名：如隙仔溪、隙仔。隙子溪為十八世紀初新竹一帶拓墾活動的南緣（北緣為今稱頭前溪的竹塹溪）。參考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箚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臺灣風物》39 卷 4 期（1989），頁 77-78。又收於氏著，《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 - 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頁 236-237。「隙仔」作為聚落名，地名緣起為位置在隙仔溪出竹東丘陵的出口處，故名「隙仔」。至於「隙仔溪」地名緣起，據載係其中游將竹東丘陵切割出青草湖盆地。從新竹平原南望，有如一個大缺口，故名「隙仔」。參考陳國川，《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八・新竹市》（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6），頁 82、185。

　　如同鹿耳門一帶的「隙仔」曾為當時文人題詩的對象，新竹一帶的「隙仔溪」，曾以「隙溪墨水」、「隙溪吐墨」，列為塹南、淡水廳內的八景之一。參考陳培桂（1871），《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40。鄭鵬雲、曾逢辰（纂輯）（1897），《新竹縣志初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9。以「隙溪吐墨」為名的詩，有陳朝龍所題，收於《新竹縣志初稿》，頁 247、249。

24　若出賫名單上的地名排列有地緣關係、地理空間序列考量，則 Lamkia、Pohong（h）應近麻豆港、倒風內海；Ciauwangh 則偏向鹿耳門方向。

茄藤頭	*Ka-tia^{n}-thâu*	Cattia-atau / Cattiatauw / Cattia Tau etc.
南港？	*Lâm-káng*	Lamkam / Lamcan / Lamkam
隙仔	*Khiah-á*	Caya / Kaya / Gaya etc.
？		Lamkia
□風？		Pohon / Ponhongh etc.
□汪？		Ciauwangh / Chiauwangh

五、瞨港地名：內陸水潭、溪河漁場

1650 年起，東印度公司出瞨紀錄開始獨立列出「水潭、溪河漁場」（der visscherijen zijnde binnen wateren en revieren），並將先前列於他處（如 Oynij、麻豆港或麻豆溪）或未加以細分類（如笨港附近的 Catchieuw），但視為水潭、溪河，且以漁撈為營利方式的漁場歸入此項目。1650 年當時記載的內陸水潭、溪河漁場出瞨地名有 12 處，其中 3 處還有別稱。但當中有合併瞨金者，因此共有 10 個出瞨單位。如下：鯽仔潭（Zijdatham）一處，含西港（Hammekam）與直加弄（Tickeran）二處併一單位，大目降溪與／或新港溪併一單位，麻豆港又稱倒風（Tohongh）一單位，Catchieuw 潭一處，魍港對面的 Vadsieckan 一處，位麻豆和哆囉嘓之間、又稱作 Vatiouw 溪的茅港尾（Omkamboy）溪一處，[25]Kattiakar 一處，位大菁栽種區的 Dagouseman 潭與 Doelangh 潭等二處併一單位，位麻豆溪與麻豆港內、約在麻豆與蕭壠平地一帶的 Oenij。[26]

25 成書於 1922 年的〈茅港尾紀略〉，以當時的傳聞及古書契為主，著重於農業墾殖。將茅港尾的「歷史」，視為始於延平郡王入臺之初。見黃清淵（纂），〈茅港尾紀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 129-130。臺灣早年民間傳說多將福建移民的歷史，視為始於國姓爺入臺之際，忽略更早移民的案例。類似例子亦可見於本文提及的馬沙溝。馬沙溝早在十七世紀上半即有福建唐人活動。馬沙溝觀音巖的碑文，提及於明末將軍之西，海汕浮起沙洲，先民渡海來，登將軍港馬沙溝一帶捕魚，墾拓生涯定居。但烈池宮立於 1982 年後的碑文，則提及當地陳氏祖先原定居福建省漳州府海澄縣南門外十八都，明永曆十五年（1661 年）陳氏三兄隨延平郡王鄭成功來台。其先祖陳宗榮方定居馬沙溝。

26 *DZIII*, p. 123；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頁 127-128。

內陸水潭、溪河漁場出賦地名，1654 年起略有變動，原本為 2 個出賦單位者，一為又稱作倒風的麻豆港，另一為位麻豆溪與麻豆港內的 Oenij，二者合併為 1 個出賦單位，稱為「倒風與 Oenij」，不再使用麻豆港此地名。另外，則在 Oeny（Oenij）附近新增一處 Lockjonghou。[27] 之後的出賦地名、單位多依循 1654 年的資料。

以 1654 年起這 16 個內陸水潭、溪河名稱為討論對象，《熱蘭遮城日誌》中譯本已確定的地名有鯽仔潭、含西港、直加弄、麻豆港、大目降溪、新港溪、倒風、茅港尾等 8 處。至於 Vatiouw 溪則是含西港溪的別稱。其餘 6 處，Catchieuw 已註明位笨港溪一帶，1650 年的紀錄尚註明是為了諸羅山社族人的利益出賦，[28] 因此考證為嘉義朴子的猴樹（POJ: Kâu-chhiū）（港）並無異議。[29]Oenij 則考證為塭仔（POJ: ún-á），[30] 文獻提及 Oenij 在麻豆溪、麻豆港一帶，且 1654 年起與倒風併為一賦金單位，位置應在臺南佳里塭仔內不遠處。[31] 剩下 5 處分別是 Vadsieckan、Kattiakar、Dagouseman、Doelangh，以及 Lockjonghou。不過不同年份的資料記載拼寫略有不同。以下討論以 Vadsieckan、Kattiakar、Lockjonghou 為主。

Vadsieckan 又記為 Ladrikan、Ladsikan、Sadsikan、Zadzikan。文獻記載其位置為魍港上方，並註明是為了麻豆社族人的利益出賦，因此與麻豆社應有地緣關係。暫時比定為鹹水港（POJ: Kiâm-chúi-káng）。

Kattiakar 又記為 Cattayar、Cataja、Cattaya、Cattia。1648 年時稱為清水溪，1650 年起才改稱 Kattiakar 溪，[32] 並註明是為了新港社族人的利益出賦。Kattiakar 溪應該就是茄藤仔（POJ: Ka-tiaⁿ-á）溪的拼寫。《熱蘭遮城日誌》「歷史地名列表」

27 *DZIII*, pp. 337-228；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頁 325-326。
28 *DZIII*, p. 123；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三）》，頁 127。
29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陳美鈴，《臺灣地名辭書：卷八・嘉義縣（上）》（南投與嘉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嘉義縣政府，2008），頁 83。
30 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19 卷 4 期（2012），頁 7 註 17。
31 林聖欽等，《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612-613。
32 1657 年記載清水溪以南墾地出賦時，即提及清水溪又稱茄藤仔（Cattkaunia）溪。*DZIV*, p. 247；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四）》（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頁 295。

將清水溪比對為今日的二仁溪（二層行溪），[33] 當時唐人在瞨港時稱為茄藤仔溪。

至於 Lockjonghou（w）又記為 Lackjonghou、Lonckjou，位 Oenij 附近，已有考訂為嘉義縣義竹鄉龍蛟村的龍蛟潭。[34]

前述討論的內陸出瞨水潭、溪河漁場地名整理如表二。

表二　內陸出瞨水潭、溪河漁場地名

地名	**Pe̍h-ōe-jī**	文獻紀錄
鯽仔潭	*Chit-á-thâm*	Zijdatham / Tzijdathan / Sydathan etc.
含西港	*Hâm-se-káng*	Hamsekam / Hanesekam etc.
直加弄 *	*Tit-ka-làng*	Tickeran / Tikarang
倒風	*Tò-hong*	Tohongh / Tihong / Johangh etc.
茅港尾	*Hm̂-káng-bé*	Omkamboy
猴樹	*Kâu-chhiū*	Catchieuw / Caetsieu / Caatzieu etc.
塭仔	*Ún-á*	Oenij / Oeny / Onynij
鹹水港	*Kiâm-chúi-káng*	Vadsieckan / Ladrikan / Sadsikan etc.
茄藤仔	*Ka-tia^{n}-á*	Kattiakar / Cattayar / Cataja / Cattaya etc.
龍蛟（湖）	*Lêng-kau-ô͘*	Lockjonghouw / Lackjonghou / Lonckjou
？		Dagouseman / Daganseman etc.
？		Doelangh / Doulangh

說明：* 表示非源自漢語系地名。

六、墾地地名

文獻記載唐人在臺灣從事耕作的地方，一開始多依附在南島語族社名之下；像是依附於新港社或蕭壠社的耕地。之後也有不依村社名，改成依附於獨立的地名；如原屬蕭壠社族人的領域分出直加弄、含西港等地名後，唐人在此耕作，則

33　*DZII*, p 692.

34　翁佳音，〈《諸羅縣志》所載之臺灣「早期史」評釋〉，《嘉義研究》18 期（2018），頁 54。

稱為直加弄或含西港耕地（Tikarangse, Hamsakangse velden）。1660 年 3 月鄭軍來襲前夕，東印度公司為了制止與南島語族住民接觸頻繁的唐人四處散播謠言，決議將前述直加弄、含西港，以及 Barius 耕地和笨港一帶耕作的唐人遷往赤崁一帶的耕地。[35]

至於赤崁一帶的耕地，若以 1647 年起文獻中記載的墾地（polder）列表為主，當時東印度公司係使用 6 筆荷蘭地理名、6 筆公司人物名的紀念性地名。[36] 之後，人物名的墾地地名陸續增加為 9 人。這 6 筆荷蘭地理名為東印度公司在荷蘭母國 6 個商會的所在地，分別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台夫特」（Delft）、「荷恩」（Hoorn）、「恩克豪生」（Enckhuysen）、「鹿特丹」（Rotterdam）、「米德爾堡」（Middelburch）等 6 處。人物名為 Sonck（Martinus Sonck – 宋克）、De Witt（Gerard Frederikszoon de With）、Nuijts（Pieter Nuijts – 納茨）、Putmans（Hans Putmans – 普特曼）、Van der Burch（Johan van der Burg）、Traudenius（Paulus Traudenius – 陶德）、Lemaires（Maximilian le Maire）、Coyett（Frederick Coyett – 揆一）、Koeckebacker（Nicolaes Coeckebacker）等 9 人；9 人當中前七名分別是公司於 1624 年至 1644 年派駐在臺灣的 7 位長官，第八名則是末代長官，最後一位是公司爪哇高層於 1639 年派至（越南）東京灣、臺灣視察的專員。荷蘭人以東印度公司辦公室所在地地名，以及歷任駐臺長官人名為墾地名稱，除了可彰顯東印度公司在臺的殖民成就；並與一六四〇年代中葉以來，大量唐人難民湧入赤崁墾區，成為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主要農業墾殖人力後。此命名不無公司當局在因

35 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413-414. Barius 耕地若拼寫無誤，應是以 1640 年秋來臺，1646 年年底病逝臺灣的巴維斯（Johannes Bavius）牧師之名命名。巴維斯曾一度派駐蕭壠社。*DZII*, p 76n36；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 72 註 71。生前曾建議將其派駐地的直加弄耕地交由唐人耕作。參考議長 Pieter Anthonisz Overtwater 給總督范德萊恩 Cornelis van der Lijn 的書信，1647 年 9 月 24 日，大員。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205, 206. 臺灣議會議長 Pieter Anthonisz Overtwater 並將位於蕭壠社西方約 200 甲的土地授與巴維斯。巴維斯去世後，蕭壠社族人向公司宣示這片土地的所有權，打算前來耕作。參考長官凱撒給總督 Joan Maetsuijcker 的書信，1654 年 11 月 19 日，大員。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556, 563. 巴維斯耕地之後由唐人頭人 Bienko 以 450 里爾的價格購入，成為其財產。參考總督 Joan Maetsuijcker 給長官凱撒與福爾摩沙議會的書信，巴達維亞，1655 年 5 月 14 日。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V, pp. 37, 43. 佔地 200 甲巴維斯耕地在蕭壠社與馬沙溝（Bessikauw）之間。

36 *DZII*, p 599；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 679-680。

應唐人人口倍增的壓力下，為了避免危急統治的正當性，並確立主權所有，因而帶著主權（再）宣示的味道。[37]

不過，當時在臺灣的唐人移民對這些墾地名稱另有漢語系的稱謂。1650 年文獻登錄墾地甲數時一併提供了對應的漢語系地名。依照翁佳音的考證，阿姆斯特丹、台夫特、荷恩、恩克豪生、鹿特丹、米德爾堡分別為蚵寮港（Orakan）、二層行（Leijseijkoeijn）、中樓（Tonglouw）、瀨口（Lockauw）、香洋仔（Hoenjouwa）、舊社口（Schoesiackhou）等。Sonck、De Witt、Putmans、Van der Burch、Traudenius、Lemaires、Koeckebacker 分別為桶盤棧（Tampoasiam）、角帶圍（Kaptwahoij）、上港崗（Cekankon）、中洲仔（Tongsoija）、中港崗（Tiokankon）、三舍甲（Siamsiamticke）、喜樹仔（Heijsouga）等；當中僅以長官納茨為墾地名對應的 Sijsijnnangh 待考。[38] 至於以 1656 年 6 月就任公司駐臺長官的揆一為墾地名，係 1657 年時將原本稱清水溪（今日的二仁溪）以南，高雄境內的茄萣（Cattjaa）與竹滬（Teckhou）一帶、堯港（Jockan）或 Poespas 一帶、觀音山（Quannimswa）一帶的墾地一併給一名稱。[39]

前述討論的墾地地名整理如表三。

表三　墾地地名

地名	**Pe̍h-ōe-jī**	文獻紀錄	對應荷文墾地名
蚵寮港	*Ô-liâu-káng*	Orakan	Amsterdam
二層行	*Jī-chàn-hâng*	Leijseijkoeijn	Delft
中樓	*Tiong-lâu*	Tonglouw	Hoorn
瀨口	*Lòa-kháu*	Lockauw	Enckhuysen
香洋仔	*Hun-iû^{n}-á*	Hoenjouwa	Rotterdam
舊社口	*Kū-siā-kháu*	Schoesiackhou	Middelburch
桶盤棧	*Tháng-phôa^{n}-chàn*	Tampoasiam	Sonck
角帶圍	*Kak-tòa-ûi*	Kaptwahoij	De Witt

37　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紀念性地名〉，《成大歷史學報》54 期（2018），頁 9-10。
38　翁佳音，〈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
39　VOC 1222, folio 534.

上港崗	*Siōng-káng-kong*	Cekankon	Putmans
中洲仔	*Tiong-chiu-á*	Tongsoija	Van der Burch
中港崗	*Tiong-káng-kong*	Tiokankon	Traudenius
三舍甲	*Sam-sià-kah*	Siamsiamticke	Lemaires
喜樹仔	*Hí-chhiū-á*	Heijsouga	Koeckebacker
？		Sijsijnnangh	Nuijts
茄荖	*Ka-tiāⁿ*	Cattjaa	
竹滬	*Tek-hō͘*	Teckhou	Coyett
？		Poespas	
觀音山	*Koan-im-soaⁿ*	Quannimswa	

七、賸社地名

賸社地名語源為漢語系者，臺南一帶最為我們熟悉的是新港、蕭壠、麻豆等南島語族村社名。若往北延伸至廣義的南瀛地區（即今日統稱為雲嘉南地區）以及相關周邊地帶，採用前述針對一地二名的分析方式，由南往北延伸，約略有諸羅山、打猫、阿里山、猴悶、虎尾壠、二林、馬芝麟（尾二林）、大突、南投、北投等社；目前可確定此一地二名模式，即一為南島語自稱、另一為漢語他稱的部落名，除了臺南一帶的新港、蕭壠、麻豆等社外，彰化、南投一帶的二林、馬芝麟（尾二林）、大突、南投、北投等社也如此。至於屬於南瀛地區的諸羅山、打猫、阿里山、猴悶、虎尾壠等社，大抵而言極有可能也是循此模式。[40] 現將南瀛地區以及彰化、南投一帶，擁有漢語他稱與南島語自稱一地二名的村社列表如下表四：

40 舉例來說，荷蘭文獻中「阿里山社」的紀錄，寫法為 Arissangh，係荷蘭人依據出入當地的唐山生理人對當地人的他稱 *A-lí-san*。當地人自稱是 Talack Bajen，虎尾壠（Babuza）語意思是「東 Talack」，而 Talack 又是打猫社（Dovaha）的別稱。換句話說，當時唐山生理人口中的「阿里山社」，與打猫社關係匪淺；曾有打猫社頭人私下移住「阿里山社」，而遭東印度公司免除職務之事。東印度公司之後也曾嘗試讓二社合併等。康培德，《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臺北：聯經，2016），頁 128-129。荷蘭文獻中的「阿里山社」與我們今日熟悉的「阿里山鄉」的「阿里山」無關。依劉益昌教授告知（2017 年 10 月 20 日），「阿里山社」地點可能在今日嘉義縣民雄鄉大坪頂一帶，但仍需考古挖掘進一步求證。

表四　漢語他稱與南島語自稱的村社

社名	**Pe̍h-ōe-jī**	漢語他稱	南島語自稱
新港	*Sin-káng*	Sinkan	Tagloulou
蕭壠	*Siau-lang*	Soulangh	Toeanimich
麻豆	*Môa-tāu*	Mattau	Toukapta
諸羅山	*Chu-lô-san*	Tirrosen	Laos
阿里山	*A-lí-san*	Arissangh	Talackbayen
打猫	*Tá-bâ*	Davoha	Talack
猴悶	*Kâu-būn*	Chaumul	Tossavang
虎尾壠	*Hó-bé-lâng*	Favorlangh	Ternern
二林	*Jī-lîm*	Gierim	Tackais
馬芝麟（尾二林）	*Bé-chi-lîn*	Betgilem	Dorenap
大突	*Tāi-tu̍t*	Taytoet	Torchara
南投	*Lâm-tâu*	Lamtou	Tausa Talake
北投	*Pak-tâu*	Packtou	Tausa Mato

八、代結語：漢語地名分佈與意義

十七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抵台前即存在的漢語地名，大多與沿海地帶船隻進出，或是泊船的沿岸港灣有關。至於荷蘭時代語源為漢語的地名，分佈狀況仍多以西部沿海為主。不過，一方面係伴隨著移居台灣的唐人人口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則受惠於東印度公司相關史料對當時各地的描述相對細緻化，我們因而可見到漢語語源地名出現在唐人人口集中的西南部沿海地帶；特別是漁場的瞨港地名，以及墾地地名，即大量集中於此。此部分，漢語語源地名的分佈範圍，與我們一般所了解的唐人移墾台灣歷史擴張趨勢，並無多大二致。

若挑選一地二名，且當中之一語源為漢語的瞨社地名，其分佈範圍則不僅是在沿海地帶（如南崁、竹塹、崩山、馬芝遴、二林、虎尾壠、蕭壠、下淡水、茄

藤等），以及臺南一帶（如新港、麻豆等）而已。當時偏向內陸部分，如八卦台地東側貓羅溪流域的北投、南投，雲嘉平原的打貓、諸羅山、阿里山等，已有語源為漢語的聫社地名出現。

南島語族村社出現語源為漢語的一地二名現象，應不脫唐人在當地的互動已有一定的時日與規模，這也是為何漢語社名大部份多出現在沿海一帶。至於當時不少案例已深入中部內陸地區，而北部、南部並不多，多少代表著唐人對中部內陸地區已有一定的認識。

後世清人史料時常提及海澄人顏思齊等，於荷蘭入臺前即已率眾據臺活動。大部份史料雖未明載顏思齊等係以哪些地方為據點；不過，《臺灣外記》倒是提供一有趣的線索，敘及顏思齊去世前「因往豬勝山打圍回來，歡飲過度，隨感風寒，自知不起。」[41] 當中，豬勝山即諸羅山。

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文獻，對虎尾壠社的描述亦頗耐人尋味。1636 年，長官普特曼（Hans Putmans）與繼任長官范德勃格（Johan van der Burch）提及一名曾受尤紐斯牧師熱烈款待虎尾壠社頭人，連同其 300 或 400 名族人有意與東印度公司締和。並說只要荷蘭人出現在虎尾壠社，他即會和其族人躲在灌木叢中，不起身攻擊荷蘭人。還會在其房子貼上寫著漢文的小紙條，讓荷蘭人了解原委。並在族人的房子貼上漢文紙條為記號，避免遭荷蘭人破壞。[42]1639 年，東印度公司與虎尾壠社二度兵戎相見後，長官范德勃格與虎尾壠社族人達成的和平協議中，提及不追究 4 名長老與一名叫 Tziecka 的唐人頭人。[43]1642 年，長官陶德（Paulus Traudenius）提及，曾數次以口頭並用漢文書寫的短箋，要求虎尾壠社交出公司眼中的罪犯。[44] 之後，戰地指揮官 Johannes Lamotius 率領東印度公司部隊進入虎尾壠社後，確認對抗公司的是 2 名頭人，以及 7 名已在當地久住的唐人，並將對方斬首示眾。[45] 一直到 1644 年，東印度公司派牧師范布鍊（Simon van Breen）駐在當地後，唐人在當地的影響力才開始遭荷蘭人有效抑制。

41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3。
42 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108, 112, 118, 124.
43 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222, 225.
44 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 331.
45 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328, 329.

其實當時唐人的勢力，時常以沿岸可泊船的港灣為據點，藉由河道深入內陸。1643 年底，一群由名叫 Kimwangh，別名為 Saccalau[46] 的唐人所領導的武裝船隊，即東印度公司眼中的海盜，經由澎湖群島西來。Kimwangh 以東螺溪（Betsierims reviere）出海口一帶的馬芝麟社（Bethgierim）為據點，將二林、舊 Davolee、大小 Samlo、Dalivalou、大武郡、眉裡和 Darou、猫羅（Karra Karra）等今日彰化平原的村社納入其轄下。Kimwangh 還發放象徵權力的權杖給村社頭人，向虎尾壠社收取象徵臣服的豬隻為貢，並宣稱自己係統治北方的長官，而荷蘭人為統治南方的長官，大有分庭抗禮的氣勢。Kimwangh 還結盟猫兒干社族人一起攻擊他里霧社，燒毀一半的村社，直到後來進一步攻勢受挫而罷。[47]

換句話說，十七世紀上半唐人在台灣中部內陸地區活躍的程度，多多少少解釋了當時漢語語源的社名深入當地之故。也代表當時唐人對中部內陸地區的認識，已有一定的規模與深度。這也是為何同樣是跨部落地域勢力的強人，荷蘭文獻紀錄了唐人稱中台灣大肚社的甘仔轄（Camachat Aslamies）為「番仔王」（Quataongh），但享有較多實質權力與相對複雜穩定社會階序的南台灣瑯嶠人領袖 Tartar，則沒此稱謂。[48]

---

46 1641 年 4 月 11 日，東印度公司召開首屆地方會議，北路村社僅赤崁一帶的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蕭壠、麻豆，以及大武壠等 6 社長老與會。翌日北路又有哆囉嘓（Dorco）、Aurij、Verongh、諸羅山（Tisosan）、打猫（Davolak）、Dadoulangh、Dacalacca、Saccalauw 等社長老來訪。*DRB, anno 1641-1642,* p. 55. 郭輝（翻譯），《巴達維亞城日記》，頁 319-320；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イア城日誌（二）》，頁 142。*DRB, anno 1641-1642* 為 Herman Theodoor Colenbrander, ed.,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anno 1641-1642*（'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00）之縮寫。此處作為社名的 Saccalauw，是否與 Kimwangh 的別名 Saccalau 有關？或此社與唐人關係密切？待考。

47 *DZII*, p. 204; 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419-420;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頁 206。

48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沿海稱北港之處，已是文獻中的唐人漁場、走私或海上勢力團體活動之處，並可用於指臺灣島上的地點或特定地區。參考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臺北文獻》3 期（1963）、〈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臺灣銀行季刊》6 卷 1 期（1953），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145、162-165；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十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與變遷〉，《漢學研究》21 卷 2 期（2003），頁 251-256、262。進一步對照前述十七世紀初〈福建海防圖〉的地名，北港用於指地點，應位於二林之南，大線頭、魍港之北。換句話說，當時唐人早在荷蘭人之前已在今日臺灣中南部的彰化、雲林、嘉義沿海一帶活動。

九、後記：方法的反思、漢語語源、唐人用詞

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文獻記錄下語源為漢語的地名中，已是學界共識，且相當肯定無疑慮的案例，像是淡水、南崁、竹塹、南投、北投、北港、魍港、茄藤、馬沙溝、鹿耳門、北線尾、角帶圍、鯽仔潭等；這些地名除了地理位置比對無誤外，文獻中的地名拼寫與漢字讀音也較一致。不過，仍有些比對係地名拼寫與漢字讀音不盡然一致的情況下，透過其他間接證據推斷出的結果。如本文的案例 Vadsieckan / Ladrikan / Ladsikan / Sadsikan / Zadzikan，雖然拼寫方式之一很像猫兒干（Vassican），也與大安港的舊稱螺絲港、勞施港（POJ: Lô͘-si-káng）相近；不過，因文獻載明位於魍港附近（對面、上方或北邊），因其他註明位於魍港附近者為北鯤鯓，故位置應在今日嘉義西南方，不應在猫兒干所在地的雲林一帶，或是勞施港的臺中一帶。[49] 因此，古倒風內海裡的鹹水港（POJ: Kiâm-chúi-káng）或洪水港（POJ: Chiáⁿ-chúi-káng）的可能性較高。推斷二者的相關性，係比對周遭地理位置，排除其他可能的地名對應後的結論。如同將清人文獻中的半線社，比對為荷蘭文獻中的 Baberiang / Bobarien 一樣，並非完全依靠地名比對上的讀音相近而下結論。[50] 故比對上仍有一定的詮釋空間。

其二，語源為漢語的地名若是出自部落、村社的一地二名現象，那麼誰是語源為漢語的他稱？誰是語源為南島語的自稱？這當然牽涉論文一開始提及，是否能在東亞其他漢語系通行區或東南亞唐人足跡曾蒞臨之處，找到是否有相同或類似讀音的漢語系地名。若有，則台灣的案例源自南島語的可能性即降低；如「雞籠」即是明顯的案例。

---

49 Ladsikan 若是螺絲港的拼寫。係因「螺絲」即螺殼上之迴旋紋譬喻，用於形容船隻出入的水道繞轉的狀況，因而稱螺絲港，或紀錄成同音異體字勞施港。如同以螃蟹的雙螯：蟳管（chîm-kóng）作為比擬港灣地形而延伸出的異體字地名「蟳廣澳／成廣澳」（臺東縣成功鎮一帶）、「蟳廣嘴」（屏東縣恆春鎮一帶）等，都是從水手角度命名的地名。從文獻紀錄中 Ladsikan 的位置，只能推論出當時唐人曾稱魍港附近某一地方為螺絲港，而不是指今日臺中大安港的勞施港（螺絲港）。

50 半線作為語源為漢語的地名，在文獻中僅曇花一現地出現在 1644 年 10 月隊長彭恩（Pieter Boon）率東印度公司部隊攻擊水裡社後的紀錄。當時，東印度公司部隊一行人在馬芝麟過夜，從當地的族人與一些唐人得知，數名在 7 月設法逃脫公司襲擊的海盜正躲在半線（Pasua）。當時由於強風，荷蘭人並未立刻出兵前往距離 3 小時行程的海盜躲藏處。隔天東印度公司部隊出動後，據描述相當大的半線社並沒有族人反抗，旋即遭到公司部隊徹底破壞。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 479.

以目前已知《公案簿》所收錄的公堂文件中唐人地名為例，此為十八、十九世紀爪哇唐人菁英層級留下的書面語文件；像「大南門」、「小南門」、「五腳橋」、「港墘」、「公司後」、「大使廟」、「甕菜河」、「茄心丁巷」、「新厝仔」、「中港仔」、「磚仔橋」、「打鐵街」、「杉板寮」、「中廊」、「窑內」、「廿六間」、「大橋頭」、「洲府」等，即是我們所認知的漢語語源傳統福建地名（endonyms）。至於「八戈然」、「戈勞屈」、「班芝蘭」、「茄箔」、「望茄實」、「吧昂些安」、「賴猫冬」、「吧把丹」、「丹仔望」、「把東」、「牛郎沙里」等，則為語源為當地馬來語系擬音借詞的外來地名（exonyms），分別對應的拼寫為 Pakojan（位於巴達維亞城西區）、Glodok（位於巴達維亞城小南門外的唐人聚居區）、Pancuran（位於巴達維亞城南）、Depok（位於巴達維亞城西南郊外）、Bekasi（位於巴達維亞城以東郊區）、Pegangsaan、（位於巴達維亞城東南郊外，現為雅加達中央區）Luar Batang（雅加達附近）、Prapatan（巴達維亞城地名）、Tanah abang（巴達維亞城西南郊外的市鎮名）、Padang（位於今蘇門答臘島西岸）、Goenong Sari 等。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案例都是如此涇渭分明，像是「萬丹」、「寧望」、「文丁」、「龍岡」等，分別是擬音自馬來語的地名：Bantam、Rembang、Benteng、Lenggang 等，並非全是漢語語源。[51]

臺灣地名部分，也仍有些案例待進一步釐清；例如位置在今日民雄一帶的打猫社，文獻記錄為 Davoha 或 Talack。打猫的讀音 *Tá-bâ* 明顯與 Davoha 較近，但 Talack 又與我們今日孰悉的地名「斗六」白話字讀音 *Táu-lák* 相近。但今日的斗六一帶，一般多比對為文獻記錄中的 Talackbayen，即又稱為 Arissangh 的阿里山社，白話字 *A-lí-san* 與 Arissangh 讀音相近。復加上 Talackbayen 中的 bayen，虎尾壠語意思是「東」；因而視 Talack、Talackbayen 的語源為南島語，Davoha、Arissangh 為漢語語源。不過，若說打猫／ Davoha、阿里山／ Arissangh 是漢語語源，不如用更卻精確些的說法，即此為當時出洋唐人使用的語詞，語源可能是漢語，也可能加入了非漢語的元素。如同南島語語源的 Talackbayen，Talack 之後逐漸形成我們今日孰悉的「斗六」，斗六在十七世紀以來應已是唐人用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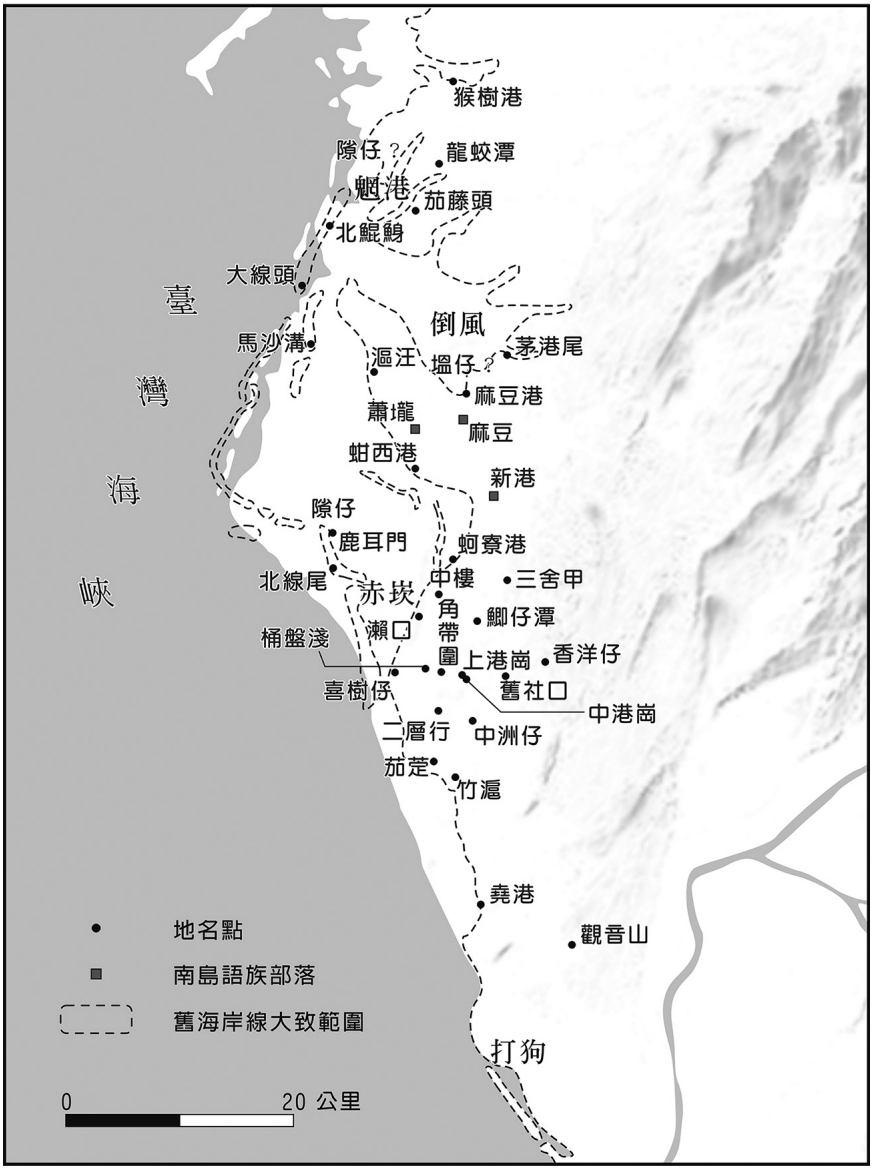
51　參考《公案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散見於各冊。

再以「二林」為例，白話字為 *Jī-lîm*，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文獻明確提及 Gierim 係唐人的說法，當地南島語族族人係稱之為 Tackais。十七世紀初陳第〈東番記〉提及的地名「加哩林」，一般多比對為二林。不過，「哩林」前頭多了個「加」，讀音為 ka-，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南島語的字首綴詞。若以前述判定 Talackbayen 為南島語語源的邏輯，「加哩林」則應該是南島語語源。至於也是十七世紀初的〈福建海防圖〉，則記載了二林、三林等地名，延伸出數字序列地名，代表「二林」一詞已內化成為當時唐人的慣用語詞。之後東印度公司相關文獻大量記載「二林」之時，「二林」除了已是唐人慣用的地名，甚至以此為詞幹，延伸出「尾二林？」、「西二林」等地名。至於再往後的清人修撰志書中，除了延續「三林」（今大城鄉西港）等數字序列地名，「二林」也已轉為擬音的異體漢字「芝遴」，字面上脫離了以「二林」為主體的地名系列，產生了「馬芝遴」的寫法。這十七世紀以來的變化，代表「二林」一詞已內化成為當時唐人的慣用語詞，不再是十七世紀初的「番語」。那麼，由此可見語詞屬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的動態性，有其複雜的面向。不是單純的去除時間層脈絡後的二分法。[52]

52 舉例來說，我們熟悉的台語，其關係語言漳泉語或廈門語，或隨百年多前中國國族主義運動一併延伸出的國族語言地理閩南語此稱謂，今日一般多歸類為漢語系。但亦有研究採用 Austroasiatics 或 Sino-Austronesians 等語言學詞彙來稱呼今日中國華南地帶的語言與人群。參考 Jerry Lee Norman and Tsu-lin Mei,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32（1976）: 274-301; Jerry Lee Norman, Chines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19; Laurent Sagart, “Proto-Austronesian and Old Chinese Evidence for Sino-Austronesian,” *Oceanic Linguistics* 33.2（1994.12）: 271-308. 指出了在東亞大陸北方的漢語南侵前，華南沿海地帶的語言與今日我們稱為南島語系，以及亞細亞語系之間可能的同源關係。如同越南語，剔除漢越詞（Từ Hán Việt）等外來詞後，其基層語言分類即從漢語系轉成南亞語系。台語方面，亦有剔除文讀後整理出的白話基層語彙與非漢語語源的關係。參考張裕宏，《TJ 台語白話小詞典》（臺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2009）。換句話說，如同語言分類歸屬，當中牽涉討論對象的歷史時間層，甚至國族意識等議題。界定語詞的語源，同樣不可忽視語詞屬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的動態性。

表五　「二林」一詞的變動

時間層	地名	方位等延伸地名	數字序列地名	
陳第〈東番記〉	加哩林			番語？
〈福建海防圖〉	二林		三林	
荷蘭文獻	二林	尾二林？（Betgilim）		漢語？
		西二林（West Gierim）		
清人文獻	二林	馬芝遴	三林	



引用書目

〔清〕王必昌
1961（1752）《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清〕江日昇
1960（1704）《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清〕余文儀
1962（1762）《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清〕黃叔璥
1957（1722）《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清〕陳文達
1961（1720）《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清〕陳培桂
1963（1871）《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清〕蔣毓英
1993（1685-1689）《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清〕謝金鑾
1962（1807）《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不著撰人
1963 《臺灣縣輿圖纂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江樹生（譯註）
2000 《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2 《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3 《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2011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江樹生（主譯）、翁佳音（協譯）
2010a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1622-162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0b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I）1627-1629》。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林聖欽等
2002 《臺灣地名辭書：卷七 • 臺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施添福
1989 〈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箚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臺灣風物》，39卷3期，頁 73-82。收於氏著，《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 - 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頁 233-241。

翁佳音
2006 〈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收入《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頁 70-85。
2018 〈《諸羅縣志》所載之臺灣「早期史」評釋〉，《嘉義研究》18 期：45-73。

黃清淵（纂）
1965（1922）〈茅港尾紀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 127-140。

陳宗仁
2003 〈「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十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與變遷〉，《漢學研究》21 卷 2 期：249-279。
2016 〈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23 卷 3 期：1-42。

陳美鈴
2008 《臺灣地名辭書：卷八 • 嘉義縣（上）》。南投與嘉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嘉義縣政府。

陳國川
1996 《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八 • 新竹市》。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康培德
2009 〈荷蘭時代臺灣各港之間的貿易變遷〉，黃富三（主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頁 15-39。
2014 〈二林地區：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彰化平原與濁水溪沖積扇北半部人群的地域區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5 期：21-46。
2016 《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臺北：聯經。
2018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紀念性地名〉，《成大歷史學報》54 期：1-21。

曾品滄
2012 〈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19 卷 4 期：1-47。

張裕宏
2009 《TJ 台語白話小詞典》。臺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

簡宏逸
2012 〈從 Lamcam 到南崁：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臺灣史研究》19 卷 1 期：1-28。

鄭鵬雲、曾逢辰（纂輯）
1959（1897）《新竹縣志初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謝國興（主編）
2015 《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Blussé, Leonard,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eds.)
1995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Gravenhage: M. Nijhoff.
199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Gravenhage: M. Nijhoff.

Blussé, Leonard,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eds.)
2000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V, 1655-1662.* Gravenhage: M. Nijhoff.

Blussé, Leonard and Natalie Everts(eds.)
2000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 1636-1645.* Taipei: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Norman, Jerry Lee
1988 Chines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man, Jerry Lee and Tsu-lin Mei
1976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32: 274-301.

Sagart, Laurent
1994 "Proto-Austronesian and Old Chinese Evidence for Sino-Austronesian," *Oceanic Linguistics* 33.2: 271-308.

The Dutch langu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Japan and Maluku: a case-study in language spread

Christopher Joby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utch and South African Studies,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Poznań, Poland.

Introduction

Some accounts of language spread consider how one language competes with and overcomes one or more other languages, using narratives suggestive of Darwinism, where 'stronger', more 'progressive' languages 'spread' by displacing their less efficient 'weaker' counterparts.[1] By contras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success of the same language, Dutch, in spreading at the same point in history in three different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in East Asia, Japan and Taiwan, and Maluku (The Moluccas) in the east of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The article begins by comparing the spread of Dutch in Japan and Taiwan. As is well know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r VOC had trading posts in western Kyushu, Japan, from 1609 until 1860, and from 1624 to 1662 it colonized areas of Taiwan, both to provide a link in the chain between Batavia and Japan and in order

1 Errington, *Linguistics in a Colonial World*, p. 146.

to trade with China.[2] Although the VOC was in some sense multilingual, the Dutch language dominated the organization. One question that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swer is whether one can sustain the argument that during the VOC period in Taiwan, the Dutch language was used more in local society than it w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Japan. In trying to support this argument, the article presents four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rate and extent of language spread being greater in Taiwan than in Japan. These are, first, the lack of central government in Taiwan; second, the presence of missionaries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on the island; third, the absence of a pre-existing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LWC) or *lingua franca* in Taiwan; and fourth, the fact that in Taiwan native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seen Dutch as an H- or high-prestige language, while at this time in Japan it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L- or low prestige language.

The article then turns to Maluku. Here, two attempts to establish Dutch as the principal language among local people were not successful. After providing a brief history of these attempts, the article tries to identify which of the factors that prevented Dutch from spreading in Japan may also have played a role in its failure in Maluku. The picture that emerges is that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attempts to establish Dutch in Maluku was that there was already an LWC in these islands, namely Malay.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about Dutch in Japan comes from Dutch records. Similarly, we do not have records from this period describing the Taiwanese and Moluccan natives' point of view towards the Dutch, so what we have is from Dutch records.[3] Nevertheless, in both cases, taking into account as far as possible any bias, the article offers an interesting case study in contrastive language spread, which adds both to our knowledge of language spread in general and to the history of the Dutch language in East Asia in particular.

---

2 In fact, the VOC functioned from 1602 to 1799. Thereafter, its operations were taken over by the Dutch government. For further reading on the Dutch in Taiwan, see Groeneboer, 'Het Nederlands op Formosa', Shuichi Nara, 'Zeelandia, the Factory,' and Van Veen, 'How the Dutch Ran a Seventeenth-Century Colony'. For a nuanced account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Dutch presence in Japan and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Shogunal authorities *(bakufu)*, see Clulow, *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3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4.

Furthermore, although Japan was never a Dutch colony, Taiwan, or at least parts of it, and Maluku, were under Dutch colonial control. Therefore, what this article says about language in Taiwan and Maluku can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lonial linguistics. Several works on this subject focus on language policy. For example, Kees Groeneboer analyses th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VOC and the Dutch state in his 1993 book on the Dutch languag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4] Likewise, a recent essay by Sinfree Makoni explores language polic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Africa.[5] Another approach to colonial linguistics is to analyse the role of missionaries in language spread. This is the subject of a recent collection of essays edited by Klaus Zimmermann and Birte Kellermeier-Rehbein.[6] Other contributions to this field include Joseph Errington's *Linguistics in a colonial world: a story of language, meaning, and power* (2008), quoted above, and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state of the subject edited by Daniel Schmidt-Brücken, *Aspects of (Post)Colonial linguistics:current perspectives and new approaches* (2016).[7]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present contribution adds to this literature.

The Dutch in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brief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this section,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spread of Dutch in Taiwan and Japan. First, a brief word is in order about the presence of the Dutch in Taiwan between 1624 and 1662 and in Japan prior to 1662. In 1622 the Dutch had occupied the Penghu (Pescadores) islands, which brought them into conflict with Ming China. After a prolonged siege by Chinese warships, a deal was brokered which allowed the Dutch in 1624 to retreat

4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5 Makoni *et al*.,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anguage policies in Africa'.
6 Zimmermann and Kellermeier-Rehbein, *Colonialism and missionary linguistics*.
7 See also Drechsel, *Language contact*, which challenges Eurocentric perspectives about early colonial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eastern Pacific.

to Taiwan, which, unlike the Penghu islands, was beyond Ming territory.[8] Taiwan was inhabited by various groups of Austronesian aborigines and about 10,000 Chinese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who were mainly traders, fishermen and pirates.[9] Initially, the Dutch colonized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island, using what became Fort Zeelandia (later Fort Anping 安平古堡) as their base.[10] In 1626 the Spanish began to occupy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but in 1642 they were finally driven out by the Dutch.[11] According to one source, there were now 300 villages under Dutch control. Dutch missionaries were active in converting the aboriginal Taiwanese to Christianity and many churches were built. However, this all came to an end in 1662 after Zheng Chenggong (國姓爺) (Koxinga) (1624-1662) had laid siege to the island, with the Dutch either being killed or escaping to Batavia or the Dutch trading post at Deshima in Nagasaki Bay, Kyushu.[12] On the eve of Koxinga's attack, there were some 10,000 aborigines.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in Taiwan, the number of Chinese had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s a result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on the mainlan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13] By 1661 there were 34,000 Chinese on Taiwan.[14] As the author only has access to data concerning the spread of Dutch among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this is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article. However, if possible, it would be of value in future research to identify and interpret sources which might inform us if and to what extent Dutch spread amongs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in Taiwan.

As for Japan, the first Dutch ship, the *Liefde*, reached Kyushu in 1600. In 1609 the Tokugawa Shogunate (1603-1868) authorized the Dutch to trade with Japan through

8 Clulow, 'Commemorating Failure', p. 222;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6; see also Van Dyke, 'The Anglo-Dutch Fleet'.

9 For a summary in English of ethn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Austronesians on Taiwan, see Borao Mateo, *The Spanish Experience*, p. 53. See also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39.

10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42, n. 188.

11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p. 6, 17-18.

12 The Dutch did try to recapture Taiwan and occupied Chi-lung in Northern Taiwan in 1664. However, these efforts were not successful and the Dutch were finally expelled from Taiwan in 1668. Wills, 'The Dutch Reoccupation of Chi-lung'. Deshima is sometimes transcribed as 'Dejima'.

13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17.

14 Shōzō Fujii,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p. 64.

Hirado in western Kyushu.[15] Between 1609 and 1640, 221 Dutch vessels arrived at Hirado under the VOC flag.[16] In early 1641 the Dutch finally left Hirado for the artificial island of Deshima in Nagasaki Bay.[17] This had been built for Portuguese merchants, but became vacant when the Portuguese were expelled in 1639 over concerns about proselytization. About seven VOC ships a year arrived at Deshim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discussion. The only time that the Dutch moved beyond western Kyushu was on the *hofreis* (lit. 'court journey') an annual journey to Edo (modern day Tokyo) to pay homage to the Shogun, by whose grace they were in Japan. By 1662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Dutch beyond the trading posts in western Kyushu and Edo.

Factors influencing language spread

The article now consider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read of Dutch in Taiwan and Japan, beginning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Central government

On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Japan was that whereas in Japan there was a strong central authority, this was not the case in Taiwan.[18] As it lay outside Ming jurisdiction, the Dutch were able to expand their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of Taiwan fairly quickly after 1624.[19] In this regard, Blussé writes that the missionaries 'provoked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to extending its jurisdiction over heathen villages so that their missionary field might be expanded'.[20] One other

15 The trade permit (*handelspas*) given to the Dutch is now held in the *Nationaal Archief* The Hague (NA), MS. 1.04.21–1A1.

16 De Lange, *Pars Japonica*, p. 244.

17 The last entry in the Hirado *dagregister* is dated 3 February 1641. *Diaries Kept by the Heads*, IV, p. vii. The final Dutch ship left Hirado on 10 February 1641. De Lange, *Pars Japonica*, p. 221.

18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8.

19 Clulow, 'Commemorating Failure', p. 222.

20 Blussé, 'Retribution and Remorse', p. 158.

consequence of the lack of central government was that when the VOC decided to implement a Dutch language policy there was no local administration to oppose this in Taiwan.

As for Japan, we need to consider two phases, first the period from 1609 to 1640 when the Dutch traded through Hirado, and second the period after 1640 when they traded through Deshima. Hirado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local feudal lord or *daimyō* of Hirado, initially Matsura Shigenobu (1549-1614) and subsequently other members of the Matsura clan. The *daimyō*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independence from the Shoguns in distant Edo. It seems that the Dutch were relatively free to move around Hirado, and indeed the Hirado *dagregister* or journal records that senior VOC employees were on occasion in Nagasaki prior to 1640, probably for the purpose of doing business there.[21] However, it is likely that the Dutch spent most of their time in or near Hirado, s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could come into contact with Japanese would have been limited.

One reason that the Dutch trading post was moved from Hirado to Deshima was that the Shogun wanted to bring its activities under his control. In contrast to Hirado, Nagasaki wa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or (*bugyō*), who was directly answerable to the Shogun.[22] Access from Deshima to Nagasaki was controlled by a gate, guarded by Japanese, and so the movement of the Dutch beyond Deshima was strictly controlled. Furthermore, as with Hirado, Nagasaki is on the island of Kyushu, in the extreme west of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During both the Hirado and Deshima periods, the *hofreis* to Edo gave rise to very limited language contact as the VOC representatives and their Japanese assistants moved through towns such as Osaka and Kyoto.[23] However, in the period under discussion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real opportunity for the Dutch to pass on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language to local people.

21 *Diaries Kept by the Heads*, I, pp. 13; 16-17.

22 There were typically two *bugyō*, one in Nagasaki and the other in Edo.

23 Where there is a standard form of a Japanese word or toponym in English, such as Kyushu, this article does not use macrons.

Finally, a word is in order about language policy. Boxer claims that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ese scholars were prohibited from learning Dutch.[24] He also notes that after about 1636 the Dutch were not permitted to learn Japanese.[25] However, there is evidence that members of each group did learn the other language. For example in the *dagregister* for 1641, the *botteliersmaet* ('steward's assistant') Hicke Essert was said to have quite a good command of Japanese (*redelijcke ervarentheijt in de Japansche tale*).[26] Nevertheless,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overall number of these individuals was probably quite small.[27]

Missionary language

The second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was that whereas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was able to undertake significant missionary activity in Taiwan, there was almost no such activity in Japan.

The VOC did not want there to be proselytization in Taiwan lest it upset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However, the first ordained minister in Taiwan, George Candidius (1597-1647), who arrived in 1627, had other ideas and set about doing exactly that.[28] In relation to language in broad terms we can identify two phases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in Taiwan. In the first phase, from the late 1620s to the late 1640s, the emphasis was on the Dutch learning native languages and using those to proselytize native people.

Ann Heylen observes that in line with European Renaissance thought, Candidius believed that instructing the aboriginal people to read and write would promote Godliness. He therefore encouraged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to arrange for a

24 Boxer, *Jan Compagnie*, p. 12.
25 Boxer, *Jan Compagnie*, p. 59. See also De Groot, *The Study of the Dutch Language*, p. 2; Joby,'Recording the History', p. 221.
26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 botteliersmaet.*
27 *Diaries Kept by the Heads*, V, p. 195.
28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7.

continual succession of ministers to learn the Sinkan language.[29] His successor, Robert Junius (1606-1655), who arrived in Taiwan in 1629 and left in 1643, learnt this language and compiled a catechism in it.[30] By 1638 in the schools established by the Dutch, there were 400 registered students learning doctrine in the Sinkan language written in Roman letters.[31] Although this did not do much for the spread of Dutch, what it did do was to familiarize native people with the Roman alphabet, preparing them for the second phase of this story, in which there was a shift towards teaching them Dutch.[32]

This shift was in large part driven by the change in VOC language policy, mentioned above. In the early 1640s the VOC encouraged the teaching of Dutch to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areas of South and East Asia that it controlled.[33] In Taiwan the VOC's primary concern was not mission but securing a base for its trade with China and Japan. In 1643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he VOC in Batavia wrote to the Dutch Governor in Taiwan saying that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local people adopted Dutch.[34]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February 1648 that Dutch was officially introduced in schools in Taiwan.[35] From this time onwards there was an increased use of Dutch alongside the native tongues. The school day would be divided so that instruction was given in the 'Formosan language', i.e., Sinkan, in the morning and Dutch in the afternoon.[36] Bilingual works were produced, such as the catechism, *Leerstukken Ten gebruikke der schoolen van 't Favorlang district*, completed in 1650, which had parallel

29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p. 8-9.
30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p. 11-14.
31 Shōzō Fujii,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p. 64.
32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13.
33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26;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p. 199.
34 Groeneboer, Gateway to the West, p. 48.
35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27. See also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II, p. 188.
36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36.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42, 307-308. The minute-book of the Taiwan consistory records that a version of a book by Joannes Amos Comenius (1589-1670), *Deurre off Portaal der Taalen*, was used for teaching the Dutch language in the afternoon.

texts in Dutch and the indigenous Favorlang tongue.[37] Dutch books were imported and a process of *Hollandiseering* or 'Dutchification' of Taiwan got underway. Further bilingual materials were produced as the Dutch missionaries continued to study and transcribe the principal native languages.[38]

In 1648 the Governor, Pieter Overtwater (1647-1650), reported that the native people seemed happy to adopt the Dutch language. In November 1648 the church consistory reported that the experiment to teach Dutch to local people was having great success.[39] Local people 'were very much inclined to learn Dutch' and were able to do so with relative ease.

By 1656, of 10,109 aborigines, about 6,000 understood Christian teachings, while nearly 2,800, over a quarter, understood more than simple prayers in Dutch. In 1657 a seminary was established to educate thirty indigenous seminarians.[40] It seems therefore that there was both bilingualism and *diglossia*, i.e., Dutch was used in certain social domains such as education and religion, while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continued to be used in other domains such as the home.[41]

The numbers quoted might have been higher but for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forces at work which probably slowed down the spread of Dutch. First, while some in the church in Taiwan were keen to promote Dutch, others wanted to use native languages.[42] The main argument against the use of Dutch was that it would slow down the process

37 Trans.'Tenets of the Faith for use in schools in the Favorlang district'. Heylen,'Dutch Language Policy,'p. 24. This included the Lord's Prayer, the Articles of Faith,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other prayers.

38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p. 28-29. See also Campbell (ed.),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and Campbell (ed.),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39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32, 242.

40 Shōzō Fujii,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p. 64. Fujii takes his figures from Taiwan wenxian weiyuanhui, *Chongxiu Taiwansheng*, pp. 3-17.

41 *Diglossia* is a somewhat contested term. I use it here in same manner as Joshua Fishman, to describe the use of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by the same speaker in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Burke, 'Diglossi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 14. See also Romaine, *Language in Society*, p. 51.

42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301.

of Christianization.[43] Second, in 1650 the Dutch consistory in Taiwan made a request to Batavia for a printing press. But this request was never granted, in part because it was feared that it might give the operation in Taiwan too much independence.[44] Furthermore, after much deliberation it was eventually decided only to teach Dutch to younger natives, and not to older ones.[45]

It is likely that the use of both Dutch and native languages was seen by some as a transitional phase towards a fuller adoption of Dutch. As Molewijk observes, 'If the planners had been able to realize all their dreams, Formosa might have become a Calvinistic, Dutch-speaking island'.[46] However, these dreams were of course not realized as a result of the attack by Koxinga in 1662. But, that is not quite the end of the story of Dutch in Taiwan. It is reckoned that the shift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typically takes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The fact that the Dutch were in Taiwan for less than forty years means that their language simply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take root as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n the island. However, there are reports by French Jesuits in Taiwan of natives being able to speak and read Dutch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some sixty years after the Dutch left the island.[47]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when a language serves important religious functions it may stand a better chance of survival.[48]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association of Dutch with religion in Taiwan may have helped it to persist alongside native languages for many years after the Dutch

43 Groeneboer, *Gateway to the West*, p. 49.

44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p. 32-33;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59-261.

45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35; Groeneboer, *Gateway to the West*, p. 49;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32, 301, 305, 306.

46 Molewijk (ed.),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p. 18. Quoted in Groeneboer, *Gateway to the West*, p. 51.

47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42, records the visits of the French Jesuits, Father de Mailla in 1715 and Jean-Baptiste du Halde in 1720.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p. 200, records that French Jesuit priests found that some native Taiwanese spoke and read Dutch in 1714.

48 Romaine, *Language in Society*, p. 54.

themselves had left the island.[49] Finally, Dutch words were adopted by local linguistic varieties including the Minnan (Chinese) dialect and the Paiwanese language.[50]

In Japan,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different. By 1609 when the Dutch began to trade at Hirado, there was already antipathy towards Christianity, although this was in particular towards Catholicism. Here, a brief word is in order about the background to this state of affairs.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Japan began in earnest in 1549 with the arrival of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in Kagoshima on Kyushu. By 1591 the proselytizing activities of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particular by religious orders such as the Jesuits and Franciscans, populated principally by Portuguese, Spanish and Italians, had resulted in there being some 200,000 Japanese Christian converts.[51] However, some Japanese leaders were becoming concerned that the missionaries were merely the vanguard of a full-scale invasion of Japan by Portugal and Spain. Therefore, in 1587 the warlord and unifier of Japan, Toyotomi Hideyoshi (1537-1598), promulgated an edict expelling the missionaries. In 1596 he crucified 26 missionaries and Japanese converts.[52] Although official resistance to Christian mission lessened after Toyotomi's death in 1598, in 1614 the Tokugawa Shogunate moved to expel all missionaries. There were further persecutions of missionaries and Japanese converts and finally, in 1639, in the wake of

49 The Jesuit priests who visited Taiwan recorded that some Taiwanese had fragments of 'our five books' in Dutch. This may be a reference to the Pentateuch. If so, it would underline the close link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Dutch language in Taiwan.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p. 200. One other possible reason for the persistence of Dutch among aboriginal Taiwanese is that it distinguished them from the Chinese who colonized the island.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would be required before anything more definitive could be said on this matter.

50 Hsin-Hui Chiu, 'Colonial Linguistic Phenomena'. This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read of Dutch in Taiwan.

51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p. 148.

52 Yoshimi Orii, 'The Dispersion', p. 192. Hideyoshi's attitude to Christianity did, however, vary over time. In 1591 he reportedly wore a rosary and Portuguese dress. Furthermore, a letter from Padre Pasio in 1594 indicates that some of Hideyoshi's retainers learnt the *Pater Noster and Ave Maria* litanies by heart.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pp. 153, 207. For more on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see also Elison, *Deus Destroyed*.

the Shimabara Rebellion that broke out on Kyushu in 1637, all Portuguese including traders were expelled from Japan.

As for the Dut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ligious activities at Hirado is limited as no *dagregister* was kept at the trading post prior to 1633.[53] However, one reference to the Dutch in July 1617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trading post at Hirado, Richard Cocks (1613-1623), suggests that by no means all the Dutch took their religious duties seriously. Cocks received a visit from the Dutch preacher of 'thadmerall ship', who had in fact been born in England, and wrote 'Yt seemeth [the Dutch preacher] is awery of being amongst these Hollandrs, whom he sayeth have littell respect to religion'.[54] Other Dutch, though, did practise their Reformed faith. In 1640 a Japanes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utch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 found that they had been 'openly celebrating the seventh day' at Hirado. Furthermore, the investigation had found that 'through this [the Dutch] had converted some people'. The *opperhoofd* François Caron was very apologetic.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removal of the Dutch from Hirado to Deshima was the Japanese objection to the dates on the façades of the Dutch houses at Hirado, which were from the Christian era.[55] Although this may be taken to illustrate how fiercely the Japanese opposed Christianity, it seems likely that this was at least in part an excuse to force the Dutch to remove to Deshima, where, as noted above, they would be under the watchful eye of the *bugyō* and taxes collected from them would go the shogun and not to a local *daimyō*. At Deshima, the Dutch struck a secret deal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at they could only trade with Japan if they did nothing to promot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erefore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any further proselytizing activity.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is that there were no missionaries in Japan to

53 There are, however, letters in manuscript to and from the Dutch trading post (*factorij*) at Hirado. Cynthia Viallé is currently compiling an edition of this correspondence.

54 Cocks, *Diary kept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p. 130.

55 Hesselink, 'A Dutch New Year', p. 197. De Lange, *Pars Japonica*, p. 221, records that it was the display of the date of completion of a new building at Hirado, 9 November 1640, i.e., in the Christian era, that caused offence to the Japanese.

promulgate Dutch or produce learning materials for Japanese to learn Dutch. One of the first VOC employees to produce materials in Japanese was in fact a German, the physician 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He produced a German-Japanese wordlist during his time in Japan (1690-1692). This was, however, not for religious reasons, but for scientific purposes, both to study Japanese and to help him engage with the Japanese in his research on the flora and fauna of Japan.[56]

All this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the Dutch at Deshima ceased practising their Reformed faith, merely that they had to do so privately.[57] The Dutch agreed not to import any Christian books or other materials and Japanese officials inspected cargoes when boats arrived.[58]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bibles and other religious works were brought onto Deshima, not least because the inspectors could not read Dutch.[59] Furthermore, some Japanese managed to obtain Dutch bibles and other material with reference to Christianity.[60] A rare reference to religious observance at Deshima comes in an entry in the *dagregister* dated 4 April 1649: *Paasdach, passeerden in alle stillicheydt* ('Easter Day, we spent it very quietly').[61] Nevertheless, there was clearly no inten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utch to undertake any proselytization of the Japanese in the manner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56 Michel, 'Engelbert Kämpfers Beschäftigung mit der japanischen Sprache', esp. pp. 204-208

57 The Dutch held Reformed services at Deshima. Mochizuki, *The Netherlandish Image after Iconoclasm, 1566-1672*, p. 319.

58 Vermeulen et al., *The Deshima dagregisters*, XI, pp. 23, 72, 106.

59 Boot,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p. 196. It is likely that the Dutch sealed the books in a barrel which was then brought ashore. Such books would necessarily remain for private use.

60 The *daimyō* of Hirado, Matsura Seizan (1760-1841), owned several books which made explicit reference to Christianity including a Bible commentary. Boot,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p. 199.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Dutch bible in the library of Yamagata Shigeyoshi in Osaka. Kiyoshi Matsuda, *Yōgaku no shoshiteki kenkyū*, p. 373.

61 Vermeulen et al., *The Deshima dagregisters*, XI, p. 128.

Language competition

The third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is that whereas in Japan Dutch faced competition from other languages, this was not the case to any great degree in Taiwan. In particular there was no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LWC) in Taiwan. Elsewhere in East Asia two LWCs were typically in use, Malay and Portuguese, both of which had high and low or creolized forms.[62] However, neither of these was used as an LWC in Taiwan prior to the Dutch arrival in 1624.[63] In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briefly controlled by the Spanish, some natives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indeed speak Castilian. However, Catholic missionaries had learnt native languages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Castilian had presented significant competition to the spread of Dutch after 1642.[64]

Again, the situation in Japan was quite different. The Japanese already had a unifying language, namely Japanese, although there were of course different dialects. The Portuguese had been in Japan for half a century by the time that the Dutch arrived and their language had clearly become the principal LWC by which the Japanese communicated via interpreters with Europeans including the Dutch.[65] The Englishman, Richard Cocks, mentioned above, and the Hirado *dagregisters* from 1633 onwards record that many Japanese spoke and wrote Portuguese with great fluency. Boxer observes that most Dutch ships carried an interpreter or teacher of Portuguese on board and that a knowledge of Portuguese, or indeed Castilian Spanish, was a *sine qua non* for those in charge of the Dutch trading post at Hirado.[66] There were exceptions. The boatswain of the *Liefde*, the first Dutch ship to arrive in Japan, Jan Cousynen, had been forced to

62 Groeneboer, *Gateway to the West*, p. 25. Fo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pread of Portuguese in South and East Asia, the emergence of Low or Creole Portuguese and language contact with Malay and Arabic, along with further literature on this subject, see Le Page and Tabouret-Keller, *Acts of identity*, pp. 23-32.

63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p. 26-27.

64 Heylen, 'Dutch Language Policy,' p. 27; Borao Mateo, *The Spanish Experience*, p. 80.

65 For example, one entry in the Hirado *dagregister* for 1637 records that a Japanese knew both Portuguese and Tonkinese. *Diaries Kept by the Heads*, I, p. 229.

66 Boxer, *Jan Compagnie*, p. 59.

remain there. He developed a good command of Japanese and so was employed by the VOC as the first Dutch-Japanese interpreter for twenty guilders a month.[67]

Shortly after the move to Deshima, the VOC was forbidden from employing their own interpreters and so only local Japanese interpreters could be used. Although the Portuguese themselves were expelled in 1639, their language persisted and it continued to be use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Dutch and Japanese via interpreters. Some Dutch knew Portuguese. An entry in the Deshima *dagregister* in 1641 tells us that the assistant (*assistent*) Lourens van Swaenswijck was noted for his experience in Portuguese (*sijn ervarentheijt in de Portugeesche tale*).[68] However, it is likely that they predominantly relied, or were forced to rely, on local interpreters. For example, the *dagregister* for July 1641 mentions three Portuguese interpreters who presented themselves to the Dutch at Deshima, and the *dagregister* for the following month mentions another eighty interpreters who had previously worked for the Portuguese in Nagasaki.[69] In June 1644, the *dagregister* records that interpreters were 'doing their utmost to have their sons learn to speak and write the Portuguese language, so that when their fathers die, their sons may replace them'.[70]

Indeed it was not until 1673 that the first official efforts were made by the Governor of Nagasaki to teach interpreters Dutch.[71] For several decades thereafter, the use of Portuguese persisted. As late as 1695, one interpreter, Imamura Gen'emon (1671-1736), who had been an assistant to the physician Engelbert Kaempfer, took an examination in both Dutch and Portuguese.[72]

---

67 De Lange, *Pars Japonica*, pp. 211, 215. An entry in the Hirado *dagregister* for April 1637 refers to *dien Hollander die Japan spreecken can*. No name is given, so this may be reference to Cousynen or another Dutchman. *Diaries Kept by the Heads*, I, p. 270.

68 *Diaries Kept by the Heads*, V, p. 195.

69 *Diaries Kept by the Heads*, V, pp. 103, 128.

70 Vermeulen et al., *The Deshima dagregisters*, XI, p. 162.

71 De Groot, *The Study of the Dutch Language*, p. 24.

72 Joby, 'Dutch in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 p. 11.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thing of a mixed Portuguese and Dutch language emerged as interpreters moved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We see hints of this in surviving wordlists from this period. During the *hofreis* in 1650, the interpreters of the German-born physician Caspar Schamberger (1623-1706) produced a word list for those medical students in Edo whom Schamberger taught. The list consisted of mixed Dutch and Portuguese words written in the Japanese syllabary *katakana*.[73] Other wordlists from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called *kuchi* also contain a mixture of Dutch and Portuguese words.[74] A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mixing of Dutch and Portuguese is that at this time, the Japanese considered Dutch and Portuguese to be two dialects of the same (general European) language.[75] However, we cannot currently make any stronger claims about a mixed Portuguese/Dutch language variety.

But it was not only the interpreters who knew Portuguese. In the 1640s and 1650s the Dutch had many dealings with Inoue Masashige (1585-1662), who had oversight of their activities in Nagasaki.[76] He possessed a Portuguese-Japanese dictionary, *Dictionario da Lingoa de Japam*, which had been compiled by the Jesuits and printed in Nagasaki in 1603.[77] Furthermore, in 1653 he asked whether any of the Dutch at Deshima could translate Rembert Dodoens' *Cruydt-boeck*,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554, from Dutch into Portuguese. The *opperhoofd* Frederick Coyett told him very politely that no-one amongst them was able to do this.[78] In 1652 another Japanese Andō Ukyō ordered two books from the Dutch, one on anatomy and the other on botany, both to be 'illustrated and in Portuguese'.[79]

73 De Groot, *The Study of the Dutch Language*, pp. 25-26.
74 De Groot, *The Study of the Dutch Language*, pp. 48-49.
75 De Groot, *The Study of the Dutch Language*, p. 26.
76 For more on Inoue, see Blussé, 'The grand inquisitor'. His title in Japanese was *Shūmon aratame no Yaku* ('Inspector of Religions'). Laver, *The Sakoku Edicts*, p. 65.
77 Vande Wall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p. 130.
78 Vermeulen et al., *The Deshima dagregisters*, XII, p. 95.
79 Vande Wall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p 130.

Language status

One probable reason why Portuguese persisted as an LWC in Japan after the Portuguese had been expelled was that it is likely to have enjoyed a higher status there than Dutch. Again, this contrasts with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Portuguese had been brought to Japan by traders, but also by mainly Jesuit missionaries. What I want to argue is that the fact that Portuguese was associated with religion, which often affords a high status to a language, meant that Portuguese had a certain prestige among at least some Japanese.[80] This prestige was enhanced by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published by the Jesuits, such as the *Dictionario da Lingoa de Japam*, mentioned above, and a Latin, Japanese and Portuguese dictionary, based on the polyglot dictionary of Calepino, printed at Amakusa on Kyushu in 1595.

By contrast, for the Japanese Dutch was a language of traders. Therefore, it had none of the prestige that attached to Portuguese as a result of its close association with religion. Furthermore, merchants were at the bottom of Japanese society, very much shaped by Neo-Confucianism.[81]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Dutch and Japanese was further restricted by the fact that many interpreters were samurai, who belonged to the upper echelons of society. It was therefore socially problematic for them to learn Dutch from 'mere' merchants.

In the next century, the status of Dutch began to increase in certain quarters as some of the more able Nagasaki interpreters and Edo scholars realized the value of the learning in Dutch books and the knowledge of Dutch surgeons and physicians. There were already hints of this in our period. In 1650/1, the physician Caspar Schamberger healed Inaba Masanori (1623-1696), *daimyō* of Odawara and member of the Shogun's court, who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gout. This led the Japanese to realize that they had something to learn from him, particularly as court physicians trained in Chinese

80 Boxer, *Jan Compagnie*, pp. 58-59; Romaine, *Language in Society*, p. 54.
81 De Groot, *The Study of the Dutch Language*, pp. 25-27.

medicine had been unable to cure Inaba.[82] However, as already noted, the extent to which Schamberger used Dutch in Edo is not clear.[83] More promising is a manuscript completed in 1654 entitled *Kōmōryū geka hiyō* ('Secrets of Red-Haired Medicine'), 'red-haired' because the Japanese considered the Dutch to be red-haired. This was based on the oral teachings of a Dutch surgeon,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by Nagasaki interpreters and transcribed by Mukai Genshō (1609-1677).[84]

The oral teachings of other Dutch surgeons were also written down at around this time. For example in 1661 the *Arumansu hō sho* ('Document on the lessons of Herman') was written by Ryōan Kawaguchi. This was one of the manuscripts based on the lessons of Herman Katz, the Dutch chief surgeon at Deshima 1660-1662.[85] These manuscripts were reports that were compiled for the Governor of Nasagaki (*bugyō*) or the shogunal administration (*bakufu*). Parts of them were incorporated in early printed material such as *Oranda geka shinan* ('Compass for Dutch surgery'). In the course of the next few decades several other works were produced in Japanese, based on Dutch medicine.[86] These facts mean that over time the status of Dutch gradually increased. However, for most of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it would have had a relatively low status.

In Taiwan, by contrast, the fact that Dutch was the language of the intruding power, which often considers itself to be superior to those already in a territory, may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e rapid promulgation of the Dutch language. Furthermore, although som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favoured using local languages in engaging with aboriginal Taiwanese, in the latter years of the Dutch colonization, there

82 Joby, 'Dutch in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 p. 15.

83 De Groot, *The Study of the Dutch Language*, pp. 25-26.

84 Mukai's work reached a wider audience when in 1670 Yamawaki Dōen included parts of it in his work *Oranda geka ryōhō* ('Good formulas of Dutch surgery'). As a consequence, Mukai would come to dominate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 Japan for the next one hundred years. Michel, 'On Early Red-head-style External Medicine', p. 385.

85 Mestler, 'A Galaxy of Old Japanese Medical Books', p. 148. For the dates of the *opperhoofden* and chief surgeons at Hirado and Deshima, visit http://wolfgangmichel.web.fc2.com/serv/histmed/dejimasurgeons.html. Consulted 23 September 2018.

86 Clements, *A Cultural History*, p. 155; Joby, 'Dutch in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 p. 14.

was clearly a close link betwee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spread of Dutch in schools and churches. So, it is likely that for the aboriginal people, Dutch was in some sense seen as a language of religion. When the Dutch arrived in Taiwan there were shamanistic ritual practices.[87] However,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 hieratic language variety, which might have provided competition with Dutch in the domain of religion.[88]

Another case: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So far, this article has considered the factors that are likely to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e relative succes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utch language in Taiwan over against the relative failure of the language to make any ground beyond the Dutch trading posts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the capital city Edo in Japan prior to 1662, when the Dutch were forced to leave Taiwan. Before concluding 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Dutch language in another area of East Asia were successful or not and to determine what the factors were in its fate.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discussion the VOC was active in other areas of East Asia.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period it began to operate on the island of Ceylon, now Sri Lanka (1656). In the East Indies, it established its principal trading post at Batavia, now Jakarta, and began to increase its activities on the island of Java. However, it may be instructive to consider Maluku (The Moluccas) and surrounding islands in the east of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where the Dutch developed the lucrative spice trade.

In what follows, a brief history of attempts to introduce Dutch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will be provided. This is largely based on the work of Kees Groeneboer.[89] He in turn draws on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Dutch in Maluku by the Reformed church minister François Valentijn (1666-1727), who served in Ambon, the

87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pp. 161-168.

88 An example of this happening is that after the Arab invasion of Egyp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Coptic persisted as a hieratic language. Brenzinger, 'Language Contact', pp. 279, 282-283.

89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This is based on Groeneboer, *Weg tot het Westen*, Chapter II.2.1, availabl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Gateway to the West*.

centre of VOC activities in the Maluku archipelago in 1685-1698 and 1707-1713, and VOC documents such as correspondence from Maluku.[90]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role played by the four factors discussed above, i.e. the presence of a central authority, Dutch missionary activity, whether or not Dutch faced language competition and language status.

We can begin by saying that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relatively little in the way of a central authority on Maluku when the Dutch arrived, or at least certainly not a strong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type that it encountered in Japan under the shoguns. Maluku was originally populated by aboriginal people practising animistic religions, in some sense similar to Taiwan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Dutch. Arab traders had arrive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bringing with them their religion, Islam. The Portuguese arrived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is century seems to have been marked by a struggle for dominance between the Portuguese and local Sultans. It was perhaps this lack of a dominant authority that made it easier for the Dutch to take Ambon from the Portuguese in 1605, establishing a fort there, which would function as the centre of their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Maluku and the surrounding islands.

As in the case of Taiwan, Dutch missionaries attempted to convert the local population to Reformed Christianity. However, in Maluku they faced competition from Muslim missionaries. As for language competition, the language landscape of Maluku was quite complex before and during the Dutch presence there. Besides local Austronesian dialects, both Portuguese and Malay were used as languages of wider communication on Maluku and the surrounding islands. In both cases, it seems to have been low or creolized varieties of these languages that were used by local people. As for language status,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each of the three principal competing languages, Malay, Portuguese and Dutch, was brought to Maluku by traders and by missionaries, of Islam, Catholicism and Reformed Protestantism respectively. So,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judge whether the status of each language played a role in their respective destinies in Maluku.

90 Valentijn, *Omstandig Verhaal*, III, pp. 2-35 and pp. 35-44.

The Dutch made two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ir language to local people in Maluku.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Portuguese had clearly had some success in spreading their language among local people in Maluku, albeit the low variety of their language. In 1607, two years after taking Ambon, the Dutch established a school there. An early attempt at educating local people in Dutch was to teach them the Lord's Prayer,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the Articles of Faith in both Dutch and Malay. Further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and learning materials such as *Sourat ABC* (1611, Amsterdam), a book aimed at teaching the Dutch alphabet, and its sequel *Spieghel van de Maleysche tale* ('Mirror of the Malay language') (1612, Amsterdam), were introduced.[91] However, as Groeneboer notes, the principal aim of these learners was not so much to teach the Dutch language, although this was a secondary aim, but to enable the Dutch to convert local people and educate them in the Christian faith. However, these first attempts to teach Dutch in schools in Maluku do not seem to have been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In 1615, a Dutch minister Caspar Wiltens arrived in Ambon. He saw that there was much resistance to learning Dutch in part because local people considered it to be a difficult language. Furthermore, it was apparent that Dutch soldiers were using Malay when speaking with local people. Wiltens therefor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s his principal aim was religious rather than linguistic, it would be more profitable for Malay rather than Dutch to be used at school and in the church.[92]

A second attempt to introduce Dutch was made by another minister who arrived in Ambon, Sebastiaan Danckaerts (1618-1622). He was supported in his efforts to use Dutch in Maluku by Herman van Speult, the VOC's governor of Ambon (1618-1624), who considered the Malay spoken on Ambon too poor for the pr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here were in fact plans to abolish Malay, not least because it was the language in which Islam was being promulgated. However, it seems that such plans

91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p. 2; 'Pages from Sourat *ABC* (1611)'; Ruyl, *Sourat ABC*; Ruyl, *Spieghel van de Maleysche tale*. See also Yudha Thianto, *The Way to Heaven*, esp. pp. 24-36.

92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p. 3.

were never realized. Despite Van Speult's ambitions for Dutch, for Danckaerts the spread of Dutch was secondary to the spreading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o this end, it is likely that Malay was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on Ambon, with the aim of teaching Dutch through Malay, in order that the local people would eventually be able to hear the gospel in Dutch. By 1631, in the 34 schools on Ambon and the surrounding islands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was still Malay, with pupils at only a few schools being able to read and say their prayers in Dutch. In 1633 the minister Helmichius Helmichszoon (1630-1634) pleaded for the use of an indigenous languag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but in 1634 it was decided to use Malay and an indigenous language for instruction in schools. The use of Dutch among local people continued to decline and by 1660 it is reckoned that no children on Ambon knew Dutch. Finally, in 1665 the VOC administration in Batavia decided that it would no longer encourage the use of Dutch in Maluku.[93]

Dutch did, for obvious reasons, continue to be used by VOC officials and soldiers in Maluku, as well as a few Christianized indigenous people who had dealings with the VOC. However, for most indigenous people, it was Ambonese Malay, rather than Dutch, that was the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94]

Placing these details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this article, we shall briefly compare the fate of Dutch in Maluku with that in Taiwan to see why it was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ormer than in the latter. In common with Taiwan and in contrast with Japan,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little in the way of a strong central authority in Maluku. Furthermore, as in the case of Taiwan, Dutch missionar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ying to spread the Dutch language. However, in contrast to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in common with Japan, there were already languages of wider communication in use in Maluku when the Dutch arrived. Although they succeeded in displacing one of these LWCs, Portuguese, it was another one, Malay, which final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the principal LWC in

93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pp. 4-6.
94 Groeneboer,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p. 9.

Maluku. In part, this may have been due to the use of Malay by the Dutch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schools. Furthermore, the use of Malay by Muslim missionaries is likely to have been a factor in its spread as an LWC. As for language status, as already noted,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at role, if any, this may have played in the eventual success of Malay over Dutch. One final point in this regard is that local people seem to have considered Dutch a more difficult language to learn than Malay. In very broad term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certain aspects of the syntax and accidence of Malay are somewhat more straightforward than those of Dutch. However, further investigation would be required before anything more definitive could be said on this matter.

The failure of Dutch to become an LWC in Maluku can be seen as a failure of the VOC language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or of Ambon, Herman van Speult. The VOC had hoped to use Dutch as a means of 'Dutchifying' Maluku and binding local people to it with a common language. In part this failure stems from the differing objectives of the VOC and Dutch missionaries. For the VOC the priority was trade and it saw Dutch as an instrument by which it could create a solidarity between itself and the local people with whom it traded. For the missionaries, the main objective was proselytization. Dutch was a useful instrument with which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but if they could achieve it by using another language, then they were willing to do so. In this regard, the Dutch were in fact quite successful, for Maluku became one of the few areas of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to become significantly Christianized, and it remains so to the present day. For example, in the 2010 census 58% of the population of Ambon was Protestant, compared with 39% Muslim and 2% Catholic.

Finally, although the Dutch language itself only flourished amongst local people for a few decad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utch loanwords are used in Ambonese Malay, as they are in other varieties of Malay, such as Manado Malay and Bahasa Indonesia.[95]

95 For Ambonese Malay, see N. van der Sijs, *Nederlandse woorden wereldwijd*, pp. 47-8, and for Manado Malay, see J. Prentice, 'Manado Malay'

Conclusion

Let us draw conclusions in two stages; first concerning the comparison of the spread of Dutch in Taiwan and Japan and then considering what more we learn about language spread from the case of Dutch in Maluku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irst, for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i.e., upto 1662,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Dutch in local society in Japan. By contrast, by this time Dutch had made significant inroads among the native population in Taiwan. This article tried to identify the reasons for the contrasting fortunes of the same language in these two geo-social domains in East Asia. It argued that a lack of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itially in spreading literacy and later in propagating Dutch, and the lack of a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prior to 1624, are al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Dutch on the island.

Second, the article considered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spread of Dutch in Maluku in order to see if we could identify whether any of these factors was determinative in the failure of Dutch to become a *lingua franca* among indigenous people in Maluku. In this regard, the one factor that Maluku had in common with Japan, where Dutch also failed to spread in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was that there was a pre-existing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In fact, there were two of them, Portuguese and Malay. However, whereas the Dutch managed to reduce the use of Portuguese in this part of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they failed to replace Malay as a principal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For the Dutch missionaries at least this was a pragmatic decisio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ir principal objective was not the spread of Dutch, bu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hristian gospel.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hope was expressed that this essay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n colonial linguistics. In this regard, I would argue that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concerning Dutch in Taiwan. Given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pre-existing languages of wider communication as a factor in the spread of Dutch, this essay also

offers something to the literature on that subject.[96] In this regard, if we want to seek further evidence for the importance of an existing LWC for the failure of Dutch to spread in other parts of South and East Asia, apart from Japan and Maluku, where they traded, it would be instructive to look at Ceylon or Sri Lanka, much of which was under VOC control between 1656 and 1796. Groeneboer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Dutch were on the island for some 140 years, the VOC policy of making Dutch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Ceylon largely failed. As in the case of Japan and indeed Maluku, the Portuguese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their language as an LWC in Ceylon prior to 1656.[97] Whether any of the other factors discussed above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failure of Dutch to become an LWC in Ceylon would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make any definitive statements about the failure of Dutch to become an LWC in several areas where they traded,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each case would be required. Any conclusions drawn could then be used to contribute to broader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a language spreads in a new environment. However, from the material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it does seem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the pre-existence of a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may contribute to the failure of an incoming language to spread. The pre-existing use of Portuguese and Malay in areas of East Asia where the Dutch traded and established settlements and colonies may be one of the principal reasons why, despite the extensive activities of the VOC, Dutch did not become a world language.

96 See for example, chapters 15-19 (Part III) of Maurais & Morris (eds.), *Languag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G. Leitner *et al.* (eds.), *Communicating with Asia: the future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and on Bahasa Indonesian as an LWC. H. Abas, *Indonesian as a unifying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97 Groeneboer, *Gateway to the West*, pp. 51-58.

Bibliography

1884-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IV vols.* Utrecht: C. van Bentum.

1974 *Diaries Kept by the Heads of the Dutch Factory in Japan = Dagregisters gehouden bij de opperhoofden van de Nederlandsche factorij in Japan, 11 vols.* Toky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1994 'Pages from Sourat *ABC* (1611)'*Cakalele, Maluku Research Journal Majalah Penelitian Maluku*, 5, p. iii ff.

H. Abas

1987 *Indonesian as a unifying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a historical an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L. Blussé,

1995 'Retribution and Remor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otestant Mission in Early Colonial Formosa', in Gyan Prakash ed., *After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53-182.

2003 *'Bull in a China Shop: Pieter Nuyts in China and Japan (1627–1636)', in L.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pp. 95-110.

2003 'The grand inquisitor Inoue Chikugono kami Masashige, spin doctor of the Tokugawa Bakufu,' *Bulletin of Portuguese - Japanese Studies* 7, pp. 23-43.

W.J. Boot

2013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The Import of Chinese and Dutch Books in Togukawa Japan,' *Itinerario* XXXVII (3), pp. 188-206.

J. E. Borao Mateo

2009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 The Baroque Ending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 R. Boxer

1950 *Jan Compagnie in Japan 1600–185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1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 Brenzinger

1997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Displacement', in F. Coulmas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p. 273-284.

P. Burke

2014 'Diglossi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V. Rjéoutski et al. ed., *European Francophoni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Prestige Language.* Bern: Peter Lang, pp. 33-50.

W.M. Campbell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Paul Kegan [reprint 1992, Taipei].

W.M. Campbell (ed.)

1888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Formosan (Sinkang Dialect) with corresponding versions in Dutch and English edited from Gravius's edition of 1661.* London: Trubner & Co.

1896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rlang-Formosan Dutch and English From Vertrecht's manuscript of 1650 with Psalmanazar's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 and Happart's Favorlang Vocabulary.* London: Kegan Paul.

Hsin-Hui Chiu

2007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PhD Thesis, Leiden.)

2013 'Colonial Linguistic Phenomena and Legacy of Dutch Formosa with Reference to Dutch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Monsoon Asia,'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20(1), pp. 1-46.

R. Clements

2015 *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 CUP.

A. Clulow

2013 'Commemorating Failure: The Four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England's Trading Outpost in Japan,' *Monumenta Nipponica* 68(2), pp. 207-231.

2014 *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 Cocks

1979 *Diary kept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Diary of Richard Cocks, 1615-1622, Vol. II, January 1, 1617* – Januar*y 14, 1617.* Toky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E. Drechsel

2014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early* ***colonial*** *Pacific Maritime Polynesian Pidgin before Pidgin English.* Cambridge: CUP, 2014.

P. van Dyke

2003 *'The Anglo-Dutch Fleet of Defense (1620-1622): Prelude to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L.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pp. 61-82.

G. Elison

1988 *Deus Destroyed: 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J. Errington

2008 *Linguistics in a Colonial World: A Story of Language, Meaning, and Pow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Shōzō Fujii

2006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cy of Various Outside Regimes,' in Liao Ping-Hui and David Der Wei Wang ed.,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History, Culture,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62-77.

K. Groeneboer

1993 *Weg tot het Westen: Het Nederlands voor Indië, een Taalpolitieke Geschiedenis.* Leiden: KITLV.

1994 'Het Nederlands op Formosa ten tijde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Ons Erfdeel* 37/3, pp. 373-382.

1994 'The Dutch Language in Maluku', *Cakalele, Maluku Research Journal Majalah Penelitian Maluku*, 5, pp. 1-10.

1998 *Gateway to the West: The Dutch Language in Colonial Indonesia: A History of Language Policy.* Amsterdam: AUP.

H. de Groot

2005 *The Study of the Dutch Language in Japan During its Period of National Isolation (ca. 1641–1868).* PhD. Thesis. Christchurch.

R. Hesselink

1995 'A Dutch New Year at the Shirandō Academy 1 January 1795', *Monumenta Nipponica* 50(2), pp. 189-234.

A. Heylen
2001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 (1624-1662')', in Ku Wei-ying ed., *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 199-252.

C. Joby
2016 'Recording the History of Dutch in Japan', *Dutch Crossing* 40(3), pp. 219-238.
2018 'Dutch in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 A Social History', *Dutch Crossing* 42(2), pp. 175-196.

W. de Lange
2006 *Pars Japonica. The First Dutch Expedition to Reach the Shores of Japan.* Warren, CT: Floating World Editions.

M. Laver
2011 *The Sakoku Edicts and the Politics of Tokugawa Hegemony.*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G. Leitner et al. (eds.)
2016 *Communicating with Asia: the future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UP.

R. B. Le Page and Andrée Tabouret-Keller
1985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ethnicity.* Cambridge: CUP.

S. Makoni et al.
2012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anguage** policies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emerging landscapes',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UP, pp. 523-543.

Kiyoshi Matsuda
1998 *Yōgaku no shoshiteki kenkyū.* Kyoto: Rinsen Shoten.

J. Maurais & M.A. Morris (eds.)
2003 ***Languag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Cambridge: CUP.

G. Mestler
1956 'A Galaxy of Old Japanese Medical Books with Miscellaneous Notes on Early Medicine in Japan. Part III. Urology, Syphilology and Dermatology, Surgery and Pathology,'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44 (2), pp. 125-159.

W. Michel
1993 'Engelbert Kämpfers Beschäftigung mit der japanischen Sprache' in D. Haberland ed., *Engelbert Kaempfer: Werk und Wirkung.*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pp. 194-221.
2010 'On Early Red-head-style External Medicine and the Confucian Physician Mukai Genshō', *Journal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Medical History*, 56(3), pp. 367-385.

M. M. Mochizuki
2008 *The Netherlandish Image after Iconoclasm, 1566-1672. Material Religion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G.C. Molewijk (ed.)
1991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of waerachtig verhael, hoedanigh door verwaarloosinge der Nederlanders in Oost-Indien, het eylant Formosa, van den Chinesen mandarijnen ende zeerover Coxinga, overrompelt, vermeestert ende ontweldight is geworden.* Zutphen: Walburg Pers [First edition 1675].

Shuichi Nara
2003 *'Zeelandia, the Factory in the Far Eastern Trading Network of the VOC,' in L.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pp. 161-174.

Yoshimi Orii

2015 'The Dispersion of Jesuit Books Printed in Japan: Trends in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and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2, 2015, pp. 189–207.

J. Prentice

1994 'Manado Malay: Product and agent of language change', in T. Dutton and D.T. Tryon ed.,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in the Austronesian Worl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pp. 411-441.

S. Romaine

2000 *Language in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2nd ed. Oxford: OUP.

A. Ruyl

1611 *Sourat ABC, Akan meng ayd jer anack boudack […] sombahayang Christiaan.* Amsterdam,

1612 *Spieghel van de Maleysche tale* […] . Amsterdam: Dirrick Pieters.

D. Schmidt-Brücken, S. Schuster and M. Wienberg (eds.)

2016 *Aspects of (Post)Colonial linguistics: current perspectives and new approaches.* Berlin: De Gruyter.

N. van der Sijs

2010 *Nederlandse woorden wereldwijd.* The Hague: SDU Uitgevers.

Taiwan wenxian weiyuanhui (臺灣文獻委員會)

1993 *Chongxiu Taiwansheng tongzhi v.6 wenjiaozhi xuexing jiaoyu pien.* Taiwan: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Yudha Thianto

2014 *The Way to Heaven: Catechisms and Sermon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in the East Indies.* Eugene: Wipf & Stock.

F. Valentijn

1726 *Omstandig Verhaal van de Geschiedenissen en Zaaken het kerkelyke ofte den Godsdienst betreffende, zoo in Amboina, als in alle de Eylanden* […]. Amsterdam: Joannes van Braam.

E. van Veen

2003 *'How the Dutch Ran a Seventeenth-Century Colony: The Occupation and Loss of Formosa 1624-1662,' in L.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pp. 141-159.

T. Vermeulen *et al.* (eds.)

1986- *The Deshima dagregisters*, 13 vols. Leiden: Leiden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W. vande Walle

2001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 Pre-Modern Japan and China: A Comparison.' In Willy vande Walle ed., *Dodonaeus in Japan: Transl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Mind in the Tokugawa Period.*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 123-148.

J.E. Wills

2003 *'The Dutch Reoccupation of Chi-lung, 1664-1668,' in L.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pp. 273-290.

K. Zimmermann and B. Kellermeier-Rehbein (eds.)

2015 *Colonialism and missionary linguistics.* Berlin: De Gruyter.

A 'Sense of Place' in Geocultural Dutch Formosa Mapping

Ann Heylen（賀安娟）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Introduction to A 'Sense of Place' in Geocultural Dutch Formosa Mapping

The scope of Digital Humanities (hereafter DH) tools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academia has increasingly come to include researchers from a wide spectrum of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creating their platforms for academic exchange. In this essay, I will narrate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Springer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eries handbook chapter "Expressing Dynamic Maps through 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Dutch Manuscripts" (Heylen 2018) that guides the reader through the process involved in applying digital software to 17th-Century Dutch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in documen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Dutch community in Taiwan. The key text for this exercise is the digitized version of the Church Minutes or Consistory Notes of the manuscript *Kercboek, Brievenboek van Formosa, 23 januari 1643- 4 maart 1660 (hereafter Kercboek)* in Dutch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exercise applies geocultural space in mapping cultural practices and attitudes onto the geographic regions that encompas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vents and narratives associated with that location. The location is the 17th-Century Dutch presence on the present day island of Taiwan, and the narrative invocates the sense of place of Dutch personnel in the service of the

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hereafter VOC)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text. This starts with the handwritten 17th-Century manuscript text, the components of its digitization, and its final visualization into a storymap application.

The digitized version of the Consistory Records (*Kercboek*) in Dutch transcrip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is an illustration of how to create a geocultural visualization of semi-structured text with an educational purpose. This intellectual exercise tests the feasibility of DH in bringing forth the distant past to both a general public and an academic audience by geospatially mapping the mobility of a number of 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personnel in Dutch Formosa between 1643 and 1649. My ambition i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application of exploratory techniques in the spatial humanities offers new insights about the geographies embedded in a diverse range of texts (such as letters, works of literature, and official reports). This is a starting point to include other materials to broaden and deepen ou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iod. Inspiration for this idea has come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but all are equally inspired by the world of virtual and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hat are ideal in representing mobility in "movement".

Manuscript *Kercboek van Formosa*: Mission history goes digital

The manuscript *Kercboek* is a transcription of the consistory records or Church Minutes in the Tayouan consistory from October 1643 to June 1649, and constitutes a particular categ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known as mission history materials. It is written by the clergy commenting on the moral state of the Dutch community and the progress made by the church in evangelizing the natives. Within the totality of Formosa-related documents, church texts are the least studied. Extrapolating this to the study of the VOC, Formosa-related documents are at best complementary,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longstanding Dutch presence in other VOC and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WIC) settlements. Reasons for the focus on the years 1643-1649 are not arbitrary. The Hollanders had been in Formosa for 20 years; in 1642 the Spanish left, and the Dutch mission post came to include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parts of the island. At the same time, Batavia implemented new policies, and the VOC expanded, gaining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of Malacca. The Dutch arrived in Formosa not long after the VOC in Batavia and the Reformed Church in the Dutch Republic had been established. A limited number of reference works 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Dutch community in 17th-Century Formosa have been published, but to date the main emphasis has been on tracing th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ith the Dutch and Chinese, or positioning Taiwan as a trading depot in the larger framework of Dutch East India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states and ethnic communities (Blussé 2003; Heyns and Cheng 2005; Chiu 2008, Kang 2014).

The advantage this manuscript text offers is that it lends itself to documenting moves in the spatial mobility of VOC personnel. How were daily life activities impacted by either local or VOC demands that resulted in relocation, displacement and sometimes imposed career changes? One of the dynamics through which we can illustrate mobility is education and literacy. 17th-Century society witnessed the advancement of popular literacy that had begun in the previous century with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ation (Houston 1988; Graff 1991). Literacy defines the commonality among these different professions in education, and as such helps us to reflect on processes of both upward and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Given the shortage of ordained ministers, a great variety of ecclesiastical ranks, such as licentiates, catechists and soldiers were appointed as schoolmasters. Literacy was not especially widespread amongst the Dutch settlers, so those who could read and write were promoted to the post of schoolmaster. However, this demand for literate personnel was conditioned by the role the church played.

In a recent article (Heylen 2017) I illustrate how Dutch VOC personal were conditioned by a horizontal (lateral or spatial) mobility in their careers in Formosa. My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though the voyagers to the East Indies were originally driven by the incentive for upward mobility, for many who landed in Formosa this translated into a sequel of spatial mobility. I showed this through the dynamics of relocation among several villages coupled to the changes in profession, that either revealed an upgrade or downgrade of schoolmaster to soldier, attendant-to-the-sick or interpreter to political commissioner. For instance, promotion to the post of schoolmaster did not always work out well; promoted attendants-to-the-sick tended to ask to be released from the post after sometimes only a few months, whereas the reports on the promoted soldiers were favorable. We ask how this semi-structured text can be treated as a digitized narrative that extends far beyond its immediate content and provides a digital platform for Dutch Formosa and the VOC?

With a focus on mobility and its prospects for visualizatio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of investigation are anticipated to render some new findings. First, detect particular routes where the same villages surface. This can be done through a vi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two or more villages with rotating personnel. In addition, the recording of the quarterly visit by the clergy to the villages contributes to the spatial demarcation and its scope of geographical occupation. Second, elucidate the temporal distance i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ormosa, Batavia and the patria. Post was by definition surface mail, and usually the names of ships embarking in Formosa, either coming from Japan, or sailing for Batavia are mentioned. It enables outlining the frequency of letter writing and correspondence to and from Batavia, and contributes to the letter post history and its relation to literacy practices. Third, highlight information about the Dutch community and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its actors seen from a grassroots level. In particular, their mobility within the island, often coupled to the interchangeability of positions (schoolmaster, attendant-to-the-sick, soldier) suggests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Tayouan factory in the VOC.

Identifying Terms in Unstructured and Semi-structured Text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spatial humanities, the manuscript *Kerckboek* furnishes a rich example of geocultural space. Geocultural space means mapping cultural practices and attitudes onto the geographic regions with which they are associated, or using the words of Jane Stadler (2015: 134) "referring to a 'sense of place' that encompass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vents and narratives associated with a location." The location selected for this essay is Dutch Formosa, or the 17th-Century presence on the present day island of Taiwan, and the narrative invocates the mobility of Dutch VOC personnel (lower servants) between 1643 and 1649 based on the Consistory Records (*Kercboek*). Geocultural space thus exists in relation to both the actual location, i.e. the island Taiwan, and the mobility recorded on the map representing events based on spaces of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memory. The setting is a cultural narrative depic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utch, indigenes and Chines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scent 17th-Century Dutch Calvinist community building. The mobility is visualized through the narrative with georeferents and annotates the accompanying map in a three-fold dimension: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in 17th-Century perspective. The cultural mapping relates directly to the physical landscape, but grapples with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ies such as disappeared place names and natural phenomena such as erosion and silting of the sea that caused geographical and topographical changes. In its interdisciplinary mode, it bridges historical source (manuscript), literature (narrative), and geography (placename mapping) with technology (interactive cartography),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literary turn' in history with the 'spatial turn' in cultural theory.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llustrate the steps taken towards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manuscript text onto the map.

Preparatory work resulted in the Dutch transcrip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What was needed now was the formation of a team, consisting of a few dedicated students and an IT instructor to assist in the specific tasks that span from preparing the

text, to digital uploading and taking classes in proceeding with the actual data extraction necessary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blueprint map. This team of assistants I found in Nung-yao Lin, doctoral candidate in geograph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with expertise in historical GIS, Dutch national He- On Tsao, master student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Meng-lun Teng,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NTNU, and Benjamin Hlavaty, who sadly passed away in August 2016. The first step consisted in preparing the text for digital upload: setting the text into a word document, so that it can be transferred and copy-pasted into the model software that enables the data extraction process. The usage of https://regex101.com proved ideal and became the working website with which the team learned to give commands for text search and data extraction. The advantage of this website tool is that one can upload any text. Unlike a Microsoft word search, what characterizes this tool is the acquisition of a computer logic language that teaches one to formulate commands based on key words that then search the corpus, and extract the data. Evidently, the specificities of the text and the nature of the word search define the instruction of how to use the tool.

The first series of lessons taught the team how to think in computing language. The fascinating part is the logic needed to adapt to for creating and inserting commands in order to capture terms in the corpus. The text which is to be inserted into the system is called the corpus. The most basic form is commanding Regular Expressions. Computing logic means that every space and character counts. Below are some examples of the notes taken during the lessons.

Capture terms in Corpus- Regular Expression
(可以用 javascript)
G= global
Whole word: /Dominee/ /schip/
空白字 : 如 \t \n \r \f \v \d\w
字元族 (character class) : 如 o[fn] [abc]e not the whole word, but will only find letters!!

或 [a-z] 或 [abcd], [A-Z], [0-9] , [Ii]n \s[Ii]n\s = 有空白 \s

補字元族 (negated character classes): 如 [^abc] = abc 不要 ^=not

還原字 : 找得到符號如 \? 或 \. 或 \, \\

Also regular expression find: (dot), ? , *

\d= digit	
\n= new line	
\w= ANY word CHARACTER	

\b= boundary \bthethetheater is other

\B= not boundary \bt

^From= 出現在前面一行的句子 From London and from Taipei

bye$= 出現在後面一行的句子 Good Bye

r.t rat, rot r..t root

* cu*t Winscho*ten

+ 至少會出現一次 Winscho+ten cu+t cuter, cuuter, cuuuuter

{} Winscho{1,2}ten

John|MaryCesae?r

Tijden:

2 S, 9 October= \d\s[A-Z][a-z]+

3 S, 28 October= \d\d?\s[A-Z][a-z]+

4 S, 23 November= \d\d?\s(October|November|December)

6 S, 3 December= \d\d?\s(October|November|December)

1st December= \d(\d|st|nd)?\s(October|November|December)

2nd November= \d(\d|st|nd)?\s(October|November|December)

Or \d\d?(st|nd)?\s(October|November|December)

2 Session= \d\sS(ession)?

Locations and place names:

In Taoyuan

From Soulang

((from|in)\s[A-Z]\w+)

One of the challenges this research presents that is inherent in the historical nature of the texts, is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writing in 17th-Century manuscripts. The lack of a standardized orthography especially pertains to place names and personal names. One of the Dutch VOC personalities who appeared frequently throughout the narrative is Cæsar van Winschooten. The spelling of his name is at times van Winschooten, van Winschoten or simply as Cesar, which can also refer to another VOC employee called Cornelis Cæsar. Therefore, from the very start the instructor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ow to search for this diversity in spelling. Time was thus spent on reviewing the character classes and each character's representative commands. An example would be [abc]e which would search for ae, be, and ce. We also reviewed negated character class and regular expression in the software's command language. We learned the three kinds of systems where one can make a command and the different ways one can type the command (e.g. to search for a digit: \d, [0-9], or [:digit:]. These review lessons were helpful in moving on to the next step of how to search and replace terms and word sections within our body of text,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boundary". For instance, to find "the" by itself, type \bthe\b, with "b" being boundary, or in this case a space. However, typing the string \bthe will find the word "the" but with a space before it and not after it, e.g. "theatre". This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 commands in the regular expression has allowed us to search for a wide variety of place names with a single string of commands. The place name will most likely be a single word starting with a capital letter and a space before it. We also learned how to check for alternate spellings, as many proper names in the text are spelt differently throughout, e.g. Backluan, Bacloan, Backluang, etc. We have also learned how to search for dates within the corpus, which is actually much simpler to do than searching for locations.

Armed with these commands the team was able to generate PN codes in the corpus, which resulted in the website http://church17tw.appspot.com/. The corpus text is inserted and the keywords related to place, date, and names have been highlighted in a different color. Instructor Nung-yao Lin's expertise as a geographer has a specific

interest in the compilation of a historical Taiwanese place names map. An excel sheet with georeferents illustrates the coordinates for pinpointing the location. This resulted in a first blueprint integrated text and map platform website.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website, the background work involves compiling data onto the excel sheet, which we now term a fusion-table, and will come to our attention in the next section.

Visualizing the Narrative with the Help of Faulkner

The Kercboek corpus in its blueprint version pinpoints the place names and personal names aimed to visualize the narrative. Said otherwise, it brings the Dutch community to life and creates a network cluster that visualizes the movement of schoolmasters, attendants-to-the-sick and soldiers around the island. This section features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this visualisation to realization. Our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centered on how to visualize the narrative, and to which as to paraphrase Ian Gregory (Gregory et al. 2015: 2) we employed "geographical technologies to develop new knowledge about the geographies of human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The kind of layout we were looking to implement our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was found in what we have termed the Faulkner model found at the Virginia University website.[1] In the same way we set out to map the people and places in the 17th Dutch-Formosa Consistory Repo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above, we put together a fusion-table spreadsheet mapping out the above sessions from the corpus of text.

Inspired by this Faulkner model, our geospatial database main concern is the location of the place names to show the spatial mobility of the VOC servants around the island on the blueprint map. A connection link was made to region, nation, and world instrumental for demonstrating the spatial mobility of the VOC personnel, whether

1 See *Digital Yoknapatawpha*, http://hero.village.virginia.edu/~rwb3y/Faulkner/. Many thanks go to Dr. John Corrigan whose lectur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in December 2015 inspired the idea.

in terms of arriving from or returning to the VOC headquarters Batavia, c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and/or other VOC Factories in the region. We created an enlarged vision of the Anping region where Castle Zeelandia was built. Anping as we know it today is located further inland. Compared to its loc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when this region was still a landmass whereas now it is sunken in the sea. The Consistory where the Church Minutes (or Consistory Records) were taken was located in the Castle. The Consistory icon thus forms the central point on the blueprint map. At a later stage, the map can be expanded with icons of other buildings mentioned in the manuscript text, such as the church, the poorhouse, schools in the villages, the prison in the castle, or the warehouses. The Faulkner format also ties in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the project. This means compiling a map that has the place names in its different spellings and languages, such as Dutch, Chinese, aboriginal, and also in Spanish where possible.

We utilized what we have learned to highlight the following in the corpus: Personal Names, Place Names, and Dates. To these data are added columns that include the geocoding of the locations, icons which show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the person (social status of each person regarding his or her title), and additional markers to show the means of mobility (such as various appearances of ship names). These data input are necessary to procure visualization on the blueprint map. The blueprint map itself is divided in three sections on the screen. The several variations will be included that will be used as references in the scholarly database, and place names will be complemented with secondary materials accessible in Taiwan. To date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complete with an historical map are lac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Faulkner model allows the creation of a similar structure with the manuscript text. The *Kercboek* of the Tayouan consistory is an ecclesiastical writing consistent with the church regulations in Calvinist countries. Consistories or church councils (*kerkeraad*) were assemblies of ministers and elders who administered church discipline, acting as a form of ecclesiastical justice. Although it was exercised in a purely spiritual way it reveals the all-powerful and pervasive force of religion in

the lives of the believers. In this fashion, the Tayouan consistory kept detailed records of the moral state of mind of its members. The consistory sessions were chaired by the minister, who acted as the praeses (or president) and who was assisted by the scribe, and each session bore signatures of approval from the elders, the deacon, and the political commissioner. The entire text is thus chronologically divided in sessions. Each session has a date, the names of the praeses, the scribe and the board members signing the Minutes. This structure enables us to represent the content of each session on the blueprint map, and this is done through the Play by Section function. Both the Dutch transcript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re included, and the user can interchange between both languages.

Due to the quantity of data each session contains we feel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ome choices. We decided to associate personal names with the place names. 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t up: to demonstrate the mobility of VOC personnel. The character icons that appear on the map have extended pop up window functions when selected. When we click on the icon the pop up window is as comprehensive abou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icon as it is in the entire narrative. The names of the board members who signed each session do not appear as icons in the map, but instead appear in the Consistory. When the Consistory is clicked on the window that appears is not as comprehensive as other icon windows, this instead shows the board members involved in the meeting and the minutes according to the session highlighted. However, the people in the narrative do appear as separate icons, and clicking on them generates a window with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about that individual as it is shown throughout the entire narrative.

Digital Exercise in Mobility

Not all designations for keywords and icon placement are equally straightforward. This section will highlight some examples from the text and draw attention how to

visualize its mobility. On the toolbar in the map each section or text entry of the corpus is arranged in a numbered bar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number of the session. The first example features the sentence in bar/session 9, which is the entry on 2 January 1644:

> "Paulus Stroes Vendrig requests support for the widow of some soldier who died during the latest excursion to the south."

This calls for a classification of "nameless people" - rather than widow - and "excursions" as part of the mobility. Equally pertinent is the question how to visualize the notion of future movement on the blueprint map. Bar/session 14 with the entry on 27 January 1644:

> "The visitors, having returned from the south, report to the meeting: Merkinius professed bad conduct in [carrying out] his duty: Hans Volland was worse, and many substantial complaints were heard against him from the elders in Nettne and Cattia."

On the map we see a Personality Icon for Merkinius and Hans Valland appearing on the villages Nettne and Cattia pinpointed as icons in the Formosa section. When you click on the icon of these individuals, the pop-up window provides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two people in the text. When you click on Nettne and Cattia, there should be a pop-up of an element such as a school or a list indicating baptism records depending on the relevance to the session's content. The same entry on 27 January 1644 also reported on intended movement:

> "The Church Council considered the last point of the 7th session of 5 December 1643 and took into account what the visitors had reported about Merkinius and Hans Valland: [thus they] gave their approval to Hans Olof taking up his residency in Sinckan, Merkinius being kept under closer supervision in Soulang, one attendant-to-the-sick, Gerrit Jansz., being ordered to reside in Tapuliang, Jan Boudewijnsz. in Tirocen, Hans Volland in Backluan, Jacob Sandbergen in Tavokan, Daniel Hendriksz. in Soulang."

The visualization thus goes as follows: Apart from Merkinus who stayed put in Soulang, the other personalities in this session are all about to be on the move. The Consistory decided over their location and for some this translated into relocation. Thus, when we click on the session, the mobility of the person is shown with an arrow giving direction to. To the left of the Hans Olof Icon appears an arrow showing direction to Sinckan marked on the Formosa map (but he has not yet moved there). The same representation goes for the other personalities in that session. Although, when we click on the icon mobility, and search for the name Hans Olof, we see all the movements he made throughout Formosa. In an extended version, this is visible for all the key persons in the narrative, with the purpose to show their spatial mobility.

The extract taken from Folder 65, 1645, 35th Session of 16 January. Chairman D. Joannius Happartus, clerk Jannius Bavius

> “The Church Council agrees that Acouw, Netne and Kattia, which are lacking in schoolmasters, will each be provided with a Dutch resident from the best ones who are currently living in Tapoeliang; also that Joannes Olhoff will take good care that the children of the several villages who are still running free in the countryside will be attracted to the schools.”

This relocation of Dutch schoolmasters from Tapoeliang to Acouw, Netne and Katia is thus visualized with an icon for the unnamed schoolmaster with an arrow from Tapoeliang pointing towards the three southern villages. However, in the pop-up window information section, it could be mentioned what the follow up was, but that is not necessary, only if the unnamed schoolmaster becomes known later on. It could be that there was no follow up of this relocation, in which case it should be marked as equally meaningful.

The following entry brings to the fore some of the more tricky elements in the visualization process. In addition to the textual representation below, the image in the fusion table shows how it will be made visible on the map.

(Fol. 42) 21st Session 26 July Chair Johannes Bavio, Clerk Simon Brenio

The Rev. D. Johannes Happart [ICON], former preacher in Walcheren [WORLDMAP], appears before the meeting. He had been sent here from Batavia [VOCMAP], to be the preacher in this district. After showing his Hon. his attestation, he was welcomed by the meeting and accepted into service. Attendant-to-the-sick in Tapuliang [FORMOSAMAP], Gerrit Jansz. [ICON], who had complained several times about Caesar van Winschoten in his letters [BOOK ICON], which were quoted at the meeting, presents his accusations in writing against Cæsar. The Church Council agrees that, after both parties have been heard separately and together, D. Johannes Bavius and Simon van Breen and also the elder Sr. Boon would be appointed to hear the case once more, keeping the resolution for the complete meeting [to be held]. Alexander [ICON], who had come here as attendant to the sick with the ship Haerlem [MOBILITY], asks to be put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in Formosa. The Church Council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matter should be postponed until the arrival of François Caron [ICON], which will be any day now.

Johannes Bavius [CONSISTORY]
Simon van Breen [CONSISTORY]
Nicasius de Hooge [CONSISTORY]
Pieter Boon [CONSISTORY]
Philippus Heijlman [CONSISTORY]
Nicolaes Reijerss [CONSISTORY]

For the visualization on the map, we chose icons available on the web. Interesting in this entry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otion of literacy, exemplified through the sentence in which Gerrit Jansz. complains about Cæsar van Winschoote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se notions of literacy and its mobility frequency at the time in the narrative, a keyword selection such as “letter” “read”, “send”, “sent”, “write”, “writing” will be

used for our digital exercise. The purpose of this exercise is to deduct how many letters were written, the length of time they were en route, and their frequency. This interest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cy and mobility equally pertains to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movement of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distance, routes, and time it took information to spread. Ideally, we like to extract information about how many times and in which months a ship arrived, how to picture the “postal service” on the island in the follow up project that integrates the interactive map into the Apsti website (http://apsti.nccu.edu.tw). By all means, this information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existing work and database on the VOC shipping history. The documentation of 17th-Century Taiwan geography features the findings for the keyword “visits” and related geographical terms “north” and “south”. This will enable us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villages. Bringing all these findings together will result in a cluster network representation, and ideally reveal some findings that we do not see when reading the text manually. Such i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digital exercise. What we have achieved so far is presenting the shift in focus from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xt (person A in place B) to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that the text is presenting (hi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ople). We thus are able to map the spatial mobility, for instance Van Winschooten moves from Tapuliang to Akauw, we also map the social mobility, Van Winschooten as the schoolmaster becomes a political interpreter, and we map the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which is revealed through the administered church discipline that has consequences for his career moves in the island inextricably related and impacting his spatial mobility.

At this stage we need to return to the initial purpose. The Faulkner blueprint sets the stage for the spatial mobility, provides the pop-up windows with information, but is not particularly helpful in structuring the narrative flow as memory support. Henceforth we had to integrate an intermediary step via the creation of the storymap. The advantage of the storymap in relation to our semi-structured text is that it provides clear instructions that allow treating the text as prosopography. Another welcome advantage of this intermediate stage is that the storymap worked as a double check with the

information stored in the georeferenced excel sheet. In practice this meant the expansion of the team with two members: Kyle Griffin and Evelyn Kuo. Needless to say, the storymap itself is already a hypertext electronic database filled with cross references. Crucial step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storymap involved developing a view of how references to people in the source should be structured into historical persons. The pop-up window cards in the Faulkner blueprint map tied to icons, was expanded and allowed for structured information (factoids) that at a following stage would allow access to the persons not only by their names, but by the offices they held, by the ethnic-geographical community to which they belonged in terms of where they hailed from in Europe, and other criteria. Cross-referencing enables combining the criteria to find individuals who share these characteristics.

Generating a Scholarly Database

The final part of this project consists in linking a scholarly database to the mapping platform. It enhances the academic application and makes it accessible to as wide and varied a public as possible. For the informed researcher and audience the study of Taiwan society, culture and history is new in a sense that it is being formatted into an academic discipline of recent origin. To date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place name map and a centralized database that encompasses the scattered smaller and individual efforts on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documenting Taiwan in the 17th-Century. Nonetheless, major efforts are being undertaken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17th-Century manuscripts such as the *Daily Registers* and *Resolutions*. Moving towards open access and public domain research accessibility is becoming an option within the Taiwanese academic world. Hence, the task to create a digital scholarly platform adjacent to the digital map that provides relevant and updated information about where to find either full downloadable access to scholarly articles, databases, and other academic and popular products that guide and feed our knowledge about 17th-

Century Dutch Formosa in a “glocal” setting. In order to make the scholarly database attractive and fitting with the overall purpose of mapping, this project gives digital access to a number of historical maps complementary to the creation of its own digital ma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larly database is envisioned to follow the format of *Bibliograph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aiwan*, edited by Li-cheng Lu, and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 SMC Publishing Co as its basis. This bibliographical work has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research, primary and secondary pertaining to early modern Taiwan, with the most recent entries up to 2004. The current task is to further update (2004-2018). At our disposal are the *Annual Bibliography of Taiwan History* series,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references. We also kept the same layout and chronology as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aiwan: historical sources, monographs and edited volumes, journals,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research reports and others which includes master and doctoral theses, databases: websites and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ded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Monographs and especially articles from journals that have European expansion history,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colonialism as their fields of interest are to be added. Special attention will be given to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e. the Austronesian and Asia-Pacific aspect. Expansion is envisioned in the final section with databases, exhibitions and related social media resources, including a section on literature, drama, theater and literary fiction that has early Taiwan & Dutch Formosa in particular as its topic. To date, a number of the collected data entries will be localized for pdf download, open access, and uploaded onto the ApsTi database at NCCU at a future date.

Conclusion

Kercboek has been treated as a semi-structured text, and we applied the notion of geocultural space in cartographic initiatives, show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s in which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paces are culturally understood and can be represented digitally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research features historical source (manuscript), literature (narrative), and geography (placename mapping), with technology (interactive cartography) that allow to record the mobility on the map, with deep mapping of events based on spaces of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memory. The setting is a cultural narrati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utch, Chinese, indigenes, plus 17th-Century Dutch Calvinist community practices). The mobility visualized through the narrative has geographic referents (georeferents) and annotates the map (in three layers, dimensions: local, region, world) with 17th-Century perspectives. The digitized content generated a view of the key figures in the Dutch community, their social networks and mobility in Formosa and other VOC factories, which calls for an expansion beyond Formosa, and interlinking with existing digitized sources of the VOC. Its cultural mapping relates directly to the physical landscape, but grapples with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ies such as disappeared place names. Dutch Formosa in a kindle format brings a visualization that shows something new about th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today about Dutch Formosa's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paces.

Bibliography

Blussé, Leonard. (ed.)
2003.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Chiu, Hsin-hui.
2008.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oston: Brill.

Graff, Harvey J.
1991. *The Legacies of Literacy: Continu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We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regory, I., Donaldson C., Murietta-Flores P. and P. Rayson.
2015. "Geoparsing, GIS, and textual analysis: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spatial humanitie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Computing 9.1., pp. 1-14.

Heylen, Ann.
2017. "Mobility and Consistorial Discipline in Dutch Formosa: An Examination of *Kercboek*, 1643-1649, Tayouan Consistory",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18. "Expressing Dynamic Maps Through 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Dutch Manuscripts," in Shu-Heng Chen (ed.) *Big Data i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ham: Springer, 95-116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2F978-3-319-95465-3

Heyns, Pol and Cheng Wei-chung, eds., (鄭維中 , 韓家寶譯著).
2005. 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Dutch Formosan placard-book, marriage, and baptism records].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荷蘭時代台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台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Houston, Robert Allan.
1988.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ulture and Education, 1500-180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康培德 .
2014. 〈「文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意象〉《新史學》，25 (1)：97-144

呂理政 .
2004 《早期臺灣歷史文獻研究書目》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天書局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dler, Jane.
2015. "Conceptualizing and mapping geocultural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Computing* 9.2: 133-141.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年度》中央研究院，臺灣史所
Digital Yoknapatawpha, http://hero.village.virginia.edu/~rwb3y/Faulkner/.

荷治時期大員港的入港規範：駁船、旗號與盪纜*

鄭維中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162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為發展與明帝國間的直接貿易，而有佔領澎湖之舉。由於明方最後動用武力驅逐，雙方遂協議於大員（臺灣島西南岸之一沙洲）港灣進行後續的協商。1624 年 11 月，臺灣長官宋克（Martinus Sonck）曾將在大員與澎湖各處測繪的海圖，送交東印度公司亞洲總部巴達維亞，以利後續前往大員的船隻使用。[1]

荷蘭人決定於大員落腳之前，曾經探勘臺灣西南沿海，尋找適合停泊的港灣。此類港灣需符合兩種基本條件：（1）水深足夠。港灣下錨之處，需有足夠水深，縮小波浪振幅，以利裝卸人員貨物。進入此處的航道，也不得過淺或有障礙物。（2）港灣四周需有地形環護。此可收擋風遮雨之效，並免於強烈海流推送，造成船隻漂流移位。

大員港位於台江內海潟湖與臺灣海峽交界上的沙洲，相連缺口處，受潮汐日夜沖刷，可濬深港灣下錨處，保持水深。同時，水流不斷將潟湖內的沈積物，經出入港水道沖刷而出，於水下海床堆積成水下沙洲。水流沖刷出水下沙溝，成為入港水道，而水下沙洲則形成沙堤、沙閂等種種型態，造成複雜、變動不居的水下地形，使得操船舵手欲將船隻駛入港灣下錨處時，需要人工指引。

---

* 本文草稿曾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發表於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2017 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港口、船舶與貿易》。

1 關於荷蘭人探測包括大員港在內台海兩岸水文的活動，參見：鄭維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1622-1636〉，於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台北：中研院，2017），頁 385--440。

又由於整個臺灣西南海岸，遍佈著沙洲與潟湖，此一低矮平坦的沿岸地形，不易由遠處分辨沙洲缺口位置。若船隻靠近探查，則必負擔擱淺風險。因此，舵手必須盡力在船隻位於在遠海時，即運用海圖與所觀測得的地貌，來估計港灣與入港水道位置，不待沿岸航行尋找。

在「入港指引」內容中，載有由遠海估計大員位置的方法。倘若船隻順利抵達大員港外錨地，熱蘭遮城即應派出引水員登船引領，使之進入港內錨地處。船隻視其吃水深度與任務需要，或趁漲潮時入港，或利用駁船於港外錨地逕行裝卸貨物。

本文將進行出入港、裝卸貨作業時，所仰賴的一整套包括入港程序、接駁方式、導引設施、港口裝置等種種軟硬體，統稱為「入港規範」。本文主要基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留存的「入港指引」內容，嘗試搭配其他殘存資料，來復原大員港之「入港規範」運作狀況。並兼及描述大員港之引水員與領港艇之沿革、大員港道之歷年深度變動，以勾勒荷蘭時代大員港港務運作實態。

二、歐洲航海技術史上的航路指引與海圖

海船離岸進行遠海航行時，較少遭遇暗礁。反之，於近岸航行時，卻容易不慎擱淺。但當船隻進出港口時，即不得不從事近海航行，是以，必定要採取辦法，事先警告危險所在。在歐洲，此類輔助航海的文書發端甚早，「入港指引」即常為此類文書重要內容。例如，紀元前 450 年，即有著名希臘 - 迦太基導航書類 “Periplus”（巡航書），描寫地中海域各地沿岸航行的情況。其描寫範圍甚至包括由直布羅陀離開地中海，沿岸航行至非洲西北側者。到了紀元 5 世紀，現存最晚成書的一本，由馬西安奴 ・ 赫拉克連西斯（Marcianus Heraclensis）所寫的《巡航書》，則已敘述了出地中海沿西班牙北向航行，往東北直到波羅的海沿岸之維斯瓦河出海口的海岸情況。以上兩書，記載沿岸航行的水路里程，以來回航行的方式，敘述沿岸各港灣的關係。

到了中世紀，海上航行已普遍應用羅盤。中世紀前期的航海家，將使用羅盤的航行經驗與前述導航書資料結合，賦予此類導航書新名稱為 “Portolano”（港路指引），其內容通常也包括了在地中海從事南北港口對渡的指引。迄於此時，才

有人開始將海岸線與港灣的平面圖附載於《港路指引》中出版。14 世紀初期，將港灣附近的航行指引，附帶海圖一起出版的方式已很普遍。此時，又在附圖中，加上了按羅盤方向，往四、八方伸展的方向線標示。這樣的方向線，使水手能夠明確的沿著一定的方向，駛往另一個港灣。此類標示方式演變到後來，成為海圖約定俗成採用的圖例。例如，標示各港灣名稱時，字體的排列，並非全部採北上南下等同一方向，而是各自按照水手面對港灣時方便使用的角度標示。海圖上不能用一條平滑線寫意的來代表海岸，而必須將各個海灣的形狀繪製出來。標示到河口處，需用雙層線表達，而危險的區域，如礁岩區，就用黑點或叉號標示在海岸線上。[2]

在地中海以外，西歐的低地國地區（即荷蘭前身）也發展出類似上述的海岸里程導航書類，稱為《海之書》（sea book）。此一文類發端於 14 世紀，到了 16 世紀，其內容已涵蓋歐洲大西洋岸主要部分，南自西班牙加的斯（Cadiz）起，北至黑爾戈蘭島（Heligoland，位於北海東部，日德蘭半島西側）間的海域。而從 15 世紀後半起，這類書籍資料，開始附上由海岸望向陸地時，能觀測到的地標或地形。這種圖繪被稱為「海岸識形」（coastal profiles）。標示「海岸識形」這一作法，可說是西歐海路指引書籍的特色。到了 16 世紀，這種標示已經相當普遍。[3]

荷蘭製圖家盧卡斯 · 楊森 · 華格納（Lucas Jansz. Waghenaer）於 1584 年出版了《航海之鏡》（Spieghel der Zeevaerdt）一書。這本航海書不只將歐洲各海港的圖樣整合到比例尺約為 1：400,000 的全圖上，還在 44 張各地分圖中，都附上了詳細的「海岸識形」圖。[4] 此書是首先將歐洲「海岸識形」圖標示於海圖之上，使兩者於同一圖面呈現的一本書。[5] 將「海岸識形」繪圖出版，以便來港新手識別這一作法，原先出自於葡萄牙人繪製的非洲與東亞海圖。不過，葡萄牙人並未將之推廣到歐洲海圖，也未將識形圖與海圖繪製在同一圖面。[6]

2 Leo Bagrow, *History of Cartography,*（New Brunswick/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0）, pp. 61-64.

3 *Ibid.*,p. 119.

4 C. Koeman, “Lucas Janszoon Waghenaer: A Sixteenth Century Marine Cartographe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31, No.2（Jun. 1965）, pp. 202-212 at p. 204.

5 *Ibid*., p.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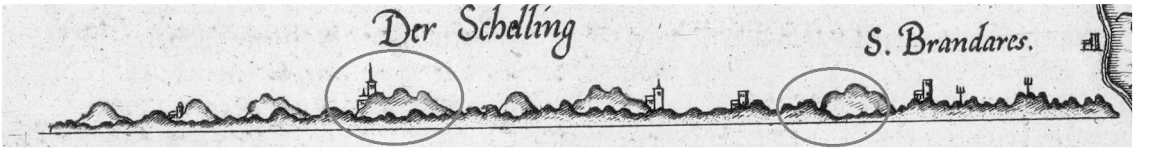
6 *Ibid*., p. 206.

在《航海之鏡》一書中，華格納明確的強調「海岸識形」的重要性：

「任何要以適當方式、實際使用海圖的人，要謹記各地方的幾種海岸特徵，如同在 [本] 海圖最上方所繪製的一樣。在其他的海圖，則是放在其他適當的位置。例如法蘭德斯的海圖，就將荷蘭和熱蘭兩處海岸識形圖，繪製在海圖的最上方，描繪出它們從海洋往陸地去，一開始被望見的樣子。這可能包括山丘、谷地、房舍、懸崖、村落、城鎮、火炬或海岬等。在望見這海岸後，經驗豐富的導航員，必須思考如何繼續航行，[還有] 港灣或河口位於羅盤上的哪一個方位。那些水上與水下的緩坡、礁石、沙洲、岩石 [位於何處]。要估計暗礁位置所在，以及接近海岸時的水深。再更為靠近後，要確認，當你進入正確的航道時，哪些海岸的特徵如：教堂尖頂、風車、山丘與懸崖等，以及那些樹叢，會位於 [方位線上，成] 一直線。甚至，航入與航出時，靠近港口及河口的海灣 [特徵將] 如何排列。它們相互之間，距離多少。這些在海圖上，都有詳細的描繪。」[7]

例如，在由北海前往阿姆斯特丹港與恩克豪森港的航行指引當中，即頗重視辨認泰爾斯海靈（Der Schelling，現代拼寫為 Terschelling）沙洲上的沙丘，以便正確就入港定位。然後開拔駛入須德海，繼續航向恩克豪森港與阿姆斯特丹港。（如下圖一）

泰爾斯海靈沙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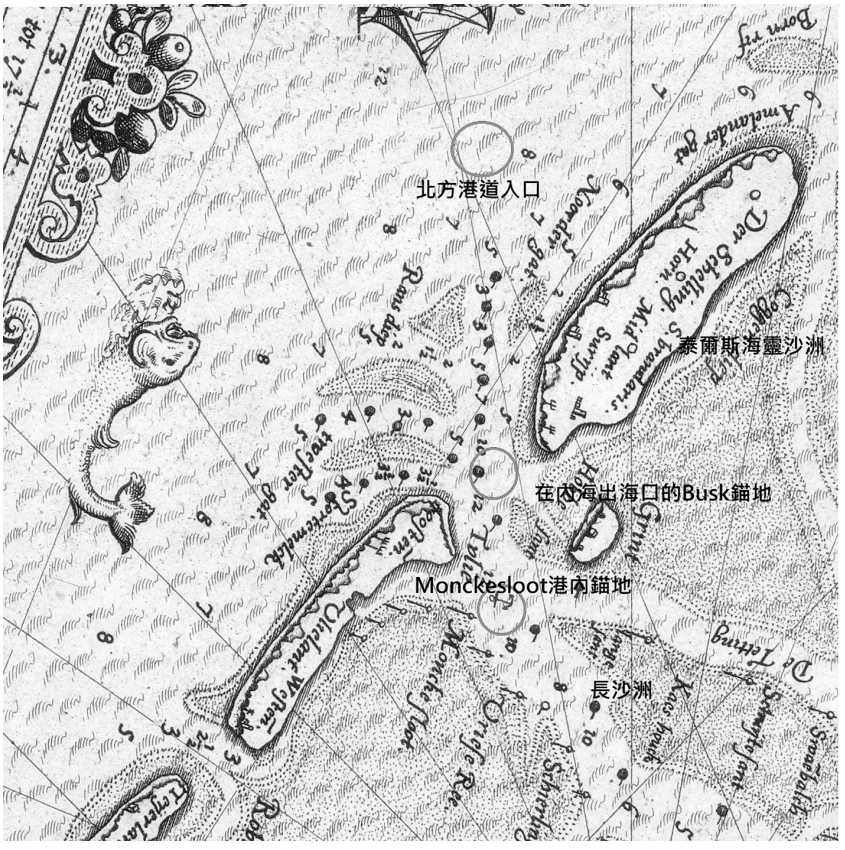
三個沙丘要對準地標 [教堂尖頂]　　黑色沙丘對正高起的白色沙丘中央

圖一：海圖 ”A description of the two famous rivers streames or channels the Flie& the Maersdeep streaching up into the Souther Sea before Enchuysen unto Amsterdam, with all sandes bankes and showldes, lying upon the sayde streames” 上所附載的海岸識形圖

來源：Lucas Janszoon Waghenaer, *The Mariners Mirror,*（London, Printed by John Charlewood, 1588）, pp. 42-43. NL-HaNA, Kaarten Leupe, 4.VEL,inv.nr.A, p. 31.

7 Lucas Janszoon Waghenaer, *The Mariners Mirror,*（London, Printed by John Charlewood, 1588）, p. 14. 此處引用的是《航海之鏡》的英文譯本，以便讀者查閱核對。本文引文中方括號內容均為作者按照文意所補足，並非原文即有。

「想要從弗利（Vlie）這個入口，或是通常被稱為北方港（noordergat）處，從北海駛入到阿姆斯特丹或恩克豪森的人，要按照泰爾斯海靈沙洲上的地標設定航線，讓地標 [即教堂尖頂] 對準三個沙丘。當黑色沙丘對正那個高起的白沙丘中央。此時即進入第一個港 [按：即北方港錨地 / 北方港道入口]，從那裡，他可以依循風向與潮水方向，航向南方稍微偏東或偏西的航線，如此航抵第二個在沙洲西南方或南方位於布斯克（Busk）的港（根據潮位來選擇）[按：即布斯克的錨地]。從這裡可以再向南方或西南方駛入蒙克斯洛特（Monckesloot）港，向東南方經過長沙州（lange sandt）…」[8]



圖二：海圖 ”A description of the two famous rivers streames or channels the Flie& the Maersdeep streaching up into the Souther Sea before Enchuysen unto Amsterdam, with all sandes bankes and showldes, lying upon the sayde streames” 海圖局部所載弗利港道部分，本圖上方為北方。淺色圈為筆者加繪。

來源：Lucas Janszoon Waghenaer, *The Mariners Mirror,*（London, Printed by John Charlewood, 1588）, pp. 42-43. NL-HaNA, Kaarten Leupe, 4.VEL,inv.nr.A, p. 31.

8 Waghenaer, *The Mariners Mirror*, p. 54.

以上圖二由北海進入須德海的航道上面，有三個錨地（anchorage）。依次是北方港、布斯克港、蒙克斯洛特港。雖然三個點都被稱為港（”gat” 字面意義是一個「洞」），實際上，只有第二個港旁邊是泰爾斯海靈沙洲碼頭，地形上稍微可以避風。其他兩處，都是海床較低的海底凹陷處，四周並無遮蔽。這三處因為海床低陷，海浪振幅較小，利於讓帆船下錨，候潮候風，準備駛入內海須德海。進入須德海域之後，舵手則多以岸邊或淺灘所設置的木柱與教堂尖塔之相對位置，來確認在航道中的位置，不再繼續使用海岸地物來導航。在水道沿岸與沙汕水淺處，也會以木柱標示，來警告航行船隻。

前面所舉例的海岸地物，具備因地制宜的性質，在各地海岸可指涉不同之物。華格納在《航海之鏡》所收錄的葡萄牙沿岸海圖，也載有利用黑色山丘作為河口位置標定點的的「海岸識形」圖。這表示，海岸識形並不限於位於海岸地帶的地物，而包括由海洋望向海岸時，可望見的內陸地景。另外，華格納收錄的挪威沿岸海圖中，也繪製有特殊山形，作為入港指示物。這是因為，挪威當地海岸地質，多由岩石構成，幾乎沒有沙丘。由於海岸沙丘的形狀，在一定時間後必然有所變遷，故前述作為泰爾斯海靈沙洲上，海岸識形物的兩處黑白沙洲，在十七世紀初，就逐漸以人工的建築物與木柱來取代。

三、大員入港指引：海圖、海岸識形與水道標旗[9]

在導引荷蘭船隻進入大員港的指示上，現存資料與前述華格納一書頗為類似。前面已經提到，由於臺灣西南海岸多為低平沙岸，船隻近岸航行容易擱淺，故必須在遠處即估計目標港灣區域所在，避免近岸尋港。臺灣與荷蘭在地形上顯著不同，具備高聳的中央山脈。故從遠方，藉助特殊的山形來識別目標海岸，便成為因勢利導的變通方式。當然，一旦有更適宜的海岸人造物來作為標的，就可淘汰此處藉助「海岸識形」從事導引的方法。

9 本節部分改寫自：拙著,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semblances in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BEFEO）*, 101（2016）, pp. 289-323 at 295-300. 及拙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1622-1636〉。

必須說明的是，為迅速切入主題，本文不再簡述荷蘭人前往臺澎的前因後果，而直接講述荷蘭人 1622 年起開始調查臺灣周邊水域的概況。1622 年 7 月 10 日，雷爾松（Cornelis Reyerszoon）率領荷蘭艦隊抵達澎湖馬公港，3 天後（13 日），其與明軍駐防當地的水師取得聯繫。當時，澎湖的明軍指揮官要求他們離開澎湖，前往福爾摩沙（即臺灣島）。原本，這位指揮官同意派遣導航人員帶領荷蘭船隻前往臺灣島尋找港灣，但明軍非但未派人協助，反而於當日無預警立即撤離。空等數日後，雷爾松一面於 21 日，派遣格羅寧根號與英國熊號兩艘大海船出航巡弋；另一方面，於 26 日，自行率兩艘快艇（又譯快船 jacht）：聖十字號（St. Cruys）與維多利亞號（Victoria），在一位當地漁民的導航下，前去調查福爾摩沙（臺灣）島港灣。27 日起，則開始調查臺灣西南岸大員周邊海域。一行人於 30 日，又二度測量大員灣。

1623 年 2 月，由於荷蘭人佔領澎湖並騷擾中國沿海，澎湖守將引介雷爾松與福建巡撫商周祚在福州會面協商。1623 年 3 月，這位守將承諾親自派人指引雷爾松到臺灣探勘合適的港灣。[10] 當時，維多利亞號快艇停泊在大員灣中，受命等待調查隊由澎湖前來。船上的商務員費胡特（Adam Verhult），在其日誌中記載，他們一行人於 4 月 17 日抵達了大員灣。

1624 年 11 月，臺灣長官宋克，將前述一批關於大員與澎湖的海圖，送交到巴達維亞，以利後續船隻入港之用。[11] 1625 年 5 月，巴達維亞當局追認了位於澎湖的荷蘭人員此前所從事的，關於臺灣島整體與大員水道細部的水文調查活動：

> 「無論貴方要繪製福爾摩沙之一部分或全體，謹照貴方合適時間進行。同樣地，對於一直接連到大員兩處水道的海床有哪些阻礙、或是如何可通過的圖，也是如此。」[12]

10 以上參見：拙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1622-1636〉，pp. 402-411. 第二節：漢人漁民、明水師與臺灣沿岸的探測。

11 江樹生主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1622-1626》（南投：臺灣文獻館，2010），頁 141。〈宋克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4 年 11 月 5 日，於大員商館。

12 VOC 852, Missive van Batavia naer Teijouwan aen den gouverneur Martinus Sonck Per 't Jacht Erasmus geschreven, Batavia, 13 May 1625, fo. 73^{v}.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1622-1636〉註 59 引用檔案標題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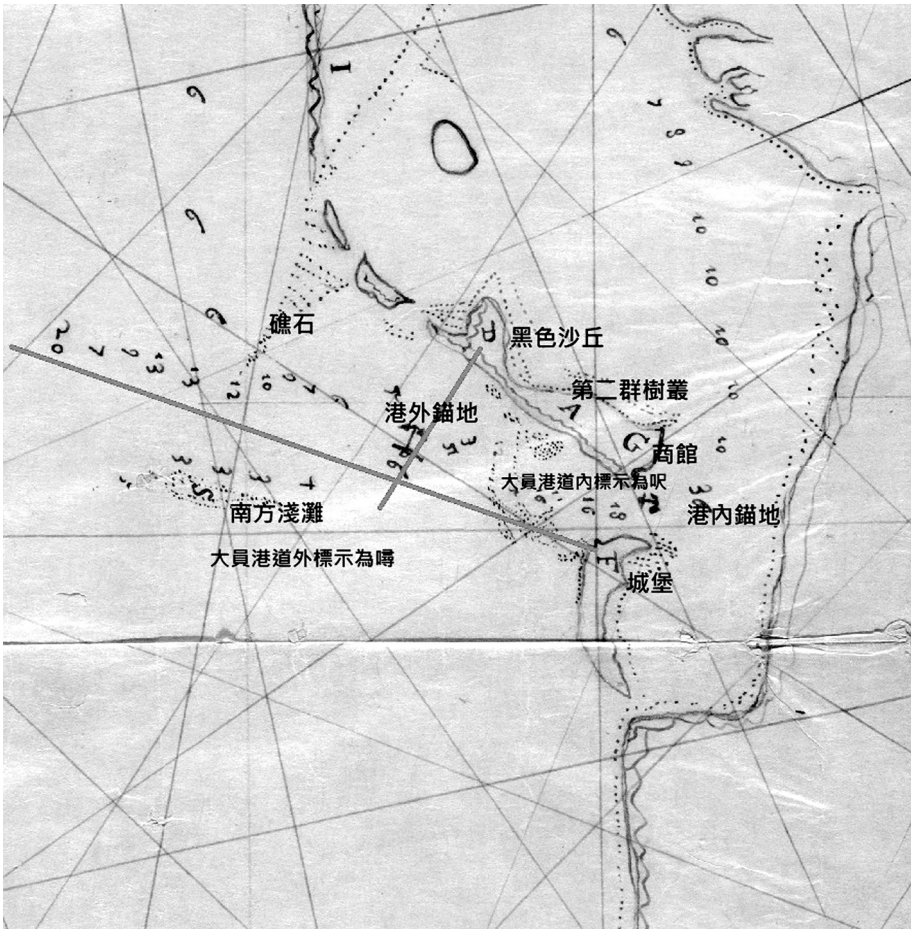
在荷蘭海牙檔案館中，保存了一幅當時指引船隻入港的海圖，其標題為：「航海圖（paskaart），在此展現了位於北緯 22 度 56 分之大員的情況，我們駛入、駛出時所檢視的哪些沙洲與淺灘，還有高山如何浮現。」[13] 這一份海圖，如同前述華格納的《航海之鏡》一樣，以「海岸識形」來標示港灣的所在，並且以地景特徵，作為引導船隻入港的標誌。這一份航海圖也如同《航海之鏡》一樣，附載了入港操作的指引（參照圖三閱讀）：

> 「沿著礁石，他要將以字母 D 標示的黑色沙丘帶到他[14] 東北方以後 [按：即沿筆者所標示淺色東南東方向線前進，直到黑色沙丘位於東北方，亦即兩淺色線交叉處，標示有錨的地點，此為一港外錨地（outer anchorage），後文稱為「港外北錨地」]，再向東南東方駛入港口。在礁石的南南西方，有一片淺灘，這裡低潮的時候深度不及 15 呎。這個商館在這淺灘的正東方。沿著這個淺灘，要把城堡保持在我們的東南東的方位上，然後我們通過礁石與淺灘之間，保持同樣的航線直到港前。[按：這一句話將前述進到港外錨地的航線覆述一次] 想要在港外下錨者，將商館帶到他東方 [按：表示由礁石前的航道前進到商館出現在正東方的時候即抵達（北方）港外錨地]，不要再駛近，[進] 到水深比 5 到 6 噚淺處。」（標線為筆者所加）。礁石附近水最深，但是不建議駛近，[進] 到水深比 5 到 6 噚淺處。」[15]

13 NL-HaNA, Kaarten Leupe, 4.VEL, inv.nr. 302, Heyndrick Ariensen lootsman, “Pascaert, waerin verthoont wort de gelegentheit van Tayouan enz”, 1625. 由於儀器與計算簿冊精確度不如現代，此處緯度測量略有誤差。本文圖三、圖四、圖五均取自此圖。亦參見：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 • 圖版篇解讀篇》，（台北：漢聲，1997），頁 18-19。

14 此處的「他（也可以譯為「人們」或「我們」）」指的應該是舵手或是船隻。

15 此處的「呎」均指「荷呎」，約 30 公分（萊因呎為 31.4 公分、阿姆斯特丹呎為 28.3 公分）。一噚則為 6 呎左右。本文方位標示均採用羅盤三十二方位標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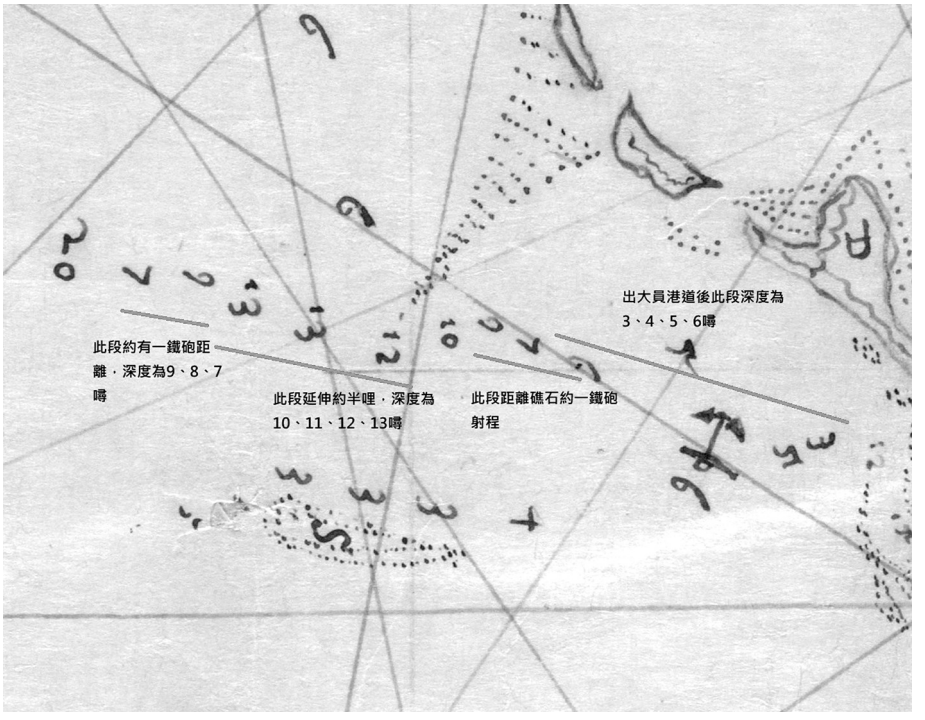
圖三：Heyndrick Ariensen lootsman, “Pascaert, waerin verthoont wort de gelegentheit van Tayouan enz” 海圖局部 , 1625. 原圖上方指向東方，本圖已轉向，上方指向北方。D：黑色沙丘，A：第二群樹叢，G：商館，S：南方淺灘，F：城堡，I：白色沙丘

來源：NL-HaNA, Kaarten Leupe, 4.VEL, inv.nr. 302.

這份指引也說明了出入港時作為參考輔助的海底深度數值，可以協助舵手確認，船隻是否是在正確航道上，朝向水深足夠的安全區域前進。（參照圖四閱讀）

「南方淺灘向南延伸的很遠。[按：即圖面標示淺灘的南方範圍都要避開] 我們投入鉛垂測深度，就可以判斷入港出港的方向，直到完全脫離淺灘為止。當我們出港，一直航行到距離礁石約一鐵砲的距離處。[按：由大員港道出口開始經過港外錨地] 深度是 3, 4 , 5 , 6 噚，之後開始有 10, 11 ,12 ,13 噚，這個深度延伸約半 [荷] 哩，然後又有 9,8,7 噚，也是約有一砲的距離，然後我們

來到 20 噚深的水之上。[按：此處即是利用一邊航行一邊測深來確認位於正確航道航行的辦法，由大員港道出口一直到離岸起點處的深度紀錄] 那麼我們就離開了全部的淺灘。」[16]



圖四：Heyndrick Ariensen lootsman, “Pascaert, waerin verthoont wort de gelegentheit van Tayouan enz” 海圖部分 , 1625. 本圖為圖三細部再放大，原圖上方指向東方，此處已旋轉，上方指向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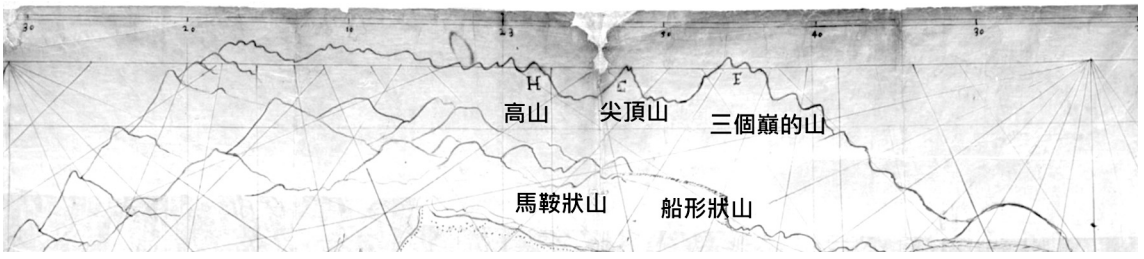
來源：NL-HaNA, Kaarten Leupe, 4.VEL, inv.nr. 302

此一指引並且運用前面所說的「海岸識形」的方式來標示，由遠海（甚至澎湖海域）即能確認大員港位置的山脈輪廓（參閱圖五）：

「當我們又到海上，陸地進入視野時，我們會注意，在這張海圖上標示為字母 H 的高山。當它在你的東方時，港口也在你的東方。在南方有個大的馬鞍

16 「一鐵砲的距離（gotelingschoot）」，根據建築史家 Jaap Jacobs 的說法，大約是 600 步或 250 萊因魯得（roede），換算為公制則約為 960 公尺。參見：Jaap Jacobs, *Dutch Colonial Fortifications in North America 1614-1676,*（Amsterdam: The New Holland Foundation, 2015）, p. 52. 淺灘實為大員沙洲由熱蘭遮城向西一直延伸到海水中的水下沙洲「潮埔（tidal flat）」，其位置並非只有海圖上所繪製的局部地點，參見第四節所引用庫克巴卡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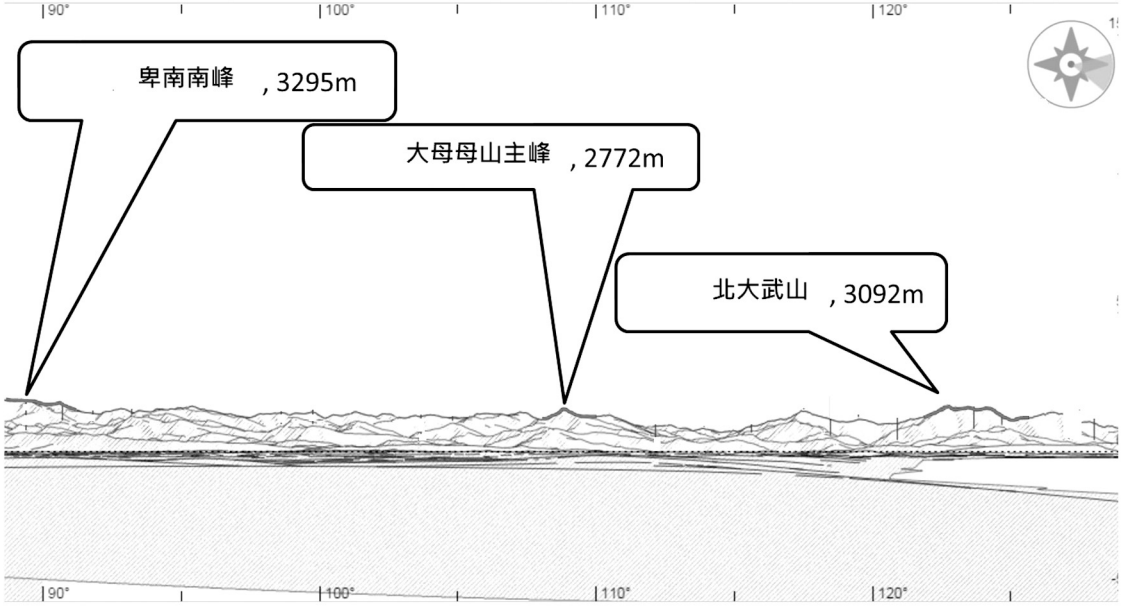
型山，然後是船型山。之後又會有一座有三個巔的山，位置在商館東南微東[按：即方位角 123.75°，英文寫作 ”southeast by east”] 的方向。這塊土地上一定能認出這些標誌。這些山都在澎湖的東南方。C 則是尖頂山，在商館的東南東方」



圖五：Heyndrick Ariensen lootsman, “Pascaert, waerin verthoont wort de gelegentheit van Tayouan enz” 海圖局部 , 1625. 此為未旋轉原圖方位，上方指向東方。此處海岸識形圖與真實方位無精確關連。

來源：NL-HaNA, Kaarten Leupe, 4.VEL, inv.nr. 302.

使用線上程式 Peakfinder，設定於鹿耳門近海向東方望，較於適合以上陳述的山形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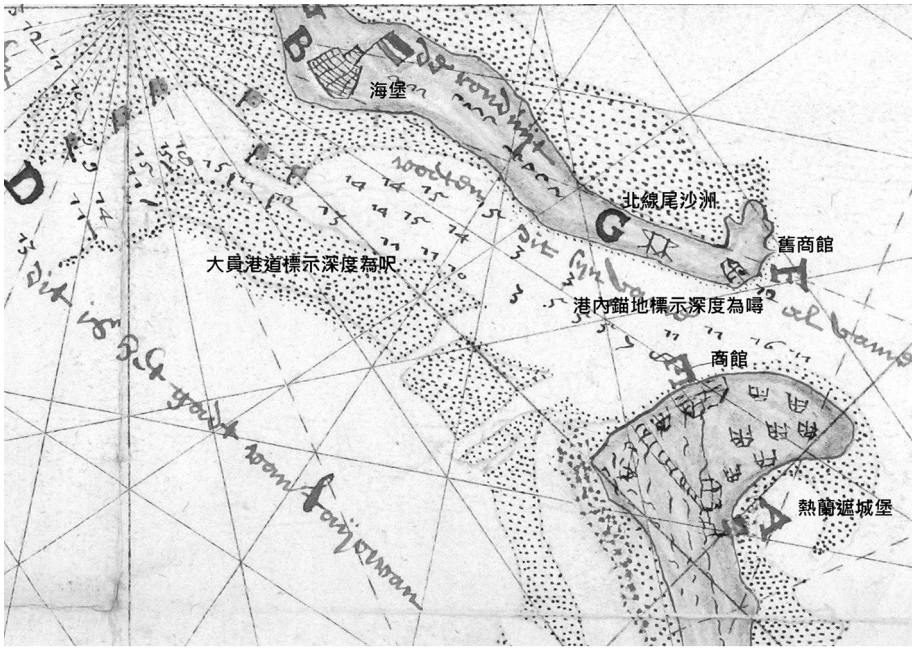
圖六：以電腦程式 Peakfinder 模擬鹿耳門近海所見中央山脈。卑南山位於 89.3 度，大母母山主峰位於 108 度，北大武山位於 122.7 至 126.6 度之間。

若將視點設於鹿耳門附近，亦即推測由外海迫近岸邊的「礁石」所在。此時大母母山山頂將落入入港指引所說的東南東方（112.50˚）。而大武山落在東南微東的方位（123.75˚），符合「三個巔的山」所在位置。據此可推測，大母母山即為入港指引與海圖所指稱的之尖頂山。「高山一角」可能為卑南山南峰，位於北緯 23 度 2 分左右。馬鞍狀的山為御油山，位於北緯 23 度整，也跟這張航海圖的圖例所說的「馬鞍狀山位於 [北線尾] 商館的正東方」大致相合。

此後，1629 年時，荷蘭駐軍已經在北線尾沙洲建立起海堡，取代前述黑色沙丘，成為海船入港時尋找的地標。此時，按照海岸識形圖來引導入港的重要性已經降低。由北方港外錨地啟程之後入港的航道，荷蘭人則有人工辦法加以標誌（參見圖七）：

> 「大員港道在兩側都以高出水面 2 噚的竹竿加以標誌，北側在竹竿上繫有白色的小旗子，向東北東方向延伸。當有人需要駛入時，必須將海堡對準其東北東方。[按：此處指準備進入水道時須就定位，當船隻抵達定位時，海堡會在其東北東方，圖七標示為 D 即接近船隻準備進入港道的位置] 當他抵達第一根立在北側的竿子時，應該會測得 16 呎的水深，第二根 9 呎，第三根附近水深 14 或 15 呎。這時他應該要沿著北側繼續航行，然後轉向東南方穿越竹竿之間，此處的水道無法確切的描述，因為經年不斷季風與洋流的沖刷下，水流方向經常改變。因此，每次都要謹慎小心處理。讓要前往大員的人，在巴達維亞時，就從那些最近到過大員的人處，取得資料，而且，在熱蘭遮城派人前來告知前述港道的適當資訊前，不要過早進入港道。」[17]

17 Collectie Aanwinsten 119（1866 A XII）, Beschrijvinge van de westcust van Formosa, de cust van China en Pehu ofte Pescadores, met haere riveren, baijen, diepten, droochten clippen, droogten segge coursen, hoochten ende inhammen, alles door verscheijden ervaren stuerluijden daertoe expresselijck gecommitteert, gedurende het gouvernement van E Hans Putmans ondersocht en bevonden, fos. 269-285.at 270. 以下簡稱為 ” Beschrijvinghe van de west cust van Formosa… ”。關於此份文件的介紹參見：拙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1622-1636〉，p. 221-226。第五節，1630 年代台海兩岸水文知識的整合與應用。這裡說第二支竹竿處，水深為 9 呎，其實已經過淺，滿載快艇很有可能會擱淺。部分譯文亦見於：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 • 論述篇》，（台北：漢聲，1997），頁 28。此段引文之「東北東」方，冉福立寫成「東北北」方。經查原文為 ”ONO” 即 ”oostnoordoost” 之縮略寫法，確為「東北東」方。



圖七："Caerte van Teyouan". Kustkaart met loodingen van 1629" 海圖局部，原圖上方指向東方，此處旋轉後，本圖上方為北方。標示 G 與舊商館 F 間的符號，則表示此處為內海或河流出海口的岸邊，為一港灣。

來源：NL-HaNA, Kaarten Leupe Suppl., 4.VELH, inv.nr. 140. 亦參見：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 • 圖版篇解讀篇》，（台北：漢聲，1997），頁 22-23。

1629 年所繪製的這張圖（圖七），特別是要表達由北方港外錨地進入大員港道的實況。正如同前引文所說，在大員港道的兩側都插有竹竿，北方竹竿上方繫有白旗。這裡所說繫有白旗的竹竿，應與十七世紀晚期漢籍史料所記載的「盪纓」有所關連（容後敘述）。

所謂的大員港道，其實是水下沙洲被水流所沖刷出來的凹槽（學理上稱為「潮線下沙溝（subtidal channel）[18]」）。圖上所繪製這個凹槽，最淺處大約僅 11 呎。這樣的深度，對於滿載的荷蘭快艇來說，已經幾乎要擱淺（容後詳敘）。位於大員港澳與北方錨地（約即前述港外錨地）間的這一大片沙洲，因隱沒於水平面下

18 多用於海岸地質學、海岸地層學、海岸沈積學的研究，例如：David K. Ralston, Mark T. Stacey, "Stratification and turbulence in subtidal channels through intertidal mudflat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0（2005）, pp. 1-16.

（學理上稱為「潮灘、（subtidal flat）[19]」），入港船隻必須要尋找其上夠深的沙溝作為航道，且不能在沙溝淤淺處擱淺。透過適當指引，即可被導入四面避風的深水港灣（大員港澳或大員內港，為前述之港內錨地，即狹義的大員港），進行裝卸貨的操作。根據上述文件的記載，大員港內錨地深度有 10-13 噚（40-65 呎），且底部堅硬。這樣的深度，大體上，即使是大型的荷蘭船隻，也足以安穩停泊。[20] 這一大片水下沙洲的情況，深受進出台江內海潮汐流量、流速、流向的影響，因此，不可能時時更新海圖來記載。是以，每當船隻抵達港外下錨處之後，就必須依靠大員當局派遣引水人來指引船隻入港。

四、大員港入港程序：號旗、號砲

前引文提到，船隻安抵北方或南方錨地停泊之後，「在熱蘭遮城派人前來告知前述港道的適當資訊前，不要過早進入港道」，這主要是大員港道的自然環境使然。由於荷蘭船隻多進行跨洋航行，吃水較深，入港必須駛過前述交互橫亙於灣澳以外的水下沙洲。如遇漲潮將水面推升數呎，或是先行卸貨、讓船隻吃水減少數呎，就能通過此一水下門檻。但這樣的操作，有賴灣澳旁熱蘭遮城的人員，與進入南北錨地的船上人員共同協作，才能讓港務順暢運作。為了協調雙方的活動，公司當局設計了一套標準作業程序。以下將此一〈航行程序〉迻譯於此：

大船、快艇等其他船隻進入大員碼頭必須遵守的航行程序

首先，大船或快艇，欲在南風季進入大員碼頭者，要將熱蘭遮城保持在其東北至北的方位，直到靠近岸邊，深度 14-15 噚處。此時，須將兩張中桅帆收起，做好準備，將前述城堡維持在同一方位，前進到水深 10 噚、砂質海床處。

但是若在收起中桅帆時，由岸上傳來一聲砲響，城堡上旗幟上下升降 3 次的話，則是要求前述前來船隻駛入水道的明確信號。此時，船應即停止下錨，立刻駛入水道，並注意城堡是否傳來另一聲砲響。若然，在砲響之後，此船

19 多用於海岸地質學、海岸地層學、海岸沈積學的研究。相關研究參見：Fan Daidu, “Classifications, sedimentary features and facies associations of tidal flats”, *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 2（1）（2013）, pp. 66-80.

20 “Beschrijvinghe van de west cust van Formosa…”, fo. 270.

即應降下所有的帆，在此處下錨。之後，若不再聽到砲響傳來，則將有引水人由水道駛出，前來導引船隻駛入。

若有船隻在北季風時前來，在北方礁岩附近下錨者，當他們收起中桅帆，開始前進，而聽到一聲砲響、望見旗幟升降三次時，就要立刻駛向水道。直到聽見另一聲砲響，那時，將會有引水人登船指引船隻，進入水道。

為了盡可能防止意外，在南風季時，各位高階官員應考慮不再登上他們的小艇前去登陸，或者 [不再] 派出小艇。而要等到看見有中式帆船、舢舨或小艇從陸上經水道駛出時，才利用這些小艇，將寫給岸上的書信，經水道迅速遞送到城堡。

在南風季，當你們於上述錨地下錨泊碇後，有風颳起的話，船上官員，無論日夜，都要有所準備。在白天，如聽聞城堡傳來三聲砲響、同時旗幟升降後，可以立刻拔錨，航向澎湖。在夜晚，當城堡傳來三聲砲響，還會搭配一些像是篝火的裝置。但這些表達向澎湖航行的信號（如篝火），可能會因為天雨遮蔽視線而看不見，無法馬上傳達。有時，因為退潮已經結束，水流不斷入港，正是緊急的時候；有時，則是在天候惡劣時出航，或是經歷暴雨。上述這些由城堡所發出的信號，需要一再觀測或傾聽，必須從全體撥派 1 至 2 個人去特別注意。

考慮到我們 [熱蘭遮城方面] 只是幫助或給予港內船上高階官員指引，所以，若他 [臺灣長官] 閣下未曾下令 [留在船上的其他人員] 要求等待前述明確信號，但事態產生變化，必須要在 [長官] 下令之前行動的話，則可以 [與此相反地] 開往澎湖。這種情況是很可能會發生的，因為 [遇到特殊情況]，船上人員比陸上人員能有更佳的判斷，知道必須做些什麼措施。而且在夜晚，因為強風暴雨的關係，人們可能也無法聽到信號。

抵達澎湖後，此船或船隊評議會須考慮，倘若天候轉好，是否要再回返大員，或是要等待長官的命令抵達，再遵循之。首先，前述評議會須考量，前述船隻上是否仍有巴達維亞運來的貨物？船上這些貨物是全滿還是半滿？或者已經全部卸貨完成，但裝載了一些要運到日本的貨物？因此，是否要用一些平底船或快艇（這些船在他們離開時，仍停留港內 [錨地]）將貨物運送到澎湖

來？他們必須要仔細衡量情況，深思熟慮地加以處理。若非有一些平底船或快艇會從大員渡來，則會在那裡等待天候轉好時將收到 [大員方面] 所送達的命令。將這些船作為載具，把送往日本的船貨載到澎湖去，並將巴達維亞送來的船貨卸下來。長官應該盡力避免船隻遭到任何危害，假若大員那裡沒有載具能夠運用，則必須在天候適合的時候，再度前去澎湖群島最南方的島嶼，從那裡很適合渡往大員。

當船隻在北季風時遭遇強風，而飄離合宜的錨地時，換言之，重新拋錨下錠顯然都不能免於危險時，這樣的一艘船，在聽到 [城堡傳來] 三聲砲響、以及旗竿上升上軍旗（topstander）後，必須開航，盡力在傍晚前抵達打狗角。或者越航而過時，則靠著沿岸，到下淡水溪河口泊碇，並且等待長官的命令。

同樣地，假若此地天候變得非常惡劣，但此船仍有能力迅速回到 [港外] 錨地，對此，不管是從陸地方面還是從水上，可以將上述服務公司的方案，根據適當的知識，決定船上與陸地上的作為後，加以取消。如城堡方想撤除在本航行程序所提出的信號，要升起親王軍旗與白旗，而船隻方面則發一砲響，表示已望見此一信號，會同樣遵循之。若是船隻方面要讓城堡方面知道，城堡方所發信號有沒有被看見，或是要引起城堡裡官員的注意，或是無法發砲的時候，就要升降三次它的前檣中桅帆（或巡航帆），來表示他們已經看見、聽見城堡發的信號並且理解了。

假如在城堡上升起白旗而沒有配上軍旗，並且發一砲響，那麼上級商務員就要跟船長一同登陸，前去參與評議會。他們要時時掌握其船隻還應該要裝入的船貨，還有船上已有的船貨，才能在登岸時與我們一同處理。

於大員新造 [城堡] 處，1637 年 3 月 15 日。[21]

這一份「標準作業程序」，將船隻進入大員近海分成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南季風的場合，一種是在北季風的場合。直到 1640 年之前，荷蘭船隻多半會先取道

21 Collectie Aanwinsten 1823（1953I）, Seijn Brieff voor de scheep en jachten al sander vaartuijgh waar naer hum in ’t aandoen van de reede van Taijouan sullen hebben te reguleeren, Tayouan,15 Mar. 1637, fos. 14^{r}-16^{r}.

澎湖，然後趁台灣海峽退潮，黑水溝這一段海峽流速減緩時，由澎湖橫越到臺灣西岸。在冬季（北季風時），會朝向魍港與蕭壟之間的海岸進行，以免北季風過強的情況下，船隻橫風飄移（leeway，又稱「風壓偏航」）向南越航大員。等到船隻進入臺灣西岸沿海，再藉由海陸風由大員北方南下尋找港路入港。而在夏季（南季風時），雖然一樣先取道澎湖，但由澎湖航向臺灣時，也一樣為了避免橫風飄移造成船隻向北越航大員，所以，是對正大員以南的壽山，來橫渡黑水溝。[22] 1640年代起，荷蘭船隻為了安全上的理由，漸次尋找不須取道澎湖的航行方式。[23] 但冬季由港外北錨地入港、夏季由港外南錨地入港的情況，並沒有太大改變。如同本文第二節所述，由嘉南沿岸尋找港路進入北錨地時，北方礁岩週邊水路最為險惡。因為海圖上以點狀描繪的礁岩，實際上並不會露出水面。而以實線標示的水面沙洲，走勢則與水下礁岩歧異。若順著水上沙洲露頭前進，船隻必然擱淺，由此可知海圖的重要性。

船隻與熱蘭遮城開始協作的起始點，在於船隻慢慢進入南北錨地附近水域時，是要順勢即進入水道，或是先暫停於南北港外錨地處。而當船隻開始收帆降低航速時，就是熱蘭遮城方面必須將其決斷清楚的表達出來，取得指揮權之時。根據「一響三降」的信號，聲明入港程序可以啟動。若在之後又聽到一聲砲響，則應在熱蘭遮城方面認定安全的近海水域，暫時投錨泊錠（應即南北錨地附近）。在南北錨地停泊時，熱蘭遮城方面應該會主動派遣引水人前來。因為南北錨地海床較為低窪，提供充分水深，波浪振幅減小，能提供泊錠船隻適當的水域靜穩度（calmness of basin）。而泥砂硬質海底，則提供錨體適當的摩擦力來定著船隻。南北錨地均是開放水域，無地形地物阻擋水面強風。故在等待進入水道的時機來臨前（通常就是漲潮並且有海風吹向陸地的時刻，視船隻大小載重船型會略有不同）的滯留期，停泊於此的船隻一旦遭遇強風，就必須另覓避風處，以免被吹向大員水道附近的水下沙洲或礁岩，造成擱淺損壞船體、損失船貨的後果。

對此，本程序亦載有船隻滯留港外遭遇強風，該如何應變的辦法。此時，城堡將發號砲三響並升降親王旗三次（南季風時）或升上軍旗（北季風時，是較長

22　拙著，“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pp. 302-308.

23　VOC 663, Resolutie van Batavia, Batavia, 5 June 1640, not foliated.

而尾端有分叉的旗幟），表示長官已經下達暫時出航避風的指示。一旦聽聞到這樣的信號，南季風時，則應航行到澎湖群島避風。（可能在馬公港泊錠）而北季風時，則駛到壽山（今旗津沙灘附近）或下淡水溪口（今東港溪出海口附近）避風。

由於南季風時，前來大員的船隻多半是要準備繼續前往日本。這些船隻可能已載有巴達維亞運來的香料，以及暹羅的鹿皮等貨物，要繼續裝載臺灣的絲貨與鹿皮。因此，船長成功避風後，需思考是否需回航大員裝卸貨，或留在澎湖，等待大員方面派遣船隻前來裝卸貨。[24] 這裡所沒有明言的是，船隻要再度橫越黑水溝，必須再等待每月的大潮退潮前後數日這樣的時機，不得不於澎湖耗費相當時日。若等待時間過長，季風時段過去，就無法順利前往日本。相對的，北季風時所載運的貨物，多是日本白銀，卸貨比較簡易，在北錨地停泊時，應能用船隻接駁。即便到旗津、下淡水溪口避風，接駁船也很容易與之聯繫，甚至還有陸路可行。故本程序對於北季風時期離開大員前往旗津與小琉球避風的船隻，要如何繼續裝卸貨，沒有更進一步的指示。1640 年，以上這份程序，在關於北季風的部分，曾由日本商館重複頒給前往臺灣的船隻使用，推測後來即成為一種標準的作法，而不再重新頒佈，故也不再留存於寄回荷蘭的檔案之中。[25]

五、大員港入港設施：駁船與引水人

從前述的程序當中，也可以發現，當時非但禁止船隻自行入港，也禁止來航船隻自行派遣小艇載運人員登岸。這都是由於入港水道的水流複雜，水下沙洲地形不斷變化，無法隨時記錄、先行提供測繪成果，只能由每日慣常進出的水手，按照最新經驗引路之故。李毓中教授曾發表〈近港情怯：荷據初期大員港的「近港船難」〉一篇，貼切的描述了 1620-30 年代，荷蘭船隻入港意外的慘狀。[26] 正如

24 實例請參閱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45 期（2015 年 9 月），頁 1-58，於 22-44。

25 VOC 1137, Seijnbrief voorde schepen fluijten ende jachten die uijt Japan vertrecken, waerbij haer aengewesen wert hoe dat in ’t aendoen van Taijouanse reede hen sullen hebben te reguleren, Firando, 20 Nov. 1640, Fos. 851$^{r\text{-}v}$. 此文件指出，是根據 1636 年 3 月 3 日所發出的版本。故不排除後面這一版本比本節討論的版本起源更早。

26 李毓中，〈近港情怯：荷據初期大員港的「近港船難」〉，《歷史月刊》，235 期（2007 年 8 月），頁 27-30。

上述入港程序的說明，在南北錨地停泊的船隻，需等待熱蘭遮城方面，派遣小艇或吃水較少的中式帆船前來接引、指示。這也是荷蘭人為推動大員港務，所提供的解決辦法。在此必須指出，如同臺灣西南部河流有冬季之枯水期與夏季豐水期一般，大員港道受到水流沖刷，應也有枯豐之分。即使枯水期水道變淺，通常在夏季強烈降雨或颱風造成的水流沖刷後，也可能再度加深。據說這樣來來回回，曾發生同年度前後差異 5-6 呎的情況。[27] 再者，每月、每日之漲退潮，也會改變水道的深度。根據 1636 年之調查，大員附近潮差為 2 呎（應非最大潮差）。[28] 而每日的潮來潮往，正是讓大員水道附近水下沙洲，乃至於水道位置不斷改變的主要原因。督察官庫克巴卡（Nicolaes Couckbacker）於 1639 年時進行的實地勘查對此有詳細說明：

> 熱蘭遮城的正對面為北線尾沙洲，由東向西延伸，接著是北線尾島，還有北方礁岩。他們對於阻擋海流，還有強烈南風推送的水流，很有用處。從城堡及高起的沙丘延伸向西到海裡，有一塊水下的沙洲。所謂南方淺灘，即此沙洲的最西端。這沙洲並延伸到大員港道的入口。這兩塊向海延伸的沙洲，一者為露出在水面上的北線尾，另一者為水面下的南方淺灘，造成了大員水道，寬約 1/2 鐵砲的射程，長約比半荷哩稍短，目前深度在 [夏季] 小潮高潮位（ordinarie tije）有 14 呎，大潮高潮位則有 16 呎。漲潮潮水能從南方進入水道，並突穿或繞過、越過南方淺灘，流注至北線尾沙洲，沿著它流動直到它的最東端，在那裡轉向東北微北，還有東南東去，衝擊到此處並灌注於更廣大的水體 [按：即台江內海]。退潮的水來自前述的內陸水體，從北方流過來，造成一處快速流動的水流，從前述北線尾的東端，沿著它從大員水道流出，也會越過前述的南方淺灘而去。[29]

27 VOC 884, Missive van Batavia naar Taijouan, Batavia, 21 April.1660, fo.130.

28 拙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1622-1636〉，頁 224-225。當代研究指出安平港地區的平均潮差為 0.53 公尺，合於此處所記載的兩荷呎（約 60 公分上下）。參見：蘇青和、吳基、徐如娟、林受勳，〈安平港港口區域潮汐及海流特性研究〉，《第二十四屆海洋工程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海洋工程學會，2002），頁 525-532。

29 VOC 1131, Rapport [van Nicolaes Couckebacker]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al Anthonio van Diemen ende de raeden van India, nopende Couckebacker's besendinge near Tonckin ende gedaen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erderen ommeslag uij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dt Formosa, at fluitship *De Rijp*, 8 Dec. 1639, fos. 267-268.

根據臺灣當局報告巴達維亞方面的函件，及《熱蘭遮城日誌》的記載等，我們大概可以還原每年夏季，大員水道最淺處（姑且稱為水下門檻）的深度。另一方面，把這樣的深度再減少 0.5-1 呎，大概即是入港船隻滿載後，尚且可以安全通過的吃水深度，以下用表列方式來呈現其變化。

年份	水道深度（夏季小潮 [平均] 高潮位）（括號內為推估）	船隻入港最大安全吃水深度
1622	15 [30]	
1629	13 [31]	
1635	11, 11.5 [32]	
1636	（12.5）	12 [33]
1637	（11.5）	11 [34]

30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1979），頁 330-331。當時所測低潮水位水深有 12 呎，荷蘭人並且推估高潮位有 15-16 呎，相差 3-4 呎（即 0.9 至 1.2 公尺）。前者符合當代研究所稱安平港附近之平均最大潮差（0.99）公尺而後者符合於最大潮差（1.33）公尺。但最大潮差僅於每月朔望出現，故其小潮高潮位應該僅為 15 呎左右。當代研究數據參見參見：蘇青和等，前引文，頁 526。

31 VOC 1098, Kort verhael uijt welck voor oogen ende ten oordele gestalt wert ofte de oncosten, die de compagnie tot vervolg van den Chinesen en Japonschen handel te leijden heeft, oock soodanigen avancen geeft, dat de lasten daeruijt niet alleene overwonnen, maer oock daerenboven goede somme jaerlijcx bij deselven geprospereert, ofte wel , dat de macht ende contanten daertoe noodich, op andere plaetsen met meerder avantagie gebruijckt connen warden, te presenteren aen de Ed. Heeren bewinthebberen, den gouverneur general en de raden van India; bij Pieter Nuijts gedaen in Zeelandia op Formosa, Tayouan, 10 Feb. 1629, fo. 391[r]. 記載大潮高潮位為 14 呎，故推算小潮高潮位應為 13 呎。

32 江樹生主譯 / 註，《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V）1629-1636》（南投：臺灣文獻館，2015），頁 677。〈宋克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35 年 3 月 9 日，在熱蘭遮堡。

33 Leonard Blussé, Margot E. van Opstall, Ts'ao Yung-ho and Wouter. E. Milde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s-Gravenhage: Nijhoff, 1986-2000）, 4 vols, Vol. 1, p 267. 7 Aug.1636. 後文略稱為 "DZ"；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 252-253。江樹生譯文「因為要在 12 呎處停泊，可以在這港道入港」應修正為「因為 [就算] 裝載到 [吃水]12 呎深，[還] 能通過這港道入港。」

34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頁 343。1637 年 8 月 24 日；VOC 1123, Originele missive Van Jan van der Burch naer Batavia aen gouverneur general van Diemen, Tayouan, 16 Oct. 1637, fo.741[v]-742[r.]

1639	14 [35]	
1642	16-17 [36]	
1645	（14）	13.5 [37]
1646	（14）	13.5 [38]
1647	（12.5）	12 [39]
1650	9 [40]	7-8 [41]（冬季）
1651	（11.5）	11 [42]
1652	10-11 [43]	
1653	10.5 [44]	
1654	11 [45]（秋季）	10, 10.5 [46]（秋季）

35 VOC 1131, Rapport [van Nicolaes Couckebacker]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l Anthonio van Diemen ende de raeden van India, nopende Couckebacker's besending naer Tonckin ende gedaen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erderen ommeslag uij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dt Formosa, at fluitship *De Rijp*, 8 Dec. 1639, fos 267-268.

36 VOC 1141, Corte rapport over eenige poincten concernerende den jegenwoordigen stant der Japanse, Chinese, Tonquinsche commertie, insgelijcx ons gevoelen wegen de Quinamse saecken, en hoe de Tonquinsche negotie bij vertieringe van eenige profitabile coopmanschappen in Europa soude connen verbetert, en wijder uijtgebreijt warden, door Carel Hartzinck, Amsterdam, 26 Aug. 1643, fo. 364[v].

37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頁 462。1645 年 9 月 16 日。

38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頁 581。1646 年 9 月 9 日。

39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2000），頁 295。1647-12-31；林偉盛，前引文，頁 9。

40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323。1651 年 1 月 20 日。譯為「退潮」，經查原文 doodt getij（現代荷蘭文拼為 doodtij）亦為小潮潮位之意。參見：Cheng Shaogang,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Ph.D. diss. Leiden University, 1995）, vol. II: Appendix, p. 275.

41 VOC 1183, Missive van Nicolaes Verburch naer Batavia aen Cornelis van der Lijn, Tayouan, 20 Dec. 1650, fo 548

42 VOC 876, Missive van Batavia naar Taijouan, Batavia, 21 May 1652, fo.226;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338。1651 年 12 月 19 日。

43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353。1652 年 12 月 24 日。經查原文「平常水深（gemeen tije）」應為「一般高潮位」。參見：Cheng Shaogang,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p. 303.

44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388。1654 年 1 月 19 日。原文「在漲潮時不過 11.5 荷呎深」，經查原文應為「在大潮高潮位 (springh tije) 時不過 11.5 荷呎深」，故推算小潮高潮位為 10.5 荷呎深。參見：Cheng Shaogang,"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 p. 342.

4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 429。1654 年 11 月 2 日。

46 同前書。

1655	10[47]	
1656	13[48]	
1659	9[49]（冬季）	
1661	小於 10[50]	

表一：歷年夏季大員水道門檻小潮高潮位深度，括號內是由船隻入港最大安全吃水深度逆推所得數值。「小潮高潮位」意指荷蘭人概略測量所得數值，近似於當代「小潮平均高潮位」，惟其僅計算夏季數月平均值。

來源：參見註釋 30-51。

由上表可以看出，大員水道在 1630 年代稍淺，但到 1640 年代又變深，而 1650 年代，淤淺的趨勢則持續發展。因為這種每年、每季來來回回淤淺、刮深的發展，使得在 1650 年代，大員當局即有人提出整治水道的工程計畫，巴達維亞當局卻遲遲無法決定是否要投注資本。（容後敘述）而船隻是否要進入大員港內錨地，則牽涉到貨物體積與數量。倘若在大員轉運的貨物，以體積較小、數量稀少的奢侈品為主，如絲綢、香料、金銀等，則無需使用大型船隻，進入內港停泊卸、取貨。相反的，體積大，數量多的貨物，如蘇木、鹿皮、蔗糖、米穀，則不但需要靠近倉庫卸貨，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停泊。關於在大員所使用的荷蘭船隻之船型、數目，以及其在大員港及澎湖周邊的運作等，林偉盛教授利用已出版的荷蘭史料，已有宏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詳論。本文在此則不擬重複，請讀者諒察。[51]

此處所要探討的是，在港道變遷的過程中，大員當局採取何種方針來加以對應。1635 年，漢斯 • 普特曼斯（Hans Putmans）長官根據大員港的情況，向巴達

47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 516。1655 年 7 月 22 日。
48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466。1657 年 1 月 31 日。
49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V）》，頁 377。1660 年 1 月 29 日〈長官 F. Coyett 與議會寫給總督 J. Maetsuycker 的信〉。此處記載的「平均深度」，應為夏季小潮平均高潮位之意。
50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V）》，頁 542。1661 年 7 月 9 日。
51 林偉盛，前引文。

維亞當局提出，應派遣 10 艘平底船（fluijte）或 pinas 船，各載重 180-200 拉斯特到此水域值勤，其滿載吃水深須為 11 到 12 呎以內，不可再深。[52] 翌年，巴達維亞當局同意將送包括 6 艘平底船，共 14 艘船前來。根據林偉盛教授的研究，當年度除 6 艘平底船以外，另有 7 艘快艇抵達大員。[53] 這應該是綜合考慮了在東亞水域活動的需要以及大員港灣的環境所做出的決定。

1636 年之後，大員開始試種甘蔗、生產蔗糖，約翰・范得堡（Johan van den Berg）長官在寫給阿姆斯特丹分公司的書信中強調，兩年前普特曼斯向阿姆斯特丹分公司所要求供應的平底船尚未取得，如此，在大員缺乏倉儲空間、船隻載運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有可能必須取消種蔗的訂單，造成公司損失。[54] 范得堡長官在信中也提到，倘若有大型海船（又譯「歸國海船」）在澎湖停泊時，使用平底船接駁，可免去利用多艘、多趟中式帆船，將準備送交日本的貨物轉運到澎湖的風險。他並舉出實例，表示平底船東卡佩（Oostcappel）號，滿載吃水僅有 11 呎深、而載重則比快艇德萊普（De Rijp）號、鴿（De Duijve）號及女皇帝（Keijserinne）號多載 20 拉斯特（此三船滿載吃水則為 12 呎深）。[55] 可見港道水淺，迫使大員當局在為大型海船進行裝卸貨時，必須依賴平底船為駁船。過去這種場合，大員當局應該也曾依賴中式帆船。既然使用情況不盡如人意，當然要採取比較堅緻耐用的荷蘭船隻來擔當此一任務。[56]

1637 年後，由巴達維亞方面輸送給大員的平底船（載重 150-200 拉斯特），其滿載吃水量能克服大員港道的自然限制，可利用每日漲潮時進出水道，最大化

52 VOC 858, Missive van Batavia [Anthonio van Diemen] naar Taijouan aen den Heer gouverneur Hans Putmans, Batavia, 16 April 1636, fo. 266.

53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頁 16。拉斯特（last）為衡量船隻載重能力的單位，目前一般都將 1 拉斯特推定為 2 噸的載重能力，但仍有爭議。

54 VOC 1123, Originele missive van Jan van der Burch near Amsterdam aen de Camer Amsterdam, Tayouan, 16 Oct 1637, fo 741v.

55 VOC 1123, Originele missive van Jan van der Burch near Amsterdam aen de Camer Amsterdam, Tayouan, 16 Oct 1637, fo 741v.

56 林偉盛教授認為由小型快艇到平底船的轉折與 1635 年以前公司執行武裝行動有關，與 Herman Ketting 看法一致。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頁 15。

接駁載貨的能量，來接應那些停留於澎湖或南北錨地的大型船隻之裝卸貨需求。[57] 但相對的，當海象或潮汐狀況不足以讓平底船入港之時，仍需要派遣更小型的船隻由大員灣澳接駁，取卸停泊於南北錨地或澎湖之平底船的貨物。1637-1638 年時，即偶有小艇從事卸貨與搜救的任務。[58] 而 1639 年，范得堡長官即利用小型快艇小布列丹（Cleen Bredam）號（載重約 60 拉斯特），瓦特盧菲佛（Waterloose werve）號（載重約 36 拉斯特），中式帆船密得堡號（載重約 40 拉斯特）來轉運停泊於港外錨地，使用平底船欲起卸到港內的貨物。這三艘船一度常駐於大員，並由大員當局來支薪。為了支援以上較平底船更小的駁船，讓他們在臺灣沿岸執勤時，無須經常入港補給糧食彈藥，又需要更為小型的領港艇或小艇來加以支援。當時便有一艘載重 5 拉斯特，附有艙蓋的領港艇，與另一艘載重相若，但無艙蓋的小艇在大員，兩艘一同負擔支援任務。范德堡長官同時再向巴達維亞方面請求，另外輸送兩艘小艇。並且指出，其中一艘載重相似的小艇，必須附有艙蓋，並設有單桅。如此才能在海象天候惡劣的情況下，進出大員港道，負擔救援任務。他要求另送一艘開放無蓋的小艇，則僅需載重 2.5 到 3 拉斯特。[59] 1640 年 1 月，范得堡長官又致書請求送來兩具千斤頂，以備於陸地修茸上述兩艘領港艇、小艇，以及中式帆船。[60] 1641 年繼任的特勞牛斯（Paulus Traudenius）長官也在大員又造了一艘大領港艇。[61]

57 Herman Ketting, *Fluitschepen voor de VOC,* (Zaltbommel: Aprils, 2006), p.35. 作者指出 1645 年來航的平底船載重約在 150-200 拉斯特之間，吃水約 11 呎深。他並指出若是載重較大的平底船如多羅米達里斯（Drommedaris）號（280 拉斯特）和大衛王（Koning David）號（300 拉斯特），即無法通過大員港道。

58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頁 325。1637 年 7 月 12 日。此處所說的「小船（boot）」應即具有主桅的小艇。前引書，頁 332。1637 年 7 月 29 日條，又說明派出接應的小船具有「篷蓋」，應即艙蓋設施。前引書，頁 375。1638 年 1 月 29 日條，「公司的小船」。前引書，頁 402。1638 年 7 月 19 日條「我們的那艘大的小船」。前引書，頁 440。1639 年 6 月 16 日條「派那艘大的小船出港」。以上均為派遣小艇出港接應或上卸貨的記載。

59 VOC 1131, Rapport[van Nicolaes Couckebacker]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al Anthonio van Diemen ende de raeden van India, nopende Couckebacker's besendinge near Tonckin ende gedaen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erderen ommeslag uij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dt Formosa, fluitship *De Rijp*, 8 Dec. 1639, fo. 293.

60 VOC 1133, Memorie van de coopmanschappen, ammonitie van oorloge, fortificatie ende andere nodigheeden welcke tegens het aenstaende Zuijder Mousson anno 1640 voor het Comptoir Tayouan van Battavia ende Siam geeijst wert, Tayouan,28 Jan. 1640, fo. 201.

61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頁 5。《巴達維亞城日誌》1640-1641，頁 263-268；〈長官 P. Traudenius 於 1641 年 3 月 17 日在大員寫給總督 A. van Diemen 的書信〉。荷文 "loodsboot" 江樹生譯為「領港船」本文則譯為「領港艇」。

這些領港艇、小艇、中式帆船，正如同上一節入港規範所提出的一樣，在船隻來航，並進入南北港外錨地附近水域時，必須由熱蘭遮城主動派遣出港，去接應其入港。根據《熱蘭遮城日誌》的記載，此項操作，也約在1639年開始常規化。[62] 由於領港艇無論任何時候，只要來船抵達便必須出港接應，自然不能受到港道水深與風向的限制，且必須是較為堅緻，可以靈活調度的船隻。1642年，大員派出領港艇北上雞籠與淡水支援時，曾記載大型領港艇裝載了80名人員（包括了水手與士兵），藉此可看出其一般的載運規模。[63]

1642年時，前述大領港艇主要都由西蒙・科內利森・克羅斯（Simon Cornelisen Clos）舵手來駕駛，扮演著聯繫大員與基隆、淡水駐地的主要角色。[64] 1643年時，在《熱蘭遮城日誌》當中記載，其職銜為「引水員（loots，江樹生教授譯為稱為「領航員」）」。[65] 由此可推估，大員港引水員的正式職位，大約是在此時確立。前面已經提到，1640年代中期大員水道（門檻）深度維持在13-14呎左右，大體上夏季來訪的平底船，經由領港艇引港，均能順利於大員內港裝卸貨物。前述的小型快艇因此沒有用武之地，隨後調往他處服務。[66] 此時引港的工作，大約都是由前述的引水員與領港艇來擔任。既然哈克・包威爾森（Harck Pouwelsen）於1645年起，擔任臨時引水員，又於1646年扶正，他可能即接任前述克羅斯之職缺。[67]

62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頁453。1639年9月29日條「那艘昨夜派出的大的小船（de groote boot）回來了」，「大的小船」即本文所稱之領港艇。

63 VOC 1140, Missive van Paulus Traudenius near Amsterdam aen de Camer Amsterdam, Tayouan, 5 Oct. 1642, fo. 456^{v}.

64 其履歷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頁20。註10。

6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頁184。1643年8月15日。

66 如Cleen Bredamme於1640年7月30日抵達蘇門答臘西南岸的Indrapura值勤，參見：J. A. van der Chijs,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Anno 1640-1641, (’s-Hage: M. Nijhoff, 1887), p. 12. 21 Sept. 1640. 而Waterloose werve則於1640年1月24日啟程調往暹羅。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頁467。1640年1月24日條。

67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25。1648年3月24、25、26日。及註30。

但 1640 年代末，大員港道淤積趨勢陡增，在 1650 年造成大部分來訪平底船無法入港，須於南北港外錨地或澎湖裝卸貨物的慘狀。[68] 雖然大員當局於當年度即提出運用水利工程來濬深水道深度的構想，但由於每年夏季豐水期，大員水道仍有可能再度被沖刷出較深的港道，巴達維亞當局遂決定，先調動吃水更淺的小型船隻，前來大員應急。等待港道的變化確定後，再做決策。[69] 1651 年夏季，巴達維亞當局派出於暹羅製造、巴達維亞裝修完成，載重 70 拉斯特的巴克艇（barck）阿姆斯特丹號前來。並指出，另有一艘載重 35 至 40 拉斯特的小艇，在巴達維亞的工廠即將完成。還有一艘稍小的小艇，則剛開始製造。這些都是為了讓大員當局，可以避免雇用中式帆船，自行派船接駁裝卸貨物之用。這艘巴克艇送抵大員後，則升任原先擔任引水員的包威爾森為其船長。[70] 前述載重 40 拉斯特的小艇，則可能即是後來的（大）領港艇伊哈福摩沙（Ilha Formosa）號，則在 8 月抵達大員，也稱為加雷翁艇（又譯「大帆船」）伊哈福摩沙號。[71] 包威爾森順利升任後，引水員一職應即由西克・彼得森（Sicke Pieterszoon）接任。[72] 其後，大員港道水深雖然稍有加深，但到了 1654 年 7 月 1 日，引水員出港時，曾略過領港艇而直接駕舢舨出航，「因為要搭小船 [領港艇] 不能那麼快就啟程」，暗示領港艇也無法在低潮位無礙出航。[73] 當年的 11 月 2 日，引水員測得，漲潮時水道深度為 11 呎，故判斷只有吃水淺於 10.5 或最好是 10 呎的船隻，才能入港。而滿載的平底船，亦被阻於港外。[74] 之後，於 1655 年，仍不適於導引平底船入港。甚至，連領港艇本身也

68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323。1651 年 1 月 20 日。又在此數年間，此種淤淺情況似非大員獨有，1648 年越南東京（河內）港道亦淤淺至 12 呎深。參見 Ketting, *Fluitschepen voor de VOC*, p. 37.

69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323。1651 年 1 月 20 日。關於巴達維亞方面的觀望態度，可以從後來 1661 年阻止大員方面下手進行工程的回函看得出來。參見：VOC 884, Missive van Batavia [van Joan Maetsuijcker] naer Tayouan aen den gouverneur [Frederick Coyett] ende den raet aldaar, Batavia, 22 April 1660, fos. 130-131.

70 VOC 875, Missive van Batavia [van Carel Reniersz.]naar Taijouan aen den heer gouverneur Nicolaes Verburgh ende den raadt geschreven, Batavia, 11 May 1651, fos. 181, 190.

71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 235。1651 年 8 月 1、2 日；VOC 875, Missive van Batavia [van Carel Reniersz.] naar Taijouan aen den E. commissaris Wilhem Verstegen en vice gouverneur Nicolaes Verburgh, Batavia, 22 June 1651, fo. 224.

72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 273。註 69。

73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 348。1654 年 7 月 1 日。但也有可能導航艇另有其他阻礙其出航的原因亦未可知。（如修茸不及等因素）。

74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 429。1654 年 11 月 2 日。

無法輕鬆通過港道。[75] 接下來數年，直到 1662 年荷蘭人撤走之前，大員港道的淤淺趨勢都沒能再扭轉，而逐漸淤淺至 11 呎之內。這已觸及大部分中型平底船最淺的吃水深度。而領港艇，也越來越少被派遣擔任接引的任務，多逕由舢舨接替。

1650 年，當大員水道一度淤淺到 9 呎時，巴達維亞當局其實已經意識到，未來平底船勢將難以進入大員港內錨地裝卸貨。在港外錨地裝卸貨時，領港船以及中式帆船都不夠堅緻，難以在惡劣天候下執行任務。他們決定向荷蘭方面預訂加雷翁艇來負擔於港外錨地裝卸貨的工作。[76] 1654 年，天候異常惡劣。公司在此航行的船隻，卻已老舊不堪。結果，該年巴達維亞派出的 11 艘北上船隻，僅有 7 艘勉強平安抵達目的地。為了解決以上汰舊換新與港外裝卸的問題，翌年（1655），巴達維亞當局向荷蘭方面訂製了非常小型的平底船與加雷翁艇。即所謂：「吃水淺的平底船，載重約 70、80 到 90 拉斯特，以及 6 到 8 艘加雷翁艇。」[77] 一年後（1656 年），大員當局請求巴達維亞當局派遣加雷翁艇前來，也希望盡快抒解港道淤淺造成的運輸問題。[78] 當年夏季，即有 3 艘小型船隨同加雷翁艇紅狐（Rode Vos）號抵達大員。[79] 1657 年夏季，巴達維亞當局又回覆，已經向荷蘭方面，再爭取訂製 5-6 艘紅狐號那樣的加雷翁艇（載重 30 拉斯特），還有 2-3 艘，類似布魯克列（Breuckele）號那樣的小型平底船。惟當時巴城尚且缺乏此類船隻，無法立即供應，希望大員方面自求多福。[80] 根據荷蘭檔案的記載，當時為大員訂購的小型平底船的船隻尺寸為「載重 80 拉斯特者，吃水約 9 呎」。這勉強符合大員港道淤淺後的要求。[81]

由此亦可推知，在 1657 年之後，大員港道持續淤積的趨勢若不改變，已經難以將載重 150-200 拉斯特的快艇、平底船引入港內，必需直接於南、北港外錨地或澎湖裝卸貨物。除了船隻堅緻度不足外，領港艇由於載重量太少（5 拉斯特），也

7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 523。1655 年 8 月 1 日。
76 Ketting, *Fluitenschip voor de VOC,* p. 35.
77 Ketting, *Fluitenschip voor de VOC,* p. 37.
78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433。1656 年 2 月 1 日。
79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466。1657 年 1 月 31 日。
80 VOC 881, Missive van Batavia [van Joan Maetsuijcker] naar Taijouan aen den E. president Frederick Coyett ende raedt, Batavia, 15 May 1657, fos. 155-156.
81 Pieter van Dam, F. W.Stapel ed., *Bescrryvinge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27), Eerste Boek , Deel I, p. 469

不適於當成駁船來運用。而加雷翁艇（有時又稱大領港艇）載重為 30 拉斯特，較適合作為駁船運用。[82] 前述領港艇吃水較舢舨為深，故若僅是迎接來船，並傳遞訊息，則又不如舢舨出入水道便利。結果，在荷蘭時代末期，於大員港道活動者，多為舢舨與加雷翁艇，偶有領港艇與小型平底船。與大員港於 1640 年代，中型船隻齊集內港的盛況，大異其趣。船隻既不入港，引水員也無用武之地。彼得森擔任引水員之任期，較前兩任都長（約 1651-1661，至少 10 年，其前任則各為 5 年、4 年），可能便是由於引水員功能弱化，業務減少，不需訓練新人之故。

六、代結論：大員港務設施的成立與延續

風帆時代港灣之成立，有其自然條件的背景：適宜的水深、可遮蔽強風的地形、容易辨識的地景標誌等。而一旦自然港灣被選作人類運用的重要海港，則使用者也必然投注相當努力，來改善自然環境所造成的不利。大員港不利之處，在於缺乏適當標誌地景，很難從海上發現其位置（反之打狗灣澳、小琉球則不然），其入港水道，遍佈水下沈降沙洲，時時變換型態，難以捉摸。面對缺乏自然標誌的問題，荷蘭人以建築人造標誌來解決。如海堡為北錨地之重要標誌、熱蘭遮城則為南錨地與入港時的重要標誌。其後，海堡雖因颱風掏空地基而崩塌，但熱蘭遮城直到十九世紀，都還是航行至安平港的重要標誌。[83] 面對水下沈降沙洲變換的問題，荷蘭人則以設立水道旗標以及派任引水員的方法來對應。

1662 年之後，鄭氏政權佔領熱蘭遮城，持續使用大員港內錨地，如 1664 年成圖的〈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上即標示：「此港極深，從來過臺灣，皆由此港入」。[84] 1672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人員戴輔（Simon Delboe），曾乘中式帆船由澎湖前往安平，也由大員港道入港。他描述：「…此港的入口非常危險，為許多沙

82 關於荷蘭時代晚期活躍於大員港道的加雷翁艇，參照：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頁 19。表二。

83 海堡毀於 1656 年之颱風，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頁 136。1656 年 10 月 8 日。十九世紀時，要到安平港停泊船隻仍須藉助熱蘭遮城堡為地標的記載見：Charles J. Bullock,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London: Hydrographic Office, Admiralty, 1874), vol. 3, p. 238.

84 陳漢光，賴永祥，《北台古輿圖集》（台北：台北市文獻會，1957），頁 5。此書將「來」誤識成為「未」，文意不通，筆者已改正引文。

洲與無法確定位置的礁石所阻，所以，任何吃水高於 9 英呎的船隻均不可能進入。我們以為，在此一水域，因為水象變動不居，雙桅小艇（ketch）或平底小艇（pink）比快艇或大海船更適合在這港灣活動。」。[85]〈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上，亦於三鯤身處標示：「夾板往來泊舟處」，「夾板」指稱的為西洋式船隻，故此「泊舟處」亦即本文所稱的港外南錨地。1672 年夏季，英國東印度公司人員林布瑞（William Limbrey）曾乘歸返號（Return）前來臺灣，他一開始停泊于南錨地，兩星期後，鄭經便派出領航員帶他們前往澎湖停泊。他們等到秋季之後，又受鄭經命令，前往港外北錨地接受出航許可。[86] 由此可知，大體上，大員入港規範（港內外錨地、引水人）變動不多。

雖然文獻沒有提及，但可能入港水道上仍有竹竿標示。1686 年蔣毓英修撰之《臺灣府志》則記載：「…西至海…，曰鹿耳門（在臺灣港口，行如鹿耳，鎮鎖水口．其港又甚隘，下有隱石，行船者皆以浮木植標誌之）…離安平鎮不及里許，中一港，名大港，紅毛時甚深，夾板船從此出入，今淺）…」[87] 由此可知當時鹿耳門已經逐漸取代大員港道，為通往台江內海大員港內錨地的入口。此處以「浮木植標」標示水道範圍的作法，則可能仍延續過去荷蘭人用於大員港道的習慣。1735 年，尹士俍所著的《臺灣志略》，描寫更為詳細：「鹿耳門…鐵板沙潛伏水底，最為險惡。土人插竹繫纓布為招…海航往來，必由招中；否則，沙衝舟滯，立為浪碎…」[88] 此一水道旗標：「招」，後來稱之為「盪纓」。如 1752 年王必昌於《重修臺灣縣志》所記載：「…插竹立標、南白北黑，名為盪纓…」。[89] 從外觀與功能來看，這與過去荷蘭人標誌大員水道的旗標，並無二致。對於清代台南水手如何藉此應付沙汕與水道變化，吳密察教授則有詳論，在此亦不深論。[90]

85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Wu Mi-tsa,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1670-1685*,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p. 152. Simon Delboe and Council at Taiwan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London, 16 September 1672.

86 C. R. Boxer," Jan Compagnie in Japan 1672-1674", in:id., *Dutch Merchants and Mariners in Asia 1602-1795*, (London: Variorium Reprints, 1988) pp.138-203 at 174-176.

87 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1686），頁 16。

88 尹士俍，《臺灣志略》（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1738），頁 245-246。

89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1752），頁 119。

90 蔣毓英《臺灣府志》（1686）：「鹿耳門，…下有隱石…行船者皆以浮木植標誌之。」關於清朝統治下的大員港灣，可參閱：吳密察，〈清代安平的港口條件初探〉，於江明珊、謝仕淵編，《古城、新都，神仙府：臺南府城歷史特展》（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1），頁 30-39。

在鄭氏與清政府統治初期，進入鹿耳門水道之中式帆船，其規模應與荷蘭時代的大領港艇或加雷翁艇相似（載重約 40 拉斯特），洵非荷蘭人佔領澎湖時之大型海船（約 300 拉斯特）、1640 年代入港裝卸貨之中型平底船（200 拉斯特）可比。根據記載，載重 91 拉斯特的大型加雷翁艇特布得（Ter Boede）號（長寬深為 25.5X6.4X3 M）大約與清代中型的趕繒船（長寬為 23.7X5.4M）大小相當。那麼，一般在大員使用的，載重約 30-50 拉斯特的加雷翁艇，可能與清代的水艉船大小相若。[91] 儘管在清代，安平港（即荷蘭時代大員港內錨地）也並非十分容易使用的港口，但安平居民沿用荷蘭時代的辦法，卻讓這個港口能夠持續營運下去。熱蘭遮城作為安平附近沙岸突出的海岸地景，在在十八世紀唐人的航海針路書裡，仍被當成導引航行的重要地標來看待。[92] 而大員港道淤淺，為鹿耳門水道取代後，卻藉延續「盪纓」這種水道旗標設施，讓大員內港仍能保持一定的功能。這使得清廷得以在一段不短的時期內，藉此控制大宗的人員與貨物出入，而保證了臺南府城（即為荷蘭時代的普羅文遮市）作為臺灣西南岸政經中心的地位。由此觀之，荷蘭時代的港務設施，經過鄭氏時期之因革損益，時至清初，仍持續發揮功能，而使得安平 - 赤崁保留港口吞吐作用，持續影響著清代臺灣史的發展。

91 李其霖，〈清代臺灣水師與戰船的建置〉，於同氏編，《宮廷與海洋的交匯》，（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17），p. 403. 表四；Pieter van Dam, F. W.Stapel ed., *Bescrryvinge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27),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27), Eerste Boek , Deel I, p. 772.

92 向達，《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33-134。其中〈順風相送・塒裏取台灣港口〉便將「王城」作為導航指標。

The Trade Network between Nagasaki (長崎), Banten and Anping (安平) in the 1670s

SAKAI Takashi（坂井隆）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Nagasaki (長崎) Port in 1673

Nagasaki was a major port located on Kyushu (九州) Island, Japan. It was open to foreign traders for most of the Tokugawa (德川) Shogunate period (1600-1868). Importantly, the Chinese and the Dutch directly traded with the Japanese here. Special residential quarters for both groups of foreigners were constructed such as Dejima (出島), a small manmade island for the Dutch after 1640, and Tojin-yashiki (唐人屋敷), a walled residential area for the Chinese to occupy in 1689. After the prohibition of trade and the stay of Portuguese in 1638, a result of the Tokugawa's anti-Christianity policy, no other foreign ships entered Nagasaki except the Chinese and the Dutch. This is despite the port's origins as a special area of the Jesuit Society in 1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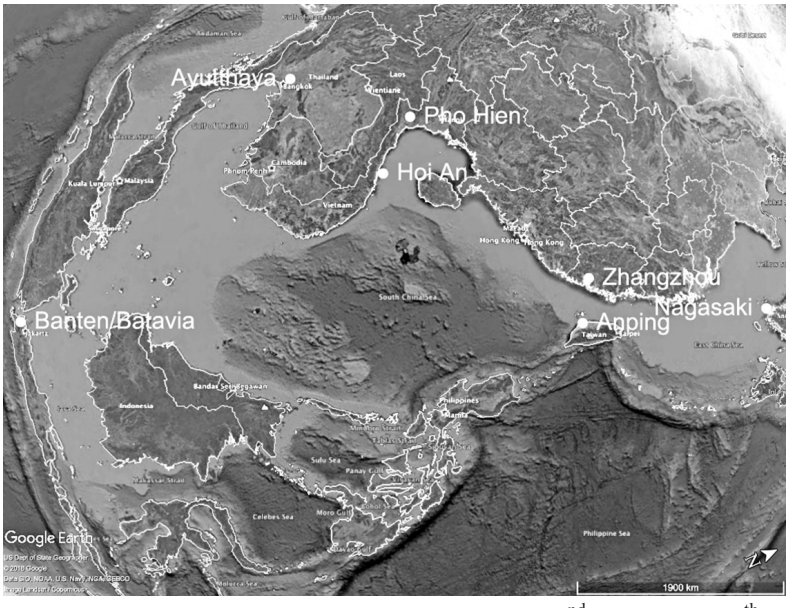
In 1673, another European sailing ship suddenly entered the Nagasaki Bay requesting the resumption of trade relations. That ship, an English ship called the *Return*, arrived via Anping (安平), Taiwan and Banten, Java[1]. In 1623, England had left Hirado (平戶), another important trade port of Kyushu, for their own reasons and now, after half a century, reentered Japan. This ship is illustrated in the right half of the Kanbun Folding Screen of Nagasaki (寬文長崎圖屏風; Fig.3) surrounded by official small ships of the Japanese navy. This illustration was reconstructed after the great fire of 1663 and in total two main wharfs and 6 junks can be seen in the left half [2]. Specifically, three anchored junks are drawn in the both the Daikoku-machi (大黑町) Wharf (Fig.1) and Motokago-machi (元籠町) Wharf [3](Fig.2) with captions of the last departed port names including *Kauchi* (Hoi An), *Shiyam* (Ayutthaya) and *Chanchau* (Zhangzhou; 漳州) in Daikoku-machi and *Tonkin* (Pho Hien), *Jagatara* (Batavia) and *Bantan* (Banten) in Motokago-machi [4].

1 Sever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voyage of the *Return* have been published (Chang et al. 1995). In addition, England's request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e relations was rejected by the Tokugawa (德川) Shogunate (Matsuo 2013).

2 This unknown painter's relatively small screen, each half being 129 cm by 327 cm, is exhibited in the Nagasaki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

3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cations anchoring junks is according to Shin Nagasaki Shishi (新長崎市史;長崎市 2012, pp.119-125). According to Nagasaki Chokan Byobu (鳥瞰屏風; Bird View Screen; ca. end of the 1670) are two places also used for wharfs in Nagasaki, especially an anchoring junk seen in Motokago-machi Wharf (長崎市1987).

4 In the next year, 1674, the arrival of junks at Nagasaki was recorded: at least 2 departed from Fuzhou, 3 from Guangdong, 1 from Batavia and 2 from Taiwan. Among them, a junk departing from Guangdong reported that 2 junks from Nagasaki in the previous year were heavily damaged by strong winds in Guangdong before their return to Banten and Hoi An respectively (Ura 1958, pp.76).



Map 1 Major port cit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y 2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In particular, we have to consider other junks in the right half of this screen, the scenery of the Nagasaki Bay. In this part, an anchoring junk is seen near Oura (大浦) Bay close to the English ship the *Return*. The caption could be read as *'tou?i'* (Fig.4). Although incomplete, the original writing can be simply understood as *'Tonei'*, the Japanese pronunciation for *Dong-ning* (東寧), the special name for Taiwan during the Ming-Zheng (明鄭) period [5]. If this identification is correct, this junk image is easily identified as dating back to at least about a half century earlier than the Taiwanese junks among the Tosen-no-zu (唐船之圖) in the Matsura Historical Museum (松浦史料博物; Fig.6) thought was the oldest—the mid-18th century. Also, we must note the other junk in the right half of the same screen without caption (Fig.5). Here, the half image of a sailing junk is drawn with a red flag atop of the sub mast [6]. If we consider similar flag on the sub-mast of the previous *'Tonei'* junk, this sailing junk can be another Taiwanese

5 In this period in Taiwan, the Japanese name of 東寧 for Taiwan has been recorded in several documents (Yokota 2009).

6 Fukase Kôichiro (深瀨公一郎) explained the special meaning of the Dutch flag on the mast of junks like the Banten departed junk in the Motokago-machi Wharf in this screen (Fukase 2010). However, he did not mention the meaning for various non-European flags of junks in this screen.

junk. The special sailing condition of this junk is the upper sail by a large cloth at the main mast . This sail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llapsible sails by bamboo beams and was not used by the Taiwanese junk images in Matsura. In fact, a large percentage of junk images by the 17th century have the same additional cloth on the upper sail. Among 10 junk images in Matsura, junks departing from Southeast Asia such as Hoi An, Ayutthaya or Batavia appear with that sail. This condition shows different routes taken by junks departing Taiwa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In 1689, *Tojin-yashiki* (唐人屋敷; the walled area of Chinese) was constructed at Juzenji (十善寺) Village behind Motokago-machi Wharf as the official accommodation facility for the arrival Chinese crews and traders. Following the lifting of the Great Clearance (遷界令; 1661-83) in 1684, Chinese arrivals drastically in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done by the Nagasaki City Education Boar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Jingdezhen (景德鎮) wares were found at the layer of leveled foundation from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in 1689 [7]. Basically, it consisted of daily-use-type underglaze cobalt blue bowls (Fig.7, 8). This condition is entirely opposite of the basic tendency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Nagasaki around the 1660s - 70s. In those sites, such as the Sakae-machi (榮町) Site close to Meganebashi (眼鏡橋; the Spectacles Bridge), believed to be the ruins of a storehouse for export traders, only Japanese Hizen (肥前) porcelain were found. Given this condition, we can ascertain tha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Chinese Jingdezhen ware was brought to Nagasaki before 1689, while almost no Chinese ware was imported during the 1660s and 70s.

7 According to Ôgiura (2013), by using the findings of ceramics on the foundation layer, it is possible to estimate that, before 1689, several junk traders used this place for their activities such as storage. This estimation also relates to the meaning of the use of Motokago-machi Wharf in the Kanbun Secre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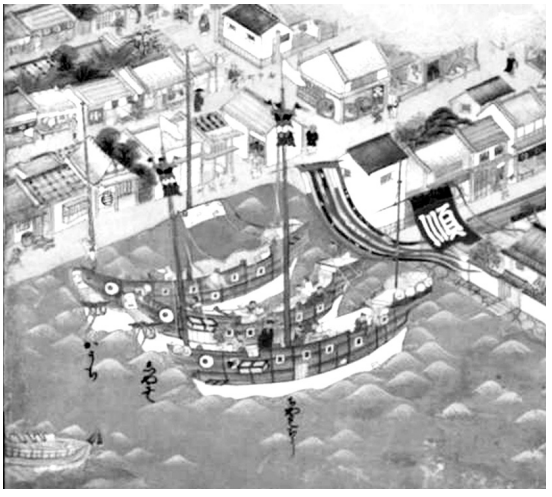


Fig.1 Daikoku-machi Whar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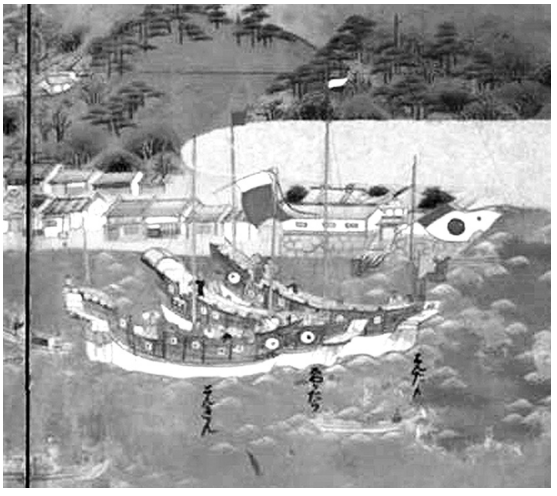


Fig.2 Motokago-machi Wharf



Fig.3 England ship the *Retu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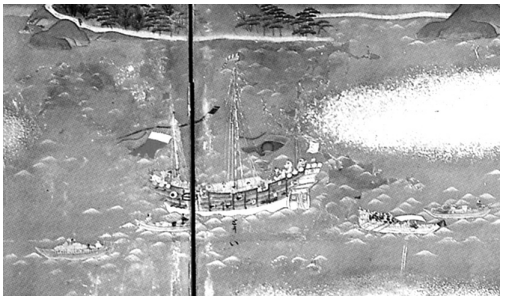


Fig.4 A junk captioned 'Tonei'



Fig.5 A sailing ju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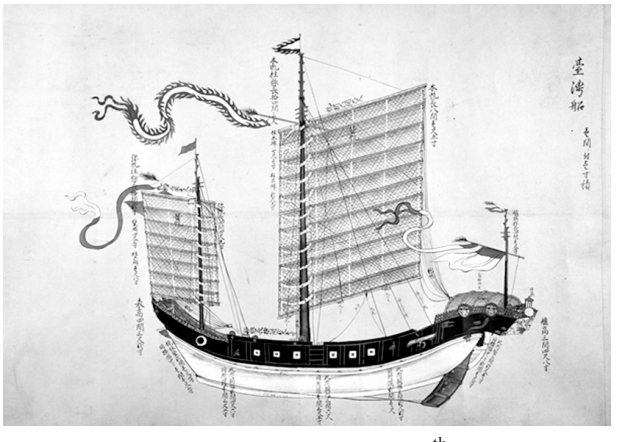


Fig.6 A Taiwanese junk (18th C.)



Fig.7 Jingdezhen bowl A, Tojin-yashiki



Fig.8 Jingdezhen bowl B, Tojin-yashiki

The sudden decrease in Chinese porcelain exports during 1644-83, caused by Qing's occupation on important manufacturing kilns such as Jingdezhen and the Great Clearance of Qing, is usually understood as a good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exportation of Japanese Hizen porcelain vis-à-vis the world ceramic market. Related to this theory, the findings of Tojin-yashiki also show a sudden export increase of Jingdezhen ware before 1689. However, if we consider the condition of Tirtayasa Site, Banten in Indonesia,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it is possible the increase in exports occurred before 1682—during the Great Clearance.

Connection between Nagasaki (長崎) & Anping (安平)

Resulting from several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he Fort Zeelandia ruins (安平古堡) in Taiwan conducted by Prof. Liu Yi-Chang (劉益昌), we now have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for both the structures and artifacts of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te. Significant findings are currently exhibited in the Fort Zeelandia Museum (熱蘭遮城博物館), Anping. Now, I would like to tur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several types of exhibits, specifically the ceramic shard exhibits.

Firstly, we must point-out several pieces of Jingdezhen ware. In particular, the underglaze cobalt blue porcelains. A floral arabesque motif bowl (Fig.9) has branches and leaves drawn by double lines. Under the rim, double horizontal lines are found. These elements and the basic shape of this bowl, from the late 17th century, are similar to the findings in Tojin-yashiki of Nagasaki (Fig.7 & 8).

The center of a dish is decorated with a paulownia leaf motif and the Chinese poem *wu-tong-yi-ye-luo, tian-xia-jin-jie-qiu* (梧桐一葉落、天下儘皆秋) from the late 17th century. The rim's underside is decorated with a narrow rough arabesque zone (Fig.10). The same motif dish of Jingdezhen ware was found in Tirtayasa Site, Banten, Indonesia (Fig.27). Moreover, this motif was copied by several kilns in Fujian and Guangdong. A sexagenary circle (干支) was added under special Taiping (太平) era, such as the finding in the old Fengshan county walled town in Zuoying (左營鳳山縣舊城)[8].

An excavated dish with a manufacturing era name of Kangxi (康熙) in the inner foot (Fig.11). It is easily recognized that this dish was carried here after 1661, the year Zheng Cheng-gong (鄭成功) attacked the Dutch ruled Fort Zeelandia. Naturally, this shard only tells us the dating as during the Kangxi era until 1722. However, a similar Kangxi era written Jingdezhen large bowl was excavated in Tirtayasa, Banten (1660s-80s; Fig. 26).

Numerous rough white porcelain bottle 'Anping jars' (安平壺) from the 17th century were found with similar likeness and condition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aiwan (Fig.12). The first reported findings of this Fujian made ceramic was in the Anping area, hence the name Anping jars. This bottle is widely found in Southeast Asian port cities and in several ports of East Asia including Nagasaki (Fig.13).

Several shards of Japanese Hizen stoneware (Karatsu [唐津] ware) large bowls were also found (Fig.14). Among the many kinds of Karatsu ware, only this two-glaze with brush motif (*hakeme nisaide;* 刷毛目二彩手) type was predominately carried to Southeast Asian archipelago area, such as Indonesia (Fig.15).

Besides the findings of Hizen stoneware in Fort Zeelandia, Hizen porcelain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e Shenei (社內) site, Tainan [9]. In this site, Hizen porcelain consisted of a Kraak motif dish and rough dragon/jumping carp motif bowls. Both types of Hizen porcelains were commonly exported to the Southeast Asian market.

---

8 Fig.40 of Zang et al. 1993. Ôhashi Kôji (大橋康二) pointed out Zhucuo kiln, Zhangzhou (漳州朱厝窯) or Anxi kiln, Anxi (安溪縣安溪窯), and Shuiwei kiln, Dapu-xian, Guangdong (廣東・大埔縣水尾窯 ; close to the Fujian border) as firing kilns. Marked years were estimated as 1675, 1679 and 1680 (Ôhashi 2017).

9 In Taiwan, the first identified Hizen porcelain was found in the old Fengshan (鳳山) county walled town site in Zuoying (左營; Zang et al. 1993 and Hsie 1996).



Fig.9 Jingdezhen bowl, Fort Zeelandia



Fig.10 Jingdezhen leaf motif dish, Fort Zeelandia



Fig.11 Jingdezhen ‘Kangxi’ dish, Fort Zeelandia



Fig.12 Anping jars, Fort Zeelandia



Fig.13 Anping jar, Nagasaki



Fig.14 Karatsu large bowls, Fort Zeelandia



Fig.15 Karatsu large bowl, Indone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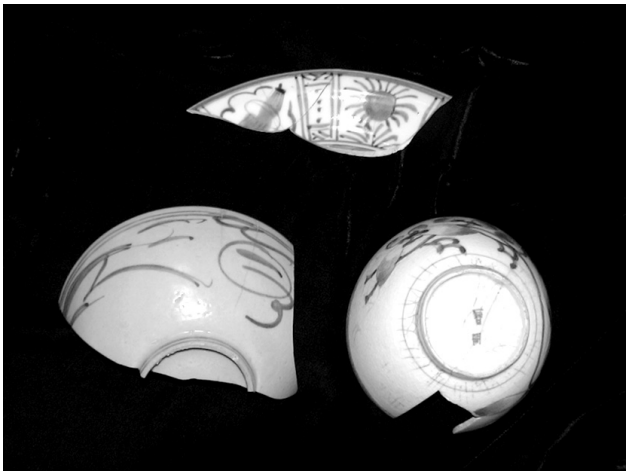


Fig.16 Hizen porcelains, Shenei, Tai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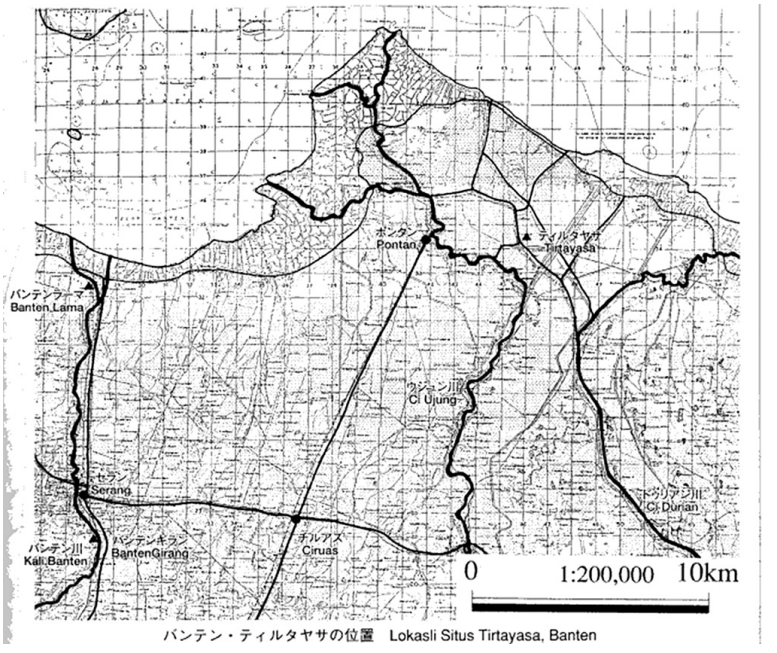
Despite the curr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search at Fort Zeelandia and the concerned Ming-Zheng (明鄭) period sites in Tainan and Kaohsiung being limited in number and size, most ceramic findings are deeply connected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Connection between Anping (安平) & Banten

Basic condition

Banten, the departure port of the *Return's* Banten-Anping voyage,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Java, Indonesia. For a long time, Banten acted as an important hub port for Asia's long-distance trade network due to its location on the Sunda Strait and the special product of pepper. A powerful sultanate was established here by the 1520s.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vited many foreign traders including, by 1596, the first Dutch voyage to Asia. After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Batavia (Jayakarta/Jakarta) 90km east from Bante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anten Sultanate had, until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co-existed for long time with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In the present, Banten Lama and Tirtayasa, two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Banten have sparked the interests of archaeologists. Banten Lama/the old Banten is the capital ruins and the largest port site for the 16 – 18th centuries, while Tirtayasa, about 25km east of Banten Lama, was a temporary royal villa of the Great Sultan Tirtayasa (1651-82; Map 2).



Map.2 Banten Lama and Tirtayasa, Banten

In Banten,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ombstones of foreigners related with the Anping trade network. The first is the tombstone of Mr. Xu (許) from Haicheng (海澄), Zhangzhou (漳州) found in Klapa Dua, 10km south from Banten Lama (Fig.17). The estimated dating of 1661 makes this the second oldest tomb of an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on record. Yet the Dutch had already recorded the stay of Chinese and their quarter of Banten in 1596. After the 17th century, overseas Chinese from Southern Fujian worked actively as traders with the status: officials of the sultanate (*shahbandar*).



Fig.17 An Overseas Chinese tomb in Banten, 1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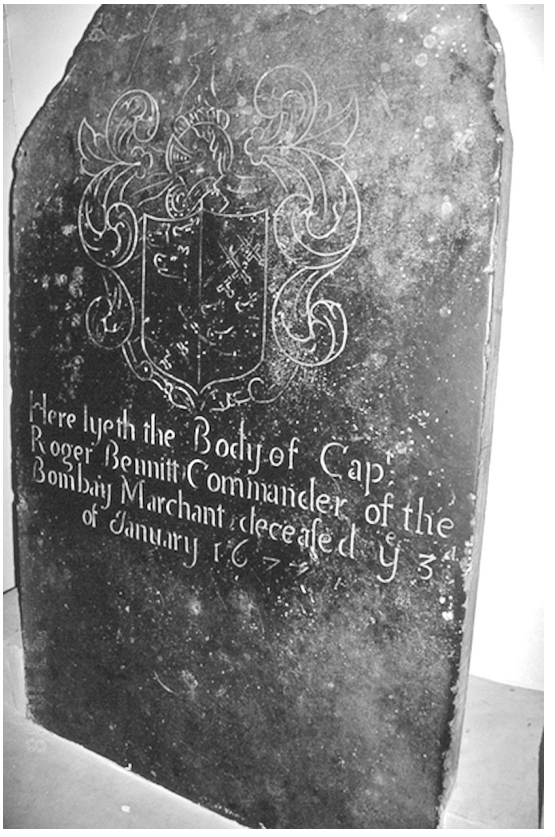


Fig.18 An England captain tomb in Banten, 1677

The next is the tombstone of Roger Bennitt [10], a captain of the *Bombay Merchant*, who died in 1677. This tombstone was found around Banten Lama and is now exhibited in the Banten Lama Site Museum. The English ship had already arrived in Banten by the beginning of 17th century. Here the English kept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of Southeast Asia. The official connection with the Ming-Zheng (明鄭) in Taiwan was held by this branch; congruent with the voyage of the *Return*. In fact, as good evidence of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Great Sultan Tirtayasa sent official

10 He was also recorded, by 1670, as a captain of the *Advance* in the instruction letter by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to the council of Banten (Chang 1995, pp.60).

diplomats to London in 1682 [11]. These tombstones show the breadth of the Banten's trade connections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during the 2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Banten Lama

In the present, in Banten city, the former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port of the sultanate, all that remains of Banten Lama's archaeological ruins are two (still crowded) religious centers, the Great Mosque and the Chinese Guanyin Temple. The city wall originally constructed before 1596 using bricks and wood and restored using stone before the 1670s, has almost totally collapsed. However, the extent of the restored outer wall of the Surosowan Palace in 1681 is next to the Great Mosque (Fig.19), where Indonesian archeologists have held excavation investigations since 1976.

As a result, numerous foreign ceramic shards have been unearthed. This led to two collaborative analytical works by Indonesian archaeologists of about 300,000 shards. The first in 1993 and the second in 1997 [12]. These analyses found that various ceramics from China, Japan, Southeast Asia, West Asia and Europe from before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could be identified (Graph 1). Although our initial interest focused only on Japanese Hizen ware, we ended up finding lar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large scale and continuous trade in Asian ceramics. In this paper, I will introduce only a few very limited examples among them.

A large cover of Hizen porcelain with a diameter of over 40 cm was found (Fig.20). The outside of this cover is decorated with fine chrysanthemum flower and leaf motifs (dated to the 1670s). Also, many kinds of Hizen ware were found including several types of the Kraak style dishes and Karatsu stoneware large bowls (Fig.21). Finally, of the total number of late 17th century units, 14.6 % were identified as Hizen ware.

11 The engraved portrait of this embassy's ambassador was published in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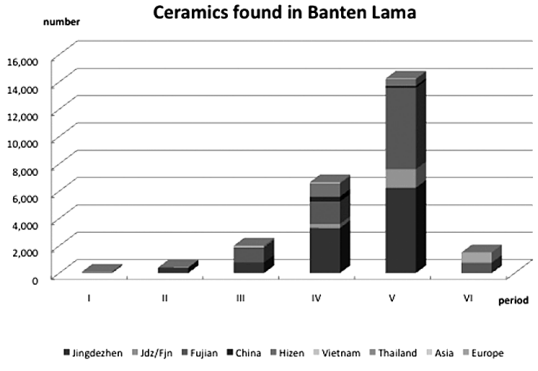
12 The basicl tendencies resulting from these analytical works is reported in Ôhashi & Sakai 1999.

Moreover, Anping jars in various size and form variation were also easily identified (Fig.22). Anping jars have been fired before the end of 16th century and continually manufactured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findings in Banten Lama covered almost all such variations in one century.

Even though Banten Lama is located relatively close to Batavia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Batavia were frequent, findings of Hizen ware in Banten Lama are of far greater variety and covers a much wider time period than findings in Batavia, showing a similarity with findings in Anping. Therefore, I can conclude that Hizen ware in Banten Lama was carried not by the Dutch ships but by overseas Chinese junks via Anping.



Fig.19 Surosowan Palace ruins, Banten Lama



Graph 1. Ceramics found in Banten Lama



Fig.20 Hizen large cover, Banten La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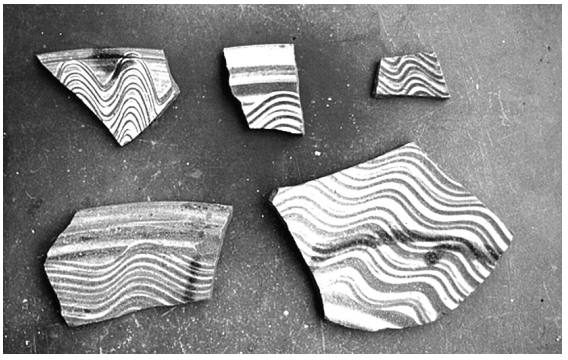


Fig.21 Karatsu large bowls, Banten Lama



Fig.22 Anping jars, Banten Lama

Tirtayasa

Orginally, Tirtayasa was developed, under the economic policy of the Great Sultan Tirtayasa, into a new rice field cultivation area by constructing a canal irrigation system in 1663-64. When his son returned from Mecca and succeeded the throne in 1678, the Great Sultan moved from Banten Lama to the royal villa built in Tirtayasa. However, differences in their diplomatic thinking towards the Dutch led to a civil war. The Dutch, supporting Tirtayasa's son, attacked the royal villa of Tirtayasa in 1682.

Since the Dutch destroyed the royal villa, no meaningful activity has occurred at the site. At present, the only ceramic shards unearthed resulted from villager burials on the former ruins of the royal villa (Fig.23). These shards demonstrate the existence of a short stay by the Great Sultan Tirtayasa. Among our seven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from 1997-2006, we found a section of either the royal villa's wall foundation (Fig.24)[13] or a water gate structure of the canal system.

Moreover, we also discovered many fine quality ceramics, in particular, fine Hizen wares such as the Kraak motif large dish (the 1670s; Fig.25) in large quantities. A high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ceramic findings consisted of Hizen ware (Graph 2). This figure is the highest record of Hizen ware in any archaeological site outside of Japan.

13 The condition of ceramics found in the royal villa is reported in Sakai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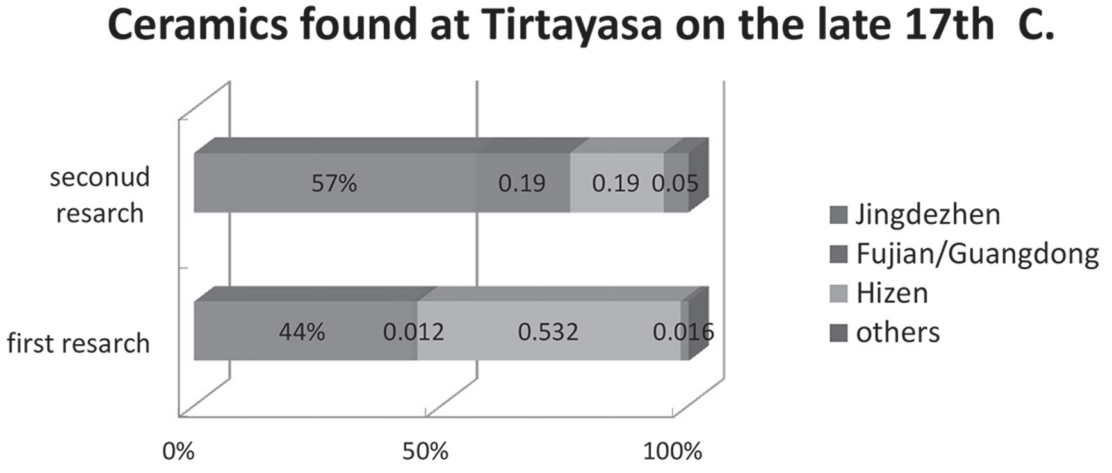
However, of even greater importance are the findings of Jingdezhen wares; especially when we consider the royal villa's short lifespan . The majority of Jingdezhen ware dated to the late-17th century was also of fine quality including a large bowl with the writing of 'Kangsi reign' (康熙年製; Fig.26), a dish with a Chinese poem (Fig.27) and several *Sancai* dishes. Besides such wares, we also discovered common quality Jingdezhen ware in small numbers, such as bowls decorated with chrysanthemum floral motifs (Fig.28).



Fig.23 The royal villa ruins



Fig.24 Excavated wall foundation



Graph 2. Ceramics found in the royal villa of Tirtaya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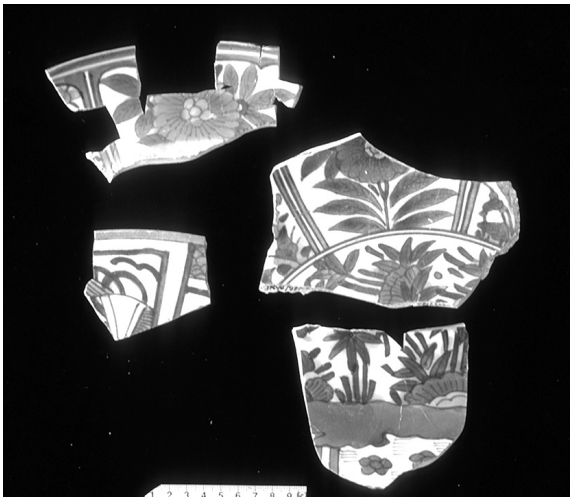


Fig.25 Hizen the Kraak dish, Tirtaya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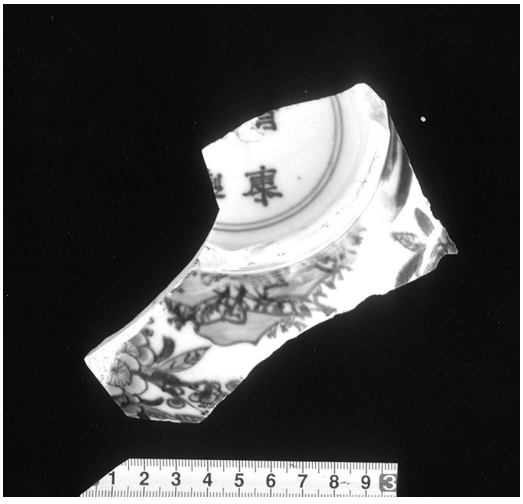


Fig.26 Jingdezhen 'Kangxi' dish, Tirtaya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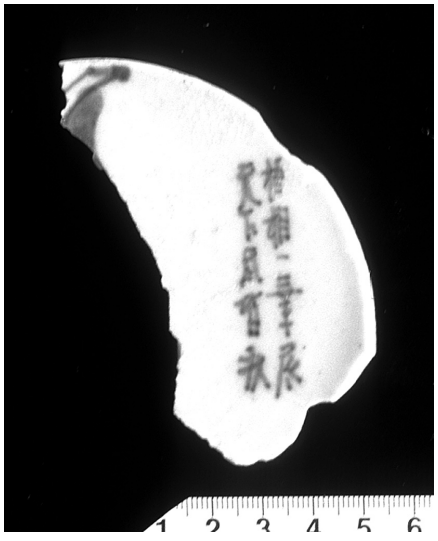


Fig.27 Jingdezhen leaf-poem motif dish, Tirtaya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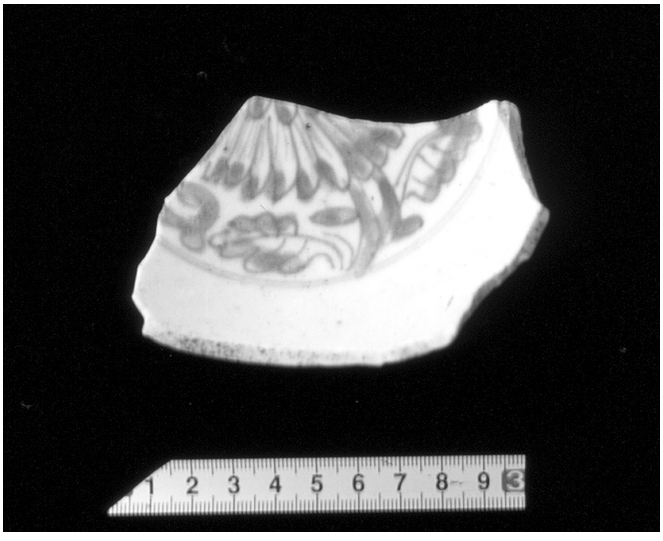


Fig.28 Jingdezhen chrysanthemum motif bowl, Tirtayasa

These findings clearly tell us the Great Sultan's important ability to acquire large quantities of Jingdezhen ware—44% or 57 % of the total (Graph 2). When we consider that the entirety of the royal villa's very short lifespan (1678-82) existed within the Great Clearance period (1661-83), these percentages reflect a seemingly unbelievable condition.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aking the ceramic shards mentioned above as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 will pla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port sites into context.

In the Fort Zeelandia, a 'Kangxi reign' Jingdezhen dish (Fig.11) and a floral arabesque bowl (Fig.9) were foun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is site, the former could be imported during either the Ming-Zheng (明鄭) or the Qing period; we already know that the latter was imported exclusively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17th century.

Additionally, in the Tojin-yashiki Site of Nagasaki, numerous Jingdezhen chrysanthemum motif bowls (Fig.7 & 8) were unearthed. The bowls were found at the layer of leveled foundation, before buildings were constructed (before1689), reflecting a large possibility that the bowl can be dated to or before the 1680s due to the basic tendency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Nagasaki.

Moreover, in the Tirtayasa Site of Banten, a 'Kangxi reign' Jingdezhen large bowl (Fig.26) and a chrysanthemum motif bowl (Fig.28) were excavated in the royal villa ruins. When we consider the short lifespan of this villa (1678-82), both Jingdezhen wares must have been imported before 1682.

By basic observation, the Jingdezhen bowls found at the three sites resemble each other in basic motifs and shapes. Also, 'Kangxi reign' is written in a similar style at both Fort Zeelandia and Tirtayasa. Therefore, we can confirm with high certainty that the 'Kangxi reign' dish of Fort Zeelandia and the chrysanthemum bowls of Tojin-yasiki were carried to both sites before 1682. This view is also supported by many other commonly found ceramics at these three or related sites such as the Chinese poem motif Jingdezhen dishes, Hizen stoneware large bowls or the Kraak motif porcelain dishes.

The English ship the *Return* departed from Banten and completed its voyage to Nagasaki via Anping in 1673. This network of three ports continued until 1682; the

same connection is documented in written instructions sent by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of London to the factory of Amoy/Xiamen (廈門) in 1681 [14]:

> *Of Silk wares we desire the following particulars may be sent us by way of Fort St George of otherwise as aforesaid, vizt. --- And in Japan screens, chinaware & other China rarities, well bought, the value of 2000 dollars.*

The Amoy factory belonged to the Anping branch. It formed the most important base for the Zheng to connect with China and functioned as a port tied with Nagasaki [15]. If we consider the material evidence from the three ports, the 'chinaware' Amoy ordered would, in fact, consist of both Jingdezhen wares from China and Hizen wares from Japan [16].

The Great Clearance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as good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export of Hizen ware vis-à-vis the world ceramic trade market *not* Jingdezhen ware, whose exports were prohibited by the Qing. However, we should confirm that at leas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irtayasa royal villa (1678-82), the trade activity of Southern China was restored through several methods. In this context, we can conclude that Anping port acted as the key point or hub port of this 'illegal' connection for Qing and Nagasaki in East Asia, and Banten in Southeast Asia.

---

14 Chang et al. 1995, pp.441-449. The Zheng 's re-occupation of Amoy was realized during 1674-80. Therefore, at the time of this instruction, Amoy had left from the rule of the Zheng.

15 At least 4 ships departing from Simingzhou (思安平志明州; Amoy) arrived in Nagasaki by 1679 (Ura 1958, pp.287-302).

16 Even though Shang Zhixin (尚之信), the Prince of Guangdong, joined the revolvers during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1673-76), I have no material evidence for the export of Jingdezhen ware via Guangzhou.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Southern Fujian, where the manufacture of Zhangzhou (漳州) export ware developed (a copy of Jingdezhen ware), meant the export of Guangdong ceramics almost never appeared in significant numbers during the 16-17th centuries. Also, during the same time, no evidence of Cantonese migration has been found in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Banten. Moreover, *Anping Zhi* (安平志) recorded that Jingdezhen wares were exported by Fujianese traders from several ports in Southern Fujian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Feng 2000).

Bibliography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 Wu Mi-Tsa
1995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1670-1685*,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eng Xian-Ming馮先銘
2000 『中国古陶瓷文獻集釋』[Compos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Old Documents for Chinese Old Ceramics], 藝術家出版社.

Fukase Kôichirô深瀬公一郎
2010 「十七世紀後半の長崎港における船旗の役割」[The role of the ship flag in Nagasaki por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ulletin of Nagasaki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5, pp.67-80.

Hsie Ming-lyang謝明良
1996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The supplement note for unearthed ceramic in Fengshan county old walled town of Qing period, Zuoying],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3-1, Preparatory Office for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agasaki City長崎市
1987 *『出島図』[Paintings of Dejima].*
2012 *『新長崎市史第２巻　近世編』[New History of Nagasaki City vol.2 Pre-Modern].*

Ôgiura Masayoshi扇浦正義
2013 *『唐人屋敷跡』* [The Chinese Mansion Ruins], Nagasaki City Education Board.

Ôhashi Kôji大橋康二
2018 「インドネシア出土貿易陶磁器の要點」[Key issues of the trade ceramics excavated in Indonesia], Sakai Takashi (ed.)*『インドネシアの王都出土の肥前陶磁―トロウラン遺跡ほか―』[Hizen wares excavated from Royal Capital Sites in Indonesia—Trowulan and other sites —]*, Tokyo: Yûzankaku雄山閣.

Ôhashi Kôji & Sakai Takashi大橋康二･坂井隆
1999 「インドネシア 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Ceramic from the Site of Banten, Indonesia],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82, pp.47-94.

Matsuo Shinichi松尾晉一
2013 *『江戸幕府と國防』*[The Tokugawa Shogunate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Tokyo: Kodansha講談社.

Sakai Takashi坂井隆(ed.)
2000 *『バンテン・ティルタヤサ遺跡發掘調査報告書』* [The Excavation Research Report of Tirtaysa Site, Banten], Tokyo: 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es Sophia University.

Ura Yasuichi浦廉一 (exp.)
1958 *『華夷變態』*[Kai Hentai], Tokyo: Tôyo Bunko東洋文庫.

Yokota Kiyoko横田きよ子

2009 「日本における「台灣」の呼稱の變遷について：主に近世を對象として」[The Changing Designations of "Taiwan": The Changes in the Early Modern Japan], *海港都市研究[Journal of Port City Research]*, 4, pp.163-183, Kôbe University.

Zang Zhen-hua, Gao You-de & Liu Yi-chang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

1993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集落的試掘」*[Prospecting trial excavation at the Old City of Fengshan County of Qing Era in Zuoyi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4-3, Academia Sinica.

Picture sources

1-5: Nagasaki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6: Matsura Historical Museum, 7 -8: Ôgiura Masayoshi, 9: Ôhashi Kôji, 9-14: author, 16: Nogami Takenori, 17-28: author, Map 1: Google Earth, Map 2: author, Graph 1-2: author

Tayowan as a Global Center: Trad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yuto Shimada（島田竜登）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Faculty of Letter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ntroduc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Asian economy stepped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Large volumes of silver flowing from Mexico and Japan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ushered East Asia into an economic boom period. Moreover, the full establishment of Japan's Tokugawa regime throughout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anged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East Asia. Under these globally and regionally changing conditions, the island of Taiwan came into focus for development. Tayowan, which served as the base for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hereafter VOC) and is currently Anping District in Tainan City, became a key center of global and regional trade. This article argue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ayowan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and Asian economic history and introduces important recent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subject.

This article has three sections. First, an analysis of Dutch expansion in maritime Asia is presente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VOC extended its Asian trade and established a well-organized trading network in maritime Asia not only for Euro-Asian trade but also for intra-Asian trade. As part of this expansion, the VOC was largely engaged in the export trade in silver from Japan, and it constructed the fort of *Zeelandia* in Tayowan in 1624.

Second,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Dutch trading post in Taiwan in the Dutch trading network. The VOC maintained its trading post from 1624 to 1662. During this Dutch colonial age in Taiwan, the VOC made efforts to develop a trading network throughout maritime Asia: the VOC expelled the English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Amboyna massacre in 1623, while it acquired Portuguese Malacca in 1641. Despite this expansion, the Dutch post of Tayowan remained a key trading center for the VOC in maritime Asi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intra-Asian trade based on Taiwan in Asian waters from Japan to South Asia and West Asia.

Third, the article highlights Dutch enterpris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Taiwan. In fact, Taiwan was the first place in Asia in which the plantation system of sugarcane production was introduced by European initiatives. While facing conflicts with Chinese and aborigine people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the VOC attempted to manage a systematic plantation production around Tayowan on a large scale, although the Company was forced to leave Taiwan in 1662 due to an attack by the maritime troop of Zheng Chenggong (1624-1662).

The VOC's intra-Asian trade

While the VOC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first modern joint stock company, it was also the first modern global corporation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First, it was established in 1602 and engaged in global trade by settling its offices and trading posts in three continents: Asia, Africa, and Europe. The VOC's business was on a geographically global scale. Second, the VOC not only conducted geographically long-distance trade but the people employed by the VOC were also multi-ethnic. In addition to Dutch and other European employees, many Asian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VOC. The VOC hired Asian employees as interpreters, sailors, and soldiers, and Indian Muslim sailors traveled with European Christian sailors on board of the VOC vessels to conduct trade in Asian waters.[1] Moreover, the Company possessed a huge number of Asian slaves for manual labor.[2] Thus, the rich history of the VOC attracts scholar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issues faced by present-day global corporations.

This global company was the first corporation to realize a set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maritime trade: it combined Euro-Asian trade with intra-Asian trade to maximize its profits. The VOC's Euro-Asian trade took shape in maritime trade, which reflected the initial purpose for the Company's establishment: to procure Asian products such as spices by sending its own vessels to Asian waters through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to supply them to the European market. In the VOC's initial stage, the most desirable Asian products were spices such as pepper, clove, nutmeg, mace, and cinnamon. Later, sugar and cotton textiles became more important in Euro-Asian trad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ollowed by coffee and tea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3]

---

1 Matthias van Rossum, "A 'Moorish World' within the Company: The VOC, Maritime Logistics and Subaltern Networks of Asian Sailors," *Itinerari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 36(3), 2012.

2 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xpansion and Decline*, Zutphen Walburg Pers, 2003, p. 95.

3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134.

TABLE 1

Bullion exports from the Netherlands to Asia, 1602-1795 (guilders)

Decade	Exports	Decade	Exports
1602-1610	5,207,000	1700-1710	39,275,000
1610-1620	10,186,000	1710-1720	38,827,000
1620-1630	12,360,000	1720-1730	66,030,000
1630-1640	8,500,000	1730-1740	40,124,000
1640-1650	9,200,000	1740-1750	38,275,000
1650-1660	8,400,000	1750-1760	58,396,000
1660-1670	12,100,000	1760-1770	53,542,000
1670-1680	11,295,000	1770-1780	48,317,000
1680-1690	19,720,000	1780-1790	47,896,000
1690-1700	28,605,000	1790-1795	16,972,000

Source: J. R. Bruijn *et al.,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7, Vol. 1, pp. 187, 240.

To procure Asian products,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VOC to bring silver to Asia from the Netherlands. Bullions were almost the single item that the VOC could offer in Asian markets as a means of payment to obtain Asian products for Europe. TABLE 1 displays the decadal bullion exports from the Netherlands to Asia throughout the Company's near-entire existence. From the 1610s to the 1680s, the VOC needed approximately 0.8 to 1.2 million guilders of silver per annum. Silver exports from the Netherlands declined from the 1630s to the 1660s when the Company was able to obtain silver from Japan, as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in more detail.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VOC's silver exports from the Netherlands began to increase rapidly until the 1720s. Then,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8 to 5.8 million guilders of silver were exported annually from the Netherlands. This is because the scale

of the VOC's trade at that time was about twice the scale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in terms of value.[4]

In order to reduce silver exports from the Netherlands to Asia and thus to maximize profits, the VOC developed a wise system of intra-Asian trade. The Company did not immediately spend silver sent to Asia in purchasing Asian products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Instead, the VOC first invested the European silver in intra-Asian trade. European silver brought to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was first sold there to procure Indian cotton textiles. Cotton textiles were then sent to Southeast Asia for consumption. From Southeast Asia, several products were shipped to Japan, such as sugar produced in Java as well as Siamese animal, forestry, and fishery products like deer hides, buffalo hides, sappanwood (a tree that produces red and yellow dyes), and ray skins. In exchange for these Southeast Asian products, Japan provided the Company with bullions and copper. Japanese silve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xport commodity until 1668 when the Japanese shogunate authorities prohibited the VOC from exporting it. Afterwards, gold and copper were the main export items from Japan.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pper became the single key export item from Japan. Through this triangular trade among India,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the VOC pocketed large profits, which in turn were reinvested to purchase Asian products for Europe.[5]

In addition to this triangular trade, the Company was engaged in numerous patterns of intra-Asian trade. When the Company was located in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t engaged in intra-Asian transit trade based in Taiwan. The VOC in Tayowan bought Chinese products such as raw silk from Chinese merchant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he Company transported it with its own vessels to Nagasaki in Japan. In addition, the VOC obtained Japanese silver at Nagasaki to be used as capital for buying Chinese products at Tayowan. Another example of the VOC's intra-Asian

4 Om Prakash, *European Commercial Enterprise in Pre-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4-119, 211, 265-267.

5 Ryuto Shimada, *The Intra-Asian Trade in Japanese Copper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6, pp. 17-21.

trade is the trade between Nagasaki and Tonkin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he Dutch trading post at Nagasaki sent vessels from Nagasaki to Tonkin to earn profits from regional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Northern Vietnam.[6] In this way, the VOC devoted its energy to the management and extension of intra-Asian trade; its success in intra-Asian trade brought the VOC huge amount of profits, as it was able to reduce its silver exports from the Netherlands.

FIGURE 1

Japanese silver exports to the VOC, 1622-1667 (taels)



Source: Yasuko Suzuki, *Kinsei Nichiran Bōeki no Kenkyū* (A Study of the Japan-Netherlands Trade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Kyoto: Shibunkaku Shuppan, 2004, pp. 42-43, 55.

6 Hoang Anh Tuan, *Silk for Silver: Dutch-Vietnamese Relations, 1637-170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7, pp. 125-164.

TABLE 2

Japanese silver exports to the VOC, 1635-1645 (*taels*)

year	exports	year	exports
1635	238,570	1641	1,112,000
1636	872,000	1642	399,000
1637	1,133,000	1643	473,000
1638	1,716,000	1644	686,000
1639	2,508,000	1645	763,000
1640	1,180,000		

Source: Yasuko Suzuki, *Kinsei Nichiran Bōeki no Kenkyū* (A Study of the Japan-Netherlands Trade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Kyoto: Shibunkaku Shuppan, 2004, pp. 42-43.

FIGURE 1 shows the VOC's exports of Japanese silver. In the 1620s, the Company's silver exports were relatively small, as Japanese traders were also engaged in overseas maritime trade, as were the Portuguese and Chinese. At that time, silver was the most desirable merchandise from Japan for export. Thus, non-Dutch traders also exported huge volumes of Japanese silver. Meanwhile, Dutch trade with Japan was halted between 1629 and 1632 due to political confus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Tokugawa authorities and the VOC caused by struggles between Pieter Nuyts (1598-1655), the governor of Formosa, and Suetsugu Heizō (1546?-1630), the governor of Nagasaki (and his follower, Hamada Yahyōe). In 1633, Dutch trade with Japan was restarted and Japanese silver exports by the VOC began to rapidly increase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30s. In fact, annual exports in 1635 amounted to only 238,570 *taels* but reached their peak in 1639 when they amounted to around 2,500,000 *taels*, as seen in TABLE 2. In 1639, on the other hand, Portuguese merchants were expelled from trading with Japan by the order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 From the 1740s onwards, annual exports of Japanese silver were relatively stable in terms of volume, amounting to around 500,000 *taels*. However, the Company was prohibited from engaging in the silver export trade in 1668 due to the decline of Japanese silver production.

The rise in silver expor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30s was partly du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lliance between the VOC and Zheng Zhilong (Iquan) (1604-1661). Zheng Zhilong, the father of Zheng Chenggong, was a leader of armed maritime traders around the coast of Fujian province after the VOC began to settle in southern Taiwan in 1624. Thanks to this alliance, Dutch Tayowan assumed the role of transit port. Chinese traders under Zheng Zhilong brought raw silk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yowan, where the VOC purchased Chinese silk in exchange for Japanese silver. The VOC then brought Chinese silk to Japan, where huge volumes of silver were given to the Company.[7]

On the other hand, Dutch exports of silver from Japan largely declined in 1642; afterwards, the VOC could export only ca. 500,000 *taels* of silver per annum from Japan. This change was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alliance. Chinese traders under Zheng Zhilong went directly to Nagasaki for trade with Japan. Beyond the China-Japan trade, an armed group led by Zheng Zhilong was largely engaged in trade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This widespread activity brought about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VOC and Zheng Zhilong's Chinese troops. In this way, the VOC at Tayowan suffered from the decline in the supply of raw silk from mainland China.[8] Although Zheng Zhilong surrendered to the Qing court and stopped his maritime trading business in 1646, his son Zheng Chenggong took the position of his father to lead maritime trade among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9] which restricted Dutch trade in Tayowan and Nagasaki.

Tayowan and Dutch global trade

The VOC established a trading post at Tayowan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1624. This enabled the Company to engage in transit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mainland

7 Eiichi Kato, *Bakuhansei Kokka no Keisei to Gaikoku Bōeki* (The Formation of the *Bakuhan* State and the Foreign Trade), Tokyo Azekura Shobō, 1993, pp. 222-223.

8 Eiichi Kato, *Bakuhansei Kokka no Seiritsu to Taigai Kanke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kuhan* State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Kyoto: Shibunkaku Shuppan, 1998, p. 156, 224-235.

9 Teijiro Yamawaki, *Nagasaki no Tōjin Bōeki* (Chinese Trade in Nagasaki),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1964, pp. 28-34.

China.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ing post in Tayowan, the VOC at Hirado had suffered from bad business conditions. Without access to raw silk from China, the VOC had no means of payment to procure silver from Japan. This was a truly different situation from that of the Portuguese at Nagasaki at the time, as the Portuguese had good access to Chinese products through Portuguese Macau. The VOC obtained a trading post in Tayowan, which allowed Dutch trade to prosper.

Tayowan was a center for intra-Asian trade for the VOC.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Keisuke Yao, 151 Dutch vessels arrived in Nagasaki from 1641 to 1660. Among them, 54 vessels came directly from Tayowan, while 12 vessels came to Nagasaki via Tayowan from embarkment ports other than Tayowan. With regard to other ports of embarkment, Batavia amounted to 51, Tonkin to 19, Siam to 17, Cambodia to 3, Keelung in Taiwan to 1, Pescadores (The Penghu Islands) to 2, and unclear embarkment ports to 4. This data suggests that Tayowan was a base for the Dutch trade with Japan and East Asia, and it was as key as Batavia.[10]

In addition, the observation of Dutch vessels departing from Nagasaki gives almost the same results. The number of VOC vessels that left Nagasaki from 1641 to 1660 was 151. Among these, 117 vessels were designated to travel to Tayowan. Significantly fewer vessels traveled directly to Batavia, amounting to 51.[11] In short, Tayowan served as much more of a key entrepot in the case of departing vessels from Nagasaki.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ayowan for the VOC's trade changed over time. The Dutch colonial age of Tayowan from 1624 to 1662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around the point of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in terms of its trading network, namely 1624 to 1649 and 1650 to 1662.

In the first period from 1624 to 1650, Tayowan was a transit port supplied with Chinese products such as raw silk and sugar by Chinese traders from the Chinese

10 Keisuke Yao, *Kinsei Oranda Bōeki to Sakoku* (The Duth Trade and National Seclus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1998, p. 298.

11 Yao, *Kinsei Oranda Bōeki*, p. 298.

mainland. This Chinese merchandise was then sold to the VOC in Taiwan, which in turn sent them to Hirado, and after 1641, to Nagasaki. The Dutch trading posts in Japan underwent a boom period, as they could now obtain Chinese products for the Japanese market, as well as silver from Japan. Once the VOC in Japan procured Japanese silver, it was shipped to the Dutch trading post in Tayowan. Japanese silver was used to purchase Chinese products from Chinese merchants coming to Taiwan from mainland China.

TABLE 3

Destinations of silver exports from Japan by the VOC, 1638-61 (1,000 taels)

Year	Taiwan	Tonkin	Siam	Batavia	Malacca	others	Total
1638-49	10,944	1,355	231	0	0	40	12,570
1650-61	3,955	450	90	513	640	0	5,648

Source: Kayoko Fujita, "Oranda Higashi Indo Kaisha Shiryō niyoru Nihongin no Sūryōteki Kōsatsu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Japanese Silver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Shimaneken Kyōiku Iinkai (ed.) *Iwami Ginzan Iseki Sōgō Chōsa Hōkokusho* (Reports of General Survey of the Ruin of Iwami Silver Mine), Vol. 4, 1999, p. 136.

TABLE 4

Destinations of Japanese silver re-exports from Taiwan, 1638-61 (1,000 taels)

	Coromandel	Bengal	Surat & Persia	Batavia	others	Total
1638-49	503	0	1,375	145	75	2,098
1650-61	1,073	1,503	508	30	407	3,521

Source: Kayoko Fujita, "Metal Exports and Textile Imports of Tokugawa Japan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South Asian Connection," in: Kayoko Fujita, Shiro Momoki and Anthony Reid (eds.) *Offshore Asia: Maritime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Asia before Steamship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 266.

TABLE 3 i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Kayoko Fujita's excellent work showing the destinations of Japanese silver, which was exported by the VOC in Japan. In the first period from 1638 to 1649, the table shows that most silver was shipped to Taiwan from Japan on Dutch vessels. The silver sent to Taiwan was used to buy Chinese products from Chinese merchants,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shares of other destination were extremely small. Tonkin only accounted for 10.8 per cent and Siam just for 1.8 per cen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table indicates that the VOC's station in Tayowan was a center of intra-Asian trade. It shows the re-shipments of Japanese silver from Tayowan. While the VOC at Tayowan received 10,944,000 taels of Japanese silver, as shown in TABLE 3, it exported 2,098,000 *taels* of Japanese silver to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and Safavid Persia (See TABLE 4). Around 81 percent of Japanese silver was spent on Chinese products in Taiwan from Chinese merchants that traveled from mainland China, while 19 percent of the total was used to fund the VOC's geographically large-scale intra-Asian trade beyond East Asia. In a nutshell, Tayowan was not only a center for intra-Asian trade in East Asia, it was also a center for intra-Asian trade throughout maritime Asia.

This situation changed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second period after 1650, Japan reduced its silver exports to the VOC due to the decline of silver production in Japan. In addition, the final destinations of Japanese silver handled by the VOC changed on a large scale. The VOC at Tayowan used only 434,000 *taels* of Japanese silver to purchase Chinese products in Taiwan, as calculated from TABLE 3 and TABLE 4. Other Japanese silver was finally sent to Batavia, South Asian ports, and Gamron (Bandar-e Abbas) in Safavid Persia.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trepot of Tayowan declined, especially regarding transit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first sugar plantation island in Asia

In addition to its role as an entrepot of maritime trade in East Asia, Tayowan took on another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Asian economic history. The VOC attempted to

introduce a plantation system in Taiwan, as the Company aimed to make profits from lan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commerce. This was a frontier of coloni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1630s, the VOC at Tayowan changed its policy and began to tur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aiwan. For this purpose,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and the production of rice and sugarcane were encouraged.[12] To realize thi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y Chinese immigrants, Souw Beng Kong (1580-1644) was invited to Taiwan from Batavia. He was the first *kapitan*, the head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Batavia under Dutch control. During his stay in Taiwan, he made efforts to encourage Chinese migration to Taiwa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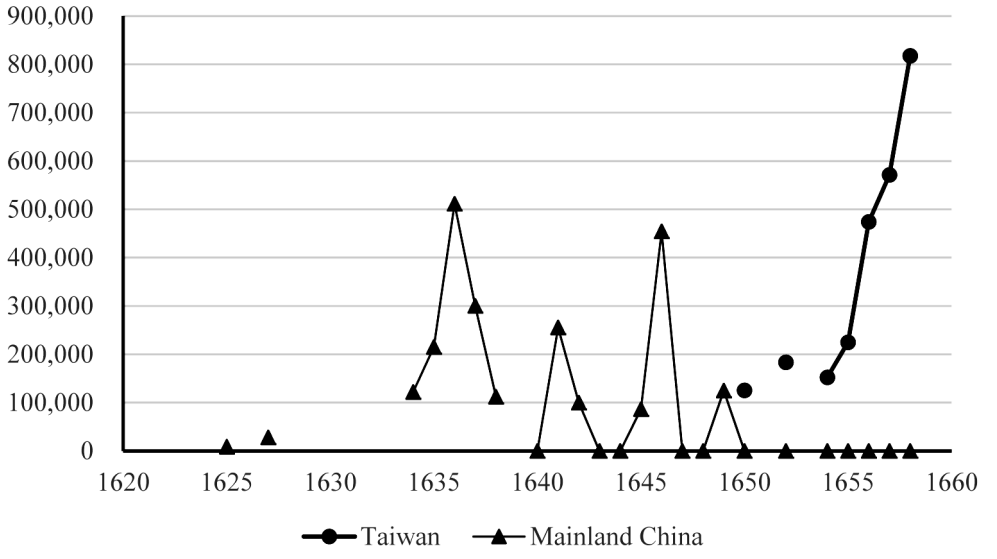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sugarcane plantation around Tayowan grew to such a degree that Taiwanese sugar was exported abroad. Before then, the VOC had imported sugar produced in mainland China to Japan, and this transit trade continued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fterwards, the VOC began to bring Taiwanese sugar to the Japanese market, as seen in FIGURE 2. This figure gives a clear picture of the transit of the origins of sugar imported into Japan by the Compan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inland Chinese sugar was imported, although the annual volumes largely fluctuated,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trend of the VOC's procurement of Chinese mainland sugar was not very stable. The turning point was in 1650. In this year, the imports of mainland sugar disappeared forever, while the VOC began to handle Taiwanese sugar for the Japanese market. From this year onwards, the volumes of Taiwanese sugar rapidly increased.

12 Keisuke Yao, "Two Rivals on an Island of Sugar: The Sugar Trade of the VOC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Formos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Leonard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n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3, p. 132.

13 Yao, "Two Rivals on an Island of Sugar," p. 133.

FIGURE 2

Origins of sugar imported into Japan by the VOC, 1625-1658 (Dutch lbs.)



Note: 1 Dutch lb. = 0.494 kg.

Source: Keisuke Yao, "Two Rivals on an Island of Sugar: The Sugar Trade of the VOC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Formos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Leonard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n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3, p. 136.

Taiwanese sugar markets were globally widespread. The VOC brought Taiwanese sugar to the Netherlands, while other important markets were Safavid Persia and Tokugawa Japan. Although Japan was one of the closest markets geographically, Chinese traders were engaged in the sugar trade with Japan, supplying sugar produced in mainland China; their transportation cos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VOC for Taiwanese sugar. Because of this, the VOC sent Taiwanese sugar to other Asian markets. For example, 446,975 catties (ca. 558,719 Dutch lbs.) of Taiwanese sugar were sent to Persia in 1654, and 8,000 piculs (ca. 1,000,000 Dutch lbs.) of sugar were sent to Persia

in 1659.[14] At those times, the VOC of Tayowan sent 152,397 Dutch lbs. of Taiwanese sugar to Japan in 1654, and 817,523 Dutch lbs. in 1658, as seen in FIGURE 2.[15] In f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aiwanese sugar export trade by the VOC was emphasized by Seiichi Iwao, a Japanese historian at th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30s.[16]

In contrast to refined sugar, sugar water (*suyckerwater*) was exported to mainland China by Chinese traders.[17] Already in the middle of the 1640s, Taiwan exported sugar water to mainland China through the hand of Chinese junk traders calling at Tayowan.[18] Huge volumes of sugar water were later exported during the 1650s. For example, on 1 March 1656, three junk ships left Tayowan for the Chinese coastal area. There, three junks loaded 11,450 catties (ca. 13,900 Dutch lbs.[19]) of sugar water.[20] Although sugar water was a drink for laborers, it was mainly manufactured for brewing alcohol in mainland China.[21]

However, the VOC had to surrender the colony in Taiwan in 1662; it was expelled by troops led by Zheng Chenggong. This marked the end of the first European colonial system of sugarcane plantations in Asia. In contrast, the VOC endeavored to develop sugarcane production on a large scale in the *Ommelanden*, a suburban area of Batavia in Java,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Dutch colonial control, Chinese entrepreneurs at

14 Cheng Shaogang,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 Deel 2, PhD thesis, Leiden University, 1995, pp. 355, 467.

15 Yao, "Two Rivals on an Island of Sugar," p. 136.

16 Seiichi Iwao, "*Sanbyaku Nenmae niokeru Taiwan Satō to Cha no Perusya Shinshutsu* (Expansion to Persia of Taiwanese Sugar and Tea around 300 Years Ago)," *Manpō Dozoku*, 2(2), 1933.

17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永積洋子《荷蘭時代台灣論文集》（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 年）p. 246.

18 J.L. Blussé, W.E. Milde, Ts'ao Yung-ho and N.C. Everts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Vol. 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 362 (18 March 1645).

19 1 Dutch lb. = 0.494 kg.

20 J.L. Blussé, N.C. Everts, W.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Vol. 4,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 7 (1 March 1656).

21 翁佳音《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文獻資料的搜集計畫：西班牙、荷蘭及明鄭時期檔案》（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5 年）p. 138, Footnote 182.

Batavia, Chinese technology, and Chinese immigrant laborers. When the VOC first arrived in Jav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digenous sugarcane production was already being conducted. However, the VOC was not interested in sugar production in Java, as spice was much more lucrative.[22] Instead, the VOC made efforts to develop sugarcane production in Taiwan, and Taiwan became the greatest sugar producer for the VOC. Yet, faced with the loss of Tayowan in 1662, the VOC had to develop sugar production in the *Ommelanden*. Moreover, the peace treaty with Banten in 1683 spurred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Ommelanden* for the prosperity of sugar production.[23]

Peasant agriculture was traditional and served as a basic patter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aritime Asia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Small-scale and family-based management was typical of rice cultivation in particular. However, peasant agriculture was not the sole forma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plantation system also began to expand in tropical Asia. Sugarcane and coffee bean plantations were typical examples,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ea plantations in South Asia and rice plantations in the Mekong delta were symbolistic production systems in the European colonial economy. In this sense, the attempt at sugarcane production in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the first trial by Europeans to introduce a new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for the tropical economy in Asia.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Dutch Tayowan in the changing global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introduced recent Japanese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matter. The island of Taiwan underwent an er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yowan as the bas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became a key global center.

---

22 Els M. Jacobs, *Merchant in Asia: The Trad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2006, p. 245.

23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and Riverton: Foris Publications, 1986, pp. 84-93.

First, the article analyzed Dutch expansion in maritime Asia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f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VOC extended its trading network in Asia not only for Euro-Asian trade but also for intra-Asian trade.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VOC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was to reduce silver exports from the Netherlands to Asia. 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scheme, the VOC was highly engaged in intra-Asian trade so as to procure silver from Japan. At the time of this expansion in the intra-Asian trading business in maritime Asia, the VOC established the fort of *Zeelandia* at Tayowan in 1624.

Second, the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utch trading post at Tayowan in the Dutch trading network. The VOC maintained its trading post from 1624 to 1662. During this Dutch colonial age, the VOC developed a trading network throughout maritime Asia.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trading post in Tayowan was an entrepot for the transit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Although its role in the trade in East Asia declin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ayowan grew in importance. Its connection went beyond the scope of East Asia; it becam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outh Asia and Persia.

Third, the article examined Dutch enterpris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Taiwan from the fourth decad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aiwan was the first place in Asia in which the plantation system of sugarcane production was introduced with the VOC's encouragement. This plantation system around Tayowan was realized by introducing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In the 1650s, Dutch-led plantations became successful exporters of Taiwanese sugar. In fact, Taiwanese sugar was the only sugar the VOC offered to the Japanese market starting in the year 1650.

In this way, Dutch Tayowan was a center not only in the region of East Asia but also on a global scale. It was also a remarkable frontier of new mod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ugarcane plantations. Although the VOC was forced to leave Taiwan in 1662, Tayowan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by present-day economic historians.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Pre-Nineteenth-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

Kai Yiu Chan（陳計堯）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Introduction

The City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Taiwanfu cheng* 臺灣府城, or the "prefectural city") and its neighbourhood (and to a large extent, the whole Island of Formosa) possessed a diversified monetary heritage when the Manchus took over the two former Dutch fortresses from the hands of Koxinga's (Zheng Chenggong 鄭成功) grandson in 1683. Both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Qing have frequently reminded the reader of the widespread circulation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known as "foreign monies", *fanqian* 番錢 or *yangqian* 洋錢) in the Taiwanfu area.[1] Euro-American silver

*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not be conducted without the generous support of published information from Mr. Wen-cheng Shih 石文誠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and Mr. Sheng-chih Wen 溫勝智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ainan Are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Dr. Jun-nan Chen 陳俊男 and Professor Kuo-feng Chung 鍾國風 also kindly shared valuable archeological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advices from Professors Peter Borschberg and Wen-liang Tzeng 曾文亮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rafting and revision process.

1 On the use of the term "*fanqian*", Huang Shujing 黃叔璥, *Taihai Shichalu* (Records of my missions to Taiwan 臺海使槎錄) (Taipei: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7), p. 42; on the use of the term "*yangqian*", see Fan Xian 范咸, et.al., comp., *Chongxiu Taiwanfu Zhi* (Re-compilation of 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重修臺灣府志), 5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臺灣銀行, 1958), Vol. 4, p. 495.

coins became so popular in Taiwan that, according to local poetry, it w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exchange for the cloth woven by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inland area.[2] Recently, local numismatists in Taiwan have also suggested the wide circulation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cross the island.[3]

Along with a "colonial heritage" of using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present-day Tainan City is known to hav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island-wise and external trade of the island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twin-fortresses of Zeelandia and Provintia by the Dutch, the locale star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regional and intercontinental trade established by the Dutch, Chinese, Japanese and other Asian merchants.[4] Under the Manchu rule, the two locales formed the axis of trade to connect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rest of the Qing Empire, *en route* Amoy (modern Xiamen 廈門), which was the only officially-sanctioned location to trade between the whole island and the rest of the empire before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5] Despite the addition of new locations of officially-sanctioned external trade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refectural city" continu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albeit its relative decline, in the island's

2 Liu Jiamou 劉家謀 , et. al., *Taiwan Siyong Heke* (A combined pub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poetry of Taiwan 臺灣雜詠合刻), (Taipei: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1958), p. 57.

3 Che Lu Tseng (Zeng Zelu 曾澤祿), *Taiwan Huobi de Jingshen yu Wenhua*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Taiwan coinage 臺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 (Jiayi County 嘉義縣 : Che Lu Tseng, 2004), pp. 1-56.

4 On the Dutch opening of Taiwan in the 17th century, see Cao Yonghe 曹永和 , "Heju Shiqi Taiwan Kaifa Shilue (A brief history of opening of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Dutch occupation 荷據時期臺灣開發史略)", in Cao Yonghe, *Taiwan Zaoqi Lishi Yanjiu*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aiwan's early history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Taipei: Lianjing Chuban, 1979), pp. 45-70; Nakamura Takashi 中村孝志 , *Helan Shidai Taiwanshi Yanjiu Shangjuan: Gaishuo, Chanye* (Studies on Taiwan history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Vol. 1: overview and industry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 (trans. and comp. by Wu Micha 吳密察 and Wen Jiayin 翁佳音) (Banqiao City, Taipei County 台北縣板橋市 : Daoxiang Chuban 稻鄉出版 , 1997); Murakami Naojirō 村上直次郎 , Iwao Seiichi 岩生成一 , Nakamura Takashi 中村孝志 , and Nagazumi Yōko 永積洋子 , *Helan Shidai Taiwanshi Lunwenji* (Anthology on Taiwan history of the Dutch period 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 (trans. by Xu Xianyao 許賢瑤) (Yilan City 宜蘭市 : Foguang Renwen Shehui Xueyuan [Foguang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tudies]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 2001).

5 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95-152.

external trade.[6]

As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ontinued to circulate and the "prefectural city" inherited a flourishing trade, one would expect the locale to have achieved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 in trade finance. In fact, trade had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nurturing banks in the history of finance in late medieval Italy, Tokogawa Japan, and Shanghai and Tianjin under the Qing.[7] When trade expand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ue to opening to external trade, Newchwang (Niuzhuang 牛莊), another edge of the Manchu Empire with rich exports of soy beans, also witnessed the appearance of native banks and the creation of a common currency standard for remittance and finance (i.e. *guoluyin*, transliterated as the "furnace transfer

6 Kuo-tung Ch'en (Chen Guotong 陳國棟), "Qingdai Zhongye (yue 1780-1860) Taiwan yu Dalu zhijian de Fanchuan Maoyi: yi Chuanbo wei Zhongxin de Shuliang Guji" (Junk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during the mid-Ch'ing period (ca. 1780-1860): An estimation of the shipping capacity 清代中葉(約 1780-1860) 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計), *Taiwanshi Yanjiu*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臺灣史研究), 1:1 (June 1994), pp. 55-96.

7 In late medieval Italy, in particular, banks were formed as merchants needed credits for capitalization, and a credit instrument for circulating capital. See Raymond de Roover,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Medieval Bruges – Italian Merchant Bankers, Lombards and Money Changers –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Banking* (Cambridge, Mass.: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48). In East Asia, several other hubs of trade later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 banking before the advance of modern bank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For example, in Edō of Tokugawa Japan, expanding domestic trade became the hotbed of exchange merchants who eventually grew into bankers offering loans to both merchants and the samurai See the example of the money-changer Mitsui, in Nihon Keieishi Kenkyūjo 日本經營史研究所 , comp., *Mitsui Ryogaedana* (The exchange shop of Mitsui 三井兩替店) (Tokyo 東京 : Kabushiki Kaisha Mitsui Banko 株式會社三井銀行 , 1983). Across the Qing empire, the Shanxi banks had been providing remittance service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anwhile, native banks in Ningbo (*qianzhuang* 錢莊) and Tianjin (*yinlu* 銀爐) offered domestic exchange and trade credits about the same time. On the Shanxi banks, see Huang Jianhui 黃鑒暉 , *Shanxi Piaohao Shi* (A history of the Shanxi banks 山西票號史) (Taiyuan 太原 : Shanxi Jingji Chubanshe 山西經濟出版社 , 1992). On the Ningpo and Shanghai native banks, see Susan Mann, "Finance in Ningpo: the Ch'ien Chuang, 1750-1880," in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7-77; Susan Mann,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73-96; Andrea McElderry, *Shanghai Old-style Banks (Ch'ien-Chuang), 1800-1935: a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Yeh-chien Wang,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Native Banks in Shanghai,"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6: 1 (March 1978), pp. 111-142.

silver"過爐銀).[8] As trade prevailed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one would expect a similar pattern of development in trade finance. Nonetheless,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sharply contrasts with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descriptions of its lack of banking facilities. "No Native banks or banking agencies" was the phrase used by the city's key Maritime Customs official in the early 1890s.[9]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Taiwan made similar remarks in the late 1890s on the absence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on the island, except those remittance agents connected with Amoy.[10]

Certainly, th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leading to a locale's development of the banking sector could be greatly different. Nevertheless, the contrasting implications deferring from records on the absence of a banking tradition but a wide circulation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lead one to rethink the basic questions in the business and monetary histories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ese colonization. In particular, how did people use their silver coins and for what?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age and purpose of silver coin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monetary and banking history?

In fact, the study of Taiwan's currencies has been considerably fruitful. Both economic historians and numismatists have produced well-researched works on

8 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Gaishatō a Keizai Chō Sakyoku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亞經濟調查局 , *Eikō no Karo Gin* (The furnace transfer silver of Newchwang 營口の過爐銀), in Keizai Shiryō (Materials on Economics 經濟資料), Vol. 10, No. 8 (Tokyo: 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Gaishatō a Keizai Chō Sakyoku,, 1924), pp. 14-19.

9 P. H. S. Mortgomery,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1891,"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9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3), p. 488.

10 Taiwan Sōtokuhu Zaimukyoku Kinyuka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 , *Taiwan no Kinyu* (Finance of Taiwan 臺灣の金融) (Taihoku 臺北 : Sōtokuhu Zaimukyoku Kinyuka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 , 1930), pp. 10-15.

different kinds of currencies, whether in ingots, coins and cash, or in silver and copper.[11]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fiscal aspects of the currency system, employing not only government documents but also real estates documents for intellectual investigation. Although these previous studies have acknowledged the existence of a great variety of monies circulating in the economy, they have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aiwan (or in East Asia in general). Instead, they tend to simplify them. To some,"copper cash" and "silver" formed the matrix of the monetary system of both Taiwan and the whole Manchu Empire. To others, the question of "copper vs. silver" went hand-in-hand with "silver (tael) vs. silver (dollar/*yuan*)". Different conclusions on whence and where copper cash, silver ingots or silver coins became dominant in the currency market have occupied the academic debate. Important these findings ar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cy issue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se studies basically put both minted silver in coins and bullion silver in ingots into the broad definition of "silver", though not

11 Che Lu Tseng, *Taiwan Huobi de Jingshen yu Wenhua; Yuan Yingsheng* 袁穎生 , *Taiwan Guangfuqian Huobi Shishu* (Historical descriptions on Taiwan's currencies before the recovery 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 (Nantou 南投 :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2001); Li Mianshi 李晃世 and Huang Dianquan 黃典權 , "Qingdai Taiwan Diqu Huobi Zhidu zhi Yanjiu (A study of the currency system in Qing Taiwan 清代臺灣貨幣制度之研究)," *Guoli Chenggong Daxue Lishi Xuexi Lishi Xuebao*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 Vol. 3 (July 1976), pp. 1-54; Zheng Yongchang 鄭永昌 , "Qingdai Qianqi Taiwan Huobi Liutong de Fazhan yu Bianqia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in early-Qing Taiwan 清代前期臺灣貨幣流通的發展與變遷 (1684-1800),"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故宮學術季刊), 19: 1 (Autumn 2001), pp. 227-261. Recently, historians on Chinese monetary history also put Taiwan's land deeds into consideration, see Kishimoto Mio 岸本美緒 , "Qingdai zhongqi Zhongguo de Huobi Shiyong Qinkuang —— Yi Dongnan Zhusheng wei Zhongxin (The ways monies was used in China during the mid-Qing —— with reference of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s 清代中期中國的貨幣使用情況——以東南諸省為中心)", Chen Ciyu 陳慈玉 , ed., *Chengxian Qihou —— Wang Yejian Yuanshi Jinian Lunwenji* (Succeeding and path-breaking —— Anthology to commemorate Fellow of Academia Sinica, Yeh-chien Wang 承先啟後——王業鍵院士紀念論文集) (Taipei: Wanjuanlou Tushu 萬卷樓圖書 , 2016), pp. 195-222.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ir distinctiveness in the currency market.[12] The implications of Euro-American coinage in Taiwanese and East Asian economic life have yet been thoroughly explored.

Nonetheless, as Hamashita Takeshi and Kuroda Akinobu have suggested,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monetary lif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befor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as the problem of "silver-silver" exchange down to the level of each particular kind of silver coins and their value in the market.[13] "The market value of silver content could work as an anchor at best, not as a precise measure of a currency's value."[14] Each kind of silver coins was one of the many commodities of the currency market. Their individuality could be found not in their weight and fineness (as bullions) but in the iconography on their head and tail. Consequently, as Masui Tsuneo suggested, numismatic catalogues gradually appeare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both Japan and China.[15] In other words, silver coins were more than simply silver. They were products that could be classified, catalogued and valued in the market, in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land and capital, and above all, other

12 For example, although Zheng Yongchang managed to list out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nd their weight and fineness throughout his article, his main findings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e of the "tael" (*liang*) to silver coins (*yuan*) in the 1750s. Ye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oins have not been suggested. See Zheng Yongchang, "Qingdai Qianqi Taiwan Huobi Liutong de Fazhan yu Bianqian", pp. 245-251. For similar examples, see Ri Kōbai 李紅梅 , "Shindai Hukkenshō niokeru Keizaihatten to Kaheiryūtsū"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ney circul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of the Qing period 清代福建省における経済発展と貨幣流通), *Matsuyama Daigaku Ronshū* (松山大学論集), 19: 1 (April 2007), pp. 153-200; Ri Kōbai 李紅梅 , "Shindai Hukkenshō no Kahei Shiyō Zittai —— Tochibaikenrui o chūshin toshite" (The actual usage of money in Fujian Province of the Qing period —— with reference of land deeds 清代における福建省の貨幣使用實態—— 土地券類を中心として), *Matsuyama Daigaku Ronshū* (松山大学論集), 18: 3 (August 2006), pp. 131-173.

13 Hamashita Takeshi 濱下武志 , *Kindai Chūgoku no Kokusai teki Keiki --- Chōkō Bōeki Shisutemu to Kindai Ajia* (Turning poi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dern China ---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Tokyo: Tokyo Daigaku Shukpankai [Tokyo University Press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0), pp. 53-62; Akinobu Kuroda, "Concurrent but Non-integrable Currency Circui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among Monies in Mod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5: 1 (2008), pp. 17-36.

14 Akinobu Kuroda, "Concurrent but Non-integrable Currency Circuits," p. 19.

15 Masui Tsuneo 曾井經夫 , *Chūgoku no Gin to Shōnin* (Silver and merchants of China 中國の銀と商人) (Tokyo: Kenbun Shukpan 研文出版 , 1986), pp. 49-77.

kinds of coins or currencies. Meanwhile, the existence of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in Taiwan had posted as a divergent element in a country under Chinese colonization. The type of silver coins would, therefore, decide the specific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at particular form of money. As present-day Tainan City possessed both traditions of circulating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onducting a viable external trade, and undertaking a colonization process, a re-examination of its history of circulation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ould make a modest contribution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its economic life in history and to posit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us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relation to the money, trade, and finance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

With the limited space here, this paper confines to explore the ways silver coins were used and circulated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and its vicinity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usages. To conduct such an investigation, we will examine the folk and official records, including local gazetteers, stele inscriptions and real estate contracts, as monies accordingly recorded were used for public project, land development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s, and religious donations. Although these categories of historical sources have been previously-known, there has been no limit in re-examining them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discovery of the old documents. Therefore, in the early 2000s, scholars could have done an island-wise research on the type of currency used in land transactions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by studying about 300 and more pieces of land deeds.[16] Yet, at present, in Tainan City alone, we have already found more than 230 of land deeds, thanks to the

16 See Zheng Yongchang, "Qingdai Qianqi Taiwan Huobi Liutong de Fazhan yu Bianqian", pp. 253-258. Among the 363 entries studied in Zheng's work, only 39 are identifiable as being related to present-day Tainan City.

recent publications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land documents.[17] The availability of more documents certainly facilitates us to reach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eflected. In particular, we will examine the kind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being used in relation to these different aspects of economic and public projects, along with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usages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of Formosa. One can even distinguish the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walled-city of the prefecture. Besides these literary records, we will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findings in Tainan's historical archeology in relation to the excavation of metal coins in the locale. These findings certainly provide us with some clues on the usage of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t the local and daily levels beyond the understanding from literary records. This paper will at last examine the role of merchants in the circulation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hich would eventually be related to the issue of money, trade, and finance of this commercially prospered part of the island.

17 Besides some of those had already existed in the early 2000s, several important compila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since then, including: Liu Zeming 劉澤民 , *Pingpu Baishe Guwenshu*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undreds of village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平埔百社古文書) (Nantou 南投 : Guishiguan Taiwan Wenxianguan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2); Liu Zeming 劉澤民 , *Taiwan Zongdufu Dang'an Pingpuzu Guanxi Wenxian Xuanji*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he archives i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 (Nantou 南投 :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2001); Liu Zeming 劉澤民 , *Taiwan Zongdufu Dang'an Pingpuzu Guanxi Wenxian Xuanji Xupian* (Second compilation of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he archives i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篇) (Nantou 南投 : Guishiguan Taiwan Wenxianguan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4), 2 vols.; Zhan Pingren 詹評仁 , comp., *Nanying Guqi Jijin* (A mixed collection of old deeds of Tainan 南瀛古契集錦) (Tainan: Tainanshi Wenhuaju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2016); Lin Yuru 林玉茹 , comp., *Tainanxian Pingpuzu Guwenshuji* (Collected volume on folk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ainan 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Xinying City, Tainan County 臺南縣新營市 : Tainanxian Wenhuachu 台南縣政府文化處 , 2009); Paul Jen Kuei Li 李壬癸 , *Studies of Sinkang Manuscripts* (新港文書研究)(Taipei 臺北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2010); Paul Jen Kuei Li 李壬癸 , *Studies of Sinkang Manuscripts* (新港文書研究)(Taipei 臺北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2010); (PL2) Paul Jen Kuei Li and Hsiu-min Huang 黃秀敏 , "Xin Faxian Sijian Xingang Wenchu" (Four recently uncovered Sinkang Manuscripts 新發現四件新港文書), *Taiwanshi Yanjiu*, 22: 4 (December 2015), pp. 167-189.

Sources of the "Foreign Monies"

The origin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Formosa can certainly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before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started its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Fort Zeelandia. In November 1621, the VOC's top officials in Batavia, who masterminded the building of Zeelandia, began to ask the company for "capital", which means hard currency.[18] Nearly a year later, they could already dispatch some people to carry silver coins as "cash", valued at 80,000 reals.[19] By early 1623, the Batavia administration held 80,000 reals of silver coins in hand, along with more than five million gulden of assets and goods.[20] "Real" (the "Reales") was a Spanish unit of coinage.[21] There existed other kind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ayouan (Dayuan 大員), the area in which the future Fort Zeelandia would be built. In mid-1625, for example, another VOC official report mentioned that in Tayouan, the VOC's operations held 450,000 "gulden" of "capital", the official unit of coinage in the Netherlands.[22]

When the VOC established their fortresses in southern Formosa, more different kind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ere used to conduct trade. In 1642, for instance, the VOC officials in Batavia reported that Tayouan held four different kind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two kinds of Netherlands coins, "*Rijksdaaler*" and "*Leeuwendaaler*", the Spanish "*Reales*", and the English "*Mark*"), along with the Chinese "tael" (*liang* 兩).[23] Two years later, The "Portuguese escudo" was added onto the list.[24] By the 1650s, the VOC authorities in Zeelandia even had an "official"

18 Cheng Shaogang 程紹剛 (trans), *Helanren zai Fuermosha* (The Dutch in Formosa 1624-1662 荷蘭人在福爾摩莎) (Taipei: Lianjing Chuban 聯經出版 , 2000), p. 3.
19 Cheng Shaogang (trans), *Helanren zai Fuermosha,* p. 10.
20 Cheng Shaogang (trans), *Helanren zai Fuermosha,* p. 22.
21 Peng Xinwei 彭信威 , *Zhongguo Huobishi* (History of money in China 中國貨幣史) (Shanghai 上海 :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58), p. 662.
22 Cheng Shaogang (trans), *Helanren zai Fuermosha,* p. 48.
23 Cheng Shaogang (trans), *Helanren zai Fuermosha,* p. 234.
24 Cheng Shaogang (trans), *Helanren zai Fuermosha,* p. 259.

exchange rate between the Dutch coins and other currencies.[25] Although Japanese silver bullion and Chinese silver ingots, along with gold bullions, had been going through Fort Zeelandia, Dutch coins (valued at 150,000 gulden) remained the major hard currency held by the VOC officials at the end of their operations in Formosa.[26]

The VOC's fortresses fell into the hands of Koxinga but the circulation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survived the regime change. In fact, at the truce agreement between Koxinga and the VOC's chief executive in Zeelandia, the former put claims on all hard currencies of more than 200 reals by value held by the company personnel.[27] After the VOC's withdrawal from the island, the regime of the Zheng family collaborated with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o maintain the island's international trade. English merchants continued to carry Spanish coins (the "reales") along with their cargoes when they sailed on Formosan waters.[28]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ontinued to prevail in the island throughout the Zheng regime.

Entering into the Qing Empir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simply did not tide down. Early Qing observers, such as Yu Yonghe (郁永河), foun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late-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Prefecture that these silver coins continued to be used.[29] Another observer, Huang Shujing (黃叔璥),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25 Cheng Shaogang (trans), *Helanren zai Fuermosha*, p. 402; Jiang Shusheng 江樹生 , *Dang'an Xushi: Zaoqi Taiwanshi Yanjiu Lonwenji*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aiwan 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 (Tainan 台南 :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2016), p. 128.

26 Cheng Shaogang (trans), *Helanren zai Fuermosha,* p. 531. For more detailed reports from the VOC officials, see also Shu-sheng Chiang (Jiang Shusheng 江樹生), trans. and comp., *Helan Lianhe Dong-Yindu Gongsi Taiwan Zhangguan zhi Badaweiya Zongdu Shuxinji* (Collect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Dutch VOC's Governor in Taiwan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in Batavia, Vol.I: 1622-1626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 1622-1626)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sitory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2010); Vol. II: 1627-1629 (2010); Vol. III-V: 1629-1636 (3 vols) (2015).

27 Jiang Shusheng (trans), *Rilanzecheng Riji Disice* (Diaries of Fort Zeelandia, Vol.4 熱蘭遮城日記) (Tainan: Tainshi Zhengfu 台南市政府 , 2011), p. 823.

28 Derek Massarella, "Chinese, Tartars and 'Thea' or a Tale of Two Companies: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aiwan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3: 3 (Nov. 1993), pp. 393-426, particularly p. 409.

29 Yu Yonghe 郁永河 , *Beihai Jiyou* (A travel note on a small sea 裨海紀遊) (Taipei: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1959[1697]), p.13.

the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on the island during the 1730s, made similar observation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30] Although modern monetary historians would suggest the standardized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s their main attraction to the Qing Empire's coastal population,[31] there was no concrete explanation given by the early Qing observers.

Both Yu Yonghe and Huang Shujing also suggested that these silver coins were Dutch-made, though did not speak of how they continued to come into circulation on the island. Meanwhile, both Yu and Huang pointed out the wider maritime trading world of East Asia in their writings on Taiwan, suggesting the continuity of trading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East Asia.[32] It was because entering into the Qing times, although Taiwanese ports could not sail directly overseas, they could still import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through trading networks centred at Amoy. As the corresponding port authorized to trade with the Taiwan Prefecture, Amoy imported sugar and rice, two prosperous merchandises of the Qing Empire, from southern Taiwan, and thus linking the island with the outside world. On the one hand, ports along the coast of the empire were reachable by Taiwanese boats *en route* Amoy. On the other hands,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ports were linked indirectly with Taiwan *via* Amoy.[33]

The attitud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owards this colonial heritage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 at first negative. Initially, once the new regime of the Manchus was established on the island, it implemented its own monetary policy, obviously to restructure the former Dutch and Zhengs' foothold into an extended territory of the Qing

30 Huang Shujing, *Taihai Shichalu*, p. 42.

31 See Wang Yejian (王業鍵 Yeh-chien Wang), "Zhongguo Jindai Huobi yu Yinhang de Yanjin (1644-1937)"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and banking systems (1644-1837) 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 (1644 － 1937)), in Yeh-chien Wang, *Qingdai Jingjishi Lunwenji (Yi)* (Collect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Qing China 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一）) (Banqiao City 板橋市 , Taipei County 臺北縣 : Daoxiang Chubanshe 稻鄉出版社 , 2003), pp. 161-274, particularly p. 186.

32 Yu Yonghe, *Beihai Jiyou*, pp. 30-31, 69-72; Huang Shujing, *Taihai Shichalu*, pp. 45-49. Here, Yu basically stated it clear that Taiwan's sugar production was important to the prefecture's fiscal condition, while Huang mentioned much less about that.

33 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pp. 95-152.

Empire. The official currency and accounting unit thus adopted was previously-known, the "tael", which had been used in state finances, officials' salaries, and government taxes.[34] The "tael" could appear in the form of an ingot of silver with government-fixed weight, fineness and exchange rate with the officially-minted copper cash. In 1688, an imperial mint was opened in Taiwan to mint copper cash with a character "Tai" (臺) on the back of the coin.[35] Yet, because the copper cash of Taiwan's imperial mint was not allowed to circulate in other parts of the empire, merchants who transported Taiwanese crops back to Fujian preferred to exchange for silver as much as possible on their return trip.[36] The mint was soon closed down in 1692.[37] Without a local mint, the government would occasionally send in copper cash minted in Fujian, at the least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province's various garrisons on the island.[38] In a sense, although the copper cash was officially used in Taiwan, as it w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Qing Empire,[39] it was not a locally produced, self-sustainable form of money on the island.

Entering into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the local population basically preferred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to the Chinese silver "taels".[40] Such an attitude eventually caused a major policy change, although it is not known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34 Jiang Yuying 蔣毓英 , comp., *Taiwanfu Zhi* (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臺灣府志)(Nantou: Guoshiguan Taiwan Wenxianguan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2[1685]), pp. 82-101; Gao Gongqian 高拱乾 , comp., Taiwanfu Zhi (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臺灣府志), 3 vols. (Taipei: Bank of Taiwan, 1960[1695]), Vol. 2, pp. 113-162.

35 On the opening of the mint in 1688, see Li Mianshi and Huang Dianquan, "Qingdai Taiwan Diqu Huobi Zhidu zhi Yanjiu," p. 5.

36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comp., *Fujian Taiwanfu* (The gazetteer of Fujian's Taiwan Prefecture 福建臺灣府志), 6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0), Vol. 3, p. 507.

37 On the closure of the mint in 1692, see Li Mianshi and Huang Dianquan, "Qingdai Taiwan Diqu Huobi Zhidu zhi Yanjiu," pp. 5-6; Zheng Yongchang, "Qingdai Qianqi Taiwan Huobi Liutong de Fazhan yu Bianqian," pp. 234-235;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Tongzhi* (A general gazetteer of Taiwan 臺灣通志), 3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0), Vol. 2, pp. 532-533.

38 In 1739-1740, for example, it was reported that 48,000,000 wen of copper cash was minted for the Taiwan Prefecture, see Li Mianshi and Huang Dianquan, "Qingdai Taiwan Diqu Huobi Zhidu zhi Yanjiu," pp. 5-6.

39 On the spread of the copper cash in other parts of the Qing Empire, see Wang Yejian (王業鍵 Yeh-chien Wang), "Zhongguo Jindai Huobi yu Yinhang de Yanjin (1644-1937)", p185-189.

40 Huang Shujing, *Taihai Shichalu*, p. 42.

in Beijing an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Fuzhou processed the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a new order promulgated in 1740, the prefecture government allowed both colonizing "Han-Chinese"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o pay tax in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stead of silver ingots by the "tael", although the latter was still the unit of account in official taxation documents.[41]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rce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gradually shifted away from the Dutch heritage to other channels, particularly to the Spanish one. In a local gazetteer of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several kinds of silver coins were listed, including "Sword Coin" (*Jianchian* 劍錢), "Rounded Coin (*Yuanqian* 圓錢), also known as Flowery-Fence Coin (*Hualanqian* 花欄錢)", "Square Coin (*Fangqian* 方錢), also nicknamed as the "Foreign Coin (*Fanbing* 番餅)", and "they were mostly coming from Java (咬嗱吧) and Luzon".[42]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uzon had already been a Spanish colony.[43] Java fell under Dutch rule in 1619.[44] Thus, these silver coins as recorded in literary records found their way to Taiwan from Spanish-American colonies *via* Luzon and from the Netherlands *en route* Java. Similar descriptions were repeated in subsequent written records of Taiwan.[45]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world production of silver was expanding. Its largest production centre, Mexico, had been increasing its mintage in every two decades throughout the century. As Table 1 shows, in about three quarters of the century, silver minted in Mexico had been nearly doubled.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

41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Nanbu Beiwen Jicheng* (Collection of scripts from the stone tablets in Southern Taiwan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 6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6), Vol. 4, pp. 377-380.

42 Fan Xian, et.al., comp., *Chongxiu Taiwanfu Zhi*, Vol. 4, p. 495. On the Chinese name of Java, see Xu Jiyu 徐繼畬 , comp., *Yinghuan Zhilue* (A brief gazetteer on all seas 瀛環志略) (Taip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臺灣商務印書館 , 1986), p. 120.

43 On Luzon, part of the Philippines as a Spanish colony, see Gaspar de San Agustin,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565-1615*, trans. by Luis Antonio Mañeru (Manila: San Agustin Museum, 1998).

44 On the occupation of Java by the Dutch, see Albert Hyma, *A History of the Dutch in the Far East* (Ann Arbor, Michigan: George Wahr Publishing Co., 1953), pp. 108-127.

45 For example, see Zhu Jingying 朱景英 , *Haidong Zhaji* (Folded records on the locale east to the sea 海東札記) (Taipei: Taiwan Yinhang 臺灣銀行 , 1958), p 28.

it was more than two and a half times the mintage a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Converted into silver pieces in term of the "dollar", that would be, by the lowest estimates, from 14 million pieces (dollar) to 36 million pieces (dollar) in a century.

Table 1. Mexican Silver Mintage, 1701-1800

Period	Quantity (million ounce)	Lowest Estimated in "Pieces"
1701-1720	11.4	14,068,863 pieces
1721-1740	13.9	17,154,140 pieces
1741-1760	17.1	21,428,571 pieces
1761-1780	21.0	26,724,357 pieces
1781-1800	28.3	36,014,252 pieces

Note: Conversion ratio between pieces and ounces, 1701-1728, 1 piece =0.8103 oz., 1732-1771, 0.798 oz., 1772-1790, 0.7858 oz., 1791-1800, 0.7797 oz. For those covering two periods, the earliest one is also chosen for the lowest estimates.

Source: Pierre Vilar,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 to 1920* (trans. by Judith White) (London: Verso, 1991), p. 351; on the conversion ratio, see Thomas Michael, ed., *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701-1800*, 7th edition (Iola, WI: Krause Publications, 2016), pp. 1199-1207.

Without a comprehensive trade statistics for Taiwan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fathom the volum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on the island. In any case, both Dutch and Spanish-American silver coins were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and they continued to play a part in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capital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The questions are how and in what transactions they were used.

Monies for the Land

Historians often follow economic theories to identify "money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unit of account", "income" and "capital", and so forth.[46] In many ways,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performed most of these functions in the pre-nineteenth

46 E. Victor Morgan, *A History of Mone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 Penguin Books Ltd., 1965).

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Indeed, the idea of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is certainly an impossible mission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in a divided society based on race, ethnicity, culture, place of origin, and above all, language. Nonetheless, folk documents which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since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yield some clues about these activities.

The first way of using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as the medium of exchange and capital, especially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It is a well-known fact that land developmen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olonization project of the "Han-Chinese" in Taiwan under the Qing.[47] Land developers did not simply profit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land by themselves but from the leasing or sale of the land opened. These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would therefore mea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land market by continued capital flows.

Of course, the us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s the medium of exchange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reflected only a portion of the capital in monetary form, for there were some non-monetary resources in land development, such as timber, stones, and labour. For example, a 1718 stone tablet states that a local official used his own salary to initiate a bridge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which workers were recruited for timber collecting, brick transportation and construction.[48] On another occasion, hard currency was not involved at all. In a contract made in 1723, three groups of settlers joined together to agree to pool labour and other resources together to repair a dike near Damujiang (大穆降).[49] No money was mentioned in the terms regarding the pooling of

47 Two examples of the "Han" and/or "Chinese" perspective of Taiwan's land development include: Cheng Daxue 程大學 , comp., *Taiwan Kaifashi* (A history of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臺灣開發史) (Taichung 台中 : Taiwansheng Zhengfu Xinwenchu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 1978); Ye Zhenhui 葉振輝 , *Taiwan Kaifashi* (A history of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臺灣開發史) (Taipei 台北 : Taiyuan Chubanshe 台原出版社 , 1995).

48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Nanbu Beiwen Jicheng*, Vol.1, pp. 16-17.The inscription did not state clear on the currency unit.

49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Sifa Wuquanbian* (Taiwan's customary law, property rights section 臺灣私法物權編), 9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3), vol. 7, pp.1270-1271.

resources (labour, tools, and materials) or output results (the right to share water). In other words, in case of an official initiative, wages were to be paid in hard currencies. Otherwise, labour service was not clearly calculated, alongside with the fact that other materials, especially timber, could be collected almost for free from the wild in eighteenth-century Taiwan. Therefore, the use of money, in any form or any unit, would be limited to these colonial and developing conditions.

Nonetheless, on many occasions,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did involve physical currency. As mentioned, there exists a large quantity of folk documents concerning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in present-day Tainan. Among them, there are only nine pieces of clearly identifiable folk documents concerning property transactions within the "prefectural city" between 1686 and 1800, summarized in Table 2. They cover from the transactions on house selling to mortgage of land.

Table 2. Folk Documents of the City of Taiwan Prefecture, 1686-1800

	Date	Location	Currency	Deed's Nature
1	1686	Ningnanfang 寧南坊	Silver 70 *liang*	House sale (C-1, 116-117)
2	1710	Ningnanfang	Silver 182 *liang*	House sale (C-1, 117-118)
3	1729	Zhenbeifang 鎮北坊	Silver 50 *liang*	House sale (B-3, 573-574)
4	1745	Dajingtou Jie, Xidingfang 西定坊大井頭街	Silver 150 *liang*	House sale (C-1, 107)
5	1730	XiDingfang Nanhaojie 南豪街	Silver 1340 *liang*	House sale(E-125)
6	1747	Juncheng Qifurenjing 郡城七身夫人境	Annual rent, silver 2 pieces	Land rental (B4, 725-726)
7	1749	Xinjie 新街	Silver 100 *liang* + annual rent silver 21.6 *liang*	House mortgage (B7, 1344-1345)
8	1758	Ningnanfang	"Sword Silver" 20 pieces + annual silver 4 pieces	Land mortgage (B5, 768-769)
9	1789	Ningnanfang	Foreign Head Silver 50 pieces	House mortgage (B7, 1343-1344)

Note: "piece", transliterated as "*yuan*", can be conveniently called "dollar" in modern sense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urrencies, may not be equal to one another.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keep the closest translation to the original. English used here for translation has been abbreviated for the limited space.

Source: (B)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comp., *Taiwan Sifa Wuquanbian* (Taiwan's customary law, property rights section 臺灣私法物權編) (Taipei: Taiwan Yinhang 臺灣銀行 , 1963), 9 vols; (C)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Sifa Zhaiquanbian* (Taiwan's customary law, liabilities section 臺灣私法債權編)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0), 2 vols; (E) Shi Weilian (William Speidel 史威廉) and Wang Shiqing 王世慶 , "Taiwan Minjian he Tianye suozun Qingdai Shiliao jiqi Jiazhi (Q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aiwan's folk society and fieldwork and their value 臺灣民間和田野所存清代史料及其價值)," *Taipei Wenxian* (Taipei Archival Documents 臺北文獻), Zhizi (直字), No. 55 and 56 (June 1981), pp. 123-152.

The currency units used in these transactions are intriguing. In the first contract, the "tael" was used as the currency of transaction. This trend lasted until 1749, interrupted only by the 1747 rental contract. From 1749 onwards, the "tael" disappeared and there were only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namely the "Sword Silver" (*Jianyin* 劍銀) and the "Foreign Head Silver" ("*Fantouyin* 番頭銀 "). Both were mentioned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Qing literature. The first came from the Dutch, the latter from Spanish Luzon.[50]

From these documents, it is clear that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use of currency unit from the "tael" to the "pieces" (員/元).[51] Table 2 also suggests that there might not be a gradual transition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 and accounting unit from the silver"taels" to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ithin the prefecture's capital. It shows that even after the order of 1740 to allow paying silver coins by conversion into the "tael", silver payment by the "tael" was still made, as in the case of the 1749 mortgage con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ael" to the "pieces" in the city eventually took place around the mid-1750s, as the currency unit adopting the "pieces" without conversion. Since then,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learl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the unit of account and/or the medium of exchange within the prefecture's capital. In other words, in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uro-American

50 Zhu Shijie 朱仕玠 , *Xiao Liuqiu Manzhi* (Random records on Little Liuqiu 小琉球漫誌) (Taipei: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1957), p. 82

51 According to the logic we follow on the silver currencies of the pre-nineteenth century period, "piece", transliterated as "*yuan*", can be conveniently called "dollar" in modern sense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urrencies, may not equal to one another.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keep the closest translation to the original, i.e., the "pieces".

silver coins not only served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and capital, they possibly gradually became the *unofficial* accounting unit as well.

As the land documents of Table 2 concentrate on settlements within the prefecture's capital, which do not reflect the condition outside the capital city,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in the villages in its vicinity. With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Han-Chinese", the colonizers also established their villages alongside with many settlements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Regard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s' use of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hinese literary records are not totally clear. The first officially-published local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listed various kinds of taxes levied upo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yet they were all entered in silver "taels" instead of coins.[52] Early Chinese observers, such as Huang Shujing,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hunted "deer to exchange for silver in order to pay the tax", without saying in what form the silver would appear.[53] As both the "tael" and the "pieces" were allowed to be used to pay the tax in 1740, it would be intriguing to see how far the imperial policy of using the "tael" as currency unit and means of payment could be maintained in the vicinity of its prefecture capital.

In fact, outside the walled-city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the Qing government's monetary unit, the "tael", basically lost its ground to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the "pieces". This can be observed in Appendix 1, which is based on all the published selected volumes of folk documents, partly or fully devoted to the present-day Tainan City. It contains altogether 230 pieces of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sale, mortgage and rental) before 1801, mostly in the aboriginal villages. With the sheer quantity of these documents focusing on one region, the findings are illuminating.

52 Gao Gongqian, comp., *Taiwanfu Zhi*, Vol. 2, pp. 132-140.
53 Huang Shujing, *Taihai Shichalu*, p. 106.

First of all, in all 230 pieces of real estate documents in Appendix 1, only one did not specify the unit of currency for transaction, two used silver without specifying the form of the metal took, two used copper cash, two used silver and copper cash, while 12 others have listed goods or animals as the medium of exchange, from 1721 to 1783. Although some entries, especially those for rental contracts, would involve payment in both silver and kind (millet), their shar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folk documents examined is still minor. In all 230 contracts, 12 are merely settled in kind, and 10 others involve partial payment in kind. It may reflect the divergent nature of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It means in the midst of the gradual adoption of a monetary economy, the non-monetary options were never neglected in the drawing of these contracts.

Accordingly, one clear image emerges from Appendix 1, i.e., 215 pieces of real estate documents had mostly used "silver" as the currency unit, or, as a few occasions suggested, involved silver as part of the payment. Despite all these variations, the silver used certainly appeared mostly in the form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the "pieces", in Appendix 1. In all the entries involving silver, the "tael" as the medium of exchange had been used 43 times, while the "pieces" had been used 181 time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crossover between the "tael" and the "pieces" in a few numbers of these contracts, the prevalenc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as phenomenal. It shows the predominanc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pre-nineteenth 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especially in land development which was the island's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and business activity under "Han-Chinese" colonization.

Despite the dominance of the anonymous expressions of "silver in *liang*" and "silver in pieces", the tabulations in Appendix 1 also reveal a variety of currency units for the transactions. Among the deeds which do have silver coins as the currency unit, several were used. These include the "Sword Silver", "Foreign Silver" ("*Fanyin* 番銀"), and the "Flowery Edges Silver" (*Huabianyin* 花邊銀).[54] The "Sword Silver" was known in

54 Zhan Pingren, comp., *Nanying Guqi Jijin*, pp. 18-49.

eighteenth-century Qing literary sources as Dutch silver coins.[55]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1741 shows its usage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was older than conventionally thought.[56] The "Foreign Silver" and "Flowery Edges Silver" were equally well-known as coins coming from Spanish Luzon.[57] A mid-nineteenth-century Cantonese handbook on foreign coins clearly outlined the imagery of the "Flowery Edges Silver", which was the same as the so-called "Pillar Dollar" of Spanish America (See Plate 1).[58] There are also some kinds of silver coins that have not been identified with their Euro-American equivalent, including the "Serpent Silver" (the translators transliterated them as "Dragon Dollars"龍銀), the "Round-Mirror Silver" (圓鏡銀), "Flowery Red Silver" (花紅銀), and the "Big Coin Silver" (大圓銀). Their respective history of circulation in Taiwan must rely upon further research.



Plate 1. "**Flowery Edges Silver**" **or the** "**Pillar Dollar**" **of 1760**

Sources: left: Liang Size, *Yinjing Fami* [The secret bible on silver 銀經發秘) (Shunde: author's publication, 1844), pp. 34-35; right: "Pillar Dollar of 1760 (Kai Yiu Chan, private collection)

55 Zhu Shijie, *Xiao Liuqiu Manzhi*, p. 82

56 This calibration contradicts with the finding of Kishimoto Mio, who found that the "Sword Silver" first appeared around 1780, see Kishimoto Mio, "Qingdai zhongqi Zhongguo de Huobi Shiyong Qinkuang", p. 213.

57 Zhou Kai 周凱 , *Xiamen Zhi* (The gazetteer of Xiamen 廈門志), 5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1), Vol. 2, p. 277.

58 Liang Size 梁思澤 , *Yinjing Fami* (The secret bible on silver 銀經發秘) (Shunde 順德 : author's publication, 1844), pp. 34-35。On the "Pillar Dollar", see Eduard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ransactions Affecting China*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26), p. 129.

Regarding all types of silver coins with a "Buddha" name in the front, the "Buddha Head Silver" (*Fotouyin* 佛頭銀 , or in similar expressions as "Buddha Silver" [*Foyin* 佛銀] and "Buddha Face Silver" [*Fomianyin* 佛面銀]), they need further explanation. They were not clearly described in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fore-mentioned mid-nineteenth-century Cantonese handbook used the term "Left Face" (*Zuomian* 左面) to name the Carolus Dollar.[59] I have also checked with a local gazetteer compiled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ich was later edi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1930s, and yet the name was not mentioned on the list of old silver currencies.[60]

The earliest definition of the "Buddha Silver" (including "Head" or "Face") as the Spanish silver coins imported from Luzon was given by Lian Heng 連橫 , one of the early historians on Taiwan.[61] Although Lian did not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his "definition", scholars in subsequent decades have chosen to follow it.[62] Present-day numismatists, with their fascinating coin collections' visualized images, often directly refer these coins as the "Carolus Dollar", issued from 1772 to the early 1820s (See Plate 2).[63] Yet, in some other areas, land deeds bearing the currency unit as "Buddha Silver" dated as early as in 1732.[64] In present-day Tainan as in Appendix 1, three entries (one "Buddha Face Silver" in 1755 and two "Buddha Head Silver" in 1759) bearing pre-

59 Liang Size, *Yinjing Fami*, p. 10.

60 Tainanshū Kyōenkai 臺南州共榮會 , comp., *Nanbu Taiwanshi* (A gazetteer of Southern Taiwan 南部臺灣誌) (Tainan 臺南 : Tainanshū Kyōenkai, 1934[1907]), pp. 267-268.

61 Lian Heng 連橫 , *Taiwan Tongshi* (A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臺灣通史) (Shanghai 上海 : Shangwu Yinshuguan 商務印書館 , 1947[1918]), p. 144.

62 For example, see Inō Yoshinori 伊能嘉矩 , *Taiwan Bunkashi* (Cultural gazetteer of Taiwan 臺灣文化志), 3 vols.,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trans) (Taichung 臺中 :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1985), Vol. 3, p. 29; Kitayama Hukujirō 北山富久二郎 , *Taiwan ni o keru Shōryō Kaheisei to Woga Heisei seisaku: Kinjikare o Ryōshō se shimuru Kinhonisei* (On the weight-counting currencies and our monetary policy: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bullion in the gold standard 臺灣に於ける秤量貨幣制と我が幣制政策——「銀地金を流通せしむる金本位制」) (Tokyo 東京 : Ganshōtō Shōten 巖松堂書店 , 1935), p. 27; Peng Xinwei, *Zhongguo Huobishi*, pp. 803-804.

63 Che Lu Tseng, *Taiwan Huobi de Jingshen yu Wenhua,* pp. 17-19; Peng Xinwei, *Zhongguo Huobishi*, p. 782. On the first issue of the "Carolus Dollar", see Eduard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p. 129.

64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Qingdai Taiwan Dazu Diaochashu* (Report on the surveys of Taiwan primary rent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 6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3), Vol. 3, pp. 444-445.

1772 dates of mintage are also found. Therefore, there exists a wide gap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reception towards thes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Formosa. If we do not accept the "Buddha Silver" as the "Carolus Dollar", the whole change of silver coin units in Appendix 1 cannot be tackled with the present-day knowledge. What we can do here is to tentatively follow Lian's definition of the "Buddha (Head or Face) Silver" as the one from Spanish Luzon, presumably the "Carolus Dollar".



Plate 2. The "Carolus Dolla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ft: Carlos III (1784); right: Carlos IV (1797)

Source: Kai Yiu Chan, private col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understanding, one can therefore observe from Appendix 1 that the Dutch silver coins were used beyond the official ending of the Dutch VOC's rule on the island. The Dutch coin's final appearance among these land deeds was in 1790, nearly two decades after the "Carolus Dollar" was first issued.[65] All other kind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lso ended their appearance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After that, the "Carolus Dollar"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65 Zhan Pingren, comp., *Nanying Guqi Jijin*, pp. 40-41.

currency unit in the Taina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66] Indeed, if future research on the "Buddha Silver" goes agains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will be a different story. However, there will only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kind of Euro-American coin and the other. It will not alter the fact that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prevailed in the monetary transactions of Formosan inhabitants.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unlike what was happening within the capital city where silver "tael" gave way to "*yuan*", Appendix 1 shows that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undertook downside and upsid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an important medium of exchange and storage of value in the areas surrounding the prefecture's capital before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Although the first land deed of 1683 used silver coins for currency of transaction, it took nearly half a century (1732) for the second time. Still, it shows the recovery of the use of silver pieces under Qing policy of using the "tael". From then onwards,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ere increasingly used to express the value of the transac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order of 1740. The "tael" basically was used from 1723 to 1798 but its last singular appearance as a unit of transaction was in 1783. This last piece of transaction, however,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lt farms in the southern suburb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and needed to be expressed in the "tael"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s salt policy. If we discount this entry, therefore, the latest time for the "tael" to appear singularly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would be 1771, before whence there had already existed some occasions of "foreign silver" being expressed in the "tael". Interestingly, the same plot of salt farm was sold again in 1798, and the "Buddha Silver" was used. In a sense, under the predominanc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neighbouring areas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the local population had effectively

66 The use of the "Buddha Silver"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ven among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Sun-Moon Lake in the 1860s, see Kai Yiu Chan (Chen Jiyao 陳計堯), "Shilun Riyuetan Diqu Yuanzhumin de Lishi Qianyi (A history of aboriginal migration in the Sun-Moon Lake Region, 1815-1934 試論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歷史遷移 (1815-1934)," *Taiwanshi Yanjiu*, 7: 1 (June 2000), pp. 81-134, for the contract, pp. 109-110. The Spanish Dollar even becam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British 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wars with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France, E. M. Kelly, *Spanish Dollars and Silver Tokens: An Account of the Issue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1797-1816* (London: Spink & Son Ltd., 1976).

evaded the adop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unit of account ("tael") in their daily life. Around the 1740s,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pieces" started to become the single means of payment and transaction in these aboriginal settlements. The order of 1740 to allow collecting tax in silver coins signified the victory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As most of the folk documents used in Appendix 1 are related to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the well-known "Sinkang Manuscripts" (*Xingang Wenshu* 新港文書) written in Romanized and Chinese characters, one must also examine the textual expressions of the currency unit in order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se expressions. From Paul Jen-kuei Li's translation of various collections of the "Sinkang Manuscripts", the aboriginal expression on the silver currency units for transaction was "vanitok".[67] Meanwhile, the original Chinese expressions added alongside with the Romanized characters distinguished one kind of silver coins from the other. Most of the differentiated expressions on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except the "Serpent Silver" that still cannot be identified, 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Chinese texts. It seems tha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ere quite indifferent to what kind of silver, in the "tael" or in coins, was used in the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Meanwhil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or the "Sinicized" indigenous peoples who drew the contracts with those using Romanized characters, seem to be more specific in the monetary unit used, leaving more rooms for maneuvering in the "money market".[68]

67 Paul Jen Kuei Li, *Studies of Sinkang Manuscripts*, p. 23.

68 On this maneuvering in the "money market", the limited space here does not allow any further exploration. Some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various sorts of silver coins to the "tael" and to copper cash varied from north to south. But whether it chang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whether it varied from one type of silver coin to the other, we simply need more samples. See Zheng Yongchang, "Qingdai Qianqi Taiwan Huobi Liutong de Fazhan yu Bianqian", pp. 248-250; Wang Shiqing, "Shijiu Shiji zhongye Taiwan Beibu Yinqian Bijia Biandong Chutan" (Silver money and copper coin valuations in northern Taiwan during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銀錢比價變動初探), in Chen Qiukun 陳秋坤 and Hong Liwan 洪麗完 , eds., *Qiyue Wenshu yu Shehui Shenghuo (1600-1900)* (Contractual behavior and social life in Taiwan and southern coast China 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1), pp. 141-172.

The local inhabitants' persistence of using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an be clearly observed in the epic event of the "Rebellion of Lin Shuangwen" in 1787-1788.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dered troops to move southward to the Fujian Province, local officials sent memorials to the emperor, reminding the government the widespread us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on the island. For soldiers to procure provisions in Taiwan, these officials suggested,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exchange silver ingots measured by the "tael" into locally-accustomed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Eventual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obilized both the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to send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to the Taiwan-bound government troops.[69] It was reported that before leaving Fujian, the Qing government troops had already raised 60,000 piece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nd more followed.[70] At the end of the rebellion, the imperial general Fu Kang'an (福康安) suggested to rebuild the island's local society by enlisting more indigenous tribes into the defense-land development system, in which aboriginal soldiers were also paid with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71]

However, in the Taiwan Prefecture's capital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money was spent not only in economic activiti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 considerable amount was used in the name of state policy, public good and the conformed code of conduct of social group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state, its agents (the officials, the soldiers, and the gentry), and other sectors, especially the religious one, used (or not used)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ertainly reflects not onl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ate managed to penetrate into society and economy but also the ways how money was used outside land development.

69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Qinding Pingding Taiwan Jilue* (A royally-sanctioned record on the pacification of Taiwan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6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1), Vol.3, p. 358

70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Qinding Pingding Taiwan Jilue*, Vol. 3, p. 359.

71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Qingdai Taiwan Dazu Diaochashu*, Vol. 6, pp. 1023-1056.

Monies to be "Remembered"

As the state, its agents, and other social groupings, for the sake of being remembered, would express their will, command, or agreement with others in stele inscriptions, therefore, it is instrumental to study the stone tablet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se tablets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their inscriptions published years ago. These stele inscriptions are embedded with different messages but for our present discussion, some of the features related to the use of money have been summarized in Appendix 2.

From this long list of stele inscriptions, one can identify basically four categories which are as follows: (1) the state, (2) the officials, soldiers, and the gentry, (3) the merchants, and (4) temple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Some of them indeed are inter-related with one and other. For example, some officials would initiate a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a temple, followed by the gentry and merchants. Meanwhile, the gentry and some merchants would als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te's own projects, such as building a government office, a bridge, or a school. Some temples and shrines in which the gentry and merchants also donated money, such as the Confucius Temple, would also have implications in state examinations. Therefore, the four categories listed above are still ambiguous.

Compared with the ambiguities in defining the nature of these stele inscriptions, their currency units are fairly clear, from payment in kind to precious metals, and from ingots ("tael"), silver pieces ("*yuan*") to copper cash ("*wen*"文). Moreover,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se monies were mostly inscribed for the hard currencies paid. On some occasions, there may be a mixture of various currencies putting together in one listing of payments, implying that there might be very little conversion of currency. For example, in the entry of 1747, a group of merchants donated various sums of silver to build a bridge, including ingots ("taels"), som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Fanyin* 番銀) calculated by the "tael" (i.e. by weight and fineness), and full-siz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Yuanqian* 員錢) in "pieces". In this case, only the second type would have

involved some degree of conversion. Hard currencies, instead of units of account, were obviously used at par on many of these public projects.

Taking a close scrutiny on the four roughly-defined categories, one would realize that among these public projects and manifestations, payment in kinds, "gold" (also mostly implicitly meant "money") and silver by the "tael" were more commonly used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1710s to 1740s).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first appeared in 1747, after the prefecture's order of 1740 to allow using silver coins to pay taxes calculated in the "tael", and yet became gradually dominant in the use of money among these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mostly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Equally important, perhaps, is the fact that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officials used ingots in the "taels" to make donations to temples or public work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still used the "tael"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pay and to calibrate public projects, the officials *themselves* made private donations in the "pieces" ("*yuan*"). In other words, these stele inscriptions reveal a similar phenomenon as the folk documents show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that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undoubtedly achieved its supremacy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ven the Qing officials as individuals, who received silver ingots and copper cash for salary, paid out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public for non-governmental projects.

What we have discuss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s applies to land deeds, lease contracts, and stele inscriptions, all being written records which might not be fair to express the voices of the illiterate or the non-Han ethnic groups. To understand the way peoples in pre-nineteenth century Taiwan used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excavated archeological sites offer a possibility, for they not only show us how people might think what they treasured most in life but also what they might want to take with them in death.

Monies for the Dead

In present-day Tainan City, there exist a few archeological sites which contain suggestive information for us to have a glimpse on Tainan people's life in pre-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y. Some sites, such as tombs, would contain objects which people might want to bury with them, or to use them as objects to pay tributes to the dead. Other sites, such as lost settlements destroyed by natural disasters, could have objects to show their untold histories before calamity.

The fir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rcheological site in present-day Tainan, of course, is that of the Dutch-built Fort Zeelandia. However, in the archeological report on its excavation in the early 2000s,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site did not yield any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72] There were only some unidentifiable copper cash found, together with some copper coins of the Meiji period and early KMT rule in Taiwan. Indeed, as the excavation site only occupies a tiny portion of the whole historic compound, more may be uncovered in future archeological projects. Yet the absence of any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poses as a puzzle of where they went beyond the Dutch fortress.

The absenc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s also prevalent in the second archeological site. In Madou's (麻豆) Shuijuetou (水堀頭) archeological site, archeologists uncover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Chinese copper cash of the Ming and Qing times. Although they also excavated some Vietnamese copper cash from the ground, no Euro-American silver

72 Caituan Faren Chengda Yanjiu Fazhan Jijinhui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comp., *Diyiji Guji Taiwancheng Chanji (Yuan Rilanzecheng) Chengji Chubu Yanjiu Jihua Chengguo Baogaoshu*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uins of the first-rank archeological site, City of Taiwan (originally Fort Zeelandia) 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 (原熱蘭遮城) 城址初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Tainan City 臺南市 : Unpublished report, 2003), pp. 2-40、2-93.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 generosity of Professor Chung Kuo-feng 鍾國風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e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showing and lending me the archeological reports for this paper.

coins had been discovered.[73] Given there exist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in the locale's neighbourhood, the lack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archeological site implies that the silver used for land did not ended up underground but was moved, or "circulated", somewhere else.

The third archeological site is the Siraya village of Shenei (社內) in the suburb of the Tainan City. It was excavated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at the midst of a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hydraulic conservation.[74] The Shenei site was not a graveyard but a proper settlement covered underground by natural disaster, leaving us the impression of what the life might be at that particular moment. Among different artifacts discovered underground, there is a rich collection of metallic objects which are now kept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nan. For our interest, the coin section is revealing. In this archeological site, there exist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official Chinese copper cash of the Ming and Qing Empires, bearing the reigns of "Yongle" (永樂), "Wanli"(萬曆), "Yongli" (永曆) and "Kangxi" (康熙).[75] Interestingly, this archeological site also hosts a silver coin of small denomination, a Dutch "2 stuivers" silver coin issued

73 Liu I-chang 劉益昌 , Liu Ying-san 劉瑩三 , Yen Ting-yu 顏廷伃 and Chung Kuo-feng 鍾國風 , *Madou Shuijuetou Yiji Kaogu Fajue Yanjiu Jihua Chengguo Baogaoshu* (The project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archeological site at Shuijuetou, Madou 麻豆水堀頭遺址考古調查發掘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Tainan County: Tainanxian Zhengfu Wenhuachu 台南縣政府文化處 , 2008), pp. 141-142.

74 Lu Taikang 盧泰康 , Li Kuangdi 李匡悌 and Wang Zhuping 王竹平 , *Tainan Shenei Yizhi Chutu Jinshuqi Yanjiu* (A study of the metallic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he archeological site of the Shenei Village in Tainan 臺南社內遺址出土金屬器研究) (Tainan: Guoli Taiwan Shiqianwenhua Bowuguan[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15), p. 24; also see Lu Taikang, "Taiwan Nanbu Kaogu Chutu yu Chuanshi de Xifang Yinbi Yanjiu (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 Taiwanshi Yanjiu, 22: 2 (June 2015), pp. 151-196, particularly, pp. 152-153

75 Lu Taikang, Li Kuangdi and Wang Zhuping, *Tainan Shenei Yizhi Chutu Jinshuqi Yanjiu*, pp. 83-90, 110-118. There is also an privately issued copper cash for deity worship, which may be interesting to see the religious influence from the outside. On the reigns' and dynasties' copper cash issues, see Ding Fubao 丁福保 , comp., *Lidai Guqian Tushuo* (Illustrative catalogue on old copper cash of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歷代古錢圖說)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上海書店 , reprint of the 1940 edition, 1986), pp. 161-162, 169, 176-177.

in 1640.[76] Although its value against the accounting unit of "florin" could vary,[77] its value against other "hard currencies" was fixed. According to contemporary numismatic information, a "stuiver", officially, means 1/50 of a fore-mentioned *Rijksdaalder* in the Netherland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78] As silver was valued higher in Asia than in Europe, or the existence of the so-called "light and heavy money" question,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stuiver" and "*Rijksdaalder*" would be even larger in Asia.[79] The same contemporary numismatic information also reports that for the whole period of Dutch VOC's rule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the Netherlands Zeelandia minted no more than 2,000,000 pieces of "2 stuivers" coins for the whole provinc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80] It was presumably used for payment in small transactions.[81] As the locale was close to the VOC's important establishment, Fort Provintia, which had been collecting supplies from its neighbourhood,[82] the existence of the "2 stuivers" coins could reflect part of the historical life of the local inhabitants. The absence of large silver coins, on

76 Lu Taikang, Li Kuangdi and Wang Zhuping, *Tainan Shenei Yizhi Chutu Jinshuqi Yanjiu*, pp. 95-96, 115-118. Although it bears the characters "ZEELANDIA", it was not possibly issued in this island. Rather, it was certainly issued in the Netherlands' Zeelandia and shipped here for trade.

77 See for example, Pol Heyns 韓家寶 and Zheng Weichung 鄭維中 , trans., *Holanshidai Taiwan Gaolinji, Huanyin yu Xili Denglubu* (A compilation of public ordinances, marriage and baptist records in Taiwan during the Dutch times 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Taipei: Cao Yonghe Wenjiao Jijinhui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 2005), p. 144.

78 George S. Cuhaj, ed., *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601-1700*, 5th edition (Iola, WI: Krause Publication, 2011), p. 1372.

79 William G. Walters, "Heavy and Light Money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and the Dutch Republic; Dilemmas of Monetary Management with Unit of Account System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5: 1 (2008), pp. 37-53; also Peter Borschberg, ed., *The Memoirs and Memorials of Jacques de Coutre: Security, Trade and Society in 16th- and 17th-century Southeast Asia* (trans. by Roopanjali Ro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4), p. 338-339; and Peter Borschberg, *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Violenc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in the 17th centu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pp. 340-341.

80 George S. Cuhaj, ed., *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601-1700*, 5th edition, p. 1425.

81 Lu Taikang, Li Kuangdi and Wang Zhuping, *Tainan Shenei Yizhi Chutu Jinshuqi Yanjiu*, pp. 115-118.

82 On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t Provintia and its neighbourhood, see Zheng Yongchang 鄭永常 , "Wan-Ming Yuegang Kaifang yu Hezhi Dayuan Huaren Shehui zhi Xingcheng" (The opening of Port Yu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Tayouan under Dutch rule 晚明月港開放與荷治大員華人社會之形成), Li Qingxin 李慶新 , ed., *Haiyangshi Yanjiu Disiji* (Maritime History Research, Vol. 4, 海洋史研究第四輯) (Beijing 北京 :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2), pp. 90-110.

the other hand, implies a gap existed between those who possessed the large coins and the locals' needs.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archeological site in present-day Tainan City is the Shuijiao Village (水交社),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tip of the former "City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The site excavated only part of the larger area of graveyards during the Zheng family's rule and the early Qing.[83] As it contains mostly graveyards of colonizing settlers and soldiers from China, the site also hosts a greater variety of objects buried with the dead. Among these objects, there include Chinese copper cash in substantial quantities, ranging from the Northern Song, Ming, Koxinga's regime, to the Qing Empire.[84] The site also hosts other kinds of copper cash, including those issued by Japan ("Kanei" 寬永), Vietnam ("Taiping"太平 , "Anfa"安法 and "Jingxing"景興), the rebellious regime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Rebellion" ("Honghua"洪化), and locally Taiwan-issued "Kangxi" copper cash.[85] Interestingly, the site hosts a few Euro-American coins, including a 1-Real silver coin, and a few Spanish copper coins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the reign of Carolus (Carlos) IV.[86] The excavation of the Shuijiao Village and other sites mentioned above leads one to reach a similar observation that large silver coins were generally absent in the archeological sites in present-day Tainan City, not even as hoarding in ancestors' keep. That means large silver coins were neither used

83 Lu Taikang and Li Kuangdi, *Faxian Tainan Shuijiaoshe Qian-Qing Mozanqun* (Discovering the graveyards of the former Qing Dynasty in Tainan's Shuijiao Village 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 (Tainan: Guoli Tainan Yishu Daxue Wenboxueyuan Yishushi Xuexi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藝術史學系 , 2009).

84 For the Northern Song, there include the reigns of "Taiping" (太平), "Huangsong" (皇宋), "Yuanfeng" (元豐), on the Ming, there includes only the "Wangli" (萬曆) reign. On Koxinga's regime, there includes the "Yongli" (永曆) reign. On the Qing, there include all the reigns from "Kangxi" (康熙), Yongzheng (雍正), Qianlong (乾隆), Jiaqing (嘉慶) and Daoguang (道光), Lu Taikang and Li Kuangdi, *Faxian Tainan Shuijiaoshe Qian-Qing Mozanqun*, pp. 170-173. On the reigns and dynasties copper cash issues, see Ding Fubao, comp., *Lidai Guqian Tushuo*, pp. 84, 91, 95, 162, 176-180.

85 Lu Taikang and Li Kuangdi, *Faxian Tainan Shuijiaoshe Qian-Qing Mozanqun*, pp. 170-173. On the reigns of issues of the copper cash, see Ding Fubao, comp., *Lidai Guqian Tushuo*, pp. 172, 176, 218-219, 222, 226-227. The archeological report also mentions a kind of Vietnamese copper cash bearing the reign of "Dingyuan 定元" (p. 170). It cannot be identified in the copper cash catalogue on Vietnam, nor have the authors of the report analyzed it (pp. 179-179, 201-204).

86 Lu Taikang and Li Kuangdi, *Faxian Tainan Shuijiaoshe Qian-Qing Mozanqun*, pp. 170-173; also see Lu Taikang, "Taiwan Nanbu Kaogu Chutu yu Chuanshi de Xifang Yinbi Yanjiu," p. 159.

as sacrifices for ancestral worship, nor as the item usually available to the villagers' ordinary life. More importantly, the general absence of even a small denomination silver coin may also suggest that people who had their families buried there might think of better use of silver coins, if any, for the living.

In fact, large coins might be passed on to the present through careful private collectors rather than being "discovered" from the soil. According to another recent archeological study, large Spanish-American silver coins are found in Tainan's City Museum, not in excavation sites.[87] An early-1930s commemorative volume on the 300 years of Taiwan history states that by that time, there were several collectors holding larg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of various sorts.[88] All of these coins did not have their mintage year clearly revealed but they were listed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 contents and nature. Among them, only one piece of silver probably came from the pre-nineteenth century Spanish Empire, reportedly being discovered in a construction site in Tainan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Japanese rule. Meanwhile, four others clearly stated "Mexican silver coins" (i.e. coins minted after the Mexican independ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l in the hands of Taiwanese collectors in Tainan. There were also two other unidentifiable silver pieces listed, reportedly being found in a graveyard and re-sold to a Japanese collector in Tainan. After all, we still do not hav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ow these large silver coins were passed into the hand of the collectors, not to say the museum.

The question of the availability of larg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mong the local inhabitants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and its vicinity finally leads one to question

87 These include one "Pillar Dollar", 3 "Carolus Dollars" of Carolus III and IV, one piece of 4-Reals coin of Carolus IV, and two pieces of 2-Reals silver coin of Carolus IV, see Lu Taikang, "Taiwan Nanbu Kaogu Chutu yu Chuanshi de Xifang Yinbi Yanjiu", pp. 153-161. The same survey also reported the existence of one piece of 6-stuivers coin in the Amis settlement of the east coast, and another "Carolus Dollar" in Hengchun of the Pingdong County.

88 Taiwan Bunka Sanbyakunen Kinenkai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 comp., *Taiwan Shiryō Shūsei* (Collection of Taiwan historical materials 臺灣史料集成) (Tainan: Tainan Shiyakusho 臺南市役所, 1931), pp. 65-66.

the role of the merchants who were all related to land development, public projects, and religious donations. Therefore, it would be instrumental to examine what role the merchants played in the us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and its vicinity.

Merchants and Monies

Although mercantile activities (from the Dutch VOC to the Koxinga regime) form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e-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Prefecture, *direct* evidence on Taiwan merchants' use of silver coins is still limited. Yet, they seem to be in a position to control the circulation, conversion and exchange of silver. It was because the merchants were given three roles in Formos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rule on the island. In each of these roles,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ould be involved at varying degrees.

Firstly, similar to the Dutch system of tax-farming (*pu* 賻),[89] the Qing government authorized some people as "linguists" (*tongshi* 通事) who actually acted like merchants to farm taxes from and trade with the aborigines.[90] In this cas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ould be used in exchange, as the linguists would finally convert them into the "tael" for taxation. Yet, these linguist-merchants would still need to obtain a source of supply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from the more wealthy commercial centres, such as the "prefectural city".

Secondly, merchants were allowed to trade with the island by accepting official assignment to carry government cargoes of grains back to the mainland. Originally,

89 Pol Heyns, *Holan Shidai Taiwan de Jingji Tudi yu Shuiwu* (Economy, land rights and taxation in Dutch Formosa 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 (trans by Zheng Weichung) (Taipei: Bozhongzhe 播種者 , 2002), pp. 149-170.

90 Zhou Yuanwen 周元文 , comp., *Chongxiu Taiwanfu Zhi* (Re-compilation of 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重修臺灣府志), 3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0 [1713]), Vol. 2, pp. 309-310. The term "*tongshi*" had been translated as the "linguists" by the English-speaking writer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see S. Wells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taining Treaties, Tariffs, Regulations, Tables, Etc., Useful in the Trade to China and Eastern Asia*, Fifth Edition (Hongkong: A. Shortrede & Co., 1863), p. 161.

mercantile vessels were allowed by the Kangxi government to export rice or paddy to the mainland, while the Yongzheng government used Taiwan grains for occasional famine relief measures.[91] In 1746, the system of mercantile vessels for government cargoes was formed.[92]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Qing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send "tribute grains" to Fujian by mercantile vessels.[93] In the midst of these changing systems of carrying trade, merchants sought for profits not only when there was a grain price discrepancy between Taiwan and Fujian Province but also when an exchange rate gap existed between various currencies, especially between silver ingots and copper cash.[94] The merchants involved, therefore, continued to face the risk of currency fluctuation in "tribute grain" transportation across the whole eighteenth century.[95] To these merchants, silver ingots, copper cash and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ould all be considered, though the first two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se merchants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state fiscal system,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would equally be watchful over them.

Lastly, the "*jiao*" (郊) merchants (organized mercantile associations) were authoriz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exercise trade regulations, along different lines of business

91 Inō Yoshinori, *Taiwan Bunkashi*, pp. 9-10.

92 Yao Ying 姚瑩 , *Dongchai Jilue* (A short recollection of missions to the east 東槎紀略)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57[1829]), pp. 22-23.

93 Zhou Kai, *Xiamen Zhi*, Vol. 2, pp. 186-187;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Fujiansheng Li* (The prece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Fujian 福建省例), 8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4), Vol. 1, pp. 34-36.

94 For the whole issue of Taiwan's grain price history, see Xie Meie 謝美娥 , *Qingdai Taiwan Mijia Yanjiu* (A study of grain price in Qing Taiwan 清代臺灣米價研究) (Banqiao City, Taipei County 臺北縣板橋市 : Daoxiang Chubanshe 稻鄉出版社 , 2008)..

95 This was the whole issue of "tribute grains of Taiwan" (Tai-yun 臺運), see Wu Lingqing 吳玲青 , "Shindai Chūha Taiwan ni o keru Gomei to Gin —— 'Taiun' to 'Taishō' wo *Chūshin toshite* (On rice and silver in Taiwan during the mid-Qing —— with reference to the 'Taiwan shipment' and 'Tribute grains of Taiwan' 清代中葉台灣における米と銀——「台運」と「台餉」を中心として)", (Tokyo: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Tokyo'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9). "Tribute grain" here refers to the grain collec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from the people as a form of land tax. It was sent by the local officials to the imperial capital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ood supply. See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9), pp. 148-151.

and particular shipping routes, among fellow merchants coming to the port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96] making themselves the *de facto* trade monopoly at the authorized sea-ports. They probably started to group together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in the 1710s, centred at the *Shuixiangong* (Temple of the Water Immortal 水仙宮).[97] By the 1760s, they certainly ha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temple near the west coast of the "prefectural city".[98] As their first donation in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as made in 1772,[99]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were most likely the group among the three listed here to be able to accumulate the coins throughout the years of monopolizing import-export trade.

Without further contemporary and first-hand materials on the "*jiao*" merchants' business details, it is difficult to reconstruct their role in the circulation and exchange of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me late-nineteenth-century sources, nonetheless, may yield some clue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not only going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but also complicated on its own. Depicted by Imperial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officials in Tainan in the early 1890s, private merchants were reportedly offering loans and producing credit instruments to facilitate transactions in a limited fashion:

> "There are no Native banks or banking agencies in this district. Loans are effected from the rich merchants at the rate of 12 per cent a year, and the same merchants give drafts on their firms or agents on the mainland. Dollars and cash are the local currency. There are no Native or Foreign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but rolls of $50

96 Inō Yoshinori, *Taiwan Bunkashi*, pp. 1-8.

97 Chen Wenda 陳文達 , comp., *Taiwan Xianzhi* (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County 臺灣縣志), 2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1[1720]), Vol.2, p.211; also see a stone tablet of in 1765,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Nanbu Beiwen Jicheng*, Vol.1, pp. 68-70.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emple's name in English, I have consulted Kristofer M. Schipper, "Neighbourhood Cult Associations in Traditional Taina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51-676, particularly p. 658.

98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Nanbu Beiwen Jicheng*, Vol.1, pp. 68-70.

99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Nanbu Beiwen Jicheng*, Vol.1, pp. 90-91.

each, done up in paper bearing the stamp of the hong issuing them, circulate freely when there is no question as to the standing and respectability of the hong".[100]

Here the "hong" ("*jiao*") offered hard currency standard ("rolls of $50 each") with a credit instrument (a piece of "stamped" paper) for other people to circulate as capital and medium of exchange. In other words, by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se "hong" ("*jiao*") merchants performed a part of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Once their standing and respectability were questioned, their banking function would be lost.

More importantly, the "hong" merchant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till depended upon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the "dollar", to conduct business and offer credits. By then, the fore-mentioned Carolus Dollar had not been minted for some time, while those still in the market enjoying a premium.[101] Even though these "hong" merchants could not be called "bankers", their business practice facilitated trade of the time, which c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 of using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and its vicinity. On the contrary, the late-eighteenth-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had established its tradition of using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daily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yet it did not flourish a banking facility for its external trad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bov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began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were used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capital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and its vicinity before 1800. It examined the sources of the

100 P. H. S. Mortgomery,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1891,"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9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3), p.488.

101 Eduard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p. 129; F. M. Page, *Tables for Estimating the Cost of Remittances to Shanghae & Hong-Kong, in Bar-Silver, Mexican Dollars, Drafts on India, and Carolus Dollars* (London: Edward Colyer, 1863), pp. 15 and 38.

silver coins and their spending in land development, public and religious projects. From the folk documents and stele inscriptions studie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eople (civilian, merchants, clerks, officials and soldier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had first been using the official currency system of the silver ingots by the "tael" and copper cash. From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onwards,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of various sorts, from the Dutch "Sword Silver" and Spanish-Mexican "Flowery-Edge Silver" to the Spanish-Mexican "Buddha Head/Face Silver", began to replace silver ingots and copper cash in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monetary life of the city. By the 1750s, the "tael" was rarely mentioned as a means of payment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of the prefectural capital. Outside the "prefectural city",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lso dominated the world of monies, starting to replace the "tael" in the 1740s. By the 1770s, there was only a few mentioning of the Chinese official silver currency in the private contracts. The government's silver standard, the "tael", was not even close to be an acceptable currency for non-government-related, private transactions.

The imagery of a triangular mone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per cash, silver ingots and silver coins as suggested by previous scholarship does not apply to the historical reality we have reconstructed here. Unlike other prefectures in Fujian where copper cash still considerably occupied a firm position as a currency standard,[102] the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 and its vicinity seldom saw copper cash as the principal currency standard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If applicable, there only exi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lver ingots and silver coins. The shifting from the "tael" to the "pieces" may also recall the previous studies' imagery of when that took place. Yet, the difference of timing between the "prefectural city" (1750s) and its vicinity (1770s) implies a gap in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 terms of spatial difference.[103]

---

102 See Ri Kōbai, "Shindai Hukkenshō niokeru Keizaihatten to Kaheiryūtsū", pp. 185-191. It must also be pointed out that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s, the amount of folk documents published in Fujian has not been comparable to those in Taiwan. Therefore, such a comparison must be revised when more Fujian-based folk ducments are available in future.

103 On the general finding on the shift from the "tael" to the "pieces" in Taiwan, see Zheng Yongchang, "Qingdai Qianqi Taiwan Huobi Liutong de Fazhan yu Bianqian", pp. 245-246. Zheng suggested that the shift generally happened in the 1750s.

More importantly,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hard currency neither stayed in the countryside, nor among the indigenous peoples' settlements, as the reports of the present-day Tainan's excavation sites have recorded only a few small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long with many copper cash and copper coins. The presence of a "2 stuivers" silver coin in a Siraya village or a 1-Real silver coin in a "Han-Chinese" settlement certainly meant the neatly embroidered socio-economic networks of daily life between aboriginal and colonizing societies. However, it also meant the absence of the large coins. Accordingly, there might be a shortage of a monetary base for high-finance in the parameter of Dutch rule based on the two fortresses, as the ordinary people did not have enough hard currency to circulate, not to say to accumulate. On the contrary, the merchants, especially those "*jiao*" merchant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prima facie*, would be able to circulate, exchange, and even to accumulate wealth based on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Obviously, the ke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for European and Spanish-American silver coins was their regular supply through external trade. Although this paper does not cover the mercantile networks to materialize a regular silver trade to the "prefectural city", it suggests the key period was the 1750s-1780s. For this period witnessed at first a shift of use from the silver "tael" to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Then, by the 1780s, it shifted again from various kinds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to basically one type, the "Buddha Head Silver" or supposedly the Carolus Dollar of Spanish America. Probably in the 1780s, merchants of the City of Taiwan Prefecture managed to secure a stable supply of Spanish silver coins to circulate in the island's Chinese-colonial capital. In this respect, the wider networks of the merchants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must be reconsidered, across the China coast, South East Asia, and West Pacific.

The "Rebellion of Lin Shuangwen" and its subsequent suppression by the Qing troops probably also added a push by abruptly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vailable on the island. The "rebellion" has been studied for years in the

line of thinking of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even ethnic implications.[104] Its economic impact, alongside with the whole restructuring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considered. Although the persistence of the us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aiwan had been prevailing before the "rebellion", its impact to the local economy could be forceful in sustaining the use of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for the next century to come. Silver production of the "New World", as some historians suggested, had an enormous impact on Europe, especially Spain and France, breeding inflation, and eventually, playing a role in the events leading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105] Its impact on the capital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could lead us closer to the events in Taiwan in relati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re, it is still premature to provide any sensible explanation to our original question of the absence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before 1800. Undoubtedly, there may be other factors leading to the lack of banking agencie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especially the scale of trade in comparison with Shanghai or Ningpo. What is clear here is that silver circulated but did not accumulate in the export-rich area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That leads one to question why the *jiao* merchants did not develop their own banking institutions. Or, one may doubt whether there existed exaggerations in the commercial heritage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On the other hand, merchant hous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ften transferred funds as banks did,

104 Wen-hsiung Hsu (Xu Wenxiong 許文雄), "Lin Shuangwen Qishi han Taiwan Shehui Bianqian (The Lin Shuangwen Uprising and Taiwa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林爽文起事和台灣社會變遷)",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19: 1 (Autumn 2001), pp. 95-150, 300; Chih-Ming Ka (Ke Zhiming 柯志明), *Fan Toujia: Qingdai Taiwan Zuqun Zhengzhi yu Shou-Fan Diquan* (The aboriginal landlord: Ethnic politics and aborigine land rights in Qing Taiwan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1), 255-275.

105 See the classic study of Hamilton on American silver and Europe's so-called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reprint of the 1934 edition, 1977). On its impact on socio-political changes in Europe, see Pierre Vilar,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 to 1920* (trans. by Judith White) (London: Verso, 1991), pp. 253-308.

drawing drafts and moving capital *via* remittance.[106] And yet, they were not agencies engaging primarily in banking business. At most, they were engaged in some "private banking" which only traded with a limited circle of business partners. Besides, they were not pres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any case, the "prefectural city"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still needed to take a long way to develop the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s for high-finance.

Inde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Buddha Head/Face Silver" was the Carolus Dollar may still alter the argument of the present study. The riddle created by Lian Heng's judgment, however, leads one to consider a wider scop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prefectural city" was certainly the political centre of the island befor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ts economic influence over other parts of the island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The circulation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and its vicinity must also be put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same object's circulation in other parts of the island. A full-scale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circulation, along with its implications, must be important for us to uncover another dimension of Taiwan history in future.

Here the position of the Qing Empire's central government is intriguing. As an empire to have acquired a footage on the island through conquests, the Qing initiated various measures, including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military and the nav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schools, and above all, state-supervised trade to build the establishment. These measures aimed at re-engineering the indigenous society of Formosa into a docile colony of the "Han-Chinese" ruled by the Manchus. Ironically, the Qing Empire eventually failed to convert the local population to use the kind of money it wanted. In a sense,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the Dutch VOC continued to survive the Manchu Empire and Chinese colonization.

---

106 For example, the Xu family business in Lugang, see Yu-ju Lin 林玉茹 and Shiuh-feng Liu 劉序楓 , comp., *Lugang Jiaoshang Xu Zhihu Jia yu Dalu de Maoyi Wenshu* (The trade letters of the Hsu family between Lugang and mainland China in 1895-1897 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一八九五-一八九七）) (Taipei 臺北 :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臺灣使研究所 , 2006).

In conclusion, the use of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aiwan's "prefectural city" maintained a tradition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Dutch VOC's rule, which was reinforced b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rise of the merchants of the "prefectural city". Consequently, by continuing to use the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and capital, which was also used by European states and their colonies across the globe, Taiwanese socie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ready found itself part of a globalizing world economy well befor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ppendices

Appendix 1. Land Deeds of Tainan Outside the Capital City, 1683-c.1800

	Year	Location	Nature	Currency	Amount	Sources
1	16?? (Kangxi)	Madou	Male	Silver, *liang* for millet	94 *liang*	PL-541
2	1683	Madou	Mortgage	Silver, pieces	3000 pieces	PL-330-334
3	1721	Xia Danshui	Lease	Paddy, *dan* and *dou*	7 *dan* 5 *dou*	PL-355-360
4	1723	Damujiang	Irrigation	water	water	B7, 1270-1271
5	1723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72 *liang*	PL2-170-173
6	1727	Jiateng	Lease	Paddy, *dan*	4 *dan*	PL-361-362
7	1730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10 *liang*	PL-503-504
8	1731	Xingang	Mortgage	Groups of straws	560 groups of straws	PL-106-109
9	1731	Xingang	Sale	Silver, *liang*	Silver *liang*	PL-506-509
10	1732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40 pieces	PL-373-376
11	1732	Xingang	Sale	Silver, *liang*	25 *liang*	PL-492-495
12	1733	Jiateng	Lease	Millet, *dan*	50 *dan*	PL-365
13	1734	Dawulongshe	Mortgage	Silver, pieces	6 *liang*	H-375-377
14	1735	Xingang	Land exchange	Land	Land	PL-110-112
15	1735	Xinhuananli	Mortgage	Silver, pieces	315.4 pieces + 340 pieces	B-1, 64-65
16	1735	Guozilin	Sale	Foreign silver, pieces in *liang*	Foreign silver in 102.3 *liang*	C-1, 5-6
17	1735	Xiaolongshe	Sale	Silver, *liang*	50 *liang*	H-372-373
18	1736	Xingang	Mortgage	Copper cash	2000 cash	PL-479-480
19	1736	Xingang	Mortgage	Flowery Edges silver, *liang*	8 *liang* Flowery Edges Silver	PL-510-511
20	1737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36 *liang*	PL-113-116
21	1737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qian*, *fen*	29 *liang*, 2 *qian*, 6 *fen*	PL-23-26
22	1739	Xingang	Land dispute	Land	Land	PL-515-517
23	1739	Jiate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0 piece	PL-366-369
24	1740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55 pieces	PL-322-323
25	1740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unknown	Unknown	PL-27-30

26	1741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Unknown, *liang*	PL-117-120
27	1741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240 *liang*	PL-461-463
28	1741	Xingang	Sale	Silver, *liang*	8 *liang*	PL-121-122
29	1741	Wanli	Sale	Clean-water Sword Silver, pieces	240 pieces	I-164
30	1742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 *dan* of millet	24 *liang* + 36 *dan*	PL-123-126
31	1743	Wanli	Sale	Silver, *liang*	32 *liang*	PL-552-554
32	1743	Da Wulong	Sale	Silver Foreign Silver, *liang*	24 *liang*	PL-353-354
33	1743	Biaoyezhuang Beishi Dapai	Sale	Silver, pieces	216 pieces	ZPR
34	1744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 pieces	PL-401
35	1744	Xingang	Settle dispute	*Dan* of millet, pig and alcohol	8 *dan*, 1 pig and 1 jar of alcohol	PL-127-129
36	1744	Madou	Sale	silver, *liang*	100 *liang*, 2 *qian* 3 *fen*	PL-335-338
37	1744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35 *liang*	PL-130-132
38	1745	Xingang	Houses claim	Unknown	Unknown	PL-481-483
39	1746	Wanli	Mortgage	Foreign Silver, *liang*	86 *liang*	PL-557-559
40	1746	Wanli	Sale	Silver, *liang*	45 *liang*	PL-555-556
41	1746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 *dan* of millet	3 *liang* + 7 *dan*	PL-377-379
42	1746	Xingang	Mortgage	Foreign Silver, *liang*	50 *liang*	PL-31-34
43	1747	Zhuohou	Sale	Silver pieces	112 pieces	PL-518-520
44	1747	Xingang	Lending	Silver, *liang*	20 *liang*	PL-133-137
45	1747	Zhuohou	Mortgage	Silver, pieces	6 pieces	PL-324-325
46	1748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9 pieces	PL-138-140
47	1748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30 *liang*	PL-309-311
48	1748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70 pieces	PL-141-143
49	1748	Xingang	Lending	Silver, *liang*	139 *liang*	PL-307-308
50	1748	Xingang	Sale	Silver, *liang*	330 *liang*	PL-35-37
51	1748	Wanli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50 pieces	PL-560-561

52	1749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0 pieces	PL-385-387
53	1749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2 pieces	PL-144-146
54	1749	Wanli	Sale	Foreign Sword Silver, *liang*	140 *liang*	PL-542-545
55	1749	Wanli	Sale	Silver, pieces	92 pieces	I-168
56	1750	Xingang	Lending	Silver, *liang*, weight	73 *liang*	PL-505
57	1750	Xingang	Sale	Silver, pieces	25 pieces	PL-147-151
58	1750	Xingang	Sale	Silver, *liang*	300 *liang*	PL-152-154
59	1750	Wanli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45 pieces	PL-546-548
60	1750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32 pieces and 3 *qian* + 1 piece and 8 *qian*	PL-155-157
61	1751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2 pieces	PL-402-403
62	1751	Xingang	Lending	Silver, pieces	4 pieces	PL-158-159
63	1751	Xingang	Guarantee for selling goods	Pig and alcohol	1 pig and 1 jar of alcohol	PL-484-485
64	1752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5 pieces	PL-160-162
65	1752	Xinfengli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950 pieces	B-6, 1005-1007
66	1753	Madou	Mortgage	Sword Silver, pieces	120 pieces	PL-342-344
67	1753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8 pieces	PL-163-166
68	1753	Xingang	Transfer land opening rights	Silver, *liang*	92 *liang*	J-v2-624
69	1754	Xingang	Lease	Silver, pieces + *dan*	3 pieces + rent 2 *dan*	PL-388-390
70	1754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liang*, *qian*, *fen*	64 *liang*, 4 *qian*, 8 fen	PL-187-190
71	1754	Xingang	Lease	*Dan*, equivalent to pieces	3 *dan* + 8 *dan* debt equivalent to 13 pieces	PL167-169
72	1754	Wanli	Sale	Silver, pieces	200 pieces	I-169
73	1755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64.5 pieces	PL-170-172
74	1755	Madou	Sale	Round-Mirror Silver, pieces	32 pieces	PL-533-536
75	1755	Xingang	Land dispute	Silver, pieces	12 pieces	PL-173-177

76	1755	Madou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20 pieces	PL-530-532
77	1755	Maogangwei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213 pieces	ZPR
78	1755	Madoushe	Sale	Foreign Silver, pieces	120 pieces	ZPR
79	1755	Madoushe	Sale	Round-Mirror, pieces	Silver 32 pieces	LYR
80	1755	Wanli	Sale	Buddha Face Silver, pieces	200 pieces	I-169
81	1755-64	N/A	Sale	Silver, pieces	Silver 120 pieces	LYR
82	1756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30 pieces	PL-178-179
83	1756	Wanli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70 pieces	PL-572-574
84	1756	unknown	Lease	Silver, *liang* and *qian*	4 *liang* 5 *qian*	PL-456-457
85	1756	Xingang	Sale	Silver, pieces	13 pieces	PL-476-478
86	1756	Mujialiuwanshe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70 pieces	H-385-386
87	1757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liang*, *dan* of millet	47 *liang* 6 *qian* + 28 pieces + 15 *dan* + 28 pieces exchanged for 16 *liang* 8 *qian*	PL-180-182
88	1757	Madou	Sale	Round-Mirror Silver, pieces	260 pieces	PL-345-347
89	1757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55 pieces	PL-486-488
90	1757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0 pieces	PL-183-186
91	1757	Wanli	Sale	Foreign Sword Silver, pieces	60 pieces	PL-570-571
92	1758	Xingang	Labour	Silver pieces per year	6 pieces per year	PL-312-313
93	1758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 pieces	PL-191-193
94	1758	Jialixingshe	Sale	Sword Silver	75 pieces	ZPR
95	1759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70 pieces	PL-194-196
96	1759	Xingang	Mortgage	Foreign Sword Silver, pieces	200 pieces	PL-38-41
97	1759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5 pieces	PL-197-200
98	1759	Wanli	Sale	Buddha Head Silver, *liang*	25 *liang*	PL-562-564
99	1759	Wanli	Sale	Buddha Head Silver, *liang*	82 *liang*	I-170

100	1760	Xingang	Sale	Silver, pieces	275 pieces	PL-201-203
101	1760	Zhuohou	Sale	Flowery Red Silver, *liang*	24 *liang*	PL-326-327
102	1760	Xingang	Sale	Silver, *liang* + 7 pieces	33 *liang* 5 *qian* + 7 pieces	PL-205-208
103	1760	Xingang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30 pieces	PL-42-45
104	1761	Xingang	Sale	Foreign Sword Silver, pieces	310 pieces	PL-46-50
105	1761	Zhuohou	Mortgage	Silver, pieces	7 pieces	PL-328-329
106	1762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50 pieces	PL-209-212
107	1762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 cash	2 pieces + 1600 cash	PL-213-215
108	1763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30 pieces	PL-216-219
109	1763	Zhuohou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2 pieces	PL-220-224
110	1764	Madoushe	Sale	Sword Silver	70 pieces	ZPR
111	1764	Zongyezhuanghou	Sale	Sword Silver	100 pieces	ZPR
112	1765	Xingang	Mortgage	Sword Silver, pieces	299 pieces	PL-404-409 + LYR
113	1765	Wanli	Sale	Foreign Sword Silver, pieces	60 pieces	PL-570-571 + LYR
114	1765	Xinhuanei Duoluoguobao 新化裏哆囉國保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900 pieces	F-154
115	1766	Xingang	Mortgage	Foreign Silver, *liang* +*dan* and *dou* of millet	65 *liang* + 52 *dan* 6 *dou*	PL-398-400
116	1766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4 pieces	PL-225-226
117	1766	Xingang	Lease	Silver, pieces + *dan* and *dou*	65 pieces (52 *liang*) + 1 *dan* and 6 *dou*	PL-51-56 + LYR
118	1766	Xingangshe	Mortgage	Sword Silver	49 *liang* 5 *qian* + 1 pieces	LYR
119	1766	Jiaobanianzhuang	House sale	Foreign Sword Silver, pieces	32 pieces	A-1, 88
120	1767	Wanli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65 pieces	PL-549-551
121	1767	Xingang	Mortgage + lease	Foreign Sword Silver, pieces + *dou*	104 pieces + 4 pieces + 3 *dou*	PL-57-59
122	1767	Madou	Sale	Silver, pieces	4 pieces + 43 pieces	PL-339-341
123	1767	Wanlishe	Sale	Silver	60 pieces	LYR

124	1768	Xingang	Lending	Pig and alcohol	1 pig and 1 jar of alcohol	PL-227-233
125	1768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5 pieces	PL-234-236
126	1768	Xingang	Lending	Silver pieces	2 pieces	PL-294-295
127	1768	Xingang	Funeral items	Silver, pieces	4 pieces + 4 *qian* 5 *fen*; items counted in silver	PL-296-298
128	1768	Maogangwei	Sale	Sword Silver	180 pieces	ZPR
129	1768	Madoushe	Sale	Sword Silver	30 pieces	LYR
130	1769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55 pieces	PL-512-514
131	1770	Xingang	Mortgage	Foreign Silver in pieces and converted *liang* + *dan* of millet	2 pieces + Foreign Silver 55 *liang* 1 *qian* 4 fen + 36 *dan*	PL-60-64
132	1770	Xingang	Mortgage	*Dan* of millet	5 *dan*	PL-237-238
133	1770	Wanli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36 pieces	PL-565-567
134	1770	Dawulongshe	Sale	Silver, pieces	200 pieces	B-2, 352-353
135	1771	Xingang	Sale	Silver from *liang* to pieces	From 33 *liang* 5 *qian* to 100 pieces + 7 pieces	PL-239-242
136	1771	Wanli	Sale	Silver, *liang*	64 *liang*	PL-568-569
137	1771	Wanli	Mortgage	Clean-water Sword Silver, pieces	45 pieces	I-172
138	1771	Xingang	Sale	Flowery Red Silver 花紅銀, pieces	7 + 2 + 1 pieces	PL-65-67
139	1771	Biaoyezhuang	Sale	Sword Silver	230 pieces	ZPR
140	1771	Xingangshe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0 pieces	LYR
141	1771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6 pieces	PL2-174-176
142	1773	Xingang	Lending	Silver, pieces	15 pieces	PL-243-245
143	1773	Jiaobanianzhuang	Sale	Silver, *liang* + *dan* and *dou* of millet	19 *liang* 6 *qian* + 15 *dan* and 6 *dou*	A-1, 84-85
144	1774	Zhuohou	Mortgage	Buddha Head Silver, pieces	86 pieces	PL-528-529
145	1774	Zhuohou	Lease	Foreign Sword Silver, pieces	248 pieces	PL-521-523
146	1774	Jialixingshe	Sale	Sword Silver	17 pieces	ZPR

147	1774	Wanli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45 pieces	I-172
148	1775	Xingang	Mortgage	Big Coin Silver, pieces	90 pieces	PL-415-42 + LYR0
149	1775	Jiaxiangli	Rental	Cash	6 cash per year	LYR
150	1775	Wanli	Sale	Silver, pieces	130 pieces	I-173
151	1776	Xingang	Accounts	Silver, pieces	90 pieces	PL-299-303
152	1776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5 pieces	PL-381-384
153	1776	Xingang	Contract on money	Silver, pieces	11 pieces 5 *fen* + 83 pieces + 5 *fen*	PL-246-247
154	1776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0 pieces	PL-248-249
155	1776	Xingang	Mortgage	Sword Silver, pieces	120 pieces	PL-421-424
156	1776	Xingang	Sale	Silver, pieces	12 pieces	PL-380
157	1776	Xingangshe	Mortgage	Sword Silver	25 pieces	LYR
158	1776	Xingangshe	Mortgage	Sword Silver	120 pieces	LYR
159	1776	Xingang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77 pieces	D-2, 367-368
160	1771	Xingang	Lending	Silver, pieces	4 pieces	PL2-177-178
161	1777	Xingang	Mortgage	Sword Silver, pieces	16 pieces	PL-68-71
162	1777	Xingang	Lending	Silver, pieces	40 pieces + Serpent Silver 13 and a half pieces + 27 pieces + 15 pieces = 95 and a half pieces	PL-304-306
163	1777	Xingangshe	Rental	*Dou* or millet	3 *dou*, 3 *sheng* 升 , and 3.33 *he* 合 of millet	LYR
164	1778	Xingang	Lending	Silver, pieces	6 pieces	PL-250-252
165	1779	Xingang	Mortgage	Sword Silver, pieces	1 piece	PL-429-431 + LYR
166	1779	Xingang	Lending	Silver, unknown	Unknown	PL-253-255
167	1779	Madou	Sale	Clear Water Sword Silver, pieces	330 pieces	B-6, 1089-1090

168	1780	Xingang	Mortgage	Foreign Sword +Buddha Silver, pieces	Foreign Sword Silver 60 pieces + Buddha Silver 17 pieces	PL-72-76
169	1780	Xingangshe	Mortgage	Sword Silver	100 pieces	LYR
170	1780	Xingangshe	Mortgage	Buddha Head Silver	5 pieces	LYR
171	1780	Xingangshe	Mortgage	Sword Silver	1 pieces	LYR
172	1781	Xingang	Lending	Silver + Serpent Silver, pieces	2 pieces of silver to repay in Serpent Silver	PL-256-257
173	1781	Madou	Sale	Silver, pieces	120 pieces	PL-349-352
174	1781	Xinhuanei Duoluoguobao 新化裏哆囉國堡	Mortgage	Flowery Edges Silver, pieces	64 pieces	B-194
175	1782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41 pieces	PL-432-434
176	1782	Niudiaopushe	Sale	Silver	41 pieces	LYR
177	1782	Xingang	Mortgage	Buddha Silver, pieces	6 pieces	B-6, 1013-1014
178	1782	Xiaolishe 霄厘社	Mortgage	Silver, pieces	41 pieces	H-369-370
179	1783	Xingang	Lease	Silver, pieces	17 pieces	PL-77-79
180	1783	Zhuohou	Mortgage	*Dan* of millet + Sword Silver pieces	32 *dan* + 10 pieces	PL-524-527
181	1783	Madou	Sale	Sword Silver, pieces	26 pieces	PL-537-540
182	1783	Niudiaopushe	Mortgage	Silver	Silver 1 pieces + silver 6 pieces-silver 3 pieces + silver 30 pieces	LYR
183	1783	Taiwan County, Laibeichang	Sale of Salt Field	Silver, *liang*	120 *liang*	B-6, 982-983
184	1783-4	Madoushe	Sale	Sword Silver	26 pieces	LYR
185	1784	Xingang	Mortgage	Flowery Edges Silver, pieces	319 pieces	PL-410-414 + LYR
186	1784	Xingang	Sale of a cow	Silver, pieces	12 pieces	PL-258-259
187	1784	Xingang	Mortgage	Sword Silver, pieces	120 +14 pieces	PL-80-82
188	1784	Xingang	Mortgage	Buddha Silver, pieces	160 pieces	B-6, 1014-1015

189	1786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4 pieces	PL-458-460
190	1786	Xingang	Sale	Silver, pieces	12 pieces	PL-260-261
191	1786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0 pieces	PL-435-437
192	1787	Wanli	Sale	Silver pieces	180 pieces	I-173
193	1788	Xingang	Mortgage	Buddha Head Silver, pieces	250 pieces	PL-83-86
194	1789	Xingang	Mortgage	Foreign Sword Buddha Head Silver, pieces	35 pieces	PL-87-90
195	1789	Madoubao Yuchaoshe	Sale	Sword Silver	80 pieces	LYR
196	1789	Madoushe	Sale	Sword Silver	50 pieces	LYR
197	1789	Xingangshe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 piece	J-v2-624
198	1789	Wanli	Sale	Silver, pieces	50 pieces	I-174
199	1789	Wanli	Sale	Buddha Head Silver, Sword Silver, pieces	135 pieces	I-174
200	1790	Xingang	Mortgage	Flowery Edges Sword Foreign Sword Buddha Head Silver, pieces	Flowery Edges Sword Silver 30 pieces + Foreign Sword 11 pieces + Buddha Head Silver 11 pieces	PL-438-440
201	1790	Xingang	Mortgage	Buddha Head Silver, pieces	632 pieces	PL-91-94
202	1790	Xingangshe	Mortgage	Flowery Edges Silver + Buddha Head Silver	Flowery Edges Silver 30 pieces +Buddha Head Silver 11 pieces	LYR
203	1791	Madoushe	Sale	Buddha Silver	43 pieces	LYR
204	1794	Yingding	Sale	Buddha Face Silver	60 pieces	ZPR
205	1795	Xingang	Mortgage	Foreign Silver, pieces + cash	1 piece + 100 cash	PL-95-97
206	1795	Madoushe	Sale	Silver + cash	Silver 7 pieces and copper cash 400 pieces	LYR
207	1795	Madoushe	Land Opening	Silver, pieces	4 pieces	LYR
208	1797	Kugualiao	Land tax	Silver, pieces	0.25 pieces	B-6, 1030

209	1797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5 pieces	PL-262-264
210	1797	Xingang	Mortgage	Serpent Silver, pieces	530 pieces	PL-265-271
211	1797	Dawulongshe	Sale	Silver, pieces	200 pieces	H-378-379
212	1798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9 pieces	PL-272-273
213	1798	Xingang	Mortgage	Buddha Head Silver, pieces	140 pieces	PL-391-394
214	1798	Xingang	Sale recharge	Foreign Silver, pieces	5 pieces (previous Foreign Sword Silver 49 *liang* 5 *qian* + 116 pieces + 100 pieces	PL-441-443 + LYR
215	1798	Kandingzhuang	Sale	Buddha Face Silver, pieces	145 pieces	ZPR
216	1798	Jialixingshe	Sale	Buddha Silver	14 pieces	ZPR
217	1798	Yingdingshe	Sale	Buddha Head Silver	20 pieces	ZPR
218	1798	Zhuohoushe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 pieces	LYR
219	1798	Duoluoguobao	Mortgage	Foreign silver, pieces	70 pieces	I-188
220	1798	Taiwan County, Laibeichang	Sale of Salt Field	Buddha Foreign Silver, pieces	260 pieces	B-6, 983-984
221	1798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167 pieces	PL2-177-184
222	1799	Xingang	Mortgage	Buddha Head Silver, pieces	280 pieces	PL-98-101
223	1799	Xingang	Lending	Silver, pieces	6 pieces	PL-274-275
224	1799	Xingang	Unknown	Silver, pieces	10 pieces	PL-276-278
225	1799	Mangzimangshe 芒仔芒社	Mortgage	Buddha Silver, pieces	5.4 pieces	G-83
226	1799	Mangzimangshe	Mortgage	Silver, pieces	45 pieces	H-366-367
227	1799	Xingangshe	Sale	Buddha Silver, pieces	6 pieces	J-v2-625
228	1800	Xingang	Mortgage	Silver, pieces	25 pieces	PL-464-466
229	1800	Dawulong Xinshe	Mortgage	Buddha Face Silver, pieces	40 pieces	B-2, 264-265
230	1800-1	Zhuohoushe	Mortgage	Buddha Head Silver	7.5 pieces	LYR

Note: piece, transliterated as "*yuan*", can be conveniently called "dollar" in modern sense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urrencies, may not be equal to one another.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keep the closest translation to the original.

Source: (A)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comp., *Taiwan Sifa Renshibian* (Taiwan's customary law, civilian section 臺灣私法人事編) (Taipei: Taiwan Yinhang 臺灣銀行 , 1961), 5 vols.; (B)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comp., *Taiwan Sifa Wuquanbian* (Taiwan's customary law, property rights section 臺灣私法物權編) (Taipei: Taiwan Yinhang 臺灣銀行 , 1963), 9 vols; (C)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comp., *Taiwan Sifa Zhaiquanbian* (Taiwan's customary law, liabilities section 臺灣私法債權編) (Taipei: Taiwan Yinhang 臺灣銀行 , 1960), 2 vols; (D)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comp., *Qingdai Taiwan Dazu Diaochashu* (Report on the surveys of Taiwan primary rent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 (Taipei: Taiwan Yinhang 臺灣銀行 , 1963), 6 vols.; (E) Shi Weilian (William Speidel 史威廉) and Wang Shiqing 王世慶 , "Taiwan Minjian he Tianye suozun Qingdai Shiliao jiqi Jiazhi (Q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aiwan's folk society and fieldwork and their value 臺灣民間和田野所存清代史料及其價值), *Taipei Wenxian* (Taipei Archival Documents 臺北文獻), Zhizi (直字), No. 55 and 56 (June 1981), pp. 123-152; (F) Zhang Yanxian 張炎憲 (comp.), *Taiwan Guwenshuji* (Old documents of Taiwan 台灣古文書集) (Taipei 台北: SMC Publishing Inc. 南天書局 , 1988); (G) Cheng-ming Tseng 曾振名 and Yuan-chao Tung 童元昭 , comp., *Gemalan Xilaya Guwenshu* (A collec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from Kavalan and Siraya 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 (Taipei: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9); (H) Liu Zeming 劉澤民 , *Pingpu Baishe Guwenshu*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undreds of village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平埔百社古文書) (Nantou 南投 : Guishiguan Taiwan Wenxianguan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2); (I) Liu Zeming 劉澤民 , *Taiwan Zongdufu Dang'an Pingpuzu Guanxi Wenxian Xuanji*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he archives i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 (Nantou 南投 :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2001).; (J) Liu Zeming 劉澤民 , *Taiwan Zongdufu Dang'an Pingpuzu Guanxi Wenxian Xuanji Xupian* (Second compilation of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he archives i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篇) (Nantou 南投 : Guishiguan Taiwan Wenxianguan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4), 2 vols.; (ZPR) Zhan Pingren 詹評仁 , comp., *Nanying Guqi Jijin* (A mixed collection of old deeds of Tainan 南瀛古契集錦) (Tainan: Tainanshi Wenhuaju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2016), pp. 18-51; (LYR) Lin Yuru 林玉茹 , comp., *Tainanxian Pingpuzu Guwenshuji* (Collected volume on folk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ainan 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Xinying City, Tainan County 臺南縣新營市 : Tainanxian Wenhuachu 台南縣政府文化處 , 2009), pp. 46-193; (PL) Paul Jen Kuei Li 李壬癸 , *Studies of Sinkang Manuscripts* (新港文書研究)(Taipei 臺北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2010); (PL2) Paul Jen Kuei Li and Hsiu-min Huang 黃秀敏 , "Xin Faxian Sijian Xingang Wenchu" (Four recently uncovered Sinkang Manuscripts 新發現四件新港文書), *Taiwanshi Yanjiu* (臺灣史研究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22: 4 (December 2015), pp. 167-189.

Appendix 2. Stele Inscriptions Concerning Currency Unit in the Capital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1713-1797

Item	Year	Location	Currency	Inscriptions' Nature
1	1713	Confucius Temple, Prefectural City	"*Dan* 石" and "*dou* 斗" of paddy	Gentry educational land management
2	1718	Xiaying	"Gold"	Officials' donation to build bridge
3	1720	Confucius Temple, Prefectural City	Silver taels	Officials' and degree holders' donation to build a pond inside Confucius Temple, Prefectural City
4	1720	Confucius Temple, Prefectural City	"Gold"	Officials' and degree holders' donation to build a shrine inside Confucius Temple, Prefectural City
5	1730	Prefectural City's Beijidian 北極殿	"Tael"	Temple's property management
6	1731	Damujiang	"Gold"	Official-initiated irrigation project
7	1740	Prefectural City's Shuixiangong 水仙宮	"Gold" + houses and shops	Temple's property management
8	1744	Xuejia	Silver taels + "*dan*" of paddy	Temple's property management
9	1745	Prefectural City	Silver Taels	Shipping fee regulations
10	1747	Prefectural City's Datongjie 大銃街	Silver Taels + Fanyin (番銀) in Taels, and Yuanqian (員錢) in pieces (員)	Merchants' donation to build bridge
11	1750	Prefectural City	"Foreign Silver" could be converted into the "tael"	Miscellaneous duties and taxes
12	1751	Confucius Temple, Prefectural City	Silver taels	Officials' and gentry donations to build school
13	1751	Madou	"*Yuan*" (pieces)	Gentry donation to build temple
14	1752	Guantian	Cash	Official rate on paying wages to carriers of government duties
15	1765	Prefectural City's Cidian Wumiao 祀典武廟	"Gold" taels	Officials' and gentry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facilities
16	1766	Xinying	Silver "*Yuan*" (pieces)	Gentry donation to build bridge
17	1767	Prefectural City	Cash	Merchants' appreciation of official action against bachelors

18	1768	Anping	"*Fanyin* pieces", "pieces", cash, silver taels, 1 house	Soldier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19	1771	Zhoujiwei Wen 洲仔尾塭	"Silver" two thousand	Officials' donations of salary, gentry to undertake building dam
20	1772	Chaitougang 柴頭港	"*Fanyin*" in taels	Officials' and "*jiao*" merchant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21	1772	Prefectural City	Officials in taels, others in silver pieces	Gentry and merchants' donation to build government office
22	1774	Prefectural City's Kueilou 奎樓	Official and others, all in silver pieces	Officials' and gentry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23	1774	Prefectural City	Silver pieces	Believer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24	1778	Madou	Silver pieces	Gentry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25	1778	Prefectural City's Kaiyuanci 開元寺	Silver pieces	Officials' and gentry donations to temple property and its management
26	1779	Duogeguo 哆咯嘓	"*Dan* 石" and "*dou* 斗" of paddy	Aboriginal land rent
27	1780	Fotougang 佛頭港	Silver pieces	Street folk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28	1780	Confucius Temple, Prefectural City	Silver pieces	Gentry and *jiao* merchants' donations to build a government school
29	1784	Prefectural City's Sanshan Guowang Miao 三山國王廟	Silver pieces	Believer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30	1790	Prefectural City	Silver taels	Rebuilding the Prefectural City
31	1790	Ciguangsi 慈光寺 , Maogang 茅港 , Xiaying	Silver pieces	Official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32	1791	Confucius Temple, Prefectural City	Silver pieces	Officials' and gentry donations to build official temple
33	1793	Maogang	Government borrowing in silver taels	Gentry applying for order of prohibition
34	1794	Zhounanchang 洲南場 (Yanhang 鹽行)	Silver pieces	Salt field management
35	1795	Jiali 佳里	Silver pieces and "*dan* 石" and "*dou* 斗" of rice	Temple property management

36	1795	Yanshuizhen 鹽水鎮	Silver pieces	Officials' and gentry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37	1795	Jiyutan 鯽魚潭	Silver pieces	Gentry donation to build bridge
38	1795	Prefectural City's Greater Guanyin Pavilion 大觀音亭	1 shop for lease, rent in silver	Temple property management
39	1795	Prefectural City's Greater Guanyin Pavilion 大觀音亭	Silver pieces, copper cash	*Jiao* merchant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40	1796	Prefectural City's Shuixiangong 水仙宮	"*Fanyin*" silver pieces	Harbour management
41	1796	Prefectural City's Kaiyuanci	"Gold" in thousands	Officials' and gentry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42	1796	Prefectural City's Kaiyuanci	Silver pieces	Generals', soldiers' and *jiao* merchant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43	1797	Prefectural City's Xingjigong 興濟宮	Silver pieces	Generals', soldiers' and *jiao* merchants' donations to build temple

Note: English used here for translation has been abbreviated for the limited space.

Source: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Taiwan Nanbu Beiwen Jicheng* (Collection of scripts from the stone tablets in Southern Taiwan), 6 vols. (Taipei: Taiwan Yinhang, 1966).

Selected Bibliography

Historical Materials:

Borschberg, Peter (ed.), trans. by Roopanjali Roy
2014 *The Memoirs and Memorials of Jacques de Coutre: Security, Trade and Society in 16th- and 17th-centu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Chen Wenda 陳文達 (comp.)
1961(1720) *Taiwan Xianzhi* 《臺灣縣志》[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County], 2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臺灣銀行 .

Cheng Shaogang 程昭剛 (trans.)
2000 *Helanren zai Fuermosha* 《荷蘭人在福爾摩莎》[The Dutch in Formosa 1624-1662]. Taipei: Lianjing Chuban 聯經出版 .

Chiang, Shu-sheng (Jiang Shusheng 江樹生) (trans. and comp.)
2010 *Helan Lianhe Dong-Yindu Gongsi Taiwan Zhangguan zhi Badaweiya Zongdu Shuxinji*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 1622-1626》[Collect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Dutch VOC's Governor in Taiwan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in Batavia, Vol.I: 1622-1626].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Chiang, Shu-sheng (Jiang Shusheng 江樹生) (trans. and comp.)
2010 *Helan Lianhe Dong-Yindu Gongsi Taiwan Zhangguan zhi Badaweiya Zongdu Shuxinji*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I 1627-1629》[Collect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Dutch VOC's Governor in Taiwan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in Batavia, Vol. II: 1627-1629].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Chiang, Shu-sheng (Jiang Shusheng 江樹生) (trans. and comp.)
2015 *Helan Lianhe Dong-Yindu Gongsi Taiwan Zhangguan zhi Badaweiya Zongdu Shuxinji*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II-V 1629-1636》[Collect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Dutch VOC's Governor in Taiwan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in Batavia, Vol. III-V: 1629-1636], 3 volumes.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Fan Xian 范咸 (et. al., comp.)
1958 (1746) *Chongxiu Taiwanfu Zhi*《重修臺灣府志》[Re-compilation of 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5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Gao Gongqian 高拱乾 (comp.)
1960 (1695) *Taiwanfu Zhi* 《臺灣府志》[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3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Heyns, Pol 韓家寶 and Zheng Weichung 鄭維中 (trans.)
2005 *Holanshidai Taiwan Gaolinji, Huanyin yu Xili Denglubu*《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A compilation of public ordinances, marriage and Baptist records in Taiwan during the Dutch times]. Taipei: Cao Yonghe Wenjiao Jijinhui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

Huang Shujing 黃叔璥
1957 (1735) *Taihai Shichalu*《臺海使槎錄》[Records of my missions to Taiwan]. Taipei: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Jiang Shusheng 江樹生 (trans.)
2011 *Rilanzecheng Riji Disice*《熱蘭遮城日記 第四冊》[Diaries of Fort Zeelandia, Vol.4]. Tainan: Tainshi Zhengfu 台南市政府 .

Jiang Yuying 蔣毓英 (comp.)
2002 (1685) *Taiwanfu Zhi*《臺灣府志》[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Nantou: Guoshiguan Taiwan Wenxianguan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Li, Paul Jen Kuei 李壬癸
2010 *Studies of Sinkang Manuscripts* (《新港文書研究》).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Liang Size 梁思澤
1844 *Yinjing Fami*《銀經發秘》[The secret bible on silver]. Shunde 順德 : author's publication.

Lin Yuru 林玉茹 , comp.
2009 *Tainanxian Pingpuzu Guwenshuji*《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Collected volume on folk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ainan]. Xinying City, Tainan County 臺南縣新營市 : Tainanxianzhengfu Wenhuachu 台南縣政府文化處 .

Lin, Yu-ju 林玉茹 and Liu, Shiuh-feng 劉序楓 , comp.
2006 *Lugang Jiaoshang Xu Zhihu Jia yu Dalu de Maoyi Wenshu* 《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一八九五 - 一八九七）》[The trade letters of the Hsu family between Lugang and mainland China in 1895-1897]. Taipei 臺北 :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臺灣使研究所 .

Liu Jiamou 劉家謀 (et. al.)
1958 *Taiwan Siyong Heke* 《臺灣雜詠合刻》[A combined pub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poetry of Taiwan] Taipei: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Liu, Zeming 劉澤民
2001 *Taiwan Zongdufu Dang'an Pingpuzu Guanxi Wenxian Xuanji*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he archives i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Nantou 南投 :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Liu, Zeming 劉澤民
2002 *Pingpu Baishe Guwenshu* 《平埔百社古文書》[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undreds of village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Nantou 南投 : Guishiguan Taiwan Wenxianguan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Liu, Zeming 劉澤民
2004 *Taiwan Zongdufu Dang'an Pingpuzu Guanxi Wenxian Xuanji Xupian*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篇》[Second compilation of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Plain Aborigines in the archives i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Nantou 南投 : Guishiguan Taiwan Wenxianguan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 vols.

Mortgomery, P. H. S.
1893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1891".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9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age, F. M.
1863 *Tables for Estimating the Cost of Remittances to Shanghae & Hong-Kong, in Bar-Silver, Mexican Dollars, Drafts on India, and Carolus Dollars.* London: Edward Colyer.

Tainanshū Kyōenkai 臺南州共榮會 (comp.)
1934 (1907) *Nanbu Taiwanshi*《南部臺灣誌》[A gazetteer of Southern Taiwan]. Tainan 臺南 : Tainanshū Kyōenkai.

Taiwan Bunka Sanbyakunen Kinenkai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 (comp.)
1931 *Taiwan Shiryō Shūsei*《臺灣史料集成》[Collection of Taiwan historical materials]. Tainan: Tainan Shiyakusho 臺南市役所 .

Taiwan Sōtokuhu Zaimukyoku Kinyuka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
1930 *Taiwan no Kinyu*《臺灣の金融》[Finance of Taiwan]. Taihoku 臺北 : Sōtokuhu Zaimukyoku Kinyuka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 .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comp.)
1960 *Fujian Taiwanfu*《福建臺灣府志》[The gazetteer of Fujian's Taiwan Prefecture], 6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1964 *Fujiansheng Li* 《福建省例》[The prece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Fujian], 8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1966 *Taiwan Nanbu Beiwen Jicheng*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Collection of scripts from the stone tablets in Southern Taiwan], 6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1961 *Qinding Pingding Taiwan Jilue*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A royally-sanctioned record on the pacification of Taiwan], 6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1963 *Qingdai Taiwan Dazu Diaochashu*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Report on the surveys of Taiwan primary rent], 6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1963 *Taiwan Sifa Wuquanbian*《臺灣私法物權編》[Taiwan's customary law, property rights section], 9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1960 *Taiwan Sifa Zhaiquanbian*《臺灣私法債權編》[Taiwan's customary law, the obligation section], 2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comp.)
1960 *Taiwan Tongzhi* 《臺灣通志》[A general gazetteer of Taiwan], 3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Tseng, Cheng-ming 曾振名 and Tung,Yuan-chao 童元昭 (comp.)
1999 *Gemalan Xilaya Guwenshu* (A collec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from Kavalan and Siraya 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 Taipei: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ao Ying 姚瑩
1957[1829] *Dongchai Jilue* 《東槎紀略》[A short recollection of missions to the east]. Taipei: Taiwan Yinhang.

Yu Yonghe 郁永河
1959[1697] *Beihai Jiyou* 《裨海紀遊》[A travel note on a small sea]. Taipei: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Zhan Pingren 詹評仁 (comp.)
2016 *Nanying Guqi Jijin* 《南瀛古契集錦》[A mixed collection of old deeds of Tainan]. Tainan: Tainanshi Wenhuaju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Zhang, Yanxian 張炎憲 (comp.)
1988 *Taiwan Guwenshuji* (Old documents of Taiwan 台灣古文書集). Taipei 台北 : SMC Publishing Inc. 南天書局 .

Zhou Kai 周凱
1961 *Xiamen Zhi* 《廈門志》 [The gazetteer of Xiamen], 5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Zhou Yuanwen 周元文 (comp.)
1960 [1713] *Chongxiu Taiwanfu Zhi* 《重修臺灣府志》[Re-compilation of the gazetteer of the Taiwan Prefecture], 3 volumes. Taipei: Taiwan Yinhang.

Zhu Jingying 朱景英
1958 *Haidong Zhaji* 《海東札記》[Folded records on the locale east to the sea]. Taipei: Taiwan Yinhang.

Zhu Shijie 朱仕玠
1957 *Xiao Liuqiu Manzhi* 《小琉球漫誌》[Random records on Little Liuqiu]. Taipei: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Books

Borschberg, Peter
2010 *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Violenc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in the 17th century.* Singapore: NUS Press.

Cheng Daxue 程大學 (comp.)
1978 *Taiwan Kaifashi* 《臺灣開發史》[A history of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Taichung 台中 : Taiwansheng Zhengfu Xinwenchu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

Cuhaj, George S. (ed.)
2011 *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601-1700*, 5th edition. Iola, WI: Krause Publication.

Ding Fubao 丁福保 (comp.)
1986 (1940) *Lidai Guqian Tushuo* 《歷代古錢圖說》[Illustrative catalogue on old copper cash of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上海書店 .

Hamashita Takeshi 濱下武志
1990 *Kindai Chūgoku no Kokusai teki Keiki --- Chōkō Bōeki Shisutemu to Kindai Ajia* 《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Turning poi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dern China ---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Tokyo: Tokyo Daigaku Shukpankai 東京大學出版會 [Tokyo University Press].

Hamilton, Earl J.
1977 (1934)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Heyns, Pol 韓家寶 (trans by Zheng Weichung)
2002 *Holan Shidai Taiwan de Jingji Tudi yu Shuiwu* 《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 ・ 土地與稅務》[Economy, land rights and taxation in Dutch Formosa]. Taipei: Bozhongzhe 播種者 .

Huang Jianhui 黃鑒暉
1992 *Shanxi Piaohao Shi* 《山西票號史》[A history of the Shanxi banks]. Taiyuan 太原 : Shanxi Jingji Chubanshe 山西經濟出版社 .

Hyma, Albert
1953 *A History of he Dutch in the Far East.* Ann Arbor, Michigan: George Wahr Publishing Co.

Inō Yoshinori 伊能嘉矩 , translated by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5 *Taiwan Bunkashi*《臺灣文化志》[Cultural gazetteer of Taiwan], 3 volumes. Taichung 臺中 :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Jiang Shusheng
2016 *Dang'an Xushi: Zaoqi Taiwanshi Yanjiu Lonwenji*《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Collected essay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aiwan]. Tainan 臺南 :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Ka, Chih-Ming (Ke Zhiming 柯志明)
2001 *Fan Toujia: Qingdai Taiwan Zuqun Zhengzhi yu Shou-Fan Diquan*《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The aboriginal landlord: Ethnic politics and aborigine land rights in Qing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Kann, Eduard
1926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ransactions Affecting China.*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Kelly, E. M.
1976 *Spanish Dollars and Silver Tokens: An Account of the Issue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1797-1816.* London: Spink & Son Ltd.

Kitayama Hukujirō 北山富久二郎
1935 *Taiwan ni o keru Shōryō Kaheisei to Woga Heisei seisaku: Kinjikare o Ryōshō se shimuru Kinhonisei* 《臺灣に於ける秤量貨幣制と我が幣制政策——銀地金を流通せしむる金本位制》[On the weight-counting currencies and our monetary policy: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bullion in the gold standard]. Tokyo 東京 : Ganshōtō Shōten 巖松堂書店 .

Lian Heng 連橫
1947[1918] *Taiwan Tongshi*《臺灣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Shanghai 上海 : Shangwu Yinshuguan 商務印書館 .

Masui Tsuneo 曾井經夫

1986 *Chūgoku no Gin to Shōnin*《中國の銀と商人》[Silver and merchants of China]. Tokyo 東京 : Kenbun Shukpan 研文出版 .

McElderry, Andrea

1976 *Shanghai Old-style Banks (Ch'ien-Chuang), 1800-1935: a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ael, Thomas (ed.)

2016 *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701-1800*, 7th edition. Iola, WI: Krause Publications.

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Gaishatō a Keizai Chōsakyoku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亞經濟調查局

1924 *Eikō no Karo Gin*《營口の過爐銀[The furnace transfer silver of Newchwang]. In Keizai Shiryō (Materials on Economics 經濟資料), Vol. 10, No. 8. Tokyo: 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Gaishatō a Keizai Chōsakyoku.

Morgan, E. Victor

1965 *A History of Mone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 Penguin Books Ltd.

Murakami Naojirō 村上直次郎 , Iwao Seiichi 岩生成一 , Nakamura Takashi 中村孝志 , and Nagazumi Yōko 永積洋子 , trans. by Xu Xianyao 許賢瑤

2001 *Helan Shidai Taiwanshi Lunwenji*《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Anthology on Taiwan history of the Dutch period]. Yilan City 宜蘭市 : Foguang Renwen Shehui Xueyuan [Foguang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tudies]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

Nakamura Takashi 中村孝志 , trans. and comp. by Wu Micha 吳密察 and Wen Jiayin 翁佳音

1997 *Helan Shidai Taiwanshi Yanjiu Shangjuan: Gaishuo, Chanye*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Studies on Taiwan history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Vol. 1: Overview and industry]. Banqiao City, Taipei County 台北縣板橋市 : Daoxiang Chubanshe 稻鄉出版社 .

Ng Chin-keong

1983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ihon Keieishi Kenkyūjo 日本經營史研究所 (comp.)

1983 *Mitsui Ryogaedana*《三井兩替店》[The exchange shop of Mitsui]. Tokyo 東京 : Kabushiki Kaisha Mitsui Banko 株式會社三井銀行 .

Peng Xinwei 彭信威

1958 *Zhongguo Huobishi*《中國貨幣史》[History of money in China]. Shanghai 上海 :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Roover, Raymond de

1948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Medieval Bruges – Italian Merchant Bankers, Lombards and Money Changers –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Banking.* Cambridge, Mass.: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San Agustin, Gaspar de, trans. by Luis Antonio Mañeru
1998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565-1615.* Manila: San Agustin Museum.

Tseng, Che Lu (Zeng Zelu 曾澤祿)
2004 *Taiwan Huobi de Jingshen yu Wenhua* 《臺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Taiwan coinage]. Jiayi City, Jiayi County 嘉義縣嘉義市 : Che Lu Tseng.

Vilar, Pierre (trans. by Judith White)
1991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 to 1920.* London: Verso.

Williams, S. Wells
1863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taining Treaties, Tariffs, Regulations, Tables, Etc., Useful in the Trade to China and Eastern Asia*, Fifth Edition. Hongkong: A. Shortrede & Co.

Xie Meie 謝美娥
2008 *Qingdai Taiwan Mijia Yanjiu*《清代臺灣米價研究》[A study of grain price in Qing Taiwan]. Banqiao City, Taipei County 臺北縣板橋市 : Daoxiang Chubanshe 稻鄉出版社 .

Xu, Jiyu 徐繼畬 (comp.)
1986 *Yinghuan Zhilue* 《瀛環志略》[A brief gazetteer on all seas]. Taip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臺灣商務印書館 .

Ye Zhenhui 葉振輝
1995 *Taiwan Kaifashi* 《台灣開發史》[A history of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Taipei 台北 : Taiyuan Chubanshe 台原出版社 .

Yuan Yingsheng 袁穎生
2001 *Taiwan Guangfuqian Huobi Shishu* 《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Historical descriptions on Taiwan's currencies before the recovery]. Nantou 南投 :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Articles (Books)

Cao Yonghe 曹永和
1979 "Heju Shiqi Taiwan Kaifa Shilue"〈荷據時期臺灣開發史略〉[A brief history of opening of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Dutch occupation]. In Cao Yonghe, *Taiwan Zaoqi Lishi Yanjiu*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 on Taiwan's early history], pp. 45-70. Taipei: Lianjing Chuban 聯經出版 .

Kishimoto Mio 岸本美緒
2016 "Qingdai zhongqi Zhongguo de Huobi Shiyong Qinkuang —— Yi Dongnan Zhusheng wei Zhongxin" 〈清代中期中國的貨幣使用情況——以東南諸省為中心〉[The ways monies was used in China during the mid-Qing —— with reference of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s]. In Chen Ciyu 陳慈玉 (ed.) *Chengxian Qihou —— Wang Yejian Yuanshi Jinian Lunwenji*《承先啟後——王業鍵院士紀念論文集》[Succeeding and path-breaking —— Anthology to commemorate Fellow of Academia Sinica, Yeh-chien Wang], pp. 195-222. Taipei: Wanjuanlou Tushu 萬卷樓圖書 .

Mann, Susan
1972 "Finance in Ningpo: the Ch'ien Chuang, 1750-1880". In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pp. 47-7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n, Susan

1974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pp.73-96.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ipper, Kristofer M.

1977 "Neighbourhood Cult Associations in Traditional Tainan".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651-67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Yejian (王業鍵 Yeh-chien Wang)

2003 "Zhongguo Jindai Huobi yu Yinhang de Yanjin (1644-1937)" 〈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 (1644－1937)〉[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and banking systems (1644-1837)]. In Yeh-chien Wang, *Qingdai Jingjishi Lunwenji (Yi)* 《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一）》[Collect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Qing China], pp. 161-274. Banqiao City 板橋市 , Taipei County 臺北縣 : Daoxiang Chubanshe 稻鄉出版社 .

Zheng, Yongchang 鄭永常

2012 "Wan-Ming Yuegang Kaifang yu Hezhi Dayuan Huaren Shehui zhi Xingcheng" 〈晚明月港開放與荷治大員華人社會之形成〉[The opening of Port Yu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Tayouan under Dutch rule]. In Li Qingxin 李慶新 , ed., *Haiyangshi Yanjiu Disiji* 《海洋史研究第四輯》[Maritime History Research, Vol. 4], pp. 90-110. Beijing 北京 :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Articles (Journals)

Ch'en, Kuo-tung (Chen Guotong 陳國棟)

1994 "Qingdai Zhongye (yue 1780-1860) Taiwan yu Dalu zhijian de Fanchuan Maoyi: yi Chuanbo wei Zhongxin de Shuliang Guji" 〈清代中葉（約 1780-1860）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計〉[Junk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during the Mid-Ch'ing period (ca. 1780-1860): An estimation of the shipping capacity]. *Taiwanshi Yanjiu* 《臺灣史研究》[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1: 1, 55-96.

Chan, Kai Yiu (Chen Jiyao 陳計堯)

2000 "Shilun Riyuetan Diqu Yuanzhumin de Lishi Qianyi" 〈試論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歷史遷移 (1815-1934)〉[A history of aboriginal migration in the Sun-Moon Lake Region, 1815-1934]. *Taiwanshi Yanjiu* 7:1, 81-134.

Hsu, Wen-hsiung (Xu Wenxiong 許文雄)

2001 "Lin Shuangwen Qishi han Taiwan Shehui Bianqian"〈林爽文起事和台灣社會變遷〉[The Lin Shuangwen Uprising and Taiwa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故宮學術季刊》), 19: 1, 95-150.

Kuroda, Akinobu

2008 "Concurrent but Non-integrable Currency Circui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among Monies in Mod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5: 1, 17-36.

Li Mianshi 李冕世 and Huang Dianquan 黃典權

1976 "Qingdai Taiwan Diqu Huobi Zhidu zhi Yanjiu"〈清代臺灣貨幣制度之研究〉[A study of the currency system in Qing Taiwan]. *Guoli Chenggong Daxue Lishi Xuexi Lishi Xuebao*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 3: 1-54.

Li, Paul Jen Kuei 李壬癸 and Huang, Hsiu-min 黃秀敏
2015 “Xin Faxian Sijian Xingang Wenchu” 〈新發現四件新港文書〉[Four recently uncovered Sinkang Manuscripts]. *Taiwanshi Yanjiu,* 22: 4, 167-189.

Lu Taikang
2015 “Taiwan Nanbu Kaogu Chutu yu Chuanshi de Xifang Yinbi Yanjiu”〈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Research on Western silver coins unearthed in Southern Taiwan]. *Taiwanshi Yanjiu,* 22: 2, 151-196.

Massarella, Derek
1993 “Chinese, Tartars and ‘Thea’ or a Tale of Two Companies: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aiwan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3: 3, 393-426.

Ri, Kōbai 李紅梅
2006 “Shindai Hukkenshō no Kahei Shiyō Zittai —— Tochibaikenrui o chūshin toshite” 〈清代における福建省の貨幣使用實態—— 土地券類を中心として〉[The actual usage of money in Fujian Province of the Qing period —— with reference of land deeds]. *Matsuyama Daigaku Ronshū* (松山大学論集), 18: 3, 131-173.

Ri, Kōbai 李紅梅
2007 “Shindai Hukkenshō niokeru Keizaihatten to Kaheiryūtsū” 〈清代福建省における経済発展と貨幣流通〉[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ney circul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of the Qing period]. *Matsuyama Daigaku Ronshū* (松山大学論集), 19: 1, 153-200.

Shi, Weilian (William Speidel 史威廉) and Wang, Shiqing 王世慶
1981 “Taiwan Minjian he Tianye suozun Qingdai Shiliao jiqi Jiazhi 〈臺灣民間和田野所存清代史料及其價值〉[Q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aiwan’s folk society and fieldwork and their value]. *Taipei Wenxian* 《臺北文獻》[Taipei Archival Documents], Zhizi (直字), 55-56: 123-152.

Walters, William G.
2008 “Heavy and Light Money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and the Dutch Republic; Dilemmas of Monetary Management with Unit of Account System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5: 1, 37-53.

Wang, Shiqing 王世慶
2001 “Shijiu Shiji zhongye Taiwan Beibu Yinqian Bijia Biandong Chutan”〈 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銀錢比價變動初探〉[Silver money and copper coin valuations in northern Taiwan during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n Chen Qiukun 陳秋坤 and Hong Liwan 洪麗完 , eds., Qiyue Wenshu yu Shehui Shenghuo (1600-1900) 《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Contractual behavior and social life in Taiwan and southern coast China], pp. 141-172.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Wang, Yeh-chien
1978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Native Banks in Shanghai”.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6: 1, 111-142.

Zheng Yongchang 鄭永昌
2001 “Qingdai Qianqi Taiwan Huobi Liutong de Fazhan yu Bianqian”〈清代前期臺灣貨幣流通的發展與變遷 (1684-1800)〉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in early-Qing Taiwa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19: 1, 227-261.

Special Reports

Caituan Faren Chengda Yanjiu Fazhan Jijinhui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comp.)

2003 "Diyiji Guji Taiwancheng Chanji (Yuan Rilanzecheng) Chengji Chubu Yanjiu Jihua Chengguo Baogaoshu"〈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 (原熱蘭遮城) 城址初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uins of the first-rank archeological site, City of Taiwan (originally Fort Zeelandia)]. Tainan City 臺南市 : Unpublished report, Caituan Faren Chengda Yanjiu Fazhan Jijinhui.

Liu I-chang 劉益昌 , Liu Ying-san 劉瑩三 , Yen Ting-yu 顏廷伃 and Chung Kuo-feng 鍾國風

2008 *Madou Shuijuetou Yiji Kaogu Fajue Yanjiu Jihua Chengguo Baogaoshu* 《麻豆水堀頭遺址考古調查發掘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The project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archeological site at Shuijuetou, Madou]. Tainan County: Tainanxian Zhengfu Wenhuachu 台南縣政府文化處 .

Lu Taikang and Li Kuangdi

2009 *Faxian Tainan Shuijiaoshe Qian-Qing Mozanqun* 《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Discovering the graveyards of the former Qing Dynasty in Tainan's Shuijiao Village]. Tainan: Guoli Tainan Yishu Daxue Wenboxueyuan Yishushi Xuexi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藝術史學系 .

Lu Taikang 盧泰康 , Li Kuangdi 李匡悌 and Wang Zhuping 王竹平

2015 *Tainan Shenei Yizhi Chutu Jinshuqi Yanjiu*《臺南社內遺址出土金屬器研究》[A study of the metallic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he archeological site of the Shenei Village in Tainan]. Tainan: Guoli Taiwan Shiqianwenhua Bowuguan[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es

Wu Lingqing 吳玲青

2009 "Shindai Chūha Taiwan ni o keru Gomei to Gin —— 'Taiun' to 'Taishō' wo Chūshin toshite" 〈清代中葉台灣における米と銀——「台運」と「台餉」を中心として〉[On rice and silver in Taiwan during the mid-Qing —— with reference to the 'Taiwan shipment' and 'tribute grains of Taiwan']. Tokyo: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Tokyo'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llustrations

Chan, Kai Yiu, photographed

1760 "Pillar Dollar of 1760" (Kai Yiu Chan,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er unknown

1784 "Carolus Dolla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rlos III (1784) (Kai Yiu Chan,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er unknown

1797 "Carolus Dolla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rlos IV (1797) (Kai Yiu Chan, private collection).

從 17、18 世紀大員／安平、府城、臺灣縣戲劇文獻看華人戲劇在臺灣的傳播途徑與傳播中心

康尹貞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專門探討臺灣近代以前，也就是 19 世紀前華人戲劇活動者甚為少見，涉及此論題者幾乎都是討論臺灣清治時期戲劇之論著，如邱坤良之〈臺灣近代民間戲曲活動之研究〉[1]、〈清代臺灣的南管戲曲活動〉[2]、〈清代臺灣方志中的「戲劇」〉[3]；沈冬之〈清代臺灣戲曲史料發微〉[4]、〈書寫與表演——臺灣戲曲史料析論〉[5]；以及張啟豐之博士論文〈清代臺灣戲曲活動發展與研究〉[6] 等。這些論著均將清治時期，即 1683 至 1895 這 212 年視為一整體；邱坤良與張啟豐將史料按照年代先後排列論述，時間脈絡較為清楚，沈冬則以現象分類，引用史料時並不特重分期。華人戲劇傳入臺灣並非清朝統治才開始，但因荷治與鄭氏東寧王國時期戲劇史料難

1 邱坤良：〈臺灣近代民間戲曲活動之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11 卷第 2 期，頁 249-250、257-263。

2 邱坤良：〈清代臺灣的南管戲曲活動〉，《現代社會的民俗曲藝》（臺北：遠流，1983 年），頁 137-145。

3 邱坤良：〈清代臺灣方志中的「戲劇」〉，《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臺北：臺北藝術大學，2013 年），頁 50-72。

4 沈冬：〈清代臺灣戲曲史料發微〉，《海峽兩岸梨園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正文化中心，1998 年），頁 121-159。

5 沈冬：〈書寫與表演——臺灣戲曲史料析論〉，《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2002 年），頁 268-302。

6 張啟豐：〈清代臺灣戲曲活動發展與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頁 23-73。

尋，僅有荷人羅斌撰〈荷蘭文獻中的臺灣早期戲劇活動〉、邱坤良撰〈時空流轉，劇場重構：十七世紀臺灣的戲劇與戲劇中的臺灣〉[7]討論 1660 年代之荷文史料。不過整體而言，邱、沈、張三人在論「臺灣之戲曲／戲劇」時，並無明確的空間定義。如邱所論之 17 世紀之臺灣，其行政區域範圍實已歷經多次演變，從荷治時期所控制的島上殖民地區，到鄭氏東寧王國實際所能及之統治範圍，乃至清治初期臺灣府的範圍。沈、張所論則從清治初期之臺灣府，直至清治末期方建之臺灣省，212 年之跨度更長，行政區畫亦多次改革。而我們已知從大員、臺灣府，乃至臺灣省，統治者控制的範圍其實是不斷擴張的。因此所謂「臺灣的戲曲／戲劇活動」，以空間概念而論，在進入日治時期，總督府真正控制全島之前，其定義應該是變動的。

至目前為止之研究，關注焦點在縱向的時間演變，而筆者願在前人所奠定的重要基礎之上，再加以橫向的空間探討，希望幫助描繪出臺灣早期華人戲劇活動更清晰之圖像。至於同時存在於島上之原住民歌舞，因性質與華人戲劇截然不同，當另文論述，故不在本文討論之範圍[8]。除以此外，本文所謂戲劇的概念，採用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於《空的空間》提出的劇場定義：「我可以選任何一個空的空間，然後稱它為空曠的舞台。如果有一個人在某人注視下經過這個空的空間，就足以構成一個劇場行為」[9]，作者並將劇場分類為僵化劇場、神聖劇場、粗俗劇場、當下劇場等。由於此時期的華人戲劇活動往往和歲時節慶、宗教儀典、生命禮俗等不可分割，戲劇發生的場合可能會是端午龍舟競渡、普渡、王醮、迎神賽會等等，這些即彼得．布魯克所謂粗俗劇場（rough theatre）中的民間戲劇。[10]再如邱坤良所言：「東西方的戲劇起源於祭祀儀式，臺灣移民社會的戲劇史更是一部民眾祭祀生活的戲劇紀錄。從戲劇的演出環境、表演內容與觀眾參與，明顯看到祭祀與儀式的關連，各行各業的社會活動也處處有戲劇的痕跡。」[11]故凡此類文獻自然都將納入觀察、取材範圍。

7　邱坤良：〈時空流轉，劇場重構：十七世紀臺灣的戲劇與戲劇中的臺灣〉，《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臺北：臺北藝術大學，2013 年），頁 12-25。

8　因此下文所稱戲劇，概指華人之活動，不再一一標出。

9　彼得．布魯克著，耿一偉譯：《空的空間》（臺北：中正文化中心，2008 年），頁 1。

10　同前註，頁 78-79。

11　邱坤良：〈道士、科儀與戲劇—以雷晉壇《太上正壹敕水禁壇玄科》為中心〉，《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臺北：臺北藝術大學，2013 年），頁 208。

二、臺灣在何處？

當我們爬梳 19 世紀以前的臺灣華人戲劇文獻，對於文獻中所述之「臺灣」應更為仔細分辨所指之空間範圍為何。在目前可知且較明確可信之文獻當中，標出「臺灣」或「臺」者有以下：[12]

表 1：19 世紀前戲劇文獻標出「臺灣」、「臺」者

年代	文獻
1685-1687	蔣毓英主修：《臺灣府志》[13]
1696	高拱乾主修：《臺灣府志》[14]（5 條紀錄）
1697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竹枝詞》[15]
1710	周元文主修：《重修臺灣府志》[16]
1720	陳文達主修：《臺灣縣志》[17]（9 條紀錄）
1721	藍鼎元：《平臺紀略．康熙六十年五月》[18]
1722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19]（2 條紀錄）
1742	劉良璧主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20]
1745	范咸：〈臺江雜詠〉[21]、〈再疊臺江雜詠〉[22]
1747	范咸主修：《重修臺灣府志》[23]

12 在本文開頭所述前人相關論著中，曾舉江日昇《臺灣外記》作為荷治末期之華人戲劇文獻，沈光文〈平臺灣序〉作為鄭氏統治時期之文獻，但《臺灣外記》成書於 1704 年，且作者江日昇本人未曾履臺；沈光文〈平臺灣序〉則真偽問題尚有爭議；因此本表不列該二項尚有疑義之文獻。

13 引自《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14 同前註。

15 同前註。

16 同前註。本志戲劇記載抄襲前志，所抄者不列入計算。

17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18 同前註。

19 同前註。

20 同前註。本志戲劇記載抄襲前志，所抄者不列入計算。

21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全臺詩》第貳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04 年），頁 272。

22 《全臺詩》第貳冊，頁 276。

23 引自《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本志戲劇記載抄襲前志，所抄者不列入計算。

1752	王必昌主修：《重修臺灣縣志》[24]（5 條紀錄）
1778	《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重修臺郡府城隍廟圖說》[25]
1778	《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26]
1787	薛約：〈臺灣竹枝詞〉[27]
1788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御制詩（三）》[28]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九．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四日》[29] 2 則所述為同一事件，〈御制詩〉之詩序可看出是根據「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四日」簡省而來。

首先最易辨認者為標題便可知之〈重修臺郡府城隍廟圖說〉、〈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臺灣縣志》、《重修臺灣縣志》，臺郡即指臺灣府府城，府城和臺灣縣之所轄範圍如圖 1 與圖 2。[30]

圖 1 中粗灰線為 17、18 世紀海岸線，灰色塊部分為 1683-1722 年（即清治之康熙時期），輪廓線與灰色字體為 1723-1735 年（即雍正時期），可看出 1683-1735 年之間行政區劃相同。圖中央最深色塊為臺灣縣，縣之西方接壤者，最小之淺灰色塊為府城，府城西方以粗灰線畫出之長形島即為安平鎮，此時屬於鳳山縣所轄。

24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25 同前註。
26 同前註。
27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全臺詩》第肆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04 年），頁 93。
28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29 同前註。
30 本文地圖概引自中研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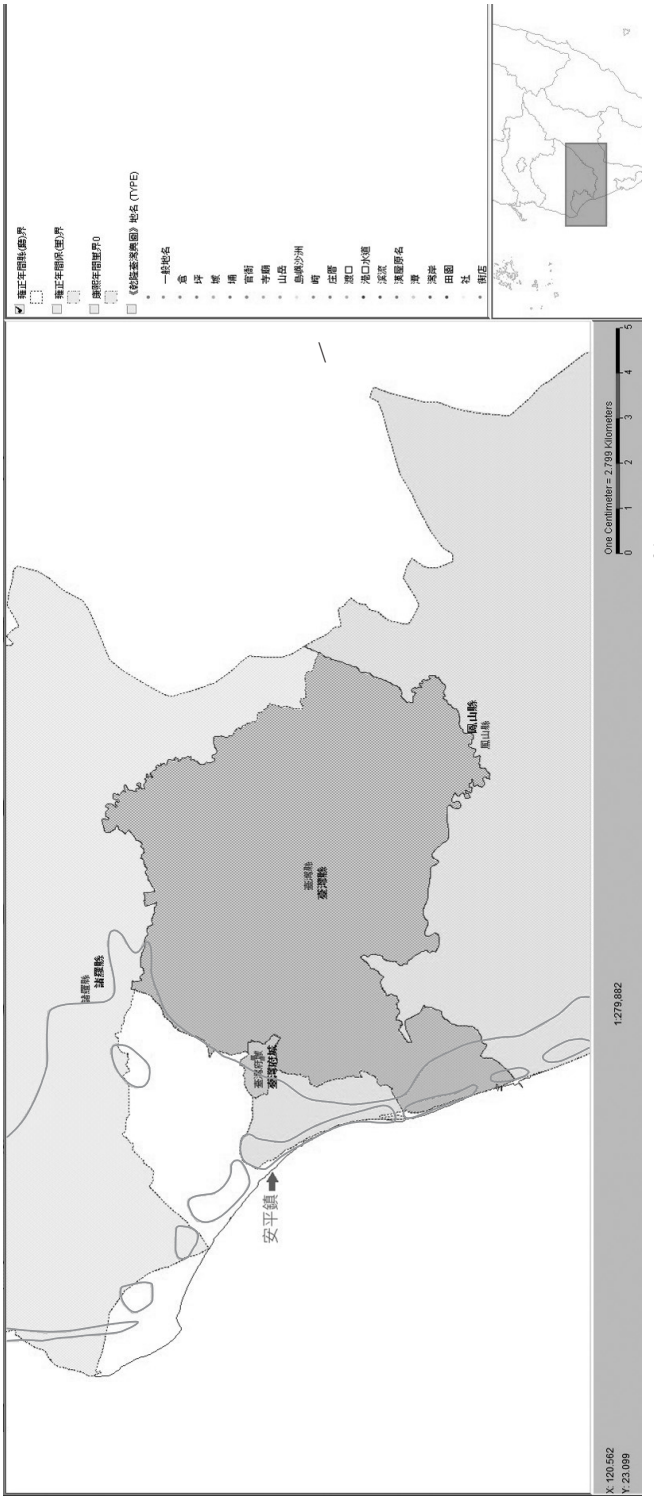


圖 1：1683-1735 年之臺灣縣範圍[31]

31　本圖為「清代康熙年間臺灣行政區域圖」套疊「雍正年間縣（廳）界」。

圖 2 則為 1683-1735 年與 1735-1795 年（即乾隆時期）行政區劃對照，灰色塊部分為 1683-1735 年間，輪廓線、較小字體為 1735-1795 年間，可看出這段時期臺灣縣範圍擴張許多，安平鎮也劃歸入臺灣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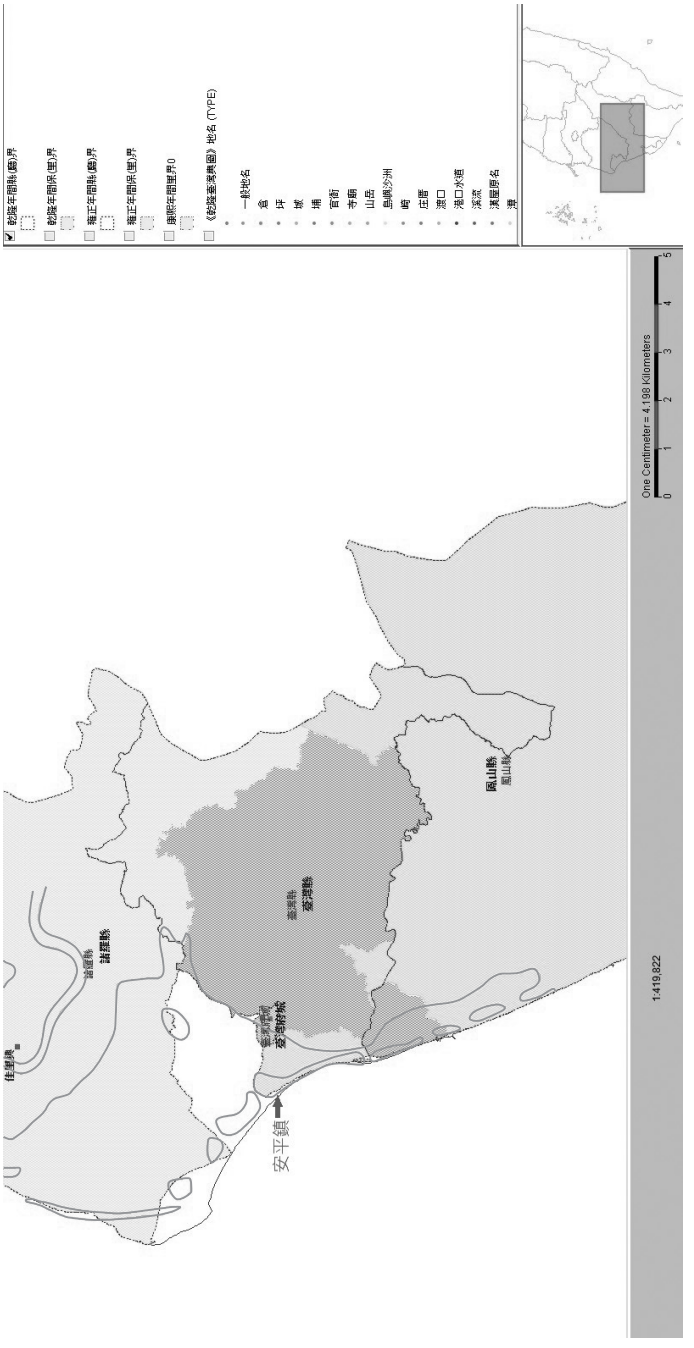


圖 2：1683-1795 年臺灣縣範圍擴張圖[32]

32　本圖為「清代康熙年間臺灣行政區域圖」套疊「乾隆年間縣（廳）界」。

接下來可辨認者則有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赤崁自然在府城之範圍內。范咸之〈臺江雜詠〉、〈再疊臺江雜詠〉，臺江原指大員／安平與赤崁之間的內海，范咸詩所描繪者應為安平至赤崁一帶，〈再疊臺江雜詠〉有「榕樹垂條刺史廳」一句，句後自註「郡署有榕橋」，更明確指出郡署，自然在府城之內。

再次則可從內容加以辨認。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竹枝詞》所述為府城大天后宮前演戲之場景。藍鼎元《平臺紀略》：「群賊攻破臺灣府，蓋朔日午刻也。杜君英先入住總兵官署。朱一貴繼入居臺廈道署。〔．．．〕遂做俳優，登高臺，鳴鐘伐鼓，呵唱拜跪，大封群賊。〔．．．〕是時偽職填街，摩肩觸額，優伶服飾，搜括靡遺。」所謂攻破臺灣府，所指即為府城，因此仿效俳優、搜刮戲服即發生於府城內的狀況。《欽訂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九：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四日》：「凡係通衢市集，負販流通，往來如織。府城內外，因賊匪蕩平，演劇酬愿者甚多。」所記亦為府城的情景。薛約所作〈臺灣竹枝詞〉，詩序言：「乾隆丙午（1786）、丁未（1787）間，臺灣林逆滋事。雖閱邸報傳聞異詞，覆檢《臺灣縣志》閱之，因得備稔其風土之異，遂作〈臺灣竹枝詞〉二十首。」[33]明確指出是依據《臺灣縣志》內容之創作。

較難一見即知者為蔣毓英《臺灣府志》、高拱乾《臺灣府志》、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這幾本志書中若提到「臺灣府」，不一定指廣義之全府轄下範圍，有時乃指狹義之府治。將這幾本府志加以比對，可發現後出之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中之戲劇紀錄抄自高拱乾《臺灣府志》、陳文達《臺灣縣志》、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因此可略去。所餘則為蔣毓英《臺灣府志》之 1 條紀錄及高拱乾《臺灣府志》之 5 條紀錄。蔣志關於戲劇之紀錄出於〈歲時〉一卷：「二月二日，或十六日，各街、社、里逐戶斂錢，宰牲演戲，賽當境土神，名曰『合福』。」對照其〈風俗〉卷中的描述：「蓁爾郡治之外，南北兩路，一望盡綠草黃沙，綿邈無際。」郡治以外人煙稀少，而演戲場合乃是在人口聚居的街、社、里，實以郡治，也就是府城之內或附近較為可能。高志完成之時間早《裨海紀遊》一年，郁永河之遊記為親眼所見，而高拱乾則未有證據顯示曾踏查臺灣府全

33 《全臺詩》第肆冊，頁 92。

域。依郁永河之紀錄，華人聚居於府城及臺灣縣：「臺灣縣即府治，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鎮、道、府、廳暨諸、鳳兩縣衙署、學宮、市廛及內地寄籍民居多隸焉。」[34] 出臺灣縣之後沿途所經或休息之處皆為番社，完全是未經開發、馴化之野生自然景觀。而高志之 5 條紀錄中，1 條出自〈風土志．漢人風俗〉，1 條出自〈典秩志．祠．土地祠〉，另 3 條出自〈風土志．歲時〉，分別為二月二日祭賽土神、立春、中秋，故 5 條所載均為華人活動。且〈典秩志．祠．土地祠〉言：「土地之祭，每歲以仲春二日、中秋望日。土俗：喧鼓裝扮雜劇侑觴，亦祈報之意。本府屬及各官署皆立祠，朔望行香。」〈歲時〉其中 2 條分別言：「立春前一日，有司迎春東郊，備儀仗、綵棚、優伶前導。看春士女，蜂出雲集，填塞市中」、「二月二日，各街社里逐戶斂錢宰牲演戲，賽當境土神；名曰『春祈福』。」可看出場景位於府治或街市，和郁永河離開臺灣縣後所經之地截然不同。將郁紀和高志所述相對照，當可判斷高志所述之戲劇活動仍應以府城、臺灣縣為範圍。

綜上所述，可知這些標示「臺灣」或「臺」之戲劇文獻，戲劇活動大部分是發生於臺灣府城，其次為安平和臺灣縣，而非指當時臺灣府全境。另外需注意的是，1683-1795 年間，澎湖也隸屬臺灣縣管轄。本時期澎湖戲劇文獻則有：1725〈澎湖八罩澳花宅鄉公約〉[35]、1750〈大礁頭採石協議碑記〉[36]、1771 年胡建偉主修《澎湖紀略》[37] 等數條。

三、華人戲劇與華人文化中心——大員／安平、臺灣府城、臺灣縣

除了上述文獻，其他從標題或內容可判定同在大員／安平、臺灣府城與臺灣縣的文獻尚有如下：

34 《裨海紀遊．卷上》，《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35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修訂版）上卷（臺北：臺灣書房，2011 年），頁 403-404。
36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澎湖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3 年），頁 219。
37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表 2：19 世紀前戲劇文獻可判定出自大員／安平、臺灣府城、臺灣縣者

年代	文獻
1651	《熱蘭遮城日誌．III-D．1651-11-11》[38]
1664	Olfert Dapper（達波）《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
1721	藍鼎元：《東征集．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門收復安平露布》[39]
1753	《清高宗實錄選輯一．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己巳．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奏》[40] 《臺案彙錄己集．六十五．刑部「為內閣抄出福督喀奏」移會》[41] 2 則所述為同一事件，而《臺案彙錄》較《清高宗實錄選輯》詳盡。
1760 後	孫霖：〈赤崁竹枝詞〉[42]
1773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三．記氣習》[43]（2 條紀錄）
1780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中）．佛頭港福德祠碑記》[44]
1736 至 1795 間	吳國翰：〈東寧竹枝詞〉[45]

首先將表 1 與表 2 合而觀之，可知 18 世紀前臺灣的華人戲劇文獻實在非常稀少，不管華文或荷文之記載皆然。目前所知的兩條荷文紀錄彌足珍貴，其一為《熱蘭遮城日誌》1651 年 11 月 11 日之紀錄：

> 11 月 11 日，星期六。今天中午，特使閣下和長官閣下，以及幾個此地的高階官員偕同他們的妻子們，由四個重要的中國人的頭家來迎接，離開城堡，去〔大員〕市鎮參加上述宴會。在那市鎮一條街道的角彎，站著幾個樂師，他們打鼓吹笛，引導上述閣下們和朋友們去到 Jock Hay〔Hay 應係 Tay 的誤寫〕的大房子（要在那裡舉行上述宴會）。於被邀請的其他朋友們都到

38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灣日記知識庫。
39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40 同前註。
41 同前註。
42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全臺詩》第參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04 年），頁 140。
43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44 同前註。
45 出自吳氏所著《潭餘吟草》，本條紀錄至今僅見於《南戲遺響》之引述。見施子清等編：《南戲遺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 年），頁 235。

> 齊以後，就由上述頭家們很禮貌安排招待，饗以可口美味的食物和飲料（依照荷蘭人的烹調方式準備的）。在那中間，也表演了數種罕見的戲劇，就像皮影戲（wayangen），用以娛樂來賓，一直表演到夜裡很晚。[46]

根據 11 月 8 日的記載，這場宴會乃是由何斌等幾位華人頭家邀請，為歡送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巴達維亞派至臺灣視察的特使 Willem Verstegen。[47]「長官閣下」指臺灣最高行政長官富爾堡（Nicolaes Verburch），其他高階官員，應包括時任副長官、上席商務員的揆一（Frederick Coyett）。宴會場所即在大員市鎮 Tay 這位頭家的大宅裡。從記載內容可看出，為了招待荷人高階官員，華人頭家特別準備荷式餐飲，但宴飲的同時看戲，則又是華人的習慣，請戲的華人和看戲的荷人似乎並不在意語言的隔閡，顯示出一種有趣的文化融合。此外，宴會從中午開始，其間表演之戲劇有數種，且演至夜深，推測所請班數應不少，型態也較可能為大戲，劇幅較長，才得以應付由中午演至深夜如此長的時間。其中提及 wayangen，即印尼皮影戲，可能是在臺灣之荷人將所見之偶戲直接與印尼皮影戲相比附。這是否即臺灣皮影戲最早的淵源？因尚缺其他史料佐證，難以遽斷。

在前人的研究中，屢次提及江日昇《臺灣外記》描述何斌於元宵節宴請彼時已升任最高行政長官的揆一，招待看戲的情節，即這段文字：「何斌〔．．．〕於元夕大張花燈、煙火、竹馬戲、綵笙歌妓，窮極奇巧，請王與酋長卜夜歡飲。」[48]本文並不將《臺灣外記》視為荷治戲劇之直接史料，畢竟書成於 1704 年，已距荷治四十多年，但若將這段情節與 1651 年之史料互相對照，卻有驚人的巧合。何斌招待揆一卜夜宴飲觀劇，和 1651 年招待富爾堡、揆一等人看戲至深夜之事如出一轍。或有可能在荷治時期，頭家宴請殖民官員，招待觀賞華人戲劇並非特例。江日昇自述撰書資料來源包括「就當日所獵聞、事之親身目睹者，廣為搜而輯成」[49]，亦即訪問耆老，這一段情節或有可能來自耆老所述而非江氏憑空虛構，而這樣的傳

46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D．1651-11-11》，臺灣日記知識庫。
47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III-D．1651-11-08》，臺灣日記知識庫。
48　江日昇：《臺灣外記．卷五》，《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相關討論詳見林鶴宜：《從田野出發——歷史視角下的臺灣戲曲》（新北：稻香，2007 年），頁 17-21。張啟豐：〈清代臺灣戲曲活動發展與研究〉，頁 25-27。邱坤良：〈時空流轉，劇場重構：十七世紀臺灣的戲劇與戲劇中的臺灣〉，頁 26-29。在此不贅。
49　江日昇：《臺灣外記．凡例》，《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說軼聞或可能本於荷治時期的一般現象？令人遺憾的是，《熱蘭遮城日誌》雖然卷帙浩繁，但紀錄主要為商貿、司法、行政方面，包括進出海關貨物、人員，船隻航行狀況，法律事務、案件，原住民事務，華人頭家、農工事務等；原住民事務的紀錄遠多於華人，對於華人習俗更罕見觸及。在這種情況下，提及戲劇活動者當然更加難覓，也因此缺少進一步的線索。

其二為《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該書為荷蘭地理學家 Dapper 彙編 1663 年至 1668 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於福爾摩沙、金門、廈門、福建其他城鎮間航行之航海日誌、使節團每日記聞、荷蘭官員與各方往來書信，於 1670 年出版。[50] 其中有 1664 年荷蘭翻譯官 Johnnes Melman 對於大員戲劇活動之紀錄：「在城市裡，而且在整個大員地區，只看到四、五千人，因為是他們的新年，他們大部分人在街道上看戲和參加其他娛樂活動。」[51] 彼時福爾摩沙已在鄭氏統治之下，因此該記錄較之仍有真偽問題的沈光文〈平臺灣序〉，是更可靠的鄭氏時期戲劇史料。

1651 年 11 月 11 日換算成農曆為 9 月 29 日，並非特別之歲時節令或宗教節日；1664 年的記載則發生於春節期間，地點則在街道上，戲劇演出的時間與空間正可與 1651 年互補；顯示至遲到了 17 世紀中期，大員的華人戲劇演出場合既有封閉式的：在私人宅邸供特定人士欣賞，亦有開放式的：在公共空間讓大眾參與，演出時間則不限於平日或特殊節日。

至於表 2 所列華文文獻，從標題即可辨認發生地者為孫霖的〈赤崁竹枝詞〉和吳國翰的〈東寧竹枝詞〉[52]，已明確指出地點在府城；〈佛頭港福德祠碑記〉之佛頭港則為府城五條港之一，位於西定坊。藍鼎元《東征集》所述乃朱一貴攻破府城後「登場作戲」。《臺案彙錄己集．刑部「為內閣抄出福督喀奏」移會》：「竊

50 此書於隔年 1671 即翻譯成英文版發行，1747 至 1749 年又有德文版。見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北：如果、大雁，2006 年），頁 184-187、224-225。

51 中文翻譯引自邱坤良：〈時空流轉，劇場重構：十七世紀臺灣的戲劇與戲劇中的臺灣〉，頁 18。邱文中對於此書的譯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於中國沿海及其帝國的重要活動》。Johnnes Melman 於 1664 年來到大員乃是為了瞭解先前鄭荷之戰中被俘荷人的狀況；詳見邱文及鄭維中，前揭書，頁 218-222。在此不贅。

52 「東寧」有廣狹二義，廣義指鄭氏東寧王國；狹義乃鄭成功將赤崁定為東都，鄭經再將東都改為東寧。吳國翰所謂「東寧」，以其寫詩的時空而言，自然非指東寧王國，而應指赤崁。

照臺灣鎮標兵丁胡勝喜直入總兵陳林每內署行刺被獲〔・・・〕本年四月〔・・・〕馬忠探知是月二十五日陳林每在花廳演戲酬神，是日進出人雜，可以同往行事。」這是一樁發生於臺灣鎮總兵官署內的事件，臺灣鎮亦在府城內。朱景英《海東札記・記氣習》：「神祠，里巷靡日不演戲，鼓樂喧闐，相續於道。演唱多土班小部，發聲詰屈不可解，譜以絲竹。別有宮商，名曰『下南腔』。又有潮班，音調排場，亦自殊異。郡中樂部，殆不下數十云。」明確指出郡中，可知為府城的情景。

另外，有些文獻雖未指明地點，但作者的生活、活動範圍即在府城或臺灣縣，因此這些文獻所反映的應即該地的現象，在府城者有：臺灣府治東安坊人劉其灼，1715 年歲貢，[53] 曾作〈元宵竹枝詞〉[54]，其中一首提及車鼓戲，演出應即在府城之內。1741 至 1743 年間擔任巡臺御史之張湄 [55] 曾作〈病起邀書楸邨給諫蔣師垣上舍同過海粟軒觀劇即次見懷原韻〉[56]；於 1744 年奉命巡臺之六十七，在任三年，[57] 其《使署閒情》中有〈即事偶成〉二律，[58] 其中一首述及戲劇演出；於 1751 擔任巡臺御史之錢琦 [59] 曾作〈臺灣竹枝詞〉[60]，其中一首述及戲劇演出。依據 1742 年劉良璧主修之《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二・公署・滿漢兩察院》所述：「滿、漢兩察院：在府治東安坊，原鳳山縣公館舊址。南向，大堂、川堂各一座，左、右建滿、漢察院住宅各二進，旁列廂房各十餘間。」[61]1747 年范咸主修之《重修臺灣府志》敘述文字全同。[62] 可知巡臺御史官署連同官邸在府城之東安坊。張湄既言病起觀劇，地點海粟軒應不至於離官邸太遠，當在府城內；六十七《使署閒情》之標題既點出官署，詩作若沒有特別標出地點，應較可能作於府城，詩中所述也應以府城之場景為主。錢琦詩所述也較有可能是官邸所在之府城內之景象。於 1769 年擔任臺灣海

53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年），頁 673。
54 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集》（臺北：商務，1983 年），頁 258。
55 《全臺詩》第貳冊，頁 145、157
56 《全臺詩》第貳冊，頁 157。
57 《全臺詩》第貳冊，頁 237。
58 《全臺詩》第貳冊，頁 241。
59 《全臺詩》第貳冊，頁 319。
60 雷夢水等編：《中華竹枝詞（六）臺港澳其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3915。
61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62 引自《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本志戲劇記載抄襲前志，所抄者不列入計算。

防同知之朱景英，1772 年撰成《海東札記》。[63] 其述及戲劇演出之詩作最多，包括〈九日同人集東堂觀劇是日演周忠介公遺事〉、〈冬夜南園同人觀演拙製桃花緣傳奇四首〉、〈正月十八日邀那西林蘭泰余退如任伯卿李蘧　本楠王亮齋王曲臺執禮集澹懷軒即事六首〉、〈東瀛署齋八詠〉，依據 1764 年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公署》之記載：「海防廳：一在西定坊，西向；乾隆二十七年（1762），同知何愷建『內省軒』。一在鹿耳門。」[64] 從詩作標題可知，朱景英頗好與同人一起看戲，應同為在臺任官者，故其官邸應即在府城西定坊，如此較可能常與官邸同位於府城的其他官員一起活動。而其所指南園、東堂、澹懷軒應該都是署齋，即官邸的一部份。因此這些詩作所述場景應該都發生於府城之內。

在臺灣縣者則如：1721 年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朱受審之供詞有：

> 康熙五十三年，我到臺灣道衙門，當夜不收。後我告退，在大目□□□□□民人鄭九賽田地度日。去年知□□□□□□山縣事務，他不曾去，令伊次子□□□□□□問要糧，每石要折銀七錢二分。百□□□□□眾人俱各含怨。續因地震、海水泛漲，眾百姓合夥謝神唱戲。[65]

原文雖有空缺，但應可推知「大目」為「大目降」之闕漏。由朱一貴供詞可知原先其生活與工作地點在大目降，屬臺灣縣，故所述地震引發海嘯，乃至百姓謝神唱戲，當指臺灣縣範圍內之景象。臺灣縣人鄭大樞，1721 年例貢，[66] 曾作〈風物吟〉[67]，中有三首提及演劇現象，應即為臺灣縣之情景。居臺灣縣治之王之敬，原籍福建興化，[68] 曾作〈新正竹枝詞〉[69] 述及戲劇活動，當指臺灣縣之情景。

在本時期的戲劇相關文獻中，演出種類極少被指出，大部分文獻僅言「戲」或「劇」。在僅有的極少數記錄下種類的文獻中，幾乎都是來自府城與臺灣縣的紀錄，名稱有「下南腔」、「七子班」、「車鼓」、「花鼓」、「粵伶」、「潮班」等諸種，文獻如：郁永河〈臺灣竹枝詞〉詩中言：「侏離唱出下南腔」；六十七〈即事偶成〉

63　《全臺詩》第參冊，頁 15。
64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65　《臺案彙錄己集．卷一．朱一貴供詞》，《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空格為原文缺字。
66　《全臺詩》第貳冊，頁 72。
67　《全臺詩》第貳冊，頁 72-74。
68　《全臺詩》第參冊，頁 84。
69　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集》，頁 257。

詩中言：「劇演南腔聲調澀」；錢琦〈臺灣竹枝詞〉詩中言：「喃喃低唱下南腔」；朱景英《海東札記》述：「演唱多土班小部，發聲詰屈不可解，譜以絲竹。別有宮商，名曰『下南腔』。」六十七所謂「南腔」應即「下南腔」之省。郁永河對於下南腔的解釋相當清楚：「閩以漳泉二郡為下南，下南腔亦閩中聲律之一種也。」由此可知 18 世紀在臺灣慣以「下南腔」指稱閩南戲劇。吳國翰〈東寧竹枝詞〉描述：「伶女青娥聳翠環，場連午夜昌緒蠻；人睜眼采摩肩望，第一時行七子班。」劉其灼〈元宵竹枝詞〉詩中言：「車鼓喧闐十里聞」。鄭大樞〈風物吟〉詩中言：「花鼓俳優鬧上元」，並自註：「優童皆留頂髮，粧扮生旦，演唱夜戲。臺上爭丟目采，郡人多以銀錢、玩物拋之為快，名曰『花鼓戲』。」花鼓之名與車鼓相近，而鄭大樞所述特徵又頗類郁永河所記，因此頗難遽斷為何，不過車鼓和七子班亦有相當深之淵源，[70] 或許在 18 世紀時尚未絕對二分。范咸〈再疊臺江雜詠〉詩中言：「優孟登場半粵伶」。朱景英《海東札記》述：「又有潮班，音調排場，亦自殊異」。范咸所謂「粵伶」有無可能即朱景英所指之潮班？惜作者並無任何解釋。唯一非本地之記載為〈艋舺竹枝詞〉，詩中言：「車鼓逢逢南復北」。[71] 不過此作仍出於府城東安坊人陳逸之手。[72] 康尹貞曾於〈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37）〉分析，日治時期以前的戲劇紀錄幾乎都非有意識的戲劇介紹，並定義所謂介紹，應該是作者有意向讀者解釋，不僅只是提及戲劇活動，也需包括其形式與特色，而符合者在 19 世紀前僅有郁永河〈臺灣竹枝詞〉、鄭大樞〈風物吟〉、朱景英《海東札記》。[73] 而此三者全都來自府城。[74]

相較之下，西部其他地區幾乎都在 18 世紀才出現戲劇文獻，且數量總和尚不如本地。[75] 戲劇文獻集中於此地，原因也是具讀寫能力者集中於此，包括了統治階

70 黃文正：〈臺灣車鼓戲源流之探考〉（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82-186。

71 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集》，頁 168。

72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 488。陳逸活躍於 1693 至 1725 年間，何時曾北赴艋舺並不清楚。

73 康尹貞：〈日治時期臺灣戲曲之研究〉，《戲劇學刊》第 21 期，頁 53。

74 其他地區關於劇種的記載，進入 19 世紀後才明顯增加，而同時府城、安平、臺灣縣的劇種紀錄文獻也持續出現，依然遠多於其他各地區。直至清治時期結束，府城、安平與臺灣縣的文獻幾乎已涵蓋了所有在臺灣出現的戲劇種類，相形之下，其他地區的文獻就無法如此完整，與府城、安平、臺灣縣仍無法相提並論。

75 其他地區文獻詳情將於下文論述。

級文武官員，以及商人階級，尤其是從事進出口貿易者。當然，這並非指所留文獻不多的其他地區或群體戲劇活動較少，現存文獻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涵蓋當時所有戲劇活動，有活動而無任何文字紀錄，或者紀錄佚失者可能更多，例如農業或勞動人口之間也很可能流行規模較小、形式較簡單之小戲如車鼓，或偶戲等。但尚存之文獻，縱然不能視之為完整全貌，也應能反映一定的狀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現存文獻觀之，若說 19 世紀以前，大員／安平、府城與臺灣縣之華人戲劇活動具有領頭的重要地位當不為過。

這樣的現象最容易理解的原因當是此地為福爾摩沙島上最早的華人移民定居地，在島上有最長的華人移民歷史。而臺灣縣轄下之澎湖，移民歷史更遠早於福爾摩沙。進一步言之，大員／安平、府城與臺灣縣蓬勃的戲劇活動應和其獨特的區域發展史有關。1624 年荷蘭人佔據大員，隨即展開貿易與殖民。荷蘭人在大員建熱蘭遮城，作為行政機關與防禦要塞；接著於 1630 年代，荷蘭人開發赤崁地區以種植稻米、甘蔗等經濟作物，至 1640 年代，荷蘭人已將大員及赤崁地區建設成為福爾摩沙島上商貿、政治、軍事，以及農業生產的中心。[76] 荷蘭的建設基礎與方向後來被鄭氏東寧王國所繼承，甚至還延續至清治時期。[77]

荷治時期，荷人招徠的華人農夫主要在赤崁工作與居住，大員市鎮亦湧入大量的華人移民。[78] 其後鄭氏亦將統治中樞設於大員與赤崁地區。[79] 可說從彼時開始，大員與赤崁已轉變為「中國城」。進入清治時期，1685 至 1687 年，第一任臺灣知府蔣毓英修撰《臺灣府志》[80]，卷五〈風俗〉指出：

---

76 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 年），頁 96-98、222-240。蘭伯特．凡．德．歐斯弗特著，林金源譯：《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臺北：經典雜誌，2002 年），頁 29-30、41-42。

77 蘭伯特．凡．德．歐斯弗特著，林金源譯：《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頁 65-67。

78 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論述篇》（臺北：漢聲，1997 年），頁 72-73。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篇、解讀篇》（臺北：漢聲，1997 年），頁 159-166。

79 C. Imbauel-Huart 著，黎烈文譯：《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灣研究叢刊》第五十六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年），頁 34。

80 此稿並未在蔣氏知府任內刊行，第一部刊行者為高拱乾所修《臺灣府志》，高氏亦曾參考蔣氏草稿。蔣志後來才由其子孫刊行面世。見邱坤良：〈清代臺灣方志中的「戲劇」〉，頁 53-54。

> 臺灣自紅彝僭竊以來，因仍草昧，鄭氏父子相繼，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地廣人稀，蕭條滿眼，蕞爾郡治之外，南北兩路，一望盡綠草黃沙，綿邈無際。故郭外之鄉不曰『鄉』，而總名之曰：『草地』。[81]

此處所言之「臺灣」應非指整個臺灣島，而當指大員一地，因為文中稱其地「民非土著」，而郡治自指府城。這個敘述實點出大員、府城已非原住民活動區，而轉為華人社區。10 至 12 年後，郁永河於 1697 年來臺，以其所見，華人社區延伸至臺灣縣的範圍，可見勢力的擴張。不過出了縣外，便屬於原住民的地盤，景觀仍保持自然與原始。若將當時大員／安平、府城、臺灣縣這一片區域與整座島嶼的景觀互相對照，可以想像在整座島上是相當特殊的地區，或可說是獨立於整座島嶼的野生自然景觀之外。

再過 20 年，1717 年《諸羅縣志》編成，不久，1719 年，《鳳山縣志》亦完成。這兩部方志的編成反映了此二地華人居住人口已增加到一定程度，官方才會認為有必要修纂、刊行正式的方志以介紹。與此同時，1720 年刊行的《臺灣縣志》序文證明了此點：

> 臺灣遠在荒陬，古聲教所不及。先襄壯公蕩平海宇，以是地為東南之保障，力疏請留，始置三縣：南鳳山、北諸羅，而臺灣居其中。臺之地廣不及鳳、諸，三十餘年來生聚教訓，迄於今，學校祀典，秩然以舉；人物藝文，蔚然以興；及乎賦役、軍防、民風、土產，與鳳、諸兩邑均為海外之中華。[82]

如該志之描述，臺灣縣與諸羅縣、鳳山縣均為「海外中華」，意指在當時府城與臺灣縣已非唯一的「中國城」。再詳究細節，《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漢俗》描述：

> 夫衣飾侈僭，婚姻論財，豪飲呼盧，好巫、信鬼、觀劇，全臺之敝俗也；《郡志》略言之矣。諸羅自急水溪以下，距郡治不遠，俗頗與臺灣同。自下加冬至斗六門，客莊、漳泉人相半，稍失之野；然近縣故畏法。斗六以北客莊愈多，雜諸番而各自為俗。[83]

81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82 《臺灣縣志．序、凡例、修志姓氏．施序》，《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83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這段描述可對照圖 3，急水溪地名以底線標出，諸羅縣治、府城、安平以箭頭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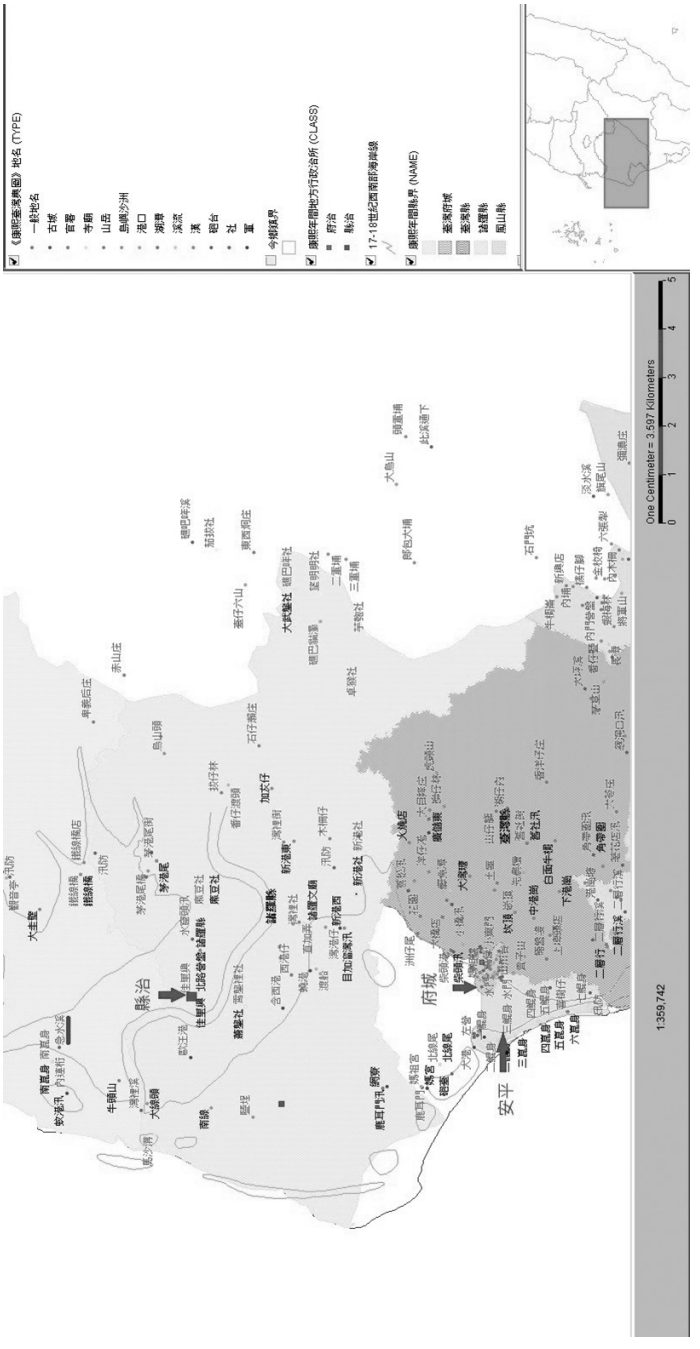


圖 3：諸羅縣急水溪以南至臺灣縣[84]

84 本圖為「清代康熙年間臺灣行政區域圖」套疊「《康熙臺灣輿圖》地名」、「《乾隆臺灣輿圖》地名」。「急水溪」名在《康熙臺灣輿圖》中未見，而見於《乾隆臺灣輿圖》。

從「俗頗與臺灣同」之敘述可知華人之勢力與文化，已從臺灣縣往北延伸至諸羅縣北之急水溪。再往北至下加冬、斗六門之範圍則如圖 4，地名同樣以底線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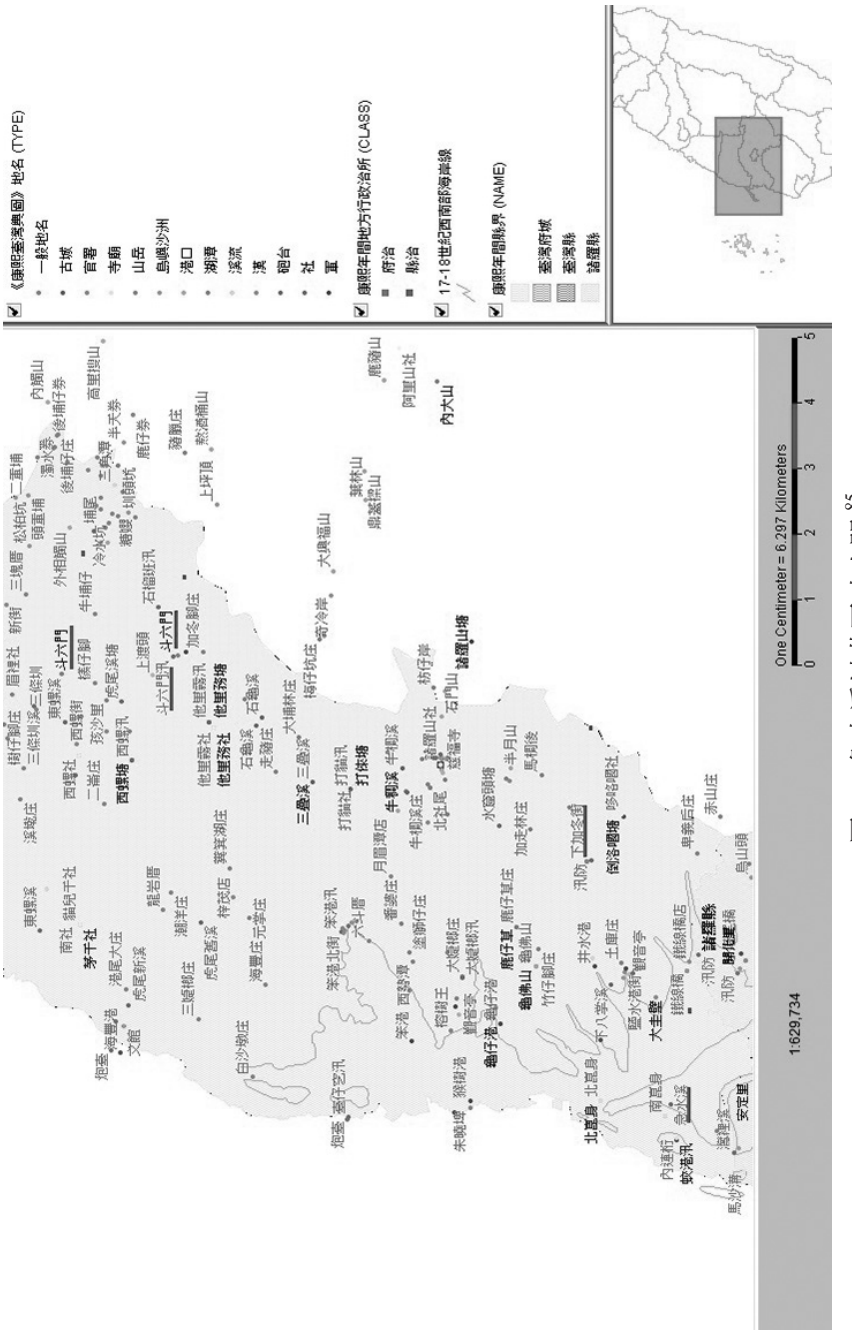


圖 4：急水溪以北至斗六門[85]

85 同前註。

從作者的敘述觀點可推知，所謂臺灣縣之習俗乃是指閩南漳泉族群之文化。急水溪至斗六門的範圍因為加入了客家人，文化已和臺灣縣不同，再從斗六門往北，因再加上原住民，族群文化更為多元。而《鳳山縣志．卷之七．風土志．漢俗》也有類似的描述：

> 夫服飾僭侈、婚姻論財、好飲酒、喜賭博、子不擇師、婦入僧寺、好觀劇、親異姓，全臺之敝俗也。鳳山自縣治北抵安平鎮等處，俗略與郡治同。由縣治南至金荊潭一帶，稍近喬野。自淡水溪以南，則番、漢雜居，而客人尤夥。[86]

這段敘述可對照圖 5，縣治與安平以箭頭指出。

86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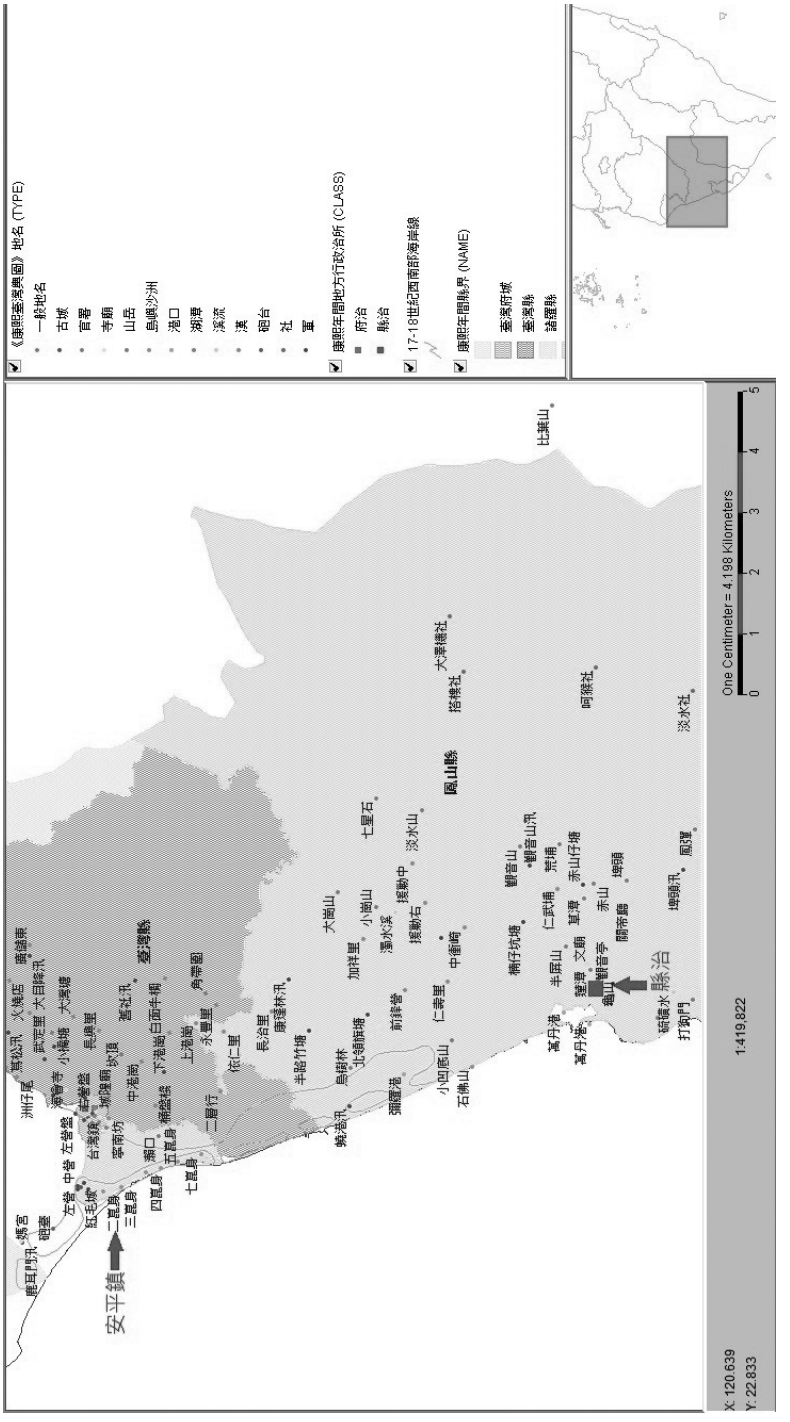


圖 5：鳳山縣治至安平鎮 87

87　本圖為「清代康熙年間臺灣行政區域圖」套疊「《康熙臺灣輿圖》地名」。

由圖文對照亦可知，華人的文化與勢力，亦同時從府城、安平往南擴張至鳳山縣治。再往南則如圖 6，縣治以箭頭指出，金京（荊）潭、淡水、下淡水地名以底線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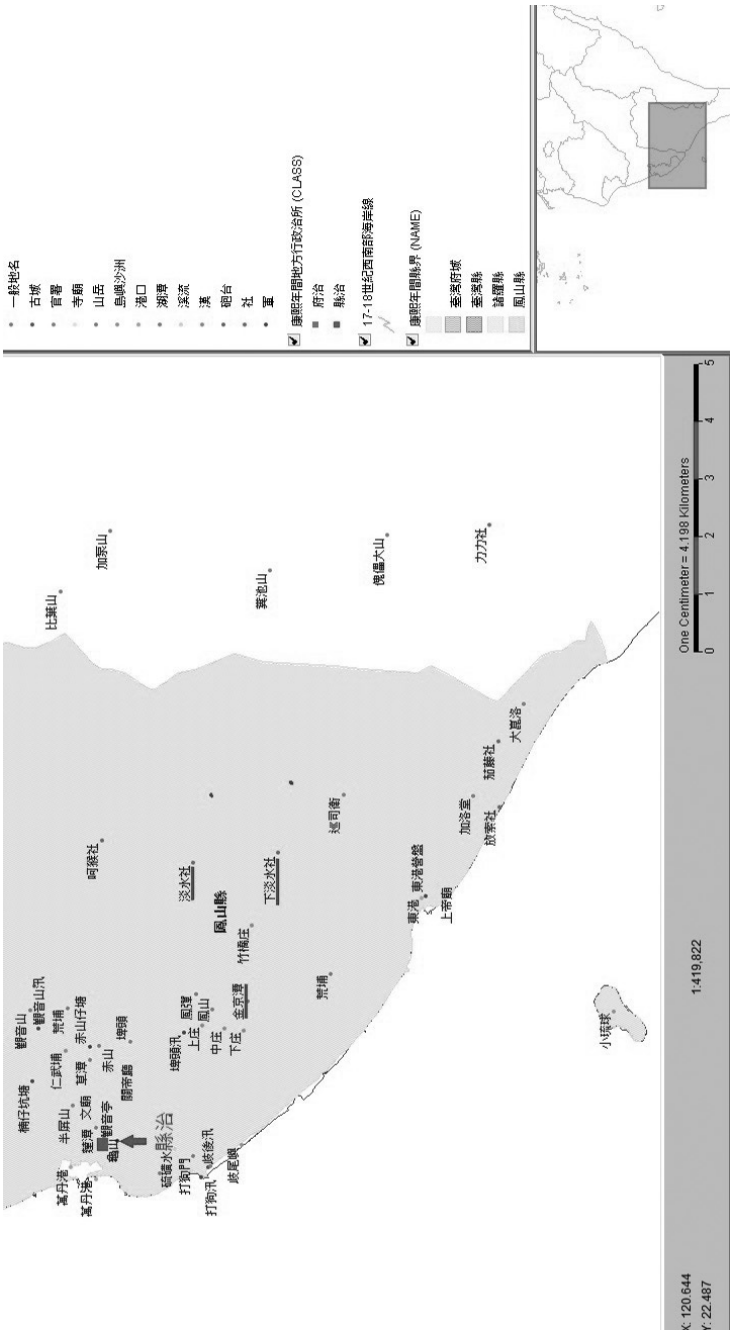


圖 6：鳳山縣治以南[88]

88 同前註。

圖文對照同樣亦可知，由縣治往南，文化已和臺灣縣不同，淡水溪之南則呈現了華人閩南、客家與原住民的多元族群文化。作者的觀點和《諸羅縣志》作者可謂相當一致，均以閩南漳泉族群為中心。我們可再對照 1720 修成的《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之敘述：

> 海外之區，風尚習俗，三邑約略相等。鳳、諸二志，載之詳矣。然二邑地廣，番漢雜處；邑治窄狹，惟漢人居之。通都大邑之中，其風醇、其俗雅，彬彬然一衣冠文物之邦；較之僻野孤村，不無懸殊。[89]

由以上對照，可發現三志都表達了一種相同的觀點：即府城、安平、臺灣縣這一片範圍擁有島上華人文化中心的位置。

我們可依照 1685-1687 年蔣毓英《臺灣府志》、1697 年郁永河《裨海紀遊》、1717 年《諸羅縣志》、1719 年《鳳山縣志》、1720 年《臺灣縣志》以來的敘述，畫成一圖；圖中以虛線所框之中心，即大員／安平與府城，漢化程度最深，定為中心第一層，往外依序分為第二、三、四層，漢化程度每層遞減。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清楚顯示了華人文化從大員／安平與府城、臺灣縣往南北逐漸擴散的情形。華人戲劇的傳播也應循同樣的軌跡。

89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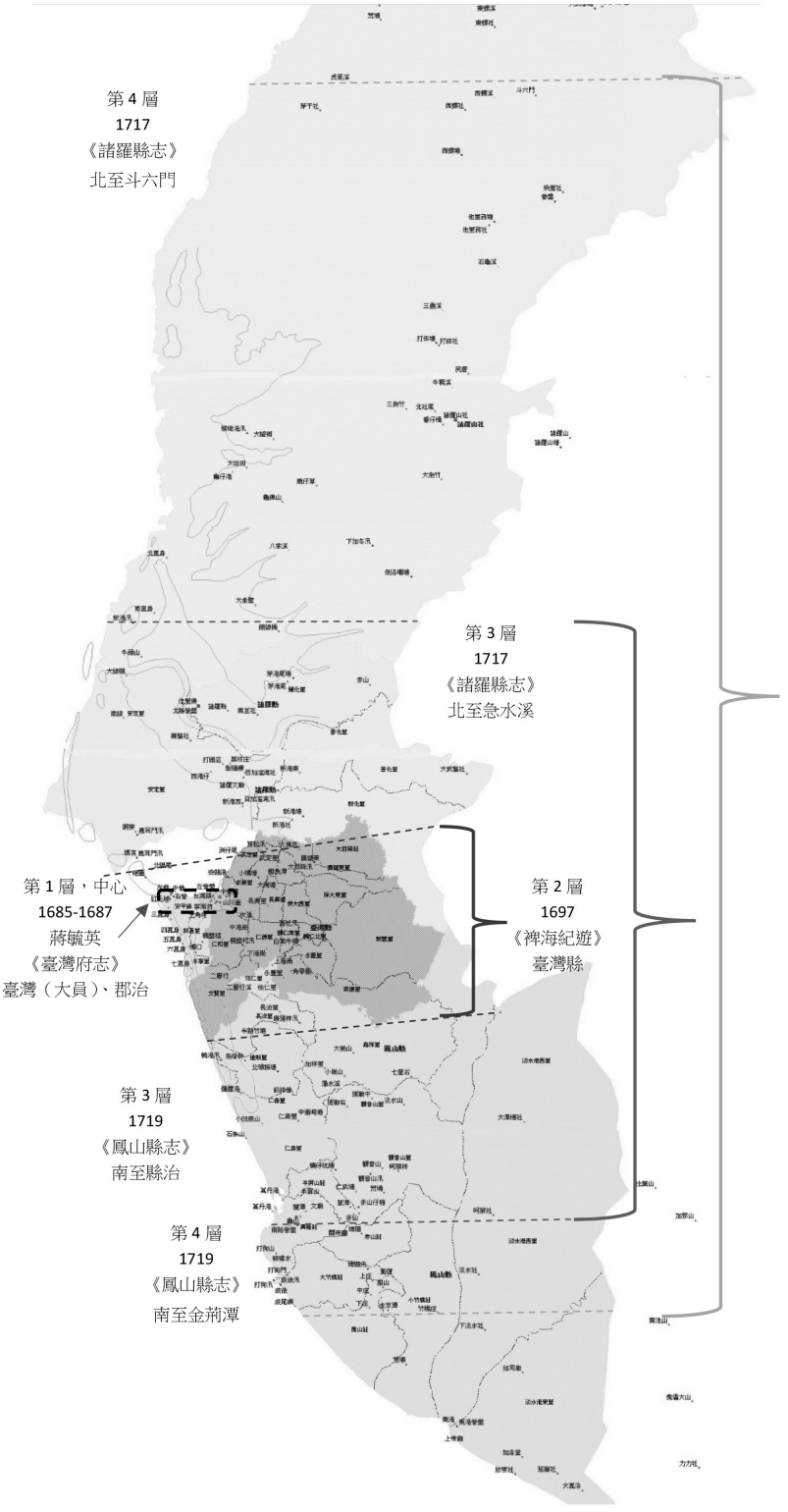

第 4 層
1717
《諸羅縣志》
北至斗六門
第 3 層
1717
《諸羅縣志》
北至急水溪
第 1 層，中心
1685-1687
蔣毓英
《臺灣府志》
臺灣（大員）、郡治
第 2 層
1697
《裨海紀遊》
臺灣縣
第 3 層
1719
《鳳山縣志》
南至縣治
第 4 層
1719
《鳳山縣志》
南至金荊潭

圖 7：漢化層次圖

除了移民以外，清治時期，大部分的官員與兵士也居住於府城、安平和臺灣縣。全臺灣府的各類政府機關以及軍事重鎮集中於此，派任來臺的官員同樣居住於此，因此該地為這批人的主要生活範圍。府城、安平和臺灣縣因有這些官員與士兵，和其他以閩南、粵東移民為主的華人社區又顯不同。這其中有某些官員偶然紀錄了該地的戲劇活動，他們的紀錄對於臺灣戲劇文獻亦有相當的貢獻。

大員／安平、府城與臺灣縣一帶作為整個福爾摩沙島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提供了興盛的戲劇活動一種重要的背景與深層的理由。至清朝統治結束，華人移民後裔的社區已經擴張、遍布整個島嶼的西半部，土地已完全開發，然而至此，依然難以找到另一個城鎮如該區域一般擁有完整的政經文化等功能，其他地區，不管城、鎮、鄉村，大多僅擁有某種特定功能。遲至 19 世紀下半，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才漸漸北移，但在文化層面，原大員／安平、府城及臺灣縣仍保存了最多的華人移民帶來、形成的傳統。

四、華人戲劇活動的背景——港口城鎮與官署

出自府城的戲劇文獻自然反映的是港口城鎮的景象，若再加上大員／安平與臺灣縣的文獻，可看出和海口的背景更是密不可分，也就是戲劇活動發生於港口城鎮的環境。這樣的特徵已經顯露於前述 1651 年《熱蘭遮城日誌》與 1664 年 Johnnes Melman 之記載。進入清治時期，知名的 1697 年郁永河〈臺灣竹枝詞〉描述：「肩披鬢髮耳垂璫，粉面紅唇似女郎；馬祖宮前鑼鼓鬧，侏離唱出下南腔。」郁永河自註：「天妃廟近赤崁城，海舶多於此演戲賽願。」明確指出觀劇地點為赤崁城附近的天后宮，即今日所稱大天后宮，和赤崁樓僅數步之遙。「海舶」可指漁船也可指商船。由府城的貿易背景來看，貿易商為祈求旗下貨船航行平安，請戲時機必定相當多。

其後的記載，同樣也不脫海口與城鎮這兩大背景。前者如 1720 年《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雜俗》述：

> 臺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之義也。附郭鄉村皆然。境內之人，鳩金造舟，設瘟王三座，紙為之。延道士設醮，或二日夜、三日夜不等，總以末日盛設筵席演戲，名曰請王；進酒上菜，擇一人曉事者，跪而致之。酒畢，

將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財寶，無一不具。十餘年以前，船皆製造，風篷、桅、舵畢備。醮畢，送至大海，然後駕小船回來。[90]

由內容可看出王醮的舉辦地點位於海邊，因此末日設筵演戲自然也在海邊。1752 年《重修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廟．將軍廟》所述類似，如下：

所傳王誕之辰，必推頭家數人，沿門醵資演戲展祭。每三年即大歛財，延道流、設王醮二三晝夜，謂之送瘟。造木為船，糊紙像三儀仗，儼如王者。盛陳優觴，跪進酒食，名為請王。愚民爭投告牒畢，乃奉各紙像置船中；競墑柴米。凡百器用、兵械、財寶，以紙或綢為之，無一不具。推船入水順流揚帆而去則已，或洄泊岸側，其鄉必更設醮造船以禳。每費累數百金，少亦不下百金。雖窮村僻壤，罔敢吝惜。[91]

演戲展祭的地點，同樣在海口。

1721 年〈朱一貴供詞〉言：「續因地震，海水泛漲，眾百姓合夥謝神唱戲」，可看出居民因海嘯災害而請戲祀神，自然是屬於靠海地區之事。1745 年范咸〈再疊臺江雜詠〉：「朝潮盈縮視堯莫，榕樹垂條刺史廳。春雨獨添鐵線白，秋山無過木岡青。絃歌比戶皆蠻語，優孟登場半粵伶。欲望長安愁日遠，夜涼徙倚太微星。」一開始就畫出海岸的場景，也就是優孟登場所在之環境。鄭大樞〈風物吟〉十一首之四：「海港龍舟奪錦標，纏頭三五錯呼么。行看對對番童子，嘴裏彈琴鼻裏簫」作者自註：「端陽海口，或用錢，或用布帛，懸於竹竿為標，漁船爭取之，為鬥龍舟之戲。」、「臺多漳、泉人，怯海風，以黑布包頭，到處鋪蓆聚賭，若遇勝會、戲場，為尤甚。」作者同樣一開場就點出海港，而其註文所提及之戲場，同在海口之環境。

兩種背景兼有者則如 1722 年《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崁筆談．習俗》：

七月十五日，亦為盂蘭會。〔．．．〕至夜分同羹飯施燄口。更有放水燈者，頭家為紙燈千百，晚於海邊親然之；頭家幾人，則各手放第一盞，或捐中

90 《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雜俗》，《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91 《重修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廟．將軍廟》，《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 番錢一或減半，置於燈內。眾燈齊然，沿海漁船爭相攫取，得者謂一年大順。沿街或三五十家為一局，張燈結采，陳設圖畫、玩器，鑼鼓喧雜，觀者如堵。二日事畢，命優人演劇以為樂，謂之壓醮尾。月盡方罷。[92]

這段描述中既有沿海之情景，所謂「沿街或三五十家為一局」，又為街市。1752 年《重修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祠（附寺宇）．文廟土地祠》：

> 又文武各衙門左，俱有土地祠。朔望日本衙門行香祭，則本官主之。其居民所祀土王曰福德祠。在東安坊者六：嶺頂、番薯崎、觀音亭邊、諸羅倉邊、嶽帝廟右、龍川井。在西定坊者四：南巷口、新街尾、海防廳邊、佛頭港。在寧南坊者五：打石街、安海街、磚仔橋、大南門邊、大埔尾。在鎮北坊者六：禾寮港街、總爺街、熟皮磚、赤嵌樓左、粗糠崎、林投井。在永康里者二：彌陀寺右、燒焜嵌。他如大南門外仙草寮、小北門外柴頭港及安平鎮、新豐里、長興里、土庫、歸仁北里、舊社街，在在有祠。每歲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沿戶鳩資演劇，張燈慶讚，亦春祈秋報之意。[93]

所述範圍包含府城東西南北四坊，安平鎮，而大南門外、小北門外、永康里、新豐里、長興里、土庫、歸仁北里、舊社街，則屬城外臺灣縣。[94] 府城內之地點有佛頭港、禾寮港街，反映出府城的海港性質，臺灣縣之柴頭港以及安平鎮同為港口的場景。寫於 1760 年後之孫霖〈赤崁竹枝詞〉：「結緣纔過又中元，施食層臺市井喧。三令首除羅漢腳，只教普度鬧黃昏。」作者註：「臺俗：〔．．．〕中元節，好事作頭家，醵金延僧施燄口，燃紙燈於海邊，謂之普度。是月也，最多『羅漢腳』，搶孤打降，結黨滋擾。觀察覺羅四公、刺史余公、明府陶公並委員巡查，禁演夜戲。」詩之標題指明赤崁，內容描繪「市井」，註文則有海邊之場景。1780 年〈佛頭港福德祠碑記〉：

> 佛頭港之有福德祠，由來久矣。緣戊戌之春，右廡之店，更築崇高；而我本街弟子，悉遇災咎。用是鳩集街眾捐銀，公置拆低；歷年收稅以充本廟

92 《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崁筆談．習俗》，《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93 《重修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祠（附寺宇）．文廟土地祠》，《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94 各里位置可見附錄：圖 8。

> 誕辰資費。厥後，凡有捐銀鐫石者，遇春秋演戲，免題緣銀；其餘依舊照分題湊，相率慶賀。眾議：廟前店屋不得張高，致傷廟宇，貽禍街眾；如有增高其店者，值年爐主必聞眾阻止；如不遵公議，即呈官究治。[95]

由碑文可知佛頭港一帶為商店街。

由上述文獻中可推知，戲劇的興盛和貿易港的背景息息相關。且可資注意者，某些紀錄採取的是「先港口城鎮後鄉村」的敘述視角，如《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雜俗》：「臺俗演戲，其風甚盛。凡寺廟佛誕，擇數人以主其事，名曰頭家；斂金於境內，作戲以慶。鄉間亦然。」、「臺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之義也。附郭鄉村皆然。」這有可能反映了城鎮帶領演戲的流行風氣，而鄉村追隨其後的情形。

府城、安平與臺灣縣因具有政治、軍事中樞的地位，此地之官署演戲、官員看戲也成為 19 世紀前戲劇文獻中的重要部分，如前所引 1753 年〈刑部「為內閣抄出福督喀奏」移會〉述臺灣總兵陳林每在官署花廳演戲酬神。而宦遊臺灣之高級官員，如張湄、范咸、六十七、錢琦、朱景英等人也留下觀劇之詩詞，如前所述。其中朱景英不僅看戲、有意識地介紹本地戲劇現象，還創作劇本實地搬演，可說一人身兼觀眾、創作者、戲劇觀察者數種角色。

另根據張啟豐之研究，18 世紀末葉，崑曲曾傳入臺灣，乃是由府城郊商所引進。朱景英詩作〈九日同人集東堂觀劇是日演周忠介公遺事〉、〈冬夜南園同人觀演拙製桃花緣傳奇〉所指之「周忠介公遺事」、「桃花緣傳奇」即為崑曲。[96] 蘇州梨園公所翼宿神祠，即彼時崑曲藝人的行會組織，其 1783 年〈翼宿神祠碑記〉有「臺灣局」捐金的紀錄，臺灣局即該行會在臺的分支；而所捐數額遠高於全國他省之分會，[97] 足見財力之雄厚。根據前文對於「臺灣」意涵之分析，臺灣局此一會館之所在地也以府城最為可能。崑曲之傳入顯然和府城身為全臺政治經濟中樞的背景密切相關，觀察文獻，或可推測崑曲是專屬於官員、貿易商此種掌握政經權力階級的「高級」戲劇。

---

95 〈佛頭港福德祠碑記〉，《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96 「周忠介公遺事」即李玉《清忠譜》，見張啟豐：〈清代臺灣戲曲活動發展與研究〉，頁 70-71。

97 張啟豐：〈清代臺灣戲曲活動發展與研究〉，頁 206-207。

此外，在提及戲劇活動的文獻中，也常見對於臺俗奢侈的形容，如 1696 年高拱乾《臺灣府志》除了首度敘述臺人「好戲劇」，同時也指出「間或侈靡成風」。1747 年六十七之〈即事偶成〉，註文指出「臺俗尚奢，有衣羅綺而負販者」。前引 1752《重修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廟．將軍廟》指出「所傳王誕之辰，必推頭家數人，沿門醵資演戲展祭。每三年即大歛財」、「每費累數百金，少亦不下百金。雖窮村僻壤，罔敢吝怯。」1773 年朱景英《海東札記》述：

> 海外百貨叢集，然直倍中土。俗尚華侈，雖傭販輩徒跣載道，顧非紗帛不褲。婦女出不乘輿，袨服茜裙，擁傘踅通逵中，略無顧忌。匠作冶金範銀，釵笄釧珥之屬，製極工巧。凡鬻冠服履襪者，各成街市，闃然五都，奢可知已。
>
> 俗喜迎神賽會。如天后誕辰、中元普度，輒醵金境內，備極鋪排，導從列仗，華侈異常。又出金傭人家垂髫女子，裝扮故事，舁遊於市，謂之「抬閣」，靡靡甚矣。每舉尚王醮設壇，造舟送迎，儼恪糜費，尤屬不貲。[98]

所謂奢侈雖非單指戲劇演出風氣，不過綜合而言，臺人好戲劇也被視為奢侈風氣的一環。由此亦可間接推測，由於戲劇演出和貿易港有密切關係，以貿易商之財力，在請戲、籌辦演出上可能花費較為大方。此外，由本時期的文獻觀之，天后、王爺、土地神誕的祭祀都是相當重要的活動，演戲絕不可免，臺灣華人共通的一年三大祭、次之各地神明祭祀與歲時節慶等演出，本地戲班或許無法完全應付，而需從對岸請來；范咸〈臺江雜詠〉應可為證，該詩曾述：「語學咮嚦海上伶」，所謂「海上伶」應指從海上來的伶人，即搭船從內陸來臺演出的演員。如此一來請戲成本自然高於內陸，全年累積下來，所費者必定遠高於內陸的一般城鎮。也或許在當局看來，花大錢請戲即為奢侈之舉。

98 《海東札記．卷三．記氣習》，《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五、其他地區文獻所反映的華人戲劇傳播途徑

19 世紀前府城、安平與臺灣縣以外的島內戲劇活動現存文獻如下表：

表 3：19 世紀前本島西部其他地區戲劇文獻

年代	文獻
1716	《諸羅縣志》[99]（6 條紀錄）
1719	《鳳山縣志》[100]（2 條紀錄）
1725 前	陳逸：〈艋舺竹枝詞〉[101]
1757	〈雙慈宮天燈永耀碑記〉（今屏東縣里港鄉）[102]
1760	《臺案彙錄己集・七一・刑部等衙門副奏摺》（鹿港）[103]
1764	《重修鳳山縣志》[104]（2 條紀錄）
1764	〈嚴禁侵占牧埔碑記〉（今嘉義縣朴子市）[105]
1764	〈慈祐宮聖母香燈碑記〉（甲）（今新北市新莊區）[106]
1774	〈奉禁惡丐逆擾碑示〉（今高雄市燕巢區）[107]
1774	〈嚴禁掘土害塚碑記〉（今屏東縣崁頂鄉）[108]
1775	〈嚴禁侵害牧埔碑記〉（今雲林縣西螺鎮）[109]

99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100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101 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集》，頁 168。
102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 年），頁 57-58。
103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104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105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補遺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 年），頁 46-47。
106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 年），頁 6-7。
107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高雄市・高雄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 年），頁 95-96。
108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頁 167-168。
109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補遺篇》，頁 109-110。

1779	〈重修慈祐宮碑記〉（乙）（今新北市新莊區）[110]
1780	〈添建艋舺大渡碑記〉（今臺北市中正區）[111]
1781	〈永垂碑〉（今嘉義縣大林鎮）[112]
1782	《臺案彙錄己集・七四・內閣抄出臺灣總兵金蟾桂奏摺》（彰化） 《臺案彙錄己集・七五・刑部「為內閣抄出福建巡撫雅奏」移會》 《臺案彙錄己集・七六・禮部「為內閣抄出福建巡撫雅德奏」移會》 《臺案彙錄己集・八二・內閣抄出福建水師提督黃等奏摺》 《臺案彙錄己集・八五・兵部「為內閣抄出福撫雅奏」移會》[113] 以上數條皆述同一事件。
1788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九・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初八日》（鹿港）[114]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御制詩（三）》（鹿港）[115]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五・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116] 御制詩詩序所述乃是根據「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內容而簡省。

1716 年《諸羅縣志》與 1719 年《鳳山縣志》所反映的環境已如前述，此後之文獻，如一府之後的二鹿，其戲劇記載有 1760 年《臺案彙錄己集・七十一・刑部等衙門副奏摺》：「據鹿仔港巡檢陳登象報稱：五月二十二日，鹿仔港街尾〔・・・〕有番仔宅民人沈房，於五月十九日來地看戲」；《欽訂平定臺灣紀略・卷九・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初八日》：「劉志賢赴鹿仔港住守，因傳戲班不到，將戲子杖責」；《欽訂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五・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自林爽文拏獲之後，鹿仔港各廟社演戲謝神，殆無虛日。」排第三的艋舺，記載則為 1719 年陳逸所作〈艋舺竹枝詞〉，及 1780 年〈添建艋舺大渡碑記〉：「謹為□□監碑演唱梨園」，立碑者有眾商號與糖郊、廈郊，可見貿易港之背景。值得注意的是 1757 年〈雙慈

110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縣篇》，頁 13-15。
111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市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 年），頁 7-8。
112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 年），頁 6-7。
113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114 同前註。
115 同前註。
116 同前註。

宮天燈永耀碑記〉，從碑文：「茲鳳邑之西有大港焉，市廛新興；爰造天后宮，奉祀聖母。舉凡港市商民以及庄眾，無不咸被感應之鴻恩也。」可知背景為港口城鎮。1774 年〈嚴禁掘土害塚碑記〉，從碑文「港東之里，有街曰『崁頂』。人煙輻輳，四民雲集，巍然一巨鎮也。」可知背景同為港口城鎮。1764 年〈慈祐宮聖母香燈碑記〉（甲）碑文：「淡水四面環海，舟楫之利遍通東南省會。前人建立慈祐宮，且將左右店租、魚池、渡租增入廟內香燈之費」，1779 年〈重修慈祐宮碑記〉（乙）為眾多商號同立，亦可看出渡口、港口城鎮之背景。從 1764 年〈嚴禁侵占牧埔碑記〉開始，以農業村莊為背景的文獻才明顯增加，包括接下來 1775 年〈嚴禁侵害牧埔碑記〉、1781 年〈永垂碑〉，以及 1782 年 5 條記載彰化莿桐鄉看戲鬥毆致命的文獻。

由此可知，在 19 世紀前的臺灣戲劇文獻中，來自於港口、城鎮的記載便占了大部分。18 世紀後葉開始，鄉村的戲劇文獻才有明顯的增加。若說華人戲劇是由貿易商引進臺灣，並且首先在港口城鎮當中發展，應該是非常可能的。華人戲劇在臺灣的傳播路徑，應當便是由沿岸港口往島內，並且由城鎮往鄉村地區散播。生活於 19 世紀初期至中期臺灣縣治的施瓊芳 [117] 所作〈北港進香詞〉第十二首便可能透露這樣的跡象：「舶商賽會為活波，祀到山農意若何？廟樂聲闌秧鼓動，慶豐祝比慶瀾多。」[118] 作者在詩中說出了他的疑問，這個疑問也反映了作者對於戲劇傳播的概念，和中國本土並不相同。在中國的文獻記載中，鄉村地區迎神賽會演戲是再普通不過之事，記載之文人知識階層即使不一定認同此種娛樂，也並不覺得這種現象的形成有何特異之處。但施瓊芳所表達之「祀到山農」，其實反映了一種貿易港口商人先、鄉村農人後的順序。而末句「慶豐祝比慶瀾多」和詩人的疑問直接相關，本句的背後其實暗示原本為「慶瀾」演戲應多於「慶豐祝」，但在詩人看戲的時代或那個季節，「慶豐祝」竟反而多於「慶瀾」了。證之於北港發展的歷史：北港原稱為笨港，在 19 世紀前本為山疊溪（北港溪）出海口，是船隻可直接出入的商貿口岸；但漸因泥沙淤積，使海岸線逐漸西移，笨港由海口變成陸地，也因此轉為陸運集散點，改由猴樹港、下湖口港做為外港，以牛車等從笨港轉運貨物至外港出

117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全臺詩》第伍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04 年），頁 353。
118　同前註，頁 421。

口。[119] 這應當便是施瓊芳指出「慶瀾」減少的背景。但反過來可看出 19 世紀前北港之經濟的確是由舶商所主導，慶瀾之賽會演劇原本也應當更為興盛。因此本詩仍然透露了港口貿易發展在先之順序。這呼應了前述文獻所呈現的華人戲劇傳播途徑：首先出現於貿易港大員／安平、府城與臺灣縣，接著是諸羅縣治、鳳山縣治，再來為西部其他港口、城鎮，最後是鄉間地區。

這個路徑又進一步呼應了臺灣的開發史。原本可說遺世獨立的福爾摩沙島，因地理大發現開啟世界海洋貿易，突然被拉進了世界史的進程中。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中國人紛紛來到臺灣進行貿易。而一改福爾摩沙島原始農業型態的高密度集約農業，則比海洋貿易晚發展，更進一步言之，高度技術的農業之所以被引進臺灣，也是荷蘭人基於貿易的需要。[120] 在東寧王國取代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之後，對外貿易仍是最重要的政策以及經濟支柱，此乃導因於清帝國對沿岸發布的海禁。[121] 其屯田政策的出現，也是因海禁直接切斷了糧食供給鏈，迫使鄭氏大軍必須自行生產糧食。[122] 福爾摩沙特殊的歷史進程：先立基於貿易，農業為輔助腳色，同樣型塑了華人戲劇的發展過程。在 20 世紀之前，存在於臺灣的各類華人戲劇，不管是已發展成熟之大戲如七子班，或形式相對簡單之小戲如車鼓，或者偶戲，全都是「舶來品」。直到 20 世紀，才有本地歌仔從臺灣之宜蘭誕生。如同其他的舶來品，這些自中國「橫向移植」的產物，很可能首先由港口城鎮享用，再往鄉村傳播，而這種向來以「進口」供應大眾娛樂需求的模式，也成為臺灣劇場史的常態。進入 20 世紀，前半葉，日本戲劇隨著日人移民來臺，同時有新一波的中國戲班來臺熱潮；後半葉，戰後來臺的中國移民又再度帶來各類的戲曲／戲劇。不斷橫向移植的現象，可說是臺灣劇場史的特點，而此特點從荷治時期便已奠定。

119 鄭螢憶：〈從貿易小口到宗教中心：十九世紀以來笨港市鎮機能的發展與變化〉，《暨南史學》第 14 期，頁 81-85。

120 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篇、解讀篇》，頁 161。

121 賴永祥：〈臺灣鄭氏與英國的通商關係史〉，《臺灣文獻》16 卷第 2 期，頁 1。方真真：〈明鄭時代臺灣與菲律賓的貿易關係——以馬尼拉海關紀錄為中心〉，《臺灣文獻》54 卷第 3 期，頁 61-62。

122 林偉盛：〈國姓爺攻臺之役的再思考〉，《臺灣文獻》55 卷第 4 期，頁 21-24。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2003 年），頁 50-51、57-58。

六、結語

本文奠基於前人對於臺灣清治乃至更早期華人戲劇活動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17、18 世紀戲劇文獻的詳情，將戲劇活動發生的所在地與背景、環境更清楚分析，發現本時期標出「臺灣」、「臺」之戲劇文獻，所指都是大員／安平、府城、臺灣縣此一範圍。而全島文獻同樣有極高比例出於此地，內容則明顯以貿易港口城鎮為背景，另外統治階級的戲劇活動亦為重要特色。而本島其他地區戲劇文獻以數量與提供的線索而言均無法相提並論，因此這些戲劇文獻正可反映大員／安平、府城、臺灣縣的發展特色和作為全島政經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時也顯示了華人移民文化以此地為中心，向南北擴張的軌跡。觀察其他地區的文獻，同樣有極高比例以港口城鎮為背景；相較之下，農村文獻之出現則晚至 18 世紀後葉，數量也並不多。雖然農民、勞動階層有可能同時也流行小戲，但畢竟文獻難徵，以本時期的劇場發展史而言，港口城鎮與文武官員政、商階層的戲劇活動應仍居於主導地位。因此文獻整體所呈現的華人戲劇在臺傳播路徑，乃是由海岸向內陸，由港口城鎮向鄉村發展，戲劇的引進臺灣，和對外貿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戲劇在當時或許是貿易所進口的舶來品，並且是由港口城鎮內的統治階級與商人階級先行享用。「橫向移植」的模式，從荷治時期便已開始，並持續至今，成為臺灣劇場史的特點。

引用書目

專書

全臺詩編輯小組
2004 《全臺詩》第貳冊。臺南：臺灣文學館。
2004 《全臺詩》第參冊。臺南：臺灣文學館。
2004 《全臺詩》第肆冊。臺南：臺灣文學館。
2004 《全臺詩》第伍冊。臺南：臺灣文學館。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
1993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澎湖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4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5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5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高雄市．高雄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9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9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市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9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補遺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邱坤良
1983 《現代社會的民俗曲藝》。臺北：遠流。
2013 《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臺北：臺北藝術大學。

林鶴宜
2007 《從田野出發——歷史視角下的臺灣戲曲》。新北：稻香。

施子清、朱展華、鄭國權、吳捷秋、曾金錚
1991 《南戲遺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陳香
1983 《臺灣竹枝詞選集》。臺北：商務。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
2003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

雷夢水、潘超、孫忠銓、鍾山
1996 《中華竹枝詞（六）臺港澳其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鄭維中
2006 《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北：如果、大雁。

Aalsvoort, Lambert van der.（蘭伯特．凡．德．歐斯弗特）著，林金源譯
2002 《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臺北：經典雜誌。

Andrade, Tonio.（歐陽泰）著，鄭維中譯
2007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

Brook, Peter.（彼得．布魯克）著，耿一偉譯
2008 《空的空間》。臺北：中正文化中心。

Imbauel-Huart, C. 著，黎烈文譯
1958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灣研究叢刊》第五十六種。臺北：臺灣銀行。

Meijensteen, P. Daniel Meij van.（梅氏）著，江樹生譯註
2003 《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

Zandvliet, Kees.（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篇、解讀篇》。臺北：漢聲。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論述篇》。臺北：漢聲。

學位論文

張啟豐
2004 〈清代臺灣戲曲活動發展與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黃文正
2003 〈臺灣車鼓戲源流之探考〉。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期刊論文

方真真
2003 〈明鄭時代臺灣與菲律賓的貿易關係——以馬尼拉海關紀錄為中心〉。《臺灣文獻》54 卷第 3 期，頁 59-105。

邱坤良
1982 〈臺灣近代民間戲曲活動之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11 卷第 2 期，頁 249-282。

林偉盛
2004 〈國姓爺攻臺之役的再思考〉。《臺灣文獻》55 卷第 4 期，頁 1-31。

康尹貞
2015 〈日治時期臺灣戲曲之研究〉。《戲劇學刊》第 21 期，頁 47-72。

鄭螢憶
2011 〈從貿易小口到宗教中心：十九世紀以來笨港市鎮機能的發展與變化〉。《暨南史學》第 14 期，頁 77-120。

賴永祥
1965 〈臺灣鄭氏與英國的通商關係史〉。《臺灣文獻》16 卷第 2 期，頁 1-50。

論文集論文

沈冬
1998 〈清代臺灣戲曲史料發微〉。《海峽兩岸梨園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正文化中心。頁 121-159。
2002 〈書寫與表演——臺灣戲曲史料析論〉。《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頁 268-302。

電子資源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查詢日期：2018 年 9 月 2 日。
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網址：http://thcts.ascc.net/view.php。查詢日期：2018 年 2 月 6 日。
《熱蘭遮城日誌》。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查詢日期：2018 年 9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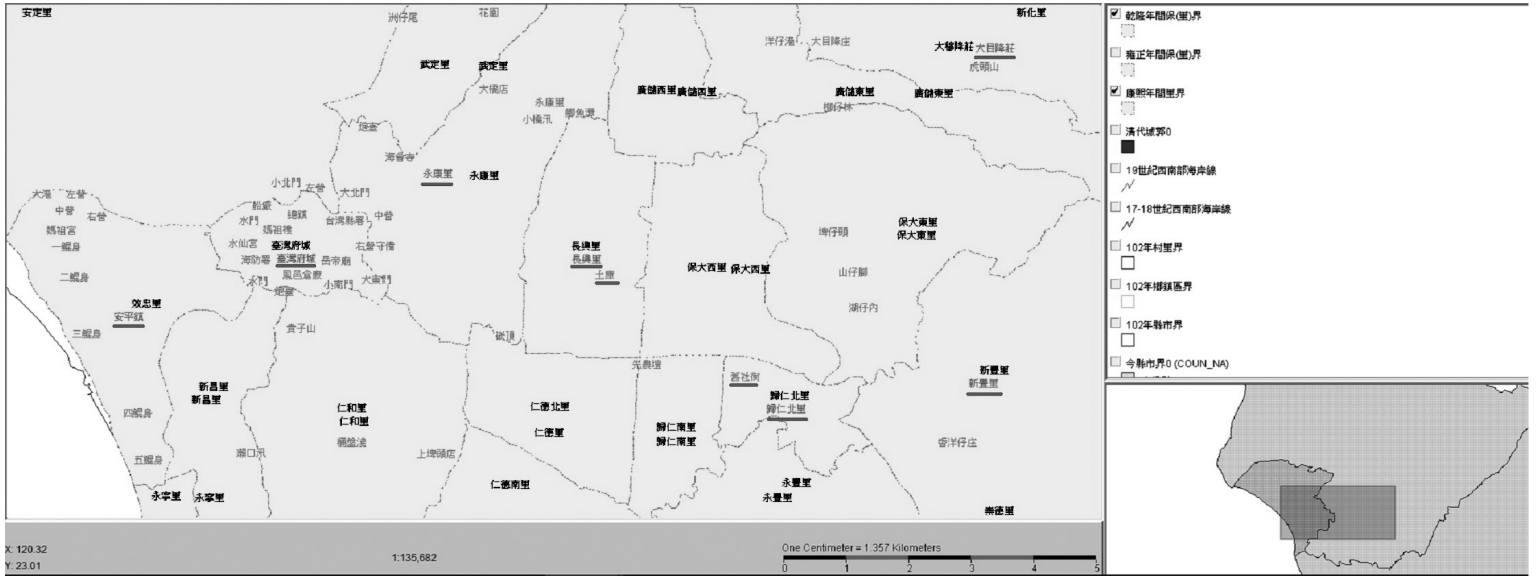


圖 8：1683-1795 年府城、安平鎮、臺灣縣各里戲劇活動相關地點

說明：本圖套疊之圖層包括：

「康熙年間里界」——黑色字體

「乾隆年間保（里）界」——黑色字體

「《乾隆臺灣輿圖》地名」——淺灰色字體

文獻所指戲劇活動地點：臺灣府城，含總鎮（即臺灣鎮）、海防署、岳（嶽）帝廟；安平鎮、永康里、長興里、土庫、舊社街、歸仁北里、新豐里、大目降莊。其中「安平鎮」見於康熙年間里界圖，在乾隆年間保（里）界圖中則改稱「效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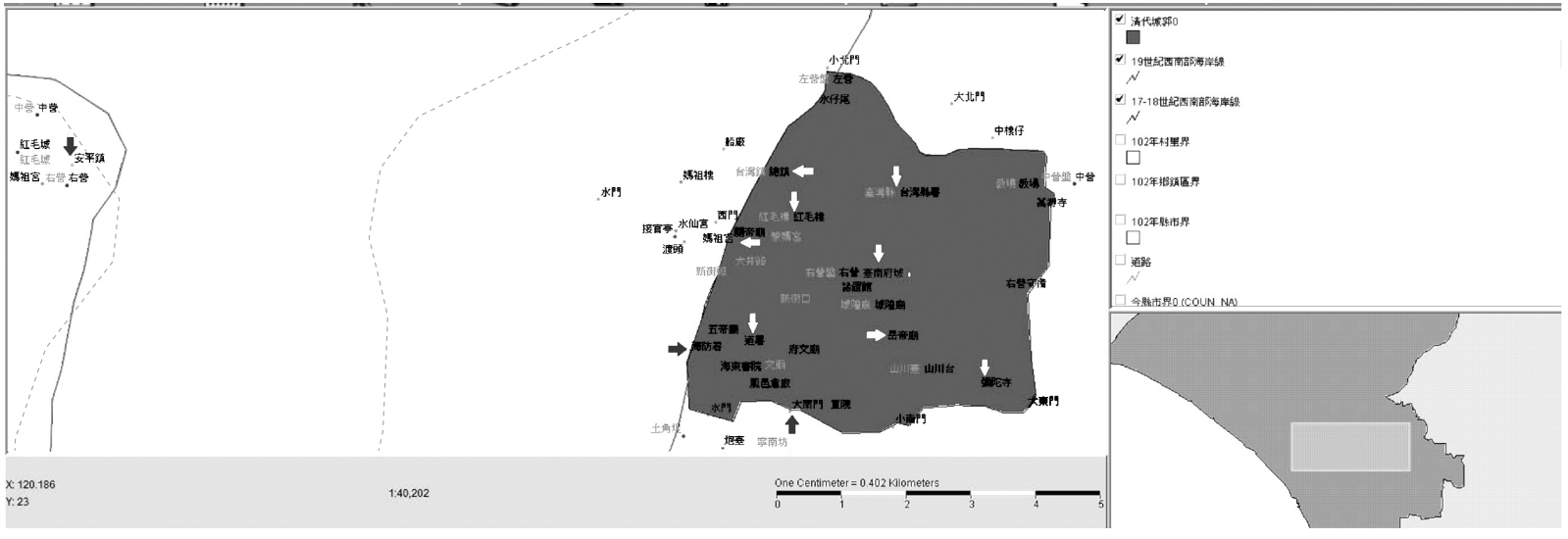


圖 9：1683-1795 年間所繪《康熙臺灣輿圖》、《乾隆臺灣輿圖》中戲劇活動相關地點（1）

說明：本圖套疊之圖層包括：

「《康熙臺灣輿圖》地名」——灰色字體

「《乾隆臺灣輿圖》地名」——黑色字體

「清代城郭」——灰色塊

「17—18 世紀西南部海岸線」——實線

「19 世紀西南部海岸線」——虛線

箭頭所指之地點包括：

行政、軍事官署：臺灣府署、臺廈道署、臺灣縣署、海防署、臺灣鎮、安平鎮。

文獻所指戲劇活動地點：臺灣鎮、安平鎮、海防署、大南門、紅毛樓（即赤崁樓）、媽祖宮、岳（嶽）帝廟、彌陀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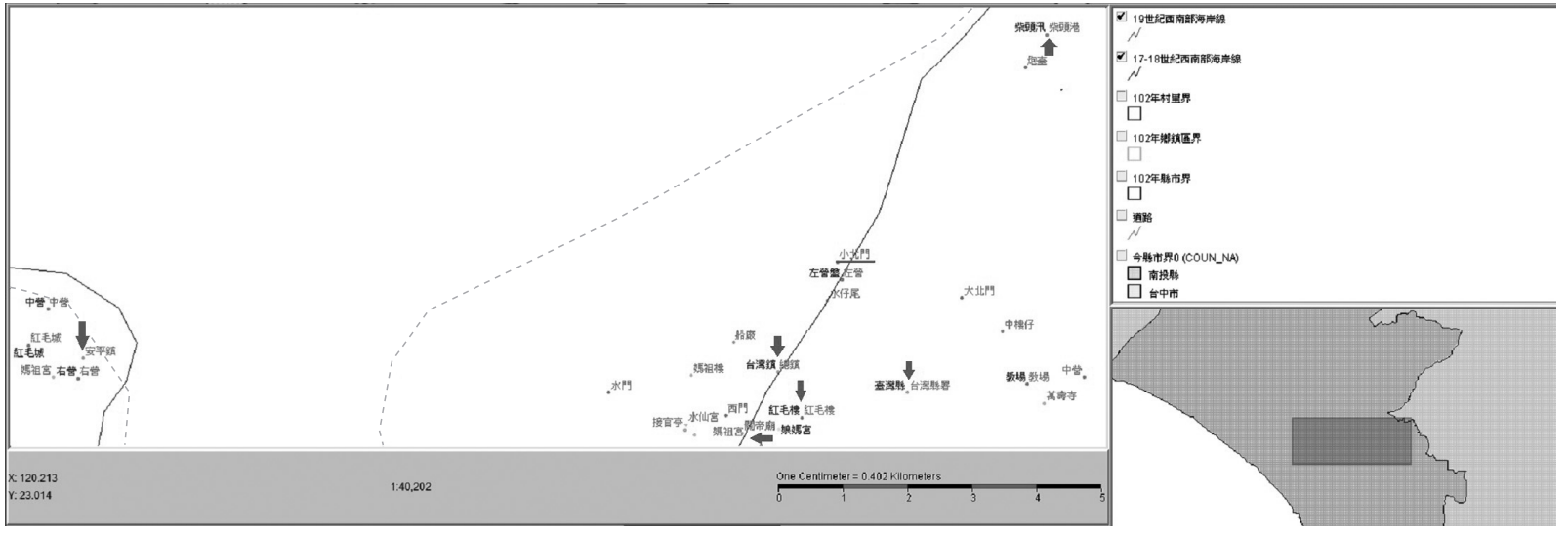


圖 10：1683-1795 年間所繪《康熙臺灣輿圖》、《乾隆臺灣輿圖》中戲劇活動相關地點（2）

說明：本圖套疊之圖層包括：

「《康熙臺灣輿圖》地名」——黑色字體

「《乾隆臺灣輿圖》地名」——灰色字體

「17—18 世紀西南部海岸線」——實線

「19 世紀西南部海岸線」——虛線

箭頭所指之地點包括：

行政、軍事官署：臺灣縣署、臺灣鎮、安平鎮。

文獻所指戲劇活動地點：臺灣鎮、安平鎮、紅毛樓、媽祖宮、柴頭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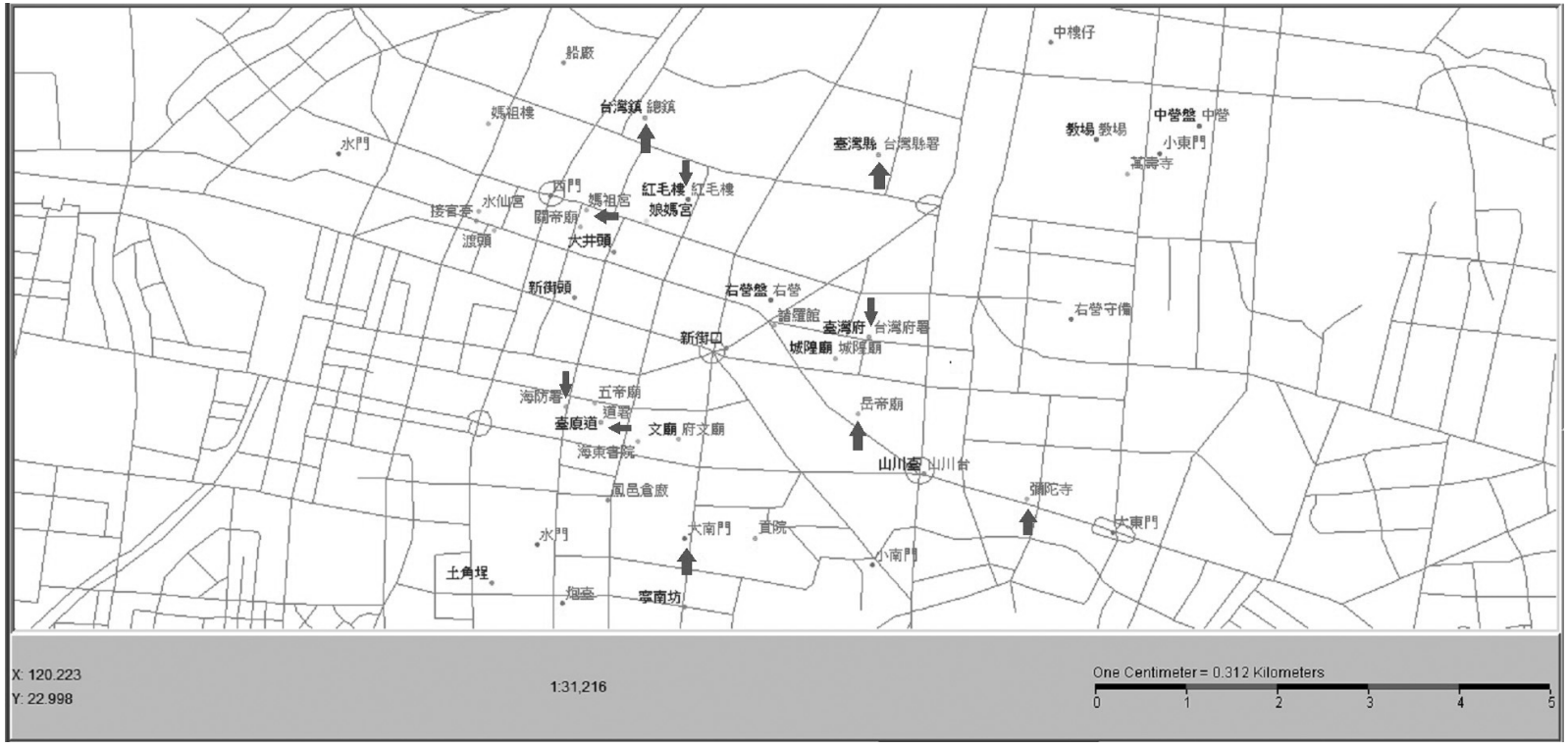


圖 11：1683-1795 年間所繪《康熙臺灣輿圖》、《乾隆臺灣輿圖》中戲劇活動相關地點（3）

說明：本圖套疊之圖層包括：

「《康熙臺灣輿圖》地名」——黑色字體

「《乾隆臺灣輿圖》地名」——灰色字體

道路圖——灰線，今臺南市道路圖

箭頭所指之地點包括：

行政、軍事官署：臺灣府署、臺廈道署、臺灣縣署、海防署、臺灣鎮。

文獻所指戲劇活動地點：臺灣鎮、海防署、大南門、紅毛樓、媽祖宮、岳（嶽）帝廟、彌陀寺。

被農業覬覦的湖水：
租稅政策與鯽魚潭的消失，1645-1900

簡宏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一、前言

鯽魚潭（又稱「東湖」、「龍潭」）是一座已經消失的湖泊，原址位於今日的臺南市永康區和仁德區。鯽魚潭以盛產鯽魚而得名，除了作為漁場，也是臺邑八景之一，在十八世紀成為騷人墨客吟詠的主題。鯽魚潭的漁業從荷蘭統治時期以來就以發賧的方式課徵稅金，其後鄭氏統治下的狀況雖然沒有文獻記載，但以賧餉徵稅的方法應該一直延續到清代，並在此時從不固定的賧金轉變為每年定額的港餉。清初文人提及鯽魚潭時，都會強調它的經濟價值。諸羅知縣季麒光在〈客問〉就說鯽魚潭在內的各港潭，「扼其險可以制患，資其利可以裕民」。[1] 與季麒光交好的沈光文在〈平臺灣賦〉中說「鯽魚潭可饒千金之利」。[2] 同時代稍晚的林謙光也在〈臺灣紀略附澎湖〉中說鯽魚潭「採捕之利，足供軍需」。[3] 但是清代對水域徵收的稅額通常不高，也低於一般田園。[4] 當自然環境變化，水域淤積陸化之後，不只地方豪勢會覬覦新生地的土地資本。[5] 在鯽魚潭的例子中，主政的官府對水域田園化可增加的稅收也相當有興趣。回顧從水域變田園的鯽魚潭，以及附加於上的租稅不斷增加的過程，我們可說經營此處的地方政府（依序是荷蘭東印度

1 清・季麒光，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1694]），頁 102。

2 收錄於清・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1747]），頁 703。

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澎湖臺灣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57。

4 李文良，〈清代臺灣的「港戶」及其水域權利：以臺江內海新灣二港為例〉，《臺大歷史學報》54 卷（2014），頁 225。

5 同前引文，頁 231。

公司、鄭氏政權、臺灣縣、臺灣道）一直都是最覬覦鯽魚潭收益的一方，並且壓制了反對陸化的意見，確定了鯽魚潭陸化消失的結果。

相較於傳統文人對鯽魚潭的興趣，關於鯽魚潭的歷史研究並不算多。最早的研究出現於日本時代的土地與舊慣調查，當時的興趣在於調查「鯽魚潭租」的成立過程與性質，故其研究範圍僅止於鯽魚潭的租稅史。[6] 但調查所收集的史料，不只呈現了清代地方政府從鯽魚潭得到的租稅收益，也保存了鯽魚潭在十九世紀初葉陸化的過程。詳細考察《臺灣私法》中鯽魚潭租相關記述的源頭，至少可發現三種資料。第一種是調查收集到的古文書兩件，分別是 1846 年的給墾照和 1891 年鯽魚潭董事期滿續任之入稟，兩者都收錄在附錄參考書中。[7] 第二種可能是參考清朝官署檔案或實地訪查得知。整合上述兩種資料的研究，已經出版在 1905 年《臺灣土地慣行一斑》之中。[8] 但該書可能來不及採用第三種資料，也就是 1903 年佘英三應日本官方之託調查編寫的《臺南各衙門官租起源沿革款類舊慣調查全冊》。[9] 這本調查全冊雖然看起來相當詳盡，但在鯽魚潭租的細節，卻無法符合《臺灣文獻叢刊》整理出的清代臺灣方志史料。《臺灣私法》在撰寫時也沒有對佘英三的報告詳細考證，繼承了部分的錯誤資訊，所以我們也不能盡信《臺灣私法》對鯽魚潭租的描述。其實日本時代初期設置的臺南縣，為了接管清代的官租，也作了一些調查。不過這批調查關於鯽魚潭的描述與文獻資料有所出入，所以沒有被納入日後土地、舊慣調查的研究報告，僅保留在舊臺南縣公文類纂之中。[10]

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第一卷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頁 451-452。

7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附錄參考書　第一卷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頁 427-429。

8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　第貳編》（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頁 284-288。

9 佘英三，《臺南各衙門官租起源沿革款類舊慣調查全冊》，1903，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藏。佘英三的經歷不詳，但在 1888 年清丈後抱怨辦公經費與薪水沒有著落的諸位糧書中有佘姓者二人，可能和佘英三有親戚關係。見〈臺南府轉飭迅將應貼道府書吏經費剋日議定在於徵收錢糧串票錢文項下提給〉，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7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頁 200。

10 例如臺南縣於 1897 年製作的〈官租種目別來歷調書〉，收錄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官租區分方臺南縣伺ニ對スル通達，138-31，頁 2-5.。鯽魚潭租見頁 4。

在日本時代的土地和舊慣調查之後，鯽魚潭研究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戰後二、三十年內臺南縣市的地方歷史研究，似乎都將焦點集中在府城與鄭氏史事之上，已經消失的鯽魚潭並沒有得到歷史家的注意。反而是在農業雜誌《豐年》半月刊，1957 年出現了一篇關於鯽魚潭的短文，內容略述鯽魚潭作為漁場和名勝的過去，以及改道陸化的時間點。[11] 這篇文章在文末預告未來收集到充實的資料時，會再向讀者報導鯽魚潭的故事，但預告並沒有兌現。1976 年 10 月 3 日與 17 日，成大歷史系的師生在鯽魚潭址進行了田野調查，收集到「陳潭界」碑與后土的拓本，可作為漁業與農業兩種生產方式在鯽魚潭的證據。[12] 不過成大歷史系師生並沒有對鯽魚潭的歷史多做發揮，對於鯽魚潭歷史與地理的全面性研究，要到 1989 年才由出身在地的陳奮雄以〈鯽魚潭之探討〉完成。〈鯽魚潭之探討〉討論了鯽魚潭的地理環境變遷、橋樑興廢、租稅之徵納與運用、附近聚落人口與姓氏分佈，除了運用《臺灣文獻叢刊》整理出版的地方志與古文書，作者也透過訪談當地耆老記錄在地記憶，並保存了許多現在已經消失的鯽魚潭歷史地景。[13] 之後臺南地方研究提及鯽魚潭之時，研究的材料與規模皆沒有超過〈鯽魚潭之探討〉，故該文可說是鯽魚潭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筆者在此並不打算挑戰〈鯽魚潭之探討〉，對鯽魚潭的地理與歷史重做一次研究。本研究之重點將放在鯽魚潭租稅成立的歷史，地方政府所覬覦的收益成長，以及經濟上的誘因如何確定了鯽魚潭消失的結果。並且運用荷蘭檔案與日本時代土地調查的史料，將鯽魚潭的歷史往前、往後延伸，並嘗試為鯽魚潭的歷史建立從十七世紀中葉以降的連續性。在史料解釋的細節上，本研究與〈鯽魚潭之探討〉也略有不同，此處的新意見或許可以作為相關研究之參考。此外，在考察比定史料的過程中，本研究也會觸及鯽魚潭周遭的社會環境變遷，特別是漢人在鯽魚潭附近經營農業的歷史。本研究發現，1652 年的郭懷一抗荷事件，以及 1844 年郭光侯抗租上京控告事件，兩者都和鯽魚潭有間接的關係，是鯽魚潭附近歷史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11　良惡，〈風土特寫：鯽魚潭〉，《豐年半月刊》7 卷 21 期（1957），頁 18。
12　陳雪玉，〈臺南縣永康鄉大灣勘考續記〉，《史蹟勘考》5 卷（1977），頁 62-64。; 郭瑞容、蔡祉芬，〈由陳潭界碑談鯽魚潭〉，《史蹟勘考》5 卷（1977），頁 66-67。
13　陳奮雄，〈鯽魚潭之探討〉，《史聯雜誌》17 卷（1990），頁 42-72。

二、比定荷蘭文獻中的鯽魚潭

在荷蘭文獻中尋找鯽魚潭的紀錄，如果只從地名來尋找，找到的不會是臺南永康的鯽魚潭，而是高雄路竹的鯽仔潭。荷蘭檔案上通常將這片水域以閩南語「鯽仔潭」的對音寫作 Zijdathan，又被稱為「桌山下的湖」，但我們不需要比定桌山的位置就可以確定這個鯽仔潭位在今天的高雄市內。1656 年 3 月有個漢人農夫在鯽仔潭的上游截水灌溉自己的農田，導致潭水枯竭，引起當年度蹼港的商人 Zincko 抱怨。熱蘭遮城方面派遣揆一（Frederick Coyett）和 Pieter van Alphen 前往視察。在他們視察返回後臺灣評議會所做的決議中，提到這個湖泊「在南路」（om de zuyt），故可以確定在今天的高雄市境內。[14] 對照清代《臺灣府志》，也有「鯽仔潭，在維新里，闊三百餘步，深丈餘，內產魚」的記載。[15] 不過《熱蘭遮城日誌》漢譯註將這個鯽仔潭比定於阿公店水庫附近，則有商榷的餘地。[16] 參照《臺灣堡圖》，在維新里東境與嘉祥外里和長治一圖里交接處，有一個被標記作濕地的區域，形成三個里的自然界線。[17] 現代的區界與清代已有差異，但此處依然是路竹、阿蓮、岡山三區的交界。《鳳山縣采訪冊》中將這片水域稱為「鯽魚潭（俗呼潭底）」，[18] 歸屬於嘉祥里。現在的潭底里也屬於岡山區，是清代嘉祥外里的一部分。但此處其實是嘉祥外里的西界，過潭就是維新里，因此清末與清初的文獻並不衝突。故將荷蘭文獻中的 Zijdathan 比定於此，應該比阿公店正確。

南路這個鯽仔潭從 1645 年起就出現在蹼港蹼社的清單中，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徵收漁業稅的水域之一（現存出蹼紀錄見表一）。荷蘭在臺灣徵收漁業稅的

14 臺灣評議會 1656 年 4 月 14 日決議，見 Leonard Blusse and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vol. 4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10), 174.

15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696]），頁 45。

16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　第四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頁 31。

17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8 日）。

18 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894]），頁 106。與談人陳奮雄老師指出二十年前他至岡山潭底田調時，注意到當地住家皆設有「半樓」，以防淹水時的財物損失。筆者於 2017 年 11 月訪問岡山區潭底里與北側的阿蓮區玉庫里，亦發現水利署設置的淹水測量尺標，足證此處地勢低窪。

紀錄，最早見於 1640 年。從 1640 年 9 月到次年 2 月，徵收到漁業稅 300 里爾。這個金額與同時期徵收的人頭稅比起來，可說只是零頭而已。從 1644 年下半年開始，港社出賧開始制度化，並在 1645 年擴大規模，確立臺灣西半部稅務承包制度的規模。[19] 但就在臺灣當局透過賧稅制度擴大收入的同時，牧師 Robertus Junius 卻對這樣的政策提出反對意見，他出席在海牙舉行的十七人理事會，向公司總部痛陳臺灣當局的政策對福爾摩沙原住民的剝削，特別是將原住民的鹿場和漁場出賧給漢人，妨礙了他們傳統的生業。未等十七人理事會做出決議，阿姆斯特丹商館就在 1646 年 12 月 3 日函中指示東印度總督應該對 Junius 的意見採取行動。[20] 因此，東印度總督在 1649 年 8 月 5 日函中，要求臺灣當局即刻廢止出賧臺灣的河流與湖泊，命令賧商立即離開，將河流與湖泊還給原住民。除非原住民認為漢人有益於他們，否則不准漢人再進入捕魚。[21] 對於巴達維亞的指示，臺灣評議會在 1650 年 4 月 6 日決議，賧社制度照舊，但對於屬於原住民的內陸水域，則變更制度，使出賧的利益歸於原住民，而且原住民仍然可以自由地去出賧的水域捕魚。[22] 不過這筆來自內陸水域的賧金，對原住民來說可能只是過路財神而已，因為臺灣當局依然對原住民課徵各種罰鍰，但至少原住民從 1650 年以降在名義上取回自由使用內陸漁場的權利。[23]

19 中村孝志，〈荷蘭統治下的臺灣內地諸稅〉，載於《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上）》，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7[1963-64]），頁 266-270。

20 1646 年 12 月 3 日阿姆斯特丹商館理事致東印度總督 Cornelis van der Lijn 函，見 Leonard Blusse and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vol. 3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133.

21 1649 年 8 月 5 日東印度總督 Cornelis van der Lijn 致臺灣議長 Pieter Anthonisz. Overtwater 函，見 ibid., 264.

22 臺灣評議會 1650 年 4 月 6 日決議，見 ibid., 285.

23 臺灣長官 Nicolaes Verburch 致東印度總督 Cornelis van der Lijn 函，見 ibid., 341-342.

表一、《熱蘭遮城日誌》中桌山下的湖泊與藍草園旁的湖泊現存出賧紀錄

出賧日期	標的物	賧金	《熱蘭遮城日誌》中譯本冊頁數
1645-04-28	那座桌山下面的湖裡的漁業	50	第 2 冊，頁 402
	藍草種植區附近那小湖裡的漁業	29	
1646-04-13	桌山下的湖	80	第 2 冊，頁 521
	藍場旁邊的湖，用 3 艘舢舨	25	
1647-04-08	桌山下的湖	80	第 2 冊，頁 621
	藍田附近的湖	25	
1648-04-07	在那桌山下的湖泊	90	第 3 冊，頁 31-32
	藍田旁邊的湖泊	25	
1650-04-18	桌山下稱為鯽仔潭（Zijdatham）的那湖泊，利益歸新港社人	150	第 3 冊，頁 127-128
	Dagouseman 湖，在藍田旁邊，及其附近那個稱為 Doelangh 的小湖泊	200	
1654-04-30	在那桌山下稱為鯽仔潭（Tzijdathan）的湖泊，為新港社人發賧的	100	第 3 冊，頁 325
	藍草園的湖泊 Daganseman 和那小湖泊 Doelang，也是為新港社人發賧的	240	
1655-04-30	那在桌山下面稱為鯽仔潭（Sydathan）的那湖泊，收益也歸新港社人	90	第 3 冊，頁 477
	在那藍田旁邊稱為 Dagunseman 的湖泊，及其附近的小湖 Doelangh，也為新港社人賧售	150	
1656-05-05	在桌山下的那個湖泊	25	第 4 冊，頁 60
	那個靛藍湖 Daganseman 與那個小湖 Doelangh	150	
1657-06-30	那桌山下的湖泊	20	第 4 冊，頁 203
	靛藍湖 Dan Danseman，以及小湖泊 Doelang 的漁場，收入歸新港社居民	110	

賧金單位：八里爾銀幣。筆者製表。

不過臺灣當局對改善原住民的經濟毫無誠意，1650 年的決議只是應付上級指示而已，他們只要找到機會，依然會積極開發財源以增進臺灣商館的收益。1656 年南路鯽仔潭發生上述的截水事件之後，1656 年 4 月 14 日臺灣評議會以多數決議，將鯽仔潭澈枯產生的土地，如同赤崁地區的舊例一樣放領出去，成為私人財產作為耕地使用。決議中也說原住民不可以因為過去賸港的收益歸於原住民，進而覬覦此湖泊乾枯後的田土權利，因為他們擁有的是漁場，不是潭底。[24] 這可說是臺灣當局重視土地農業收益大於漁業的「先聲」。新港社是這個事件中最大的輸家，不只漁場變小，次年從鯽仔潭收到的賸金也大幅降低。荷蘭東印度公司則是最大的贏家，他們透過一個漢人農夫自私自利的截水行動而露出的潭底，就可以順勢將漁業轉為農業，把原本歸原住民的收益納為己有。不過這片土地是否持續可耕，則有討論的餘地。因為清末的《鳳山縣采訪冊》都還在抱怨「自清丈後，錢糧大租均帶甚重，殘不知此洋地勢極卑，若遇秋霖，則洪流氾濫，九空橋上水深丈餘，行人病涉，全洋悉被淹壞矣．此亦附近居民所深患也」，[25] 看來南路的鯽仔潭就算陸化，也並不像個可以穩定生產的田園。

話說回來，前面說的都是南路鳳山縣的鯽仔潭，那清代臺灣縣的鯽魚潭在荷蘭文獻中又該如何比定？筆者認為，荷蘭文獻中「藍草園旁稱為 Dagauseman 的湖泊及其附近稱為 Doulangh 的小湖」，其中一個就是清代臺灣縣的鯽魚潭，而且很有可能就是 Dagauseman。要證明這個比定，首先要找到「藍草園」的位置。荷蘭人從 1641 年起嘗試在臺灣種植印度種的藍草，計畫作為經濟作物，大量生產靛藍染料以供出口，但卻因為強風而屢次失敗，最後只好將公司的藍草園出賸給漢人經營，自己從生產者退回收購者的角色。在 1647 年 9 月的赤崁耕地表中，可以看到藍草園總共 51 morgen，分布在 Amsterdam、Delft、Putmans、Lemaire 四個農區（polder），其中以 Lemaire 農區的 42 morgen 最多。[26] 江樹生推測荷蘭人原先自己

24 臺灣評議會 1656 年 4 月 14 日決議，見 Blusse and Evert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4, 174.

25 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106。

26 "Notitie Van De Landen Alsmede Van De Vruchten Op De Saccamse Velden Gesaeijt, Opgenomen in De Maent September 1647, Als Hieronder Aengewesen Staat. [Tayouan, September 1647]," (VOC 1164 fol. 412).

經營的藍草田就位在 Lemaire 農區。[27]Lemaire 農區的位置，根據 1650 年記載荷蘭語和閩南語雙語地名的赤崁耕地表，可知「Lemaire 農區又名 Siamsiamticke」。翁佳音指出，此處的 Siamsiamticke 很可能是「三舍甲」的誤寫。[28] 三舍（Samsiack）是 1640 年代以降荷蘭臺灣當局倚重的漢人頭家，1648 年出賤的公告曾有貼在三舍家的紀錄，[29] 可見他是溝通荷蘭人與在臺漢人的重要窗口。而且從「舍」這個詞綴可知，三舍的長輩在中國有舉人以上的功名，可見他的社會地位頗高。三舍甲今天的位置在新化區西南，接近大目降社的位置，這並不表示三舍住在這裡，而是他的田地在此，因為不在地地主乃是常態。這塊農區也不會太接近大目降社，而且一定在大目降以南。前者是因為原住民在 1644 年抗議漢人開墾的農地離村社太近，使荷蘭臺灣當局下令漢人只能在村社邊緣以外開墾；[30] 後者則是 1647 年東印度總督的指令，要求臺灣當局不准漢人在大目降以北耕作。[31] 因此可以將大目降設定為比定 Lemaire 農區可能區域的北限。[32] 當然，這並不是說三舍甲就在鯽魚潭旁邊，三舍甲在此的功能，是用來推測 Lemaire 農區的位置在赤崁農區的東北部，但又在大目降以南。

根據以上的考訂，對照 1644 年的赤崁耕地圖（Caerte van Besaeijde Velden aen Saccan），[33] 可以看到全區的東北部有一個水鳥點綴的水池，池邊還有兩小片田園，雖然整張地圖都沒有標示地名，但從對「Lemaire 農區又名 Siamsiamticke（三舍甲）」的考證可知，水池邊的田園就是當時種植藍草的 Lemaire 農區，故該水池就是「藍草園旁稱為 Daganseman 的湖泊」。值得注意的是 1644 年赤崁耕地圖的視角也被清代中葉以前的臺灣輿圖所繼承，所以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將赤崁耕地圖

27 江樹生，《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頁 187。

28 翁佳音，〈舊地名與古地圖〉，載於《臺灣史十一講》，李明珠（編）（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頁 78。

29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　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95。

30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　第二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370。

31 1647 年 5 月 9 日東印度總督 Cornelis van der Lijn 致臺灣議長 Pieter Anthonisz. Overtwater 函，見 Blusse and Evert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3, 179.

32 大目降社人於 1658 年 9 月遷居新港社，見 1659 年 6 月 2 日東印度總督 Joan Maetsuijcker 致臺灣長官 Frederick Coyett 函 Blusse and Evert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4, 401.

33 Jos Gommans and Rob van Diessen, eds.,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l. 7 (Voorburg, the Netherlands: Atlas Maior, 2010), 233.

上的水池比定為清代臺灣縣的鯽魚潭，並將荷蘭文獻中的 Daganseman 與清代的鯽魚潭畫上等號。

但這樣也只找到一個湖而已，那在 Daganseman「附近稱為 Doelangh 的小湖」又該如何比定？這個問題並不難，在鯽魚潭的東側，今日歸仁區的北端有一個叫做「南潭」的地名，地名本身就指出此處曾有湖水。南潭北方不遠處的保西代天府，其建廟傳說中也提到當時神旨擇定之地，平原沃野，一水清泓，[34] 呼應附近「南潭」的地名，指出此處曾有一個水域。但是依照《臺灣堡圖》上的海拔高度資訊，可知南潭的大小不會像鯽魚潭一樣橫跨數公里，面積比鯽魚潭（Daganseman）小得多。依據以上資訊，應該可以有把握地將歸仁區的南潭比定為荷蘭文獻中「稱為 Doelangh 的小湖」。附帶一提，在南潭西南方約八百公尺處，今天陸軍歸仁基地境內有舊地名「菁埔坑」，似乎也遙遙呼應了十七世紀中葉這附近種植藍草的歷史。臺南附近與大菁（藍草）有關的地名，或許也有能直接或間接追溯至荷蘭時代的藍草產業，值得繼續研究。

三、十七世紀中葉開墾鯽魚潭附近的漢人

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此經營藍草的歷史，可知十七世紀中葉已經有漢人進入鯽魚潭一帶進行農業生產。這些漢人是否就此在鯽魚潭畔住下來，則是個有關歷史連續性的議題，值得進一步探討。在〈鯽魚潭之探討〉中，陳奮雄透過田野調查訪談，記錄下鯽魚潭附近許多家族祖先遷居臺灣的年代，其中也有不少將祖先來臺年代繫於永曆年間（1646-1683）。以大灣庄來說，當地的李姓、陳姓、謝姓家族都在永曆年間來臺。[35] 不過永曆年在臺灣的政治上跨越了荷蘭與明鄭兩個政權，這些人當年來到的是荷蘭治下的臺灣，還是如常言所說「跟鄭成功來的」？大灣庄的公廟廣護宮將建廟沿革追溯到 1650 年來臺的商人謝德瑞，然後又接上隨鄭成

34　黃典權，《保西代天府碑誌》，1981，臺南市歸仁區：保西代天府藏。
35　陳奮雄，〈鯽魚潭之探討〉，頁 63-64。

功渡臺的謝德明。[36] 雖然這份建廟沿革所主張的歷史連續性頗有斧鑿痕跡，[37] 但與荷蘭文獻中 1650 年代漢人已經來此從事商業或農業的記載相對照，我們還是可以推斷鯽魚潭畔的大灣庄在十七世紀中葉已有雛型。至於其庄名，則是取於鯽魚潭，蓋當時「灣 /oan」亦可寫作「淵」，在十八世紀以前的閩南語中有「水池」的意思。當時建立大灣庄的漢人，應該就是以鯽魚潭這個明顯的地形特徵作為該地之名。同樣的例子，也可在臺北大安以及高雄仁武的大灣發現，兩者也是瀕臨大水池的庄頭。[38]

除了鄰近鯽魚潭的庄頭，經營赤崁農地東北部，大目降社以南的 Lemaire 農區的漢人頭家也在荷蘭檔案中留下痕跡。首先注意到的是公司的藍草園，前文已經說明大部分都在 Lemaire 農區。在 1650 年漢人頭家 Sinck 承包藍草園，不過他似乎也因為藍草園經營不善而破產，[39] 而且 1652 年之後似乎就沒人願意承包不賺錢的藍草園了。[40]

另一個可以注意的漢人頭家是 Pauw，荷蘭文獻記載他是 1652 年漢人民變首領郭懷一的兄弟。1652 年他不願隨郭懷一起事，並且將此事密告臺灣當局，使熱蘭遮城方面有足夠時間組織攻勢，成功鎮壓事變。[41] 由於在事變中表態正確，Pauw 事後成功與造反的兄弟切割，在 1652 年以後依然是在臺灣重要的漢人頭家。他經營往雞籠淡水的船運，擔任賸商的保證人，也經營農業。[42]1654 年 Pauw 和 Thoqua 在大目降附近擁有農地，原本大目降社不同意他們開墾，但經過臺灣長官介入後，大目降社最終同意 Pauw 等人開墾，理由是他們要開墾的地方位在低濕之處，不特

36 李水草原編，謝壬水增補，《大灣廣護宮史誌》（臺南：大灣廣護宮，2016），頁 7。

37 與談人陳奮雄老師指出，西曆 1650 年建廟的說法為謝壬水參考鄭老櫻的手稿〈大灣建廟記〉的補充所加入，唯此傳說與神話難以視為信史。但大灣廣護宮的建廟年代在此也不是重點。依照荷蘭文獻，仍然可以確定 1650 年代漢人已在日後的大灣庄附近活動。感謝陳奮雄老師提供〈大灣建廟記〉之影本做為參考。

38 簡宏逸，〈重探臺北市內「古亭」和「大安」地名源流：一個跨學科考證的嘗試〉，《文史臺灣學報》4 卷（2012），頁 150-153。

39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之臺灣農業及其獎勵〉，載於《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上）》，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7[1937]），頁 74。

40 江樹生，《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頁 187。

41 Olfert Dapper,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Amsterdam: J. van Meurs, 1670), 38-41.

42 例如 1654 年的出賸紀錄。見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　第三冊》，頁 322-323。

別開墾就無法利用。[43] 由於大目降社與鯽魚潭之間，地勢大致呈東高西低的走勢，故可以推測 Pauw 的農地離鯽魚潭不會太遠。不過 Pauw 雖然在 1652 年漢人事變時切割了兄弟，他卻切割不了國姓。1660 年他和許多在臺漢人頭家一樣被懷疑私通鄭成功，所以財產被臺灣當局扣押，[44] 直到 1661 年國姓攻臺前夕才發還。[45] 但不久以後鄭荷開戰，Pauw 在熱蘭遮城附近的住家被鄭軍挪用，隨即被荷蘭人以大砲破壞。[46] 這是 Pauw 在荷蘭文獻中最後的紀錄。

這位活躍於荷蘭統治時期的漢人頭家 Pauw，似乎被小說家稱作「郭保宇」，但這只是沒有根據的音譯而已。清代方志僅提到郭懷一造反，但被荷蘭人發覺而失敗，連告密的 Pauw 都沒有提到，又怎麼會有他的漢文名字呢？不過筆者在《錦湖郭氏族譜》查到有趣的資料。該族由世員公於洪武年間在漳州府龍溪縣錦湖開基後，傳到第五世太字輩約為十六世紀中葉。其中郭太傑派下，三世之後的第八世有人名曰「邦寧字懷一」，年代與名字都符合 1652 年在臺灣造反的漢人頭家郭懷一。但光是族譜中的一筆記載，證據效力恐怕還是不夠。可是往旁邊一看，邦寧的弟弟名曰「邦補」，「補」的發音與 Pauw 相近，可見這份族譜的資料不是巧合。[47] 再者，這份族譜流傳於澎湖，提供者似乎自認不是太傑派下子孫，為了攀附而「半路認祖宗」的可能性不大。[48]

如果再對照《郭姓源流與十二使祖簡歷》對於錦湖郭氏子孫遷臺的紀錄，會發現太傑派下有多人遷居臺灣，甚至就住在臺南的南潭。[49] 前文已經將南潭比定為藍草園旁的小湖 Doelang，亦即在 Lemaire 農區附近，或許和在此經營的頭家 Pauw 有關。不過在遷臺的紀錄中，並沒有郭邦寧和郭邦補的後代。但這也不難解釋，畢竟郭懷一造反被殺，郭邦補與荷蘭人合作，但在鄭荷之間緊張局勢升高時，將家人送回中國，他們兩人的後代可能早就離開臺灣，甚至根本沒有跟過來。但

43 同前引書，頁 329

44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　第四冊》，頁 380。

45 同前引書，頁 396。

46 同前引書，頁 514-515。

47 澎湖縣文化局藏，《錦湖郭氏家譜》（1975 年郭金標油印 1915 年抄本），頁 14-15。

48 該族譜所記遷居澎湖者為太忠、太臨、太迅、太集等派下子孫。同前引書，頁 4。

49 郭清林編，《郭姓源流與十二使祖簡歷》（臺灣：郭清林，1980），頁 6。猶他家譜學會攝影，微捲編號 1418848 Item 19。網址：https://familysearch.org/search/catalog/1096085（上次檢視：2017 年 6 月 9 日）。

是他們同族的堂兄弟和堂姪，則可能透過族中這兩位在臺灣活躍的頭家，以族緣關係來臺，並且就此生根。附帶一提，除了南潭郭姓，不遠處過港仔郭姓也來自龍溪縣，宗祠中的神主牌也記載「皇清漳州府龍溪縣石美保錦胡社二八都」。[50] 但這一族要如何與《錦湖郭氏族譜》相接，則有待後續研究。

綜觀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鯽魚潭附近，我們可以確認漢人在十七世紀中葉就已經進入鯽魚潭附近墾殖，並且與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對於土地利用迭有糾紛。荷蘭臺灣當局雖然順從上意，將內陸水域出贌的收益轉給原住民，之後也對原住民因農業開墾所失去的獵場有所補償，但荷蘭臺灣當局對維護原住民權益並沒有太大的誠意。1656 年發生在南路鯽仔潭的截水事件中，可以發現臺灣當局無意維護原住民應得的漁場贌金，反而為了更有價值的農業收益，犧牲了原住民從內陸漁場獲得的長久利益。這種重農業而輕漁業的「經營」的方法，可說是清代地方政府成立鯽魚潭租的先聲。

四、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的鯽魚潭

1662 年鄭氏領臺之後，繼承荷蘭建立的出贌社港制度，用同樣的方法來徵稅。不過因為文獻佚失，關於鄭氏統治時期的情況只能從清領初期的文獻窺其一斑。清朝第一任諸羅知縣季麒光，雖然僅管轄一府三縣之一，但從當時他與上級討論臺灣稅餉制度的公牘可知，季麒光所描述與議論的其實是當時一府三縣全體的狀況。前文已經將清代的鯽魚潭比定為荷蘭文獻中藍草園旁的湖泊 Dagauseman，從 1645 年前開始出贌，並從 1650 年前將贌金轉交新港社。在已知清初計畫直接繼承鄭氏的賦稅制度的情況下，可知季麒光在〈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提及「港潭二十七所」就是鄭氏治下出贌的水域。這二十七所港潭並沒有全部被清政府繼承，只剩下二十一所，因為有六所無人承贌，季麒光列為缺額。[51] 從後來高拱乾修撰的《臺灣府志》可知，這些被列為缺額的港餉，最後清政府決定從稅額中剔除。[52] 不過這

50　臺南市歸仁區大廟社區，〈郭家祖祠〉，http://sixstar.moc.gov.tw/blog/damao/knowHowFronListAction.do?method=doReadKnowHow&source=2&knowhowId=2757（檢索日期：2017-06-09）。

51　清 ・ 季麒光，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 ・ 東寧政事集》，頁 162。

52　清 ・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136。

六所被剔除的港潭中並不包括鯽魚潭，可見荷蘭統治時開始在 Dagauseman 徵收的漁業稅，被鄭氏和清朝繼承下來，成為臺灣縣鯽魚潭的水餉。二十世紀初佘英三為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所做的報告中稱「該潭歸民管理，不納官稅」，[53] 恐怕沒有辦法得到清初史料的支持。

鄭氏除了繼承荷蘭建立的收稅標的，出賧的方法也一併繼承。鄭氏時每年陰曆五月在公所叫賧，從高往低喊價，有人應聲則得標，如果沒有人願意承賧，那就不得其稅額。[54] 在這樣的制度下，賧商與賧金都不固定，這已經清楚反映在荷蘭文獻中。但是季麒光等清朝官員到任時，卻面臨中央制度與地方慣習的扞格，以及戰亂後經濟不振與政府控制力降低的問題。首先，清朝的稅額由政府制定，就算由商人承包，每年也要照額繳納，不像之前兩個政權可以依市況調整。再者 1684 年清政府官員抵達臺灣時，早已過了叫賧的時候，而且商人與人民因為戰火而逃亡離散，結果就是當年稅額難以徵收。即使找到商人，商人又說鄭氏的稅額過重，無人願意承包社港，以致季麒光上書建議降低稅額。[55] 以港潭來說，鄭氏時二十七所港潭徵餉 3060 兩，扣掉無人承包的六所之後，季麒光建議二十一所港潭徵餉減少十分之三，共徵銀 1791.216 兩。不過季麒光在〈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中所說的「兩」幾乎都是指「時銀」，一兩時銀值紋銀七錢（0.7 兩）。1694 年的《臺灣府志》中，二十一所港潭徵銀 1253.8512 兩，正好就是季麒光建議額度換算成紋銀的數額，可見季麒光的建議有被朝廷採納，而且相較鄭氏時，餉稅也有相當程度的降低。

清初確立的鯽魚潭港餉額度是紋銀 160 兩，[56] 但臺灣實際流通的是西班牙銀圓。若以一銀圓合六八錢紋銀換算，鯽魚潭餉約為 235 圓（換算數額四捨五入至整數），或可算作同樣數量的八里爾銀幣。雖然這已經是清初調降 30% 之後的稅額，但仍然相當高，可比現存荷蘭時代的出賧紀錄中，藍草園旁兩個湖泊賧金的最高紀錄（1654 年為 240 個八里爾）。荷蘭制度下若無人認賧，賧金就會降低，現存紀錄的最後一年（1657）不過 110 個八里爾，是三年前的一半不到。由此可見季麒光

53　佘英三，《臺南各衙門官租起源沿革款類舊慣調查全冊》。
54　清・季麒光，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頁 161。
55　〈請免二十三年半徵文〉，同前引書，頁 156。
56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137。

所言「紅毛始設賸商，稅額尚輕」，符合時人的感受。但是商人們「咸稱偽額重大，莫肯承認」，也不是推託之詞。[57] 根據以上的計算，我們對沈光文所說「鯽魚潭可饒千金之利」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蓋所謂「千金之利」，其實是建立在鄭氏治下的高額潭餉，利益歸當局所有，代價則透過賸商，間接由在鯽魚潭採捕的漁民承擔。

鯽魚潭所帶的稅額，除了上述的潭餉以外，在鯽魚潭作業的採捕小船也要繳納樑頭餉。[58] 不過清代文獻中並沒有詳細指出鯽魚潭徵收了多少樑頭餉，故我們也無從估計當時漁業的規模。不過 1846 年鯽魚潭租確立之時，招佃給墾的文書上有言「緣此潭本係漁利，徵餉三百五十元」。[59] 這看起來比清初的鯽魚潭餉多了一些，但嘉慶年間的《續修臺灣縣志》仍然記載鯽魚潭餉為 160 兩，可知多出來的部分可能來自採捕小船的樑頭和魚網餉。現已知鯽魚潭餉換算成銀圓約為 235 圓，故可知剩下的 115 圓來自從事漁業的船隻，以六八銀換算約為 78 兩紋銀。因此，在清初制定租稅時，從鯽魚潭可以產生的水餉，應約為 238 兩紋銀，這樣才能和 1847 年古文書所記載的數額對上。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討論的都只是稅額，因為臺灣縣採捕小船的數量從清初以來就沒有變動，這在現實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從稅額去推算漁業規模，恐怕一開始就不會如願。再者，即使政府固定了稅額，自然環境卻持續不斷地變化，特別是鯽魚潭淤積陸化的過程，在整個十八世紀都無聲無息地在水面下進行。淤積會造成鯽魚潭蓄水量減少，在大雨成災之時，溢出的潭水就會波及潭畔的農田，造成嚴重的災害。例如 1772 年至 1774 年解文燧擔任臺灣縣知縣期間，洪水造成鯽魚潭潭水溢出，淹沒周邊長興和廣儲兩里的農田。解文燧捐出養廉來雇工疏導潭水，並且奏請上級，成功為被泥沙掩蓋無法恢復的農田從 1774 年起豁免租賦。解文燧因此得到好名聲，並在縣志中有傳。[60]

57 清 ・ 季麒光，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 ・ 東寧政事集》，頁 161。
58 樑頭是帆船大桅處的橫木，其長度與船身全長大約成一定比例，故可以用樑頭的寬度推估船的大小，作為課稅的依據。
59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附錄參考書　第一卷上》，頁 428。
60 清 ・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ca. 1820]），頁 107。

這次鯽魚潭溢出造成的水災，也顯示鯽魚潭的淤積情況即將浮出水面，以致需要「掀泥掘沙開潭溝」，除去壅塞排水之處來疏導洪水。可是一旦潭面中出現可以開發成農田的浮復地，事情就不是水利工程就可以解決，因為周邊地方勢力會盯上這些新生地，企圖佔為己有，往往會造成利益團體控訴到衙門的現象。就在鯽魚潭北邊不遠處的新港和堤塘在十九世紀初葉從水域變成陸地的過程，就是瞨港的港戶與附近勢力互相爭控的案例。李文良的研究發現，出面承擔稅額一直是清代臺灣控制土地的主要手段，但原本就已經承擔港餉的港戶，官方也承認其對於區域內陸化的水域的優先控制權利。[61]

在鯽魚潭陸化的過程中，文獻並沒有留下承包鯽魚潭餉的港戶的相關紀錄，無從得知他們是否也曾主張陸化水域的控制權。但是從鯽魚潭餉（水餉）轉變為鯽魚潭租（田租）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覬覦鯽魚潭浮復收益的人，其實就是府城裡的臺灣縣衙門。

五、鯽魚潭陸化與鯽魚潭租的成立

要了解鯽魚潭陸化的過程，日本時代土地調查時收集到的 1846 年給墾照是最直接的史料。[62] 從這張給墾照中可知，鯽魚潭陸化的時間點約在 1810 年代，浮復處位在北畔，就是當時鯽魚潭的出水口附近。水域陸化會損害既有的漁業生產，但潭餉並沒有因此減少，所以當時任由農業開發，以新增的農業收入來補貼漁業的工本。不過臺灣縣很快就開始介入鯽魚潭浮復地的農業收益，1820 年姚瑩在任臺灣知縣任內（1819-1820 間），開始向北畔新開農田徵收每年 300 圓的租賦。但這筆錢不是作為正供，而是作為引心書院的膏伙。引心書院由兩位貢生在 1810 年創立，原名引心文社。1813 年臺灣縣知縣與地方仕紳商議，改為引心書院，實質上成為臺灣縣書院。[63] 在 1820 年代的鯽魚潭中，除了陸化浮復地，南畔水域的部分也開始有人種植菱角，收益高達 1000 圓，所以臺灣縣又進一步追加稅賦，使鯽魚

61　李文良，〈清代臺灣的「港戶」及其水域權利：以臺江內海新灣二港為例〉，頁 231。
6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附錄參考書　第一卷上》，頁 428-429。
63　清・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頁 166。臺灣私法繼承佘英三調查，誤作乾隆年間。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第一卷上》，頁 451。

潭負擔巡檢每月 50 圓，每年合計 600 圓的經費。此時，鯽魚潭每年所帶的稅賦，在原有基於漁業的水餉 350 圓之外，還有來自農業收益的 900 圓。亦即，從 1820 年代以後，鯽魚潭的農業稅賦就已經高於漁業稅賦，而且農業稅賦還不必上繳布政使，而是作為臺灣縣內官署支用的外款。[64] 這使得臺灣縣在鯽魚潭的角色，從原本應該中立的管轄者變成了利益交關的經營者。

但就在鯽魚潭的農業收益開始為臺灣縣所運用之後不久，鯽魚潭遭遇了歷史上最大一次的環境變化。鯽魚潭原本的出水口在北邊，潭水北流匯入鹽水溪再進入臺江。前文提到北畔在 1810 年代就已經有浮復地被開闢為農地。到了 1823、1824 年間，大風雨帶來的泥沙完全堵塞北流的水路，鯽魚潭水改道往南流入二層行溪。作為此次水災的善後工作，1825 年臺灣知縣李慎彝捐俸開闢水道疏導潭水。[65] 此時的鯽魚潭的水面尚未完全消失，乾旱時只要捲起褲管就可以涉水而過。1826 年進一步在鯽魚潭中修建三座石橋，次年竣工，作為水漲時跨越水域的孔道。在此同時，鯽魚潭附近的居民也開始將淤淺的水域開發成農田，加速了漁業與農業在鯽魚潭的消長。

其實在鯽魚潭尚未完全陸化的 1820 年代末期，在地也曾有「改潭為田」和「祛田復潭」兩種看法。參與《臺灣采訪冊》修撰事業的曾敦仁特別關注臺灣縣的風水，《臺灣采訪冊》中關於風水的討論皆出自其手。他在 1830 年從風水的角度來討論最近幾年臺灣縣地理環境的變化。對於鯽魚潭的陸化，他批評官方與地方改潭為田的動作，其實只有少數的農業經營者受惠。但是改潭為田破壞龍脈，使得府城商業不振，強盜四起，反而傷害了多數人的利益。解決之道，是恢復即將乾涸的鯽魚潭，讓水流貫通地氣以修復龍身，並且讓鯽魚潭如洪水之前一樣北流入海，如此才能保全府城的龍脈，使官民全都受惠。[66] 但鯽魚潭淤積陸化的自然力量並非人力可以阻擋，臺灣縣作為在地農業經營者的立場，可能也在政策上促進了「改潭為田」的結果。從結果來看，曾敦仁的意見可說完全沒有實現。鯽魚潭的生產方式，從漁業轉變為農業的趨勢，已經無可改變。

64　正款與外款的定義，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第一卷上》，頁 389。
65　清・陳國瑛等著，《臺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ca. 1830]），頁 20。
66　同前引書，頁 26-27。

但由於鯽魚潭尚未完全陸化，仍是水陸交雜的狀態，農業生產的方式也因此分為陸地的田園和水域的菱角兩種。[67] 這兩種農作方式本身就有衝突，因為農地擴張水域縮小，就會妨礙菱角佃的收穫。反之水域擴張農地縮小，陸上的佃戶也一定有怨言。更麻煩的是，潭埔和水域的農業都已經被臺灣縣加上稅額，不只每年都得完納，臺灣縣也因為自己參與經營，而無法成為公正的仲裁者。各方利益互相衝突的情形，在 1840 年水患造成南畔外潭成為荒埔之後，以鯽魚潭菱角佃與潭埔七十二佃戶之間互相爭控的形式爆發，導致農業生產停頓。1845 年鯽魚潭又再遭遇水患，結果不只南畔蔓草叢生，北畔亦變為荒埔，鯽魚潭的農業遭到嚴重的破壞。[68]

同一時間，鯽魚潭附近的社會也動盪不安。1846 年的給墾照提及「洪協倡患，鎮憲駐營潭埔，耕佃流離」，此為 1843 年 10 月間之事。同時期，鯽魚潭所屬的臺灣縣東鄉，亦發生武生郭光侯 [69] 等地方仕紳帶頭抗繳稅賦的事件。這些事件加上 1840 年和 1845 年的水患，嚴重破壞了鯽魚潭的農業生產，原本承擔稅賦的董事吳邦淵也無力開墾，只得把問題交回臺灣縣處理，改由陳組聲擔任鯽魚潭董事，確立了未來鯽魚潭租的規則。關於郭光侯抗租案與洪協事變的始末，陳捷先已經做過詳細的討論。[70] 以下將根據陳捷先大量引用的〈大學士穆彰阿等覆奏審擬郭洸侯一案供情摺〉與陳氏之論文，對鯽魚潭租成立的關鍵年代，即 1840 年到 1845 年間，鯽魚潭附近的的社會動亂在此略作交代，以供參考。[71]

1840 年清朝與英國之間爆發鴉片戰爭，臺灣當局為了籌辦防務，於 1841 年向地方募集資金來組織鄉勇。此時又值穀賤銀貴，應地方要求，臺灣知縣閻炘上書臺灣道姚瑩同意當年度臺灣縣的正供的折色，從每 10 石 22 圓降為 20 圓，次年恢

67 菱角為被課稅的水生植物。但陳奮雄老師也指出鯽魚潭最晚到 1960 年代都還出產水生的蘭草，可以用來編織草蓆。宋義祥、鍾和邦，《仁德鄉志》（臺南：臺南縣仁德鄉公所，1994），頁 1080-1081。一樣地勢低窪的高雄鯽仔潭，在日本時代也發展出蘭草產業。郭秋美，〈臺灣堡圖之岡山鎮舊地名研究〉，《高縣文獻》24 卷（2005），頁 83。

68 見 1846 給墾照。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附錄參考書　第一卷上》，頁 428。

69 〈大學士穆彰阿等覆奏審擬郭洸侯一案供情摺〉作「郭洸侯」。此處依過港仔郭姓祖祠正廳的表記作「郭光侯」。

70 陳捷先，〈道光壬寅臺灣縣民抗糧案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3 卷（1976），頁 197-220。

7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3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148-159。

復原價。但是 1842 年臺灣縣東鄉以郭光侯和劉取[72]為首，不願意以原價折色繳納正供，堅持用前一年每 10 石 20 圓的價格繳納。臺灣縣派遣糧差李捷升前往勸說。和李捷升一起去的是麻煩人物許東燦。他也當過糧差，卸任後又捐官為同知以利出入衙門，對外宣稱可以幫忙打點官司，結果因此被革斥。這兩位官方代表與東鄉仕紳在彌陀寺會議，郭光侯等人堅持以 20 圓折色完納，不肯退讓。許東燦一氣之下就說「既不遵依，儘可完穀！」沒想到郭光侯等人真的照辦，找了鄉民數百人將正供的稻穀載去縣倉外堆放。臺灣縣以稻穀不乾淨，難以收存，加上其它三鄉都折銀繳納，不能只讓東鄉繳納本色，拒收郭光侯等人運來繳稅的稻穀。官民雙方僵持不下，就這樣把事情拖到 1843 年秋天。

1843 年 10 月 10 日，[73]洪協聚集遊民，在臺灣府城北門外木柵殺害塘兵，起事造反。次日洪協帶百餘人到保西代天府，強逼廟祝郭域水去過港仔郭家勸誘郭光侯入夥。郭光侯說他與官府對抗只為了正供折色的價格，絕不是謀反，令人立刻鳴鑼趕走洪協。另一方面，官軍也擔心郭光侯被煽動造反，所以在 13、14 兩日都派人去找郭光侯，要他處理拖延近一年的抗稅問題，但是郭光侯仍不出面。14 日洪協的手下林孕被官兵捕獲，臺灣知縣王德潤問他郭光侯有沒有入夥。林孕先說郭光侯拒絕加入，但王德潤覺得林孕支吾其詞，刑求後林孕翻供，改稱郭光侯已經應允入夥。得到供詞後，16 日林孕就被處斬，官兵則依照林孕的供詞搜捕郭光侯，焚毀庄內房屋。被誣陷的郭光侯先逃到香洋仔庄（關廟區），再逃入山內，並且起意進京控訴其冤情。

1844 年 8 月 25 日，浙江道監察御史陳慶鏞獲京師晉江館報信，說有可疑人士到館住宿。陳慶鏞前往查看，該人堅持不透露身分，正好他的晉江同鄉武官兩人來到，認出那個可疑人士就是通緝中的臺灣武生郭光侯。[74]郭光侯把握機會陳訴冤情，促使官方重新調查，結果知縣王德潤以誣告議處，前任知縣閻炘也因沒有妥善處理正供折色，又拒收本色稻穀，導致事情無法了結，也交部議處，飭令回省。

72 與談人陳奮雄老師提供資訊：劉取於抗租事件後逃到高雄茄濃定居，其子劉和參與 1896 年乙未之役，其孫劉球參與 1915 年噍吧哖事件，皆為抗日人士。亦見陳奮雄，《臺南縣永康鄉大灣劉姓宗譜》（臺南：宏大，1989），頁 26-35。

73 月日為舊曆。為避免混亂，此處月日不換算為新曆日期。

74 1844 年陳慶鏞〈盤獲臺灣逆首疏〉。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經世文編選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76-78。

至於郭光侯，雖然洗清自己的冤情，卻也因為抗租之事被流放新疆。不過在地方上，郭光侯領導降低折色額度的事蹟，仍然被當作義舉來紀念，現在過港仔郭姓祖厝所供奉的，就是地方的英雄郭光侯。

六、鯽魚潭租成定制

經過 1840 年至 1845 年間的戰亂與水患之後，鯽魚潭的地理環境與農業生產者都被「重設」過一遍，回到必須重新開墾農地的狀況，原本農田佃戶與菱角佃戶之間的官司大概也因此不了了之。不過 1845 年的水患似乎給逐漸縮小的鯽魚潭最後一擊，因為 1846 年的給墾照中並沒有提到水域或菱角等水生植物。此時的鯽魚潭可能已經全面陸化，或是水域範圍縮小到不需要特別一提的程度。不過原本鯽魚潭的 350 圓水餉，以及菱角收穫產生的 600 圓巡司月費，並沒有因為潭水消失而免除。過去漁業與農業產生的稅額合計 1250 圓，在 1846 年以後全由陳組聲招佃重新開墾的鯽魚潭埔承擔。此時確立的制度中，鯽魚潭董事提供開闢田園的資金每甲 9 圓，剩餘工本則由佃戶自己負擔。收成董事則與佃戶均分，應交給官方的鯽魚潭租則由董事負責繳納。至於潭租原來包含的正款水餉與外款經費，給墾照中並沒有詳細交代如何處理，但應該是統一交給臺灣縣處理，正款繳布政使，外款照額度分配給巡檢司署和引心書院（1886 年後歸蓬壺書院）。

不過鯽魚潭租的額度在此之後依然呈現上漲趨勢。上漲的動力可能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臺灣縣和臺灣道持續利用鯽魚潭產生的租稅來支應巡檢司署的經費，另一個則是賸辦鯽魚潭租的董事牟取自利的動機，因為扣掉上繳的潭租和經營成本，餘下的淨利皆歸他所有。在這兩個動力的助長下，1860 年前後（咸豐末年）李秋水成為鯽魚潭董事，鯽魚潭租上漲為每年 1600 圓。同治年間（1862-1874），主管鯽魚潭租的單位從臺灣縣變成臺灣道，並且制定鯽魚潭董事四年任期，每四年要重新向道臺衙門稟請換戳。[75] 移管的時間沒有明記，但可推算是在 1864、1868、1872 這三年之一，因為 1891 年生員王承暉代表的王輝記向臺灣道申請續辦 1892 年正月到 1895 年底的鯽魚潭租，故可以從 1892 年往前推算。在 1892 年起這一期，

7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第一卷上》，頁 452。

王承暉要負擔的鯽魚潭租是 1676 圓，又比三十年前李秋水承辦時上漲了一些。[76] 不過對臺灣道來說，鯽魚潭租仍然有很大的壓榨空間，因為鯽魚潭的收穫雖然會因每年農況而變動，但平常都有五千元之譜，凶歲時也不會低於四千圓。對有意賸辦官租來賺錢的人來說，鯽魚潭租是塊收益頗高的肥肉。[77]

臺灣縣和臺灣道透過提高鯽魚潭租來支應巡檢司署經費的動作，也值得進一步分析，因為從 1891 年的賸辦申請中可以發現，巡司月費這款比十九世紀初葉成長頗多，從每年 600 圓變成每年 960 圓。臺灣縣轄下有兩個巡檢，一個是 1789 年設立的羅漢門巡檢，另一個是 1834 年歸臺灣、嘉義兩縣共轄的大武壠巡檢。依照《安平縣雜記》的資料，鯽魚潭賸戶負擔大武壠巡檢每月 30 圓，即每年 360 圓的經費。[78] 羅漢門巡檢的細節沒有交代，但從 1891 年文書中所說的 960 圓減去 360 圓，可以算出每月 50 圓，每年 600 圓的經費。前文提及巡司月費是在 1820 年代因種植菱角而開徵的賦稅，此時大武壠巡檢尚未歸臺灣縣共管。[79] 由此可以推測 1820 年代新增的巡司月費是給羅漢門巡檢使用的。之後在十九世紀後半的某個時間點，大武壠巡檢的費用也從鯽魚潭提撥，鯽魚潭租中的巡司月費就從 600 圓變成 960 圓了。不過在 1888 年清丈之後，鯽魚潭租的結構與性質有了重大變化，這也反映在 1891 年王承暉申請繼續賸辦的文書中。

1888 年清丈帶來的第一個重大改變，就是從十七世紀繼承下來的鯽魚潭水餉 350 圓正式廢除，畢竟潭水在 1840 年代就已經消失得差不多了。[80] 清丈所得 288 餘甲的潭埔田園，從間接負擔的水餉，改為直接加諸於上的正供 480 餘兩，換算成銀圓大約是 710 圓左右。用來支付正供的是原本的巡司月費每年 960 圓，足足有餘，不過史料上並沒有記載餘款的去向。可是在正供以外，鯽魚潭原本負擔的引心 / 蓬

7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附錄參考書　第一卷上》，頁 428。
77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第一卷上》，頁 452。
7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ca. 1895]），頁 99。
79　大武壠巡檢由臺灣嘉義兩縣共管之事，1834 年由閩浙總督程祖洛提出清 ・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1867]）。共管之事於 1837 年起實施，見清實錄道光 17 年 8 月 24 日，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1865448-0086700867.txt〉。
8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頁 100。

壺書院膏伙並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從原本的 300 圓增加為 650 圓，估計是把省下來的水餉直接轉給書院膏伙了。此外還有紙札經費 66 圓，《臺灣私法》誤解作董事辦公經費，[81] 其實這是給臺灣道的辦公經費。1890 臺灣道唐景崧鑒於清丈之後衙門辦公經費全遭刪除，要求屬下各地方官員參考清丈前的規定，盡速籌出衙門辦公經費。[82] 所謂的「紙札經費」，應該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此經費與正供、膏伙合計，清治末年的鯽魚潭租是 1676 圓。結果清丈並沒有減低租稅負擔，而且在董事賧辦中介之下，鯽魚潭佃戶的負擔遠比鯽魚潭租還多。

1895 年清朝割讓臺灣給日本，次年新成立的地方政府就開始接管清代的官租。從安平縣接管鯽魚潭租的單位是臺南縣。為了理解這些官租的性質，臺南縣知事隨即開始調查舊慣賦稅制度、官租位置、佃戶、稅額等資訊，以便順利接管。這些保存在舊臺南縣公文類纂中的資料，對鯽魚潭租的早期歷史並不準確，經考證後就會發現許多的問題，卻也可說是鯽魚潭研究的先驅。

回到鯽魚潭租。日本新成立的地方政府雖然對接管的清代官租採取「照舊慣」的方式處理，在鯽魚潭租上面卻有一個重大改革：廢除董事。從 1896 年起，鯽魚潭租改由各佃戶自行繳納，每年政府所得約一千三百餘圓。[83] 但日本時代收的是日本銀貨，以 1 圓臺灣通行洋銀比 1.04584 圓日本銀貨換算，大約在 1243 圓到 1338 圓洋銀的範圍內。相較於過去董事經手時，估計高達四、五千圓的租額，日本新政府可說大大減輕鯽魚潭佃戶的負擔。

不過好景不常，臺南縣似乎在「搞懂」舊慣如何運作後，大約在 1899 年間將 1900 年度的鯽魚潭租以每年 2100 圓的價格賧給臺南地方仕紳王球仙，然後王球仙就依照清代慣例，以加上一倍的租額向鯽魚潭佃戶徵收租金。因為過去四年度在新政府下，鯽魚潭佃戶已經習慣較清代大幅減輕的稅額，王球仙在新時代依照舊慣收租的動作引來鯽魚潭佃戶極大的反彈，抗繳潭租，向臺南縣知事陳情，要求解除王球仙賧辦鯽魚潭租。王球仙一方面請人先墊付 1900 年度潭租，一面向臺南辦務署請求民事調解，但雙方從 1900 年 7 月爭執到 1901 年 8 月，調停數十次都

8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第一卷上》，頁 452。
8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頁 199-202。
83　同前引處。

沒有結論。1901 年 9 月 9 日剛上任不久的代理辦務署長畑弘出面處理，最後協調賸戶與佃戶雙方意見，訂下處理僵局的契約。契約內容有三點：

1. 李軒等 512 名鯽魚潭佃戶同意 1900 年以降五年，每年租額 2100 圓。佃戶應支付給王球仙已繳納的 1900 年度租額，期限為 1901 年 9 月 30 日。
2. 1901 年度以下四年租額，每年 2100 圓，由李軒收齊，在繳交官租期間轉給王球仙，遲交每月增加 5% 利息。
3. 1900 年永康上中里已經繳納給王球仙的租額不需退還。[84]

這是個各方皆能接受的協議。就臺南縣來說，確保了每年 2100 圓的鯽魚潭租。對佃戶來說，2100 圓約合 2008 圓洋銀，雖然比過去幾年多，但比清代仍然降低不少。看起來白忙一場的王球仙則不需退還已經收到的租額。這似乎是以實物繳納的，因為佃戶認為該租額價值一千圓，王球仙認為只有四五百圓，兩者對租額的價值有所爭論。但不論價值多寡，王球仙至少得到了五年分的辛勞銀，也不算空手而回。[85]

表二、1685 年至 1900 年間鯽魚潭稅額

年代	鯽魚潭稅額	稅額內容
1685 年	350 圓（估計）	鯽魚潭餉 235 圓、樑頭餉 115 圓（估計）
1820 年	650 圓	水餉 350 圓、引心書院膏伙 300 圓
1820 年代	1250 圓	水餉 350 圓、引心書院膏伙 300 圓、巡司月費 600 圓
1846 年	1250 圓	水餉 350 圓、引心書院膏伙 300 圓、巡司月費 600 圓
1860 年前後	1600 圓	水餉 350 圓、引心書院膏伙 300 圓、巡司月費 950 圓
1888 年清丈	1676 圓	正供 710 圓、膏伙 650 圓、紙札經費 66 圓、不明 250 圓
1896 以降數年	1243-1338 圓間	佃戶各自繳納租額
1900	2008 圓	佃戶代表收齊租額上繳

單位：洋銀（銀兩以六八銀折算，1 洋銀合 1.04584 日本銀圓，四捨五入至整數）
筆者製表

84 〈臺南縣鯽魚潭租地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9 月 17 日，版 2。漢文版見

85 本文初稿誤將李軒比定為蔴豆堡崁仔庄的保正，經與談人陳奮雄老師提醒此人僅為同名同姓之人物。代表鯽魚潭租戶的李軒是大灣當地人，1863 年生，1927 年卒，住在大灣庄東灣里（俗稱後壁李），為大灣庄頗富聲望之人，故被推舉為代表。以上資訊感謝陳奮雄老師提供。

七、結語

翁佳音指出，臺灣史研究常因為文獻語言的種類，而被研究者便宜地分類為幾個「時代」，但其中的連續性卻容易被人忽略。[86] 本研究以臺南府城東邊鯽魚潭的租稅歷史為考察對象，嘗試從荷蘭檔案中尋出鯽魚潭漁業稅的源頭，以及這筆稅收如何被後續的政權繼承、改造，甚至到了鯽魚潭全面陸化的時期，名目上的漁業稅仍然存在了一段時間，直到清末劉銘傳清丈後才消滅。但是稅目的存廢與稅額沒有連動，在這片被覬覦的潭水、土地上生產的人民，在董事中介稅收的習慣下，承擔了比稅額更重的租賦。從歷史連續性的角度來看，鯽魚潭的稅額和人民負擔，從十七世紀有紀錄以來就呈上升趨勢，成為府城署衙的小金庫，以及有力人士覬覦競逐的肥肉。但是相較於附近從臺江內海陸化的新港和堤塘，因為浮復地產生過複雜民事爭訟，鯽魚潭的情況相對單純。這可能是因為鯽魚潭一直是府城署衙囊中物的緣故。作為官租，我們也有相對較多的資料來研究租稅的內容與變遷過程。

除了鯽魚潭的租稅制度，本研究也處理了鯽魚潭周邊人群的活動歷史，並且隱約指出了鯽魚潭附近的世居大族在歷史上的連續性。但這一方面的連續性涉及了歷史記憶與認同的複雜議題，我作為一個外人，在此應做的工作僅止於指出文獻，提出可能性，不敢對地方的集體記憶越俎代庖。這也算是種專業的矜持。

86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板橋：稻鄉出版社，2008），頁 233。

引用書目

Blusse, Leonard, and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Vol. 3.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Vol. 4.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10.

Dapper, Olfert.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Amsterdam: J. van Meurs, 1670.

Gommans, Jos, and Rob van Diessen, eds.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l. 7. Voorburg, the Netherlands: Atlas Maior, 2010.

"Notitie Van De Landen Alsmede Van De Vruchten Op De Saccamse Velden Gesaeijt,
Opgenomen in De Maent September 1647, Als Hieronder Aengewesen Staat. [Tayouan, September 1647]." VOC 1164 fol. 412.

清・丁曰健
《治臺必告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1867]）。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中村孝志
〈荷蘭時代之臺灣農業及其獎勵〉，收入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上）》，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7[1937]，頁 43-80。
〈荷蘭統治下的臺灣內地諸稅〉，收入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上）》，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7[1963-64]，頁 259-320。

江樹生
《檔案敘事：早期臺灣史研究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

江樹生譯
《熱蘭遮城日誌　第二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
《熱蘭遮城日誌　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
《熱蘭遮城日誌　第四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

佘英三
《臺南各衙門官租起源沿革款類舊慣調查全冊》，1903，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藏。

宋義祥、鍾和邦
《仁德鄉志》，臺南：臺南縣仁德鄉公所，1994。

李文良
〈清代臺灣的「港戶」及其水域權利：以臺江內海新灣二港為例〉，《臺大歷史學報》54 卷，2014，頁 211-246。

李水草原編，謝壬水增補
《大灣廣護宮史誌》，臺南：大灣廣護宮，2016。

良惡
〈風土特寫：鯽魚潭〉，《豐年半月刊》7 卷 21 期，1957，頁 18。

清・范咸
《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1747]）。

翁佳音
〈舊地名與古地圖〉，收入李明珠編，《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頁 70-85。
《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板橋：稻鄉出版社，2008。

清・高拱乾
《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696]）。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1865448-0086700867.txt〉。

清・季麒光，李祖基點校
《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1694]。

郭秋美
〈臺灣堡圖之岡山鎮舊地名研究〉，《高縣文獻》24 卷，2005，頁 71-127。

郭清林編
《郭姓源流與十二使祖簡歷》（臺灣：郭清林，1980）。

郭瑞容、蔡祉芬
〈由陳潭界碑談鯽魚潭〉，《史蹟勘考》5 卷，1977，頁 66-67。

清・陳國瑛等著
《臺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ca. 1830]）。

陳捷先
〈道光壬寅臺灣縣民抗糧案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3 卷，1976，頁 197-220。

陳雪玉
〈臺南縣永康鄉大灣勘考續記〉，《史蹟勘考》5 卷，1977，頁 62-64。

陳奮雄
《臺南縣永康鄉大灣劉姓宗譜》，臺南：宏大，1989。
〈鯽魚潭之探討〉，《史聯雜誌》17 卷，1990，頁 42-72。

黃典權
《保西代天府碑誌》，1981，臺南市歸仁區：保西代天府藏。

臺南市歸仁區大廟社區
〈郭家祖祠〉，http://sixstar.moc.gov.tw/blog/damao/knowHowFronListAction.do?method=doReadKnowHow&source=2&knowhowId=2757。
〈臺南縣鯽魚潭租地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9 月 17 日，版 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安平縣雜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ca. 1895]）。
《清經世文編選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臺案彙錄甲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3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7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
《澎湖臺灣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
官租區分方臺南縣伺ニ對スル通達，138-31，頁 2-5.

澎湖縣文化局藏
《錦湖郭氏家譜》，1975 年郭金標油印 1915 年抄本。
〈蔴荳製糖會社之進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904 年 5 月 24 日，版 3。

清・盧德嘉
《鳳山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894]）。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臺灣土地慣行一斑　第貳編》，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 局，190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臺灣私法　附錄參考書　第一卷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
《臺灣私法　第一卷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

清・謝金鑾、鄭兼才
《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ca. 1820]）。

簡宏逸
〈重探臺北市內「古亭」和「大安」地名源流：一個跨學科考證的嘗試〉，《文史臺灣學報》4 卷，2012，頁 133-166。

大神吃小神：談鄭成功封神

葉春榮[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列子・說符）

一、神明標準化

美國人類學家 James Watson 1970 年代到香港做研究，他綜合他對宗教的研究提出「神明標準化」的說法（1985）；對香港人喪葬儀式的研究，提出「儀式標準化」的說法（1988：3）。他的兩個標準化的說法貌似並不相同，實際上都是在討論漢文化趨於統一的問題。本文要討論的是神明標準化的說法，因此就不擴及儀式標準化、文化統一等議題。

Watson 的研究主要在新界廈村一帶。他說位於深圳灣岸邊的沙江天后宮，原來是水上人（蜑民）奉祀沙江媽的小祠。沙江媽其實是水上人從水裡網上來的一塊圓錐形石頭（cone-shaped stone），水上人在岸邊建一小祠來供奉這塊石頭，稱之為沙江媽。居住在較內陸的廈村鄧姓農民家族比蜑民晚到該地，鄧家人本來也不拜沙江媽。

1 本文之萌芽，最先得到蔡相輝教授之啟發，在研討會宣讀時得到評論人戴文鋒教授，以及與會的鄭道聰先生、陳奮雄教授惠賜寶貴意見，特此感謝。在寫作期間得到王松濤先生（延平郡王祠心同敬神明會、六合境大埔福德祠主委）的幫忙，特此申謝。

康熙元年，清廷為了斷絕東南沿海百姓跟鄭成成勢力的來往而下禁海令。康熙八年（1669），清廷認為禁海令已收效因而允許復界。鄧家在復界後，把原來的沙江媽改建為天后宮，新的天后宮把原來代表沙江媽的那塊石頭做為天后的底座，當地人說沙江媽被天后「吃」了（Watson 1985:310）。Watson 在香港田野工作期間共看到七個這種大神取代小神的例子。

Watson 對於廈村人以天后取代沙江媽的解釋是，因為朝廷推動某些勅封神明的信仰，而廈村的仕紳為了表示對朝廷的順從，也表示自己的文明開化，因而配合朝廷的政策祭拜媽祖，這樣的結果使得越來越多的大神取代小神，顯示宗教的統一，也就是文化趨於統一，他稱之為神明標準化。

筆者不同意 Watson 的說法，曾以台灣及香港的例子來反駁（葉 2014）。Watson 認為朝廷有目的、有政策的推動媽祖信仰，好像朝廷是個理性的行動者（rational actor）。筆者不認為朝廷有推動媽祖信仰的政策，但不否定地方仕紳的行動（或配合）。假如推動媽祖信仰是朝廷的政策，那何以 1720 年陳文達的《臺灣縣志》所載的 60 所台南廟宇裡，媽祖廟只有三座？何以施琅在平定台灣後奏請加封天妃卻被禮部、康熙否決？

筆者不否認漢人社會裡存在著媽祖或其他大神吃小神的現象，但是說這種現象反映出文化的統一，筆者覺得推論太過。而且封神之事並不是他想像的那樣有個簡潔的公式：地方仕紳配合朝廷政策。本文以鄭成功封神的例子來討論 Watson 的說法。筆者發現在歷史的過程裡，台灣有些奉祀鄭成功的宮廟確有以鄭成功取代其他神明之事，但鄭成功被封為神並取代其他小神，則與朝廷政策、文化統一無關，並不是出於政府的推動或仕紳的配合，因此 Watson 的說法不能讓人信服。

晚近以來，台南地方有些奉祀王爺的宮廟被學者說奉祀的是鄭成功，也就是說神是不是自己、神能不能坐在那個位子上、神的命運，居然由學者說了算，因為某宮廟請某甲學者來研究就說是鄭成功；請某乙學者來研究就說不是鄭成功，神的命運居然完全由運氣決定。

此外，此處要附帶說明的是本文題為「大神吃小神」並非完全合適。大灣二王廟原來奉祀關聖帝君，後來改祀鄭成功父子，說關聖是小神並不恰當。再說，鄭成功雖然在清朝已受到光緒皇帝勅封，儼然成為大神，然而實際上光緒皇帝雖

說是同意追贈他謚號「忠節」及建祠，嚴格說來並非封神，因為建祠跟封神仍有差別。而且鄭成功的神格在民間仍有不同的看法，台灣固然有許多鄭成功廟，但台南天壇在偏殿的樓上後殿把鄭成功跟土地公供奉在一起，顯示他們認為鄭成功的神格只跟土地公相當；台南民權路北極殿在正殿後方的虎邊偏殿裡把鄭成功當成地基主，跟土地公供奉在一起，廟方總幹事許育騰先生說北極殿成立於明鄭時代，鄭成功作為臺灣的奠基者，而且「地」跟鄭在閩南話發音相近，因此他們是「明拜地基主，暗拜鄭成功」。實際上北極殿的土地公跟地基主（即鄭成功）都固定在農曆 8 月 15 中秋節一同祭拜，[2] 然而農曆 8 月 15 日是民間祭拜土地公的日子，顯示作為地基主的鄭成功連自己的生日都沒有，比土地公的地位都不如。天壇、北極殿都是台南有名的大廟、老廟，但鄭成功在那裡只能被列為地位不高的小神、地基主。地基主在台灣是只有年節才會拜的無名小神，跟許多小神一樣連名字、生日都沒有。土地公、註生娘娘雖然沒有名字但至少還有神像，而地基主跟床母、大眾爺一樣，既沒有神像更沒有名字、生日。北極殿的地基主算是例外，不但有名字（鄭成功），有神像，而且神像還戴王爺帽。

二、鄭成功爭議

鄭成功去世至今已經三百多年，三百多年來有關鄭成功許許多多的事蹟多半都爭議不斷，很少是可以肯定、沒有爭議的。譬如鄭成功的模樣，有人認為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的畫像（蓄短鬚著明服）較為接近，有人主張福建惠安石井鄉鄭氏祖祠的畫像（無鬚、幘而不冠，較圓潤）較為可靠。鄭成功的登陸地點到底是土城還是顯宮，雙方從半個世紀以前就爭吵到現在，仍然沒有結果。鄭成功上岸的禾寮港到底在現在的三老爺宮一帶，還是在永康洲仔尾？鄭成功寫給何斌的「禮樂衣冠第…」墨寶居然鬧出三包案（中華日報 1958 年 8 月 8 日），到底其墨寶是真是假？鄭成功受降地點在哪裡？鄭成功的墓是在永康洲仔尾的什麼地方？鄭成功之孫到底將鄭成功之屍骨葬在福建省泉州南安市水頭鎮康店村，還是河南固始（徐宗懋 2003）？順治皇帝是不是在廈門被鄭成功以大砲轟斃（聯合報 2004 年 4 月

2 本來把土地公跟地基主（即鄭成功）供奉在一起，前年（2016）廟方覺得一個神龕上供奉偶數尊的神明不妥，因而把原來供奉在後殿的陳璸請過來。

24 日；陳洋 2007: 22-24）？鄭成功個性如何，日本人說他具有「大和民族特有的武士道精神」（高致華 2006: 61-2），西方人卻看他是海盜、暴君（tyrant）、兇殘（cruelty）、嗜血的（bloodthirsty）、殘忍的（brutal）等等（Croizier 1977:28-31；江仁傑 2006:150-5）。本文要討論的鄭成功封神一事，只是眾多爭議之一而已。

三、鄭成功封神

本文要討論鄭成功封神之事，這也是件爭議不斷的歷史公案。底下筆者擬由台南幾間與奉祀鄭成功有關的宮廟來討論鄭成功封神之事。

（一）開山王廟：陳稜與鄭成功

鄭成功在 1662 年去世，隔年鄭經就在承天府寧南坊建「延平王廟」奉祀鄭成功及祖先（林衡道 1979：175）。雖然稱為廟，其實是閩南人家廟、宗祠的性質，並不是把鄭成功封為神，而只是祖先。「延平王廟」就是現在的鄭成功祖廟，但那是鄭家人祭拜祖先的地方，與此處討論的開山王廟無關。

（1）明清時期

一般認為台南最早把鄭成功當成神來祭拜的廟是開山王廟。開山王廟最早見於康熙 33 年（1694）高拱乾《臺灣府志》的記載：「開山王廟，在附郭縣東安坊」（高拱乾 1960:220）。康熙末期陳文達的《臺灣縣志》說：「開山王廟，偽時建。」（1968:208），這裡指出開山王廟建於明季，也就是鄭氏家族統治臺灣的時期，但並沒有說廟裡奉祀的是誰。在這之後，乾隆 17 年（1752）王必昌的《重修臺灣縣志》記載：

> 將軍廟：在澎湖將軍澳，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舊有此廟，因以名澳。豈隋開皇中，遣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
>
> 又舊志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圮；長興里有王公廟，俱偽時所建。茲查各坊里社廟，以王公大人稱者甚夥：東安坊則山川臺、坑仔底，西定坊則王宮港、草仔磚、海防署前，寧南坊則馬兵營、打石街，鎮北坊則普濟殿、三老爺宮、以及安平鎮、青鯤身、北線尾、喜樹仔、永豐里、紅毛寮、

> 中路、南潭等處，廟宇大小不一，概號曰代天府．神像俱雄而毅；或黝、或赭、或白而晳；詰其姓名，莫有知者。（王必昌 1961:182）

這裡王必昌猜測澎湖的將軍廟可能是隋朝的陳稜，是因為康熙 23 年（1684）的《福建通志》就提到澎湖將軍澳的將軍：「在將軍澳，神之事蹟莫考，自有澎湖即有此澳，故澳亦自以為名」（引自蔡相煇 1989:35）。[3] 因為不知道將軍澳的將軍是誰，因此王必昌猜測說難道是隋朝的陳稜嗎？沒想到王必昌這段話在半個世紀後，他猜測的陳稜已被搬遷到臺灣，1807 年謝金鑾、鄭兼才的《續修臺灣縣志》同樣沿用：

> 開山王廟：在東安坊，舊圮，乾隆年間邑人何燦鳩建。邑又有稱王公廟、大人廟、三老爺廟者，不知何神，或云皆即澎湖將軍澳之神也。「舊志」云：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豈隋開皇中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謝金鑾、鄭兼才 1961：341）。

由上面所引的文字可以知道，台灣早期的志書都沒有說開山王是誰，1752 年王必昌猜測澎湖的將軍廟是隋朝的陳稜，然後 1807 年謝金鑾、鄭兼才的《續修臺灣縣志》，更進一步把陳稜從澎湖搬到台南，說台南的開山王廟、大人廟、三老爺廟也都可能是、難道是陳稜了（謝金鑾、鄭兼才 1961：341）。

這樣的說法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譬如光緒 19 年（1893），臺南出身的進士施士洁在「臺灣雜感」詩中寫道:「墾荒蹟紀開山廟」，詩後附記說:「相傳隋虎賁陳稜略地至此，鄭氏因建『開山王廟』以祀之」（1965:54-5）。這裡說傳說開山王指的是陳稜，而且是鄭氏所建。日本時代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更有文章說：「開山王廟乃祀陳稜，非祀今之鄭成功也。相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鄉鄰父老至今猶盛稱之，曰開山王」（1909 年 9 月 26 日，第 1 版）。[4] 這兩則記載明白的說開山王廟裡的開山王指的是陳稜，而非鄭成功。這兩則記載指的顯然

3 此處蔡相煇原文說引自康熙二十五年《福建通志》卷 11〈祀典〉附澎湖祠廟條，筆者查閱康熙年間金鋐主修之《福建通志》卷 11 祀典（金鋐 1988：1466-93），並無附澎湖祠廟條。

4 引自陳麗華 2013: 9。

是奉祀陳稜的開山宮，但卻把開山宮稱為開山王廟。[5] 筆者認為這些紛擾的起源來自混淆不清的記載，西定坊有個奉祀陳稜的開山宮（今之民生路巷子裡），東安坊有個開山王廟，而方志裡從未說清楚開山王廟的主神是誰，兩者名稱相近，因此夾纏不清，產生許多誤會。

近年來又有學者說開山王廟拜的是王爺而非鄭成功（王見川 2004）。王見川曾引用一份乾隆五十二 （1787）林爽文餘黨莊大田的軍師的一份供詞，證明在乾隆末 已經有人把鄭成功當成神（2004: 65）。有人把鄭成功當神是一回事，但王見川認為在清前期，開山王廟的主神並非鄭成功，因為官員不會允許老百姓在官衙附近奉祀鄭成功，而且老百姓也不可能對鄭成功這麼忠誠，冒著被告密的危險奉祀鄭成功（2004: 68），因此他認為開山王廟的主神「可能是民眾崇祀的類似王爺的神明。也就是說，鄭成功並未被民眾稱為開山王」（同前引）。

康熙 39 年（1700），因鄭克塽之請，康熙准鄭成功歸葬福建南安。康熙皇帝聖旨說：「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如田橫故事。置守冢，建祠祀之」（黃宗羲 1958:47）。然而在臺灣，開山王廟奉祀鄭成功則是從沈葆楨開始。牡丹社事件之後，同治 13 年（1874），沈葆楨跟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福建將軍文煜等人一同上書，請清廷准予建祠（沈葆楨 1959：18）：

請建明延平王祠摺（同日）

奏為明季遺臣、台陽初祖，生而忠正、歿而英靈，懇予賜謚建祠，以順輿情、以明大義事。

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據台灣府進士楊士芳等稟稱：竊維有功德於民則祀，能正直而壹者神。明末延平郡王賜姓鄭成功者，…厥後陰陽水旱之沴，時聞籲嗟祈禱之聲，肹蠁所通，神應如答；而民間私祭僅附叢祠，身後易名未邀盛典，望古遙集，眾心缺然！可否據情奏請，將明故藩鄭成功准予追謚、

5 根據筆者的訪問，開山宮自認為他們是全臺灣最早的廟，明鄭時稱為將軍祠，奉祀陳稜的牌位。鄭軍來台時，有人攜帶保生大帝的香火來供奉在將軍祠裡，將軍祠遂改奉保生大帝為主神。開山宮原來位於現在民生路的路中央，日本人因拓寬民生路及防火巷，開山宮乃遷至現址，仍然供奉陳稜之牌位，光復後才雕塑陳稜之神像，稱為陳府千歲，供奉於正殿裡最靠近大門的神桌上。

> 建祠，列之祀典等因；並據台灣道夏獻綸、台灣府知府周懋琦等議詳前來。…伏讀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詔曰：朱成功系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祀之。…

光緒元年（1875）清廷追謚鄭成功「忠節」，在東安坊油行尾街（今開山路），將舊時開山王廟拆除，重建為延平郡王祠，塑造泥像（鄭氏宗親會 1962:89），工匠、建材都來自福州（顏興 1953：20；鄭氏宗親會 1962:86），因此外觀為福州式建築。這是朝廷同意、為鄭成功建祠的開始，然而因為沒有紀錄，我們並不明白當時祭祀的形式，只知道有個泥像，但有沒有香爐？有沒有神明形式的金身（即現在神明會供奉的金身）？我們只知道自清代以來，每年農曆正月 16 日，三個神明會都會到延平郡王祠祭拜，其中法仔組會在前一天下午召營，16 日犒將，17 日收營，而六合境住戶會自備菜餚牲禮到開山王廟祭拜（鄭氏宗親會 1962: 88）。[6] 但這些神明會的金身平時是不是供奉在祠裡？



圖 1：開山王神像（鄭氏宗親會 1962：4）[7]

6 《安平縣雜記》：「十六日，延平王誕．六合境及各會社，排日慶祝」（不著撰者 1959：3）。

7 原文說：「為延平王祠前身開山聖王廟所供之原像，當係清代所塑者，現存王祠附近之民家」。筆者訪查延平郡王祠附近仍供奉延平郡王之成功祠（在府連路）及大埔福德祠，無法得知此神像之下落。

（2）日本時代

日本人領有臺灣後，1896 年台南縣知事磯貝靜藏向臺灣總督桂太郎建議，將延平郡王祠改為神社，因為鄭成功為「忠烈之日本婦人所生」，「予以更改社號為開台神社，並將社格列為國幣社」（溫國良 1999：34）。磯貝靜藏的建議在隔年得到日本拓殖務大臣的同意，將延平郡王祠改為開山神社，列格為縣社。[8]



圖 2：日治前期延平郡王祠正殿（刊於山田 1915；引自陳麗華 2013: 13）

開山神社仍然沿用沈葆楨所建的福州式建築的延平郡王祠。山門的形狀及「明延平郡王祠」、「奉旨祀典」兩塊匾額依舊存在，正殿正門上方匾額是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寫的「力挽迴瀾」四字。後來在大正三年（1914）擴建，增加了拜殿、社務所、手水社、鳥居等神社建物。這時鄭成功之泥塑神像還在，但是在中日戰爭後，因為日本神社並無供奉神像的習俗，原來供奉在延平郡王祠裡的鄭成功神像被毀損（鄭氏宗親會 1962：89; 連景初 1995：454）。[9] 在慶典時，日本人以日本

8 日本神社分為官社與民社。官舍分為官幣社（皇室神社）與國幣社（國家神社）；民社分為縣社、府社、村社、無格社。官舍由中央政府支持，民社由地方政府維持（江鑌萍 2000:42）。

9 不同報導人的說法不同。有人說正中間大尊泥塑神像一直保留到後來自然毀壞為止，小尊神像由各神明會請回；又有人說鄭成功神像在皇民化運動期間拆除。

神社慶祝節日的方式舉辦擊劍、相撲、 大弓、里神樂等日式祭典，而臺灣人則在六合境主辦遶境、戲劇演唱等活動（小林里平 1910：26-27）。日據以後，奉祀延平郡王的五個神明會裡，忠雅堂、崇德堂不再參加祭典（鄭氏宗親會合編 1962：88；連景初 1995：449-50,451）。日本戰敗後，被毀損的鄭成功神像委託府城之蔡火修復裝回，1947 年台南市政府又委託蔡心用樟木重塑鄭成功神像（鄭氏宗親會合編 1962：88；連景初 1995：454）。蔡心的鄭成功神像乃是依據原藏於赤崁樓的鄭成功畫像而來（連景初 1995：45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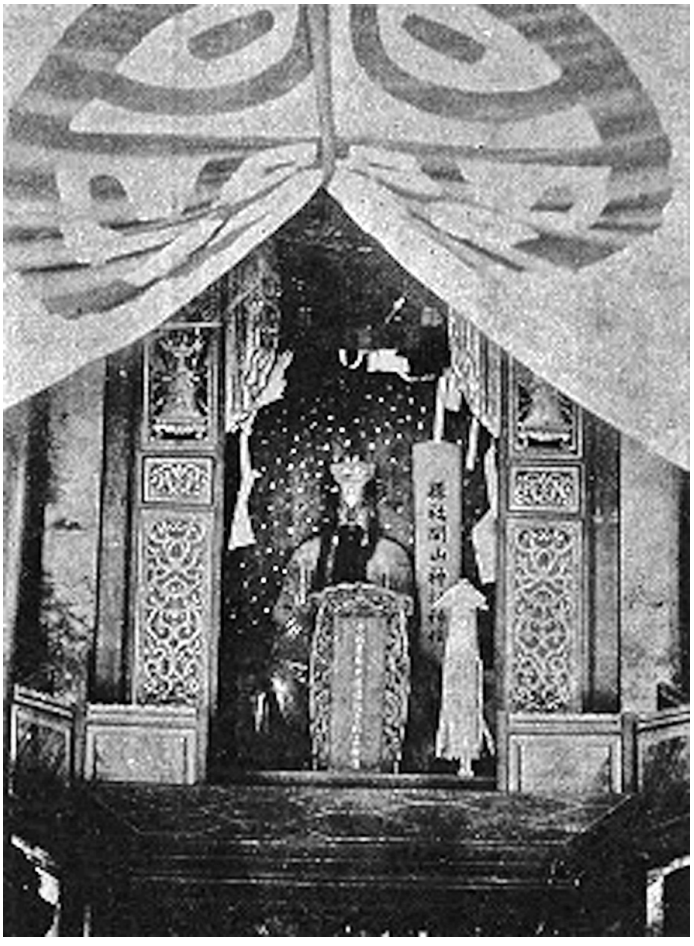


圖 3：日據初開山神社（引自陳麗華 2013: 22）

說明：照片中間靠右方的牌位為「縣社開山神社神位」，正中間的牌位為「予謚忠節明賜姓延平郡王神位」（鄭道聰 2012:111）。

10　赤崁樓之鄭成功畫像原為小早川篤四郎（1939）所繪，後來毀損，現在之畫像為方昭然所仿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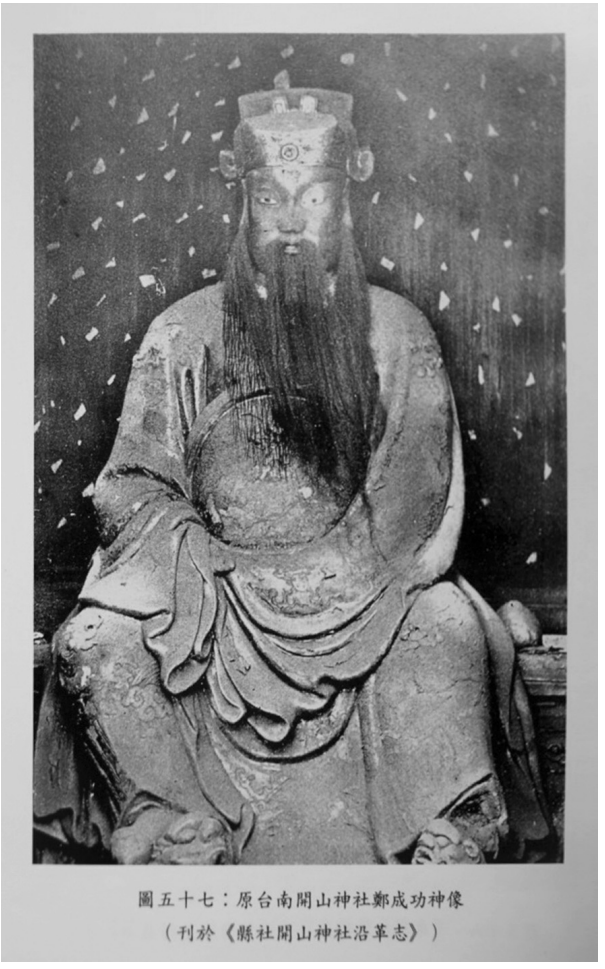


圖 4：開山神社鄭成功神像（山田孝使 1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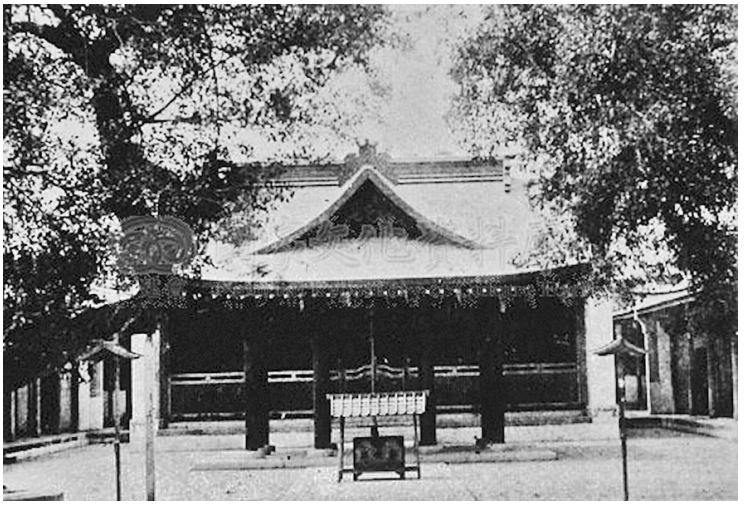


圖 5：日據中後期開山神社（引自陳麗華 2013: 14）

說明：正殿仍然是沈葆楨所建的福州式建築

日本統治臺灣早期，山田孝使曾在 1915 年出版《縣社開山神社沿革志》一書，書中說：

> 開台的始祖，明延平郡王薨去後，台人追念他的功德，於是建廟祭拜。…由於年代久遠，已不知廟創建於何時，只知臺灣尚在鄭氏統治時期，東安坊內即有延平郡王的廟宇存在。…該廟稱為開山王廟，又稱開台聖王廟，是庶民私祀延平郡王的場所。（1915:6）[11]

山田完全不知陳稜之說，直接就說開山王就是鄭成功。江鍰萍認同山田孝使的說法，認為山田已經「證明開山王即鄭成功」（2000:27），她「相信自康熙 34 年（1695）即有記錄之開山王廟即鄭成功廟，亦即鄭成功死後約 30 年即有民眾視他為神祇，建廟膜拜」（2000: 27-28）。筆者不同意山田及江鍰萍的意見，山田孝使的說法雖然合乎大家的認識，但他只是陳述，沒有證據，更沒有「證明」開山王即鄭成功。

在山田孝使稍後，連橫在大正 10 年（1921）出版的《臺灣通史》說：

> 復次為王爺。王爺之事，語頗鑿空。或曰，是澎湖將軍澳之神也。舊志謂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豈隋開皇中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又曰，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圮。按開山王廟所祀之神，為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即我開臺之烈祖也。…是開山王廟固祀延平也。陳稜之廟在西定坊新街，面海，曰開山宮，為鄭氏所建，以稜有開臺之功也，而府志誤為吳真人，且言臺多漳、泉人，以其神醫，建廟特盛。夫吳真人醫者爾，何得當此開山之號？…唯臺灣所祀之王爺，…其廟或曰「王公」，或曰「大人」，或曰「千歲」，神像俱雄而毅。其出遊也，則曰「代天巡狩」。而詰其姓名，莫有知者。…顧吾聞之故老，延平郡王入臺後，闢土田，與教養，存明朔，抗滿人，精忠大義，震曜古今。及亡，民間建廟以祀，而時已歸清，語多避忌，故閃爍其辭，而以「王爺」稱。…其言代天巡狩者，以明室既滅，而王開府東都，禮樂征伐，代行天子之事。故王爺之廟，皆曰「代天府」，而尊之為「大人」，為「千歲」，

11　譯文引自江鍰萍 2000：27。

> 未敢昌言之也。…夫臺人之祀延平，固為崇德報功之舉。後人不察，失其本源，遂多怪誕。而師巫之徒，且藉以歛錢，造船建醮，踵事增華，惑世誣民，為害尤烈。烏乎！先民雖愚，斷無如是之昧也。然二百數十年來，無有能糾其謬者，而今乃得抉其微。先民有知，能毋慰乎！（連橫 1962：571-3）

連橫的說法指出三個重點。第一：開山王廟所奉祀之神為鄭成功；第二：陳稜之廟在西定坊之開山宮；第三：所謂王爺、王公、大人、千歲、代天巡狩都是指鄭成功，因為「時已歸清，語多避忌，故閃爍其辭，而以王爺稱」。顯然在山田、連橫的年代開山王已經被大家當成鄭成功，但在更早的年代，我們並不知道開山王是不是鄭成功。前面提到的 1807 年謝金鑾、鄭兼才的《續修臺灣縣志》兩次提到開山王廟，都沒有說開山王就是鄭成功，反而猜想可能是陳稜；又說「王公廟、大人廟、三老爺廟者，不知何神」（謝金鑾、鄭兼才 1961：341）。這裡已經明白的說 1800 年代的當時人並不知道開山王廟奉祀的是誰，但是連橫長期住在台南，熟悉台南地方的文史史蹟，他的說法應該反映當時某些台南人對開山王廟的認識。

綜合以上的敘述，從明末到清末，開山王廟奉祀的到底是誰，民間傳說跟歷史紀錄並不相同。民間認為是鄭成功，而方志記載則從未說是鄭成功，甚至推測可能是陳稜。隋朝的陳稜曾被方志的作者派到澎湖去成神，也曾被派到台南開山宮。反過來說，鄭成功也可以被學者派到澎湖的將軍廟去當將軍，譬如蔡相煇就認為澎湖將軍廟的將軍應該是鄭成功而不是陳稜，因為當時只有鄭成功能被稱將軍，將軍是個專有名詞（1984a: 47）。

如前所述，說開山王廟奉祀陳稜而非奉祀鄭成功，筆者認為這是方志的作者混淆開山宮與開山王廟所造成的錯誤。連橫已指出陳稜的廟在開山宮，而非開山王廟。

（3）光復後

1947 年，由台南市政府主導，將開山神社改為「明延平郡王祠」。因為當初沈葆楨所建、日本人整建的開山神社已經老舊，台南市各界倡議重建，因此拆除原有之開山神社，重建為北方宮殿式建築，同時請楊英風先生雕塑鄭成功塑像一尊，於 1961 年鄭成功復台三百年時安座，原來蔡心所塑之樟木鄭成功神像則移往鄭成功祖廟。楊英風雕塑的鄭成功則只是塑像或是藝術品，就像中正紀念堂裡的

蔣介石塑像或國父紀念館裡的孫逸仙塑像一樣，只讓人紀念或景仰，並非神像，因此不用燒香、不用香爐供奉。

然而老百姓原來在此地（開山王廟）蓋廟的目的並非只是紀念或景仰鄭成功，而是祭拜鄭成功，把他當成神。可是當初開山王廟裡的鄭成功神像之下落已不可考。我們只知道在楊英豐雕塑的大尊神像之外，民間還有五個神明會也各有鄭成功金身：心同敬（大公組）、誠心敬（轎班組）、和心敬（法仔組）、忠雅堂（福州同鄉）、崇德堂（鄭氏宗親會）（鄭氏宗親會 1962：87-8）。[12] 至於說這五祧的神像是否曾被供奉在開山王廟、開山神社、延平郡王祠裡，或者說何時被請出去，因為歷史沒有記載，我們都不清楚。根據研究，

> 延平郡王祠前身開山聖王廟原神像現仍存民間，輪流供奉於民宅之中，與一般廟宇神像類似，體型較小，但卻造型及表情都十分優美，每年農曆正月十六日，民間爐主便會將此神像連同其陪祀的甘輝及萬禮像請至台南延平郡王祠正殿供人祭拜。（傅朝卿 1999:189）

這些被請出去的五組神明會的鄭成功神像，每組都是以輪爐主的方式輪流祭拜，因為每年輪流供奉在不同的爐主家裡，因此也沒有任何紀錄。現在大公組的爐主王松濤先生說，他父親當爐主也是過去二、三十年來的事，以前鄭成功金身供奉在其他爐主家裡的事情他也不清楚。此外，這些金身是不是在某個年代被重新雕刻、粉面，因為沒有記載，也沒有人知道。王先生說大公組的鄭成功神像（金身）曾寄居在大埔福德祠，之後奉祀於他家裡，2005 年之後又曾寄祀於媽祖樓天后宮，而轎班組及法仔組的延平郡王則分別奉祀於爐主家裡。2018 年 1 月，崇德堂的鄭成功神像在鄭成功祖廟附近的一戶鄭姓人家裡被發現，現在已被鄭成功祖廟迎回供奉。忠雅堂（福州同鄉會）之鄭成功金身迄今不知下落。

2007 年 2 月，台南市政府決定將大公組寄放於媽祖樓的鄭成功金身迎回延平郡王祠，許添財市長在前一晚先到媽祖樓祭拜鄭成功，並感謝媽祖的收容。隔天

12 和心敬在不同的文獻裡又寫成合心敬、合心堂等。原來之五祧，在日據時期以後只剩心同敬、誠心敬、和心敬三祧而已（鄭氏宗親會編 1962:88）。轎班組為負責扛鄭成功神轎的信徒所組成，法仔組為小法團成員組成，現在法仔組成員已解散。

迎回鄭成功之後，由陳水扁總統主祭。現在延平郡王祠大殿內立了一塊許添財市長署名的「開台聖王像回鑾安座記」木牌，簡述這些神像被趕出開山神社及延平郡王祠的經過：

> 民國五十二年（1963）本祠重建，二年後聘請楊英風塑像，鄭氏端坐殿堂。然於民國五十四年（1965）原開臺聖王神像卻因蔣中正欲前來祭拜民族英雄，神像而被移往祠外，始終未見回鑾，迄由民間輪流奉祀，歷四十載，直至民國九十四年（2005）三月十七日，由開山王廟王添富主委議請寄祀媽祖樓天后宮。民國九十六年（2007）台南市政府尊崇信仰源流，乃請筊奉允迎回神像，恢復崇祀原貌。…民國九十七年（2008）二月十七日開台聖王神像安座，萬民膜拜，是為誌。

這一塊匾從 2007 年至今已經換了兩次，內容改來改去卻仍然錯誤百出，譬如何時重建，何時楊英風塑像，年代都不對。又譬如說蔣中正前來之事也錯誤連連，蔣中正是哪一年來的都說不清楚，[13] 說蔣中正前來「祭拜」，不知是無心還是故意，因為大家都知道蔣中正是基督徒，他來了只可能瞻仰、參觀，不能說是「祭拜」。此外，這塊匾最大的問題是把民間神明會所奉祀的鄭成功神像之所以流落在外，歸咎於蔣中正要來，因而被移出去，筆者認為這說法沒有證據。前面已經說過，這些神明會的金身歷史上從沒有記載，因此這些神明會的金身是不是開山王廟時期的金身並不可考，是否曾供奉於開山神社以及延平郡王祠裡，歷史上也從沒有紀錄，筆者的訪查也得不出結果。許添財市長在沒有證據的情形下就說這些神明會的金身是因為蔣介石要來而被移出去的，實為草率，率爾操觚。

實際上證據還是有的。從一張蔡心刻的鄭成功神像的照片來看就知道那時的延平郡王祠裡除了鄭成功的塑像，根本沒有其他神明會的金身。

13 蔣介石來延平郡王祠之事，2008 年的木匾說是 1965 年，2010 年的木匾改為 1960 年。依筆者所見資料，蔣介石曾最少兩次到延平郡王祠，一次在 1949 年 6 月 18 日（林桶法 2009: 圖 23）。林桶法此處圖說為：「蔣介石父子至台南延平郡王祠」，但照片背景為赤崁樓。另一次無法確定日期，但正殿是楊英風雕刻之鄭成功像，因此不可能是 1960 年。



圖 6：延平郡王祠（1947-61）[14]

說明：鄭成功塑像為蔡心所雕刻，供桌上並無任何神明金身。

這張照片之鄭成功塑像為蔡心所雕刻，1947-61 年間供奉於延平郡王祠，之後移往鄭成功祖廟。照片顯示供桌上並無民間神明會供奉之鄭成功金身。底下一張照片顯示蔣介石來參觀延平郡王祠時，他所看到的是楊英風雕塑的鄭成功，而楊英風的雕塑是用來取代蔡心的雕刻的，既然蔡心雕刻的神像前面就已經沒有那些神明會的金身，我們如何能證明楊英風所塑的鄭成功像的前面有那些神明會的金身？可見歷史的是非黑白本來就是當權者所寫的。



圖 7：蔣介石瞻仰鄭成功

14 引自網路：http://rice98.pixnet.net/blog/post/4104078-%E6%B2%88%E8%91%86%E6%A5%A8%E5%A5%89%E6%97%A8%E5%89%B5%E5%BB%BA-%E5%BB%B6%E5%B9%B3%E9%83%A1%E7%8E%8B%E7%A5%A0

2010 年 12 月，台南市政府又將奉祀於誠心敬（轎班組）、和心敬（小法組）的兩組鄭成功金身及配祀迎回，從此祠、廟合一，延平郡王祠成為由政府祭拜民間神明的少數特例。為什麼說是少數特例，因為政府管理的先聖先賢的祠廟，通常就是紀念的形式，就像紀念堂一樣，塑像類似藝術品，塑像、牌位只是緬懷、紀念、瞻仰的對象而已，並不把紀念的對象當神，既然不是神，平常並不燒香。然而民間的祠廟供奉的神像是神明不是藝術品，每天都得燒香。現在延平郡王祠是個由政府出錢買香、雇人每天燒香的政府場所，也就是由官方供奉民間神明的地方。

現在延平郡王祠供奉的三組延平郡王神像之外，在神龕的左右兩側還有兩尊延平郡王神像，最右邊的一尊作為接神之用；[15] 最左邊的一尊則為出巡之用。此外，神龕虎邊還有一組五營令旗及人偶頭像的五營營頭，顯示出延平郡王祠完全以民間宮廟的形式、以神明的方式來奉祀鄭成功。

現在的延平郡王祠一年有四次活動，第一次是農曆正月 16 日春祭，也就是民間傳說的鄭成功壽誕，以鮮花素果祭拜鄭成功。第二次是國曆四月 29 日，也就是鄭成功復台紀念日，以前由內政部長主祭，但是這個延續五十多年的傳統在蔡英文上台後中斷，2017 年開始內政部長不再主持祭祀，改由台南市長主祭。

第三次是農曆七月 14 日，這是鄭成功在日本出生時的生日，以鮮花素果祭拜並賞兵。[16] 第四次是農曆七月 22 日，在文物館舉辦普度。

無論開山王廟早期奉祀的是誰，經過清、日本、民國等不同朝廷的肯定，鄭成功就算不是民間宗教裡的大神，至少可說已取得官祀、正祀的地位與認可。

15　當有其他神明繞境、進香路過延平郡王祠時，工作人員就會在延平郡王祠大門外擺出香案，將這尊鄭成功神像放在香案上作為迎客之用。

16　犒賞神龕裡由五營令旗及營頭所代表的五營兵馬。



圖 8：現今延平郡王祠正殿（2017-12）

說明：鄭成功塑像前為三個神明會之鄭成功神像，照片左方可以看到五營營頭及五營令旗

（二）三老爺宮

上面一節敘述開山王廟無論原來拜的是誰，到清末連橫時已經定調為鄭成功。連橫的說法後來得到石萬壽（1979）、蔡相煇（1989）等學者的支持；但同樣也遭到一些學者的批評，譬如翁佳音認為台灣的一百多間鄭成功廟，其實都是王爺廟改的（2002）。本節敘述台南地方幾個捲入祭拜鄭成功爭議的宮廟、首先說三老爺宮。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說禾寮港三老王爺廟創立於乾隆 15 年（1750），這說法應該可信，因為乾隆 17 年（1752）王必昌的《重修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 / 廟 / 將軍廟）也同樣記載：「鎮北坊則普濟殿、三老爺宮」（王必昌 1961：182）。問題是三老爺宮的主神到底是誰。1807 年謝金鑾、鄭兼才的《續修臺灣縣志》說：

> 邑又有稱王公廟、大人廟、三老爺廟者，不知何神，或云皆即澎湖將軍澳之神也。（謝金鑾、鄭兼才 1961：341）。

這裡說不知道三老爺宮拜的是誰，可能是陳稜。相良吉哉在 1930 年代的調查說三老爺宮供奉的是三老王爺、朱王爺、魏王爺、太子爺、玄天上帝、註生娘娘（相良吉哉 2002:22），然而三老爺是誰，並沒有記載，之後有人說是老王爺，又說是玄天上帝（朱鋒 1995：288-9）。現在三老王爺不見了，正殿裡供奉的是朱、曹、魏三位老爺。石萬壽認為三位老爺當中的朱王爺為鄭成功。他比較台南地方供奉三老爺的宮廟的主神：

府城三老爺宮：朱、曹、雷（即禾寮港三老爺宮）
東門大人廟：朱、李、池（即東門圓環大人廟、東安坊崙仔頂大人廟）
歸仁大人廟：朱、池、李（即保西代天府、保西里大人廟、保大里大人廟）
蔦松三老爺宮：朱、雷、殷（葉按：實為朱、曹、魏）
佳里金唐殿：朱、雷、殷

從這幾間廟的觀察，石萬壽認為朱老爺即是鄭成功。他的說法是：

第一：主神都是朱王爺，因為這些廟宇的朱王爺都是從府城的三老爺宮或大人廟分香而來，而三老爺宮是鄭成功登陸之地，大人廟「極可能是鄭成功和荷蘭人議降之處」（1979:40），因為這種地緣關係，「朱王爺極可能是鄭成功」（同前引）。

第二：主神的左右二位王爺不同，是因為駐紮地不同，「這些王爺可能是明鄭各地屯駐軍將領的姓氏或代號」（1979:41）。

第三：一般王爺都有王醮，但三老爺廟沒有王醮。

「由此三點，即可推知朱王爺即是鄭成功的替身，因為在明鄭覆滅後，遺民不敢公開祀奉鄭王，乃改稱三老爺，託言一般的王爺，以免遭到清廷的猜忌」（同前引）。這樣的說法似乎合理，而且他在文章裡都很謙虛客氣的說可能是、極可能是鄭成功，還帶有不確定的語氣，但在面對宮廟及市政府的請託時就搖身一變，成為歷史權威學者打包票的肯定句，說就是鄭成功。石萬壽 1978 年在蔦松街三老

爺宮立的「重興蔦松街三老爺宮碑記」說：「三老爺宮奉祀朱王爺，…實我開台聖祖國姓延平郡王朱諱成功也」（1979:42）；在仁德區三爺宮立「台南縣文賢里埤仔頭街三老爺宮碑記」，也說是鄭成功；在禾寮港三老爺宮前立了一個刻著「國姓爺上陸頭暝安營之地」的石柱，石柱後還有石萬壽所撰的說明：

> 明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西曆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暗頭 國姓爺率師上陸禾寮港北岸 安營尖山西南坡梨園以圍赤崁城 翌日移營崙仔頂 及趕走荷蘭人後士民建廟於國姓爺上陸頭暝安營之地 祀國姓爺與其部將二人 顏稱三老爺宮。

三老爺宮歷經數次重修，最近一次為 1996 年新廟落成。現在三老爺宮有一塊 1996 年所立的「三老爺宮重建碑記」：

> 本宮開基於清康熙初葉，明朝遺臣所建祠宇。祀朱王爺，而朱王爺即開台延平郡王鄭國姓是也。昔時之本境（三老爺境），鄭國姓軍隊由禾寮港德慶溪（原本宮廟前）登岸，曾駐軍於此（昔時稱為尖山），圍攻赤崁樓，致使荷蘭人投降，本宮之頭銜【開台聖地】亦得之於此。鄭國姓克台後，為反清復明，奔走國事，積勞成疾，來台一年即告圓寂。遺臣為崇仰且功德，乃塑造金身奉祀。至康熙廿三年（西元一六八四年）清軍水師提督施琅將軍，征台入關，嗣子鄭克塽降清，里民為避隱清官面目，而將鄭國姓爺改尊奉為朱王爺（鄭國姓之國姓為朱），繼續崇奉。乾隆十五年（西元一七五〇年）境內三老爺街，安祿境街及鴨母寮街（本宮廟前之市場昔時稱鴨母寮菜市仔）等里民合力捐建擴大廟宇延襲（葉按：當作沿襲）至今。

廟方的說法顯然來自石萬壽的意見。假如石萬壽所說的德慶溪從荷蘭時期到現在從未改道，當年德慶溪的出海口大約是現在的西門路、自強街（大銃街）、長北街一帶，也就是說，根據石萬壽的說法，鄭成功的船隊大約由現在的立人國小進來，到達鴨母寮市場，然後沿著馬路右轉穿過成功路到中成路。

石萬壽之外，蔡相煇也認為三老爺宮的三老爺是鄭成功、鄭經、鄭克壓三人（1989: 39），從此朱王爺確定變身為鄭成功。雖然朱鋒認為這種鄭氏祖孫三人的說法「實屬一種無稽之談，不足徵信」（1995:289），但現在三老爺宮宮內的石柱、

牆上全都是歌頌鄭成功豐功偉績的對聯、壁畫，表示廟方完全接受主神是鄭成功的說法。石萬壽的說法是鄭成功登陸後在禾寮港街紮營，鄭成功過世後，百姓為了紀念他，因而在他的登陸安營之地建廟，可是怕被清朝官員知道，因此假託三老王爺的名義。這種說法似乎合乎常理，但是這中間有幾個問題。

第一：石萬壽說三老爺宮是鄭成功登陸之地、大人廟是山川臺，[17] 有這樣的地緣關係，所以朱王爺是鄭成功。筆者認為當時的台南，哪個地方跟鄭成功沒有關係？老百姓要蓋廟，到處都是空地，任何地方都可以跟鄭成功有關，為何還要特地跑到登陸地、到接見荷蘭使者之地（也就是石萬壽認為的山川台）去蓋？

第二：就算三老爺宮就是鄭成功安營之地，後人在那個地方蓋廟，那又怎麼證明該廟拜的就是鄭成功？兩者並無邏輯上的關連。石萬壽說:「等赤崁樓攻下後，鄭王移居赤崁樓，軍民乃於故址建廟祀之」（1979:40）。這段話不合乎史實，他何以知道「軍民乃於故址建廟祀之」？在何時建廟祀之？

前面提到相良吉哉的《臺南州祠廟名鑑》說三老爺宮創立於乾隆 15 年（1750），現在廟方的介紹也這麼說，假若這說法可信，那麼三老爺宮建廟時鄭成功已經過世 88 年，滄海桑田，海岸線早已改變，台南人真的對鄭成功如此崇拜，還知道那是 88 年前鄭成功登陸安營之地，要蓋廟還要特地回到登陸之地去蓋？更何況，假如開山王廟、大人廟也都是奉祀鄭成功的話，那麼當時的台南已經有兩座奉祀鄭成功的宮廟，那時台南才多少人，台南人真的對鄭成功那麼崇拜，冒著被告密的危險也要為他建廟？（那我們如何解釋天壇及北極殿裡鄭成功的地位？），而且建廟還要回到他的登陸地去？

第三：石萬壽在上述「國姓爺上陸頭暝安營之地」的石柱後面的文字說：「及趕走荷蘭人後，士民建廟於國姓爺上陸頭暝安營之地，祀國姓爺與其部將二人，顏稱三老爺宮」。也就是說現在三老爺宮奉祀的朱、曹、雷三人，朱是鄭成功，曹、雷二人則是他的部將。這部將二人能夠跟國姓爺平起平坐，應當是鄭營裡功勳彪炳的部將，可是這樣的大將，石萬壽居然連名字都講不出來，表示一點證據都沒有，就以「部將二人」敷衍過去，筆者認為這不僅僅不負責任，根本就是偽造歷史。

17　大人廟位於崙仔頂，相傳鄭成功在此祭山川所以稱為山川台。

同樣的，他說各地朱王爺旁的兩位王爺的姓氏不同，是因為鄭成功在各地的部將姓氏不同。這也完全是自以為是的說法。學者的陳述（statement）難道不需要證據的支持？一個歷史學者應該提出證據來證明他的說法，而不是信口開河自己說了算。首先他要提出證據說鄭成功曾在歸仁、佳里、蔦松等地駐軍屯墾（也就是軍屯、營盤田），然後說出駐守該地的將領是誰。譬如說佳里金唐殿的主神為朱、雷、殷三位王爺，石萬壽應該提出證據說當時鄭成功曾經派雷、殷兩位部將屯墾佳里；同樣的，歸仁大人廟奉祀朱、李、池三位王爺，他也要提出證據說鄭成功曾經屯墾歸仁，領兵的兩位部將分別姓李跟池。其實這也牽涉到一個歷史小問題，石萬壽怎麼知道每個地方都是兩個首長？我們從沒看過這樣的記載說鄭成功的軍屯是雙首長制。

一般奉祀鄭成功的廟裡，陪伴在鄭成功旁邊的神像最常見的是甘輝、張萬禮兩人，其他能夠跟鄭成功平起平坐、被奉祀在廟裡、功勳高過他們兩人的真是沒有見過。在台南大家熟悉的鄭成功武將，譬如馬信（宅在馬兵營）、陳澤（宅在統領府）、黃安（宅在檨林，即舊忠烈祠）、林圯也都沒有這樣的榮譽。而且，鄭成功從大陸征戰、登陸臺灣到逝世期間的部將，在延平郡王祠裡左右兩廡都有功勳部將的牌位；他安置兵力、撫墾的地方，譬如林鳳營、柳營、參軍莊（陳永華屯墾地，在高雄湖內）、蔡文莊（蔡文屯墾地，在高雄路竹）等等，在《臺灣通史》的〈軍備志〉（卷十三）、〈撫墾志〉（卷十五）都有記載；另外，早在 1958 年黃典權就編纂《鄭延平開府臺灣人物志》一書，詳列鄭成功的滿朝文武名單及事跡，其中表三「明招討大將軍幕轄渡台武職人物表」詳列鄭軍武將 338 人，其中姓魏的有魏國、魏騰兩人，魏國為宣毅後鎮，魏騰駐守安平鎮並管烏鬼（黃典權 1958：20, 43）；姓曹的有曹從龍，他曾短期守安平砲台（黃典權 1958：27）。[18] 其他並無姓雷、池、殷之人，更查不到曹、雷或李、池，或雷、殷等部將兩兩駐守同地之事。石萬壽盡責去查這些文獻了嗎？他說三位王爺是鄭成功及他的兩個部將，要是沒有證據就是偽造歷史。

18　此外，賴永祥也編有〈鄭成功藩下鎮將簡表〉（1956），詳列鄭軍諸將的名稱、任期。

此外，石萬壽連府城三老爺宮、蔦松三爺宮奉祀的王爺的名稱都弄錯，建立在錯誤的名稱上，如何能解釋說朱王爺之外的另兩人是他的部將？更不用說完全不能解釋三老爺宮的主神由三老爺、朱王、魏王變成朱、曹、魏三王了。事實上我們知道各地三老爺宮的主神是分香而來，與鄭成功部將的駐地毫無關係。因為是分香的關係，因此朱、李、池三王爺比較多。難道我們也要說，鄭成功派駐各地的部將也都姓李、池？

第四：石萬壽說各地的王爺廟都燒王船，但鄭成功一系的王爺廟不燒王船。事實上府城三老爺宮、歸仁大人廟、佳里金唐殿也都燒王船，因此他的說法並不成立。

第五：筆者不知道以前三老爺宮的神明塑像是不是鄭成功，然而筆者認為最核心的問題是禾寮港在哪裡。楊英《從征實錄》說：「四月初一日…是晚，我舟齊到，泊禾寮港，登岸札營近街坊梨子…」（1958：186），這是中文記錄裡關於鄭成功登陸地點最確實的記載。在 1720 年陳文達的《台灣縣志》前面的「輿圖」裡就畫有「禾寮港街」。王必昌在 1752 年的《重修台灣縣志》的「城池圖」也畫有一條禾寮港街，就是當時構成十字街的北方那條街。連雅堂說禾寮港就是打銀街，也就是忠義路在民族路、民權路中間的那一段（連橫 1953:8-9）；黃典權先說禾寮港在赤崁樓附近（1961:16），後來又進一步說「就在今日三山國王廟的西邊數十公尺處」（1989:210-1）；石萬壽堅持禾寮港街與三老爺宮的地緣關係：「在今台南市成功路忠義路口北幹線東，約三老爺宮附近」（2003:221, 註 11）。可是晚近根據荷蘭文獻的研究，翁佳音（2001,2008）認為鄭成功是在永康洲仔尾上岸，江樹生認為可能是在今開元寺與洲仔尾之間（2003:22）。江樹生在《梅氏日記》一書的插圖裡，就把禾寮港畫在柴頭港（今開元附近）跟新港溪之間（2003:6,8）。

禾寮港是不是禾寮港街？顏興說是的（1954: 33-34），之後石萬壽也沿用顏興的說法，說禾寮港就是後來的德慶溪。[19] 然而禾寮港街就在普羅民遮城附近的數百公尺之內，楊英《從征實錄》說：「是晚，赤崁城夷長貓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

19 德慶溪已經在大約三十年前被市政府加蓋，所以現在都在柏油路下面。現在中成路（由成功路這端往民族路方向看）右邊的店家提到當年土地被市政府徵收的往事仍然罵聲連連。德慶溪的支流枋溪也早就被加蓋成為馬路，2017 年 11 月上旬，清水寺前面的枋溪因工程需要被挖開，市民得以重見馬路下的枋溪。

（1958：186），表示鄭成功登陸的地方一定是荷蘭人大砲打不到的地方，那應該不會是普羅民遮城附近，不是現在的三老爺宮附近。因此石萬壽把鄭成功登陸之地定為三老爺宮附近，這樣的推論可能有點危險。

就算禾寮港是德慶溪，石萬壽何以知道鄭成功是在三老爺宮附近登陸，而非別處（譬如開基天后宮前或縣城隍廟前）？石萬壽斬釘截鐵的說鄭成功在三老爺宮前上岸，事實上石萬壽對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一圖的解讀已經完全錯誤（詳下），居然還能定出一個上岸地點，完全無法使人信服。筆者認為他把鄭成功的登陸地點定在三老爺宮前，主要的目的只是要強調三老爺宮與鄭成功有關係，只有這樣他才能把朱老爺說是鄭成功。

因此，萬一三老爺宮附近不是鄭成功登陸安營的地方 --- 譬如上一段翁佳音、江樹生說禾寮港是在開元、洲仔尾一帶，假如他們的說法成真，那麼三老爺宮該怎麼辦？把鄭成功趕走嗎？把鄭成功改回三老王爺或朱王爺嗎？

石萬壽說三老爺宮的三老王爺或朱王爺是鄭成功，說大人廟的朱王爺是鄭成功，他立論最核心的根據就是來自他對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圖（圖 9）的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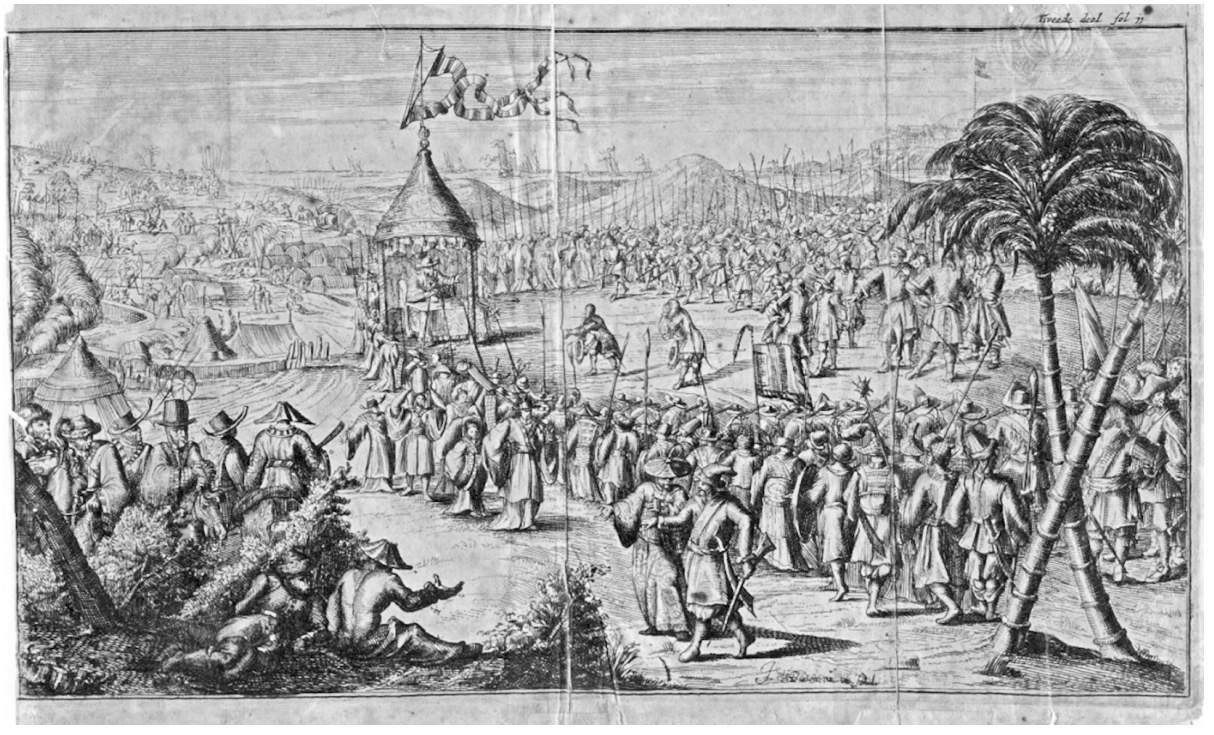


圖 9：1661 年 5 月 3 日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圖

這圖畫的是鄭成功登陸後第三天（1661 年 5 月 3 日）接見荷蘭使者 Thomas van Iperen（商務員）、Leonard de Leonardus（會計）及陪同人員的插圖（或者可稱鄭成功諭降圖），原圖出於荷蘭末代總督揆一（Fredrik Coyett）的回憶錄（Coyett 1975:52-3）。此圖從日本時代開始一直被誤解為荷蘭人投降圖，經過一百多年之後，學者已逐漸瞭解那是錯誤的解讀，然而石萬壽居然還相信這是荷蘭投降圖（2002: 294-8），他作為研究鄭成功的專家，在二十一世紀還會犯這種錯誤可謂十分離譜。鄭成功 1661 年在禾寮港登陸與荷蘭人在 1662 年從安平離開，兩者相差九個月。而且，1661 年 5 月 6 日主管普羅民遮城的貓難實叮（Jacobus Valentijn）把普羅民遮城鑰匙交給鄭軍，以及 1662 年 2 月 9 日荷蘭長官揆一在把熱蘭遮城的鑰匙在安平海邊沙灘上交給鄭成功手下然後離開（江樹生 1992: 85），荷、鄭之間雖有締約，但荷蘭人在普羅民遮城及熱蘭遮城兩次棄城都沒有什麼投降儀式，因此把此圖說是荷軍投降圖，根本就是誤解歷史。筆者要說明：

第一：這不是荷蘭投降圖，而是 1661 年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圖。這點基本的錯誤，就足以推翻石萬壽整個說法。

第二：這只是揆一書裡的插圖（Coyett 1975:52-3），是插畫作者根據揆一書裡的描述所畫的想像圖，而不是現場實景的紀錄。石萬壽根據這種想像圖去研究歷史，可說本末倒置緣木求魚。[20]

第三：因為許多人（包括石萬壽在內）把這幅 1661 年的荷蘭使者求見圖誤解為 1662 年的荷蘭投降圖（荷、鄭雙方有和約，但沒有荷蘭投降的儀式，因此根本沒有荷蘭投降圖），也同時誤解了這張圖的地點。石萬壽在後來的一篇文章裡已經把此圖改為「國姓諭普羅民遮城代表梅腓力限期投降圖」（2009: 201）表示他已經發現錯誤，然而他的標題仍然顯示他不了解這張圖。石萬壽看到《梅氏日記》的封面及書裡的插圖，就以為那就是這張 1661 年 5 月 3 日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圖，其實不是。《梅氏日記》畫的是 1661 年 5 月 4 日鄭成功接見梅腓力的事。然而，

20 過去多年來，許多人都把這幅圖當成真實的場景，筆者曾在台南遇到拿著這張圖到處比對的一位民間學者，他並且把這張圖加上色彩，丘陵、海水、樹木各有不同的顏色，俾以增加真實感。筆者告訴他這只是想像的插圖，就如同荷蘭人所畫的西拉雅平埔教堂圖（Coyett 1975:12-3）一樣都是想像圖，而不是實景，但是他仍然執著他的土法煉鋼，並且發表多篇文章討論這張圖。

最根本的問題是，就算石萬壽已經了解到他之前認識上的錯誤，那麼面對他以前錯誤的解讀所造成的問題、所立的石碑、所封的神，又該如何善後？

第四：就算禾寮港是在三老爺宮附近，鄭成功的船隊有數十甚至數百艘船，進入台江內海後南北展開佔據台江內海南北至少數百公尺的海岸線，在這麼寬的海岸線上，數十、百艘船登陸應該是在台江內海禾寮港附近的一大片海岸邊同時上岸，而不是一個單一定點大家輪流上岸，因為那樣太浪費時間。因此，我們事實上無從知道鄭成功是在那個點登陸、安營，在三老爺宮前面立個「國姓爺上陸頭暝安營之地」恐怕失之武斷。

另外，哪裡是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的地方？譚君炎認為是在「今日安平古堡的西南偏西處」（1956）；黃典權認為在「億載金城東北不遠處」（1961:22）；林鶴亭說不在安平而是在赤崁樓一帶，「原台南州廳附近」（1961: 109）；[21] 石萬壽認為是大人廟門前的東門圓環，翁佳音說是在永康洲仔尾（2001: 288-9），大家的猜測相差十幾公里。重點是：歷史學者的猜測究竟有什麼證據？石萬壽說大人廟在山川台，有什麼證據？其實沒有證據，就是根據那張錯誤認知的插圖（圖 9）猜想而已，插圖上有小山丘，就猜那是山川台是崙仔頂；有海，就猜這是安平。其實揆一說是在赤崁周圍的一處空曠的原野上（open field，Coyett 1975:51），然而大家顯然都不知道揆一的說法。

本文的目的不在討論鄭成功登陸地點，筆者質疑的是石萬壽立論的根據。他把登陸地點作為鄭成功封神的依據，然而他根據的是一張錯誤認知的插圖，先說三老爺宮「該地極可能是鄭成功登陸禾寮港後，為進攻普羅民遮城臨時駐紮之所」（1979: 40），然後就信誓旦旦的在三老爺宮廟前立碑（「國姓爺上陸頭暝安營之地」）；又說東門大人廟是山川台，是諭降之地，因此也得立碑（「國姓爺諭降荷蘭普羅民遮城守將之地」）。這樣牛頭不對馬嘴的歷史研究筆者覺得非常荒謬，地點都無法確定，市政府及各宮廟卻到處替他立碑背書。

21　原台南州廳，即今之國家文學館。

本文旨在討論朱王爺是不是鄭成功，而不是鄭成功在哪裡登陸，然而因為石萬壽根據諭降圖錯誤的認知說三老爺宮是鄭成功登陸之地，說山川台是諭降之地，因而說兩處的朱王爺都是鄭成功，遂使得本文也不得不插入鄭成功登陸的討論。筆者認為石萬壽說禾寮港三老爺宮、東門大人廟的朱王爺是鄭成功根本沒有證據，或者說石萬壽的「證據」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因為市政府的背書，使得荒謬的結論成為官方認定的事實。石萬壽把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圖、兩處三老爺宮王爺的名字都弄錯了，憑著這樣脆弱的知識都敢封神，只能用《紅樓夢》的名句「滿紙荒唐言」來形容。如同敘述史學（narrative history）大師 Haydon White 的說法一樣，歷史敘述就是言詞的虛構（verbal fictions, 1986:82），像虛構的小說一樣，也就是歷史的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22]

（三）大人廟

石萬壽認為大人廟之朱王爺就是鄭成功，筆者認為這說法並不可信。石萬壽認為大人廟所在之地崙仔頂即為明鄭時之山川台，為當時（1661 年 5 月 3 日）鄭成功要荷蘭人投降的地方，台南市政府還為此在大人廟前面圓環內的公園裡立了一塊「大人廟：國姓爺諭降荷蘭普羅民遮城守將之地」的石柱，石柱後面的說明寫道：

> 明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五西曆一六六一 年五月初四荷蘭普羅民遮城守將貓難 實叮派代表梅腓力往崙仔頂國姓爺營 盤國姓爺諭梅腓力回城立即投降同日貓難實叮獻城投降士民乃於諭降之地 建廟祀國姓爺以揚其功勳額題大人廟

這段歷史寫得完全不對。首先，鄭成功見荷蘭使者是 1661 年 5 月 3 日，不是 5 月 4 日。其次，5 月 3 日來見鄭成功的使者並不是梅腓力，而是前面所說的 Thomas van Iperen、Leonard de Leonardus。江樹生翻譯的《梅氏日記》裡的插畫（2003:1-3）畫的是鄭成功接見《梅氏日記》裡的梅腓力，但那是在 1661 年 5 月 4 日的事。第三：貓難實叮並不是「同日」獻城，而是 5 月 6 日。第四，「士民乃

22 此處借用 Haydon White 的說法，當然只是純粹文字表面的意思，而非 White 真正的說法。White 建構的敘述史學，認為歷史的寫作不僅包括史料、事實的陳述，也包括想像、發明、虛構，使作者得以敘述歷史。「歷史的想像」一詞出自 White（1973）Metahistory（後設史學）一書的副標題：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於諭降之地建廟祀國姓爺以揚其功勳」，完全是石萬壽個人的猜想，並不見於任何記載。第五：最大的問題是石萬壽何以知道當時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的地方是山川台？何以知道山川台就是現在的東門圓環？何以不是坑仔底或其他地方？再說，就算山川台就是崙仔頂，就算那是鄭成功接見荷蘭使者的地方，何以知道後人會在那裡建廟奉祀鄭成功？這兩者並無任何關係，也沒有證據。

筆者不同意石萬壽的說法，因為石萬壽把前述的鄭成功諭降圖誤解為荷蘭人投降圖，因此他對台南歷史、地名的解讀並不可信。然而我們現在沒有證據說當初的大人廟奉祀的是不是鄭成功，只能從大人廟現存的文物及行事、儀式去觀察。

東門圓環大人廟奉祀朱王爺、池王爺、李王爺。舊志從未記載大人廟之創建年代，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說大人廟建於康熙 55 年（1716），光緒 10 年（1884）重修（2002：2）。[23] 現在大人廟龍邊進門後的牆上有一塊民國四十五年（歲次丙申）所立的「大人廟重建碑記」，敘述大人廟的歷史，這是廟內唯一之石碑，這石碑也說本廟建於 1716 年：

> …本廟朔自康熙五十有五年起，集信徒二十人建廟，奉祀朱池李三王爺，仝祀以來設年例：[24] 朱王爺正月二十日，池王爺六月十八日，李王爺四月二十四日誕生。…光緒十年曾經一番大修築，以後於日據時代期間中，兩次因之…至本省光復以後，境眾再議，鳩資重建之議成立，商之莊家…經至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止，約成改築，興工經年工事告竣，茲將自動捐獻工程諸…。

這是 1956 年所立的石碑，假如本廟的主神是鄭成功，為什麼石碑完全沒提到鄭成功？大人廟雖然是老廟，但廟內的對聯、壁堵上的題字書畫、門神、匾額、

23 晚近有人指出，保西代天府（歸仁大人廟）分香自府城大人廟，而康熙 25 年（1686）的《福建通志》已經記載「大人廟在縣治保大里，乃代天巡狩之神」，因此府城之大人廟應該比康熙 25 年更早才對（吳明勳、洪瑩發 2013：107）。筆者不同意這樣的推論。因為歸仁大人廟分香自東門大人廟都只是傳說而已，並未見於任何記載。因此，根據傳說來推斷東門大人廟的歷史比歸仁大人廟的歷史早不合邏輯。

24 此處「三王爺」原文作「三三爺」，「仝祀」之「仝」原文有人字邊。此外，原碑因為長期被香所燻，已變成漆黑一塊，以致字跡難以辨認。斷句、辨識之錯謬或恐難免。

雕刻等等，都是民國四十四年那次改建、四十五年落成、四十九年建醮所留下來的文物，筆者認為那些文物都跟一般宮廟的裝飾沒什麼兩樣，沒有一樣跟鄭成功有關。譬如民國四十五年落成時，廟內的對聯、題字等大都出自當時台南的書畫家林江水（鵲化山房主人，號觀濤）之手，[25] 神龕外面的「正氣昭昭留大德，[26] 芳型耿耿在人間」；龍邊牆上的「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肆之心；[27] 小民亦不可不畏，畏小民則無豪橫之名」；虎邊牆上的「朱池李惠迪神大，日月星光照世人」；大門木柱的「廣大神功風調雨順；佑人精世安顯肖兮」等等，這些字句都跟鄭成功無關。假如廟裡拜的是鄭成功，為何不直接歌頌鄭成功的豐功偉績？可見在廟方的認知裡，該廟拜的根本不是鄭成功。

現在廟方唯一之管理者黃瑞生先生說他當廟公迄今（2018）已經三十九年，但他不能通神，沒有能力反駁學者的說法，因此他也只能接受三位老爺就是鄭成功（朱王）、鄭經（池王）、鄭克塽（李王）三人。黃先生及一位吳姓志工跟筆者說大人廟大門口的一副對聯可能跟鄭成功有一點關係：

大德小德舉國頌德
人安神安全台平安

筆者認為這對聯與鄭成功無關。這是民國四十五年竣工時所寫，當時國民政府正在大力推崇鄭成功為民族英雄，大人廟要真是奉祀鄭氏父子，大可公開宣揚一番，甚至在民國四十四年那次改建時光明正大的把朱王爺改成鄭成功，肯定可以贏得配合政府政策的美名，因為當時拜鄭成功已經沒有禁忌，不必遮遮掩掩，因此筆者認為此聯跟鄭成功無關。

此外，連橫在《臺灣通史》卷十〈典禮志〉之〈祀典〉一節裡，詳列台南府的祀典廟宇，包括文廟、武廟、天后宮、社稷壇、先農壇、城隍廟、海神廟、延平郡王祠、施將軍祠（按：奉祀施琅）、吳將軍祠（按：奉祀吳英欽）、蔣公祠（按：

25 筆者認為大人廟所有對聯」題字應該都出自林江水之手，然而礙於證據，此處僅舉有落款的部分為例。此外，臺灣書畫界把林江水的生卒年訂為 1899-1928，由此處林江水在大人廟的題字，可見 1928 年過世的說法不對。

26 此處「正氣昭昭留大德」，王瑋鄉讀為「當大德」（2012:73,99）。

27 此段文字出自《菜根譚》，然而《菜根譚》原文為「無放逸之心」。

奉祀蔣毓英）等等。既然延平郡王祠已列祀典，假如如同石萬壽所說的大人廟、三老爺宮同樣拜的是鄭成功，為什麼不列入祀典？

再看民國四十五年那次竣工及建醮時，友宮、信眾、眾鋪戶所送的匾額的題字都是代天巡狩、爻占九二、[28] 浩氣流芳、愛國庇民、護國佑民、慈德配天等等一般宮廟常見的題詞，無一針對鄭成功。可見在民國四十年代，廟方以及友宮並不認為大人廟跟鄭成功有關，否則怎麼會看不到任何供奉鄭氏的蛛絲馬跡？因此筆者認為大人廟跟鄭成功無關，大人廟的朱王爺會變成鄭成功是被石萬壽封的。

至於大人廟的儀式，現在每年農曆正月 20 日為朱府千歲鄭成功、6 月 18 日為池府千歲鄭經、4 月 24 日為李府千歲鄭克壓祝壽，這三個日子倒是與相良吉哉的《臺南州祠廟名鑑》所記相同（2002:2），但是限於經費，大人廟為三位主神做壽都只是設宴祭拜，沒有請道士唸經做生日醮。大人廟在台南也有一些交陪的廟宇，但廟方也因為經費問題，神明生日時從不跟交陪境插燭。

雖然一般認為歸仁大人廟由府城大人廟分香而來，兩廟的主神都是朱、池、李三位王爺，數十年來兩廟並無往來，兩廟也沒有交陪的關係。大人廟民國四十五年重建落成、民國四十九年建醮，歸仁大人廟都沒送禮，顯示兩廟並無交誼。府城大人廟管理者黃先生說，兩間廟雖然都叫大人廟，但閩南語發音不同，府城大人廟稱為「dai-rin 廟」，歸仁大人廟稱為「dua-lang 廟」，發音不同應該反映出彼此的差異；而且他管的這間小廟沒有什麼香油錢，甚至可說是窮困潦倒，而歸仁大人廟輝煌騰達，因此他也不敢高攀，不敢希望人家會來認親。

28 「爻占九二」為民國四十九年大人廟建醮時台南大天后宮所贈送，典出《易經》乾卦之九二爻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因為九二爻「利見大人」，因此題為「爻占九二」，用來送大人廟極為貼切且寓意深遠。王瑋鄉卻說「爻占九二」是反映史蹟（2012:48,54），不知這四個字反映了怎樣的史蹟。雲泥殊路也。

（四）歸仁大人廟

相良吉哉的《台南州祠廟名鑑》說歸仁大人廟創立於雍正元年（1723），主神為三老爺（2002:51）。然而康熙 23 年（1684）的《福建通志》已經記載「大人廟在縣治保大里，乃代天巡狩之神」。[29]

至於說歸仁大人廟的三位王爺是誰，有三種說法。

第一：三位結義兄弟，入宮演奏後被皇帝賜死，玉皇憐其無辜，乃封為王（涂順從 1984：321）。

第二：唐高宗時開漳聖王陳元光之部將朱參、池文魁、李伯瑤三人（黃典權 1981）。

第三：鄭氏祖孫三代（蔡相煇 1989：100-5）。

雖然說歸仁大人廟或許是由府城大人廟分香而來，但當地人並不相信石萬壽的說法，不認為他們拜的是鄭成功，而採信黃典權的說法。

歸仁大人廟為遠近知名的大廟，極為靈驗，有三處較為知名的分廟：

（東門大人廟？）--- 歸仁大人廟 ---┬ 佳里金唐殿
　　├ 蔦松三老爺宮 --- 烏竹三千宮
　　└ 仁德三甲三爺宮

在這些分靈廟當中，根據筆者的訪問，佳里金唐殿廟方工作人員都表示他們的朱王爺跟鄭成功無關，他們固定三年一科燒王船也跟鄭成功無關。筆者幾次看他們的王船儀式，他們表現的也就是南臺灣濱海地區的王爺信仰，看不出跟鄭成功有什麼關係。

（五）蔦松三老爺宮

蔦松三老爺宮在相良吉哉的《臺南州祠廟名鑑》一書裡說是建於康熙 56 年（1717），主祀三老爺、天上聖母等（2002:59）。謝石城、陳清誥《臺南縣市寺廟大觀》說蔦松三老爺宮是由歸仁大人廟分香而來（1963:414）。石萬壽在

29　此處引自蔡相煇 1989:101。筆者查核康熙年間出版之《福建通志》並未見此條。

1978 年寫「重興蔦松街三老爺宮碑記」，認為蔦松三老爺宮的三老爺就是鄭成功（1988:767）。筆者在歸仁大人廟聽到的說法是三位王爺是朱參、池文魁、李伯瑤，然而由歸仁大人廟分靈出去的蔦松三老爺宮卻經接受石萬壽的講法，認為他們拜的是鄭成功（吳明勳、洪瑩發 2013: 108）。

（六）烏竹三千宮

烏竹三千宮由烏鬼橋（烏水橋）、竹林前兩地合建，[30] 是蔦松三老爺宮的分靈廟。烏竹里代天府三千宮於民國六十四年由陳銘傳發起召集部落仕紳籌組建廟委員會，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四日落成，奉祀「朱、池、吳」三府老爺，即朱參（陝西三原人）、池文魁（河南固始人）、吳子民（陝西三原人）。

烏、竹兩地人本來都參加蔦松三老爺宮，何以獨立建廟有幾個相關的原因。首先是交通問題，因為從烏鬼橋到蔦松要穿越台鐵火車道、一號省道，每次去蔦松參加拜拜，大人挑供品，小孩跟著去看戲，交通危險（陳柏湘 2010:54）；其次是 1975 年蔦松三老爺宮計畫改建，要烏竹村負擔百分之三十八的經費（190 萬元）；另外，烏竹人對三老爺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蔦松三老爺宮既然是從歸仁大人廟分香而來，歸仁大人廟祭拜開漳聖王陳元光的部將朱參、池文魁、李伯瑤三人，然而蔦松三老爺宮卻接受石萬壽的說法，說三老爺是鄭成功祖孫三人。這些因素加起來，烏水橋人認為不如自己蓋廟（陳柏湘 2010: 54；戴文鋒 2010: 122-4）。

然而這些都是表面上大家理解的原因，實際上背後還有神明的因素。烏竹三千宮的一位耆老說蔦松三老爺宮的三老爺「祂已預測蔦松三老爺宮會改奉祀鄭成功，以後祂會居無住所，果然不出所料」（陳柏湘 2010: 51）。意思就是說，因為三老爺已經知道蔦松三老爺宮會聽信石萬壽的話，會改祀鄭成功，祂會被掃地出門，因此暗中促成烏水橋蓋新廟，否則祂就會流落街頭無家可歸。筆者的訪問也證實這樣的說法。幾個烏竹三千宮的耆老告訴筆者，以前蔦松三老爺宮的三老爺偶爾會降駕回答信徒問題及指示事情，但自從改祀鄭成功之後，原來的三老爺就不曾再降駕，表示祂已離開。

30　三千宮由烏水橋人主導興建，後來竹林前在 1986 年才籌款加入（陳柏湘 2010:52）。此處為行文方便，就烏竹合稱。

相對之下，前面提到香港的沙江媽雖被天后吃掉，但還有點人情味，因為代表沙江媽的那塊石頭仍然被放在天后的神龕的底座裡，而且往後每隔十年的醮會時，沙江媽的名字還是會被寫在一張紅紙上，貼在神壇上，表示請沙江媽來參與（Watson 1985: 311）。可是此處蔦松三老爺宮的例子顯示朱王爺被鄭成功取代之後將流落街頭。

（七）仁德三甲三爺宮

仁德三甲三爺宮供朱、池、李三位王爺，據說廟宇創始於明代之車路墘。因為年代久遠又歷經數次翻修，2003 年改建完成，廟內拜殿柱子上對聯為：

三王朱池李，瞻聖蹟，起祥煙，香馨萬里；
爺府龍虎鳳，擁神威，凝瑞氣，顯赫千秋。

門外對聯為：

池府高功，樓船無恙，衣冠瞻漢節；
李王偉績，香火有靈，劍印仰唐封。

對聯顯示廟方對主神的看法是朱、池、李三王而非鄭成功。然而廟方也不知主神之來歷，因此邀請石萬壽來研究，石萬壽因而寫成〈台南縣文賢里埤仔頭街三老爺宮碑記〉，說三爺宮之香火分自萬年州大人廟（即歸仁大人廟），創建於清康熙五十六（1717），乾隆十六（1751）搭建簡單的寺廟。最重要的是石萬壽判定主神為鄭成功：「莊西有廟，曰三老爺宮，奉祀三曹老爺，莊嚴肅穆，威武赫奕，實我開臺聖王，賜國姓，諱成功也」。這樣的結果讓一些老信徒非常不滿，因為他們拜了一輩子的三王居然一夜之間風雲變色，變成鄭成功。廟方曾把石萬壽寫的沿革志給信徒看，但還是有一半的人不相信這是鄭成功信仰的廟宇，因此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說明是鄭成功廟（王瑋鄉 2012：111），但是，「儘管老一輩並不接受由三老爺信仰轉為鄭成功信仰之轉變，但新一代仍選擇遵從學者的觀點」（王瑋鄉 2012：30, n.104）。

（八）二王廟

康熙 23 年（1684）之《福建通志》首先記載二王廟：「二王廟在府治東安坊，乃代天巡狩之神，威靈顯赫，土人祀之」。[31] 這座二王廟位於東安坊，顯然不是現在位於永康的二王廟。

永康二王廟有一塊咸豐七年（1857）舉人鄭朝蘭所撰之「重建二王廟碑記」說：

> 郡城之北相去六七里，有二王崙焉。前里人立廟於此，崇祀關聖帝君，旁列二王，故其崙並號曰「二王」。夫祀帝君而繫之以二王者，以二王為之始基也。其始不知建自何人，迄於今，相延百有餘年矣。（《臺灣南部碑文集成》/ 甲、記（下）。黃典權 1966:317）

這裡記載說二王廟已經有百餘年，主神是關聖帝君，旁列二王。相良吉哉的《臺南州祠廟名鑑》說本廟創立於康熙 41 年（1702），祭神有二王爺、關聖帝君、清水祖師等（2002:58），至於二王到底是誰，相良吉哉說是鄭成功的三弟，他在嘉義地方爭討時落馬落命（2002:58）。黃典權認為鄭成功的弟弟都陷在大陸，只有鄭襲隨征台灣，因此此廟「當係紀念鄭襲者」（1961:76）。[32]

謝石城、陳清誥《臺南縣市寺廟大觀》列出二王是誰的三種說法，一是鄭經，他在 1681 年經過甲內（今二王）時，墜馬而亡；二是鄭成功三弟；三是鄭成功四子鄭睿及十子鄭發（1963:412）。石萬壽認為二王指鄭經（1988: 767;2009:199）。蔡相煇則認為二王指的是鄭成功、鄭經父子（1984a:43；1984b；1989:32,34,94），因為鄭克塽拜表追諡鄭成功為武王，鄭經為文王（1989:32），而且代天巡狩一詞也合於稱呼鄭成功父子（1989:33）。他認為「當地人迎祀關聖帝君為主神，降二王為陪侍神，則因清廷崇祀關帝，可藉之避清吏耳目，暗中保存二王祀統於不絕也」（1984b:36）。蔡相煇又說：「該廟現存之二王神像，與已知係鄭成功化名之池王爺並不相同，應為鄭經之實像」（1989:94）。這裡他提出「鄭成功化名為池王爺」的說法，意思是清朝時民間不便祭拜鄭成功，因為鄭、池之台語發音相近，因此老百姓把鄭成功稱為池王。蔡相煇的結論是：「我們知道稱為將軍或大王者，

31　此段引文引自蔡相煇 1989:31。筆者查核金鋐、鄭開極之《福建通志》，並未見此段文字。
32　鄭襲後亦降清。

應為鄭成功之廟，以二王合祀者，則奉鄭成功、鄭經父子二人，合稱三老爺應為鄭成功、鄭經、鄭克壓三人合祀之廟」（1989:38）。

至於說二王崙之二王廟為何不見於志書記載，蔡相煇說高拱乾之《臺灣府志》曾記載二王廟，之後因鄭氏父子靈柩已歸葬原籍，「二王廟自應被拆除或任其傾圮，故康熙朝以後所修方志，即不再見及二王廟之記載」（1984b:38）。筆者認為此處蔡相煇可能誤將東安坊之二王廟當成二王崙之二王廟。

蔡相煇的說法引起許多學者的質疑，譬如康豹（1990）、王見川（2001）、高致華（2006:146-63）；然而戴文鋒認同蔡相煇的說法，認為二王的二是數字，不是排序，因此二王應該是指鄭成功、鄭經兩人（2010:95）。

現在二王廟主祀鄭府二王爺，同祀文衡聖帝、天上聖母、大王（開台聖王）、鄭府三千歲（三王）、清水祖師等神明。由此可以看到，不但鄭襲讓位給鄭經，關聖帝君也讓位給鄭經。

四、結論

本文的目的在以鄭成功封神為例，討論 Watson 的神明標準化的說法。筆者認為事情遠非 Watson 所想得那麼簡單：地方仕紳配合朝廷的政策，大神取代小神，神明就趨於統一，文化就趨於統一。大神吃小神的事情不只是發生在香港，在臺灣更不少見。筆者認為就算是大神取代小神，也不足以推論說是文化統一，因此筆者並不同意 Watson 的說法。過去或有仕紳配合朝廷的情形，但現在政府沒有推動奉祀某神的政策，仕紳也沒有配合的問題。以現在鄭成功封神的例子來看，學者的解釋變成決定性的力量，因為學者的論述，眾神都讓位給鄭成功，大神取代了小神。

石萬壽憑著錯誤的認知按圖索驥指點江山，說這裡是禾寮港那裡是山川台，因而推論出朱王爺就是鄭成功，他的認知既然錯誤，推論也就不足採信。由開山王廟、大人廟、三老爺宮、二王廟等例子來看，都是因為學者的說法而改變了神明的命運。歷來的記載都沒有說開山王廟的主神是誰，曾有人猜測是陳稜，一直到連橫才開始說主神是鄭成功。台南府城大人廟與三老爺宮雖然是同一系統的祖

廟與分靈廟，但祖廟請甲學者來研究，就說朱李池三王是唐朝陳元光的部將朱參、池文魁、李伯瑤三人；某分靈廟請某乙學者來研究，朱李池三王居然就變成鄭成功或鄭氏三代。祖廟與分靈廟所拜的一樣的神變成南轅北轍的結果。更有學者說所有的鄭成功廟都是王爺廟改的。府城大人廟、歸仁大人廟、蔦松三老爺宮、烏竹三千宮這四座廟是分香關係，主神都一樣是朱府王爺，然而因為不同學者的解釋，府城大人廟與蔦松三老爺宮拜的是鄭成功，而歸仁大人廟與烏竹三千宮拜的是朱王爺，形成隔代遺傳的荒唐現象。

本文的目的不在判斷這些廟的主神是不是鄭成功，而是在指出這些鄭成功都是學者封的，學者成為現代姜子牙。由此可以看出神明的自我、命運居然也充滿了運氣，因為不同學者的解釋，主神可以變成不同的身份。

學者封神的背後其實暗藏著神明的辛酸與信徒的無奈。當學者說某廟的朱李池三老爺是鄭成功，那就表示朱李池三老爺被掃地出門，前面提到的蔦松三老爺就是個例子，祂已經預先知道廟方會改祀鄭成功。可以代天巡狩、替天行道、神威顯赫、能知過去未來的神明，居然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不知道自己是誰，神明的命運居然也跟歷史一樣，跟麥哲倫的航行一樣充滿了偶然（contingency）、任意（arbitrary）與運氣，幾乎沒有道理可言。

神明的自我由運氣決定，其實也是一種異化（alienation），因為人應該是受到神明庇佑的，然而現反過來是人（學者）來決定神明的自我與命運。站在信徒的立場則充滿無奈，因為拜了一輩子的朱王爺，一夜之間居然變成鄭成功。筆者在過去數年裡曾多次到三老爺宮、大人廟、永康二王廟等地訪問，不同的受訪者都表示不清楚廟內的主神原來是誰，現在既然學者說是鄭成功、是鄭經，而且泐石立碑，鐫刻對聯傳之千秋萬世，那就由他們去吧。

歷史從來都是歷史學者的寫作，鄭成功被封神也一樣，是歷史學者的寫作。過去二、三十年來後現代主義潮流的發展，對史學理論的反省，也都是建立在對歷史學者的寫作之上，譬如 Haydon White 倡議的敘述史學，Foucault 的權力論等等。由本文討論的鄭成功封神的發展看來，有的學者只要一看到姓朱的王爺就說是鄭成功，已經變成是一種機械反應，這也就是筆者在本文最前面引用列子那段話的意思，當一個人心裡有成見時，越看就越像。這樣的歷史的確如 Foucault 所說的從來都不是客觀公正的，都是歷史學者帶有目的的論述（discourse）。

最後筆者再提出一點觀察。假如真是清朝時隱諱的關係大家假借朱王爺的名義來拜鄭成功，為什麼連橫以前沒有人這樣說？為什麼假借朱王爺拜鄭成功的事情只發生在臺灣，為什麼福建從未有這種說法？

後記

2007 年 10 月，筆者到馬祖參加媽祖研討會，有幸與蔡相煇教授同住。筆者那時已拜讀他的鄭成功封神的研究，但得以聽他親口講述，更加深我對鄭成功封神之事的興趣。蔡教授對台南各地有關朱王爺與鄭成功爭議的廟宇非常熟悉，各廟的對聯都能背得出來，使人非常欽佩。研討會結束後我想到北竿芹壁去看看，蔡教授是老馬祖已經去過很多次了，他還是陪我去看。因為蔡教授的講解，我那次馬祖之行感到特別充實。現在我對鄭成功封神的想法雖然與他不同，但學術討論絲毫無妨於我對他的敬佩以及我們之間的友誼。

引用書目

小早川篤四郎
1939 臺灣歷史畫帖。台南市：台南市歷史館。

小林里平
1910 臺灣歲時記。東京市：政教社。

山田孝使
1915 縣社開山神社沿革志：附鄭成功傳。臺南市：縣社開山神社々務所。

不著撰者
1959 安平縣雜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王必昌總輯
1961 重修臺灣縣志。十五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原刊於 1752 年）

王見川
2001 台灣民間信仰的研究與調查。刊於當代台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讀，張珣、江燦騰合編。頁 61-126。台北：南天。
2004 光復前（1945）臺灣的「鄭成功信仰」。道統之美 2:64-81。

王瑋鄉
2012 臺南地區主祀鄭成功廟宇之區聯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石萬壽
1979 重興蔦松街三老爺宮碑記自註。南瀛文獻 24：39-47。
1981 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市寺廟研究之一。台南文化 新 11：39-74。
1988 永康鄉志。永康：永康鄉公所。
2002 荷蘭時期的台南。台灣文獻 53（4）:288-99。
2003 鄭成功登陸臺灣日期新論。臺灣文獻 54（3）:209-48。
2009 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台灣文獻 60（1）:197-232。

朱鋒
1995 台南的三老爺宮。刊於臺灣宗教，高賢治主編。頁 288-90。台北：眾文圖書。

江仁傑
2006 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市：三民。

江樹生譯註
1992 鄭成功和荷蘭人在台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締約。漢聲 45：1-100。
2003 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漢聲 132。
2011 熱蘭遮城日誌（四）。台南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江鍰萍
2000 鄭成功信仰的成立與發展。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葆楨
1959 福建臺灣奏摺。臺灣文獻叢刊第 29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

吳明勳、洪瑩發
2013 台南王爺信仰與儀式。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金鋐主修
1988 福建通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34,35。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原著於康熙 23 年。1684）

林桶法
2009 1949 大撤退。台北：聯經出版社。

林衡道
1979 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林鶴亭
1961 鄭成功接見荷使地點考。台南文化 7（2）：106-109。

施士洁
1965 臺灣雜感，刊於後蘇龕合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1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相良吉哉
2002 臺南州祠廟名鑑。台北：古亭書屋。（原出版於 1933 年）

涂順從
1994 南瀛古廟誌。新營：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高拱乾
1960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高致華
2006 鄭成功信仰。合肥：黃山書社。

連景初
1995 明延平郡王祠沿革考。刊於臺灣宗教，高賢治主編、頁 443-456。台北市：眾文圖書。

連橫
1953 台南古跡志。台南文化 3（1）：4-13。
1962 台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徐宗懋
2003 鄭成功歸葬河南而非福建？中國時報 2003 年 11 月 1 日。

陳文達
1968 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洋
2007 思考朱成功。刊於婆娑之眼：國姓爺足跡文物特展、吳建儀主編。頁 10-24。台南市：台南市政府。

陳柏湘 主編
2010 烏竹歷史環境文物集。永康市：永康市公所。

陳麗華
2013 傳統的重塑與再現：延平郡王祠與臺南地方社會。歷史台灣 5: 5-28。

翁佳音
2001 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二）。臺灣文獻 52（3）: 281-300。
2002 諸神讓位：鄭成功廟多現象之探究。歷史月刊 2002（12）：108-113。
2008 不變的舞台：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台。刊於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頁 207-232。台北：稻鄉出版社。

溫國良
1999 日據初期台南延平郡王祠「改號」與「列格」始末。台南文化 47：33-4。

康豹
1990 評蔡相煇著《台灣的王爺與媽祖》。新史學 1（4）: 155-162。

黃宗羲
1958 賜姓始末。臺灣文獻叢刊第 25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典權
1958 鄭延平開府臺灣人物志。台南市：海東山房。
1961 鄭成功復台三百年史畫。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1966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 218。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81 保西代天府碑誌。
1989 鄭成功復台大軍始登史事考索。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 15：171-219。

傅朝卿
1999 歷史文化傳奇：鄭成功與臺灣文化資產特展參觀手冊。台南市：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葉春榮
2014 神明標準化：媽祖信仰在中國香港與臺灣。刊於當代社會中的傳統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馮驥才主編。頁 123-139。天津市：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楊英
1958 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 32。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鄭氏宗親會編
1962 鄭成功復台三百週年紀念專輯。台北市：海內外鄭氏宗親會。

鄭道聰
2012 台南延平郡王祠沿革考及祭祀源由。台南文獻創刊號：109-116。

蔡相煇
1984a 清代台灣之鄭成功祠祀考。台灣文獻 35（3）:37-50。
1984b 二王廟與鄭成功父子陵寢。台灣文獻 35（4）:33-39。
1989 台灣的王爺與媽祖。台北：台原。

賴永祥
1956 鄭成功藩下鎮將簡表（初稿）。台南文化 5（2）:86-90。

戴文鋒
2010 永康的歷史遺跡與民間信仰文化。永康市：永康市公所。

謝石城、陳清誥
1963 台灣省台南縣市寺廟大觀。高雄市：興台文化。

謝金鑾、鄭兼才總纂
1961 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譚君炎
1956 鄭成功克台受降地點考。聯合報 1956 年 11 月 6 日。

顏興
1953 鄭氏家廟與延平郡王祠。台南文化 3（2）:18-23。
1954 鄭成功之克台及登陸地點考。台南文化 4（1）:28-34。

Coyett, Fredrik
1975 Neglected Formosa A Translation from the Dutch of Frederic Coyett's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Ed. Inez de. Beauclair.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period.

Croizier, Ralph
1977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Watson, James L.
1985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avid Johnson, Andrew J. Johnso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P. 292-324.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 Elementary Forms, Ritual Sequence, and the Primacy of Performance. *In*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James L. Watso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p. 3-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hite, Haydon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Chpt. 3. Pp. 81-10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國姓爺在台南：鄭成功文化節與府城公共歷史記憶初探 *

張隆志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Birth in a remote and exotic place marked by supernatural signs, precocity and signs of future greatness in childhood, selflessness and immeasurable benefits secured for his people, finally a premature death at the height of his powers—is this not the archetypical hero that Joseph Campbell has dubbed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Ralph .C. Croizier[1]

一、前言

本文擬以台南市鄭成功文化節為例，從當代台灣公眾歷史的觀點，探討其由地方藝文節慶，逐步轉型為跨國觀光意象的發展歷程及社會意涵。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在近年來逐漸受到台灣史學界的重視，無論是強調實用取向的應用史學，迎合讀者趣味的通俗史學，乃至充滿淑世理想的大眾史學，都不再侷限於傳統的學院歷史研究，而反映出當代台灣社會在歷史書寫主體及知識傳播媒介的民主化

* 本文感謝劉靜貞，陳麗華，陳計堯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評論及建議，文中意見及錯誤均由筆者負責。

1 Ral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3.

與多元化現象。自 2004 年彰化縣文化局「大家來寫村史」運動以來，全民寫史的風氣儼然蔚為當代台灣的重要文化現象。近十年來，隨著大眾史學的提倡和推廣，無論是史學概念的闡述，各種講習會及工作坊的舉辦，乃至於學院課程與研究中心的規劃，「人人都是史家」已成為台灣史學界的流行口號。[2]

具體而言，目前在台灣史學界關於一詞，約有以下四種概念定義：一是「通俗歷史」(popular history)，著重在學院歷史知識的通俗化、趣味化與普及化；二是「應用史學」(applied history)，討論歷史學如何應用在地方文史導覽、博物館展示及檔案方志編纂等非學院的工作場域。三是「大眾史學」(people's history)，依據周樑楷教授的定義，包含大眾的歷史、歷史是寫給大眾的、歷史是由大眾來書寫的三個意涵。四是「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強調學院知識的公共化，以及民主社會公共領域的建立與公民歷史素養的培養。[3]

相較於學院歷史學對於歷史事實的強調，公眾歷史研究則更重視歷史知識的傳播影響，以及一般大眾的歷史意識。因此文化資產與集體記憶和認同的關連，乃成為公共歷史學的重要研究領域。除了客觀事實的史料考訂，公共歷史學者更重視歷史如何被記憶，以及其中所牽涉到的知識權力關係、媒介與傳遞模式、以及當代文化與認同政治等課題。對於歷史人物的紀念。[4] 以下的討論，將以公眾史學與記憶研究的觀點，結合筆者自 2010 年以來的實地研究，對於台南市鄭成功文化節活動進行初步探討。筆者擬透過鄭成功及台南府城的個案，考察台南市鄭成功文化節活動由地方藝文節慶，逐步轉型為跨國觀光意象的發展歷程。[5]

2 周樑楷，<大眾史學：人人都是史家>，《當代》第 206 期 (2004 年 10 月)，頁 72-85。

3 張隆志主編，大眾史學專號，《歷史台灣：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8 期（2014）。張隆志解題，卡爾・貝克原著，黃煜文譯，〈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歷史台灣：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8 期（2014），頁 153-168。

4 James Gardner and Paula Hamilt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John Bodnar,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張隆志，〈國姓爺在台南：走讀鄭成功文化節〉，《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5 期（2013 年 5 月），頁 85-91。

二、作為公衆歷史的台南市鄭成功文化節

筆者將公眾歷史視為由學院、官方及民間所交織成的公共歷史論述場域，而府城的鄭成功紀念活動，則反映了歷史人物與集體記憶的互動關連。

（一）台南的都市發展與文資政策

鄭成功文化節是台南市以台灣「文化首都」為期許的重要年度節慶活動。台南地區在原為西拉雅平埔族群的生活領域。從 1624 年由荷蘭人在大員建立發展貿易基地起，歷經數百年來的發展，已經成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古都。全市現有國定古蹟 22 處，市定古蹟 109 處。市區內中式、西式及日式建築分布交錯，呈現出多元混融的城市風格。[6]

為促進文化觀光產業，台南市政府自 2000 年設立孔廟文化園區起，至 2006 年間陸續將全市景點規劃統整為孔廟、赤崁、安平港、台江、五條港及民生綠園等六大文化園區。其後並增設鎮北坊文化園區（2007）、東安坊文化園區（2008）、鯤喜灣文化園區（2010），合計九大園區。其中七個園區均以歷史古蹟為主題，成為台南旅遊的指標景點。在此同時，諸如國立台灣文學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以及台南奇美博物館等公私立大型博物館的設立，大幅提升了台南市的文化設施。而 2007 年 1 月台灣高速鐵路的通車以及 2011 年 1 月正式通車的台鐵沙崙支線，為台南的旅遊觀光，注入嶄新活力。在台南縣市合併升格之後，如何在原有的「府城」都市文化格局中，融合過去台南縣所累積的「南瀛」鄉土藝文資源， 創造出新世紀的城市意象與地方記憶，則成為大台南市文化治理的重要課題。

（二）十七世紀海洋史與鄭成功論述

對於多元文化和跨國交流觀點的強調，是近年來台灣史研究的重要趨勢。戰後對於十七世紀台灣島史及東亞海域史研究，可溯源自曹永和、江樹生及包樂史等人。他們透過古荷蘭文獻所進行的先驅性研究，為戰後以來明鄭研究與漢人開發的為主的台灣史學界，開啟了新的學術方向。而翁佳音、林偉盛、康培德、鄭維中以及美國的歐陽泰等青壯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提供了海洋史及全球史的視野。

6 洪敏麟，《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1979）。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與敘事史學，也為傳統以史料實證為主的鄭成功研究研究另闢蹊徑。例如江仁傑在《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一書中，詳細耙梳鄭成功在中國、日本及歐洲文獻中的歷史形象變遷，並說明其在不同時代官方與民間論述中的發展軌跡。[7] 而周婉窈〈海洋之子鄭成功〉一文，則在綿密史實考訂的基礎上，以優美的文筆重新描摹鄭成功的內心世界，並以史家觀點進行同情的理解與評論，為歷史散文書寫提供了新的範例。[8]

相較於學院歷史研究，近年來歷史小說與文學創作，例如醫師陳耀昌的《福爾摩沙三族記》、作家平路的《婆娑之島》及蘇上豪的《國姓爺的寶藏》等作品，更為當代台灣的鄭成功論述，增添了更豐富的想像及趣味。[9]

（三）台南在地文史研究

在官方文化政策和各項硬體建設之外，台南民間眾多地方文史團體和社區營造組織，在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與古蹟活化運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舉辦各類鄉土歷史活動，宣導文化資產保存觀念，到監督主管機關及鼓勵社區民眾參與，乃至於進一步籌辦文化節慶活動、設計文化商品、輔導特色產業、組訓導覽解說志工，發展地方文化產業等工作。

例如 1999 年台南首次以「國姓爺、延平郡王、開台聖王」為主題，舉辦「鄭成功與台灣文化資產」特展，便是由成功大學傅朝卿教授與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策劃執行。[10] 近年來積極參與鄭成功文化節活動的台南市文化協會，其前身則為 1993 年台南市文獻委員鄭道聰於安平成立的赤崁文史工作室。[11] 此外如前成大教授石萬壽主持的「鳳凰城文史協會」，成功大學陳梅卿教授參與推動的台南市五條港社區發展協會，以及台南市社區大學等組織，都可以看到歷史與建築學者及在地文史工作者的活躍身影。[12]

7　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2006）。
8　台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http://tmantu.wordpress.com/。
9　張隆志，〈國姓爺在台南：走讀鄭成功文化節〉，頁 82-83。
10　傅朝卿主編，《鄭成功與台灣文化資產研討會論文集》（1999）。
11　陳奮雄主編，《台南市文獻半世紀》（2003），頁 489-585。黃典權著，丁煌、何培夫編，《海盜、香火、古港口》（台北：蔚藍文化，2017）。
12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台南風土描繪特展專刊》（2018）。

三、從地方節慶到跨國意象：台南鄭成功文化節的活動發展與論述轉型

台南市的鄭成功文化節，是台灣少見的以歷史人物為主題的紀念活動。府城鄭成功相關文化節慶，可以溯至 1990 年代文建會全國文藝季的「發現鹿耳門」（1993）及「發現王城」（1995）活動。1999 年台南市政府首次舉辦「國姓爺、延平郡王、開台聖王：鄭成功與台灣文化資產」特展主題特展。此一以歷史人物作為地方文化資產及觀光節慶活動，是由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所策劃。該展覽的宗旨，即以「重構鄭成功主軸文化的意義」為題，提出重新建構生活化的鄭成功文化資料，鄭成功與台灣文化資產，以及以鄭成功為主軸的文化活動的呼籲。認為其兼具國際性與本土性的雙重性格，以及民族英雄、祖先、神明及傳奇人物的四種文化特質，除可結合文化資產、廟宇宗教信仰及各種文物傳說及文化活動，亦可串聯台灣、中國大陸、日本與荷蘭等地官方和民間團體，從而成為台灣文化發展的重要觸媒。[13]

台南市鄭成功文化節活動，是在官方與民間的合作下，以傳統地方文史、宗教民俗與宗親組織為基礎，結合社區營造、文化資產及城市觀光等現代經營理念的集體努力成果。自 2002 年起正式舉辦鄭成功文化節，成為台南市年度重要文化節慶活動。歷年來的活動與特展主題包括「發現王城」（2002）、「邁向成功」（2005）、「壯闊領航」(2006)、「婆娑之眼」(2007)、「王者再臨（2008）、「成功領航」（2009）、「城市的榮光」（2010）、「成功啟航」（2011）、「世界的大員」（2012）、「蔦瞰西拉雅」（2013）、等。自 2004 年起，朝國際化方向發展，於 2007 年首次結合來自日本平戶松浦史料博物館、中國廈門鄭成功紀念館及奇美博物館等的跨國展品，舉辦「國姓爺足跡文物特展」。並自 2005 年起，由文建會補助進行「十七世紀台灣船復原重現計畫」，「台灣船」2010 年 12 月，從台南安平港出發試航至鹿耳門。由國家地理頻道製作「鄭成功古船重現」紀錄片，

13 傅朝卿、詹伯望，《國姓爺、延平郡王、開台聖王：圖說鄭成功與台灣文化》(台南：台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6)

亦於 2011 年 10 月台灣首播。[14] 經過十年的經營發展，已不再是過去政治性的官式祭典，而轉型成為結合地方政府、學院學者和民間團體的城市文化節慶。

在歷年舉辦的文化節中，以 2011 年的活動最為盛大。該年適逢鄭成功開台 350 週年和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更是 2010 年 10 月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後，首次擴大舉辦的文化節慶。在延平郡王祠的祭典包含了來自內政部、金門縣、日本平戶及中國福建的與會來賓，以及廣場中來自台南和台灣各地的鄭氏宗親代表。作為府城代表性的年度節慶觀光活動，擴大舉辦的 2011 年鄭成功文化節，包含了文物特展、表演晚會以及專題研習等系列活動。

其中最具特色的活動，除了由台灣、中國及日本博物館跨國合作的「成功啟航：十七世紀船舶文物」特展，還有「台灣成功號」古船再造的開放參觀、由府城、金門、漳州、泉州合作的「台海一條街」四城美食觀光交流展。此外亦是由在地志工導覽的「鄭成功開台承天府漫步之旅」和「鄭成功開台港埠之旅」[15]。這兩項導覽活動，是由台南市政府委託台南市文化協會承辦，並由台南市文化古蹟導覽解說發展協會協辦。參與者可以親身感受這位被稱為國姓爺、延平王和 Koxinga，擁有民族英雄、開台祖先及神明傳說等多重形象的歷史人物，在當代台灣、兩岸及國際上的魅力。[16]

14 「鄭成功開台港廟文化之旅」，希望透過巡訪與鄭成功有關之古蹟景點，重回當時歷史場景，深刻體驗這位歷史人物對台南土地的影響。由台南市文化協會規劃，活動路線：延平郡王祠→安平熱蘭遮城殘蹟→北線尾古戰場→佳里北頭洋荷蘭井→中洲鄭王軍民上岸之處→鹽水台灣詩路→鐵線橋港→麻豆古港碼頭→善化慶安宮→永康鄭成功墓紀念碑→延平郡王祠。資料來源：http://210.71.254.189/min-nan/zheng.html

15 「鄭成功開台港廟文化之旅」，希望透過巡訪與鄭成功有關之古蹟景點，重回當時歷史場景，深刻體驗這位歷史人物對台南土地的影響。由台南市文化協會規劃，活動路線：延平郡王祠→安平熱蘭遮城殘蹟→北線尾古戰場→佳里北頭洋荷蘭井→中洲鄭王軍民上岸之處→鹽水台灣詩路→鐵線橋港→麻豆古港碼頭→善化慶安宮→永康鄭成功墓紀念碑→延平郡王祠。資料來源：http://210.71.254.189/min-nan/zheng.html

16 2013 年鄭成功祭典暨開台 352 週年系列活動「尋跡、尋蹟－文化之旅」，分別由台南市文化協會、鹽洲社區發展協會、永康文化協會、鹿耳社區發展協會主持，規劃出四條史蹟巡禮路線，1、鄭成功開台足跡文化之旅，活動路線：延平郡王祠→鄭成功登台之地鹿耳門古廟遺址→中洲鄭王軍民上岸之處→陳桂記大宗祠開台祖媽鄭氏細娘之墓→南科考古陳列室→永康蔦松遺址→永康鄭成功墓紀念碑；2、永康洲仔尾文化之旅，活動路線：洲仔尾保寧宮→禹帝宮→天后宮→三炭店→蔦松三老爺宮→北灣里國聖宮；3、鄭成功開台港廟文化之旅，活動路線：大灣廣護宮→蔦松三老爺宮→洲仔尾保寧宮→永康鄭成功墓址紀念碑→鹽行天后宮→二王廟→古鯽魚潭遺跡等；4、重回北汕尾鹿耳門—尋找鄭成功登陸的足跡，活動路線：台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一帶。資料來源：http://newculture.tncg.gov.tw/creativetainan/News.php?id=123

2011 年以「成功領航」為主題的鄭成功文化節，亦反映了當代台南重塑民族英雄的歷史形象的新論述。例如籌辦「鄭成功開台港廟文化之旅」的府城民間文史團體，在以下活動宗旨中強調鄭成功在台灣開發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個人生涯的特殊性：

> 鄭成功，台灣人稱其為開台聖王，是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鄭成功與台灣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 1661 年四月登陸台南鹿耳門，設置郡縣行政區域，漢人開墾台灣肇始於此，雖然鄭成功在台灣只有短短的十四個月即病歿，其子與孫三世共統治台灣二十二年，卻開創了台灣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他的生平事蹟使其在歷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有中日的血統，為權貴之後，生處亂世動盪的時代，受封延平王，承擔著明朝宗室的維繫存亡，是外國人眼中的「國姓爺」，是東方海權的代表性人物，在台灣死歿為神，三百多年來民間信仰的香火供祀不斷。其歷史定位在歷經清朝、日本、民國等不同政權，皆受當權尊崇，這樣的歷史人物跟台灣的關係如此密切，但到底有多少人曾認真去認識他，去瞭解這位歷史人物對我們究竟有什麼正面的文化意義。為配合台南市政府鄭成功文化節活動，特規劃與鄭成功歷史事跡相關的景點，做為文化深度之旅的導覽路線，以增加民眾對這位歷史英雄的認識。

另一方面，台南市文化官員則致力凸顯鄭成功的海洋形象及其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意義。例如文化局長葉澤山在《2011 年文化節活動成果專輯》的序言中，便以「鄭成功的文化形象」為題，作了以下的闡述：

> 鄭成功生活的時代雖然離現在已經有三個多世紀，然而通過各個時代的言記，卻又一次次的「復活」在我們的眼前。不同時代、不同區域的人們，基於不同的立場訴說各自的「鄭成功」……近數十年來，東西方學術界對於鄭成功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解讀，不再僅以從政治、軍事或民族主義的角度論述，而是擴展到從經濟、商業、海洋文化等方面，研究鄭成功及其海商集團，藉以探討東西文化的融合的進程。二十一世紀以來，海峽兩岸及日本與鄭成功有關之城市，如台南市、廈門市、南安市、平戶市，更藉由其歷史文化資源各自舉辦「鄭成功文化節」，重新定位鄭成功的海洋形象及文化價值，擴大行銷並提升城市的競爭力，以呼應全球化時代海洋世紀的潮流。今年適逢鄭成

> 功開台 350 週年，這段歷史開創了台灣社會的發展，因此在台灣文化的論述上，鄭成功是民族祖先、開台英雄、乃至於地方神明。在以中原文化為正統的文化觀念中，我們容易忽略十七世紀他的海商集團，在東亞海域連結第一波全球化的意義……本次展覽內容即是以台灣、福建籍日本九州平戶有關十七世紀的海洋文物，體現台灣多元的文化、國際貿易的興盛與周邊關係的密切，先民冒險奮鬥的精神。希望讓參觀者重新認識鄭成功及其所代表的海洋文明，那段歷史不但是中國歷史上乃至於東亞第一次發展出海權力量，也是台灣本土海洋社會的開端。

上述兩段引文，分別反映了府城在地文史界與文化官員對於鄭成功歷史形象的詮釋觀點。而自 2011 年以來，鄭成功文化節除了是台南府城重要的地方節慶，也成為兩岸以及台日民間觀光交流的重要活動，呈現出更為多元複雜的論述型態。作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台灣歷史人物，鄭成功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文化符碼，其歷史形象與紀念方式，也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從過去的「神化」到當代的「生活化」，以及在「開台」與「海洋」文化意象中，對於其本土性及國際性的強調，乃成為當代台南鄭成功論述與文化節活動的首要特色。

四、鄭成功文化節與府城的公共歷史記憶

鄭成功文化節作為台灣公眾歷史論述的重要個案，涵蓋了學院歷史研究、官方紀念活動、民間信仰祭儀、以及當代藝文節慶，四個不同而相關的面向。從台南人對於鄭成功紀念活動中，我們可看到前述公歷史與集體記憶的特徵。雖然鄭成功波瀾壯闊的生涯橫跨日本、中國及台灣三地，其在台灣僅僅一年九個月便英年早逝。然而直到今日，在台南府城與台灣各地，民眾對於鄭成功的記憶，仍透過史蹟文物、廟宇祭祀、地名傳說、圖像雕塑、戲曲展演、地方美食等媒介持續綿延。[17] 而由官方與民間舉辦的春秋祭典與紀念活動，則成為傳承記憶的重要儀式。[18]

17　婁子匡，《鄭成功》〈北京大學民俗叢書〉（中國民俗學會複刊，1970）。
18　陳麗華，〈傳統的重塑與再現：延平郡王祠與台南地方社會〉，《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5 期（2013 年 5 月），頁 5-28。

相較於不同政權對於鄭成功的歷史形象的挪用與宣傳，台灣民間對於國姓爺的記憶與想像，則呈現出多元的風貌，從文本到圖像、從建築到文物、從傳說到食物，成為島嶼庶民生活記憶的一部份。鄭成功文化節的舉辦，便是在台南社會生活與文化記憶的基礎上，由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所推動的紀念節慶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時代潮流中，文化資產保存與塑造社區認同的呼聲，取代了過去對於登陸地點的地方派系論爭。對於文化觀光產業與常民文化記憶的重視，取代了過去反共復國式的官方政治宣傳。鄭成功亦不再只是民族英雄與偉人神話，而是個性格分明、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而隨著兩岸與跨國文化交流的頻繁，鄭成功的海洋形象及國際性格，則取代反清復明與儒家節孝，成為新的歷史敘事主軸。[19]

上述集體記憶內涵的發展及轉變，可見於 2011 年鄭成功文化節展示內容的設計。在鄭成功文物館舉行的「成功啟航：十七世紀船舶文物」特展中，策展者引用荷蘭文史料的記載，重新塑造鄭荷戰爭與議和過程中的鄭成功形象。亦不避諱提及鄭成功殘忍處決荷蘭傳教士 Anthonius Hambroek（1607 － 1661）的歷史情節。相較於過去中文史料所呈現的刻板印象，諸如江樹生譯註的《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及《1662 年鄭成功與荷蘭人的締和條約》，以及小早川篤四郎的《台灣歷史畫帖》，尤其是顏水龍所繪的《傳教士范無如區訣別圖》，更生動描繪歷史人物的相貌神情與性格作風，提供觀賞者更多元的思考角度。[20]

直到今日，在台南府城與台灣各地，民眾對於鄭成功的記憶，仍透過史蹟文物、廟宇祭祀、地名傳說、圖像雕塑、戲曲展演、地方美食等媒介持續綿延。而由官方與民間舉辦的春秋祭典與紀念活動，則成為傳承記憶的重要儀式。國姓爺與台南府城的歷史故事，因展示活動與文化想像而呈現出更多樣的色彩與風貌。鄭成功也不僅是台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成為歷久彌新的文化符碼，從民族英雄崇拜、地方藝文節慶、到跨國文化交流，持續地影響著我們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時代潮流中，文化資產保存與塑造社區認同的呼聲，以及對於文化觀光產業與常民文化記憶的重視。使得鄭成功亦不再只是民族英雄與偉人神話，其海洋形象及國際性格，取代反清復明與儒家節孝成

19 沈芳如，〈《台南文化》與戰後台南「府城」集體記憶的建構，1951-2001〉，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8）。

20 江樹生，〈鄭成功在台南〉，《2007 海洋台灣與鄭氏王朝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5-46。

為新的歷史敘事主軸。而環繞著鄭成功紀念活動的爭議，衝突與協商，則提供了吾人深入認識當代台灣集體記憶、多元文化與認同政治的重要案例。相較於不同政權對於鄭成功的歷史形象的挪用與宣傳，台灣民間對於國姓爺的記憶與想像，呈現出多元的風貌，從文本到圖像、從建築到文物、從傳說到食物，成為島嶼庶民生活記憶的一部份。鄭成功文化節的舉辦，便是在台南社會生活與文化記憶的基礎上，由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所推動的紀念節慶。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由學院、官方及民間所交織成的公共歷史場域，鄭成功文化節的相關論述轉變，也提供了我們反思歷史人物紀念與社會集體記憶的互動關連，以及當代台灣研究「記憶轉向」趨勢的重要契機。[21] 以下試就三方面做一初步討論。

（一）記憶間的爭議、衝突與協商：由於學術和社會氛圍的轉變，近年來對於鄭成功及鄭氏集團在海洋史及貿易史面向的角色記憶逐漸突出。而台南縣市合併後，相關歷史地景與人物敘事，亦需要進行記憶整合。各種不同的歷史記憶之間雖有彼此包容並存的現象，但亦需處理其間爭議、衝突與協商。例如文化局和民間導覽活動的主辦者如何處理論述競爭的關係。而鄭成功開台港廟文化之旅等活動的設計與執行，亦反映了縣市合併後之後如何整合府城與南瀛記憶的問題，均值得研究者加以關注。

（二）記憶政治中的社會行動者：台南鄭成功文化節的參與成員，包含了從文章中可以中央政府、台南市政府、在地學者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不同群體，並延伸至各地宗親會組織，以及國外相關地方博物館等。從文化活動的主導倡議與經費來源，到在地導覽與宣傳活動的傳播管道，乃至涵蓋了文本圖像、建築空間、文物展示、乃至於傳 故事與觀光美食等多元的節慶記憶內涵，均有待研究者加以深入探索。

21 戴麗娟，〈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思想史》3 (2014.9)：191-240; Barry Schwartz,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Forge of National Memory* (2003), *Abraham Lincoln in the Post-Heroic Era: History and Memory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2009)。

（三）公共歷史記憶的傳播與影響：作為台南市的代表性文化節慶活動，鄭成功文化節除了利用平面海報與新聞廣播等傳統傳播手段，亦結合了網路數位等新媒介進行宣傳。研究者尤其需要對於實際參與觀眾的數量、類型及參訪經驗加以考察。從而瞭解民　對於鄭成功的印象與鄉土教材的異同，以及實際參與者的感受。而歷年活動主題與內涵的不同所呈現出的時間層次差異，亦是值得加以觀察和分析的重點。

五、代結語

本文從公眾歷史的分析觀點出發，指出鄭成功文化節的案例，可以呈現歷史人物與知識，是如何在不同的實踐中被重構，甚而成為指向未來的基礎。國姓爺的歷史作為現在跟過去不斷的對話，除了強調其本身歷史事實的考證，亦應重視其相關知識與形象的傳播及影響。未來如何結合知識溝通與傳播的探討，對於促進歷史學與文化資產研究的跨領域對話，應是重要的課題。作為當代台灣的公共歷史事件，文化節透過各種紀念儀式、展覽、研習和表演等系列活動，重新召喚我們對於國姓爺及台灣歷史的集體記憶。如同前文所介紹的，台南人所記憶的國姓爺，並非神化的民族英雄，亦不同於官方的政治宣傳及客觀的學術研究，而是有血有肉的悲劇人物。而展示中所呈現的歷史場景，亦不僅是重現數百年前的戰爭風雲與衝突暴力，更反映出是當代對於海洋文明與區域交流的想望，以及地方記憶與城市認同的願景。

此一具有「千面英雄」形象的國姓爺，自 2011 年成功啟航的紀念高潮活動之後，又歷經了來自平埔原住民的抗議，[22] 美國全球史學者的重估，[23] 民間史家的刻劃，[24] 以及官方祭祀制度的變革。[25] 至 2018 年「成功洋芋片」及「成功啤酒」等新人氣商品成為新聞話題，[26] 並成為暢銷紀錄片電影《看不見的台灣》的故事背景。[27]

22　蘋果日報網站，2016 年 7 月 28 日，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728/917132/。
23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台北：時報，2013）
24　張溪南，《明鄭王朝在台南》(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
25　自由時報網站，2017 年 4 月 23 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96519。
26　中時電子報網站，2018 年 8 月 3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03003882-260405。
27　《看不見的台灣》臉書專頁，https://zh-tw.facebook.com/AJourneywithInvisibleFriends/。

在歷史公共化、節慶化及生活化的過程中，觀眾們親身參與並體驗重返歷史現場的趣味，並各自進行其對歷史的思考和評論。在府城特有的敦厚人情與溫暖的古都氛圍中，此一集體歷史記憶的建構過程，遠較其他城市的同類節慶更為開放、多元而生動。從「鄭成功是誰」的爭議到「鄭成功如何被紀念」的反思，台南市鄭成功文化節作為當代重要的公眾歷史個案，將持續成為承載及展演台南府城及台灣島嶼歷史的「記憶所繫之處」。[28]

28　戴麗娟譯，Pierre Nora 主編，《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台北：行人出版社，201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Ⅴ：早期南瀛／劉益昌，賀安娟 (Ann Heylen) 主編．-- 初版．--
臺南市：南市文化局，民 108.09
面；　公分
ISBN 978-986-05-9884-1(平裝)

1. 區域研究 2. 社會生活 3. 文集 4. 臺南市

733.9/129.07　　108013626

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Ⅴ：早期南瀛

Nanying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Ⅴ：Early Tainan Region

主 辦 單 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承 辦 單 位：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發　行　人：葉澤山
總　策　劃：葉澤山、何宜芳
主　　編：劉益昌、Ann HEYLEN（賀安娟）
編輯委員會：植野弘子、林玉茹、Fiorella ALLIO（艾茉莉）、
謝國興、戴文鋒、劉益昌、葉春榮、Ann HEYLEN（賀安娟）、
陳恒安、陳文松
編 輯 助 理：溫勝智
出　版　者：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地　　址：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 段 6 號 13 樓
電　　話：06-6325865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http://culture.tainan.gov.tw
設 計 印 刷：高展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 年 月：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初版
I S B N：9789860598841
G P N：1010801388
定　　價：新台幣 550 元整
展　售　處：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創發展科